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血肉之躯——劳伦斯传



作者序

1875 年圣诞节后的第 2 天，在诺丁汉的一个村镇上，一位做过学校老师的妇女和一个煤矿工人结婚了。在这以前她从未见过他下矿井时的穿着，对镇外煤村里矿工的生活一无所知。他把她带到了矿工们中间，晚上当他从矿上回家时，她还以为是个黑人闯入了屋子。

这个男人蒙满煤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并坚持说他是她的丈夫。最后当她相信了以后，她叫他赶紧去洗个澡，因为晚饭已经做好了。但他洗了一下手便坐到了厨房的餐桌旁。

“可你还未洗干净呢，”她说。

“啊，姑娘，”他说，“我已经洗过手了，不是吗？这是煤的脏污——是干净的脏污。”

她强迫自己吃完了饭。

然后，她的丈夫要她准备一浴盆热水。水烧好后，他脱光了衣服说：“来吧，姑娘，该帮我擦背了。”那妇人还有些犹豫，男人说：“我自己洗不着。”

她帮他背上的煤污擦下来时，心里一阵阵作呕。当柔软的热毛巾摩擦着他的肌肤时，他轻声地唱起歌来。有许多矿工爱唱歌，他的歌喉在他们中间颇有名气。

就是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在将近十年以后，成了 D. H. 劳伦斯的父母。

丛书总序

戈宝权

在我的案头上，摆着厚厚的一摞书，是刚从“秋风万里芙蓉国”的湖南捎来的，它们散发着淡淡的墨香。我惊喜不已，湖南文艺出版社竟在出版界不景气的今天，接连出版了那么多世界名人传记，我感到欣慰。丛书主编郭铎权同志在信中告诉我，第一辑十二种书印了两万套，第二辑十二种书初版拟印一万套。据我所知，在全国几百家出版社中，成辑出版如此多世界名人传记，实属少见。

翻阅这套丛书之后，我百感交集。我们的社会今天太需要这样的图书了。如果三十年前某个出版社能如此系统地、不间断地出版这样一套介绍世界名人的大型丛书，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出书，受这套丛书恩泽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就能更多一些，这种潜移默化的效应是无法估量的。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今天，湖南文艺出版社以魄力和道义为青少年和全社会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我由衷地感到敬佩。

我多次去过俄罗斯，并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前苏联有一个著名的“青年近卫军出版社”，从1933年开始到苏联解体时为止近60年间，几乎不曾间断地出版《名人传记丛书》。这套丛书是俄国文星高尔基倡导的。早在十月革命前夕，他曾设想为遭受战争和愚昧蹂躏的俄罗斯青少年编辑出版一套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并聘请文学大师罗曼·罗兰、威尔斯等人撰稿。1916年12月，他写信给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请求他执笔写一本贝多芬传，回信中，罗曼·罗兰颇为感慨地说：

“我们成年人不久将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将留给我们子孙的，是一份可怜的遗产，我们将留给他们十分忧郁的生活。这场荒谬的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者）便是我们道德衰竭、文化没落的明证。我们应当提醒我们的后代，各个民族都曾有过的——而且现在也有——伟大的人物、高尚的心灵。您自己非常了解，在今天没人比下一代更需要我们关怀的了。”

高尔基给前苏联千千万万青少年做了一件为后人称道的实事。这套丛书囊括了近千位世界名人的生平和奋斗史。其中有文学家、科学家、政治家、教育家、音乐家、美术家、工程师、宇航员等。雨露滋润着世间生灵。半个多世纪来，前苏联的教育机构造就了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润物细无声”，许多青少年受益于这套丛书。郭铎权同志告诉我，他去年在访俄期间亲眼看到，在许多学校、工厂、机关的图书馆里仍珍藏着这套丛书，甚至在一些教授、新闻记者、中学教师、工人、农民的家庭小图书库里也把它当作珍宝收藏起来。

人生如一湾小溪，历史是一条长河。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是由杰出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著名人物，不断更新和完善自己所处时空的文明史并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英国发明家斯蒂芬森发明的火车，从利物浦驶向世界，推动了英国的产业革命，推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爱迪生发明的电灯缩短了人类历史昔日缓慢的航程。毕达哥拉斯、达尔文、诺贝尔等巨人更是人类杰出的精英。文学大师莎士比亚、列夫·托尔斯泰、歌德、雪莱、拜伦、车尔尼雪夫斯基、雨果等人杰则用智慧、良知去剖析世界，剖析灵魂，讴歌正义和真善美，揭露暴力和专制，他们给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给人类带来了美好、善良和希望，他们企盼着人类社会不断自

我完善、跨入一个又一个崭新的、文明的、公正的门槛。

作为一名作家和文学研究工作者，并以一个读者的名义，我衷心希望湖南文艺出版社持之以恒，继续出好这套对我国社会和现实，对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带来知识、榜样、良知、智慧和力量的丛书。我国的读者需要这套丛书，我们应该向教师和家长推荐这套丛书，希望他们的学生和子女认真读一读这些书，从中汲取营养，师法世界英才不畏艰辛，敢于攀登知识高峰，勇于探索正确人生之路，努力奋斗，自强不息，为真理和正义献身；学习名人对祖国、对社会、对民族、对人类的责任感、使命感。不贪图安逸和享受，应该成为青少年的新风尚、新道德准则。全民族文化素质下降，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的抬头是社会大厦精神支柱倾覆的不祥之兆。我希望青少年朋友首先要追求人生开拓、奋进的真谛——猎取知识。我相信，伟大的中华民族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一定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成为一株文化与知识的参天大树。我确信，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中将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对人类各个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像诺贝尔、贝多芬、达尔文、列夫·托尔斯泰一样的举世英才。

我还想和青少年朋友谈一点个人体会：世间的每一位名人英才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各异，他们的思维空间、智慧、创造力也有其局限性。我们万不可囫圇吞枣一般地学习和承袭。

据悉，人民日报将和湖南文艺出版社举办世界名人知识大奖赛，这将是我国出版界的一件十分有意义和值得称道的事。时下，一些师出无名的“大奖赛”充斥社会，使一些涉世不深的青少年扑朔迷离，荒废学业，甚至误入歧途，这难道不使一些莫名其妙的“大奖赛”的始作俑者感到汗颜吗？十年“文革”绝不亚于一场战争。使我们丧失了多少人才，损失了多少时间和机遇，滋生了多少“文盲加流氓”！至今“文革”的后遗症仍斑斑可见，这是我们民族应该永远记住的教训和耻辱。我们的社会舆论应该鼓励什么？我以为要鼓励类似人民日报和湖南文艺出版社共同举办的这种旨在为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竞赛，社会各界也应该支持这种引导青少年读书、激励青少年成才的活动，我们的“关心青少年”的口号才不会落空。

岁月匆匆，人生易老。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进入垂暮之年的我，正在和病魔顽强搏斗。有生之年能有幸看到湖南文艺出版社的《世界名人文学传记丛书》一辑接一辑地出版，这套丛书愈来愈受读者和社会的青睐与器重，无疑也将是我感到十分高兴的事了。是为序。

1993年盛夏于北京

血肉之躯——劳伦斯传

第一部 在诺丁汉的日子

（一）祖先的遗音

大卫·赫伯特·理查兹·劳伦斯于1885年诞生在伊斯渥，这是位于诺丁汉郡埃华希山谷旁的一个煤村。在那里，那美丽的自然景色，那残存的舍渥德森林与那工业区的简陋，那些耸立的煤井井架和遮盖田野的烟雾不协调地交织在一起。

20世纪的末期，这地区的一些地方的景象正如劳伦斯的稚童的目光所看到一样。现在那里很少能见到满脸污黑的矿工，他们也不再在煤尘中唱着歌回家了。诺丁汉公路上颠簸的公共汽车和公路两旁奔驰的小汽车当然是后来的事情，但劳伦斯童年时代所见的那些房屋许多还依然竖立在狭窄的街道两旁。伊斯渥更老一些的建筑也都带有工业革命后的面貌，虽然这地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远。当年诺尔曼人巡视他们的征服地时，他们曾指定伊斯渥（当时称伊斯维克）为一块采地，这里，自由民们曾蹒跚着在犁后播种，猎人们曾带着猎鹰骑马驰骋。伊斯维克离诺丁汉要塞不到9英里，这个诺丁汉郡城对以后劳伦斯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其他许多对他青少年时期有过重要影响的地方都在诺丁汉的另一个方向，位于他故乡的北部和东北部。他是一点一点熟悉这片乡土的；作为一个屠弱的孩子，他迈着轻轻步履，日复一日地走遍了他未来作品中的田野山川。

在他的自传体小说《儿子和情人》（1913年）的前一些篇章中，劳伦斯戏剧化地将他父时间旷日持久的争吵描写成一种超出两个人之间的冲突：那是一种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斗争，在此劳伦斯将自己置于两个阶级之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总是处于这样一个无人地带，一个有利于艺术家的位置，而他后斯诗作中一首叫《红鲱》的诗（“我的父亲是一个劳动者……我的母亲有个高贵的灵魂……”）则是一种夸张。诚然，在他童年时代，他的父亲确实下过矿井，但他并无真正地道的无产阶级传统，因为劳伦斯的父亲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他确实确实来自于和劳伦斯的“高贵的”母亲一样的家庭；两个家庭至少也因为婚姻而发生了关系。

劳伦斯夫妇在诺丁汉安下了家。D·H·劳伦斯的祖父约翰·劳伦斯就是在这个城市长大的，或许就出生在这里。他后来做了裁缝在伊斯渥东部的布宁斯列定居。他是在诺丁汉向他的继父乔治·杜雷学得手艺——根据D·H·劳伦斯的哥哥乔治·劳伦斯所说，他是在约翰母亲的丈夫战死于滑铁卢以后与她结婚的。

约翰·劳伦斯体魄强壮，年轻时是位有名的运动员。那时候，特伦特河上的水上体育十分流行，特别是在考维克河上的四桨划艇比赛，约翰·劳伦斯就是当时一名著名的划手。然而，使他最为声誉卓著的是他在拳击场上的业绩，他高大硕重的身体和一双大手赋予他非凡的力量。他还曾在一次非正式比赛中与本·考特对垒，这确实是劳伦斯家族的一桩传奇故事。考特在连胜101场比赛以后，于1840年成为“英国冠军”，但此“传奇”说，当他非正式地与约翰·劳伦斯交手时，劳伦斯竟击败了他。

约翰·劳伦斯在1853年或1854年迁居到布宁斯列。开始，他在那儿的生意还算稳定，因为那时候矿主要发给矿工们下井穿的服装。D·H·劳伦斯

记得孩提时代他祖父的裁缝店里大捆的做工装用的法兰绒，和那“古老，奇怪的缝纫机，非常特别，祖父就是用这种机器来缝制矿工服。”然而，劳伦斯的姐姐埃达对当时情景的回忆要温雅得多，她只记得她祖父特别善于“缝制绅士礼服。”

约翰，劳伦斯的妻子萨拉，是诺丁汉的一位花边和丝绸制造商亚当·帕森斯的女儿，约翰和萨拉劳伦斯在1846年6月18日成了阿瑟·约翰·劳伦斯——D·H·劳伦斯之父——的父母。他后来所娶的那位“高贵的灵魂”，丽蒂娅·比尔德骚比他小6岁。丽蒂娅是诺丁汉人，她父系的先辈离开德比郡的沃克斯渥以后就到此定居了，比尔德骚家族曾在那里当过制革匠，花边制作业兴起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向诺丁汉迁移。按照家族的传说，丽蒂娅的祖父曾在城市里发了财，但在花边市场颇不景气时破了产，此事大约发生在1837年的萧条时期，当时约有十分之一的花边制造商行被迫倒闭，大约有十二分之一的人口靠救济活命。

丽蒂娅祖父的破产倒闭“严重地羞辱了”他的儿子，我们可以认为在《儿子和情人》一书中的这句描述就是指的这种情景。这位“被羞辱了的”男子——D·H·劳伦斯的祖父，乔治·比尔德骚——是个虔诚的教徒。作为一个圣保罗信徒的工程师，比尔德骚对神学的兴趣不仅限于阅读；他还是一个有名的牧师，常常在韦斯雷茵的讲坛上布道。在劳伦斯的兄长乔治看来，这位祖先是“一个了不起的老家伙，”当20年代访问肯特的希尔尼斯时，乔治·劳伦斯发现，时隔五十余年，人们“仍对他当年布道的情景记忆犹新。”乔治·比尔德骚与他的诗人孙子一样，也以爱争辩著称；其中最有名的是他和化学家杰西·布特（后为特伦特勋爵）之间关于如何管理诺丁汉的非国教教堂的争论，以及和威廉·布斯之间的争论，此人劳伦斯曾常常提及，因为他和劳伦斯的祖父共同创建了那个后来发展成救世军的组织。

年轻的时候，乔治·比尔德骚曾在诺丁汉为詹姆斯·卡弗尔和约翰·莫斯利做事，他俩是第三和第五布契尔街的纺车简管和车架的制造商。在去希尔尼斯当码头工头之前，比尔德骚娶了丽蒂娅·牛顿，她的外祖父约翰·牛顿的故事，对于理解劳伦斯的家庭背景也十分重要。

这位D·H·劳伦斯的曾外祖父是个赞美诗作者，颇有名气；但大家不要将他与另一位更早期的约翰·牛顿（1725—1807年）混淆起来，后者是考珀的合作者。这位诺丁汉的约翰·牛顿，生活于1802至1888年之间，在他的家乡最为著名，他的赞美诗在英格兰的各非国教教堂里也广为传诵，他的《至高无上》一诗是非国教教徒们最喜爱的颂歌之一。

D·H·劳伦斯的兄长乔治认识这位老人；在乔治童年时期，一次他母亲病了，他便与他这位曾祖父在斯尼恩顿相处了一年，他记得约翰·牛顿“细长而瘦削，体质虚弱，就像后来的D·H·劳伦斯一样。乔治·劳伦斯在1950年对本书作者说，这位老人曾多年在花边业谋事，退休后“常常在家坐于钢琴前。”

一位熟知约翰·牛顿的人这样写道，“他有九个孩子，在他年迈时他为自己的聪慧、为还能领悟音乐的美妙而感激上帝，因为那上苍之音就在他的灵魂深处，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乔治·劳伦斯回忆，为了替他操持家务，这位老人的一个女儿曾在家里待了许多年。

劳伦斯对这些人已不太清楚了，即使略有所知，也是印象极微。但这些先辈中的每一个人，肯定在他童年时期留下了影响。他对他的祖父母很熟悉；

他也肯定几次见到过他的外祖父；丽蒂娅·比尔德骚·劳伦斯肯定经常谈起她的那位写赞美诗的祖父，并在劳伦斯家的客厅的那架“叮叮咯咯的钢琴”前弹奏他的赞美诗。

约翰·劳伦斯，这位成为矿区裁缝的运动员，和他从小就当矿工的儿子阿瑟·乔治·比尔德骚，这位宗教热衷者和爱争吵的工程师以及他的多愁善感的女儿（她的外祖父即是那位著名的赞美诗作者）——在红砖墙住宅和煤烟飘浮的英格兰中部工业城镇里的这些人就是（用当地的俗语说）D·H·劳伦斯的“家谱”。

阿瑟·劳伦斯在丽蒂娅·比尔德骚的婶婶家里遇见了她，这也是丽蒂娅叔叔的家。这关系看来有些复杂，因为爱丽丝·帕森斯（阿瑟·劳伦斯的母亲）嫁给了小约翰·牛顿（丽蒂娅·比尔德骚母亲的兄弟），就这样，阿瑟·劳伦斯和丽蒂娅·比尔德骚结成了夫妻，他们是近亲结婚。

阿瑟·劳伦斯在1874年末从布林斯列来到诺丁汉，他是来帮助在克利冯附近打一口煤井的。晚上，他有时去巴斯福德他姑姑的家里作客，巴斯福德在诺丁汉的北端。据乔治·劳伦斯说，这位姑姑的丈夫“对花边机械十分精通，”后来他移居美国，死在纽约州。他的妹妹丽蒂娅，也就是约翰·牛顿几个孩子中的一个，嫁给了乔治·比尔德骚，她的那位先前提到的与阿瑟·劳伦斯在牛顿夫妇家相遇的女儿也叫丽蒂娅。

劳伦斯的母亲于1852年7月18日出生，早年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希尔尼斯，并在那里当了学校教师。她曾写过些诗。好些年后，她的女儿埃达说，《儿子和情人》中对她母亲年轻时经历的描写基本属实；她曾经被一个“精明的”年轻人抛弃，这个年轻人后来娶了一个大年龄的有钱女人。埃达·劳伦斯·克拉克说有关她父母相识的故事是真实的。这个矿工英俊潇洒，舞跳得很棒，是丽蒂娅从未遇见过的那种人；他把他在矿上的工作描述得很浪漫。埃达还说她的父亲从未剃过胡子，他长了一头黑发和满脸的落腮胡；劳伦斯在他的《儿子和情人》中说，他的母亲在认识他父亲之前从未“汝汝尔尔”过，——虽然这样的习惯用语在当时显然让她觉得很有趣，她后来还试图阻止她的孩子们用这样的词。

1875年12月27日，阿瑟和丽蒂娅在斯尼恩顿教区的圣·斯蒂芬教堂结了婚。婚后他们没有立刻去伊斯握和布林斯列，而是先在塞顿·伊思·阿希菲尔德，然后在老莱弗德住了一阵。塞顿·伊思·阿希菲尔德是个有几个煤矿的城镇，离伊斯握约八英里；老莱弗德以前是一个村庄，现已划入诺丁汉市的西区。

不久，阿瑟·劳伦斯又回到他布林斯列的矿上工作，他和丽蒂娅在伊恩渥下面的山谷中住一间小屋。

渐渐地她开始和他反目起来。他曾立誓戒酒，但又自毁此约，常在下工回家的路上在酒吧逗留，与朋友们大杯地喝啤酒。当他最后回到家里时，他的妻子就对他唠叨责备，他就会突然大发雷霆，继而两人拳脚相加。然而，尽管有这许多麻烦，劳伦斯太太还是常常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当然，这不过是一个达观的人的强颜欢笑而已。她总是孩子们欢乐的伙伴，总是和他们在一起活动。她为这些孩子们感到骄傲，并竭力争取让他们生活得好；她的儿子们不至于下矿井干活，她的女儿们不至于去当佣人。在那些年的艰难贫困中，她为他们作出了极大的牺牲，特别是为了继续大卫·赫伯特（家里人称他伯特）的教育。

不幸的是，这仅是故事的一部分。这妇人心中强烈的爱表现为外在的两个方面：她痛恨她的丈夫，又以同样的强度热爱她的孩子们。这些孩子们成了父母之争的战场。

埃达·劳伦斯·克拉克在她的回忆录中说，她的母亲要孩子们一起反对父亲；埃达在晚年时觉得他们当时应该多给予他们的父亲一些同情。据劳伦斯的朋友阿契萨布·布鲁斯特 1922 年在锡隆说，在劳伦斯完成《儿子和情人》10 年以后，他曾对她的丈夫说过，他在书中对他父亲的描述是不公平的，并“想要重写此书”。后来他才觉得他父亲对生活原是有兴趣的，他母亲过分的自以为是既毁了他的父亲，也毁了孩子们。”回忆起他敬爱的母亲时，他会摇着头说这位自以为是的妇人是殉难于她自己的这种性格，这是一桩可怕的事情，所有自以为是的女人都应该殉难。

在这种殉难的初期，丽蒂娅·劳伦斯随她丈夫移居到伊斯渥，住在维多利亚街下坡的一幢小砖屋里，这里后来就是 D·H·劳伦斯的诞生地。劳伦斯太太在靠街的前屋开了一个小铺子；她将这间屋子的一面大方窗作为橱窗，在铺子里出售亚麻制品和花边以及维多利亚时期的家庭主妇穿戴的帽子和围裙。

由于家庭的扩大，劳伦斯太太关闭了铺子。从 1877 年到 1887 年的 10 年间，她共生了 5 个小孩。其中，D·H·劳伦斯排行倒数第二，也是三个儿子中最小的。

伯特·劳伦斯是个孱弱的孩子，一开始就受到他母亲较多的关心和偏爱，虽然一直到许多年以后，他才成为她生活的中心。他长大后常常说起，在他出生仅两个星期时就差点死于气管炎。威廉·霍普金，一位诺丁汉郡的古董商回忆说，当伯特·劳伦斯一个月时，“他看上去像一只剥了皮的兔子”。霍普金当时是一位 23 岁的年轻人（他后来比劳伦斯晚去世 21 年），他曾在伊斯渥的主要大街诺丁汉路上遇见过推着童车的劳伦斯太太，车里放着那个初生儿。她悲伤地摇着头告诉霍普金说她不敢指望那孩子能活过 3 个月；“恐怕我养不大这个孩子了”。

但从一开始，伯特·劳伦斯就表现出他要求生存的强烈、执拗的渴望，使后来的医生们惊奇的是，这种渴望竟使他生存了 44 年半。童年时凡看到过他的人都说，他们是所看到的最瘦弱的孩子。他的兄长乔治，（后来他们俩人经常争吵）还深情地提起过他的小弟：“哦，伯特是一个了不起的小孩，——他总是纤细病弱——他因不能参加男孩们的游戏而十分悲伤，——他总是和女孩子们一起去摘黑莓——他是那样的瘦弱，我可以让他坐在我肩上走好几英里。自他出生以后，我们就对他百般娇宠——我母亲更为他倾尽了心血。”

D·H·劳伦斯在他生命的晚年写过一句话——强调了他的病弱，和他经常性的感冒——也说他是个“娇弱苍白的小家伙，常常塞着鼻子，许多人都对他特别体贴关照。”所有关于他童年时期的情况都提到了他的温雅和对友谊的渴求，这使得人们都很喜欢他。

他两岁时，家里从维多利亚街的住处搬出，迁居到城北低地的一个叫布利契的地方。这是一片古老的世界，在中世纪时被称为勒·布列希（劳伦斯时代以后好久，此处被改名为花园路）。

在劳伦斯一家迁居布利契的一些年前，矿主在那里建造了 8 幢分租房屋——共两排，一排 4 幢，每幢 12 间——供矿工家属租用。为了租用一套靠边

一些的房子，他们每星期要多付六便士，尽管这房子多一片狭长的花园，劳伦斯太太还是很讨厌这个地方。因为按照习俗，所有家庭在户内的时间都是在后屋的厨房里度过的。向窗外望去，是煤灰弥漫的矿井和将两排住宅分开的小巷——这是一种喧闹的社区生活，男人们和女儿们游荡着，交谈着，孩子们奔跑着，叫喊着。

劳伦斯对这个地方印象很深；他在《儿子和情人》中对它作了详尽的描写，书中布利契被称为帕顿斯。他在那里生活了4年，直到6岁时全家迁走；4年里，他就生活在这些小巷胡同之间，远处是小溪，溪边有山楂树和柳树，旁边是绵延不绝的农田。

在他们的新居，劳伦斯可以将这些景色一览无遗，新居是在伊斯渥北缘的沃克街，即通向布利契斜坡的顶部。“走上沃克街，”他许多年后写信给一个朋友时说，“——站在第三间屋子的前面——可看到左前方的克利契，正前方的恩德渥——和右前方的海伊公园的丛林和安纳斯内：我在那间屋子里从6岁住到18岁，我对那片景色比世界上任何景色都要谙熟。”

然而，在孩提时代，每当他走向乡村，择径穿过田野朝北面的林地走去时，他就会意识到他身后的那个城镇。几百年以来，这个伊斯渥只不过是村庄（到1780年代仅有28户人家），在工业革命的刺激下，它迅速地发展起来。早在村子扩大之前，这里就有了煤矿：有些矿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一张在《1739年1月探明的矿脉的地图标明了伊斯渥位于矿脉的西部边缘，此矿脉“向北延展，经过德比和诺丁汉的一些县，直至约克希。”这也包括了一些在20世纪仍在开采的煤矿，如格利斯列、布林斯列和其它一些附近的矿区。劳伦斯的父亲从童年到晚年一直是布林斯列的一个矿工。

到了18世纪，现代伊斯渥的建设者们，巴勃家族和沃克家族开始控制这地区的煤矿业，在伊斯渥一英里远的地方的一个教堂墓地有一座墓，表明了早在1710年巴勃家族就在那里埋葬他们的亲属；至1791年，在东南几英里处的比尔波诺的矿活“都由沃克先生和巴勃先生租配。”到了1800年，巴勃和沃克的公司已正式成立。据威廉·霍普金说，那时候，“农业劳动者受高薪的吸引，从林肯郡和其它县纷至沓来。”

在1770年代拓成的爱尔渥希运河，载着煤船运往特伦特，再运往重要的商埠。但在19世纪初期，在诺丁汉北部地区的巴勃，沃克和其他矿主开始在雷斯特郡失去市场，因为他们竞争不过那个县的铁路运输；他们便聚集在伊斯渥的太阳旅店里讨论这些商务。此旅店外墙上的一块徽章就是在1832年为纪念这次会议而作，因为此会议为修建爱尔渥希山谷铁路奠基，此铁路后来成为有名的中部线路。几位矿主在会上为修筑铁路捐款32000英镑，在这笔款项中，巴勃和沃克公司共资助10000英镑。

伊斯渥在发展。因为地处各矿工居住点的中心，这里变成了这地区的商业城镇。在19世纪，这里是诺丁汉郡每平方英里人口增长率最高的教区：达63.5%。1801年，伊斯渥仅735个居民，1881年（劳伦斯出生前4年）是3566人，到了1901年，人口已为4815个。这些人口增长的数字很能解释劳伦斯的写作倾向，因为这种增长主要是在劳动阶层和小店主的层次；在巴勃和沃克家族层次的增加则极为鲜少。那么，这些虽属少数而极有权势的工业资本家们，在那个城市侵蚀农村的时代里干些什么呢？劳伦斯在《恋爱中的女人》一书中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此书的一个主题就是工业对人类和自然美好的一面的破坏。

劳伦斯在他晚年的一篇散文《诺丁汉和矿乡》中指出，“有钱阶层和企业主在维多利亚兴盛时期所犯下的最大的罪恶就是将劳动者推入丑恶之中，丑恶，丑恶，吝啬，混乱和丑恶的环境，丑恶的理念，丑恶的宗教，丑恶的希望，丑恶的爱情，丑恶的服装，丑恶的家俱，丑恶的房屋，工人与雇主之间丑恶的关系。人类的灵魂需要真正的美而不仅仅是面包。”那城镇“本来很可能成为一个可爱的意大利式的山城，多姿多彩”——但是没有，它是千万个伊斯渥中的一个。厚厚的煤灰和黄褐色的砖墙。

假如这个公司，不曾建筑过那些肮脏丑陋的矿场，那么，在山顶上他们就还有个好玩的地方：假如他们在商场中心竖起一根高柱，再在商场周围搭起些拱形顶棚，让人们在那里信步或小憩，身后是堂皇的大楼！假如他们建造了一些宽舒实在的，有五、六个房间一套的公寓和漂亮入口的住宅楼。总而言之，假如他们提倡一些服装的美化，一些户内生活的美化——家俱，以及室内装潢。假如他们为最漂亮的椅子和桌子、最可爱的头巾、最迷人的房间设立奖金！假如他们这样做了，那就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工业问题了。这些工业问题，就产生于他们强使人类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更多的获取而竞争的这个根源。

童年时的劳伦斯，经常背离丑陋的红砖和煤灰，走进北面和东北面，自然之中，这里是有名的鲁宾汉的舍伍德丛林，也就是现在英国文学读者们所熟悉的劳伦斯乡村。

劳伦斯从童年初期就经常涉足的一处是布林斯列，这里北离伊斯渥约一英里，在曼斯菲尔德公路的一边。这里住着他的祖父母，他的父亲就出生在那里。现在，他的父亲每天就在附近矿区干活；他的儿子，看着那里的地面，那些井架上的轮轴，高烟囱冒着的黑烟和小铁轨上的矿车，知道他父亲正在地下深处的黑暗中作苦力。

有时，小劳伦斯不往北去，而向东走一英里到格利斯列，在那里他可以看到一座14世纪时城堡的断壁残垣，但在格利斯列以北一英里处，还有一处更吸引人的遗迹。在那里，农庄的屋舍和博凡尔修道院的残墙遗壁交错在一起。这里是一篇有关劳伦斯年轻时候的故事的背景，此短篇最后出版时的名字叫《一块彩色玻璃的碎片》。此故事的灵感来自于这个小山谷那曾经充满暴力的中世纪的过去。它说明了劳伦斯对此古迹的历史是何等的着迷。

在其它一些故事中，他常常取材于海洋、公园、丛林，这块丛林位于那座修道院的北面和东北面。拜伦在年轻时曾为了追求玛丽·乔渥斯从纽斯戴德修道院来到这里，玛丽当时住在海洋公园丛林北端的安纳斯内。

这片丛林西缘的莫尔格林水库，是后来劳伦斯作品中的又一个重要地址。但他的故事中最为人们熟悉的景致是从莫尔格林一直延伸到恩德沃一带：被称为格利斯列·赫格斯的农田和西面的一块叫威利·斯布林的林地。这就是真正的劳伦斯乡村，是《儿子和情人》以及其它许多早期作品的背景。

这是我们自己的幽谷，

我们的伊甸，我们的家园。

所以，这些地方，可被记作劳伦斯年轻时候和他早期作品的重要地理位置：伊斯渥和它山顶上的红砖房屋，下面烟雾弥漫的布林斯列，格利斯列和其古堡遗迹，博凡尔和那里的中世纪的残壁，还有不远处的海洋公园丛林，再就是丛林西边那一汪池水，最后是海洋公园和威利·斯布林之间的那个小山谷。

晚年，劳伦斯在意大利回忆起伊斯渥北面的景致时写道：“那是我心中的乡村。”

沃克街的住房从来也不是一个安静之所，他父母之间的争吵在那里继续着。晚上，孩子们睡在床上，可以听到他们的父母在厨房里争吵。有时他们的声音响得可以透过树丛传到街上；劳伦斯在《儿子和情人》以及一首叫《童年的不谐和音》的诗中对此作了详尽的描述：这些经历所留下的伤痕很明显地贯穿于他的作品之中。

然而，他的童年时代并不完全是凄楚痛苦的，他还没有进入学校校园的残酷时期，在那个时期，作为一个不喜欢玩蟋蟀和足球的孱弱儿童，他将面临一种传统的不幸的命运。如前面所提到的，他最喜欢的是他四周的土地，在其中他感到乐趣无穷，当然那时他还远不知那是为什么。在 19 世纪精神感染下，自然景色成了他的一种崇拜形式。

这个小男孩从沃克街住宅旁那满是煤尘的树梢间意识到了大自然可怕的一面，从中联想到人类可悲的一面，同时也从那住宅的窗口看到了展示在他面前的如同画册一般的自然之美：“那里仍然是属于森林和农业的古老英格兰；那里没有汽车，煤矿的发展只是一种偶然，罗宾汉和他的快乐的战士们并不遥远。”

劳伦斯童年时代最为熟悉的景致位于伊斯渥和布林斯列之间：许多个星期六，他常和他的姐妹艾米莉和埃达穿过田野去看望祖父祖母。他们那位做裁缝的老祖父的胸前总是沾满了粉尘。在苹果收获季节，他总会这样问孩子们：“你们要吃点苹果吗，我的小鸭子们？”当他们急切地点着头时，他就走进院子从树上给他们去采凯斯维克斯苹果。老劳伦斯太太变得唠叨多语；但她那耳聋的丈夫已听不清她的责备抱怨了。

在布林斯列，孩子们还常常去拜访他们的三位姑姑，其中二位是阿瑟·劳伦斯的姐妹，另一位是他兄弟詹姆斯的遗孀。他们的萨拉姑姑（或称萨利姑姑）也就是杰姆·斯威恩太太，她对孩子们不太热情，而她的寡妇姐姐，爱玛·萨克斯顿却总是对孩子们很友善。她的房间没有萨拉·斯威恩姑姑的那样整洁，所以她不太介意她的侄儿侄女们将泥土带进屋里；孩子们一到，她就让他们坐下来，给他们东西吃。

按婚姓，这位姑姑，应该叫波莉姑姑，在孩子们的叔叔詹姆斯·劳伦斯死于一次矿井事故数年以后，她改嫁给詹姆斯·阿鲁姆。几年以后，劳伦斯在他的短篇小说《菊香》和剧本《荷尔鲁爱德太太的寡居生活》中将这位姑姑用作主要角色。她与前夫所生的女儿，阿尔文娜·劳伦斯——D·H·劳伦斯的第一个表妹——后来嫁给了他最亲密的朋友阿伦·钱伯斯。当然那是许多年以后的事情：劳伦斯到 15 岁时才真正认识钱伯斯一家，虽然在那以前他常常向北走过他们在格利斯列·赫格斯的农庄，即《儿子和情人》中的威利农庄。

（二）永恒的村庄

由于劳伦斯在村庄里生活得如此深入长久，所以他所写的总是千篇一律的村庄，城市始终未在他的作品中占据重要位置，他从未在城市久居。虽然他作品的背景偶尔也有市郊，但大多数是乡村。他多次认真地塑造的乌托邦就是一个理想化了的村庄。

他生于斯长于斯的伊斯渥却不尽是这样的一个村庄。当然，拥有万贯家产的矿主家族，享有比任何时期的乡绅都优越的特权，而生活在低劣的红砖墙院内的大多数群众的生活并非那样充满乐趣。当然，和任何时代的大众一样，他们也会自得其乐。

例如，那里有一年两次，每次为期三天的9月和11月的集市（或称节日）。第一个是在城北山顶举行的山顶节。集市的场地位于当时“三桶旅店”前的一片空地（即《儿子和情人》中的“星月酒馆”）也是阿瑟·劳伦斯最喜欢的酒店。在《儿子和情人》的第一章里有这样的描写：孩子们在节日里兴高采烈；父亲深夜才回家，说他在“星月酒馆”帮忙，尽管他只赚回了“不到五先令的钱”。当妻子说他“把其余的钱都喝啤酒了”时，他咆哮道，“啊哈，你这个肮脏的小贱妇！谁喝醉了？我倒想知道谁喝醉了。”

另一个和山顶节相似的节日叫“法令和集市”，在11月举行，此节日起源于过去农民们进城找工受雇的传统；旧时的雇主在雇佣一个人时，会给他一枚“定约便士”，表示这一年劳务合同的签定。这些一年一度的集会从它们的原始形式中沿袭下来，“节日”的成份得到充分的保留，所以那时人们依旧涌入城内去赶集。在以前，这样的赶集总是和雇佣的程序联系在一起的。这个集会在伊斯渥西端举行，旁边是圣玛丽非国教教堂，稍北是诺丁汉公路。

1926年9月，劳伦斯最后一次去伊斯渥时，他执意要去赶集，并在那里呆到疲惫不堪时才离去。但是他感到很快活，这个面色苍白，一脸红胡的人曾在那里生活过那么久；现在显然只有这个地方能让他感到愉快。

他童年时代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时常有一些流动剧团到伊斯渥演出。其中最受欢迎的大概要数泰迪·雷勒剧团，他们在一顶大篷帐下演出。好几次他们觉得在伊斯渥地区的生意非常好，以至有时要逗留好几个月，演出莎士比亚的剧本和其它的剧目，如《斯维尼·托德》、《舰队街的神奇理发师》、以及《玛丽亚·马丁》或《红仓谋杀案》等。劳伦斯写道，他曾在“两便士流动剧院”看过《哈姆雷特》，当那个戴着盔甲的鬼魂唱道：“安布列特，安布列特，我是你父亲的鬼魂”时，他会“激动得脸色苍白”。

劳伦斯童年时的另一项文化活动没有延续下来：即“一便士阅读”。这活动是在阿尔伯特的英国学校中进行的，后来，当劳伦斯18岁时，在这个学校当了一名教师。”一便士阅读“以其入场费而得名，参加的人数很多。当地人在那里进行各种娱乐活动，最常见的是音乐活动，也有独唱和独奏。但最主要的内容是阅读，通常是狄更斯的作品：一个城里人在台上背诵作品，就像狄更斯在外面游荡、访问时经常做的那样。

伊斯渥的另一个习俗是，每年圣诞日的后一天，矿工的孩子会被邀请到矿主巴勃和兰姆·克罗斯的家里，他们会分给每个孩子一个橘子和一枚崭新的便士。劳伦斯童年时的一个朋友，梅宝·塞尔贝·柯利休太太告诉爱德华·尼尔说，有一次，劳伦斯十分害羞，不敢上前到巴勃家的管家那儿去接礼物。梅宝便把她那一份给了他，然后自己再去拿一份，当管家拿眼睛瞪着

她时，她对他说：“不，我不足自己要拿二个便士，有一份是给伯特·劳伦斯的。”在她和劳伦斯回伊斯渥的路上，他们开始讨论如何处置他们的礼物。他最后决定——这是后来劳伦斯作品中喜剧特点的闪现——他建议将自己的那个便士交给母亲，而用那女孩的一便士去买糖果，然后两人分而食之。

当苏格兰牧师罗伯特·雷德在1898年开始掌管非国教教堂的教坛时，他创建了一个文学社，社址就在教堂旁边的英国学校。劳伦斯常去这个教堂做礼拜，虽然母亲来自维斯列安的一个卫理公会教家庭。牧师雷德先生和她成了好朋友，并很喜欢与他的这位颇有修养的教民饮茶闲谈。正如威廉·霍普金所说的，“劳伦斯太太很喜欢家里有一位牧师客人。”《儿子和情人》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描写：父亲从矿上回家，发现牧师正在那里和母亲高谈阔论着神学问题，她还换上了最好的桌布，摆上了最好的茶具。在这种场合父亲的表现也许是许多次类似情况中的典型一例。（他对牧师说，“喏，你看看吧”这位矿工边说着边把汗衫的两肩露出来给他看。“现在已经干一些了，可还是潮乎乎的，像擦桌布一样，都是些汗水，你摸摸看。”）

这座雷德牧师的教堂建于1868年，是石结构的，在布尔维附近；它是一座仿哥德式的建筑，有很高的尖顶；劳伦斯很喜欢这座教堂，还记得它的“高耸挺拔，金碧辉煌而又静谧肃穆；涂着暗绿和蓝色的颜料以及略有些荷花状的边饰。在管风琴的楼厢上，用大写字母刻写着，‘哦，在美和神圣中敬慕赞美上帝。’”

幼年时的劳伦斯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对这座教堂十分熟悉，现在它已被拆毁了。数年以后，劳伦斯在一篇意为介绍弗雷德里克·卡持特的《启示录》的文章中回忆说，他是在《圣经》的熏陶下长大的，教义对他的影响刻骨铭心：“以幼年时我就熟知《启示录》的语言和形象；这不是因为我花了时间去阅读《启示录》，而是因为我总被送入主日学校和教堂，去‘希望乐队’和‘基督的力量’听读《圣经》”。尽管他不总是全神贯注，也不能全部理解，但那语言和符号却深深地渗入了他的意识之中。

在他的一篇名叫《一个男人生活中的赞美诗》的散文中，劳伦斯说：“我认为成长为一个新教徒（耶稣教徒）是很好的：在新教徒中的一个非国教教徒，或是在非国教教徒中的一个公理会教徒。”“作为一个小孩”他感到高兴的是公理教徒“摒除了卫理公会教徒中常见的个人的感伤主义”，还使他高兴的是，罗伯特·雷德牧师总的来说常避开带有伤感情调的词句，例如“引导我们，仁慈的光”，或甚至“与我同在”之类。他对那些健康的赞美诗十分偏爱。那位主日学校的主管，白胡子的雷明顿先生深得劳伦斯的喜爱，因为他常教孩子们唱一些雄壮的赞美诗，如《唱起战歌》《坚守堡垒，我来了》和《站起来，为耶稣站起来》。在这方面，是尚武精神而不是缠绵多情在主导着劳伦斯的欣赏趣味：

令人作呕的感伤主义，像麻风病一样影响着宗教，但还没有占据我们的矿村。我记得我在主日学校二班的时候，一位女教师想用耶稣受难的故事来折磨我们。她不住的说：“你们不为耶稣而难过吗？你们不难过？”许多孩子都哭了。我想我也流了几滴的眼泪，但我记得很清楚，我对自己这样说：“我实在是感到无所为。”我再也不能去想这件事。我从未为耶稣受难动过情。但惊奇之感却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中。

他在那些赞美诗中所感受到的也是这种惊奇。在一篇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中，他说，那些对他影响较深的诗，如华兹华斯的《永恒颂》济慈的颂歌，

歌德和弗雷恩的一些抒情诗，以及莎士比亚的一些诗篇——“所有这些可爱的诗篇归根结蒂显示了一个人生命的最终形式；所有这些可爱的诗篇都深深织入人们的意识之中，但都不如那些相当简单的非国教主义的赞美诗那么深深地渗入我们的心扉，这些诗歌的影响贯穿了我整个童年。”

在他后来著成的一本诗集起名的时候，劳伦斯摘用了《一天已经过去》这首赞美诗中的“鸟兽和花”一句，这首诗是由萨拜恩·巴林·格欧德在1865年写的，然而在劳伦斯所有的作品中，《癫狂的毒蛇》受矿工教堂赞美诗的影响最深；在一个遥远的墨西哥乡村的集市，满脸污黑的人们在街上——尹斯渥的矿工们晚上哼着小曲回家时的一个写照——站在九重葛树和胡椒树上燃着的火把光里，唱着阿兹台克人的赞美诗：

早晨的星辰和暮色的星辰
摇落在篝火之中
我们像吉普赛人一样集聚，不知道
他人怎样来到这里。
——《癫狂的毒蛇》
我一无所求，只想坠入
那圣灵的帐篷
进入那火焰飞窜的房中
作圣主之客。
——《非国教教徒赞美诗》

当然，在《飞鸟、走兽和鲜花》的诗篇和阿兹台克人的赞美诗中所包涵的要比一个人所记得的他童年时代的赞美诗中的感情渲泄多得多。在他所有的对自然的观察和他所有的动物绘画中，劳伦斯的创作表明了他对物体观察的细致入微是他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是他“天才”的一部份。一直到他18岁时，他才意识到了他的天才是什么，它将以何种形式出现，以及他将如何发展这种才能；然而，这种才能始终与他相随，并在朦胧和沉默中孕育着自身。

劳伦斯在青年时期放弃了公理会教，一度曾转向唯一神教。但他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一种宗教，这种宗教基于那些“黑色众神”，他觉得每个人都应该与这些神沟通心灵。他总是十分虔诚，在叙述他后来发现的伊特拉斯坎文明时尤其如此。他总是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宗教表现，在阅读劳伦斯的作品时，我们必须时常注意这个事实。他是许多从事写作活动中最信奉宗教的一个。

童年时期，当劳伦斯看到人、风景和动物时，它们在他心灵上产生的震动比其它人要强得多，这也是一种内在的宗教感情；然而，作为一个文静的孩子，此时他只是接受着那些暗示，而在日后，这些暗示将会有力地释放出来。

他小时候喂养爱畜的经历总的说来是不幸的。劳伦斯太太从来不允许她的孩子们养爱畜；动物的世界，就像矿工的世界一样，是她精美的理想领域之外的不洁之地。但她最后还是至少有两次在孩子们的热切要求下让了步，劳伦斯在他的喜剧小品《阿道夫》和《莱克斯》中提到了此事，其中之一是一个有关孩子们试图驯养一只兔子的故事，另一篇，是关于他们想养大一只小狗的故事。这两篇小品不仅生动地描写了这些小动物，也是劳伦斯家庭的生动写照：孩子们对小动物百般宠爱，父亲也每每是一个友好的同盟，母亲

却是不宽容的对头，她勉强容忍着这些小动物，当它们不得不离开时，她才觉得如释重负。

当那只叫阿道夫的兔子长得野不可驯时，家里关不住了，孩子们只好满不高兴地把它交给父亲，父亲把它装进他矿工服的大口袋里，答应他们将它放到树林里去。临走，阿瑟·劳伦斯开玩笑道“‘最好把它放到锅子里去，’我父亲说，他总喜欢惹起一点风波和骚动。”后来，伯特·劳伦斯常常想念这只兔子，想到它在疾跑时紧缩着的短尾巴和“嗒嗒”的叫声，像是它向世界挑战的信号，是懦怯者的虚张声势。

劳伦斯太太不喜欢那只兔子，她同样也不喜欢那只小狗莱克斯，很显然，她答应让孩子们喂养它是因为她的兄弟赫伯特托他们看管一段时间。赫伯特是她最宠爱的人，尽管他实际上是比尔德骚家的败家子；他曾在诺丁汉开过一家小酒店，叫贝尔帕勋爵，在罗宾汉和拉瓦汀街东北角的思尼恩顿，也就是在那座蓝铃山脚下，劳伦斯在《儿子和情人》中用过这里许多重要的场景。

他在《享乐之路》这篇故事中，以丹尼尔·萨顿描写了他这位赫伯特舅舅。故事中他描写了这个人的婚姻中的不幸，他带了一位女子去澳洲旅行，后来又指责这个女人想毒死他，他在诺丁汉既做出租车生意，又为那里的一家体育报纸做事，所有这些都是赫伯特·比尔德骚的真实经历。在《莱克斯》一篇中，一天这位舅舅突然出现，要把那狗带回诺丁汉去，他勃然大怒道：“啊，你们就这样对待这条狗，——你们都把它弄傻了。它现在比黄油还软了。”他带着莱克斯开车走了，那狗叫得很可怕，孩子们十分沮丧：“直到现在，我们心中还留着一些委屈的眼泪和伤痛。”

劳伦斯后来几乎为所有的动物写诗或故事，从鲸和大象到豪猪和蝙蝠。在后来的漂泊生涯中他有过三只爱畜——在新墨西哥时的猫蒂姆西和狗比伯尔斯，在法国南部时的猫米奇。（那头叫苏珊的牛，是劳伦斯在新墨西哥牧场的“神秘的”朋友，但此物太大，恐怕不能算作爱畜）总而言之，劳伦斯比其他作家更善于将动物放入他的诗文中，并赋予它们强有力的生命，这一点十分重要，足以引起人们的评判和研究。

埃达·劳伦斯·克拉克曾说起过有一天他的弟弟在学校解剖一只青蛙时恶心得要呕吐，他恶心并不是因为他的胃脆弱，而是因为他认为解剖是残酷的行为。埃达在许多方面也有相同的气质。有一天，她和她的丈夫带着一位美国朋友到纽斯代德修道院一带去观光时，他们看到一条小溪中有一些鱼被关在铁丝笼里，埃达弯下身去要放出那些鱼，但她的丈夫制止了她，说那样捕鱼者会找他们麻烦的。这时候，那位朋友看到埃达的脸色一定和他的弟弟伯特看到动物被困，或在生物实验室被解剖时的脸色一样难看。

在一张摄自19世纪90年代初期的室内照片上，父母和五个孩子们都穿着节日服装。这是一张在照相馆里拍的合家欢。这是一件带有乡土气的、朴素的、维多利亚风格的，令人感伤的纪念品，它甚为珍贵，其价值在于：它让我们对这7个人的外貌和内心世界都能有所了解。

右下方的父亲十分显眼，他坐在那里不太自在，带着表链和胸花，双手握拳放在大腿上。他脸上的大胡子上面有一种喜悦之色，好像是为他的家庭而感到骄傲。

摄影师让小伯特站在他父亲和母亲之间，他们三人形成了一个占主导位置的三角结构。母亲坐着，一只手有些不自然地握着放在大腿上的另一只手。她的脸部表情很难描绘，因为她的脸色是那样地憔悴，既无刚毅的线条也无

温柔的特征：她本是一个不到 40 岁的女人，但从照片上看去要老 20 岁，并带一种病态。

相片一角、母亲的旁边，是娇小的勒蒂斯·埃达，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裙子并系着一条花腰带。她脸颊两边是卷曲的长发，一直挂落到肩上，她以一种茫然的惊诧看着摄影机，嘴巴微启。埃达是全家最小的成员；（生于 1887 年 6 月日）与伯特龄差最小，她也是几个孩子中与伯特最亲密的一个，一直对他十分忠诚。

埃米莉·尤娜，年长 5 岁，站在她后面，她穿着白衣服、扎着一条深色窄腰带。她双唇微张，脸上好像带有一种青春期的困惑之色。她的头发（与他的兄弟伯特一样也是红色的）散落在胸前。童年时，家里人叫她“印第安美人”，后来叫帕米拉或“得报的善人”。

在这张合家欢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家里最大的孩子乔治，他站在后排的中间；确实，他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这位“全家最漂亮的成员”——此照片证实了埃达的称赞——这位眉清目秀的青年的衬衫高领上系着一条领带。乔治·阿瑟·劳伦斯，生于 1876 年 9 月 26 日，他和家人住在一起的时间不长：如前文所叙，他的童年是在他的曾祖父，那位赞美诗作者约翰·牛顿家里度过的。他 10 岁那年迁回诺丁汉。开始他曾跟一位做画框的叔叔学手艺，但他不喜欢这工作，像他祖父一样，他最终成了一位工程师。

威廉·欧内斯特·劳伦斯，站在后排的右端，他是当时全家的骄傲。这是一个貌似动物的年轻人，长着平平的颧骨和有力、突出的下巴。欧内斯特（生于 1878 年 6 月 22 日）在这张照片里要比乔治高出半个头。埃达对他的描述是“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粗粗的棕色头发稍带些红色，一双闪烁的蓝眼睛。”他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在游泳和障碍跑等项目中曾多次获奖。每次进家门他总是一跃而入，而不是平步走进来。

在博凡尔寄宿学校以令人注目的成绩毕业后，欧内斯特 12 岁时就开始做工。起初他在希普莱矿区办公室当一名职员，此矿就在德比郡边界的另一端，稍后在伊斯渥西部低地兰莱·米尔镇的合作社谋职。他还坚持上夜校并学会了速记和打字。后来他自学了法语和德语。他一度在柯凡特利做事，在 21 岁时进入了伦敦的商业界。

这位身强体壮，敏捷聪慧的哥哥，是年仅 7 岁的伯特·劳伦斯的竞争者——在还记得他这位兄长的成绩的学校，在想赢得更多的母爱的家中。

所有劳伦斯家的小孩都上过博凡尔寄宿学校，它是一排红砖墙壁的哥德式建筑，有角塔，高高的三角屋顶和高高的工厂式的烟囱。D·H·劳伦斯在这里上过 5 年学。

他在博凡尔的大部份时间是不愉快的。他本来也许会对学业取一种更随便的态度，但为了母亲他只得努力进取：欧内斯特的在校成绩曾使她感到鼓舞，所以她一心想让她最小的儿子能与他的兄长媲美。乔治·劳伦斯在 1950 年回忆说，强制性的学习使伯特感到头痛，要不是为了我母亲他早就不干了——她一直在培养教育他。”

伯特自己常对他父亲能逃避受教育的过程而心生羡慕。他父亲的那一代，劳伦斯在他 1929 年的一篇散文《被文明奴役》中写道：“仍是野蛮的一代。”阿瑟·劳伦斯“除了上过一所女子学堂再没受过什么正规的教育。”在布宁斯列的爱尔斯太太的学堂里，爱尔斯太太（在那篇散文里误作海茨小姐）始终未能把他的父亲教育成“一个好小孩。她只是勉强地教会了他写自

己的名字。”总而言之，他的感情“完全逃脱了她的束缚：就像他们逃脱了他们母亲的管教一样。乡村还十分辽阔。他从妇人们的身边逃出，与他的伙伴们尽情地玩耍。”

劳伦斯这一代就无法这样逃避了，他们是首先被“抓住”的一代。大多数孩子们，矿工的儿子们都希望下矿井去干活，他们觉得学校是监狱，老师是他们的看守。劳伦斯自己在第一天上学时就伤心地哭了，因为他觉得他“被捆了起来。”随即他就与师长发生了矛盾。他不喜欢“大卫”这个名字，所以在点名时他总是拒绝回答，尽管那位先生对这个固执的孩子大发雷霆：“‘大卫’是一个伟人和好人的名字！”

这位发火的老先生 W·W·怀特黑德后来帮助劳伦斯取得了一个重要的学位，当然那是经过了许多年和许多鞭罚以后的事情了。后来，这位怀特黑德——孩子们叫他老家伙，在矿区就是工头的意思——“慢慢地制服了我们”。他有所有的家长们的支持，所以在他的管教下，他用忠告和教鞭除去了矿工儿子们身上的许多野性。当他们最后离开他下矿井干活时，他们发现那里是沉闷而机械的，再不是像他们的父辈所说的“那个快乐的地下乐园”了。

在学校里，这些粗野的孩子们发现他们中间有一个温雅的伙伴，那就是孱弱的伯特·劳伦斯。他的两位兄长总是独立作战，欧内斯特还是个体育英雄：但这位伯特却不能参加什么体育活动，而他周围的那些孩子，有一种善于发现并挖苦他们的伙伴的弱点的能力，伯特便成了众矢之的。如威廉·霍普金所说：“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路过学校，小学生们正离校去吃午饭。他走在一群女孩子中间，一些布利契的男孩子跟在他后面，异口同声地喊：“迪奇，迪奇，不知羞，尽往姑娘堆里走”！他们嘲笑他女孩子气——按当地的说法就是“娘娘腔”，伯特却昂首挺胸，好像满不在乎，但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愤怒和屈辱。

不管怎么样，劳伦斯慢慢地学会了用他尖刻的言词来保护自己，他开始使用他本来就与众不同的才能，一个劳伦斯的校友数年后告诉威廉·霍普金说：“我们对他有些过份，他毕竟对自己的体质无可奈何……他也有些不是之处，他相当自大傲慢，当工头奖励他时我们就很不高兴。”但是，“他到了14岁时，便开始用言词反击了，他会用尖刻的话挖苦我”¹童年时劳伦斯所受到的另一种感情上的伤害是来自矿里发薪水的出纳员的嘲弄。对这个孩子来说，这既是一种对他的家庭同时也是对他个人的羞辱。这种嘲弄常发生在星期五下午巴勃和沃克公司的办公室里，矿工们常常差他们的妻子或小孩来这里取薪水。此办公室位于格林希尔路拐角处的曼斯菲尔德路上，即伊斯猩西端正北方低地上沃克神士家宅大院，伊斯握大厅的对面。在《儿子和情人》中劳伦斯用了好几页的篇幅描述了保尔·莫利尔的一次痛苦的经历，他走进那办公楼里为他的父亲去拿工资，因为这样他自己可以得到六个便士。

每当他站在发薪室里矿工们的队列之中时，就要受着那个公司的掌管布雷斯韦特先生，一个身材魁梧，貌似主教的白胡子老头的嘲讽挖苦，保尔“在这种场合总感到倍受折磨。”小男孩们是布雷斯韦特取笑的对象，他有一幅旷威严洪亮的嗓子”，常常在孩子们面前揭他们的父亲的短处以奚落他们。布雷斯韦特先生在现实生活中是阿尔弗雷德·伍尔斯顿·布兰脱，他一直是巴勃和沃克公司的出纳员，直到1924年2月，他90岁去世的前两年，即劳伦斯《儿子和情人》一书出版后的第12年为止。

布兰脱的父亲以前也为公司做事，当了 40 年出纳。这位儿子，一个沃克绅士家的亲信，曾是一个酒鬼——威廉·霍普金告诉此书作者说，“他经常满嘴酒气”——但后来，这位布兰脱，成了一个自我克制的典范。沃克乡绅认为，他是矿工们的好榜样。伯特的兄长们在帮他们的父亲领薪水时还能对他回敬几句嘴，但当这个白胡子老头从柜台上弯下身来大声说：“哈，小伙子，你的爸爸到哪儿去了——他喝得烂醉不能自己来取薪水了吧？”矿工们哄堂大笑时，小伯特就无法忍受，对伯特·劳伦斯来说，每个星期五下午以忍受这些羞辱而换取那六个便士是得不偿失的。

但不论他对伊斯渥的感觉如何，他还是在那里留下了他的痕迹。诺丁汉的市政厅现在就设立在一幢被称为“D·H·劳伦斯之屋”的建筑内；1970 年，诺丁汉郡议会（据伦敦《时代周刊》称）同意了“一项关于将爱尔渥希山谷修建成一处与劳伦斯有关的旅游胜地”的议案。但“伊斯渥的一些地区还显然缺乏热情，在那里，这位作家仍被当地人用俗语称做“那个下流的家伙”。他们中间的主要发难人是一个伊斯渥的高级市政官，他的姓在劳伦斯乡村很有名，叫威廉·莱姆，1972 年时他 77 岁。他说劳伦斯“离开我们以后再也没有回到过他自己的家乡，我们怎能为这样的人树碑立传？”莱姆指出，只是由于威廉·霍普金的努力才使劳伦斯得以“复活”；他还说要不然再过一代人劳伦斯也不会被人们完全接受：“我想我们有些过分拘谨，但那时候的标准不同。”莱姆还继续道（对《时代周刊》记者阿瑟·奥斯曼）“在他成名后，我和其他人都希望他能回来对我们叙述他的经历，但他从未这样做过，我不能原谅这一点。”不难想象，假如劳伦斯回到了伊斯渥，并在某个晚上登上阿尔伯特街教堂的讲坛，向伊斯渥的人们讲述他的生活感受，且为他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作辩护的话，那将会是怎样的一个喜剧场面。

并非所有的伊斯渥居民都对劳伦斯抱有敌意，不管怎样，在 1973 年，一所从前的矿工住宅被改成了劳伦斯纪念馆，还有一间屋子被腾出来作为永久性地收集他的著作和与他有关的物品的地方。同一年，89 岁的劳拉·克列夫小姐告诉《观察者》杂志的罗伊·佩诺说，她还记得劳伦斯在学校时不喜欢体育活动，常和女孩子们在一起的情景：“他挺擅长绘画。我不知道那以后他是以什么职业谋生的。”当她被告知他曾做过一段时间学校教师时，她又说：“唔，我认为他选择这个职业或从事写作都是不明智的，当然，他并不是一个笨人。”

在 12 岁的时候，他可以逃避一些伊斯渥生活中让人讨厌的事情了，他在诺丁汉高级学校获得了一笔奖学金，这是一笔郡议会奖学金，是那位性情暴躁的老“工头”帮助他获得的。一个也曾受过怀特黑德训斥的劳伦斯的朋友，乔治·内维尔说他是一位很好的执“法”者和好教师：“那个学校出好学生。”

接纳劳伦斯的学校是一所古老而在当地颇有名望的学府。诺丁汉高级学校，在 30 年以前曾是一所语法学校，它早在 1289 年就已经存在；1513 年由一位贵妇捐款重建，她捐的基金使这所学校一直得以维持，——这位贵女叫阿格尼丝·梅勒斯夫人，她的丈夫曾当过诺丁汉的市长。

这所古老的学校的校史上有着这样的记录：大卫·赫伯特·劳伦斯，住伊斯渥沃克街三号，于 1898 年 9 月 14 日，即他 14 岁生日后的第三天注册入学。但是，他差一点上不成这所学校，因为那笔奖学金只有 12 镑一年，这仅够支付学费和来往于伊斯渥与诺丁汉之间的火车车旅费，幸亏劳伦斯的母亲设法削减家庭开支，并进行其它的调节，克服所有的困难。她为自己作出牺

牲而把伯特送入学校的行为而感到自豪。

这笔郡议会奖学金对劳伦斯的前途起了重要作用，虽然在晚年时他多次指出这是害了他，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确实，在那三年里他必须每日往返于诺丁汉和伊斯渥之间，无论天气如何：从中部地区潮湿的秋季和春季到寒冷的冬季。他身穿学生制服——小蓝帽，短裤和长统袜——每天早上7点钟出门，晚上同样的时间才回家。乔治·内维尔曾描述过当时他们每天一同乘坐火车往返于纽斯沃浦和诺丁汉车站之间的情景：“劳伦斯经常有那讨厌的猛烈的干咳，每到这时，他便会急速地伸出左手捂住他自己的嘴，——咳嗽和这个习惯动作他永远也没能改掉。”

据内维尔回忆这所学校的校长詹姆斯·考尔。是“一个奇人，一个了不起的教育家，”虽然内维尔和劳伦斯像许多住在城外的孩子们一样，每天要匆匆赶晚班火车，故从未见到过校长本人，但他们都是他的儿子，小詹姆斯·考尔的好朋友，他们还是校友。后来，这位小詹姆斯在鸠特兰德战役中丧了命。1901年，这位老考尔成了伦敦西敏寺学校的校长。

乔治·内维尔认为诺丁汉学校的师资是十分优秀的，在那些教师中间，他印象特别深的是塞缪尔·科内尔，他是一位老教师；另外还有大个子吉姆波·赖尔斯和他瘦小的兄弟尼伯·赖尔斯；艺术教师S·A·斯坦利；理化教师S·R·托洛特曼；以及古典文学教师和学校牧师T·B·哈代，哈代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对于劳伦斯来说，在受训于伊斯渥怀特黑德的学校之后，再进入一所由詹姆斯·考尔这样一位有涵养，多才多艺，才高资深的人主管的学府，是得益匪浅的。在劳伦斯14岁至17岁这几年中，他受到了可和当时任何学校相比的良好的普通教育。那些认为他是“未受过教育”的人，如T·S·艾略特及其他一些这样轻易下结论的人，应该仔细调查一下这些事实，即他在诺丁汉高级学校所受的教育和他来求学的学府的学业，在这一点上，F·R·黎维斯在一篇文章中对艾略特的观点作了有力的反驳。

这里有必要来看一下劳伦斯在诺丁汉高级学校最后几年的学历，这是由后来的该校校长C·L·雷诺兹提供的：

在1900年复活节，他获得了四年级高级现代学科奖，在1900年7月，他在现代学科五年级的21个学生中居第10名，并得了第四册的数学奖。在这个年级他的英语列第13名，德语列第13名，法语列第19名。我们最后的记录表明，他在1901年7月，现代学科六年级的19名学生中居第15名。

劳伦斯在最后一学年中成绩不佳，而C·L·雷诺兹认为这是情有可原的：“在这一年，他是和一些很有才能的学生们在竞争，他们中的大多数年龄都比他大。”尽管伯特·劳伦斯年幼多病，体质虚弱，但还与他的两位哥哥的成绩相竞争而没有垮下来，这确实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他的数学成绩也许是他早年学业中最惊人的部份。他的英语成绩在21人中名列十三只能使人付之一笑：一个未来的作家在校期间却疏于语法和作文的故事是屡见不鲜的。

许多年之后，劳伦斯回忆说，他在上中学的时候“曾结交过几个来自资产阶级家庭的朋友，但他们都是些怪人。”他“本能地避开了那些十足的资产阶级子女。”但后来伊斯渥的人们记得他有一次曾到他诺丁汉中学的一个“资产阶级”朋友家去吃茶点。当那孩子的父母得知劳伦斯的父亲是个矿工时，便强迫他们的儿子与劳伦斯断绝关系。

1901年7月，一切都要结束了，至少在那时看来是这样。正如C·L·雷

诺兹所说，那时候，孩子们在 17 岁上就要结束他们的学业了，“劳伦斯的学业可以说是一般，”那位一心望子成龙的母亲在那几年中督促着他的孩子尽力进取，含辛茹苦地为他每天从早上 7 点到晚上 7 点的奔波而攒钱，但这些努力的结果又是什么呢？很显然，继续学业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付不起钱；母亲曾想把这孩子置于煤矿之外，但现在她看到，他毕竟面临着现代工业的挑战。他的命运是成为工厂的一名职员。

在每周每日都要去诺丁汉高级学校的那些年里，劳伦斯并没有中断与他的故乡的联系。这时期，他的一个好朋友，曾帮助他完成那些没完没了的，使人厌倦的作业，她是一位妇女，他在 1902 年发表的小说《迷失的少女》中曾对她大加称赞。在小说中，他的这位朋友赖特小姐成了弗罗斯特小姐，一位“迷途”姑娘的家庭教师。对赖特小姐和她所工作的那个家庭的了解，对劳伦斯来说是一段重要的经历：这段经历给他的那部小说提供了背景和主要人物，这是继《儿子和情人》之后的又一部细致描绘伊斯渥的作品。《迷失的少女》是一部喜剧作品，内中人物充满了漫画特征，其中以赖特小姐的雇主尤为突出。

这部小说中的詹姆斯·霍夫顿在现实生活中是乔治·亨利·库伦，一个花花公子和推销商。威廉·霍普金记得他是“一个沾沾自喜的人”，一个留着络腮胡子、衣冠楚楚的绅士。他以拥有在诺丁汉路上的伦敦剧院而最为闻名，——就是在《迷失的少女》中的曼彻斯特剧院（漂亮的建筑物）。这座一度独立经营的伦敦剧院，前面有一块与人行道等高的平地，后来成了诺丁汉路十九号有名的“伯顿斯——大杂货商”的一家分店。

像库伦一样，霍夫顿未能提高矿工妻子们穿着打扮的水准。霍夫顿在其它方面的所作所为也和乔治·库伦十分相似。与生活中一样，小说中的霍夫顿——库伦，曾想在伊斯渥的希尔·托普地区开一个矿，也就是在诺丁汉路的南沿。这个“破破烂烂的，不在行的”工程只能引起矿工们的不满，他们称之为“掐脖子的半便士”（在小说和生活中都是这样），并说那座矿里产出的都是泥土，“我肯定不会烧那脏东西，让面灰把我呛死”。办矿失败后，这位商人计划从事另外一些事：他在兰利·米尔建造了一座电影院（小说中的兰姆利）后来他又从事过其它的行当，但也都失败了。

在这期间，劳伦斯的朋友和私人教师赖特小姐一直操持着家务，她和库伦在商店的主要助手匹兹莱小姐（劳伦斯在《迷失的少女》中称之为匹尼加小姐）的共事中有些龃龉。小说中的阿尔文娜·霍夫顿，即那位“迷失的”少女，也是取型于现实生活：至少她的外部存在是符合现实的。与生活中的弗洛伦斯（或称弗洛西）·库伦一样，阿尔文娜成了一名护士。但是，劳伦斯的妹妹埃达坚持说，阿尔文娜的形象是劳伦斯“自己的创造”。弗洛伦斯并没有离家出走，后来与一个在他父亲的剧院演出的意大利年轻的流浪艺人结了婚。实际上，她嫁给了当地一个矿工的儿子乔治·霍杰金森，此人是剧院的看门人，后来他们到英格兰北部谋生去了。

查看一下库伦家及和他们有关的人的情况，就能使我们看到。劳伦斯与他周围的生活是多么的接近，这也说明了他对故乡是多么的熟悉。与其它小说一样，劳伦斯在《迷失的少女》中采用了实人实地，并对它们作了精确真实的描绘。然而，在故事的描写中，他常常将那些人物置于与他们所了解的完全不同的生活经历之中。小说中精彩的对应人物在细节上与原形人物的举止有些相似之处，但在大的情节上，他们必须遵从劳伦斯的想象规律，比如

《迷失的少女》中的阿尔文娜·霍夫顿，就被带到了——一个真正的弗洛伦斯·库伦所不知的地方，那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劳伦斯式的结局场所：寒冷的意大利山区。她在这里的居住地与她的故乡既相似又不同。

C·N·赖特在1892年出版的《诺丁汉市场周围十二英里之内的教区、城镇和村庄指南》中，可以找到一些劳伦斯为他的书中人物取名方法的线索，这本指南中列出了伊斯渥、布林斯列、格利斯列以及邻近村镇的商人，银行家，制靴匠，和矿主等等。在此书里，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在劳伦斯作品中常见的被借用到他作品之中的姓名，尽管他没有将这些真名实姓和可辨认的人物形象直接联系起来。

当他用现实生活中的人作为他作品中的人物时，他对他们姓名的伪装总是很粗略的。赖特的《指南》中的姓名只是被用于一些类型大不相同的人物；例如恰特莱和梅勒斯，安娜贝尔和西逊，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叫克里奇，此名与邻近德比郡的一个多石的高地村庄同名，劳伦斯家的孩子们可以在他们沃克街的山顶房子旁看到这个村庄，格利斯列条目包括有亚当·克里奇和他的儿子们，他是细木工和车轮制作匠。《儿子和情人》中的杰拉尔德·克里奇是鲁伯特·伯金的一位朋友；而另一位叫威廉·伯金的人是开马车的。《指南》中还有许多名字也在劳伦斯的作品中出现过：米勒希普，布利克赖尔，利弗尔斯等等。（这本《指南》有好几页曾重印于《D·H·劳伦斯杂录》（1959）

关于劳伦斯使用乡土素材的进一步例证也许来源于另一个社会阶层。其面貌和生活环境在劳伦斯作品中被多次郑重使用的人物。是巴勃——沃克公司矿主家族里已故的汤姆斯·菲利浦·巴勃爵士。劳伦斯对T·P·巴勃了解甚浅，但他用他的外貌塑造了好几个重要人物。

劳伦斯在年轻时经常看到巴勃家宅地上的莱姆庄园。从17岁开始到23岁离开伊斯渥期间，当每周数次去赫格斯农庄远足时，他总要骑车或走过这所庄园。他肯定经常见到那位年幼的乡绅——9岁的汤姆斯·菲利浦·巴勃骑在马背上在庄园里信步的情景，也许——像他在《恋爱中的女人》中的相应人物杰拉尔德一样——“骑在一匹阿拉伯红马上”。伊斯渥的居民说，劳伦斯有一次确实看到巴勃在鞭打他的马，因为它被门前的一列火车惊吓了。此段情景后来被用到了《恋爱中的女人》里。

据乔治·内维尔回忆。巴勃和劳伦斯至少有过一次见面和交谈。一次，内维尔和劳伦斯正走过巴勃庄园，这时那个年轻的乡绅——当时已经是一位治安官了，后来他在31岁时成了诺丁汉郡的郡长——骑马过来命令他们离开。这位瘦弱的、红头发的、年轻的闯入者没有用他母亲和学校老师们教他的有教养的语言回答那位绅士，而是用了矿工的粗鲁俗语以相对答。巴勃乡绅说：“我提醒你，我是J·P·（治安官的缩写）”。劳伦斯对内维尔咕哝道：“他听起来像个b·f·（黑体字）”

不管劳伦斯对莱姆小巷庄园是否真的很熟悉——我们知道科利休太太至少带他去过一次——此庄园在他想象性的创作中却是经常出现的。那是一座修缮过多次的建筑，原来这是一幢农场里的住房，（在新大楼的后面有一部分旧房依然存在）房主（马修·莱姆）在18世纪时将其改成了一所射击房，后来巴勃家将它买下，并加以了重建。在劳伦斯的第一部小说《白孔雀》中，这地方是以海克罗斯之名出现的：一座“堂皇的庄园……座落在那湖边最远一角的山上。”那湖就是莫尔格林水库，此小说中的赖瑟米尔。在《恋爱中的女人》中，莱姆庄园被称为肖特兰特：“一幢长长的，矮矮的房子，一座

庄园主式的住宅，在一个山坡上参差展开，一边是威利·沃特的那片小湖（——又是莫尔格林）”。此湖在那书中是一个重要的场景。在剧本《一触即发》中，一些场景是发生在涅利小巷，即矿主包罗斯的家，此剧中有好些人物和事物都是《恋爱中的女人》中的翻版。甚至《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莱格比庄园（此庄园至少有一幢显赫的别墅——西特米尔文人之家的雷利晓——曾宣称是被描述的原形）看起来或听上去都与莱姆庄园十分相像。莱格比是一幢用褐色石块建成的，长长的，矮矮的宅府，大约始建于18世纪中叶，以后经过不断修建，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房屋拥挤的宅院，已经与过去面目全非了。“此庄园座落在一片长满老树的高地上，”从那里可以看到附近矿区的烟雾和蒸气，——以及“特凡尔夏尔（或伊斯渥）村庄里星星点点的牲畜。”

长期以来，拥有莱姆庄园的家族其男性成员都用汤姆斯这个教名，从汤姆斯P·F·H·巴勃（1778—1857）到其它两位汤姆斯·巴勃（1805—1874；和1843—1893）再到劳伦斯常见到的那个汤姆斯·菲利浦·巴勃（1876—1961）。汤姆斯·菲利浦的父亲，继续了他父亲对矿工家属的慈善活动：这就有了劳伦斯经常提及，并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加以戏剧化的那些在矿主和矿工之间充满父亲般温情的日子。

在他50年的生涯中，汤姆斯·巴勃经历了很大的痛苦。他的第一个妻子在1870年时故世，年仅25岁。在他去世之前，他失去了两个孩子。他的第二个儿子肯尼思·福布斯·巴勃是在1890年13岁时，被他的哥哥即汤姆斯·菲利浦·巴勃误伤致死的。劳伦斯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引用了这一事件。（当地报纸报道说“陪审团作了‘事故致死’的裁决，并对死者的父母和亲属表示同情。”）后来，在1892年（父亲去世前一年）年仅7岁的女儿萨西利也不幸夭折。她是在莫尔格林水库溺水而死的，就像《恋爱中的女人》中“水上宴会”一章里的那个小女孩在威利·沃特淹死一样。和生活中一样，小说中的那个女孩也是从她父亲的游艇上掉入水中的；小说中那个跳入水中想去救她的年轻的布宁代尔医生实际上是阿尔弗雷顿·宾哈姆医生的年轻的儿子。同他的原型一样，他被那在恐慌中的女孩抓住了脖子，并拉入水中淹死。在1969年拍摄的电影《恋爱中的女人》里，这两个溺水的人却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在小说第一章中结婚的那对年轻人。

劳伦斯对此事件的虚构描述是他创作中的一处惊人之笔：午后，快乐的人群，迷人的色彩；暮色降落时船艇华灯初上，乐声缭绕水面。所有这些都写进了故事之中，用以展示人物间的关系；然后是一个小男孩的尖叫声：他看到他的妹妹掉入幽黑的水中，一时惊慌失措；接着是猛烈的跳水声，然后是涌出闸门的水流，在凄凉的凌晨时分，生石灰岩湖底显露出来，最后是两具尸体：那姑娘的手臂仍勾着那年轻人的脖子。劳伦斯肯定亲眼目睹过现实生活中那场惨事的部分情景；全村的人也许都去了莫尔格林，6岁的伯特和他的姐姐可能就在人群之中。

在《恋爱中的女人》中，这场灾难影响了整个地区：“矿区的人们觉得这场灾难好像是降临在他们头上，确实，他们对此要比对他们的亲人死去还要感到震惊和害怕。”他们在街头巷尾，在星期天的茶余饭后都谈论着此事，好像死亡的幽灵盘旋在他们的上空。“男人们是一脸的兴奋和惊异；女人们看上去都很肃穆，有些人还哭了；孩子们一开始就如很喜欢这样一样激动。天空中似乎有一种魔术般的紧张气氛。”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一种细致入微的笔调表现出来的，使读者感到此情此景就发生在他们的生活之中，它们无疑

来自劳伦斯的亲身经历。他还在小说中运用真实情况作为他的人物活动中一些重要的心理状态的背景。“水上宴会”这一章也起了辅助《恋爱中的女人》中爱与死这一中心主题发展的作用：杰拉尔德为他的妹妹纵身于水中，在寒冷中，他发现了“那里的一个完整的宇宙”——这也是他自己后来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的严寒中死亡的预兆。

劳伦斯还以其它各种方法将当地的场景和人物运用到他的小说里，并总是加以精心的雕琢，就如上述的例子一样，常常给予它们一种重要的、想象性的升华。

（三）伯特初涉人世

劳伦斯遇见吉西·钱伯斯是在1901年的夏天，在她家的农场。那时候他还在诺丁汉高级学校读书，不久，他便去那里的一家工厂工作了。吉西比劳伦斯小1岁多（她生于1887年1月29日），是她赫格斯农场的大家庭中的第二个女儿，这个农场在伊斯渥北面约二英里处。劳伦斯和吉西之间痛苦曲折的恋爱关系后来持续了好些年，它是《儿子和情人》一书的主题之一，书中，劳伦斯为保尔英利尔，吉西为米丽安·列弗尔斯。

吉西的祖父乔纳森·钱伯斯是布林斯列人氏，他在那里有外卖啤酒的营业执照。吉西的父亲爱德蒙·钱伯斯也在那里长大，后来结婚去了他乡。90年代，他才携妻儿回到故里，在布利契的一幢村舍住了3年，在那里他办了一个牛奶场。在劳伦斯认识吉西的3年以前，爱德蒙·钱伯斯已经成了赫格斯的一个佃农。尽管他患有风湿病，但他总是风雨无阻地外出干活，不是推车送牛奶就是在田间耕作。他的儿子们长大以后，他们也开始帮他干些农活。

30多年前，威廉·霍普金曾和这个家庭的父亲在同一所学校念书，这个调皮淘气的威廉·霍普金和那个“文静、认真”的爱德蒙·钱伯斯在学校的一个学生会里成了好朋友。霍普金在大约80年以后回忆说，爱德蒙·钱伯斯是一个十分刻苦的学生，“先生从来用不着对他使用教鞭。”放学以后，爱德蒙·钱伯斯和威廉·霍普金一起“押玻璃球”，这是矿区的一句俗语，意思是如果他俩中谁输光了他的玻璃球，另一个就将“保管”这些玻璃球，直到对方再把它们赢回去。霍普金在1950年说过，他这位老校友是个“坚定，稳重，可靠的人，有一种特别和善的性情”；他和他的妻子是“温和、令人称赞的一对，是老式的但却是和谐的——是人所皆知的美满的一对”。钱伯斯家族中最年轻的人叫丁·大卫·钱伯斯教授，他在1970年去世之前曾说过霍普金把爱德蒙·钱伯斯说得过于温文尔雅了：“他生来就是个冲劲十足，漂亮英俊，无责任感，性情急躁的年轻小伙子，总骑着他那只值四分之一便士的自行车冒失地飞驰下山。”

吉西·钱伯斯记得很清楚，她第一次见到伯特·劳伦斯是在公理会教堂主日学校的一次集会上，但是如果不是他们俩的母亲在这时候结交的话，她也许永远也不会和这个男孩子认识。丽蒂娅·劳伦斯发现钱伯斯太太是一个与自己相仿的矿山新户，她认为这位钱伯斯太太会听她诉说她在矿乡20年来的苦衷。她答应要去走访钱伯斯家，但直到3年以后，她才由她的儿子伯特陪伴着来到他们的农场。钱伯斯太太曾告诉过他如何穿过农田到达赫格斯，并告诉过他抄那条路最近——此小路现在已不复存在——穿过威利·斯普利·乌德的低洼地到达那里。

在后来的几年中，劳伦斯对这条以及其它几条通往赫格斯的路已变得十分熟悉，钱伯斯的家这时已成了他的第二个家。在《儿子和情人》中，他追述了他第一次去那里的情景：在一个夏日里，“田野里的麦苗在阳光下舞动，”一个邻近的煤矿“喷吐着白色的蒸气，发出吵哑、铿锵的吼叫。”

当母子两人来到他们的农场，走进一幢房子边的一个围得很好的小花园的时候，“门口突然出现了一个系着一条脏围裙的小姑娘。她大约14岁，黑里透红的脸蛋，一头乌黑的卷发细软而松散，一对黑色的眼睛带着疑问和对陌生人的毫不在意，她很快就不好意思地走开了。一会儿，一个瘦小，孱弱的妇女走了出来，她脸色红润，有着一双深褐色的眼睛。”小说中的这些描

写，是保罗·莫利尔第一次见到米丽安和她的母亲的情景，吉西·钱伯斯在她的劳伦斯回忆录里对此事的描写并没有说她自己因害羞而在门口躲开，而只提到了她和她的母亲出去将客人迎入起居室。在那里，“劳伦斯太太抱怨着天气的炎热”，并用她爽快的语气说她很高兴“你们这里没有生火”。

劳伦斯太太好像以后再也没有去过赫格斯，而伯特却成了常客，他经常带一本杂志去给他们看。他和他们的父亲相处得很不错，而他们的那两个兄弟开始还对他态度冷淡，好像害怕劳伦斯会摆架子似的。吉西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在那第一个夏季里，他只是从炎热的阳光里走进厨房的一个幽灵，带着烤面包的热香。”当他结束学业，在诺丁汉当了一名职员以后，他们有一段时间“很少见到他”。

劳伦斯在1901年夏天有了工作。当时他的兄弟欧内斯特在伦敦的生意做得越来越红火，他便在回家的时候帮他的弟弟起草了一封求职申请信。由于欧内斯特经常与莱姆街EC3的约翰·荷尔鲁爱德公司打交道，所以会用恰当的词句来写申请信。那个地区有许多历史遗迹：纪念碑、伦敦塔和伦敦桥，还有泰晤士河和河面上流动的船只以及人声鼎沸的码头。新的生活给这位从伊斯渥来的年轻人带来了许多乐趣，但他从不让自己沉湎其中。

欧内斯特和他母亲之间的爱是很深的。在他弟弟看来，那种爱是那样的强烈，如果欧内斯特想终结这种感情的话，那么他一定会垮掉。在家时，劳伦斯太太常常让她的这个儿子守在自己身边，使那些来找欧内斯特的乡下姑娘很容易地就被吓走。而当他将他的伦敦姑娘吉普西·丹尼斯带到伊斯渥来作客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劳伦斯太太很想对这个黝黑、活泼的姑娘表现得客客气气，但私下里她却责备吉普西浅薄。吉普西（《儿子和情人》中的露易莎·丽莉·丹尼斯·威斯顿）是一个速记员，她仅为社交聚会而活着，所想所言不是华尔兹，就是饰着丝带的舞会请帖和银色的舞鞋。劳伦斯太太对此深为不满，“她只让他为她买靴子！”

在她对劳伦斯的回忆中，吉西·钱伯斯提到过一次吉普赛的来访，很显然，那是在1901年的夏天，那是在一次“两周的假期就要结束的时候，”而且，“这次假期使得大家的关系有些紧张。”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欧内斯特为他的弟弟起草了那封求职信，他弟弟誊抄以后便寄给了那个在《诺丁汉卫报》上登广告要招聘一名低级职员的雇主，不久，伯特·劳伦斯就接到了回信，让他去诺丁汉城堡门九号的J·H·海伍德事务所面谈。

海伍德，一个外科用品制造商和医药杂品批发商（1830年起创建商行）。他的商行里有印有弹力袜和木制大腿图案的信笺。在《儿子和情人》中，保尔对乔丹（小说中对海伍德的称呼）在信笺上用的这些图案感到“惊异”，他从来也不知道弹力袜是何物，他似乎已经感受到商业界的有条理的价格体系和那种非人格化的无情的办事方式了，他对这个世界感到畏惧，居然连木制假脚都能做生意，在他看来这是荒谬滑稽的。”

偏偏就是D·H·劳伦斯，而不是别人，竟去为一个假肢制造商干活，这是颇有讽刺意味的，他去干了，每周13个先令的薪金。他又开始了乘早上的火车旅行的日子，每周6天，但没有了像在读书时的周末的半休：工厂要到晚上8点才下班，即使周末也是如此，尽管有时在星期四和星期五活就提前两小时干完了。

从这个男孩与那个刻薄的厂主的第一次谈话开始，他在海伍德的所有的

经历都在《儿子和情人》中作了详尽的记叙：事实上，小说中的内容比实际的还要详尽得多。劳伦斯让他的主人公在那里工作了好几年，而他自己在那里的时间是短暂的。然而，在那段时间内，这个感觉敏锐的孩子深刻了解了工厂生活的每一个侧面，这些经历都用在了他以后的写作之中。

这时，劳伦斯的生活中心已从他所熟知的诺丁汉移到了诺丁汉的另一个地方，这是在那片环绕那所中学的树林地带南边的一英里处；他现在身处一个工业区里，在一条狭窄阴暗的老街上干活，这街上的雅静已被那些取代原来乔治式房屋的工厂和办公楼所破坏，在《儿子和情人》中，劳伦斯给卡塞尔门用了附近一条街的真实名字：斯潘尼尔·罗。他用狄更斯式的语言将它描写成“昏暗且式样陈旧的了，街上有低矮阴暗的商店和装有铜门环的深绿色的屋门，赭色的台阶伸向人行道，然后是另一家老店，其小窗看上去像一只狡诈的，半睁半闭的眼睛。”

劳伦斯在诺丁汉共有过三次经历：中学生，职员以及几年以后的大学生活——而在这三次经历中，他选择了那段在海伍德工厂的短暂经历记入他的作品之中。他只在那里呆了几个月，而在中学他度过了三年，后来又在诺丁汉大学里度过了两年。可是，在《儿子和情人》中，他却对他的职员经历而不是学生经历进行了戏剧化的描述。在那部小说中，是那个年轻的职员而不是那个学生，在午餐时刻漫步穿过那座古堡或走过那古老的广场，或沿着工厂高楼之间的那条运河拾级而上。这里，对一个想象力丰富的青年人来说：“就像是威尼斯”，在《儿子和情人》中，劳伦斯当然也涉及他的学生经历，但他将此经历包括在那个在海伍德工作的年轻人的工作经历的范畴之中了。

在这个螺旋式的，制作弹力袜和悬带的营业部里，作为职员的劳伦斯，总坐在一张高凳上阅读信件，有些信件是用法文或德文写的，这两种语言他在中学里都学过，他将那些信件翻译过来，并将那些英文信件誊抄登记入册，然后就根据这登记册下发制货要求。对于这每天 12 小时的核对和开票的工作，他感到极为单调乏味。

他和工厂里那些制作疝气托带和假肢，在卷线机旁操作的女工们渐渐熟悉起来了。那些卷线机的操作工是专业工人，她们自以为比别人优越并常常摆摆架子。劳伦斯在《儿子和情人》中，对这些姑娘作了细腻、友好的描绘，尤其是对那位驼背姑娘芬妮：她有一头秀发和一副好嗓子。然而，乔治·内维尔说，那些工厂里的姑娘们并非那样优雅和温柔，只不过劳伦斯在小说中对她们作了多情的描述而已。

1950 年，海伍德的经理（此厂在二次大战中被炸以后，迁到了圣玛丽教堂附近的瓦斯尔门）在追忆那些日子时说“在《儿子和情人》中，那些背景描写是以我们的货栈为基础的，虽然那些名字是虚构的。”这位经理，A·E 吉尔，对那个叫劳伦斯的男孩记得很清楚，但他没有在工作之余和他接触过，因为他得赶火车回家。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候他是个非常文静和矜持的年轻人。高个子、黑头发，不管在工作中还是在工余时都沉默寡言。”（许多人都记得劳伦斯年轻时的头发是黑色的，后来变成了红色。）

劳伦斯去海伍德不久，他的哥哥欧内斯特便从伦敦回到了家里，再过不久他就死去了，时年 23 岁。他回家时正值 10 月份第一个星期最后三天里诺丁汉的鹅市集会，他先在伊斯渥和家人呆了几天，然后去诺丁汉看了他的哥哥乔治及嫂嫂。

欧内斯特死亡的病因是丹毒，又并发了肺炎。在他回伊斯渥和诺丁汉之

前，欧内斯特显然已经病得不轻了。他的雇主的儿子，汤姆斯·荷尔鲁爱德船长曾邀请他乘他的船去地中海，但欧内斯特谢绝了，因为他不想离开他的母亲那么远。

1901年10月6日，星期天的晚上，乔治·劳伦斯在诺丁汉维多利亚车站将欧内斯特送上返回伦敦的火车，乔治已经意识到他的兄弟病得不轻，他便嘱咐他回去后看看医生，并在床上静养几天。欧内斯特的感冒变得更严重了，他的脸好像由于高烧而变得彤红。第二天早上他去了办公室，但他看上去病得非常厉害，所以，老板将他送回到了他的住所。在那里，他的房东太太让他服了一些塞得利兹粉后便上了床。乔治·劳伦斯说，那房东在后来两天中，把他给忘了，当她想起来后走进他的房间时，发现他已经失去了知觉，躺在地板上，她便给他的母亲发了电报。

在伦敦南部迷津般的街市里，费尽周折的劳伦斯太太终于找到了欧内斯特的住处。他已处于昏迷状态，没能认出她便离开了人世。阿瑟·劳伦斯被人从矿井里找上来，（欧内没了，那孩子？）当他来到伦敦时（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来伦敦），一切都使他眼花缭乱。“他一点也帮不上忙”，劳伦斯太太后来告诉吉西·钱伯斯：这位极度悲伤的母亲不得不亲自去和那些殡仪局打交道和料理所有的后事。遗体将在周末运回伊斯渥，那口大棺木将要放在沃克街家中起居室的椅子上，家里的孩子们给那间屋子起绰号为“灵堂”。

欧内斯特在10月14日（星期一）被葬到了伊斯渥墓地。

劳伦斯在1912年写给爱德华·加勒特的《儿子和情人》的梗概中说：他的这位兄长“把他的性爱给了一个轻佻的女子，而他的灵魂却始终为他的母亲所占有，正是这种分裂毁灭了他。”在劳伦斯后来的小说《可爱的太太》里，这位长子热恋上了一位女演员，因此“他的母亲就对他冷嘲热讽”。“他本来得了些小病，但由于受刺激太深而病入膏肓……这显然是谋杀：一个母亲谋杀了她感情脆弱的儿子，他迷恋着他的母亲，这个锡西！（译注：锡西：Circe，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引诱男子的女魔）

欧内斯特死后，劳伦斯太太失去了本来有时能解除一下她忧郁愁闷的欢乐之源，她只是默默地坐着，黯然神伤，同样，《儿子和情人》提供了这时候的一段印象深刻的回忆：母亲从伦敦回来，小儿子去接她，“她让他吻她，却好像一点也不理会他；”葬礼以后，“她仍是闭口不言；”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当他晚上从诺丁汉回来，想和她聊聊他一天的工作时，“他的母亲总是漠然地坐着，看着前面，双唇紧闭，这种情况继续着：“以10月份到11月，一直到12月，他就可怜地撇在一边。他的母亲试图使自己振作起来，但是不行，她只是为她的亡子沉思默哀；她曾是那样残酷地断送了他的生命。”

最后，好像是他哥哥的旧戏重演似的，伯特·劳伦斯也患了肺炎病倒了。他险些丧命，幸亏他母亲的悉心照料才救了他。家里的一个成员说，伯特的这次病也挽救了丽蒂娅。他的小儿子活下来了，在她生命的最后9年中，他成了她深情厚爱的唯一接受者。

“离开学校以后，我当了3个月的职员，”劳伦斯在许多年后写道，“然后得了严重的肺炎，那年我17岁，此病毁了我终生的健康。”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海伍德工厂去。

这“毁灭性”病患的原因，可能是：这个受冷落的孩子有意识地模仿他

兄长的病症，试图以此赢得他母亲的爱。乔治·内维尔和这时期的劳伦斯非常熟悉。他的解释则有所不同，内维尔对劳伦斯在海伍德的经历确实作过不少评述，他总是认为这段经历对劳伦斯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在 1931 年，内维尔写道，劳伦斯“对一些妇女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始于她兄长欧内斯特死后的一次事件……当他在诺丁汉的一家工厂做一名国外客户联系人时，这种态度在他“年轻的心灵”被“疮疹感染”而留下了深深的痕印。在 1950 年与本书作者的一次交谈中，内维尔解释说，他的这些评叙的论据之一是指吉普西·丹尼斯在欧内斯特死后写给劳伦斯太太的一封信，吉普西虚假地声称，她再也不会爱任何男人，也不再婚嫁——对此劳伦斯太太辛辣地说：“她已经在想‘那些’事了。”

关于劳伦斯的“年轻的心灵”被“疮疹感染”一说，内维尔对他的陈述曾补充道：“工厂的那些姑娘们显然以玷污他的年轻天真为乐趣。你们也许认为对劳伦斯作出这样的评述是奇怪的，但事实如此，相信我，这是千真万确的。”在 20 年以后的一次谈话中，内维尔作了同样的解释：海伍德的那些姑娘，并非《儿子和情人》中的那些正经姑娘，而是一帮厚颜无耻，庸俗粗鲁的人，她们不时地用粗俗的玩笑戏谑这个乡村男孩。她们看上去很像劳伦斯的战时小说《请买票》中的那个野蛮的电车女售票员，她打昏了一个发脾气的男主管，并剥掉了他的衣服，在海伍德的姑娘们有一次将年轻的伯特·劳伦斯逼到楼下的库房里，扑到他身上，想要暴露他的阳具，他从她们中间挣脱出来，但已被弄得气喘吁吁，感到讨厌和恶心。乔治·内维尔说，他认为是这次惊吓和疲劳，导致了他在 1901 到 1902 年冬天发生的那场肺炎。

在劳伦斯病故前对他进行过治疗的肺病专家安德鲁·莫兰德医生。并不同意劳伦斯的那次肺炎毁害了他终生健康的说法；至少他认为不是那次疾病引起了致命的肺结核病。在 1952 年 9 月 12 日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很难断言他的肺病始于何时。我认为他幼年时的疾病和 16 岁时的那次肺炎与他的肺结核病没有什么联系，他的肺病可能始发于他第一次咳血的前几个月或更早些时候。”劳伦斯一直到 1920 年才发生第一次咳血。

那次肺炎也许影响了他的声带，威廉·霍普金回忆说，自那以后，劳伦斯的嗓音变得很尖了，其他人在回忆时也提到了这一点。

不管怎样，17 岁时的那次病患确实改变了他的生活态度，如果说在他病愈的过程中，他汲取了不少他母亲的爱的话，那么他肯定汲取了她更多的苦涩。

在温和的冬日里，劳伦斯坐在他们沃克街家里后花园中的椅子上，裹着毯子，以吸收一些中部地区微弱的阳光。他的病也使钱伯斯一家人感到忧虑——他称钱伯斯家人为海吉蒂斯——他开始和他们通信，由他们家的父亲传递，他因牛奶场的活计每天要来伊斯渥。在一个春日里，吉西的父亲用送奶车将他带到了他们的农庄。劳伦斯“很虚弱但很热切”，他很高兴又能和他们在一起。钱伯斯夫妇像欢迎他们自己的儿子一样地欢迎了他，甚至男孩子们对他的冷淡态度也开始消除了。

劳伦斯太太把伯特送到她的姐姐（贝利太太）处调养了一个月，那是在林肯郡海边的一幢红顶公寓里的一套她“精选”的供膳寄宿处。这里对这个从伊斯渥来的男孩子来说是个极有魅力的地方，对此，他常写信给钱伯斯家进行描述。

回到伊斯渥后，他恢复了对钱伯斯农庄的走访，在这段时期，吉西还不

算是劳伦斯的一个特殊的朋友——他更注意钱伯斯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大儿子，艾伦和休伯特——但他也意识到了她的存在。他所谈论的事情引起了吉西想得到更多的教育的渴望。因为这看来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所以她很不满意，但最后，可能是在劳伦斯的怂恿下，吉西的母亲同意让她回到学校，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劳伦斯渐渐地开始插手他们家的事务了。教小一些的孩子们玩惠斯特(惠斯特是类似桥牌的一种牌戏的名称——译注)。帮助钱伯斯太太清理草坪和收拾蔬菜。他觉得没有一样家务是令人厌烦的，在收获季节，他和钱伯斯先生和他的儿子们一起在禾场干活，这些禾场离农庄四英里，在格利斯列教堂对面：它们也是《儿子和情人》中的部份场景，也为短篇小说《草垛里的爱情》提供了背景。

吉西听她父亲说过，“当伯特在场的时候，干活就像游戏。”另一次，钱伯斯太太说，“我愿在天堂里和伯特为邻。”

许多年以后(在1928年)，劳伦斯在写给吉西的小弟弟大卫的一封信中充满了对往昔的美好回忆和那匹叫“花朵”的马和叫“旅行”的猛犬。“我可能忘却其它东西，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赫格斯——我是那样的爱它。我很喜欢和你们在一起，对我来说那确实是一种新的生活的开始……噢，我多想回到19岁，走过瓦伦来到农庄，第一眼就看到了那些房屋和农舍。然后，我会坐在窗边的沙发上，我们会围坐在茶几旁喝茶，在那间我感到最为自在的小厨房里……不管我现在成了什么人物，我仍然是那个兴冲冲赶往赫格斯的伯特。”

（四）教区的年轻恋人

埃达·劳伦斯·克拉克在她的回忆录中说，吉西最初吸引劳伦斯是因为她的认真，她对学校工作和书籍的兴趣，这些是她与那些伊斯渥的没有思想、天真无忧的姑娘的不同之处。再与他人不同的是，吉西对情人或花俏的服装并不在意，她常被她的兄弟们误解，他们常用农庄生活中的粗俗语言使她难堪，但她还是把劳伦斯当作她最好的朋友。她倾听他的诉说，分享他的兴趣，帮助他发展他对生活和对文学的信念。

吉西起初不愿去劳伦斯家里作客，他责怪她不敢去见他的父亲，虽然她在童年时受过一位醉叹的惊吓，但她断言说她不愿去与他父亲并不相干。劳伦斯好像还是不太相信她的话，他说：“你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你决不会见着他的，——他很少在家。”她后来发现这是事实。然而，在沃克街的那幢山顶住宅里有“一种奇异的气氛，一种紧张的气氛”，吉西觉得这既可怕又令人兴奋，她认为这气氛是来源于她母亲对欧内斯特的悲伤，以及与她丈夫的对立和她对伯特的钟爱。

这段时期，劳伦斯太太常为这俩个年轻人安排旅行活动，在劳伦斯太太和一个朋友的陪伴下，他们乘闸车去麦特洛克，这是德比郡皮克地区的一个有名的矿泉之乡，那里有多岩石的小山和岩洞，有模仿中世纪的城堡和“亚伯拉汉高峰”。在这样的旅行中，劳伦斯总是热切地充当众人的向导，介绍各个风景点和各种花鸟的名称。当然，如果没有长者在场陪伴，那是吉西最高兴的时候，虽然劳伦斯仍要充当向导，但他会更注意她。

吉西·钱伯斯在她的《D.H.劳伦斯：个人经历》一书中，对在一次旅行中发生的一次事件记忆犹新（这事也许是发生在1903年的耶稣受难日）：“我转过身去，看见劳伦斯在路中央，蹲在一顶伞下。他的神情中有一种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蹲着的姿势看上去有一种紧张、甚至痛苦的样子。那时，在我看来是他的一种象征性的姿势。我很受触动并缓缓向他走去。”她问发生了什么事，他答道：“是欧内的阳伞，母亲看到我将它弄坏了她会发疯的。”之后，她俩继续一同前行，但她“没有告诉他我看到的情景。这大概是我们意识到相互同情的开始。”从此，“我对他有了一种新的发现，它使我以一种全新的目光去看劳伦斯了……”

在《儿子和情人》中，也出现过这段重要的插曲，只是与此稍有不同。确实，观察一下劳伦斯是怎样对此情景加以描绘的，不但能看出劳伦斯和吉西在观点上的异处，而且，也能看出劳伦斯在小说中是怎样使用生活素材的。

吉西的描述也许是十分“真实”的；看来她常写日记，因为经多次核实，她的回忆是很精确的。显然，她早先对此阳伞事件有过记叙，大约在此事发生的七、八年以后，当时她正为劳伦斯写作初期的《儿子和情人》提供建议。可惜的是，她对那事件的原始记录没有像她的其它建议一样得以保留。幸好在劳伦斯这部小说的早期手稿的残留部分中还保存有她的这段记叙。

也许这里我们还需要说明一下上面提到的这许多手稿和笔记之间的关系。在文学上和生活中，对于一对恋人之间的关系有如此丰富详实的记录，并告诉我们如此之多的人类的行为和这些行为转化成艺术的情况是很少见的；这些材料充满生活气息，使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现实存在和这现实存在的艺术性深化，以及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用不同的方法处理共同经历的过程。

在对《儿子和情人》大约二年的写作以后，1912年，劳伦斯在意大利完

成了全书；1913年此书出版。为这本书，吉西·钱伯斯可能在1911年至1912年写过部分叙述章节，后来，劳伦斯将这些章节改写后写入了小说。他曾将此书的部分后期手稿寄给她；她在这些稿件的边空和行间作了眉批，并附了好几页的题记。

与《儿子和情人》的许多这样的原始稿件一样，上述的那个片断可能就直接来源于吉西对此事的原始记录。当然，还有其它一些被保留下来的材料与她提供的素材十分吻合；劳伦斯常从她的手稿中摘用些句子，她也常常对某个事件添加一些点缀，或变换一下叙述的角度，使之变得更加生动。

在一篇劳伦斯对阳伞事件进行描写的早期的文章上附有吉西的评论。在劳伦斯的描写中，他把弄坏阳伞的责任归咎于那姑娘的兄弟（杰弗里，《儿子和情人》中米莉安家的老二）：……保尔一个人被拉在空旷的路上，在阳光下他显得那样纤弱，他没有看见她，而是忙着修理那阳伞。他的这种姿势以及他身上的一种什么东西这时使她产生了顿悟，并使她倾生命之能去爱恋他了，但她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她慢慢地走下坡去，静静地站着，直到他抬起头来。“怎么”，他说，“你一直在等我？”吉西很珍视他这种感激的语调（吉西在此句下划了一条线并在上面写道：他的语调上带有感激之情。）他们继续同行。

他对小事或财物从不关心，而现在却因为一把阳伞的弹簧断了竟如此不安，她因此被深深地刺痛了。

“那不过是一把旧伞，不是吗？”她用带有些责备的语气说。

“是的，但这是威廉的（欧内斯特）——母亲肯定会发觉。”

米丽安沉默了。她懂了，他们继续一同前行。

吉西在另一页上对此评论道：“这次破伞的意外事件展示了一次心灵的觉醒。米丽安（她原先写道，后来又划去了）瞥见了保尔的内心世界，这使她感到惊异并使她开始了终生的探索，”这大概就是她坠入情网之时。

上述两种对此事件的处理态度是颇为平淡的：它们是对此经历的叙述，而不是戏剧化的描写。即使是劳伦斯的描述，也是平铺直叙，必要处也只不过使用了几个逗点。但是在《儿子和情人》的后来一稿中，直至后来出版成书时，他都对这段情景进行了看意渲染。他对“启示”的一面一笔带过，用了引号，使米丽安的反应成了一个次要题材，而不是一种真正的理想化的经验；除了对山岭小丘的老一套的描绘之外，他在各方面都对这个段落进行了深化，润色和改进：

他全神贯注地站在道路中央，天际远处射来一抹夕阳的金辉，使他的身影在那个傍晚的无色的暗淡的背景中显得轮廓鲜明。她看见了他，纤弱而坚定，好像是夕阳将他赐予她的一种深深的痛苦占据了她，她知道他必须爱他，她发现了他，发现了他的一种罕见的内在的力量，发现了他的孤独，好像受到某种“启示”的震动，她慢慢地向他走去……

“那不过是一把旧伞，是吗？”她问道。

她不知道为什么原来对小事从不介意的他对此却这样大惊小怪。

“可这是威廉的，母亲肯定会知道，”他轻声说道，仍耐心地修着那伞。这些话像利剑穿透了米丽安，这就是她对他的梦幻的证实？她看着他，然而她对他有所保留，她不敢去安慰他，甚至不敢和他柔声说话。

“走吧，”他说，“我修不好了；”然后，他们在沉默中向前赶路。

这里，文章着重渲染了米丽安，她在夕辉中拾步而前，与自然景色融成

一体，然而，由于保尔在路上的出现，读者被突然带进了米丽安的意识深处。当俩人最后终于说话时，早期手稿中有关保尔感激语调的词句被大刀阔斧地改剩了“轻声地”一个副词。保尔对他母亲会怎么想的担心使米丽安意识到一种嘲讽，这种嘲讽扩大了整个经历的范围。

如前所述，在文学史上，一部小说有这么充分的背景事实是不常见的。这里有吉西早期和后期对《儿子和情人》的评论，并还有对劳伦斯早期对此书的创作及他在1912至1913年最后一稿的详述的介绍。读者可以直接进入情景，从不同的角度和小说发展的各个阶段去阅读故事。劳伦斯曾说《儿子和情人》的前半部反映了他早年生活的真实情景，而在吉西的回忆录里，她却坚持认为他对那些时期的描述有许多虚误之处，但不管怎样，我们不无欣喜地看到了一部小说的进展过程，以及小说里三个主要人物中的两个人的特征鲜明的态度。然而，不管劳伦斯怎样紧密地联系“现实”这个主题的素材，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他是在写一部想象性的作品。

在被称为《米丽安书信文件集》的文稿中，还有一段小插曲进一步证实了《儿子和情人》的两种不同的描述。在下面一篇吉西修改过的早期手稿中（可能又是摘自她的笔记）是有关这俩个年轻人在复活节的星期一（很可能仍是1913年）去德比郡的温菲尔德宅邸游览的描写：

那里有一座很高的塔楼，据说苏格兰女皇玛丽曾被囚禁在这塔楼里，米丽安想要像那位女皇一样登上那废墟的巨大石阶，她走在前面，保尔跟在后边，一阵强风从墙洞里吹进来，把姑娘的裙子吹得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她感到很窘迫，直到保尔拉住了她的裙摆使裙子重落下来，并不住地和她随意闲聊，她这才稍感自在些。

吉西划去了最后一句并在后面写道“并没有必要去闲聊，那是最纯洁的一个亲昵举动，不必将之贬低。”在他的最后一稿中，劳伦斯将这一段描写作了一些扩充，删去了一些不自然的结构，并加进了一些保尔和米丽安谈论那位女皇时的对话，因之更为生动。然后是：

他们继续攀登旋梯。一阵疾风穿过墙洞，吹上塔顶，把姑娘的裙子吹得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她感到很窘迫，直到他帮她拉住了裙摆使裙子垂落下来，他这样做的时候非常自然，就像他帮她捡起一副手套一样。她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情景。

吉西在她的《D.H.劳伦斯：个人经历》（E.T.著）中，曾责备劳伦斯有一种偏见（他把胜利的桂冠恭捧给了她的母亲）；而吉西的偏见也是显而易见的。劳伦斯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她迷恋于他并着魔似地写他，然而吉西只是劳伦斯生活的一部分：正如他经常承认的那样，是他生活早期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当他结束《儿子和情人》的创作的时候，他已经超越了她，正如她已经超越了他母亲的影响一样。在那部小说中，无论他怎样确切地反映生活，他毕竟是在作想象性地描写，而且，他并无义务要作确实、刻板的描写。然而，他的文字中虽有坦率的自省，却毫无自卑自怜：无论他以怎样的想象去点缀他的素材，他的著作终究还是从根本上反映了真实。吉西的《D.H.劳伦斯：个人经历》是一种沮丧和不满情绪的流露。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劳伦斯和那位姑娘终于发现了自己的处境都常常相当严酷，也不是要否认吉西所经受的深刻的痛苦。

（五）奋争和学位

1902年，在沃克街住宅生活了12年以后，劳伦斯的家搬走了。他们并没有离开很远——实际上，新居就在街的拐角处——是在林·克洛弗特（或称林克洛弗特）的砖制建筑群中的一套房子，此建筑群从沃克街的东端起上坡延伸至希尔·托普地区。

乔治·内维尔在1931年写道：“那位‘小妇人’在‘欧内’死后在沃克街的住处就好像从未使她舒坦过，于是，全家搬到了林·克洛弗特的住处，这主要是受了“异教徒”“弗兰奇”和“葛里特”的影响，他们的父亲即是房主。

异教徒是由劳伦斯的一伙朋友为他们自己起的绰号，弗兰奇和葛里特就是弗兰西斯和葛特鲁德·库柏，他俩是劳伦斯家在林·克洛弗特的隔壁邻居，其住所后来成了劳伦斯《阿伦的杆杖》中的阿伦的住所的模型。确实，那位姑娘的父亲詹姆斯·库柏后来在这部小说中至少在外观上被用来描写阿伦，像阿伦一样，詹姆斯·库柏是个感觉敏锐的音乐家，一个长笛和短笛笛手；像阿伦一样，他是一个检称员，即一个受矿工们雇用，专监督矿主镑秤的人。詹姆斯·库柏选择了这样一个职业，是因为这活的收入要比他在国立学校当教师时拿的薪水高。当劳伦斯刚刚搬到现在林·克洛弗特9号的住处时，他在晚上可以听到隔壁詹姆斯·库柏的笛声；20年以后，劳伦斯让阿伦·西逊带着他的笛子离开了那平常的小屋，去经历了一次詹姆斯·库柏永远也不会知道的冒险生涯。

吉西·钱伯斯回忆说，她第一次去林·克洛弗特住处作客的时候，劳伦斯“颇为骄傲”地带领她在房子的周围兜了一圈。这段时间，她和劳伦斯常在一起读书学习。她通常每周去伊斯渥一个晚上，到那里一个机械学院的图书馆去阅读，这图书馆是这个城市的文化中心之一，仅在星期四晚上开放两个小时，吉西和劳伦斯总是双双同去，在那里挑选图书，供他们各自的家人下一个星期的阅读。

吉西总是来等劳伦斯，虽然他林·克洛弗特的家就在伊斯渥那个图书馆的另一端。在一篇保存下来的，她为他日后创作《儿子和情人》时需要准备的记叙片段里，吉西写道：“一个晚上，她告诉保尔，她将不再去叫他了，如果他还想与她同去图书馆，他可以在某个什么地方约见她。保尔没有同意这样做，所以，每星期四晚上在图书馆的相会也从此中断了。”

劳伦斯把这段从吉西的笔记中提取出来，写进了他的小说，但用了简练的对话使情景变得更加尖锐和严酷，在此片段的末尾对他母亲的简要提及，更加强了戏剧性效果。

一些对劳伦斯作品的丰富、复杂和多于变化的特点不甚了解的读者，这时可能会认为吉西是《儿子和情人》的一个主要合著者。对这些读者，必须作一个补充说明。尽管劳伦斯有一种由他自身本质中的女性因素所致的对女人的本能的理 解，但他有时会让他所熟悉的女人写下她们对某种情况的感觉或可能会产生的感觉：就这样，许多女人为他提供了“素材”。他的妻子弗丽达在她的回忆录（1935年）里说，当《儿子和情人》的写作进入最后阶段，“当他问我，‘你认为我母亲当时会怎么想’时，我就会写下一些片段。”劳伦斯1912年的小说《侵入者》，是根据他的朋友海伦·考克的部份手稿写成的，后来，他又将她的素材扩充成小说《中间地带》（1933）。在他生活

的后期，劳伦斯曾想与梅宝·道其·鲁汉和凯瑟琳·卡斯威尔合作著书，并且改写了另一位妇女 M·L 斯金纳的一部小说，此书后来由他们联名出版，书名是《灌木丛中的男孩》。女人总是他素材来源的一部份，他在煤乡的童年经历中是这样，在他后来对人类学的研究和他的旅行生涯中也是这样：假如一个作家采用女人所言并以对她们的了解作为创作的基础，那么，他又为何不能采用她们写的东西呢？

目前所有这些情况，将在数年以后把他的故事从一个层次引入对劳伦斯小说创作方法的讨论。这是一个必要的跳跃，因为这时候吉西的自我感情的表露是写于她年轻时期与经历仍很接近的时候，这会给我们一个充分的和真实的她当时的自我感觉，如果这些表露看来好像已从劳伦斯的原著中被减去，那么，我们必须记住吉西所提供的素材和劳伦斯的著作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对所引用的片段，他都经过深思熟虑：她就像是一台录音机，为他提供了一系列的回忆和事实，他则是一名想象力丰富的艺术家，将那些素材提炼加工，使之变成文学。

但是，吉西为《儿子和情人》提供素材的主要内容是传记性而不是批评性的。在《米丽安书信文件集》中，她的这些记录使我们能洞察到其它任何东西都不能提供的情景。

吉西所提出的一个重要异议是有关劳伦斯对米丽安在英格兰持久的暮色之中，带保尔去看一处野玫瑰丛的叙述——此片段在小说的“少男少女之恋”一章中也出现过，劳伦斯是这么写的：

他不想去吻她，而她却很渴望，这几乎是第一次她想被他吻。感情被他封锁在心中，（原来是：感情的门扉封锁住了他）和一种灵魂的热情交融在一起。他的情感是抽象的，纯宗教的。双唇的一触将会给他带来精神上的痛苦，他不能去吻没有热情的吻。

所以，当米丽安不能使他吻她时，她将他带到了一个（天知道，这里显然是被除去了）神圣的地方，并要他在那里搂住她的身体。这就是她的悲剧所在，她过分地纯化了他的爱情。因为在那时，就是摸一摸她也会使他感到痛苦。

吉西在这一段描写的后面写道：“这种误解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米丽安那时才 16 岁——像保尔一样纯洁和严守童贞。”再下面一段中，劳伦斯有一句是这样写的：“米丽安想要他，甚至比他所给予的还要多；他的母亲，以及他属于他母亲的那部分。都使米丽安感到不安，”在这句话下面，吉西划了一条曲线，就“给予”一词提出异议。在她后来的笔记中，吉西对“玫瑰树”事件作了评论：“那时候，俩人的性本能都尚未觉醒。对米丽安有这种要求的暗示破坏了整个事件的纯洁性：和保尔一样，米丽安当时的情感也只是精神性的。”劳伦斯注意到了这一点：当这一插曲在《儿子和情人》中展开时，其中没有性爱的提示。在 1910 年 1 月 28 日写给布朗奇·吉宁斯的一封信中，劳伦斯谈到吉西·钱伯斯：“我们不时有许多美好的，狂热的小插曲，她和我——说来也奇怪，在后来的 10 年中，我几乎没有吻过她一次。”劳伦斯后来认为，吉西·钱伯斯看来几乎是一个性感缺失症的典型例子。

吉西在她的书中并无有关像《儿子和情人》中出现的那样一种可能发生的诱惑的暗示，可是在劳伦斯去世以后，她在写给艾朱丽·德拉芬内的信中（在 1935 年）谈起过 1910 年在维逊泰德的那些假日，那时劳伦斯她像是在

伊斯渥：“我不能掩饰对劳伦斯的态度的一种强烈的暗示，好像他受到他肉体欲望的驱使——而没有自发性的行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处于既难堪又窘迫的境地，由于劳伦斯固执地禁止我去拥抱他，我们往往一指不染。”劳伦斯在《儿子和情人》的题为“对米丽安的考验”一章中，表达了他对这些经历的态度，另外在他的一些诗中也有叙述。包括《爱情中的冷酷》一首，此诗中有这样的诗句，“是否由于痛苦，亲爱的，你才这样颤抖？”在另一首题为《蝴蝶花的芬芳》的诗中，劳伦斯写道，“你卧躺在山毛榉的枯叶上，又一次，仅这一次，像是迷蒙之夜中的献祭。”吉西告诉德拉芬内医生说，劳伦斯是基于那些不足为信的早期的性接触才建立起“与米丽安的关系的；他仅根据一些微不足道的经历来判断我和开罪于我，而不停下来自省一下他自己的态度是否无可指责。”

在劳伦斯早期手稿的 220 页上，吉西对他们的关系作了最充分的评论。在“米丽安”的面具后面，在那些只为劳伦斯而写的词句中，她所说的那些话，要比她在他死后用化名发表的那本书中所述要坦率得多。当然，那本书是在事情时隔很久以后写的，也许是 30 年以后。下面的这段摘录是写于事情发生后的八、九年，而且，还可能写于这样的时刻，即吉西·钱伯斯意识到了她将永远不可能去拥抱这个她爱了这么久的、性情易变的年轻人。这使她在手稿中有关恋爱关系的议论上加重了辛辣尖刻的语气：

可见，在那时候，力量的均衡是由米丽安掌握的，因此，她还有巨大的潜力。这时候，她对保尔的爱还未超越她自身——还没有摆脱她的控制，直到这种爱被蒙上了一种宗教般的神秘色彩，而在这种色彩后面有一种“生活的意志”的力量要将那种爱否定时，她才觉得可怕起来。

1902 年的秋季，劳伦斯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伊斯渥的不列颠学校有一个小学教师的空缺，罗伯特·雷德牧师在与劳伦斯的母亲商量以后向学校推荐了他。这所不列颠学校在阿尔伯特街，一便士阅读和音乐会就在那里举行，旁边是公理会教堂。小学教师的制度，自 1846 年开始实行，规定由学校校长给低年级的见习教师发放薪水并给他们以指导。在这段当小学老师的时期内，尤其是在德比郡的依尔克斯顿，劳伦斯必须掌管一个很大的班级，并在一间大屋子中碰到其它的班，异常喧闹且各班之间的打斗时有发生。劳伦斯在很久以后说起过这“三年”给矿工的孩子上课的可怕的教学生涯，但这里有一点记忆的疏忽，这好像是他无意识地想要弱化这段苦难的经历。实际上，在伊斯渥和依尔克斯顿两处共渡过了四学年的“可怕的教学生涯”，从 1902 年秋季到 1906 年夏季。

威廉·霍普金最初是在这段时期开始较多地了解劳伦斯的，他说那个在第一年指导劳伦斯的不列颠学校的校长“只是一个平庸的教师。”作为一个矿工的儿子再去教矿工的儿子们，劳伦斯是很不乐意的。霍普金认为，论劳伦斯在伊斯渥从教是个错误，在那里，他得不到学生家长的尊重。他起初的新金是每年五镑；在三年中这薪金才能增加三倍。

1902 年的教育法案带来了一个变化，它要求将教师集中起来进行培训：劳伦斯和其它伊斯渥地区的见习教师，包括吉西·钱伯斯，在 1903 年秋季，都被遣派到了依尔克斯顿的小学教师中心。这些年轻人通常每周三次去这个离伊斯渥三英里远的自治市，它就在德比郡厄沃什运河的对面。他们早上坐火车去，通常在傍晚时步行穿过田野回来。内维尔在葛里斯雷·吉尔特学校教书，他也加入了这群被称为异教徒帮的年轻人之列。

劳伦斯与他的朋友们 1903 年在依尔克斯顿的威尔摩特街的教室接受培训。此教室就在巴士街旁边的卫公理会教堂里，这条巴士街陡峭的大道从火车站一直向上延伸到宽敞的市中心。

吉西·钱伯斯谈到劳伦斯从 1903 年到 1905 年在依尔克斯顿的日子是“十分愉快的”，但乔治·内维尔却回忆说并非如此；他当时只是在检验自己的能力。他自己后来有关此话题的议论也无愉快的表示。在《虹》一书中对这段生活经历的反映尤为如此，此书中他在厄索拉·布兰温身上反映了许多他自己的经历。劳伦斯描写的厄索拉这个人物确实部分地取材于一个他在依尔克斯顿认识的姑娘露易莎·伯洛斯，她给厄索拉提供了许多不平常的经历；那小说的有关依尔克斯顿章节主要地还是他自己对那个地方，那段时间和发生在那里的事件的想象。

尽管在《虹》中，劳伦斯将依尔克斯顿描绘成“一片幽黑、延绵的山丘”，学校是“阴暗的”，但最令人讨厌的也许是校长汤姆斯·A·比克劳夫特。在 1905 年 3 月 25 日的校刊《教师》上刊登的一封信中，劳伦斯说他在依尔克斯顿培训中心“受到了校长 T·A·比克劳夫特先生的很大帮助。”然而，10 年以后，劳伦斯在《虹》中将他漫画成哈比先生，一个蛮横专制的人。吉西·钱伯斯对劳伦斯在依尔克斯顿的日子坚持乐观的观点，她说他和比尔克劳夫特“相处得非常好”，但《虹》中的情节是与此相背的，乔治·内维尔的证实也是如此，他说在依尔克斯顿的教师们全不喜欢比尔克劳夫特，他“根本不是个好角色。”内维尔说劳伦斯“和他相处得很不愉快。”

他在异教徒帮中间要快乐得多，他们一起在伊斯渥和依尔克斯顿之间往返来去。除了劳伦斯和埃达·理查德，波戈摩和活泼的内维尔（欧内斯特·劳伦斯曾给他起绰号叫特斐尔，D·H·劳伦斯叫他“浪荡鬼”）吉西·钱伯斯和他的哥哥艾伦有时也一同来去，这群人中还包括从林恩·克劳夫特·艾丽丝庄园（《儿子和情人》中的比特丽斯·怀德）来的库柏家的姐妹们，和艾迪斯（凯蒂）·霍德尼斯，她是劳伦斯以前在伊斯渥不列颠学校主管的女儿。后来，另一位姑娘也成了这个异教徒帮中的一员，她在一些年以后，曾有一段时间介于劳伦斯和吉西·钱伯斯之间。此人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露易莎（露易）·伯洛斯，她住在考索尔，一个位于依尔克斯顿城外的村庄，她后来（1940 年）成了弗里德里克·希斯太太。

露易莎·伯洛斯已在《虹》中作为一个原型提到过，她是后来劳伦斯许多热烈的爱情诗的主题，例如那首公然描写男性生殖器的《金鱼草》。她比劳伦斯小两岁半，于 1888 年 2 月 13 日出生在依尔克斯顿。到 1895 年，她的父亲阿尔弗雷德·伯洛斯创办了一个乡村雕刻班，为考索尔的圣·凯瑟琳教堂做橡木浮饰。阿尔弗雷德·伯洛斯，《虹》中厄索拉的父亲，那个充满梦幻，热爱哥德式雕刻的年轻人的原型。他和他的一家住在圣·凯瑟琳教堂隔壁的教堂小屋里，就是在《虹》中，被劳伦斯称为柯瑟赛（此名来自那地区的另一个城镇）的蜜月之屋。阿尔弗雷德·伯洛斯娶了考索尔的露易莎·惠特莉，他直到 1947 年才在教堂的南侧过道里开了一扇感恩的彩色玻璃窗。后来在 1949 年开的一个窗，是为纪念阿尔弗雷德·伯洛斯而建的。

在《虹》中，布兰温一家所在的农场实际上是马什农场，大约在依尔克斯顿以东半英里处，即考索尔北面不远的地方。在劳伦斯时期，此农场是由弗里奇雷一家租用的，他们占有这个农场已有两个世纪；劳伦斯和露易莎·伯洛斯曾常常去这个被废弃了的、满是乱石的老农场游玩，那时，这里只有几

间小屋还被一个依尔克斯顿的屠户使用着。最后那些小屋也被拆除，被一幢平房所取代。

在伯洛斯家里，露易的父母对劳伦斯较为冷淡，他开始了解了一个与自己以及吉西的大不相同的家庭。不管怎样，他与路易之间的感情直到数年以后才成熟起来，那是在他离开了小学教师中心以后的事了。在 1903 年至 1905 年期间；主要引起他注意的是吉西以及她的兄弟艾伦。这一点可从《儿子和情人》中“少男少女之恋”一章的几个不同段落的三个句子中得到证实：“对他个人而言，他是在很久以后才意识到她的……埃德加是他的挚友……但那姑娘渐渐地引起了他的注意。”

劳伦斯的朋友及他晚年的敌人约翰·密德尔顿·莫里指出，在《儿子和情人》中的埃德加和《白孔雀》中的乔治·萨克斯顿的类同之处时议论过劳伦斯的青年时期（在《妇人之子》中，1932 年）他说，“对于乔治和埃德加的原型他肯定感觉到了什么东西，这种感觉简而言之就是爱。”

处于青春期有这样一种感情既不少见又不“反常，”因为大家对弗洛依德和金西都略知一二了。莫里着重谈论了《白孔雀》（劳伦斯的第一部小说）中的一个场景，在此片段中，有年轻人一起在池塘里洗澡的描写，是在“友情诗篇”一章中。事情是发生在收获季节，莫里发现此段描写同《儿子和情人》中“保尔和埃德加在收割柴禾时一起劳动”的描写如出一辙。莫里想要阐述这样一个很有争议的理论，即劳伦斯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可怜牺牲品，他评论说：“劳伦斯在他母亲去世之前把他真挚的、没有掩饰的热情转移到了一个男人而不是一个女人身上。”纵观劳伦斯早期的恋爱史，如果不算入露易·伯洛斯，但是与吉西·钱伯斯和艾丽丝·戴克斯这位向劳伦斯传授性爱之道的伊斯渥已婚妇女之间的关系至少可以证明莫里的推测是错误的。诚然，劳伦斯与他母亲之间强烈的感情联系使他一时难以与一个女人建立起一种持久的关系；而且，劳伦斯与吉西的兄长艾伦之间的情谊也是事实。康普顿·麦肯色在他的自传《我的生活岁月》——“八行诗之五”——中说劳伦斯曾对他说，“我认为我所有过的最真挚完美的爱是我 16 岁时对一个年轻矿工的爱。”如果他确有此言的话，他不太可能是指艾伦·钱伯斯这个农家孩子，尽管他后来也许去了矿上做工。劳伦斯在写给勃朗奇·吉宁斯的信中谈起过钱伯斯，从 1908 年至 1910 年，劳伦斯给她写给许多极为重要的表白信。1908 年 7 月 30 日，他向她表白道：

你告诉我，说我没有男朋友。那个和我一起在禾场干活的是我的乔治的原型（在《白孔雀》中，当时题为《利蒂西娅》，——他缺少其他人的那种既同情又歧视感情微妙之处，而他的这种性格和气质赋予他一种人所未有的高雅。但是，我十分喜欢我的这位朋友，他也一样。有时候他常常对我温柔地像一个妇人。看起来，我的男性朋友都大同小异，总的来说，他们总是温文尔雅地对待我；他们也很顺从我，你说得都对，我对男人之间的友谊比男女之间的感情更为看重……但是一个对不和谐的小曲能作出反应的女人总比一个全然暗哑的男人强，是吗？所以，若要让我得到一个纳拿单（《圣经》中大卫的好朋友——译注），他必须具有我所钦慕的十个男子的品质。

劳伦斯继而又说“许多人在结婚时，他们的灵魂之弦与性爱之音产生共鸣——而性爱的音符可能会注入美学、诗歌、绘画和爱情小说中去。”但是，劳伦斯认为，“如果不仅仅把性爱之弦调谐好，而且把我们所说的宗教情感（从广义上去理解）和通常的同情之心的大小和弦也调谐好的话，曲调就会

更加美妙”。他随后把这些感想与《白孔雀》中的爱情——婚姻主题联系起来。然后，他谈到了“与三个男人一起刈草”的情形，“我确实爱着他们，程度各有不同”，他们也许就是钱伯斯家的两个男孩和他们的父亲爱德蒙·钱伯斯。他描述了在葛里斯雷农田时的情景，附近是鲁道夫·冯·休伯牧师的住宅，一天晚上，劳伦斯和钱伯斯家的男孩睡在露天的草堆里，此时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没关系，小伙子们，我只是来找个野孩子，你这野小子”——这是劳伦斯的短篇小说《草垛里的爱情》的雏型。确实，有关葛里斯雷农田的全部描写是《白孔雀》里许多章节中各种场景的前型，特别是“友谊诗篇”和“乔治的学业”两章。在后一章里，西里尔说起过和乔治一起在农田的劳动：“日复一日我把教师告诉我的说给他听，有关性和它的起源，有关叔本华和威廉·詹姆斯。”

前面已经提到，劳伦斯与文伦·钱伯斯的友情在《儿子和情人》中也有描述，在这本书中，艾伦的名字是埃德加。这部小说中，保尔在米丽安关系的初期“常常避开她而和埃德加在一起。”她和埃德加“正好性情相背。埃德加是个理智的人，好奇心很重，对生活有一种科学的兴趣。”米丽安“看到自己被埃德加和保尔冷落，而且埃德加看上去远不如她，”感到十分痛苦。而保尔和埃德加相互为伴，十分快乐。“两个人在下午常在一起下地，如果下雨，就在阁楼上做木工活，他们在一起闲聊，或保尔把他从安妮的钢琴旁学来的歌教给埃德加。”

在《儿子和情人》早期手稿的片段中，曾提到埃德加很喜欢“他朋友的批发商似的冲动的举动。”下面这一段在稿中也出现过，虽然在后来出版的版本中没有：

另一天晚上，保尔在画一些松树，埃德加以一种保护人式的，亲昵的样子凑到他肩头。突然米丽安来了，三个人都沉默不语，直到保尔眯起眼睛盯着画上的松树说道：

“一棵松树的树杆不是树杆，它是一团火焰。”

“您怎么看得出来？”埃德加笑着问。

“你看那树杆——是红的吗？”

“差不多，”这个年轻的农夫答道。

“它在燃烧吗——它看上去在燃烧吗？”

“不，不在。”

“你真是一个讨厌的说谎者：你能感觉到它在燃烧，就像太阳在燃烧一样。现在说实话——就让你自己说一次实话吧——它看起来在燃烧吗？”

“唔——”埃德加的声音中有一种和一丝害怕之感“也许是的，——你可以认为它在燃烧。”

“这就对了，”保尔大声道：“如果不在燃烧的话，那是什么使你觉得那样的呢！”

这位年轻的农夫不自在的笑着，把手插进他皮带前的口袋里，走出去干活了。

吉西谈到此处时，在保尔称埃德加是个“讨厌的说谎者。”下面划了一条曲线，她写道：“保尔是15岁——埃德加是19岁？”可是，既然两个年轻人如此亲密，这一指责显然是戏谑性的，即使在那个“尊重长者”的时代也不算出格。

这些在劳伦斯式的主人公和另一个男性之间的友谊篇章，不仅出现在早

期小说中，后期作品中也时常可见，这会使人扬眉示疑。尽管有种种流言蜚语，但看来劳伦斯并不是一个同性恋者；至少，不完全是或一直是一个同性恋者。弗丽达·劳伦斯曾一直坚持说她的丈夫从任何方面去看都不是一个同性恋者，但是，在她生命的末年，她的语调稍有改变，她在 1949 年写给正在研究劳伦斯的爱德华·吉尔伯特的信中说：“莫里和他没有‘恋爱关系’。但他并非不喜欢同性恋。”不久以后，弗丽达写信给莫里说，她肯定劳伦斯对她没有同性感情，劳伦斯的同性恋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和康瓦尔郡农夫的那些日子），她与他对这事进行了抵抗，而且成功了。

当然，没有人比劳伦斯对性问题说得那样大胆和透澈。而在他的作品中，并没有任何用赞许的笔调描写男人之间的性关系，或性快感的段落。诚然，他曾用以不以为然的口吻描写过这类事情，虽然是写在没有使用的《恋爱中的女人》的引子中，（现在在《凤凰》的第二部中可以看到），伯金显然有着同情恋的倾向。然而，这反映了多少劳伦斯自己的实际情况是值得疑问的，（在那部根据此小说拍成的电影里，导演让伯金长着像作者一样的络腮胡是一个误解，劳伦斯并不是这样一个人，伯金也许是作者的一个代言人，但他并非作者自己。）劳伦斯在 1914 年告诉亨利·萨维奇说，即使一个人能从另一个男人那里得到满足，但从生理上说，一个人只有从一个女人那里才能得到肉体 and 灵魂的满足，”一切传统和直感都制约了一个男人去爱其他男人们，或另一个男人——因为那意味着一切有目的的自然力的灭绝。”

这看起来好像有些前后矛盾，因为在劳伦斯的小说中，有如在《白孔雀》中的洗澡场面和《恋爱中的女人》中的摔跤情节的描写。也许这个问题在凯瑟琳·卡斯威尔的《野蛮人的朝圣》中有最好的解释。她在文中说道；我曾听劳伦斯说过，对他来说，性反常是违背圣灵的一种罪恶，”一种不可救药的罪恶，但是他满怀希望地等待着看到一个男人与男人之间的交流，但也不乏其生理特征的。他甚至认为，我们现代人对这种交流完全否定了感情交流的复活，是引起现代性变态的原因。”他还认为对这种“真正原力”的重新发现和恢复“男人和女人之间健全的幸福”全取决于“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圣洁的更新。”

这就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后期的劳伦斯，很难用常言俗语加以简化。对其的确切理解不是用理性分析所能达到的，而是需要一个对劳伦斯作品融汇贯通的阅读经历，——一本像我这样的书只能对此稍作指点，不管怎样，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问题，无论从哪方面去研究劳伦斯都是很重要的，他不单单是在写小说、故事和诗歌；通过这些作品，他常常在倡导一种生活方式，理解他倡导的什么，是对他作品作出必要估价的一个重要方面。艾弥尔·德拉芬内在《D·H·劳伦斯和爱德华·卡宾特：对爱德华时期的过度之研究》（1971 年）中提出，劳伦斯也许受到卡宾特的影响，后者住得离伊斯渥不远，他说“对劳伦斯来说，卡宾特的文化和道德环境与威廉·E 和莎利·霍普金以及艾丽丝·戴克斯的圈子是相仿的”，虽然没有记载可以证明劳伦斯同这位《中性性爱》的作者有过交往，“此人是个有名的同性恋者，德拉芬内教授指出，吉西·钱伯斯在 1935 年说，劳伦斯肯定曾谈过戴克斯夫人的“高级”书籍，其中不少是由卡宾特所著，他还是一个妇女权利的提倡者。威廉·霍普金与本书作者谈起过（在 1950 年）他自己和卡宾特的友谊。霍普金的女儿在一封信中提到卡宾特是霍普金家在伊斯渥时的一个很受欢迎的客人。但她和她的

父亲都未提到劳伦斯和卡宾特在他们家见过面。但不管怎样，德拉芬内的假设：即劳伦斯可能读过那些明目张胆地提倡同性爱的书籍，可以从他们俩人作品中许多颇为相似的观点中得到证实。

前面已经提到，劳伦斯小说中“友谊场景”里的肉体接触不一定意味着性接触。对劳伦斯来说，抚摸是很重要的：他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神经发达，可以由触摸来感知事物，在《盲者》和《你触摸了我》等故事中都有这样的例证。看一下《恋爱中的女人》中的伯金，在险遭他情妇的谋害之后——他在头上被重击一下以后逃脱——他来到一个有树林的小山旁，脱光了自己的衣服，躺在长满鲜花，荆棘和树根的地上：“这是那样一种美好的清新，微妙的全身的接触，他好像在尽情地享受着这种接触。”现在，大多数人也许不会有与自然这样直接的交融（当然，游泳差不多也属于这一类型）；但因为劳伦斯需要这样的一种交融，所以，他能够在作品中将大自然表达得如此真切可知，通过这样的表达，作品便突出了这种真实感。他的目光并不比他的这种触觉敏锐多少；用此词的原意讲，他的作品是在“触动”读者。

在1915年写给伯特伦·罗索的一封信中，劳伦斯谈起过同性恋的另一个方面，在信中他表达了对异常性行为的厌恶，当然他是指男性之间的肛门性交。真正的人类关系，劳伦斯说，是一种发现；遗憾的是，大多数现代男性，不是去寻找一个女人以向未知世界挑战从而进入一种新型的创造性的关系，而只是与她重复一种已知的感觉，一种熟悉的反应。这就异化了现代社会中的男性异常性行为：“男人找男人在自己身上重复这种反应。这种形式与手淫相似（原文如此）。但这里仍有一个对象——是两个身体而不是一个。一个意志坚定的男人对另一个身体——男人的或女人的——过于敬畏，以至不能将它作为手淫的工具。所以他保持着中性，被动的状态……鸡奸就意味着一个男子知道他被锁于巨石之上，所以他就想要从自己身上得到一种最好的感觉。”劳伦斯继而又说，这种情形出现于“任何生命形式对其内在生命变得过于强壮的时候：衣服比这个男人更重要了：所以这个必须在他的衣服下面获得满足。”

除了道德伦理的考虑，此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仍值得讨论：即可以被称之为心理特征的那一部份。那个认为劳伦斯终生是俄狄浦斯情结牺牲品的临床学观点，加上那些包括同性恋在内的所有常见病症的迹象，是容易被忽视的。

莫里在他的自传中[发表于《妇人之子》（1931年）5年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说，他完全不是想把“通常意义上的同性恋这个词”用在劳伦斯身上。至于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那种认为劳伦斯一直受之束缚的观点被一个人令人信服地否定了，因为他熟悉劳伦斯，他的观察是毋庸置疑的。这位批评家就是英国国教牧师马丁·杰瑞特·柯尔教父，他化名威廉·惕弗顿教父写了一部很有深度的研究劳伦斯的著作《D·H·劳伦斯和人类生存》（1951年），在书中他指出，“研究劳伦斯的作者……过于夸大了他的俄狄浦斯情结。”因为在通过写成《儿子和情人》而摆脱了他对母亲的依附之后，他进入了一个用劳伦斯太太的语言无法解释的独立存在时期。”如果这种依附得以幸存的话，那么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一定会偶有显露，但这些作品中只偶尔有一些那种关系的微弱反响，例如，后期的《可爱的太太》这篇虚构的，浅显的故事。理查德·爱尔兰不同意杰瑞特·柯尔的这些观点。他在1960年3月16日的一封信中指出，“我敢说D·H·劳伦斯的百分之八十五是异性爱，而百分之十五是同性爱。”现在我们也也许可以用双性这个术语。

从心理学上看，对我们所讨论的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种观察的角度：从劳伦斯对于男性特征的赞颂去看，他也许是一个体质虚弱的孩子，一直在追求一个获得力量的希望。这并不是一种同化补偿——也就是说，劳伦斯以一个肉体巨人的角度去写作，通过同感过程“变成”一个受人赞慕的强壮的人——不是的，在这样的假设中，劳伦斯完全可以保持他本体的完整并使之与那些强壮的人们融合在一起，从他们那里获取力量。像《癫狂的毒蛇》中的那个聪明过人，身材矮小的将军西普里阿诺一样，劳伦斯可以想象自己进入一种与那个体力强壮的堂·拉蒙有领导者之间友谊的理想境界，这个堂·拉蒙的新宗教礼仪中就包括有一种男人之间的肉体的——而又不是性的——接触。同样，在《恋爱中的女人》的摔跤情景中，那个身材瘦长的罗伯特·伯金因使用柔术以及他的机敏灵活而使杰拉尔德克里奇大为吃惊。然而所有这些只是提出了一种可能：这种提示并没有任何意思认为这些描写完全是有意意识的，甚至也不认为这是一种受主观顽念驱使的无意识行为。

这个讨论好像已经脱离了伊斯渥；但这实际上是为了要深化那个背景视野，因为这样的讨论可以表明从劳伦斯的早年生活背景中，可能演化出了什么或没有演化出的什么。而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是：从许多与伊斯渥有关的踪迹中可以追溯到吉西·钱伯斯和那位劳伦斯第一次真正恋爱的已婚女人。

劳伦斯和吉西的兄长有过很深的友谊，后来他又和吉西的姐姐梅伊相处得不错，如她的小弟J·D·钱伯斯所说：“她认识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认识她。”尽管“她对D·H·劳伦斯和他的圈子敬而远之，”但是，在她结婚搬走以后，劳伦斯还曾把那个已婚的德国女人带到她家去，不久以后他就和那个德国女人私奔了。钱伯斯教授很羡慕梅伊的那种“火焰般的活力”，因为，她“大胆、乐达、性情暴躁，而对她所爱的人却十分温柔；在她们年轻的时候，她认为吉西是“多愁善感的”。

梅伊·钱伯斯还记得年轻的伯特·劳伦斯的知识是多么的丰富，语言充满机智。当他与一些年轻人穿过一片林地时，他问他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在早春时候大多数的花都是黄色的吗？”他们不知道，于是“他解释说，因为那时昆虫太少，所以要用鲜艳的颜色去吸引。”那些年轻人很喜欢他的这种信口开河式的解释和伯特时而表露的点滴知识，因为在他这样的发现之中总散发出一种新的芬芳。”不过，梅伊的母亲还是不愿劳伦斯在她的孩子面前谈论奥马·哈亚姆的《鲁拜亚特》诗：“我不想毁灭他们的信念。你读这些东西已使我感到悲伤，但你不能夺走孩子们的信念。”（对于梅伊·钱伯斯死后发现的回忆录的真实性，加拿大的学者乔治·T·柴塔洛克提出过疑议，他认为这些在爱德华·尼尔斯的《D·H·劳伦斯：综合传记》（第三册，1959年）中发表的材料实际上是吉西·钱伯斯所写）。

J·D·钱伯斯回忆起梅伊与一位叫威廉·赫布鲁克订婚以后的一桩事情：“他自有一套，几乎和劳伦斯一样惹人喜欢，我想劳伦斯也许会觉得有些妒嫉，因为他得和我们一起分享对这个没受过教育的工人的爱慕。”后来，赫布鲁克为梅伊制作了一对石雕，钱伯斯家就将它们放置在花园的门口两旁。这使劳伦斯感到十分不快，他说它们形象“丑陋”，一次他去他们家作客时，他用一把大锤子把它们砸了个粉碎。“它们成了碎石，我们默默地将那些碎石清扫起来，并拿定了主意不让这两个年轻人同时到家里来。”

虽然劳伦斯和吉西之间的友谊持续了很久，但他与艾伦·钱伯斯之间的关系显然并不长久。他渐渐地超越了她，将自己从他们关系的许多联系中解

脱了出来；而她只能有限地做到这样的脱离，必须指出，就吉西而言，她认为她对《儿子和情人》一书是有苦衷的。她觉得此小说表现的故事只是一种带有偏见的描写，而不是那段痛苦的恋爱史的真实实况。

确实，评论家们想要找到他们关系的真实情况的线索的话，就必须小心翼翼地他们在他们矛盾冲突的边缘上寻找踪迹。吉西在她的回忆录里只是用了劳伦斯的部份书信，这些书信是附合她的主题的，即，是他亏待了她；他其余的信件都在她去世之前被她不负责任地销毁了。据约翰·R·伍德（1915年与她结婚）在一封信中说（1951年1月6日），“我的亡妻毁掉（烧毁）了那些书信。”探求真实情况的评论家们有权指责吉西·钱伯斯，因为她不仅销毁了非常重要的文学资料，而且，由于她将那些对她不利的重要证据变得永不可及而将自己置于被怀疑的地位；她的这种行为使得阿斯泼恩书信文件在人们的记忆中，是何等痛苦地燃烧。

然而，这是一个受尽磨难的老妇人之所为。这时候的吉西已经远不是那个满怀希望的小姑娘了。那个时候，她常常会在夏天的下午在她那间卧室里，等着听到园门锁链的响声，劳伦斯来了，骑着自行车来到了他们的农庄。在她后来回忆整个经历时，她对他形象最清晰的记忆是在依尔克斯顿。那一天，她看到他伏案读书。她即刻就注意到了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他漂亮的容貌，他的聚精会神，他的活力，他的敏感以及一种特别的“轻灵飘逸的品质，一种内心深处的闪光。他和我都开始意识到这种不同，它在我们之间开辟了一片共有领域。我们虽未言明，但它确实存在，这是相互吸引之所在。”

吉西得到这种“启迪”之时，正是劳伦斯为参加在依尔克斯顿的一次重要考试用功的日子。这样的考试有两次国王奖学金和伦敦入学考试。那个他不喜欢的校长T·A·比克劳夫特是他两次考试的指导（不管比克劳夫特有什么过错，他还不知道怎么去选择一个优胜者）。当劳伦斯在1904年12月的国王奖学金考试中获得全英格兰和威尔士第一名时，他觉得为自己开辟了一个美好的学业前程。自那以后，如他后来回忆说，他“被认为是天资聪敏”。

关于劳伦斯在国王奖学金考试中的名次问题曾有过一些争论。1905年3月24日的《教师》杂志上提到他是一组优胜者中的一个。后来，一封写给《教师》杂志的信（由艾弥尔·德拉芬内发现）也证明劳伦斯的名次无误。但是，依尔克斯顿的校志表明，他是全国第一名，“被列为全国第一。”另外还有一些由劳伦斯本人提出的证据。美国出版商迈克尔·肯纳利在1914年出版了劳伦斯的剧本《寡居中的赫洛伊德太太》，由瑞典裔美国作家埃德温·鲍克曼作了序，他根据劳伦斯寄给他的材料为作者写了一个小传。劳伦斯对肯纳利提起过此事（1913年10月5日），说：“当然，我可以接受他在前言中对我的美言称赞：在我看来这些言辞非常确切。”鲍克曼是这样写的，使他自己以及其他人都感到惊奇的是，19岁那年他在国王奖学金考试中竟名列榜首，从那时开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被认为天资聪敏，当然，如果克曼理解有误的话，劳伦斯不会追求不属于他的荣誉，他会指出其中的错误。与这一点有关的，在一封1971年写给《时代文学副刊》的信中也有记载：他不得第一名又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劳伦斯在考试中的惊人的好成绩会很自然地影响到他与他周围那些人的关系，特别是当他们将他置于那个“被认为是天资聪敏”的位置上时：他对生活的基本态度和他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很可能会稍有改变，这也会使他的创作与本来可能的风格有所不同。

在参加专科学校的入学考试之前，劳伦斯还有6个月的见习教师工作要

完成。这时候，那所小学教师中心已经搬迁到了巴士街高端的市中心图书馆楼上的新房子里。T·A·比尔克劳夫特和学校一起搬来，他又是这位优秀生的指导。

1905年6月，劳伦斯在诺丁汉参加了伦敦入学考试。乔治·劳伦斯回忆说，这时候，他的母亲也去了那里。不知是否因为这个使劳伦斯感到紧张，或是因为又一个学年末期的学习和教学使他疲惫不堪，他没能像在前一次考试中那样成绩出色。他的名次被列在第二档次中。

不过，他已经有资格进入诺丁汉大学了；但是，因为没有20英镑的预付费，他还不能享用他的奖学金。

他的母亲又一次咬紧牙关，节衣缩食：她的儿子决不能放弃这个机会，他还得等上一年，继续教书攒钱，全家人也得作出更大的牺牲。正如吉西·钱伯斯所回忆的“以后的一年中，劳伦斯作为一个无证教师在伊斯渥的不列颠学校执教，攒下他所挣收入的大部份作为大学的费用。从这一年起，他开始写作，这书就是后来的《白孔雀》。

（六）自然的遗迹

在劳伦斯从事写作之前，他曾学过绘画。他开始是模仿杂志上的插图。他好像在雷顿勋爵的亲戚，乔治·雷顿·帕金森那里上过一些课，后者是兰利磨坊厂的装饰陶瓷制作者。劳伦斯后来说，他在‘素描’方面有过充分的训练，立体几何图形，石膏模型，和线条运用练习。”他觉得只有立体几何图形以及其“所有透视的基本原理”是对他有帮助的，而其它的方法都是有害的。

虽然他在闲暇空余常常涂上几笔，但一直到他生活的晚年他才开始认真地作起画来；今天，在英国、美国、和意大利等劳伦斯居住过的地方，人们常会拿出一些小幅的色调柔和的水彩画来说，“这是劳伦斯在这里时所画的。”

在他年轻时，他并不觉得写生画有什么“惊人之处”，那时候，大自然在他看来就和石膏模型差不多。他专注于模仿那些复制品，如凯米尔·卡洛特，弗兰克·布莱温和莫利斯·格雷芬海根的风景画。他对格雷芬海根的《田园诗》这幅画尤为欣赏，临摹了好几次。在这些画中，他并没有加入任何自己的东西；这些模仿作品中还没有在他后来的散文和画中出现的那种充满激情的笔触。然而，通过这些早期的尝试，他在训练他的目光，扩展他的视野；他所有形式的文字作品都反映了绘画的特点。

另一个对他创作的早期影响当然是文学本身。他在学校对这一科目的学习得到了后来的阅读的补充，如他和吉西在赫格斯附近田野里或在那个小厨房里的阅读，还有当他家的其它人不在时，他们在沃克街以及林恩·元洛大特客厅里的阅读。劳伦斯家里有一套他们视为珍品的文学书籍，那是一套由欧内斯特买来的一套绿色封皮的世界文学丛书。钱伯斯家也对文学有兴趣，常常朗读一些作品；早在吉西会认字以前，她就常常在星期六下午听父亲给她母亲朗读连载在《诺丁汉郡卫报》上的《德伯家的苔丝》。在劳伦斯成了他们家的朋友以后，他常常组织朗读剧本，并时而变得十分“兴奋”和“专横”，当然，钱伯斯家的人“与他很熟，因此并不生气。”但是，对于劳伦斯对公理会牧师们的肆意攻击，钱伯斯太太颇为不安；J·D·钱伯斯回忆道，劳伦斯很早就“宣称信仰一种怀疑论的唯物主义，并且将我的长兄（艾伦）也拉入他的行列中。”

在他与吉西初交的时候，劳伦斯曾给她买《小妇人》之类的小说，但后来他认为这类小书过于伤感而不屑一顾。但是在当时他曾把自己和吉西视为劳里和乔。诗歌方面，他把《希亚瓦沙》和《伊万姬林》读给她听，但她对这些诗并无他那样的热情；至于《朗塞洛特和伊莲》，她则觉得“很讨厌”。后来，劳伦斯得到了一本红封皮的《英诗金库》，他把它装在口袋里，俩人常坐在山坡上一起阅读。

他们也读当时的惊险小说，如《桑达的囚犯》和H·莱德·哈格德的传奇小说，并也攀登斯蒂文森和库柏的文坛高阁。在写作《罗拉·德翁》的背景时，他们将德冯郡的场景移植到阿内斯雷附近的山地，此地现已住满了德翁人，他们还给当地巴格沃赛森林的一些林地重新起了名字。在他们交往的初期，吉西和劳伦斯就很快一致认为狄更斯是他们最喜欢的作家——劳伦斯还半开玩笑地将自己等同于大卫·科波菲尔——他们尤其喜欢《寒冷的房子》和《德恩贝与儿子》：“我们阅读这些书籍，但对其内容往往满足于知半

解。”吉西写道，“但那是我们开始进入半拥有一个新世界的开始，是对生活的扩展和开拓。”

当然，对一个未来的小说家来说，对于莎士比亚和英国抒情诗的阅读是极为重要的训练，特别是那个森林绵延的带有传奇色彩的乡村阅读这些作品，这地方是古老的英格兰的农业旧地与新兴英格兰的工业烟雾的交合之处——这位有一个想象力丰富的姑娘为伴的小伙子，将这些景色看作是生活环境的有机构成，将这个乡村作为那些小说的背景，将那里的人们作为书中的各种人物。

在这方面，乔治·艾略特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她曾描写过德比郡·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的部分章节中，夏洛特·勃朗蒂在《简·爱》的背景中也都有这类描写；但她们都不如乔治·艾略特对亚当·比德在威克斯沃斯的描写中那样深入地涉及那些景色和人物。即便她的故事并不是以德比郡为中心的，但乔治·艾略特描写了那些可以在那里找到的人物，劳伦斯特别喜欢她的《弗罗斯的磨坊》。

当进入青年时代以后，他当然知道，要成为一个小说家，文学作品固然重要，但与他来自生活的直接经历相比，前者只是次要的。有关他的个人经历，不管生活还是阅读，我们在这里都作了密切的追溯，对他的乡村及地区的生活也谈了不少。现在是进一步探索这最后两方面的时候了，因为，这时候的劳伦斯已经意识到他的最终目标是写作，他也意识到他创作的题材，至少在开始时，是来源于他的乡村和那个地区。他游历并描写那些遥远的地方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在青年时期他可写的主题就是诺丁汉郡。

幸运的是，这时候的劳伦斯已经和威廉·霍普金十分熟悉，因为，霍普金可以告诉他有关这地区的许多事情。实际上，霍普金的妻子萨莉才是劳伦斯的挚友；在他青年时期，他常与一些中年妇女交往甚密，如与吉西的母亲和赖特小姐，即库伦家的家庭教师；现在又和霍普金太太。他常去霍普金家，他们家在德冯郡车道旁边，这是在诺丁汉公路南面与其平行的一条新街；在《虹》中，劳伦斯就将布兰温一家住在这条街上，《恋爱中的女人》也以此为场景，在这本小说中，伊斯渥被称作贝尔多伏，那条街是索默赛特大道。

在1919年，劳伦斯在剧本《一触即发》中把霍普金写成威列·霍夫顿。这位生动的鼓动者的形象和真人十分相近。与霍普金的长期接触中，劳伦斯对他的思路和说话中的口头禅非常熟悉。（劳伦斯在把一份此剧的复件寄给霍普金时写道，“这就是你，威列！”）在另一本书中，劳伦斯为他以及霍普金太太另外作了两幅肖像。此书就是在上述剧本完稿一年之后所作的未完成的长篇小说《诺恩先生》，在1934年，在作者的遗著集《现代情人》中首次出版。在《诺恩先生》中，霍普金夫妇是路易斯·高达德夫妇俩。高达德太太“是一个40岁左右的妇女，健壮结实，头上是一头缠绕着的棕色粗发。”她的丈夫“颇为英俊，高高的前额，留一撮小胡子；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看上去有点像莎士比亚的塑像，但要更为柔和一些……他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有些像基督，但稍有点儿山羊的形态。他的眼皮像山羊一样会单只地眨动。”劳伦斯又一次出色地抓住了人物特征，用生动的笔调将一个动物和理想主义者的混合体描绘了出来。

霍普金是一个虔诚的苦行僧，在他去世前的长达53年的时间里，他每周为《伊斯渥和金伯利广告人》的“随笔栏”撰稿。他和年轻的劳伦斯常在一起行走。1949年霍普金回忆道，“与他一起漫步是一桩乐事……即使是一个

青年人，他就看上去与众不同。他的描述常常不同凡响而且很有启迪性。”假如劳伦斯能使霍普金加深对他们走过的自然景色的感受的话，霍普金可以使劳伦斯增加对此地区的人文历史作为回报。

霍普金，生于 1862 年，从青年时期起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当他第一次在伊斯渥的市中心做讲演的时候，他曾被敬以烂橘子，但后来，他在伊斯渥市区议会供职达 45 年之久，并成了郡议会的一名执事和一名成员，后来官至高级市政官，到 1951 年（他去世的那一年）第 51 届委员会时，他仍是一名委员。

这个自信傲慢的激进分子，是个地方邮政局长的儿子，曾当过邮局和一个煤矿的职员，后来当过鞋匠，最后是一双靴子店的老板。他给劳伦斯讲述了许多许多的当地传说，不仅仅是矿工们和农夫的故事，而且还有伊斯渥的往事野史，包括 18 世纪时的古董收藏者瑟劳斯比在他的索罗顿的早期的《诺丁汉郡历史》的修改本中记叙的著名的塌方故事：

大约 11 年前，这里（伊斯渥）发生过一件惊人的事件，这是随着一个老矿井的下陷开始的。一位农夫在一家酒吧喝酒，他叫店主给他斟满一杯啤酒；使店主大惊失色的是，当他斟酒回来时，他看到那个农夫朝天躺在地上，两臂伸开着，手里握着他的刀和叉，桌子也翻倒了，人和桌子都陷进地上的一个坑内，他随时可能被这地陷吞没。与此同时，院里一些建筑的梁柱纷纷倒塌，其中还有一些马匹，但幸运的是人畜都无伤亡。

霍普金还知道许多其它的事情，劳伦斯自己也从索罗顿的《古代遗风》（1677 年）中读到不少东西；例如书中对伊斯渥东部地区海格斯农庄下面的那个峡谷的描写。那里，在 12 世纪的费利修道院的遗址上，曾建起过一幢漂亮的，多墙的“现代化”的砖房，这里离劳伦斯的小说《白孔雀》中主要背景的原址费利磨坊仅半英里之遥（即斯德莱利磨坊）。索罗顿在他的《古代遗风》中还收集了下面这段有关都铎时代的记载。

费利的圣玛丽的大小修道院及其院堂和地基，所有的房产和地基，果林，花园，田地和佃户，在上述费利和安纳斯列的地基之内的一切财产……另外还有一个食堂，一个谷仓，一个叫作费利磨坊的水磨坊以及两块草坪等等。在 9 月 1 日（1940 年 9 月 1 日）被购于威廉·鲍勒斯和他的妻子露西。

费利磨坊出现在《白孔雀》的第一页，此书的第一句话说的就是那里的一个磨坊池塘。第三页描写了磨坊旁的农舍，这在《儿子和情人》以及其它故事中也曾出现过。吉西家的农庄海格斯以及下面向费利磨坊延伸出去的农田——葛里斯雷，海格斯——在很久以前的记录中就出现过其中海格斯一词显然是林中的断谷之意。另外，威利·斯匹林农庄旁的那片小树林，和那条威利小径（劳伦斯常常在这条路上推着自行车上坡去海格斯）穿过威利渥农庄，和《白孔雀》中出现的那个废弃了的采石场——所有这些带威利的地名在古时的记录中也能找到。在 1912 年时是海伊阿·德·威利格，中世纪时期，此地名的拼写变化过多次，其原名显然是“Welig, Wilig 和 Leah, Willowclearing 的组合”（见《诺丁汉郡地名》〔1940〕）

这个威利·黑伊地区是先前提到的那所修道院、鲍凡尔的所在地，此修道院是郡内最迟建造的一所。16 世纪时的一篇对它的介绍十分重要。从全国来看，它为鲍凡尔修道院在大多数的大小英国史书中争得了一席之地。这所小型的卡特尔会修道院是不列颠的英雄殉难形象之一，因为在 1535 年此修道院的院长以及前任院长都因抵抗亨利八世捣毁修道院的行动而被处死。

那时的院长名字也叫劳伦斯，但他与 D、H、劳伦斯之间没有什么可查证的联系。很有可能 D·H·劳伦斯在青年时期就知道以前有这样一个和他同姓的伊斯渥人以执拗和独立的思想而闻名。他也有可能是从一部由一位地方牧师所著，1901 年在诺丁汉出版的地方史中读到这故事的。《斯诺丁希尔的葛里斯雷亚》这部被称为“来源可靠的先古时期有插图的史书”中提到了那次殉难事件和约翰·赫夫顿而不是罗伯特·劳伦斯的名字。

我们可以认为 D·H·劳伦斯读过这部由“葛里斯雷亚的主教鲁道夫·冯·休伯”写的书，因为他在《虹》中挪揄过此书。将书作者描写成一个小角色。在小说中他称这部书为《布里斯威尔教区历史》，“由布里斯威尔的主教鲁道夫·斯克里本斯基男爵所著，”劳伦斯将它描写为“一部希奇古怪的书，松散零乱，充满了一种对古尸发掘的好奇心。”这是对这部史书的一段简短扼要，恰到好处的评论，这是一本主教为他的主要教民，包括兰姆庄园的巴勃家族在内的人写的一部历史、轶事和奉承拍马之作。不过，今天对于劳伦斯以及劳伦斯乡村的研究，此书还是有用的。书中有关整个地区的故事，以及那些在劳伦斯的小说中充当各种角色的人们，使这本《斯诺丁希尔的葛里斯雷亚》——尤其是因为其原版很少——成为一本藏书者所感兴趣的书籍。

劳伦斯显然不喜欢冯·休伯，他除了在《虹》中取笑他之外，还在剧本《走马灯》中将他漫画成葛朗斯顿的主教，鲁道夫·冯·鲁奇男爵，在此剧中，他用了比小说更多的笔墨去描写这位冯·休伯。劳伦斯把《走马灯》写成了一部生动活泼的民俗小喜剧，但并不十分成功；男爵和他的妻子扮演的是情人小巷里的招人讨厌的角色，他们常在晚上走出去用甘蔗和雨伞重重地捶捣灌木丛，使谈情说爱的恋人们大刹风景。

真正的冯·休伯自称是一个波兰爱国主义者，由于参加革命活动而被迫背井离乡。劳伦斯一直怀疑他的故事和他所说的“我在我的国家是一个男爵？”霍普金记得，冯·休伯“是一个古怪的家伙，他从不肯在下午四点以后为人下葬。”有一次因为路滑，一个死者的尸体送到时已经晚了——四点半左右——冯·休伯拒绝主持葬礼，非要等到第二天才肯举行仪式。那些抬送棺材的人便将它从车上搬下来放在他的家门口，大声说：“那么我们就把这老家伙放在这里直到明天早上”——听到这话，男爵立即走了出去去主持葬礼了。

霍普金还记得一个有关冯·休伯的众所周知的故事，他声称这是一件真事。这位主教在一个有雾的晚上在兰姆庄园的巴勃家吃过晚饭以后，便想穿过田野回葛里斯雷。他在大雾中迷了路，走进了莫尔格林水库里，水浸过了他的双膝。他便大叫起来，“迷路了！迷路了！”两个过路的矿工听到了他的喊声说道：“哦，我们要到星期天才需要他呢，”然后便继续赶路。在兰姆庄园的人后来听到了他的呼救，便来救出了冯·休伯，并用一辆马车将他送回家去。

劳伦斯生活这样的民俗轶事和人物中间，耳濡目染，无意识地吸收了许多在将来十分有用的素材。甚至当地的地名对他也变得十分重要，他采用了不少地名用到他的诺丁汉郡小说和故事中，如我们所见，在一些以其它地方为背景的小说中也有出现。

劳伦斯对于伊斯渥地区的熟知，不仅仅局限于过去的知识和对矿工们生活的深刻了解；他也熟知城里的商人。吉西·钱伯斯回忆说，在他青年时期，他甚至在伊斯渥打过工，曾为一个猪肉商做过帐房。此人是查尔斯·巴克，

他的店就开在诺丁汉大路上。

所有这些具体，琐碎的事实都为劳伦斯的成功起了辅助的作用。一个不同的背景和其中的不同事物，很可能改变他的写作，至少是在表面上，或甚至可能使他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和完全不同的作家。这些当然纯属猜想：也许伊斯渥是他的视野达到这样的成熟的最严格的锻炼。

吉西记得他来告诉她他想干什么的那个晚上：“那将是诗。”当他说一个矿工的儿子想要写诗，人们一定会觉得他十分可笑，吉西鼓励他说，“你父亲的职业又有什么关系？”另一次，劳伦斯对她说再也不会会有一个新的莎士比亚了；他是一个完整时代的产物：“现在一切都土崩瓦解了。”劳伦斯独立地形成了这样一个观念，后来，T·S·艾略特称之为“情感的分离”。另外有一次，劳伦斯对吉西表示他很赞赏她的鼓励；他认真地对她说，“每一个伟人——我是说每一个有所成就的人——都受到某一个女子的青睐。为什么你就不能是那个青睐于我的女子呢？”

数年以后，劳伦斯说他还记得“那个稍有些自我感觉的下午，那时我19岁，我“创作”了我最早的两首诗。”一首题为《雪球花》，还有一首叫《石竹草》，大多数妇女们也许能写得更好：至少我希望如此。但我认为诗的感情流露还是很好的，米丽安也这样认为。“米丽安——吉西，鼓励了我心中的那个野心勃勃的恶魔。但可叹的是，她所爱的是它而不是我。所以对她来说这也是一场灾难。我的那个恶魔不是轻易可爱的：而那个平凡的我则不同。所以，可怜的米丽安感到十分失望。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也让我的那个恶魔感到丧气，直到它发出哀嚎。”劳伦斯也开始创作散文。在他伊斯渥任教的最后一年的春天。他开始写一部小说，并且建议吉西也试写一部；他们可以交流经验。”一般的思路，”他对她说，“是选两对情人，然后去发展他们的关系。乔治·艾略特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这样的思路。不管怎样，我不想作出一个情节的构思，那样我就会厌烦的，我开始就写两对情人。”

在1906年的圣灵降临节，他将第一页给吉西看。她很感兴趣地发现。它的背景是费利磨坊。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给她越来越多的稿页——悄悄地——她看到了他是如何将生活中的事件编入故事中去的。吉西的母亲曾给他看过她在树林里发现的一把旧水壶，一只知更鸟在里面做了个窝，不久，吉西在他的手稿里发现了这一描写。

劳伦斯曾告诉她，他担心他的故事可能会变成一片马赛克。他一天的时间被分割开来——早上当他想要写作时，他必须将去阿尔伯特街上的不列颠学校教书。“当你结束了一天的教学时，你的灵感也无影无踪了。当我重新开始写作时，我已成了另一个。我看不出这作品有什么连贯性。它肯定会成为一片马赛克，一片情绪的马赛克。”

他花了4年时间去写那本书。

1905-1906 学年，正是劳伦斯攒钱上大学的一年，对他的家庭来说，是经济上困苦的一年。客厅里的大沙发需要装修紧皮了，但因为劳伦斯太太觉得她没钱送它出去修，她的儿子伯特和乔治·内维尔就接受了修理任务。乔治·内维尔回忆说，这期间有一个星期五当她看到丈夫只拿了14先令5个半便士的周薪，便抽泣起来。他工作很卖力，但矿上的“情形不佳”。伯特·劳伦斯有一套新的法兰绒外套，他第一次穿的时候他父亲说，“付钱了吗？”——伯特便愤然走出门去。

除了写小说之外，劳伦斯同时也继续写诗。他最早的两首——《雪球花》

和《石竹草》——都是有关植物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他熟知各种花草，并热衷于对它们的研究和教学。

在他后来发表的诗中，《未耕种的公共地》一首可能是最早的；此诗的开始几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与植物有关——“荆豆丛上活泼的火花在窜动 / 阳光织成的小煤团模拟着火焰”——但不落旧套；它们已经显示出了那种劳伦斯后来称之为“敏锐”的特点，这种特点使他能够在描写自然景色时一笔传神。这些早期的诗作在形式、内容和用词上常常比较粗糙，其中有许多几乎是在挣脱这些不足的影响，成为一种大胆的，新型的表现方法；然而，这些诗尽管有这些不足，但其中大多数都有像《未耕种的公共地》前二句的那种灵巧。这里有一个画家的目光，也有一个诗人的目光，不但捕捉到了形象，而且也捕捉到了其动态；劳伦斯的作品总是具有这种充满活力的神采。

他的诗先于他的文；尽管他的创作开始于早期拉斐尔时期不久以后，又受哈代和弗雷恩的影响，后来又受到惠特曼的强烈冲击。但是，从一开始，他的创作就具有明显的劳伦斯式的格调；这是一种独特的声音。在几年之中，一些重要的文学刊物上刊登了劳伦斯的一些有关伊斯渥的诗作，艾兹拉·庞德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些诗的现代性；他在给《诗》杂志的编辑哈略特·蒙罗的信中谈到劳伦斯，“我认为他在我之先学会了对现代题材的恰当的处理方法。”

吉西是他的亲密伙伴，也常常是他那些早期诗作的主题，她在1906年夏天，陪伴劳伦斯和他的母亲去林肯郡沿海的梅宝索珀海滨度假。在那里的一个下午，劳伦斯与吉西进行了一次严酷的交谈，数年之后，连同在前一个复活节的那次讨论，她为他记叙下了这两次谈话的内容，作为她对《儿子和情人》一书的建议。在此书的“击败米丽安”一章里，这段情节在作了一些描述性和戏剧性的修改后出现在书中，在这一片段中，保尔对米丽安说他们应尽量少见面，因为既无婚约，而且从任何意义上讲也没有真正地恋爱。

吉西在她的回忆录中说，这时她意识到“生活完全被改变了。”使她最为伤心的是劳伦斯所说的他永远不会像一个丈夫爱他的妻子那样去爱她。那种相互同情的关系不能像以前那样在他们之间存在了。劳伦斯在5年之后的一封信中说，他们那次复活节时的痛苦的谈话是“对子宫中胎儿的残杀。”

那年春天，另一对当地的情人给小道消息增加了一条趣闻，一位姑娘“有麻烦了”。那男孩是劳伦斯的好朋友乔治·内维尔。吉西记得那天晚上埃达·劳伦斯匆匆地来到农庄来告诉他们这条“丢人显眼”的消息。第二天晚上，劳伦斯神情严肃地与吉西谈论此事。他的母亲以维多利亚式的方法利用这个机会指出“仅仅5分钟的忘乎所以”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劳伦斯在与吉西的谈话中说，谢天谢地，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干过“那个”。

许多年以后，劳伦斯在1912年写给爱德华·加内特的一封信中谈起过这件事情，但这时听起来他对那事情远没那样认真了。确实，在同一年，他将那事件中的一些人物和情节写进了民俗喜剧《已婚的男子》；后来又在他的中篇小说《诺恩先生》中用到它们。在他给加内特的信中，劳伦斯回顾道：“那姑娘才19岁，他仅20岁。她的父亲，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将她赶出了家门。”内维尔拒绝承认那个孩子是他的，“但不管怎样，他必须得付钱。”后来，当这个姑娘要嫁给一个矿工时，她来到内维尔的家里，坚持要他的父母认领他们的孙女：“谁她是她的父亲？”她把小孩递上前去问道。那位老太

太骄傲地喊道：“哦，上帝保佑她，就是像他嘛，”她的丈夫说：“好吧，莉齐，假如我们的乔治亨利说这不是他的，那么他就是在说谎。这小家伙和他长得一模一样。”劳伦斯说虽然这故事的结尾是“皆大欢喜”，但“开始是可怕的。”

尽管他在几年以后能够以一种取乐的态度去看他朋友的麻烦，并把它们写入小喜剧，劳伦斯在年轻的时候就觉得性问题并不那么有趣。在和吉西谈论过他的意图之后，他更觉性问题是一个包袱。每次当他对吉西稍示热情，好像觉得她有魅力时，他的母亲就会设法使他冷静下来。1906年在梅宝索珀的假日里，一个大风的早晨，劳伦斯看到吉西用了一根宽丝带扎住她的帽子，他的眼中便流露出了—种光彩，她问那丝带是否合适，劳伦斯便转问他的母亲，她“妒嫉地瞪了吉西—眼便转身走开了，劳伦斯脸上的光彩也随之消失。”

那天晚上他们在海边散步等待月亮升起，劳伦斯突然对吉西大发雷霆，语无伦次地叱责她。吉西说，“看上去他的心理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可能身体也是这样。”当她对他所说他所责怪她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她的过错时，他便开始责备自己。“当我每年和劳伦斯家人以及他们的朋友—起度假的时候，这样的情形又以更激烈的形式相继发生过二次”——1907年在约克郡的罗宾汉湾，和1908年在约克郡的费兰保罗。

不管怎样，从其它各方面讲，假日还是愉快的。吉西还记得在梅宝索琅走过那片野草丛生的沙地时的欢乐情景。—次，劳伦斯的父亲与他们—同前往——他在苏珊娜·斯通的茅草小屋喝了点啤酒，年轻人喝了姜啤酒——他们看到—架在工作的风车，巨大的叶片在转动着，劳伦斯和吉西便想到了《寺院和家庭》中的杰拉德。他们“发现—条小溪中长满了水田芥，劳伦斯便和他的父亲高兴地采集了许多，带回家去做茶喝。用词语很能表达劳伦斯在做这些小事情中的兴高采烈之情。”

劳伦斯和他的母亲在梅宝索珀逗留了两个星期，但吉西只能呆—周。她与劳伦斯的父亲—同先回伊斯渥，在火车上，父亲的“目光朦胧地看着”移动着的景色，他“显得几乎有些老态龙钟了。”旅程结束时，他“客气地”帮她拎行李。她不知道他是否看到——当她回顾起—星期她第—次在海边的假期中的痛苦和欢乐时——她抑制不住流下了眼泪。

（七）人文主义倾向

在 1906 年 9 月，即他进入 21 岁的那个月，劳伦斯进入了诺丁汉大学专科学校。

这所学校并不是现在位于大学公园里的那个学府，这所在城外西南部的学院最早的建筑始成于 1928 年（劳伦斯在一首小诗里提起过此事），此学院是由劳伦斯祖父的老对头杰西·布特爵士，即后来的特伦特勋爵赞助建造。而那所劳伦斯时期的老学院，位于现在已不复存在的维多利亚车站附近的莎士比亚街上，这是一座建于 1881 年的仿哥德式建筑，后来成了大学的专科学校和诺丁汉的免费图书馆。在《虹》中，劳伦斯以他年轻时的所见对它进行了描绘：“这所庞大的学院是一座石结构建筑，峙立在幽静的大街旁，在一圈芳草和菩得树的环绕下显得那么幽雅宁静，”在他的主人公厄索拉看来“是一片遥远神奇的土地，”在他看来一定也是这样。其建筑式样是平庸傻气的，“是对另一个世纪的毫无灵感的模仿，”但与其它所有建筑相比它仍有奇异之处...虽然没有什么特色，但它能引起一种对于修道院式的教育起源的奇妙的怀旧之感。”

像厄索拉一样，劳伦斯很快就对学院感到失望。不过，他们的学业在一个方面有重要的不同之处，劳伦斯是为获得教师执照而学，而厄索拉是攻读学位。黑德烈·匹克鲍恩，大学的注册员，在 1949 年 8 月 18 日的一封信中解释了两者的异处：

录取在师资训练系的学生在那时分成两个部份一部分是主修一个二年课程准备参加教育部教师资格考试，另一部分是主修准备参加伦敦大学的艺术和纯科学学位考试的课程。前者是主修教师资格的一些一般课目；后者则根据伦敦大学的学位要求选择课目。主修教师资格的还允许选一、二门其它课目，劳伦斯属于前一部份，好像选了法语和植物学为选修课目。他不是攻读学位的。

他在第一学期的意图就是这样。吉西回忆说，他为放弃了学位课程而感到高兴；他可以主修一些普通的必修课，这样便有时间用到他的写作上。他继续在写《白孔雀》，这时，他想叫这部小说为《地狱边缘》。

吉西、钱伯斯记得在这部小说的第一稿中，其主人公乔治是一个清高的农夫，他娶了一个社会地位高于他的叫列蒂的女人为妻；她经历了一个还原的过程，让一个社会地位更高的年轻人去引诱她。吉西觉得这故事过于伤感了，尽管她觉得小说的气氛是“生动的”。劳伦斯太太对这阶段手稿的评论是以“一种痛苦的声音”对吉西说的，那是在 1907 年夏天在鲁滨汉湾度假的时候；“想不到我的儿子竟写出了这样的故事。”列蒂受引诱的故事使她不安。劳伦斯与书检系统的麻烦从此已开始酝酿。

在他的以后几年的小说写作中，他将故事写成了他自己家庭和环境的理想世界。伊斯渥周围的乡村田野提供了自然背景，但没有煤矿；煤矿只是偶而遥远的地方出现。家庭中的父亲没有骚扰他的妻子和他的伯特式的儿子和埃达式的女儿；他只是忧伤沉默，偶而露面的失业者；他在故事的早期就匆匆死去了。母亲叫比尔德强太太只表现了劳伦斯太太可爱的一面。

但是，当劳伦斯将他的家庭置于一种愉悦的气氛之中时，他没有完全避开他所看到的生活中严酷的一面。对乔治·萨克斯描绘——像《儿子和情人》中对埃德加的描绘一样——是生动逼真的。在对乔治的逐渐堕落的刻划中，

劳伦斯表现了一种成熟的技巧。《白孔雀》的大部分篇幅都有这样一种风格，而后来劳伦斯对这种风格感到不满；但是，那个常驻在他心中的说实在话的劳伦斯要求他写入那个具有包含性的猎场看守人阿纳贝尔。此人，特别是他同故事中那些年轻情人的关系，可能是受查尔斯·金斯利的《骚动》(Yeast)中的那所能说会道的猎物看守人特里加瓦的影响而写成的；在劳伦斯自己的作品中，阿纳贝尔是他最后一部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猎场看守人梅勒斯的祖先，在梅勒斯的后面可能蕴藏着劳伦斯多年来形成的人生哲学，但那个言词尖刻的阿纳贝尔很大程度上是他的前型。

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那个主要的女性人物列蒂大大地超越了埃达的性格特征，她在生活中是一个执着踏实、安分守己的人。而列蒂却是风流放荡，甚至是毁灭性的祸根，是一只追求虚荣名利的白孔雀。她所嫁的男人不是早期手稿中的乔治，而是莱斯里·泰匹斯特，他带她去了哈伊庄园生活，此庄园当然是根据莱姆庄园所写的。莱斯里是劳伦斯的第一个年轻乡绅形象；对此人的描绘比较肤浅，不如他后来所描述的那些人那样高度地独立。乔治的姐姐艾米丽作为《儿子和情人》中米莉姬姆的前型是苍白无力的。

上述这些是此故事的基本要素，而这本小说主要的魅力来自于对伊斯渥地区的自然景色的描绘，在这样的描写中，劳伦斯倾注了一种像早晨阳光一样的美质。此书的行文比较平淡很少有他后来作品中的那些“特别效果”即那种基本的劳伦斯韵律，那种洋洋洒洒但又确切“逼真”的形象，综而言之，那种能体现劳伦斯成熟的文体特征的咒语的要素。

当他在写作这本后来被第一个出版商看后就接受的小说的同时，他也要做学院里的课堂作业。他被一个女教师搅得不得安宁，她是教英语的；她经常在他的作文上划满红道道后退给他。另一个男教师也使他恼怒，因为他在他的一篇作文中用了“stallion”(公马)一词而作了评改。“我的孩子，那是一个我们不用的词，”他告诉劳伦斯这位后来的《圣莫尔》这篇赞颂公马的名篇的作者。校刊拒登劳伦斯投稿的一首诗也使他十分生气。后来他在《阿姆勒斯》上发表了这首题为《研究》的诗，并在1928年的《诗集》中收入了此诗，仅作了很小的改动。

在诺丁汉，师资系的主任，阿莫斯·享德森在他妻子的协助下主管在爱帕雷大楼的学生宿舍。他的专业是数学，他的爱好是音乐，他在音乐方面帮助劳伦斯提高了兴趣。劳伦斯觉得他拘矜而不善务实，但脾气和善，他喜欢并敬慕学院的院长约翰E·西姆斯牧师。他在剑桥获得硕士学位，10年以后来到此学院任教，那时他31岁。他以他对宗教及社会问题的“进步”观点而闻名。虽然他的专业是文学，但这位西姆斯校长写了一部题为《政治经济学》的诗，在此书之前，他还写过一本《英国历史指南》以及各种其他学科的书。他在1911年因管理不力而辞职，虽然他长期以来在诺丁汉讲授单税倡导者亨利·乔治的主张以及邀请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来讲学而受到非难。

对于西姆斯手下大部份教职人员，劳伦斯取的是一种冷嘲热讽的态度，后来他在《虹》中叙述了这一点。他很讨厌一位植物教师史密斯的敏锐的观察力，说他的研究沉湎于一些观点而不是掌握这些观点。但是在1909年劳伦斯写给他的一封信中(此信未发表)说“我有欠于你。你是我第一个人生哲学的终身教师；你指引我从迷惑生硬的一元论和过时的实用主义中解脱出来，进入一种虽也生硬但能让人感到安慰的多元论。”

劳伦斯敬慕的一位教师是现代语言系的主任欧内斯特·韦克利教授。他

自己显然是一个绅士，当韦克利称那些乡下学生为“先生们”时，劳伦斯常觉得有些滑稽。不过，劳伦斯没有和这位比自己年长 20 岁的韦克利教授深交，在这个时期他也没被这位教授请到家中喝茶。

在劳伦斯的大学期间，他和吉西继续在一起阅读。他们开始看一些简易的法语短篇故事，然后阅读了皮埃尔·海迪，奥诺·德·巴尔扎克和嘎斯坦夫·福楼拜的作品。劳伦斯非常喜欢巴尔扎克《忧伤之歌》，并将故事描述给钱伯斯家的人听；吉西觉得这故事中的象征意味在压迫他，他曾带给她一部戈伊·德·莫泊桑的《故事集》的英译本，但几天以后给她一封自我责备的信：“我对你做的是什​​么？你本来是生机勃勃的，对各种事物都充满了兴趣，不要对我过于认真了。你必须使自己不受莫泊桑或我的伤害。”

劳伦斯从青年时期起好像就对象征主义有相当充分的知识，但是他对此的知识并不是大学时期所获得的，正如欧内斯特·韦克利在给本书的作者信中写道（1952 年 4 月 10 日），他在诺丁汉不是一个攻读学位的学生，他所学到的法语有相当基础的。

有时劳伦斯和吉西一起去汉诺丁的皇家剧院，他们观看了德奥列·卡特剧团上演吉尔伯特和苏列文的剧目，他们听过《坦豪瑟尔》有一次还参加了约翰·高斯华斯的《斗争》一剧的演出。一次劳伦斯一个人去看萨拉·伯恩哈特的《茶花女》这部戏剧使他感到恐惧，他告诉吉西·钱伯斯说，他当时跑出了剧场。他说他害怕有朝一日他会像剧中的阿蒙德一样“被一个女人所奴役”。他在给勃朗什·简宁斯的信中也说伯恩哈特“写的是我们都能体验到的，对一切生物一种疯狂感情的咒语。”她“沉湎于”并表现了一种“女人的原始感情”他很有预见性地补充道，“我自己可能爱上这样一个女人，爱得她人狂。”

他和吉西还继续阅读英国作家梅里迪斯的《山谷中的爱情》，好像对劳伦斯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们在读了马克·鲁瑟福特的《自传》和《克拉拉·哈帕古德》以后，劳伦斯对吉西说，如果她真要从事写作的话，她的作品可能与鲁瑟福特的差不多。也许是想到了《白孔雀》，劳伦斯笑着对吉西说，在《拉凡格鲁》中，乔治·鲍罗曼那样娴熟地将自传和小说调和在一起，使人们无法辨别其虚实。

从大学第二年开始，劳伦斯开始认真地钻研哲学。他经常与吉西和艾伦对此进行讨论。叔本华给他的印象很深，他说服艾伦给吉西买了一本《论文集》作为她 1908 年春天的生日礼物。当劳伦斯给他们朗读《世界意志论》中的“爱的形而上学”一章时，吉西的哥哥不同意叔本华的观点，即“金发碧眼是人种本身的一种变异，几乎是一种异常，和白鼠大同小异，或至少和灰色马差不多。”劳伦斯回答说，他认为只有棕色皮肤才是美的。显然他是指吉西稍带棕黑的皮肤，或可能他想到了露易·伯洛斯的皮肤，当他读到一段大意为每个人希望并渴望得到那些最美的人的论述时，他停来说，他能看到最美的东西，但并不想得到它，吉西觉得他是在为“分离观点”作辩白。

劳伦斯在鲁道夫·德克斯夫人赠送的一本英文的叔本华文集上作了眉批。在书页的空边上，劳伦斯翻译了拉丁语的原引并在叔本华的一些论述旁写上了他自己的评论。在 1936 年 2 月号的《英美周报》上，爱弥尔·德拉芬内对这本册子和上眉批作了评阅。劳伦斯的评注常常是生动有趣的。叔本华写道“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为什么那些非常聪明，不，那些非凡的男人会和那些恶妇和女魔结婚，为什么我们无法理解他们的这种选择。劳伦斯

问：“从不出现相反的情况？”这促使德拉芬内继而问之，“Lawrence pense — t — il à ses parents , la mère cultivée , intelligente , le père frustré et brutal ?”（劳伦斯是否应该问一问他的父母，那个受过教育的多才多艺的母亲和那个无知粗野的父亲？）劳伦斯自己也在边空上用法语向吉西提问，“Qu'en pensez-vous ?（你怎么认为？）——他是指叔本华下述论点：“因为恋爱的核心取决于对孩子的出生的期望，从本质上讲，在两个年轻的，漂亮的异性之间存在一种不搀和性爱的友谊是完全可能的，只要两人的性格和智能相当。实际上，一种两性之间的厌恶也是可能存在的”。

一些段落上劳伦斯只划了线，但没有质疑或评论，如有一段大意是男人的本性是变化无常的，而女人的本性则是要依附于一个男人。劳伦斯在这一段下面划了两道线，表示当“两个恋人在谈论他们的灵魂的和谐时，”他们实际上是在篡改他们各自的灵魂，而他们想像中的和谐在结婚之后不久“常常会变成一种强烈的不和谐。”艾弥尔·德拉芬内在他的文章中说，他《白孔雀》中叔本华影响下的痕迹到处可见。确实，阿内贝尔差不多就是叔本华式的人物。但叔本华的影响也涉及到这第一本小说之外的其他作品之中。尽管劳伦斯从不承认这一点；可能是因为他没有意识到。

在其他一些劳伦斯和吉西在他们年轻时读过的哲学著作中，他们不喜欢伦纳恩的《耶稣的一生》，劳伦斯认为这部作品多少带点自传性质。他曾一度沉迷于赫胥黎和黑格尔，他也饶有兴趣地读过斯宾塞和米尔；他很赞赏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和《各种宗教经验》，劳伦斯这时正经历一个对宗教怀疑时期，他特别是受到了唯物主义和理性主义观念的冲击。

此时期他认为《安娜·卡列尼娜》是最伟大的小说。钱伯斯家的人都认为列文和基蒂出场的那一段是书中最精彩的描写，但劳伦斯却对安娜十分感兴趣。在他生活的后期，他对此小说不屑一顾，并说“老列夫”是在“自作多情。”

吉西在她对劳伦斯青年时期的文学活动的回忆中说他的短篇小说《彩色玻璃碎片》原来的题目是《传说》，这篇故事是在1907年秋季，即他在大学的第二年写的，《诺丁汉郡日报》在圣诞节设立了三个短篇小说奖，每个奖的奖金为三镑，劳伦斯为了这九镑钱，决定三个奖都试一试，《传说》是他参赛项目之一，也是三篇中用他自己名字的一篇，吉西和露伊、伯洛斯答应以她们的名义寄出另外两篇。

三篇中，只有用吉西的名字和地址寄出以“罗莎琳”的笔名的那篇得了奖。这篇故事题为《序曲》，自1907年在《卫报》上刊登以后，一直到了1949年才重印过一次。第三篇故事《白袜子》像《传说》一样，被劳伦斯重新用过，1914年他的第一篇短篇集中，《传说》被扩充后以《彩色玻璃碎片》的标题出现，这篇故事则被改题为《普鲁士军官》。这些作品投到《卫报》以后，《传说》得到的评论是“一篇关于一个逃跑的农奴的故事，生动的写实主义使故事非常出色”；《白袜子》被认为是“结局欠佳”。那篇获奖的作品《序曲》，被认为是“用清晰简洁的笔调处理了一个简单的主题，颇为动人。”此故事的背景是海格斯，这是一篇无多大价值的故事。

劳伦斯继续着他的大学学业，写诗，断断续续地创作小说，这时他越来越对他的学业感到失望。吉西·钱伯斯说他已经开始“处于一种感到期望不能满足的情绪之中，”她说他在诺丁汉的两年“一无所获”。他比他学生大一两岁，他觉得他们都被当作“小学生”来对待。他很羡慕那些工科学生，

他们常常装模作样地说大话，“看不起”他们的教师。他尤其不欢喜教学实习，尽管校方将他派到一所“上等的”学校去。后来他说他在大学专科学校的两年“完全是大失所望，而不是与活人的接触交流。”

不管怎样，这所大学现在为劳伦斯曾经在学而感到骄傲，1960年在维思·德·苏拉·平托教授主持下举办了一次有史以来最大的劳伦斯作品展览。1971年大学还办了一所劳伦斯暑期学校（由凯斯·萨加博士主持），早晚有讲座、讨论会和电影；下午学校还派专车送学员去参加劳伦斯乡村。在1972年，此大学，市立图出馆和其他一些地区学术机构举办了一次对劳伦斯作品的特大规模和完整的展览。1975年，大学生在萨加博士主持下又举办了一次劳伦斯暑期学校。

在1908年6月获得教师证书以后，劳伦斯拒绝考虑任何年薪低于九十镑的职位。吉西回忆说，在1908年夏季没有职业的那段时期里，他“是一个可笑的人”。他常常去海格斯，和往常一样将他的手稿带给吉看，或和艾伦一起去干农活。然后，在10月份，劳伦斯接到了伦敦南部克劳伊敦一所学校的聘书，年薪为95镑。

他在诺丁汉大学专科学校的最后成绩是这样的：“教学B；阅读A；绘画8；音乐”。他的指导教师对他教学实习的评语表明，尽管劳伦斯与那些矿工的孩子打过几年交道——他们当然比诺丁汉的商人和工人的儿子们更加粗野——但他在课堂组织方面比较弱。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劳伦斯，这位矿工的儿子被描述为一个“喜欢挑剔”的年轻人：

博学多识，高尚优雅，如果位置合适，劳伦斯先生将是一个出色的教师。由于缺少小学的经历和他的学习方法，他目前的学习成绩按照一般的标准去看是不平衡的，要他去管来自粗野地区的一大班孩子是很不合适的，他可能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热情，而会感到厌恶。

劳伦斯的主要倾向是爱好文科，孩子们有时对这些课目的兴趣是浓厚的。不管怎样，在所有的课目中，他能在阐述，特别是在提问中将知识灌注于课程之中，缺点是对引导学生理解和必要的复述不够，——与许多有才华的教师一样，劳伦斯先生适于专门给最好的学生上课。尽管他的表达十分流畅，但有时他显然有困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汇。他无疑可做一个高年级教师。

劳伦斯先生的兴趣较为挑剔，他能对他感兴趣的任何事情都干得十分出色，但对一个普通的班级会感到失望和兴趣索然。如果在一所中学或高中的高年吸任课的话，他能干得非常出色，特别是在让自由发挥的时候。

第二部 伦敦岁月

（一）市郊教书匠

吉西·钱伯斯说，当劳伦斯要离开英国中西部的时候，“他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被判了流放的人。”他的母亲急切地问道，他走了之后她将怎么办，如果不是她每天叫他起床并给他端来稀饭，他怎么能到什么地方去，即使要去学院上课也不行呀。

在去伦敦之前，劳伦斯去钱伯斯家辞行，然后吉西将她的朋友送至外门。在那里，他回头看着田野，用法语说“最后一次了”。吉西开始抽泣起来，他将她抱入怀中并吻了她。他们默默地站在变深的10月的暮色之中，吉西觉得一切都毫无希望了，她不想再开始一次与以前一样的争论。

劳伦斯终于走了，并邀请她第二天下午去喝茶。她害怕前往，因为她感到劳伦斯家中有一种敌意，但她还是以带去一小篮苹果为理由去了。她看到在他的林恩·克劳夫特的家中没有欢乐的气氛；劳伦斯显得苍白不安。吉西很快就离开了，既伤心又感到羞辱，她意识到了她的“病根”。

劳伦斯也有他自己的“毛病”，他对他的家庭和母亲的密切的依附。但他第一封有关他对伦敦的印象和有关他新职位的情况的信是写给吉西而不是他母亲的，吉西说“他的信像可怕的嚎叫”。

但是从克劳伊敦的一封写给白朗什·简宁斯的早期的书信中（1908年12月15日）看，他很快就唱起了一首不同的曲子，此信开始是谈论巴尔扎克，其中提到他的《欧也妮·葛朗台》中的一段，劳伦斯在信中说：

至少有关接吻时的“冲动”——是欧也妮一生中的一次危机。一次最有创造性的危机。想一想——如果你吻了一个男子的嘴——那将对你意味着什么。我吻过十几个姑娘——在脸颊上——从未在嘴上。我不能够。这样的一种接触是两个生命之间感情之流的交融。像阳电一样，一样创造性的生命之流贯通了两个人，当他们用嘴接吻是——当他们像情人一样接吻时，就会有一种同样的生命力的本能——一种同样的，我不得而知的活力。我们来想像一下（原文如此），两个人要进入完全相同的感情是不大可能的；但我敢肯定，当他们像情人一样接吻时，他们就能进入这种状态。于是一种生命之流贯通于他们之间，他们将永远地改变了……不管怎样，我认为通过接触物体，我们能进入一种对宇宙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的感知（无意识）。

这个后来自称为爱的信徒的人，这个后来成为《你触摸了我》那篇故事作者的人，这时已经根据有限的经验开始有系统地阐述性爱问题了。有趣的是，我们可以发现年轻的劳伦斯在这里用了“生命力”这个柏格森学派的术语，几年前肖伯纳在《人与超人》中嘲弄尼采的一些哲学观点时也用过这个术语。

劳伦斯在1908年12月开始任教的那所大卫森路学校在很久以前就建立了，被认为是伦敦地区设施最好的学府之一。当劳伦斯的思家怀乡之念淡薄下来之后，他开始使自己适应这个环境，虽然他在那里从未真正感到愉快过。

克罗伊登这时正在变成一个砖房和烟囱林立的综合地区，从维多利亚到伦敦桥站的黄颜色的电动列车在这里的河堤上飞逝而过；渐渐地；这个迁移来的克里斯托宫邻区变成了一个灰蒙蒙的郊区，只有被挖空了的山坡和房屋之间的树木留下几处自然的景色。劳伦斯在克罗伊敦三年里所住过的房子现

在仍在那里：考尔华斯路 16 号，在一条街上的一垛矮砖墙后面的一些形状相同的房屋之中，底层是红砖墙，上面一层是粗糙的水泥地板，三角屋顶用木瓦铺盖，下水管道和电线有时掉出屋外。

劳伦斯开始寄住在考尔华斯路 12 号的琼斯家，就在下艾迪康伯路商业街的上端，靠近宾汉姆路火车站；后来，在 1991 年 9 月，他随琼斯家搬到稍北几间屋子的 16 号。

约翰·W·琼斯，兰卡郡人，是学校的校纪检查官。琼斯夫妇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婴儿。劳伦斯的母亲对吉西、钱伯斯说她听说他们家有一个婴儿很高兴，因为她觉得那样会使她儿子保持“纯洁”。

劳伦斯每天步行四分之三英里到大卫森路，学校就在左手转弯处的勃兰姆顿路的角上。学校在街道的深处，一个宽敞的沥青操场的中央，校舍是红砖墙壁，主楼是三层楼，顶屋上面是斜坡屋顶，开有老虎天窗；在屋顶上有一座高大而尖耸的角塔。

劳伦斯在大卫森学校待了三年多一点，他和学生和教师们相处得很好。他的一位学生，弗兰克·W·特纳（后来成了舰队街的记者），对当时这位年轻的教师劳伦斯作了以下的回忆（在写给本书作者的一封信中）：

在顶屋的一间教室里，一块长长的黑板占据了前半间屋子的墙壁，就是现在我也能描绘出 D·H 站在离黑板几码远的地方，伸长了手臂在黑板上画素描的情景。他对透视的示范解释和将线条画向无限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他也教我们水彩画。

当学校在校餐厅绘制《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时，一个富于幻想的艺术家的气质在他身上充分表现出来。他手执一把刷墙用的刷子，从一个木桶里蘸着颜料，躬身在铺满大厅大半间地板的帆布上画下了东方集市的背景和沙漠上的棕榈树。

劳伦斯在大卫森的最好的朋友，他的同校教师 A·W·麦克列尔德，也提供了一幅当时劳伦斯的生动写照，而且是非常完整的一幅：

很抱歉我无法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帮助你。我不知道阿格尼斯·赫特·简和大卫森夫人是什么人。劳伦斯许多在克罗伊敦的朋友我都从未见过，麦森小姐，我认为，但她只是我在学校里的同事，因为在 D·H·L 离开学校不久，我也离开了那里，与她再无联系。她比其他教师都要大，是一个很有能力，几乎是过于认真的教师。她看到劳伦斯很不强壮，所以常常“像母亲似地”关心他。他们处得十分友好，不久，他就说服她试着写一些短篇故事，作素描和画水彩画。

在我的一本《爱情诗选》上，劳伦斯写道：“当我用他对这几首糟透了诗的赏识来聊以自慰的时候，我就记起在大卫森的那些不愉快的工作日和快乐的游戏时光。

不愉快的工作日，是啊，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他不止一次地说：“我干不下去了。校方以一年 100 镑来榨取我的血汗，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我宁可去一个农庄干活。我知道有一个伊斯渥的农夫明天就可以接受我。不，我宁可当个流浪汉。”教学对他来说总是一种痛苦，他总是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但不管怎样，他在工作中还是得到不少乐趣，特别是在自然课和素描课上，在这些课上他可以尽情发挥和兴致勃勃地作画。他在离校时的遗憾之一就是他的后任可能会改变那种自由的授课方式。因为对“儿童艺术的启发像教育在那时只是刚刚开始。幸运的是，他能在那个那样有眼力，明智和和善的校

长 P·F·T 史密斯先生手下做事，他了解他的才能并给他提供了一个按他自己的爱好自由施展的天地。劳伦斯有时在空余闲暇时临模一些画——那里有斯旺恩的一系列动物研究——他说他欢喜摸透他人的风格。

他阅读他所能得到的任何东西——剧本，诗歌，尤其是小说——从易卜生，弗尔赫里恩和匹柯克到诸如玛丽·曼之类的小作家。奇怪的是他特别喜欢杰西·弗基吉尔的《第一把小提琴》，奎利多的《人的苦役》也给他印象很深。

他和他的同事们相处得很好，因为他总是十分友好，欢快，谈话热情。他们中的一个告诉我劳伦斯是个不可思议的人：有一天他说出了他内心深处的秘密，他说出了有关他自己的但从未承认的一些事情，但天知道，它们都是事实。

他自然在那些快乐的“游戏时光”中得到不少乐趣——从操场上空望去，是宽阔的田野和两旁堆着木料，通向远处诺德山丘的克里斯托宫车站的铁路——朗读他的最新诗作——分析书中的人物。我发现了他在写小说，因为有一次他问我如果我去克罗伊敦的话，帮他多买些布道纸。布道纸对我来说是一个新词，于是我问他是不是在写教义，后来我听说了他的《白孔雀》。有一天我给他带回布道纸的时候，不再是一无所知了，便急切地问他那纸是否合适。

对于在克罗伊登的经历，劳伦斯主要在诗中作了描述，即在题为《教师》的一系列诗中。这些诗中的一部份，从一些杂志上，和他的《爱情诗》（1913 年）以及《阿姆热斯》（1916 年）中的一些诗一起，在作了修改之后，重印于他的《诗集》之中。

劳伦斯去世后不久，学校的一个督学司榜瓦 A·罗伯特森，回忆起（1930 年 3 月 8 日在葛拉斯哥·海拉尔德）在一次文学社的会上，劳伦斯曾称赞过拉歇尔·阿纳德·泰勒的艳诗。罗伯特森说“我有一次对他说由于没有当过童子军他失去了很多，他使劳伦斯笑了起来”。

另一幅描绘劳伦斯在克罗伊登的肖像十分微妙，是由菲利浦 F·T·史密斯在给一封本书作者的信中（1951 年 2 月）提供的。史密斯先生在对 40 年前在克罗伊登当校长的情景作回忆时已经年逾八旬了，他的记忆力仍清晰敏锐，他的信是对年轻的劳伦斯一段精彩的回忆：

教书对劳伦斯来说是他谋生的需要，完全不是一种他所喜爱的职业。当然，他喜欢孩子们，但是孩子们而不是小学生。孩子们也以同样地，有条件地喜欢他。学校生活的例行公事使劳伦斯觉得厌烦。在他的诗《傍晚》中他写道：

“我郁郁地将愤怒带过这些弃原荒野。”

因为明日我又要将他们召回，那些可恨的教课时间。在另一首诗中，他也说到“焦急地等待放学的铃声。”

劳伦斯不能容忍权威，虽然他粗暴地对他的学生实施他自己的规定，但对于任何规定即使稍涉及他的都要激烈地反对。

大卫森学校是新建的，开学于劳伦斯 1910 年来校任教的两年之前（1908 年）。那时，教师都由教学局直接委派，并不征求校长的意见。所以，我对影响他就职前后情况一无所知，也不了解他完整的学历。

学校很大，教室宽敞，明亮而温暖。教职员工都不错，公共休息室也很舒适。学校周围没有特别的景致，校园还包括几块尚未建筑的土地，紧挨着

铁路的路警大院，这种景致特别使劳伦斯感到讨厌。他写道：

我择路走过斑驳的草坪，青草已被践踏，
陷入泥泞——空间在建筑者的手中急剧收缩。

我提及这些事实是因为劳伦斯的辩护者们将他后来的不稳定归咎于他在学校教书期间所受的压抑。

劳伦斯对一个与教学有关的职业问题有过抱怨。他对大班级教学的指责是恨之入骨的。他说“我可以给一百人上课；但我怀疑我是否自愿去教十来个人。”

当劳伦斯来学校报到时，我记得他个子很高，虽然骨架很大但非常瘦。他长着一头黑发，淡赤黄色的络腮胡须，一双生动的兰眼睛。后来我注意到他的手与他的外貌有着明显的差异，它们纤弱，手指细长，很有表现力和控制力。劳伦斯不是一个体格强健的人。他对穿着不加修饰。他的表情中常有一种自信的欢乐，很少有神情严肃的时候。他看上去对新的环境并无不安，也不怀疑自己胜任新职的能力。当时的情形不容许他慢慢熟悉工作，一大班的学生，60 个人的一个班正等待着他，他马上就开始了上课。

此期间大卫森学校的师资是由与劳伦斯年纪相仿的年轻人组成，还有一位妇女，叫阿格尼斯·爱森小姐，比他们要年长许多，所以他没有受到那种通常由老教师充作学校师资的做法的影响，他可以随意地自行其事。

他的素有名气的精力专注和刻苦勤勉很快就表现出来了。他对那些给教师的日常公务增加负担的繁琐的细节从不逃避，他对艺术、植物学和英语很有兴趣。我将他一年的植物学授课笔记保存过好几年。他对水彩画的教学和实验练习都堪称是正确和明了的典范。他刻薄的幽默常常会使人对他最赋有才华的言辞的价值怀疑。”现在让他们去玩吧”，他会说，“这个世界会教会他们怎样去工作的。”一个叫凯斯的学生，其英语从任何角度上讲都是“糟糕”的，劳伦斯便叫他“从字母 A 开始写起”。这对那个学生来讲好像是全无恶意的。〔A 是 ASS（蠢驴）之意〕

劳伦斯最怕在他上课时被打扰，那怕是一点点也不行。有一次我随行政检查官走进了他的教室。我们的进入是他未预料到的，也使他恼怒。一个奇怪的悲切的声音从远处的一个墙角传来。此声音被一块档着的大黑板蒙住了。一首熟悉的歌词从深远处发出：

你的父亲躺在五 深处；
珊瑚组成了他的尸骨。

学生们是在朗读《暴风雨》。这种课堂的活动体现了劳伦斯在授课中进行练习的严谨态度。他不愿被人搅乱了，即使是上司的莅临评论也不例外。劳伦斯伸出双手跑到惊异的来访者面前：“嘘！嘘！你听见没有？这是《暴风雨》中的大海合唱。”那些日子还盛行传统的教学方法，劳伦斯所进行的戏剧性表现自然不能得到一致的赞赏。

同一位先生在几个月后问道，“你的那位写书的家伙在哪里？”我把劳伦斯的教室指给他看。“我不到他的教室去，”他说。“我不想成为他书中的什么角色被人嘲笑。”

劳伦斯对于教授艺术课的主张也至少是值得置疑的。一次当我和另一位教育局的检查官谈话的时候，一个孩子拿着一幅刚画好的腊笔画走进来要我评阅。我瞥了一眼以后，试图将这孩子打发走，但已经晚了，那位官员的目光在我作此企图之前就看到了那画。“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理由要把这画送

来吗？”我问。“劳伦斯先生认为它相当不错，”那小孩道。这位艺术家把他的杰作留给了我们后便回教室去了。

“你是艺术家吗？”那位谨慎的官员问。“不是”我回答。“我也不是，”他说道。“我们对此人多加小心。课后，收集几张这样的绘画，别让他知道。我要把它们送到肯星顿的艺术部去听听专家的意见。”后来，这些画由那位检查官亲自带回来。“幸好我们这样做了，”他说道。“艺术部对它们评价很高。我想，将有一大批学生画出这些使你头痛的画来。”

在那个时期，有一些专门为吸引孩子们的期刊较为流行。劳伦斯便出了主意，让他的一些学生向那些刊物投些小文章。他对这些文章作了充实和编辑。其中有不少被接受了，使这些作者们喜出望外的是，他们实实在在地收到了从邮局寄来的一笔笔小报酬。从那时候起，原先不受人欢迎的《作文练习》的价值使学生们都另眼相看。对许多人们最不愿干的公差事务，劳伦斯很乐于承担。其中包括他对学校图书馆有关事务经常的关心和注意。他常常说，“只要他们肯读，就让他们去读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好了。他们很快就会抛弃那些糟粕的。”

后来，一些孩子在伦敦晚报上发现了他早期“校园诗”中的一首，他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将他们对某些诗句的不同看法用诗的形式写在上面，然后放到他的讲台上，可让他在早上上课时看到。但是所产生的反应多少使他们有点失望。劳伦斯并不表示不满和辩护，而是感到很高兴，甚至说那些诗句经修改大有提高。

劳伦斯对来自英国演员之家的那些孩子十分感兴趣。这些学生中有些人的姓名中带有的一些闻名于昔日英国舞台的名字。一次学校排演戏剧，劳伦斯绘制了所有的布置，修改增删了剧本，在第一次排练后他说，“这些小演员们对这些东西比我们知道得多。我们无法从头教他们表演，让他们按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去演这出戏吧。”我们都表示同意，结果很好。

劳伦斯为上课选用的那些诗按那时讲法是不正规的。他从不选“《我们是七个》等等”之类的俗套。他也不能容忍任何被他称作是“道德欺骗的哼哼声。”我发现在他的教案中选入了这类作品，如《亚述人走下来》（拜伦），《桑顿的钟声》（马赫尼），《去给我拿一品脱酒来》（彭斯），他认为给年轻人讲授诗的最好办法是通过韵律和词语的格调而不是去寻求什么非真实的和抽象的寓意。

后来，劳伦斯毫不隐讳地表示他不想以教书为终身职业。他的健康开始变糟，他变得不时地焦虑不安，用这里兰克郡的话说，就是“萎靡不振”。有一次他说要像那个敢于蔑视小权威而中途辞职的德国作曲家一样终止他的职业。不幸的是，由于他的健康不佳，劳伦斯迟迟未能作出决定。

离开家庭之后，劳伦斯发现要靠他一个小教员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是很困难的，他常常是阮囊羞涩，他从不抱怨，但我知道他常常运气不佳。有时，他对创作教师的前途满不在乎，他要和那些职位舒适的当职员朋友比个高低。

当时在市里有个英语演讲协会，是由一些知识界的人士赞助的，其中包括教育当局的一些成员，大部分是夫人太太们。当时协会的主席是一个资历很深的学究，他是劳伦斯创作计划的最有影响的，最为同情的支持者。他建议说，由他介绍，让劳伦斯参加协会的会议并进行一次阅读讨论也许对他有益。劳伦斯同意了，而且好像是选读了一段中世纪的罗曼史，作品中有一些

令人尴尬的场面和色情的对话。我当时不在场，对此事件不得而知；但第二天，我受到了那位被冒犯了的官员的查询。问我是否知道劳伦斯要在会上朗读作品？如果知道，我是否知道他所选的题材？我的同事中是否有人左右过他的选择？我拒绝进行查询。这不管我们学校的事；但劳伦斯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朋友。我后来未曾听到劳伦斯再提起此事，但我可以想像得出他肯定为自己的所为而暗自得意，因为他的表演引起了那些知识界的上层人物的无法表达的兴趣。

考虑到劳伦斯的熟人圈子有限，会感到孤独无伴，了许需要调节一下自己，我便提议让他常来我家坐坐。这时候，我除了知道他写过几首诗，其他概不了解。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以后，大约在 1910 年 12 月，他出乎意料地接受了我的邀请，开始到我家来作客，而且比较经常，一般是在星期天的晚上。我家中十分清静，就我妻子和我，我妻子和劳伦斯一样，对法国文学比较感兴趣，他们一起朗读法语诗，或我们一起唱法语歌曲。劳伦斯将一些法文诗译为英文，他也试着用法语写了一些。很可惜，这些原稿都不复存在了。他谈了他的家庭和早年经历，这些事情和以后出现在他的传记和小说中的故事差不多。他尤其欢喜和追忆那些被他的感情上征服过的女性朋友，以及他对女性缺点的评论和观点，有些观点引起了妻子强烈的异议。有时他删去了总有那位夫人的哭声的卿卿我我的一成不变的场面，那就会引起他的感情迸发：“亲爱的，你是多么会自得其乐呀。”他经常说——或引用说——“如果一个女人不能爱的话，她会体贴关心人吗？”有时他谈起在寄宿处的生活，描写他如何给房东家的小孩子洗澡，并在作了祈祷之后哄他们上床睡觉，这样可让他们的父母去看场电影。劳伦斯从不和我谈起他的文学创作和学校的事，也不谈论我所熟悉的人。

我对劳伦斯的生活知道得很少。他寄宿在一位行政部门官员的家里，就是琼斯夫妇家。他经常感激地说起他们对他的帮助，特别是当他生病的时候。

他到校就职不久，就暴露了他体弱多病的体质。我是由爱森小姐提醒后才注意到这一点的，她很早就对劳伦斯的身体投以关注。爱森小姐在家中要照看一位残疾的父亲。劳伦斯很快就成了她家之客，他在个人事务方面很信赖她的指导。在爱森小姐家，劳伦斯认识了她的挚友海伦·考克小姐。考克小姐与劳伦斯年龄相仿，她是我在前大卫森学校时的一位教员。她是一位很有鉴赏能力，非常迷人的才女，劳伦斯开始很快听取她对《白孔雀》和《侵入者》两本书的褒贬和评判。

劳伦斯开始喜欢菲利浦·史密斯，几年来他一直对他十分友善，但在他刚到大卫森学校的时候，他对他的评价不是很高，在 10 月 13 日在给露伊斯·伯罗斯的信中，他曾这么说：

但是这个校长是个窝囊废——他总是把责任从自己身上卸得干干净净——他从不责罚任何人；就拿你来说，如果你真要责罚什么人的时候，你必须让人去拿来责杖并将责罚的细节记入责罚手册。纪律非常松懈，教学十分够呛；当然情况并不如此糟糕——我们很快就会习惯的。不管怎样，一个人总不至于死于工作。我有一个四年级班——45 个孩子——看起来忙得不亦乐乎——实际上干不了什么事。

他补充道，“我在迅速地消除我的寂寞和惆怅；很快我会安定下来，会在这里过得很愉快的。”直到冬天他才认识了前面菲利浦·史密斯提到的海伦·考克。

关于劳伦斯和海伦·考克的故事有关人员都写了情况。海伦·考克在她的下列作品中都谈到她和劳伦斯之间的关系，如对话录《劳伦斯和启示录》（1993年），她的长篇小说《中间地带》（1933年），她的有关吉西·钱伯斯的回忆录《D.H.劳伦斯的“公主”》（1951年），一些诗如《秋天的歌》（1960年），在《D.H.劳伦斯：克罗伊敦的岁月》（1965年）和她在1976年写的自传中。劳伦斯则在《侵入者》和一些短篇小说以及他的《海伦》诗中描写他们的关系。

海伦·考克是在伦敦郊区的苏萨克斯沿海一带长大的；她的父亲是一个商店的营业员，她在克罗伊敦的小学教师中心受过师资训练，那里她的一个校友叫A.W.麦克列奥德是后来劳伦斯在大卫森学校的朋友；她在克罗伊敦南部靠近布赖顿路的鹿地小学任教。

她在1908年至1909年的冬天，第一次到大卫森时遇见了劳伦斯，他们的相识是十分温文尔雅的。到1909年秋天，他们的关系开始深了起来。当时劳伦斯从中西部的瓦特岛渡假回来，发现她由于个人的不幸而处于一种崩溃的状态，就在他帮助她振作起来的时候，他们成了好朋友。

埃利斯·布鲁克这个海伦·考克的《中间地带》中的女主人公，也受过相似的打击。她与一位已婚的男子，她的小提琴老师之间发生了感情纠葛——劳伦斯在1912年的《侵入者》中用到了这一情节。在这两部小说中，都是那个男子说服了那个姑娘一同外出渡假，在假期中两人都感到十分痛苦。他们回到伦敦以后，那男子回到家中便自杀了。

在《中间地带》中，一位叫德列克·汉弥尔顿的年轻教师在埃利斯的音乐教师安格斯·雷恩（或叫多梅尼）的死去使她“痛不欲生”之际帮助了他。德列克，作为“生活的使者”常在工余来到姑娘的家中，常在晚上带她出去散去。但他的安慰体贴没有能使她忘却痛苦，反而加深了她的痛苦；他的“手法是老练的，而意图是微妙的，他在希腊悲剧中寻找打开她痛苦心灵的钥匙。他在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中作到了一首古典乐曲，既不失调也不改变多梅尼死后的悲伤韵律，但总想将他的悲剧编入它自身的和谐旋律之中。”他是她自荐的伴侣，分担她的忧伤，耐心地让她“重新点燃起生活的热情之火，总希望渐渐地她会开始发现他，并以一种比她给予雷恩的爱还要明智的感情去爱他的。”德列克唤起了她对文学和他自己作品的兴趣，“但是，他仍然怀疑他是否能像她旧梦中的情人为她所爱。”但是，正如小说的标题《中间地带》所暗示和书中最后段落中象征性地指出的那样，他实在是无所指望的。《侵入者》中的海伦娜拒绝了那个年轻音乐教师塞西·伯恩，就像她在现实中拒绝了那个音乐教师西格蒙一样。劳伦斯的海伦诗也表现了相似的情况。

在克罗伊敦的那些岁月中，劳伦斯是和海伦·考克谈天说地一同散步的好朋友，但在那以后，他们之间的友谊并未持续下去。那时候，她住在萨尔赫斯特，离劳伦斯考尔华斯路的住处不远。他们散步时有时和阿格尼斯·曼森一起，他们那时经常穿过伦敦南部的那片开阔地。他们会穿过理奇蒙公园的山毛榉木林或远足到温布雷登公共地。他们也经常坐火车去披尔利，当时还是一个村庄，再从那里走到北当斯。偶尔他们也去伦敦的剧院，观看如斯特劳斯的《依莱克特拉》之类的演出，这类节目在当时的伦敦引起很大的轰动，或者他们也去海德公园听音乐会。这些情景，这些事件以及劳伦斯和海伦·考克之间的谈话都被写进了他们俩此时期的作品之中。整个经历中最重要的部份是劳伦斯叙述对他们之间关系的态度的那些诗作；这些诗很容易辨

认；因为有海伦的名字出现在其中，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不是专门写给某个妇女的爱情诗。在许多情况下猜测可能是一种冒险。

1968 年，海伦·考克 86 岁时受英国广播公司电视二台的麦尔考姆·墨格里奇的采访，他曾是她的学生。她十分坦率地讲述她与劳伦斯相处的经历。她说她当时一定很有魅力，因为那时她对年轻男子很少注意，往往对他们不屑一顾。（《侵入者》中的西格蒙是 39 岁了）考克小姐说，劳伦斯写作那篇小说时，将自己比作西蒙格，“自己觉得与他作品中的人物十分相似，”当问到劳伦斯在当时是否可能成为她的情人时，海伦·考克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她也不可能成为他的情人，她对他十分爱怜而且“十分喜欢他”。但是她对他没有肉体上的渴望。她说她不会做他的妻子，或作其他什么人的妻子。

另外还有吉西·钱伯斯的感情纠纷，海伦·考克曾几次遇见过她。吉西觉得劳伦斯是“上帝的一个儿子。”海伦认为她对男人的经验很少，对劳伦斯过于痴情，认为“他们可以结成婚姻中的一对理想伴侣。”当劳伦斯想在他们关系中加进性的内容时，吉西“却不愿意发生这样的肉体关系。”当问到吉西的魅力如何时，海伦·考克说吉西“非常迷人，当然在我看来是这样。”实际上，海伦承认她“爱她胜过爱劳伦斯。”当问到劳伦斯是否是个同性恋者时，她说她“没有发现有这方面的迹象。”她认为他处于性谱（spectrum of sex）的中间阶段，有着男性的阳刚和女性的阴柔二重性居于“一些最好的艺术家”中的“极大多数人”所处的一种中间位置。墨格里奇提到海伦·考克给她的自传体小说取名为“中间地带时，问她是否也处于这样一种中间位置，她的回答是肯定的。

当墨格里奇问到劳伦斯是否欢喜聪慧的女人，考克小姐回答说，“他偏爱于母亲或情妇类型的女子。”自 1912 年起，他们互相没再见面，当时劳伦斯从爱德斯·加纳特的寓所写了封信给她，让她去那里和她见面，因为加纳特“非常随便，不拘旧套。”她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之后，便冷冷地给劳伦斯回了一封信，这就是他们关系的终结。至于他们在 1912 年 2 月的最后一次会面我们将在后面叙述。显然这次会面是在海伦给他写去那封“冷冷的”信之前。但在他为她而作的常常是痛苦的诗中，他仍怀念着他们的友谊。

有关海伦的诗出现在《爱情诗》、《阿姆勒斯》、《新诗》以及修改后再版的《诗集》中。

《爱情诗》的“诱惑”展开了戏剧的背景，劳伦斯是以一个祈求者身份出现的：

……海伦，你让我的吻付诸流水，
消逝在夜的黑洞之中；吸于我吧，
我祈求；哦你这个夜的酒神的祭司，
你怎能从我盛满热吻的碗盏中隐去！

虽然在《回忆》一首中没有出现名字，但诗中所指的小提琴可以说明这也是一首“海伦”诗（啊，当我端坐在这里时，你中断了你的乐曲，弓停了，乐曲多么暗然，使人伤心。）《受拒》一首对他们的关系作了更详尽的描述，也显示了劳伦斯善于将人物和自然景色溶成一体才能，这也是他后来在小说中经常使用的手法：

这夜硕大而肃穆，海伦，我是一只小虫，
在这小丘的毛绒之中，依附在黑色石面的草叶上，
一只在夜的毛绒中悸动的蜉蝣，惧怕一切，

看到大地和天空都像是凶恶的异物
我依附在大地的毛绒上，你是天空中微弱的尘粒，
今晚我们多么的互相憎恨，恨你也恨我，
就像充满活力的大地憎恨天空中的梦幻，
就像一个男人憎恨他爱着的梦幻中的女人，因为她默不作答。

《旅程》是另一首“海伦”诗；它记录了劳伦斯和海伦·考克一次乘列车同途旅行的经历。此事发生在1910年秋天，当时劳伦斯是在周末回伊斯渥去看望他的母亲，海伦当时在阿诺·凡尔，诺丁汉的麦帕雷地区，她是去那里访问吉西·钱伯斯家的，钱家已迁到那里的一个农庄。劳伦斯和海化同坐星期天午夜的列车从诺丁汉回伦敦；他和她坐在一起，郁郁不欢地坐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后来在他用笨拙的诗句记叙了这段经历：“你在朦胧中独自坐在那里 / 沉重地压迫着我，我几乎不能忍受 / 和你同坐一趟列车……”

所以，我亲爱的，当另一个黑夜降临
在我们头顶，伸出你洁白的手指
将我剥得赤净，轻轻地触摸我
轻轻地，轻轻地抚遍我的全身。
我热切地渴望着你的触摸，
但我无法动弹，尽管我多么
想成为你的情人。
夜复一夜，星辰已经消逝
间隔着萎靡不振的白天；
黑夜再来吧，再来一个黑夜，
你可会将我抛开？
你可会催开我多情，痛苦的
身躯之蕾，再驱散我心中向你
奔涌的燃烧着的狂澜？

在《诗集》中，此诗的标题改成了“列车旅程”，诗中除了其它的改动之外。在最后第二段中原用的“我亲爱的”一词也改成了海伦的名字。

在《阿姆勒斯》和《爱情诗》中另外有一些可能也属于“海伦”系列的，有《交配》（在《诗集》中称为“春天来了，悲伤来了”）诗中写到诗人看到鸭子蟾蜍和马的交配，感到了那种明媚的阳光下“兴奋的，雄性的冲动”，并问那个女子为何要躲避他能满足她的那种欲望，坦露她的“情怀 / 用炽烈的、鲜亮的情怀去体验生命”；《一个精神女性》（在《诗集》中为《这些聪明的女人们》）她被劝导“去认识 / 那些最显而易见的事情，”她被劝导说她应该被人亲吻，直到失明，那样她就能在黑暗中发现新的生命（在《诗集》中，诗是这样结尾的：“在你的大腿之间是否毫无希望，远远地，远离你朦胧的目光？”）《叛逆》（后来的版本中称《拒绝》诗中说诗人在一个晚上来到一家人家敲门无人答应后，在市内的街上游荡，直到“一辆车子急驶而过之后，他看到那个女人“躲藏在阴影之中”，“向人行道走去，匆匆地 / 奔到静谧的前门”跨步进入，“将市街抛弃于惊愕之中。”

作为一个男子写给女子的诗，这里的数量是相当可观了。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海伦·考克并非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她是一个“先进的”思想家，她对写作十分热衷。她很动人，身材娇小，一头稍带红色的头发。这些诗一再表明，她给劳伦斯带来的只有困扰和不安。正如“火中的百合花”所示，

她回避了他的爱情（当我向你靠近时，你的光彩暗淡了，我自由的 / 火焰像死神一样进入你的花瓣，你枯萎而死化为白烬”）

然而，她以她的敏感，她的写作天赋（作为一个被广泛采用的教科书和经济史作家，她注定会有很大的成功），以及她对这位艺术家的问题的同情和深刻了解，海伦·考克是劳伦斯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的讨论常常有助于他的创作，例如，有一天去参观苔尔博物馆之后，他与她进行了交谈，然后，他马上写出了他的“柯罗特”这首诗（树木在升高，越来越高，被举到了 / 一股奇妙的冷灰色的火焰之上）和另一首《米开朗基罗》（上帝将你的园柱握捏在他的指之中”），是一种颇为可怖的用手淫造物的暗示。劳伦斯早期诗中最好的一首《爱情中的寒意》，我们不妨可称之为“海伦·考克主题的变奏曲”，因为劳伦斯是从她自己的诗作“梦幻”得到的启示，她在这首诗中想要表达她在苏萨克斯海滨的气氛中所得到的感觉。她在给本书作者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这个情况：

1910年10月1日，他和我正巧从布赖顿沿海岸去纽黑文，那是一次9英里的步行，我童年时的暑假就在纽黑文和我的表姐处度过的，她在《中间地带》中叫艾依琳。那是一个鬼魂出没之所，因为在我住过的那幢舒适、宁静的房子里，我的表姐，她的母亲，祖母和祖父都相继去世。劳和我继续沿海湾前行，到达了西福德，这是一个小镇，夏日的渡假者们已经在傍晚前离去，我们在镇的前端一个旅店找到的住所，房东太太将我们带到走廊两端的两间屋子里后，便走开了。我累极了，有点像力浦·几·温科尔一样，马上就睡着了，但又在海边大雾的寂静中醒来，雾像一张巨大、稠密的蜘蛛网一样把房子包围了起来，使我感到一种寒栗。我的诗就是想要表达这段经历中的那种气氛——但那是徒劳的，我现在意识到，因为气氛只能暗示不能传达。当我把诗给劳伦斯看的时候，他说：“当你告诉我一种想法时，我总觉得要由我自己将它写下来该多好呀！”所以《梦幻》的另一面便成了《爱情中的寒意》。

《爱情中的寒意》可以说是一首乔治风格的爱情诗的姐妹篇，即那首《一段记忆》，是由鲁帕特·布鲁克1913年10月在怀基基写的：“黎明时分我起身，迈步 / 轻轻地穿过朦胧走向你的房间……”劳伦斯的诗从韵上讲，不如布鲁斯的流畅，但它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在1928年的《诗集》中，劳伦斯重写了《爱情中的寒意》的末尾一行，“我的爱人又能在温暖中醒来，无忧无虑，”但原诗的其余部份没有什么改动。此诗的开头几句有一些对灰色的海滨的寒冷的白天和夜晚的动人的联想，诗人醒来时“黎明像尘埃一样吹入窗口”，于是：

我从惊恐中起身，非常地需要你，
因为我想你会像突然涌出的鲜血那样温暖。
我想我可以投入你奔涌的热流之中，将
寒意和阴晦一驱而净——当我用手触到门栓，
我听到了你在梦中对我说着奇怪的梦吃。
我不敢进入，突然感到慌乱。
于是我到大海中沐浴我僵硬的肉体
回来时寒颤着一身清新，但因为
寒冷而疲乏无力，就像是月晕，看来多么奇异，
我的爱情在玫瑰中复苏，犹如少女的爱心。

《亲昵》一首最初出现在 1918 年的《祈祷》中，是以一种告别辞的口吻回顾劳伦斯——海伦关系。在《诗集》中，劳伦斯给此诗重写了标题，《对海伦的短访》：“归来时我发现依然如故 / 仍与往日一样洁身自好……她撩动着他的情怀又不让他得到满足”海伦和吉西有些相像，吉西后来也成了她的好朋友，确实，海伦与劳伦斯的大多数女性朋友有许多共同之处，他后来所娶的那一位则是个例外，尽管她成了劳伦斯生活中的中心女性，他好像仍被另一种类型的女性吸引着，特别是“精神型的”，因为他无意识地认为她们是——除了吉西，——受他母亲赞赏的那一类。

劳伦斯和露易·伯路斯一直保持着联系，应她的要求，他给她寄去了一份“伟人”的名单。这种人物的列举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欧洲历史动态》一书的一些早期想法，这本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写的。由于受吉朋的影响，劳伦斯在书中对一些历史人物大书特书，例如对阿提拉（406？ - 453），在这部史书中进行了讨论，劳伦斯还在 1990 年末写过一首诗。他给路易开列的名单几乎全是军事人物，只有很少几位政治人物（其中有罗伯斯庇尔和丹顿）和几位圣人（耶隆，阿西西的方济，西纳的凯塞琳），军事人物中包括汉尼拔（公元前 247—183 迦太基名将）朱利乌斯·凯撒（公元前 100—44）（他同样也是一个政治人物，与克伦威尔、彼得大帝等劳伦斯提到的许多将国一样）查理曼大帝，拿破仑等等。这些名单的列举（全文见《恋爱中的劳伦斯》〔1968〕，致露易·伯洛书书信集，由詹姆斯·T·波尔顿编辑）对于研究和探讨劳伦斯的生活和作品都是一份极有意思的名册，因为这说明了那些人是他特别敬慕的，这对于他本人以及他在作品中所讨论的各种事件的研究都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

另一封写给露易·伯洛斯的信（1909 年 3 月 28 日）是有关两天前在克罗伊登的一次二级选举以及所涉及的一个反对妇女参政的保守党分子罗伯特·哈门·赫治的生动记叙。那时还是二十世纪爆发的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此运动的声势比起她们后来者毫不逊色。在读这封给露易的信时要注意当时的背景，即露易·吉西·钱伯斯和艾丽丝·戴克斯——先前已经提到——渴望平等权利，而且有过激言辞，有时简直像社会主义者。

劳伦斯告诉露易说，他“那天晚上十分快乐”，看到一群男子在一辆车子上围住了两个女权主义者。其中一个叫卡梅伦小姐的大声疾呼道，“如果男人们不能控制他们自己的话，现在应该是让女人们掌握些权力去控制他们的时候了。”咆哮着的男人们围住了那辆车子，好像要将它推翻——这是许多年以后在公共场所辩论时常采用的手段。这也许使露易的那颗“跃跃欲试的、野性的心受到了震惊。他对接着发生的事件继续作了描述，写到了人群中此起彼伏，想要压过对方的喊叫声。这是一封十分有趣的信，因为它是劳伦斯后来三部有关领导权的小说中的暴力片段的伏笔，这三部小说就是《阿伦的杆杖》《袋鼠》和《癫狂的莽蛇》，发表于 20 年代中期。

更为有趣的是，在提到二天前发生的情况之后，劳伦斯继而又提到了学校里那些穷孩子们的糟糕的境况（露易莎，我亲爱的，生活恐怕并不那样温柔、有趣和愉快），然后又提到了他星期天去参观达尔维奇艺术馆的情景，在那里看到了蒂田斯，霍比麦斯，莫里罗斯和其他大师的作品。在其它的信中，他还谈到了音乐会——瓦格纳的表演对他们的打动不深——和去剧场看戏的情况。综而言之，这个来自乡村的年轻人正在观摩这个在不断扩展着的大都市各阶层的生活，在那个时候，在约瑟夫·康纳德看来（正如他后来所

说的) 这个城市像 “ 一个吞噬着世界之光的残酷贪婪的人。 ”

（二）死亡的记号

吉西·钱伯斯不但鼓励劳伦斯努力创作，而且还把他的诗作投寄给一位编辑。吉西说，劳伦斯曾对她说过，可按她的建议将他的一些作品投给《英文周刊》（English Review），如果她为他起一个化名的话：他不想作为一个诗人在克罗伊登出名（她给他起的化名是理查德·葛里斯雷，是根据他未用的化名理查兹和他的教名合成的。）劳伦斯对此事的叙述有所不同；他回忆道，他在克罗伊登的时候，“那位作为我青年时期主要朋友的姑娘，她本人也是一个煤乡教师，抄录了我的诗作，没有告诉我，就将它们寄到了《英文周刊》，此刊物在福德·麦道克斯的主持下正开始走红。

当吉西在 1909 年夏天将劳伦斯的诗作寄给休福，休福回信表示有兴趣时，劳伦斯正好不在，他和他的母亲在瓦特岛度过了暑假中的一段时间。当他们回来时，吉西把编辑的信给他看，他说，“是你让我走运了。”然后他把信给他的母亲看，以后吉西便再也没有看到那封信，因为劳伦斯太太再也没有提起此事。吉西觉得很不是滋味，“为未经准许而去插手他的事情而感到内疚。”

1909 年的暑期对劳伦斯太太来说一定要比往常更为愉快，因为这一年吉西没有和她以及她的儿子一起去度假，同行的人中虽有好几个劳伦斯的异教徒帮朋友，但劳伦斯太太对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无反感。同行的人中有乔治·纳维尔，他记得另外几个人是艾丽丝·赫尔，弗朗西斯和葛屈德·库柏以及埃达·劳伦斯，艾丽丝·赫尔的母亲帮助劳伦斯太太管理这个团体。

他们将钱集中起来，在尚克林租下了玫瑰别墅，是在岛的东南面，他们在那里租借了一些海滨帐篷。劳伦斯从未这样远离过克罗伊登和伊斯渥，但有他的母亲作伴，所以十分愉快。年轻人在岛上漫游，并在 8 月的第一个星期末到了考尔斯去看国王和沙皇舰队的阅舰式。在假期中，劳伦斯只是一个年轻的小学教师，但瓦特岛的景色和阅舰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在他的第二部小说《侵入者》中大加发挥。当时他甚至还没有计划要写这部书，因为他是从 1910 年才开始使用海伦·考克的手稿作为他创作的素材；但那时他可能已经勾起了对那个地方的记忆。

这是他的母亲度过的最后一个暑假；她刚刚进入 50 岁，虽然看上去还很健康，但是 35 年不幸婚姻的艰难困苦已经为她敲响了丧钟。正好一年之后，她便得了致命的疾病。

劳伦斯第一次去见福德·麦克道斯·休佛是在他回到克罗伊登，学校开学以后。那位和蔼可亲而语言花俏得不太可靠的报道者对吉西为劳伦斯送稿件和劳伦斯第一次去编辑办公室的情况自有一番描写。他说当劳伦斯走进办公室时，看上去像只红狐狸。休佛在四分之一世纪多以后的回忆中坚持说吉西除了给他送去了诗以外还有小说作品，他说他最初读到的劳伦斯作品是短篇小说《菊香》的开头一段，凭此他就是以认定了劳伦斯是一个手法熟练的作家；他立刻将稿件放入收用稿件的筐内，然后便出去参加一次文学界的宴会了。宴会上，据休佛说，和他同席的有毛里斯·巴林，哈连尔·巴洛克，C.K. 查斯特顿和 H.G. 威尔斯，不一会，威尔斯便对旁边朗敦德丽勋爵夫人席上的什么人说道：“乌拉，福第又发现了一个天才叫 D.H. 劳伦斯！”休佛又补充道，那天晚上有两个出版商请求得到劳伦斯第一部小说的出版权；这位默默无闻的小教师的名字“在他还不知道他的作品已被送到了编辑手里的

时候，他已经在伦敦名声遐迩了。”

对此事件的这段描写很可能是出于模糊的记忆，或者是一段戏剧性的编造，以说明休佛很早就对劳伦斯热情扶持（同时也为了显示休佛的影响力之大），但也有可能，至少也有一点可能这件事报道的确实性。不管怎样，这段描写也反映了当时都市文学界的一种气氛。不久以后，劳伦斯也一度进入了这个圈子——在他退出了这个圈子以后，他在《恋爱中的女人》和其他故事中对它进行了嘲讽。

在《回到昨天》（1931年）中，休佛（这时已称福德·麦克道斯·福德）叙述了一次不可信的伊斯渥之行，他在劳伦斯家看到了一些年轻人在矿上一天的教书和工作之后聚集在一起，进进出出，“沉浸在我仅在美国的一些小城镇才看到的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但劳伦斯太太从不让那些高谈阔论的年轻人到她家去；这样的来客是非常有限的，正如吉西和其他人指出的那样。福德在此奇谈中还描述了劳伦斯的父亲，星期六晚上从矿上回家，坐在餐桌旁和其他矿工点数着他们挣得的钱。这一片段的部份情景可能来自劳伦斯的早期作品，但当福德往下继续描写时，他以下的那些话就越说越玄了：“年轻人不时地谈论尼采·瓦格纳，利奥帕底·福楼拜，卡尔·马克思，和达尔文，有时父亲会停下来和他们辩论几句。”

休佛后来说，他从未“真正喜欢过劳伦斯。他总是那样使人不安，以致我无法与他深交。”尽管劳伦斯并不怨天尤人，但他需要不时地关心，以取代那位不在他身边的母亲的影响，他常以“一种在外谋生的年轻人中少见的”方式谈到她的人格和见解。

也许休佛——劳伦斯在给吉西的信中对他的描写是“人相当不错，胖胖的，四十来岁，是世界上最和善的人。”——必须在这方面首当其冲，因为他出版了劳伦斯的作品，而且做得颇有影响。1910年11月那一期的兰色封皮的《英文周刊》将劳伦斯刊登在杂志的卷首，他的诗占去了前面六页，此刊物同期载文的作家按顺序是小说家约翰·高斯华兹，纯文学作家G·洛尔斯·狄金森，历险小说作家R·B·卡宁汉姆·葛兰姆，经济学家J·A·赫伯森，记者亨利·W·纳文森，历史学家C·P·古奇和休佛。一个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小学教师如此幸运地初次登台亮相是极为少见的。

第一组诗是劳伦斯到克罗伊登以后所作，无疑就是吉西投寄给《英文周刊》的那些（它们在集子中出版是1916年的《阿姆勒斯》中），这组诗中的第一首是《古老的梦和新萌发的梦》，那时被分为两个部分，《一，古老的》和《二，新萌的》。这些诗作是劳伦斯当教师时期诗作的开始的记号，这样的诗他后来还写过一些。“古老的梦”像是写给吉西的信，是这样开头的：

我打开了小窗在窗台上温暖我的双手
石栏渗透了阳光：这下午
充满了梦幻，我亲爱的，孩子悄然无声
默默地做着罗拉德翁的梦。

那本让劳伦斯以一个诗人的身份进入文学界的《英文周刊》是由休佛主持编辑的最后一本刊物。他的前任主编，凡尔列特·亨特，后来称1909年的那个秋季是“黑色的秋季”，那份刊物则“像一个活泼强壮，一开始就尊养处优的婴孩，只想用钱去获取它的特殊食品，和刚刚冲满的奶瓶，他正在或已经从编辑充满爱怜的怀抱中滑落。”但是当吉西·钱伯斯在11月去凡尔列特·亨特家吃饭的时候还没有任何麻烦的迹象，在吉西到伦敦市的第一天，

那是一个星期六，劳伦斯十分快活，伦敦也是“一个充满神奇的地方。”晚上他们去看了一场话剧，剧名颇为有趣，叫《一个绅士的诞生》，当他们回到克罗伊登的时候，琼斯一家人已入睡了。劳伦斯和他的客人煮通心面作晚餐，然后把他的最新诗作和剧本《一个矿工的周五之夜》给她看。

吉西到1点钟时已十分疲倦了，她是前一天早上6点钟离开家的，但是劳伦斯要她再陪他一个小时才让她去她的房间，于是他们便扮演了大体上与《儿子和情人》的最后一章中出现的那场戏。在克罗伊登，劳伦斯对生活方式稍作了改变，他说在新的生活的兴奋和紧张中，很容易就会耗尽精力。“他需要一个女人，但又结不起婚，于是使他感到惊讶的是，有些姑娘怎么会在不需求与他结婚的前提下，当然不是定期的，给予他“那个”。

吉西对这位未来的《查特莱夫人的情夫》的作者的害羞的委婉语并不含混其词，她则给以传统的维多利亚王式回答：他可能不欢喜那些愿意给他“那个”的姑娘——在当时当他问她自己是否认为这样的给予是一种过错时，她回答说“不是过错，但十分难堪。”她想起了《新约》中的那句话“谁用我的名义给一杯水吧”此处用到的这个一杯水的比喻，很可能使那个时代崭露头角的弗洛伊德学派感到有趣。

劳伦斯说他可以要“她”——一个他对吉西说起过的他曾想与她结婚的教师——给他“那个”，吉西回答说，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那个姑娘爱他到什么程度。然后她说她要去睡觉了，因为那时已两点了。

在吉西到伦敦的第二天，劳伦斯带她去《英文周刊》编辑社在赫伦德公园大街84号的办公室见休佛。休佛对吉西十分客气，并立即问她是不是一个主张妇女参政观点的人，她回答说她的一个好朋友（也许是威廉·霍布金或他的妻子）曾热情地与她谈起过这个运动。然后休佛问她是不是一个什么社会主义者，她的这一承诺也许是她生活中一些有趣的经历的开端；据报道，她在后来成了一个苏维埃的同情者，并曾去莫斯科观光。

在下午《英文周刊》社用午餐的时候，吉西，休佛和劳伦斯步行到不远处黑尔路80号的凡尔列特·亨特家。这是一所有名的南方式房子，一幢高高的维多利亚式郊区住宅有围墙和花园，房子里装饰着一些克利斯蒂娜·罗赛蒂，奥斯卡·王尔德和其他凡尔列特·亨特年轻时亲朋好友的纪念品。

凡尔列特·亨特后来回忆说，在午宴上吉西“显然十分紧张，但总算还能对付过去，尽管当她轻声地问我的正在削土豆的女佣人，她是否能不脱手套时有些慌乱的表现。”（46年之后，劳伦斯的遗孀，弗丽达写道：“凡尔列特·亨特所说的关于吉西的手套之事，我是不能相信的。”也许吉西看上去并不这样贵族派头实足，但毕竟弗丽达不在午宴上，而凡尔列特·亨特却在场。）在吉西的回忆中，客人中那位和颜悦色、健谈而言辞尖刻的人，即那位年轻的埃兹拉·庞德，在午宴上唱了主角。当凡尔列特·亨特说到有些主张妇女参政的人在监狱中受到折磨时，庞德说他们所在的屋子在那时就像是一所监狱。

另外一次有特殊意义的聚会是劳伦斯被介绍给当时“人人图书馆”的第一任编辑欧内斯特·赖斯，赖斯和他的妻子常常在他们赫默特治弄的家中宴请诗人们，作为诗人俱乐部的一种非正式聚会的继续，叶芝在他的自传作品中常常提到这一组织。

一天晚上休佛带来他的新发现，一个会写诗的从矿区来的小学教师。在赖斯看来站在那位有都市气派的休佛旁边的是一个“腼腆而且带有些乡村气

息”的年轻人。庞德也在那里，叶芝带来了那位女演员弗罗伦萨·法尔，让她用八弦琴为他的诗朗诵伴奏。当他们同桌共餐时，叶芝便开始了他有关将诗和音乐合成一体的艺术的独白。庞德插不上话，便开始去吃一个作为桌上装饰的郁金香块根；看来他对此相当欢喜，吞下一个之后，又拿起另外一个。叶芝一个人正说得起劲，没看到这个，其他人也没有言语。叶芝滔滔不绝地谈着，而庞德则继续咀嚼他的郁金香。

过了一会，叶芝说他已厌倦了“个人独白”，便背诵了《夜已降临》和他对朗萨德的翻译作品。在这个晚上，欧内斯特·赖德福德——后来劳伦斯与他的家庭交往甚密。——朗诵了他自己的一首诗，庞德也读了他的一首《好伙伴的歌谣》佛罗伦萨·法尔弹着八弦琴吟诵了叶芝的《一个向往仙境的人》。在休佛郎读了他的一首小讽刺诗之后，欧内斯特·赖斯轻声地请那位长着红胡子的年轻人读几首他带来的诗作。劳伦斯“有些拘谨地站起身，但从容不迫地走到一张书桌前，从口袋里拿出一本神秘的小册子，背对着大家坐了下来，开始用一种很有表现力但音量不大的声音朗读起来。

老诗人们礼貌地等他结束。但过了一会大家觉得好像他并无收场之意。他仍然背对着他们，仍然用低沉的声音朗读着，他的小册子翻了一页又一页，他读了一首又一首。半个小时之后，屋里已是一片窃窃私语声；但劳伦斯若无其事，几乎用他很难被听清的声音朗读着。最后，在一个女士的建议下，赖斯走过去对劳伦斯说他该休息一回了：为何不稍歇一会，到午夜时再开始？

劳伦斯微微一笑，“站起身来不自然地微微鞠了一躬，合上小册子，回到他原来的角落里，”过了一会，在其他一些人又朗读了之后，赖斯又来到劳伦斯跟前请他“从他的黑色小册子中”再选出一首来朗读，并强调说只需一首便符合我们聚会的礼仪了。”但休佛这时站起身来，拉住劳伦斯的手臂，把他推出了屋子，用开玩笑的语气说：“告辞了，告辞了。”

在伦敦的那些日子里，劳伦斯仍与中西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常在学校放假的时候或有时在周末去看望他母亲、姐妹和他所喜欢的女人：吉西，露易·伯路斯和戴克斯太太。

在克罗伊登，除了海伦·考克以外，与他关系密切的好像还有三个女人，A.W. 麦克利奥在先前引用的那封信中说他在这三个人都不认识，她们是阿格妮斯·赫特，简和大卫森太太。

劳伦斯的一些朋友，以及他的遗孀对于吉西所说的劳伦斯想与阿格妮斯·赫特结婚这件事的真实性表示怀疑。1909年11月吉西去伦敦时，劳伦斯曾带她去与阿格妮斯见面，就是在凡尔列特·亨特家吃午饭的那一天。她说阿格妮斯·赫特（吉西没提到她的名字）是一个红头发的小学教师，她“对劳伦斯说话时像个大姐姐，对他总有一种虚张声势的奇怪的神情，我总觉得这种神情是出于缺少信任。”据吉西说，劳伦斯在1909年圣诞节前夕对阿格妮斯·赫特说，他们要结婚的想法是一个错误。此后不久，阿格妮斯离开了克罗伊登；她与另外一个教师结了婚，并与他一起去了曼思岛，在那里办了一所学校。

在1910年1月28日写给勃朗什·简宁斯的信中，劳伦斯提到了一个他所不欢喜的“情人”。虽然这个姑娘也是27岁，与海伦·考克年纪相仿，像海伦·考克一样也有一头红发，但可能她就是阿格妮斯·赫特，因为在同一封信中，劳伦斯清楚地提到过海伦·考克，对她与那位他所讨厌的姑娘的描写是不一致的。他还说起了另一个姑娘，一个仅“引起我兴趣”的姑娘——

仅此而已——下一次我将写信告诉你——这个姑娘——她叫海丽妮——她非常有趣。听起来这位姑娘好像不是在信中的其它地方提到的那一位：“她是一个很动人的姑娘，有一头红褐色的密发。”开始她“看起来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因为她“机灵、敏捷，巧嘴利舌，有一种独立不羁的举止。”男人们都欢喜她，劳伦斯“与她交往不少”，但他对她感到讨厌，因为她实在是那样的无知和老派，尽管她（与海伦·考克不同）上过大学，而且在伦敦教过几年书。“她总是说男人们都是轻薄儿，‘仍然用维多利亚中期的标准去衡量他们’，并‘拒绝单独与一个男子见面，认为接吻完全是一种序曲和开场戏，而爱情不过是一种肉体的同情。’”她看上去“是那样的虚伪和浅薄，……我无法改变她。”她想“在生活中得到乐趣，”但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她又退缩到忧郁感伤中去了。”不管怎么讲，这封信是相当含糊费解的，也许根本无法作出一个完全可信的评论。

在劳伦斯的伦敦生活中，“简”这个人始终是个谜。唯一直接提到她的一次是在1912年2月10日给爱德华·加纳特的信中：“我见到了简，在玛丽篷和她吻别了——我的心情十分沉重。”那些在当时就熟悉劳伦斯的人——威廉·霍普金和乔治·尼维尔以及稍后认识劳伦斯的爱德华·加纳特的儿子——都不能确切说出简是谁。查理德·奥汀顿在1912年时还不认识劳伦斯，他说劳伦斯当时正“了结另一段不愉快的恋爱，”当然这里很可能就是指的那位与他终止关系的女人。奥汀顿将此事与劳伦斯写给沙莉·霍普金的一封信联系起来，此信写于同年的8月9日，信中他说“——夫人给我写了信——我曾告诉她我与另外一个女人在相处——但没什么具体内容。我为她难过，她病得不轻。”但要把信中的空白处填上的话，那就变成了一个伊斯渥人的名字了，即戴克斯夫人，而她的名字不叫简而叫艾丽丝（当然简也可能是吉西）。

这几位伦敦女人中的第三个，大卫森太太，也很难追溯。乔治·尼维尔曾对本书作者提到过她。她住在克罗伊登，他说她的名字可能叫简，她是一个寡妇，尼维尔说，对劳伦斯“很友好”，“对他十分友好”。根据尼维尔回忆，她也“寄住在琼斯家里。实际上，因为雇用劳伦斯和他的房东的是同一所学校，大卫森这个名字很可能是劳伦斯和尼维尔之间的暗语。为了掩盖一个女人的名字，她也许不是一个寡妇，可能是琼斯太太。

1950年乔治·尼维尔和本书作者有过一次交谈，他很乐意帮忙，尽管很显然他时常有所保留。有一点他肯定的是，一个伊斯渥的已婚妇女是劳伦斯性爱的启蒙者，他没有说出这个人的姓名——威廉·霍普金也证实了这一点。一次霍普金无意听到戴克斯太太对霍普金太太说：“我给伯特发生了性行为，我不得不这样。但在我们家冥思苦想一首诗但无法完成，我就把他带到楼上与他做了爱，他下楼后便完成了那首诗。”这至少是文学的创作灵感的一个不太恰当的例证。

艾丽丝·戴克斯以前从未有过性冲动，爱上了劳伦斯，她希望她后来生的那个孩子是劳伦斯的，并试图寻找出与劳伦斯相像之处，但她的那些知秘密的好朋友们坚持说那孩子显然是她丈夫的。当最后她和劳伦斯分手之后，她从未让另外一个男人去碰她，包括她的丈夫在内。

她没有想到要牵制住劳伦斯，确实，她因为觉得对他有利便让他去了。她和他之间常有不合，她觉得她决不能和他保持一种吵吵闹闹的和谐关系，就像他后来的妻子那样。艾丽丝·戴克斯在好久以后主动给弗丽达·劳伦斯

的信中（1935 年）说她觉得他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伴侣。她自己很了解劳伦斯的伟大之处；但“我完全配不上他，他喜欢的不是那时的我，而可能成为的另外一个我——那个潜在的但决不会在生活中存在的我，尽管有他的帮助和影响。”在她和他中止关系以后，据她当时的一个好友艾尼德·霍普金·希尔顿说，她“过着我们很难想像的生活。”

这段时间，劳伦斯还处于和露易·伯洛斯的恋爱之中，她在肉体上对他很有吸引力。（劳伦斯的朋友们说她有朱诺般的雍容华贵朱诺是罗马神话中朱庇特的妻子，——译注）他好似常用露易去使吉西痛苦，吉西记得，早在 1907 年夏天，劳伦斯去露易家喝茶，并想要他发现自己对她的真实感情是什么。几天以后，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吉西之后，把一首新作的诗“金鱼草”给了她。这首诗中有许多精采的片段，例如：

……我把手伸到那凹痕上
在花蕊的深处，花瓣痛苦地张开。
她目睹着，她突然凝神静默，
她看着我的手，看它能得到什么满足。
我挤压又揉搓，把那花在我手指间
掐弄，直到它垂下了头，它的茎杆
向她斜倒，我的手如武器白晰锐利
我握着被扼住的花蛇，让它处于极度的
痛苦之中，直到她不敢再笑，
直到她骄傲的羽翼弯折，断落到地上。

吉西提到的另一首写给露易的诗是《车厢里的吻》（我看到中西部的大地 / 在她的头发间转动……）另一首她断定是写给露易·伯洛斯的是《未婚夫的手》，此诗不但对下面的情景作了描写——那个多情的姑娘不让她情人的手去触摸她的身体——也告诉了我们露易的长相：黄褐色的眼睛，一头黑发和一双大手。

这些诗反映了劳伦斯和露易·伯洛斯之间关系的大部份故事。这关系至少持续了 5 年；但是与其他女人一样，劳伦斯知道在他母亲有生之年，他不可能与她们建立持久的关系。

与此同时，他也在发展他的社交生活和他在伦敦地区的交往。1910 年 2 月 28 日的一封信中有一段关于这个年轻人在艺术圈子里变得知名的有趣描写；信是写给德温特·伍德夫人的，那位雕塑家的妻子，他从克罗伊登给她写信。

亲爱的伍德太太：

非常抱歉我必须把票子寄还给你。承蒙你的好意将那些票寄来给我；我把它们寄回给你时，我自己觉得是一个浅俗的罪人。但我大病初愈，卧床已有数日，整日价望着窗旁流苏无休无止，使人伤心地在朦胧潮湿的天空中没有规律地舞动，要是明晚我真能坐在贝彻斯坦剧院里，那将是何等样的一椿乐事：但是遗憾的是，我不能届时前去了。但你准会观众满座，所以我是微不足道的。我将在下一个星期六晚上去拜访你，向你面致我的谢意。

你诚挚的 D. H. 劳伦斯

当时，别一个有趣的社交对像是一个年轻的英国妇女葛蕾丝·克劳福德，此人后来（1917 年）成了克劳德·罗伐德·福雷瑟的妻子。这位英国的服装和舞台背景设计家在 1912 年正值他事业高峰时不幸夭折。葛蕾丝·罗代德·福

雷瑟的父亲 T. C. 克劳福德是布法罗·比尔的“西大荒”剧团的财务经理，密执安人，她父亲来自佛罗特，这一家人住在时髦的伦敦斯恰顿街，就在匹克迪利前面的梅费尔广场旁边。

在她的自传《我青年时期的岁月》（*In the Days of My Youth*）（1970 年）中说她最初听说劳伦斯，是他的朋友埃兹拉·庞德与休佛和凡尔列特·亨特谈到他时，那时他们住在南小屋（后来道格拉斯·戈德林为休佛作传时用了此地名作为书名。）这位美国姑娘后来向庞德问起那个成为小学教师和诗人的煤矿工人的儿子，不久庞德就把他带到了克劳福德家喝茶。葛蕾丝描述说，他是一个“长着稀疏的小胡子，头发梳理得很好，穿着笨重靴子的”年轻人，他表现出“一种与其说是腼腆还不如说是冷漠的神情”。克劳福德小姐很快就注意到了劳伦斯有一种幽默感，而庞德却没有。他与她成了好朋友，但他们的关系“一直是正规、客套的”，他们一直相互称呼为克劳福德小姐和劳伦斯先生。

劳伦斯在那些日子里经常见到庞德，并还在肯星顿他的住处留宿过一夜，那一次是因他没赶上回克罗伊登的末班车。庞德记得劳伦斯睡在“一张可折叠的沙发上。”

劳伦斯在年轻人有时打网球的日子去南小屋，庞德，葛蕾丝·克劳福特，休佛和玛丽·马丁戴尔（休佛教妻的姐姐，他的妻子艾尔茜不肯与休佛离婚，要凡尔列特·亨特）劳伦斯从未与他们打过网球，虽然他经常乐于当记分员和捡球手，凡尔列特·亨特的母亲不喜欢休佛和庞德，她常常会把他们的网球鞋藏起来，他们便会在南小屋大吼大叫，想找她藏鞋的地方。劳伦斯作为一个旁观者对这藏网球鞋的小喜剧觉得很有趣。

在给葛蕾丝·克劳福德的一封信中，劳伦斯将庞德那段时间出现在休佛家的面貌作了描述：“总而言之，庞德的大卫科波菲尔式的卷发——也许你从未见过——像簇簇蓬草一样长在他耳朵上面——已经剪掉了。他的这种头发以前常让我想起一句俗语，“好酒店前毋须常春藤”（从前酒店前常用常春藤来作广告招牌——译注）。4 个月前他常执着的他曾祖父的那根乌黑发亮的，与他下颏的轮廓很相配的手杖，现在已被一根桃红色的所取代。他穿一件深色的棉布衬衫，没有穿背心，也没戴那顶巴拿马草帽。”他就是穿着这样衣服还戴着一只天兰色的耳环，出现在克劳福德家。那位老克劳福德，据他女儿讲平日还是很有忍耐性的，这次也变得很生气，并建议她中断与庞德的友谊，这就是后来在 1910 年 12 月出现的那一幕，她去了罗马。

她的欧洲大陆之行也削弱了她与劳伦斯的友谊。在 8 月 4 日从林恩·克劳夫特写给她的一封信中，他告诉了她，他的父亲是一个煤矿工人，这一点，实际上早在认识他之前她就知道了。他也对她讲述了家里的情况：

我的母亲是一个身材短小，头发灰白的人，常紧闭着嘴，她正在阅读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并时常带着一种表示异议的严肃神情。我的父亲不在家，用从我这里要去的一点点工钱去喝一点点啤酒。我的妹妹埃达，身体高而苗条，23 岁，与她的情人骑车去诺丁汉看戏了。我有一位已婚的兄长和已婚的姐姐——他们不能包括在内。

在 7 月南小屋一次文人聚会以后，劳伦斯说他情愿“休佛当时没有把他作为一个天才介绍给大家”。他这时已经完成了《侵入者》的草稿，休佛显然将他的手稿带到了德国。威廉·海因曼想看这本《侵入者》，他在下一年的年初出版了《白孔雀》。劳伦斯写完了西格蒙的自杀以后，对葛雷斯·克

劳福德说：“很感激你从来没有绞死你的英雄。这在你的脖子上留下了一种令人窒息的不舒服感觉和死亡的孤独——在横隔膜之下。”

休佛读了手稿以后并不欢喜。这里显然没什么关系，因为劳伦斯不管怎样已经向海伦·考克保证，如果她不满意，他就不会让《侵入者》发表。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征得她的同意之后，《侵入者》在1912年由达华斯而不是海因曼出版。

劳伦斯的社交生活不仅限于伦敦的知识的艺术圈子；如前面所述，他还与中西部地区的许多人保持密切的关系，当他回到家里，他是霍普金的社交讨论和国家一些社会改革领导人物聚会的积极参加者。正如威廉·霍普金的女儿，艾妮德·希尔顿夫人在一封信中回忆的：“每个星期天晚上是聚会日，当我的母亲给大家端来极好的“快餐”时，我们听音乐，交谈，朗读或谈笑取乐。菲利浦·斯诺敦，比艾切丝和悉尼·韦伯，以及其他一些“先进”群体的人物经常来我家作客，劳伦斯常与他们见面。他是一个沉默的听众或是一个言辞激烈的领头发言人。”这时候的劳伦斯留着胳膊胡子并习惯于戴着一只很高的领子。在一头金褐色的头发下，他的脸庞总是显得苍白削瘦，脸上是一双深沉有神的眼睛。当谈到激动的时候，他常常舞动双手，我还记得他的老习惯，就是用右拳狠狠地击在左手掌中。

劳伦斯对这些讨论会的贡献之一是他的论文《艺术和个体》，很可能在克罗伊登和伊斯渥的社团中朗读过这篇文章。此文在开始时指出，那些想参加这样聚会的人是“持着把我们的社会改革得更加完善，使我们自己成为更加完美的公民——共产主义者——也未尝不可——这样的观点来讨论社会问题的。”但是在谈论过社会主义的好处的轻松话题以后，劳伦斯便述及了他真正的话题：艺术，并开始对当时在英国教育法领域颇为流行的赫伯特的分类法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

社会主义本身从未真真吸引过劳伦斯。他在1910年8月24日写信给威廉·霍普金，“我好像完全和那些过去的‘进步’帮派失去了联系：在克罗伊登的社会主义者很愚庸，费边分子是那样的浅薄。”然而，他年轻时的家庭周围的大部份朋友都是社会主义者：霍普金一家便一直是如此，而吉西·钱伯斯，露易·伯洛斯和海伦·考克至少有一段时间是，她们都有一些“先进的”观点。还有艾丽丝·戴克斯，她是《儿子和情人》中的克拉拉·道斯——妇女参政倡导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模特儿之一。

道斯夫人，一个朱诺般容貌的人，从外貌上看更像露易·伯洛斯和劳伦斯后来的妻子，而不太像戴克斯夫人，她是一个娇小的女人。但从气质上看，克拉拉·道斯与艾丽丝·戴克斯有更多相同之处。

艾丽丝嫁给了一个药剂师，叫亨利·戴克斯，他在伊渥定居下来，后来成了一个神秘主义者；1912年他们迁居到附近的曼斯费尔德。亨利·戴克斯在举止和他的业务经营上很保守，在店里，他总是呆板地经营些一成不变的药品，直到他的妻子后来引进了一些较为“花俏”的商品，如梳子、刷子和化妆用品等等。村里的孩子对药店有一种惊恐的好奇心，因为门边的凳子上放着一大罐医用蚂蟥。尽管大家对这些蠕动着的小动物没有好感，但亨利·戴克斯却还是将它们放置在店里，因为许多矿工还是相信放血疗法的老方法；但最后，他的妻子说服了他，终于将那些蚂蟥放到了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艾妮德·霍普金·希尔顿为此书提供了有关艾丽丝·戴克斯概貌，和这个对劳伦斯的生活和创作都极为重要的女人许多情况，以及《儿子和情人》

中的伊斯渥的许多情况：

艾丽斯·戴克斯和我的母亲比她们所处的时代都要先进好些年（这也是她们吸引 D. H. 劳伦斯的一个方面），她们两人都读过很多书，服饰，思想和家庭装饰很“时髦”艾丽丝几乎毫不受其时代的约束……她反对她那一代人的“混乱”的一方面表现在她拒绝在她家里放置一切不需要的物品。她的家里没有什么画，只有一块小地毯，没有日积月累的小摆设，没有色彩艳丽的装饰品，而只有许多放置整齐的书藉。家俱的质量很好，是当时时髦的橡木制品，实在而不带花饰。在钟下没有小垫子和饼干罐头，没有“悬挂物”。地板上铺的是亚麻油毡和抛光木板，这反映了艾丽丝的性格特征——明了，直率，思想和行为都有条不紊，直截了当……她和我母亲一起为妇女的事务工作，我记得她们曾被召集去参加诺丁汉市的“会议”。我们挥舞着绿色的，紫色的和白色的小旗，那些演说者们，潘克赫斯特兄弟，安妮·肯尼和其他一些我已忘记了他们名字的人——和我们一起回家，在我们家里逗留，讨论进行到深夜，很激烈，但气氛是友好并且是比较欢快的……他们在我们的小镇上举行会议，大家热情都很高，有许多争论和一些有效的结果。科尔·哈代和我们住在一起，还有兰姆色·麦克唐纳，菲利普·斯诺敦，爱德华·卡平特，玛格丽特·邦德弗尔——和许多其他人，母亲是个欢喜忙碌的女主人，我们家每个星期天晚上都“开放”，许多村里人都鱼贯而入，家里谈论更加热烈，音乐、食物和讨论也更加多……艾丽丝·戴克斯的观点几乎是极端的，渐渐地她成了这个地区的知名人士，人们在遇到麻烦时常去找她，所有社团的慈善事业，如儿童养育协会，地方的健康保险等等都由她发起和创始。她也成功地改进了学校的制度，一种新型的现代学校由此产生。艾丽丝·戴克斯是我所遇见的人中最善良的一个，但她同辈的大部分男人都对她敬而远之。她代表了一种激进的力量，用一种生硬和无法使人理解的方式将未来强行压挤到现实之中，她可能，事实上也是，对他们的观点和明哲之言提出异议，并且她敢于自以为是——经常如此，所以我的父亲，我觉得，常下意识地担心她的性格和相似会影响我的母亲和我。像大多数的改革者那样他可以改变整个世界，但又希望他的家乡不受触及。

希尔顿夫人还说，“这个小社团在大罢工和工潮之前以在维多利亚时代和波尔战争之后令人惊异地充满生机而且富裕。在那个西部城市，英格兰几乎重新像我们这样的团体组成，他们是指向未来的先锋，他们的许诺还未得到实现。

劳伦斯的作品继续在《英文周刊》上登载，此刊物的 1910 年 2 月版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鹅市》，在 4 月和 10 月版上刊登了他的一些诗。奥斯汀·哈里森是当时的编辑，另有一个从外交界退役的官员作助手，他是一个动物学家，很有才智，是一个业余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叫诺曼·道格拉斯，其祖先是苏格兰和奥地利的混血。

在劳伦斯以后的全部生活中，道格拉斯是一个有害的朋友。他在劳伦斯去世后的自传中（《回顾》），称他是“一个具有明显的清教徒学识的有才气的乡下人，”他“有时给《英文周刊》杂志社投寄几篇用他那完美漂亮的书法书写的诸如《普鲁士军官》之类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为了在杂志上发表必须删减篇幅，因为它们往往过于冗长，我就是负责从事这种讨厌的工作。”道格拉斯坚持道：“那种盛行的认为劳伦斯是个厌恶人类者的观点是错误的，他是一个具有自然的欢乐气质的人，充满了孩子般的好奇心。他精

神世界的核心并不是世故庸俗的。他用一种温柔优异的动作去触摸世上的凡物俗事……他心灵中有一种本质的东西，一种敏捷的洞察力。”

劳伦斯在《英文周刊》上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鹅市》的背景是诺丁汉，小说中有许多道格拉斯所提到的特点，此故事在一开始就表明了劳伦斯的小说创作技能。他这时期的文章也显示了一种流畅（有时也偏于平淡），而在他的诗作中没有这一特点的。他的诗是毫放不羁的，而且总是这样。劳伦斯的早期作品已经预示了他后来作品中的那种使人大彻大悟充满生机勃勃的特点。

如果说他在 1910 年 4 月和 10 月的《英文周刊》上发表的第二和第三组诗不如 1909 年 11 月发表的那组诗的话，我们应该记住，劳伦斯还只是个处于尝试阶段的年轻诗人，他的努力并不能每次都同样地获得成功。不管怎样，他没有重新发表他几首写得最差的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损失，因为即使是他的最差的诗，其中有时不乏精彩的词句。

1909 年和 1910 年在《英文周刊》上发表的三组诗，1910 年在同一刊物发表的短篇小说《鹅市》和匿名在《诺丁汉郡旦报》上发表的故事《序曲》是劳伦斯在第一部小说出版所发表的全部作品。《白孔雀》是在 1911 年 1 月，即他母亲去世后的一个月，由海因曼得版权发表。

劳伦斯太太是在 1910 年 8 月去雷萨斯特她妹妹埃达家作客时得病的。

劳伦斯在年初完成了《白孔雀》后，又在降星节至仲夏之间写了《侵入者》（当时叫做西松蒙的传奇）的第一稿。在写作此书时，他请求吉西不要去“缠住他”。在 8 月他提出要去钱伯斯家在阿诺·凡尔的新居去作客，这地方是在诺丁汉市的边缘上，他们为他准备了一间房子。他写信给海伦·考克说，当在伊斯渥见到了吉西，她看上去“非常漂亮，非常焦虑不安；她既不想“完全结合，也不想完全分离。”劳伦斯便对她说，他们必须完全分离，他们达成了协议，彼此再不书信往来。但是还不过一个星期，他又给她写信，让她阅读巴里的《感伤的汤米》和其续篇《汤米和格利兹尔》，他说如果她愿意读这些书的话，她也许会理解他的难堪的处境，（从后来对巴里的发现，此话看来颇有讽刺意味的）。此后不久，劳伦斯又给吉西一封忧郁哀婉的信，告诉她他母亲的病情。

在 8 月 24 日他从雷萨斯特给威廉·霍普金信中说“一个肿瘤之类的东西”在他母亲的腹部肿大，医生说情况很严重，在起病后 3 个多月的时间之后，此致命的病症夺去了她的生命。

在劳伦斯得知他母亲在雷萨斯特得病之前，他正在乔治·尼维尔在兰克郡，布莱克普尔的弗利渥和巴罗·英弗尔尼斯旅行度假。他们在布莱克鲁普尔访问了尼维尔的姨妈和叫史梯瓦的姐妹俩，她们俩和劳伦斯是大学的同学，这样，“感伤的汤米”，便忘却了他的烦恼。但当得知劳伦斯太太患了癌症的可怕的消息后，他什么都顾不上考虑了。

对他母亲在 1910 年的那个秋天患病去世的过程在《儿子和情人》中有详细的描述。在《阿姆勒斯》中的许多诗也反映了这一经历的某些侧面。《儿子和情人》在记叙了许多当时的细节，如他同母亲去看病，然后雇车回家，她临终前的卧床不起和死亡的诗作都是劳伦斯直接感受之作，也许就在当时写成的。这些诗中有时也包括一些在《儿子和情人》中出现过的内容，例如，保尔在厨房的炉边吸烟时，用手弹去身上的烟灰，这时他注意到他“衣服上沾着一根他母亲的银白头发。它是那么长！他想把它捡起来，但头发飘落到

烟道里去了，他便让它飘落。那根长长的白发慢慢地飘落，掉入了烟道的黑暗之中。”《悲伤》一诗重复了这一经历，其诗是这样结尾的：

我竟然发现，让我感到内疚的
痛苦，几丝长长的白发
沾在我的胸襟上；我看着它们
一根根飘向黑暗的烟道。

这类诗中另一首《忧虑》记述了劳伦斯在克罗伊登（学校自9月开学后，他只能在周末离开那里）等待他母亲噩耗，当送信的男孩骑车来向他报讯时，这位诗人不知道他是不是感到如释重负，“抑或是一种更深的伤痛，知道/她仍然没有安息。”

在10月，劳伦斯曾要求悉尼·鲍林，海周曼的一个编辑，加快印刷他的《白孔雀》，“我并非为自己考虑。我是想在我母亲的弥留之际能看到它。她实在病得不轻。”14年以后，劳伦斯回忆道：“《白孔雀》的最早的一本终于印出了，我将它放到我母亲的手中时，她已经奄奄一息了。她用微弱的目光看了看书的外部，然后再看了看扉页，然后又看了看我。”尽管她十分爱他，但她看起来不太相信他写出了一本重要的著作。“这个大卫是决不可能征服巨人歌利亚的，又何必作此尝试？就别去碰那个巨人歌利亚了！——不管怎样，她已经不可能再去阅读我的第一部不朽的作品了。那书被放在一旁，我再也不想去看它，她也再没有看到它。”

吉西·钱伯斯说这段时期，当劳伦斯在每隔一周的周末从克罗伊登回家时，他处于“一种极度的压抑之中”，虽然他看上去“还对事物保持着兴趣”，但他“十分孤僻”很显然，“他处于悲伤之中”。他表现出一种丧魂落魄似的惊恐。”吉西说就是最诚挚和最无私的爱也不能打动他，尽管他的兄弟乔治告诉他，露易常到他家中去，在他母亲病中十分体贴关心。”就在这时候，在他母亲去世前的一二个星期里，劳伦斯给吉西写去了那封信，告诉她他打算和露易结婚。

劳伦斯在12月5日写给麦克列奥德的一封信中叙述了他母亲患病期间的直接感受：

母亲的病况确实很糟。这是一种无休止的“我们望着她彻夜长叹——”唉，一个早晨接着另一个早晨在来临，地上积着雪，天空是阴沉沉的，就像这样“早雪带来了寒意，”而她仍弥留在人世，这是一种非常缓慢的恐惧。我想汤姆·赫德的女人看上去虽是悲伤但却是美丽的：至于我的母亲我只能看看而已，她再也不能说话了。她经历了十分困苦的一生，而且一直是乐观的！可是，现在她的脸庞却变成了一付受尽折磨而十分痛苦的面具。她在健康的时候是十分欢快的，脸上只是布满了笑纹，人们决不会知道，这是一种掩盖了其它一切的永久性的神态。我一小时接着一小时地坐在卧室里，因为我是一个主要护士在看护着她——有时我转身向窗外望去，看看花园中挂着亮晶晶水珠的卷心菜，远处田野那边有几匹马，那教堂的塔楼就像一颗黑色的骰子在远处的小山顶上，我发觉自己正在对这些景致发问“这便是你的意思，是吗？”——在她的变化着的表情中，似乎有一种无休止的痛苦的阴影。陈词滥调！……

噢，有一件事我也告诉你，——如果你答应为我保守秘密的话，星期六我去了雷萨斯特。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女友，我与她一直保持着联系——在柯尔时，她是“我的姑娘”，虽然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了，我们从雷萨

斯特去夸恩，露易就住在那里，和我们在一个车厢里有五个妇女，在我们谈得十分投机的时候，火车到达了洛斯利·夸恩的前一站，“你打算干什么，伯特——在圣诞节以后？”露易说。我说我不知道——然后又补充道，“唔，我想我该结婚了。”她抬起头。“你呢？”我问。她感到很窘，并说她不知道。“我想要与你结婚，”我突然说，我能告诉你，这时我睁大了眼睛。她满脸绯红。“你说呢？”我又问。她转脸朝窗外望去，喃喃地说道，“什么？”——“想和我结婚吗？”我问。她迅速地转向我，她容光焕发。“以后吧，”她说。我非常高兴。列车开始刹闸了。“到夸恩了”我说，我的心也沉了下来。她突然将手放到我的手上并偎依到我身上。“我要去洛夫波罗，”她说。那五个妇女站起身来。“我可以在8点10分以前赶回来。”她说。那五个妇女一个一个朝外走去，我们也涌入人流和暮色之中。

于是，我给其他姑娘写了信，也给露易的父亲去了信。她是一个很好的姑娘，和我差不多高，就像一根小橡树那样挺拔强壮（不知你们是否这样形容）——像一颗石榴树那样黑里透红，像一坛葡萄酒那样芬芳醉人。我很高兴向她提出了请求。是什么促使我这样做，我也说不上来，那是一种冲动。但我不能告诉母亲。

我告诉了你是因为我想告诉一个对这事关心的人——而且你不会像有些对我的情况有更多了解的人那样会感到震惊或疑惑不解。那么就让其他人见鬼去吧，我将这样拥有露易。

但我告诉她“我的全部财产只有44镑又2个半先令——这是我的倾囊之财，——“除此只外再无一文了”——这是实话，我再也没个子儿了。

“我也比你多不了一倍，”她对我说，于是我们笑了起来。但我希望我能有一百镑——我想去找一所学校求职，并尽快结婚。

请注意——你经常把一些事情讲给菲利普（史密斯）听。我希望你不要告诉他，如果你将此告诉他——或任何人的话，我会非常生气的。但你可将其他的情况告诉他，因为我不想强迫自己给他写信。

我拿到了《白孔雀》一书的样本——但我想大选以前鲍林是不会将它出版的。书看上去很漂亮——非常漂亮——从外表看：我还没有看里面的内容——是不想看。母亲只是瞥了它一眼。“这是你的，亲爱的，”我妹妹对她说，“是吗？”她喃喃说，然后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她说，“它说的是什么？”——我妹妹便读了一小段题词。母亲说她不想再听了。

我刚刚帮她翻过身——她自己不能动了。“伯特”——她用一种非常奇怪的，孩子般的悲哀的语调说——声音很微弱。“外面风很大。”她还刚刚能辨别外边的声音。地窖和烟囱在呜咽，窗在乒乓作响，你不知道——我希望——死亡有几种程度。我母亲的脸庞——除了双颊，几乎全都是——灰白的，像灰白的天空一样。

两天以前，劳伦斯曾写信给拉歇尔·安纳恩德·泰勒，他曾把此人的诗作在一个文学社中朗读过，他与这位泰勒夫人成了朋友，或至少是一个知己（理查德·丁顿在一封未公开的信中说劳伦斯与她有过一段恋爱史）他告诉她一些关于露易的事情，和一些他家庭的背景（“我的父亲是一块矿渣”）劳伦斯在写给泰勒太太的信中有一段有关他感情经历的叙述：

没有人能够占有我的灵魂了。我的母亲曾占有过它，现在再也没有人能占有它了。再也没有人能进入我的自我，像一团空气那样注入我的肺腑。这次别说我说话太草率了。露易——在葬礼之后，我想能与她结婚——她也永

远不可能完全占有我。她爱我——但那是一种美好的，温暖的，健康和自然的爱情——不像简·爱，莫瑞尔（吉西）便像她，而是像——罗达·弗莱敏和安娜·卡琳尼娜。她决不会将双手浸入我的血液之中，去触摸我的灵魂，使我感到难受和寒冽并要想挣脱。啊哈，今晚我干得不错——非常不错。

在《儿子和情人》中，当儿子的痛苦随着母亲病情恶化而加剧时，保尔和他的姐姐曾想在她的牛奶中放过量的吗啡以“解脱她的痛苦，”然后他俩像两个密谋做坏事的小孩一样笑了起来。除了惊恐之外，他们还是受到了理智的左右。”

在小说中，母亲就在同一天的夜里死去，不管劳伦斯是否在他的母亲解除了痛苦——这一幕安乐死的情节也许是《儿子和情人》中为了渲染气氛的虚构故事——保尔因母亲之死的悲痛当然就是劳伦斯自己的悲痛。

但这个问题仍没有答案：劳伦斯是否杀死了他的母亲？

在林娜·沃特弗尔德的自传中可以找到一个可能的答案，她在1913——1914年之间在意大利和劳伦斯认识。她的丈夫，画家沃伯雷·沃特弗尔德向诗人罗伯特·卡尔佛利·特里弗良描写过他们去弗亚斯车利诺的一次访问，他们在那里去了劳伦斯和弗丽达一起生活的乡村，弗丽达当时已被认为是劳伦斯的妻子。沃特弗尔德在1914年6月8日的一封信中说：“当他告诉我们《儿子和情人》中有关他母亲之死的全部情况是真实的时，我们都感到十分震惊。因为我以为在书中他们并不是为了解除她痛苦才杀死她的，他特别指出她是想活下去的，只是因为他和他的姐姐无法再忍受……”这封公开出版的信突然中断了。

沃特弗尔德夫人在她的自传中《意大利的古堡》中刊登了这封信，她透露了一次与劳伦斯更为详细的谈话。作为伦敦《观察》和其他杂志的长期记者，她报道的可靠性是较大的。她说当她见到劳伦斯时（毫无疑问她是记日记的）她不好意思去提及《儿子和情人》，但他却直截了当地问她对此书的看法。她对书作了高度评价，然后说，“但是”——他问她为何欲言而止，她对他说她认为安乐死那一节“与儿子的一贯性格不符”因为他不忍看她受苦，不是他的母亲想死，儿子的做法是一个错误”。

劳伦斯告诉沃特弗尔德夫人说她是“完全错了”，你知道那是我干的——我给她服用了过量吗啡让她解脱了痛苦。”

沃特弗尔德夫人“感到十分惊讶和疑惑以至于不想再和他争论了。”那天晚上，她问她的丈夫他是否认为“劳伦斯真的杀死了他的母亲。”当他说劳伦斯是将故事作为巨大痛苦的象征时，“她才感到如释重负”。

劳伦斯的母亲是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里下葬的。《儿子和情人》中有可信的叙述：“潮湿的泥土湿亮湿亮的，所有白色的花都被雨水浸透。”儿子和女儿一起站在坟墓旁边，在坟底的一个角落里，可以看到他们兄弟的棺木，然后，装着他们母亲的橡木棺材慢慢地被放置下去，“她已经去了，大雨向棺木倾注，身穿黑色丧服的人们，手执挂满水珠的雨伞转身离去，墓地在飘泼的冷雨里已经空无一人。”

在葬礼的前一天，吉西说，她和劳伦斯“在那些熟悉的街巷间又散了一次步，”他们又谈论了那些老话题。劳伦斯在给摩尔格林水库旁的一个乞丐“匆匆投了一枚硬币”之后，向正在怒气冲冲的吉西解说，当一个人以那样的方式讨得一个硬币时，他已经堕落得相当深了，“当吉西说他不应在他们的关系中拉进露易·伯洛斯时，劳伦斯冷冷地说，他根本不管什么应该不应该”。

然后，在靠近一个矿村铁路轨旁，吉西说劳伦斯“用一种沉闷的声音”告诉她说他一直“像一个情人一样”爱着他的母亲。“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爱你的原因。”

然后，他给了她“一份他新写的三首诗的草稿，”这三首诗后来均发表在《阿姆勒斯》中。这几首诗比任何其他诗都更加直接、更加动人地叙述了到那时为止一直在驾驶他的生活，而且从那以后还持续了一段时间的那种关系的事。

这三首诗——《结局》、《新娘》、《圣母》——都与劳伦斯夫人有关，与吉西毫无关系，她的情况还是像以前一样毫无希望：在那时候，即使是死去了的劳伦斯的母亲还是在驾驭着他。吉西如果是一个根本上与他的母亲不同的人，他还有可能爱上她，但吉西也是一个受意志支配的女人。

（三）旧情的终止和新的开端

在海因曼接受了《白孔雀》在英国出版之后（在休佛和凡尔列特·亨特的建议下），杜弗尔德公司也答应将此书在纽约出版。杜弗尔德先在纽约印了此书，然后将印版送到了伦敦。这便引起了首版纠纷，因为海因曼的编辑们已说服劳伦斯在英国的版本中对其中两个段落作了修改，他们还在另一页上作了一处很小的勘误。除此之外，英国的第一版中有两页作过删略 227—228 页和 229—230 页。第一页上的更正是很小的 227 页上的 mucked（搞糟）一字被改成 adirtied（弄脏）。在 230 页上的更改则比较大。

那被改过的一处在美国版本中的是这样的：“天哪——我们是多情的一对——当她为我画希腊式的塑像时，她会叫我去她的卧室——我是她的克罗顿，她的大力神！……然后，她渐渐地感到厌烦了——经过了三年的时间，她对我已感到餍足了。”这些词句在英国的版本中是这样的：“主啊！——我们是堕入情网的一对——她偏偏欢喜用一种美学的目光来看我。对她来说，我是那些希腊雕塑，天哪；我是克罗顿、大力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她渐渐地感到厌倦了——整整经过了三年时间，她才对我感到餍足。”（1962 年由美国传记作家马休·丁布鲁考利的版本中，则引用了最初的文本。）

经过充分的修改之后，这本书在 1911 年的 1 月份首次在美国问世，（1 月 19 日），比英国早一天。也许是因为西里尔即故事中的“我”感伤纤弱的性格，在《雅典娜神庙》中对此书的评论是这样开始的，“这部小说是出于女性之手的典型的现代小说，”《早晨邮报》的批评家，对此书也作了肯定的评价，也同样指出此书是出于女性的手笔。《雅典娜神庙》的匿名评论人发现此小说采用了“电影摄影手法”（这在当时还是个新词）的手法，但那是不可取的；他承认书中有“对精神世界进行现代研究的高明之处”，但又发现那样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人物都围绕着作者的思维而活动的结果。”

《每日记事》（凡尔列特·亨特），《格拉斯哥先驱报》（凯瑟琳·杰克森，后来是卡斯威尔）和伦敦的《学院报》（亨利·萨维奇）等报刊上都刊登了对此文的友好评论。而伦敦的《星期六评论》则攻击此书的杂乱无章和一些书中出现的“对故事的情节发展无关的”人物和章节，虽然其主要故事情节具有“强度和力度”。《英文周刊》对它的被保护人作了热情洋溢的称赞：“从 D、H、劳伦斯身上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秀，一个显然最值得我们重视的作家……此书也许算不上是一部很好的小说。劳伦斯先生的谈话不免有些冗长；他生活的轨道看来还比较有限，其中有一些颇为累赘的和甚至于是属于乡村庸言俗语式的贫乏之处，但其中不乏一个真正的天才的闪光之笔。”在美国，弗里德里克·泰伯·库柏在《学者》上说，对此小说“相当难以估计”，虽然其中对近乎现实的情景的描写的笔调是严酷的，使人读来感到痛苦。”但是，作者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要讲，此书……给我们留下这样一种不满的感觉，即我们在精神上受到了莫大的压抑。”

劳伦斯曾描述过他父亲得知他得到了此书的五十镑预付金的情形“他用敏锐的目光看着我，好像我是一个骗子。”五十镑！你这辈子还没干过一天活呢！”

《白孔雀》在英国十分成功，以致在 3 个月里又一次印刷，但是，凡尔

列特·亨特后来说的所谓此书“轰动全城”以及劳伦斯当时所说的所谓“几乎全美国”都表示了敌意的说法均属夸张之言。

他那一年的情绪仍处于痛苦之中。母亲去世后，他和埃达觉得无法在伊斯渥面临圣诞节。1910年12月23日，他在克罗伊登写信给麦克列沃：“承蒙你还记得我要的那些拉丁诗；我自己倒已忘了，这些诗现在使我快活了许多，”他并给麦克列沃寄去了“人人书社”的奥卡辛和尼哥勒特圣诞卡，里边写着“祝快乐”的字样。然而克罗伊登离南边的布兰顿仅一站之远，埃达便来到那里与他一起过节。菲利浦·史密斯对那次圣诞假日和劳伦斯在第二年健康的衰退作了回忆：

我在布兰顿渡过了1910年的圣诞节。劳伦斯和他妹妹埃达在同时也来到了此城市。在圣诞节我邀请他俩到我住的旅馆去。那天晚上有一次惠斯特牌戏会，由住店的常客在一些年龄不一的夫人们组对参加。牌戏进行得很缓慢，应该再快一些。于是他建议玩觅便鞋（一种低牌游戏——译注）以及其他一些激烈的牌戏，这使得一些老妇人大惊小叫起来。我在当时第一次听到了劳伦斯奇特的笑声，这笑在后来被引用为（见休克斯利）劳伦斯感情洋溢的典型体现。

第二天，我和劳伦斯在多恩斯漫步了一整天。这一天他畅谈了他文学创作的雄心壮志。他还特意向我保证说，我大可不必担心会作为一个人物出现在他未来的作品文中。他解释他的观点说，那些被安逸平淡的生活经历“惯坏的”人对一个小说家是没有吸引力的。他对一位著名作家的一部近作发表了议论。他称那部作品是一部诲淫文作，并且说，“如果我在写作时不能卷入这件事，我是决不会写的。”

在一家路边餐馆吃午饭时，劳伦斯和一位偶然遇见的旅客在一些小事上发生了争执。我十分吃惊地看着他对那个节节败退的对手发起猛烈的攻击。

在1911年间，他的健康情况变得糟糕起来。他仍然去我家走访，但显然对他的环境变得焦虑不安起来，老一套的日常生活使他感到厌烦。但他始终没有放慢他工作的节奏，因为他觉得在那个时候还不能放弃这样的生活。好久以后，劳伦斯说起1911年是他“倒运的一年”，这一年中“我的一切都在崩溃，只有死亡的神秘和死神在我生命中出没游荡，我当时25岁，自我母亲去世之后，我周围的世界便开始解体，那个美丽的，彩虹般的，但又是子虚乌有的世界已经分崩离析，我自己也是悲痛过度，重病缠身”显然，这一年中他写得很少，出版得也很少，这一年劳伦斯唯一发表的诗作是《闪电》——一位男子在闪电的亮光中看到那位与他作爱的姑娘在避他而去——和一首方言诗《紫罗兰》，这两首诗都刊登在《民族》（伦敦）杂志上。

在1911年2月，伊斯渥的赫尔家发现了他们的女儿艾丽丝，（异教徒派的成员之一）是《白孔雀》中的艾丽丝·高尔。她的丈夫怀特·荷迪奇曾威胁说要打官司，但威廉·霍普金劝阻住了荷迪奇，对他说，既然他是一个教友派教徒，要采取这样的行动是不合适的。劳伦斯第二次将艾丽丝·赫尔放到他的小说中时给她取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名字，比阿特丽斯·瓦尔德——这是在《儿子和情人》中。

1911年的复活节劳伦斯是回家去过的，但他不想去会见他家人和至友以外的任何外人：“你不大能在城里找到我，我可以告诉你，”节前他这样告诉埃达。

这段时间，埃达开始怀疑她所信奉的宗教。劳伦斯此时已放弃了公理会

教，然后又放弃了唯一神教，开始信仰一种独立的教义。他在4月9日，复活节前的一个星期日写信给她：“知道你正在经历一种失去宗教信仰的痛苦，我的遗憾难以用言词表达。”这种情形是难以忍受的，但她一定记得耶和华是犹太人的上帝，“而不是我们的”。劳伦斯觉得“基督是尽善尽美的，但也像我们一样终有一死。现在还剩下一个上帝，但这不是一个人的上帝：是一种巨大的，闪烁着的冲动，这种冲动的波向上指向某个终极，我不知道是什么。”劳伦斯认为“只要对我还有一点好处的话，我仍然要去非国教教堂。结婚以后，我将一个人去。不管人们给他们所崇拜的“他”什么名字，我们都在寻求同一个上帝，所以我们宽宏大量：基督徒，佛教徒，戴克斯夫人，我，我们都在向同一个方向伸出我们的双手。而我们所呼唤的名字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所关心的是，在后来一封信中他说，想不让露易意识到生命是这样一个悲剧。“记着，她还没有看到任何生活的可悲之处，而我们就是在这种可怕的生活中长大的；在上帝的注视之下。”

自从他们从林恩·克劳夫特的住处搬出以后，埃达和她父亲相处得很不好。劳伦斯感到十分遗憾的是他的父亲“竟是这样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使他感到一种卑微，让我自己感到惊奇的是我对他是那样冷酷无情。”他对“这样丑恶和严酷的生活感到厌倦”，这段时间里他在画画，但写作得不多。“我觉得我无法写。”夏天他回到了伊斯渥，住在他姐姐艾米莉家里，8月里，他从北威尔斯，普利斯泰订，罗斯渥的维多利亚大街写信给麦克利沃“我们很愉快地安顿了下来，”这里的“我们”是指一邦人——虽然劳伦斯期望向“加维斯表示一点爱慕之情”，这里是那位现在已被人遗忘的，当时的畅销爱情小说作家查尔斯·加维斯。

几个星期以后，当时正在“到处走动”的劳伦斯来到了雷瑟斯特郡的夸恩，住在伯洛斯家里，在那里他接到了爱华德·加纳特的一封信，加纳特当时是杰拉尔德·达克华斯有限公司的编辑，他以一家美国杂志《世纪》的名义给他写信，征求小说稿件。这是一段重要的友谊的开始。劳伦斯早期的提携者休佛，用劳伦斯的话说，“让我独自去划我的独木舟，”以至于“使我险些倾覆落水，”但加纳特搭救了他。

这时候，劳伦斯正着手创作那本后来成为《儿子和情人》的书。从1910年10月18日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已经写完了“我的第三部小说《保尔·莫里尔》的八分之一，”此小说的构思是十分有趣的（对我来说）。当吉西·钱伯斯在1911年读了这部小说的第一稿以后，她觉得此书矫作生硬，便建议劳伦斯重写，使故事更接近事实，他请她写下她所能记忆的他们早年的生活，但是还没等她能给他送去提纲，她得知他已经病得很重了。

吉西可能看过那部手稿，即在1937年举办的劳伦斯展览的项目中，劳伦斯·克拉克·帕威尔描述的那一部。在这部手稿中，“父亲在误杀了保尔的兄弟之后，被关进了监狱，并在出狱后不久便死去了。”此手稿中的这个故事无疑是根据劳伦斯家族的一次事件写成的，据劳伦斯的侄女玛格丽特（帕戈）·尼德汉夫人在1975年说，劳伦斯的一个叔叔确实在一次吵架中杀死了他的一个儿子，他用拨火棍击中了他儿子的耳后部，使他当即死亡。父亲就以误杀罪被判刑入狱数年。

吉西·钱伯斯不仅看过《保尔·莫里尔》的这部手稿，她很可能后来还看过其他一些原稿。这些手稿中有许多页丢失了；其中有一部缺了250页，另一部缺了40页。后一部也许写得更早一些，其中保尔和米丽娅姆还只是以

孩子的形象出现。米丽娅姆的母亲是一个“知名的基督教徒，”她丈夫是一个叫艾伯维奇镇上的杂货商；保尔在乘坐一辆雪橇时倾翻了，受了一点轻伤，他还时常气管炎发作。另外一些手稿中，也许是后来的残稿，保尔祈祷说，“主啊！让我的父亲不要再喝酒了，”有时他说，“或让他死在矿井中吧。”在《儿子和情人》的最后一稿中，保尔的祈祷变成了“不要让他死在矿井中。”在晚于陈列在得克萨斯大学的两部手稿的一部手稿中，保尔和“一个华而不实的男孩”，艾列克的关系密切，这男孩的姓有时叫格林哈夫，有时叫理查兹。”这两个孩子，一个（艾列克）是精力充沛，大手大脚，聪敏但没有想像力，另一个则长得纤细娇弱充满好奇和怀疑，“他俩开始相处得很好，艾列克像是头，保尔则总是服从。”但渐渐地这种平衡起了变化，”艾列克本来常这样说，“我们今天上午去游泳”现在却开始这样问了，“保尔，你想去游泳吧，或许你不想去？”此时保尔仍很年轻，他和他的母亲常为米丽娅姆而发生冲突，而米丽娅姆则最相信她最终会得胜，因为莫里尔太太“已经老了”。所有这一切叙述描绘得都十分糟糕，难怪吉西·钱伯斯会提出强烈的批评。

在劳伦斯的“倒运年”中，他不仅因母亲去世而经受了巨大的痛苦，而且也因为要用他有限的精力去应付使他厌倦的教书工作和他的创作冲动而感到疲惫不堪。在寒冷的秋季，他身体的因素也对他不利，他这次重病的起缘可能是因为有一次从加纳特家走访回来时挨了雨淋。

在他与加纳特的友谊不断加深的那个1911年秋季，劳伦斯常去西内，即加纳特在肯特·艾登布里奇附近的宽大的乡村别墅，去渡周末。有一天晚上，他雨中在一个火车站等火车，这便加重了他已经患了的感冒，继而发展成了肺炎。他在11月7日写信给加纳特，“近两周来我感到情况很糟——是因为学校那些管道的干热和劳累——我必须离开学校，真的。”在大卫森学校的记忆日志上表明，写此信的日子正是劳伦斯给他的班级最后上课的那一天。

埃达接到了她兄弟病重的电报，便立即动身去伦敦。海伦·考克到玛丽列伯恩去接她，然后就和她匆匆赶往克罗伊登。她发现劳伦斯病得很重；在12月中旬以前他甚至一直不能“坐直一个小时喝点茶。”直到29日他才第一次起床走动，左腿还因患了神经炎而疼痛。

在圣诞假日期间，中西部有几个人来看他：他的姐姐艾米丽带着她的小女儿，吉西·钱伯斯和露易·伯洛斯也来了。“圣诞节过得不错。”但是，劳伦斯在12月17日的信中告诉加纳特，“医生说决不能再去学校，否则我将得肺结核病。”因此，他打算请长期病假：“那样如果我穷愁潦倒的话，还能再回来。”与此同时“校长因我的长期缺勤而十分焦虑。他知道他很难找到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去给他上课。”

康复期间，劳伦斯在1912年初开始创作那本后来叫作《侵入者》的小说。劳伦斯告诉加纳特说他已经“写完了第一章——觉行越写越好。天呢，我还大有完善提高的余地！两年前我是那么的年轻——几乎是年轻得可怜！（与此同时，吉西·钱伯斯正在写一部小说《早熟的樱草花》后来称为《尤妮斯神殿》她后来毁掉了这部自传体作品的手稿，后来在1935年她取材于此书以E.T.的笔名撰著了她的劳伦斯回忆录。）

劳伦斯随着健康的恢复，继续创作他的《西格蒙德》（即后来的《入侵者》）在1912年的1月6日，他到波恩茅斯去了几个星期，九日，他从那里写了一张明信片给他校长的妻子：“这幢房子很快乐——有45个老人——

群有影响的老而固执的老妇人——但不管怎样，也有一些很好的年轻人，十分达观快乐。”24日那天，麦克列沃收到了一封关于这位迅速恢复中的病人的详细情况的信，从信中可以看出他的寄宿之处及周围环境（在圣彼得街的康普顿公寓）并不单调乏味：

我在弹子房给你写此信，这里有个小个子芬兰人（今天他的21周岁）与一个南非来的老绅士打台球。我就经常生活在这样的恐怕中：担心有一根弹子棒插入我的耳朵或一颗弹球击中我的眼睛。我也与斯克里文饮着苏格兰威士忌庆贺我们的相交——在他的房间里一直喝到凌晨一、二点——以至于我像冷茶一样麻木无知。

那些老妇人们继续在充当我的母亲——那些年轻的——则充当我的姐姐。那些男士们十分友好，但现在几乎成了绝对戒酒主义者。上星期这里来了一个伙计，我与此人玩得不错，在星期五他与他妻子大吵了一场，因此，他与我一起外出去了普尔港，在那里他还继续大发雷霆。我当时极不愉快，当我回到这里时他还是没完没了，用童车推着婴儿朝基督教堂路走去——想乘上一辆私人汽车开走——在中心旅馆前差点与人打起来，使我们不得不全体出动。我们有四个人，手挽着手，大摇大摆地走过这里的大街，人们像兔子一样躲闪而去。形势颇为激烈，最后，我不得不将所有那些他们强要我饮下的酒泼到地上，不然的话，我担心我会像他们一样酩酊大醉。

然后，在一场长久的超乎常人的搏斗之后，我将他送回了家——他是一个身材高大，体格魁梧的35岁的约克郡人，很有钱，曾在军队里干过，——我，我必须得忍受住杰肯森太太的大吵大闹，我很欢喜她，她年轻，漂亮，游历过不少地方——并常和我同桌用餐，我十分真诚地希望在星期五晚上沐浴在遗忘河温柔的水流中。

然而，现在我已得到了谅解。今天这里下雨，天气马马虎虎，还从未冷过。我很难说什么时候回克罗伊登——如真要回去的话。但以后我会告诉你的。我想我再不会回到大卫森去了。

劳伦斯在2月3日下午两点离开波恩茅斯，4点到达滑铁卢车站，他先给海伦·考克去了信，告诉她他正要回加纳特家去，并建议她在维多利亚车站等候他，再回到克罗伊登。她在维多利亚车站见到了他，在那里用了点心；他看上去身体不错，并说他能不再回到大卫森去很高兴。海伦在火车上逗留直到过了克罗伊登站，一直陪他到了华尔汀汉。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拘谨，一直谈着一些轻松的话题——然而，他们是在一种永别的气氛中分手的，这时北多恩斯已处于最后的一抹暮色之中。虽然劳伦斯和海伦在以后的几年中还通过几封信，但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然而，在他出版他的《侵入者》之前，他必须征得她的允许，因为这部小说的部份是基于她的一些手稿写成的。海伦和劳伦斯曾在1910年达成过协议，即这本书在五年内不出版，但现在她却慷慨地答应在他的第二部小说中写入那段故事，因为她知道他需要钱。她自己的小说《中间地带》的第三，第四章中也用了同样的材料。这部小说几乎都是在1918年写成的（于1934年出版）只是海伦·考克在一封信中向本书作者解释道：

唯一写于《侵入者》之前的那部份《中间地带》的手稿出现于《中间地带》的227页至236页。这五天简要的日记是劳作品的灵感之源，在最初的达克华斯版本中，他将其补充增加到193页。除此之外，他使用了一些未成文的题材并引入了一些假想的人物，其中有两个人物是取材于他学校教师中

的两位同事。劳伦斯是那么紧密地将他自己等同于西格蒙德，以至于，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身临其境。此书非常接近于生活，而在那个超人的视野平面，生活的操纵是危险的，而且因为由于对人类的泛化而本能地避免了。后来，当感情的冲动平息下来，并由休佛·海因爱公司体面地进行了掩饰，劳曾想用理智的步骤对此书进行重写，以至于得到了你评论中提到的那种结果：“《侵入者》的行文常显得凝重粘拙。”但我们应该记住在修此书的时候，劳伦斯处于病后恢复阶段，他的精力正处于低潮。

像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样，劳伦斯也常摘录报纸上的故事用到他的小说中去。如西蒙格的死，他就是借用了海伦·考克的老师，卡尔·罗菲剧团的著名的音乐家赫伯特·麦克卡特尼的一些情况，此人戏剧性的自杀在数年前引起过报界一次小小的轰动；他自然借用了考克小姐写的《中间地带》中有关此事件的记录。劳伦斯还将许多朋友的相片插入小说的空角之处。克罗伊登的好几位教职员发现他们在其中充当了一些次要角色：凡尔列特·玛丽·巴贝奇变成了奥列维娅，两位男教师，R.H.阿尔温和欧内斯特·汉弗雷斯则以阿尔鲍特和赫列代的身份出现，在对其中第三位人物的描写中，劳伦斯给我们提供了他在克罗伊登的最好的朋友、A.W.麦克利奥的一些情况：“麦克渥特先生是高大的个子，皮肤白皙，身体微胖，他谈吐娴静，幽默而友好，而且学识渊博，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从不失态，在他友好的态度中总保持着一种绝对的分寸。

劳伦斯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侵入者》的最后一稿，至4月5日，他已经在伊斯渥进行勘误。此书在劳伦斯离开英国后的5月份出版问世。在匆忙之中，小说有趣地被人误用了别名。杰拉尔德·达克华斯不喜欢《侵入者》这一书名，在劳伦斯所建议的其它书名中——《西格蒙传奇》《男人和梦幻中的女人》，《赛西利亚的侵入者》，《罚物游戏》——达克华斯选中了最后一个。但达克华斯估计读者可能不了解此书，劳伦斯以前建议的书名便被忽略了。

与此同时，他正在继续创作他的矿镇小说，二月的晚些时候，他写信给爱德华·加纳特，他这时将他恋爱的细节毫不掩饰地告诉了他，他说他和埃达在一个晚上去“杰克斯德尔——一个几英里以外的矿村”去参加一个舞会……“我妹妹发现我与她的一个女友吻别——她是一个那样活泼可爱的小姑娘——我们的接吻是那样热烈疯狂——使周围人都感到震惊，引起了不少义愤，然而——这里的生活十分浪漫”。劳伦斯已毋须再补充说他过得“很好”。

在3月上旬，他可能给加纳特提起过有关他的一位老校友的情况，“那位我曾与你说起过的堂璜式的人物”——此人在五年前因生了一个非法孩子而使伊斯渥的年轻人吃惊不小。现在，乔治尼维尔又生了一个孩子，他向劳伦斯描述“这孩子叫吉米，是个很好的孩子，”这是他秘密结婚三个月后的产物。当地学校的行政当局把他从他的老师位置上撤除，“将他派到斯塔福——德比边界地区当个学校小头目，”他在那里很孤独；他恳请劳伦斯去那里看他。

当劳伦斯离开克罗伊登去波恩茅斯时，据艾弥尔·德拉芬内传记中他的一封信中所称，他的房东J.W.琼斯叫“劳伦斯彻底清点行装，好像我和他就要永别了”。考尔华斯街的这种气氛在他的小说《老亚当》中有所表现，此小说中，一位年轻的房客感到他与房东太太之间有一种荡漾的情波。房客

瑟文在帮助房东抬一只重箱下楼时伤了他，汤玛斯先生便迎面揍了他一记。第二天早上，他们看上去更像朋友，而不是一般的熟人了。汤玛斯太太感到有点沮丧。一位初出茅庐的评论者（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如果你没有了解劳伦斯的全部，你就不可能了解他的部份）认为这篇小说写于 1910——1911 年之间，是有关劳伦斯，欧内斯特·威克列以及威克列的妻子弗丽达的事情，但这故事是写于劳伦斯认识弗丽达的前一年。看起来，劳伦斯在故事中对汤玛斯的描绘——“他的咀很小，并有些神经质的抽搐”——与他在 1911 年 4 月 19 日写给露易·伯洛斯的信有些关系：“琼斯先生剃掉了他的胡须，我不欢喜他。他长着一张小而尖的咀，像一张绷紧的皮上的一条裂缝。看上去很奇怪。这表现了我所发现的他的性格特征的一部份：吝啬，精明和神经过敏。我觉得我实在不喜欢他，我以前对他的印象倒还不错。”

J.W. 琼斯，在 1936 年的一封信中提到，他要劳伦斯病后永远离开他的家，他还说，“劳伦斯与四个女性有交往。一个与他之间是一种拍拉图式的关系（确实如此）。一个因为在精神上惧怕他而和他分了手。一个常取笑他，并带着他经花园走进后门，要我对另外一个进行描述，我会感到羞愧。”

劳伦斯所描述的他离开克罗伊登的情况与琼斯所说大不一样。当老师第一次允许在床坐起后，他在 1911 年 12 月 9 日给露易·伯洛斯写信道，“我现在想离开考尔华斯了。我想离开琼斯太太，琼斯先生和他的孩子们。”两天以后他说他“已经剃掉了我的胡须，”这也是第一次。他第二次蓄须是在 1914 年的一次生病期间。

J.W. 琼斯信中提到的四个姑娘中那一个是露易很难猜测。在 1917 年早些时候劳伦斯写信给吉西·钱伯斯和海伦·考克的信中都提到了他与露易的关系濒于破裂。他告诉海伦·考克，“那个平凡的，普通的，相当浅薄的我确实爱着露易……但是，难道你不认为那个有敏锐目光的，悲伤的，有批评精神的，观察力深刻的我，不一定非得将自己痛苦地置于卑微的地位，去接受那种男性的，愚蠢的，注定的负担。”其意思是说，每个人实际上都生活在孤独之中。“我们在一生中可能有一个真真的伴侣——在此之后，我们也不时地有所交往，但不再虔诚。”此话听起来有些像《恋爱中的女人》的伯金年轻时所言。正似詹姆斯·波尔顿教授评述的那样：与写给布兰什·简宁斯和拉歇尔·阿纳恩德的信相比，劳伦斯写给露易的信是在认为她有一种很不成熟，很不平衡，缺少活力的个性。”

1912 年 2 月 4 日，劳伦斯从加纳特的乡村别墅写信给露易，说他正在反复寻思克罗伊登和波恩茅斯的医生对他说的话：即他不能结婚，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也许永远不能。而且，现在他已不能以教书来维持生计了，所以他也养不起一个妻子。因此，他要她和他解除关系。他觉得他的病改变了他。并且已经“打破了许多长期以来制约着我的束缚。”他征求他妹妹埃达的意见，她也说应该解除婚约。他在 2 月 6 日写信给露易时说到了这个意思。

露易让劳伦斯给她去份电报，他没有这样做。他在 2 月 7 日告诉她说他认为他没有“可结婚的真正的爱情，你不这样认为吗？”

在 2 月 10 日星期六，他提议于下周二，13 日他们在诺丁汉维多利亚车站见面。“说来凑巧”，那一天将是露易 24 岁生日，在星期三，他告诉她，他要去诺丁汉见戴克斯夫人。

不管怎样，劳伦斯和露易将他们会面日子提前到了 11 日。在 15 日，劳

伦斯在信中对她说，他很高兴他们仍能保持“朋友”的关系。她不必还给他那枚他送她的别针，以及其他一些在他“高兴的时候”送她的小东西。她可以继续保留他的书刊。

2月12日，他写信给加纳特：

我昨天见到了露易，她相当 ikey（狂妄）（形容词——自负自得，盛气凌人的样子）。她早有打算，认为嫁给我的话太便宜了。所以他认为这样她就可以变得身价百倍。后来，她还在每句话的末尾的那个词使我感到生气——谢天谢地。如果她更热切一点，更温柔热情一点的话，我可能会是一个丧魂落魄的人。我常常带她去古堡，那里有一所艺术学院举办的展览——展品十分精彩。她盯着那些裸体的男子塑像，直到我不得不向另外一个展厅走去——她给我专门讲述了做模型的详细过程——为什么有些粘土制品能存放持久而有些则不能——我只得谎称我碰上了一个我十分讨厌的老熟人。记不得，哦不，是对上一次我们去古堡参观之事毫无印象了，尽管她知道得一清二楚：认为我是个傻瓜，因为我说了，城市的影子在雾中看起来迷朦缤纷，非常惊人——以及如此等等。我带她去了一家咖啡厅，在喝茶和吃吐司的时候，第四次告诉了她。当她开始咯咯傻笑的时候，我冷冷地问她有什么有趣之事；当她开始哭泣的时候，我要了一杯茶，那情形十分有趣。我心中似有一团疑云——一种真真的黑暗之感，轻轻地在颤动着升起。我似乎成了一种非人的物体，没有五脏六腑，从黑云中向外张望。那是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我送她赶上了5点零8分的火车，十分宁静。她非常愤怒和失望，谢天谢地。

这里还有“一些余波——使我吃惊不小——我将以后亲自告诉你。那不适于写在纸上。”那“余波”是什么，我们也许永远也不得而知了。在2月4日给露易的信中，劳伦斯看起来在使自己摆脱那婚约中，表现得更像女子而不像个男子。

除了几张明信片 and 几封短信以外，这是露易在他最后一次见到他。许多年之后，她曾回到过第一次大战中劳伦斯和他妻子居住过的考恩瓦尔小屋。当他的遗体还葬在法国南部的文斯时（在1935年，他去世5年后迁葬美国并在那里火化立碑之前）露易莎·伯洛斯曾两次去扫墓。其中一次被弗丽达·劳伦斯的女儿巴巴拉发现，另一次是赫伯特·里德爵士注意到的，他可能正好去文斯参观马蒂斯的大教堂。里德认为，露易“显然从未忘却她对劳伦斯的热爱和崇敬，”而吉西·钱伯斯却从未有过这样的热情。他发现她是“一个容易气馁而又头脑清醒的人，我认为她一定觉得是劳伦斯错待了她。”

劳伦斯显然是抛弃了她，尽管她对他有肉体上的吸引力。她所缺少的是吉西·钱伯斯的那种精神上的深度，而对于后者，这种深度又过于单一极端，以至于使劳伦斯也离她而去，但他与露易的关系中断得比较快。在他1911年晚秋重病期间以及其后，他给她的信变得越来越琐碎了，几乎不大谈论文学，艺术或音乐了。到下一年的2月他给她寄去了前面谈到的那封信，信中他确切地说明了他要结束他们的关系。这样，他正在无意识地使自己准备结识另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可与他那种难弄的性格之间建立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正似他后来一本小说中的一位男子所言，“两颗星平衡共存。”

早在1916年3月6日，劳伦斯说起他可能要去德国。两个月后，他真的到了那里。

与此同时，他必须中止他和大卫森学校的关系，此学校的记事册上直到1912年3月9日还注明着他是那里的教师之一。菲利浦·史密斯曾邀请他回

去，史密斯和全体教师们给劳伦斯寄去了一些书，对此，他后来在 4 月 22 日的信中表示了感谢。但是显然在这以前不久，在一张未注明日期的从诺丁汉寄给麦克列沃的明信片上，劳伦斯写道：“这些书很好——我简直差点要哭出来——不过在一个饭馆里这样的话实在是太滑稽了。我很想回到大卫森，如果那里没有孩子——或至少减一半就好了。”

在 4 月初的一天，劳伦斯去诺丁汉的欧内斯特·威克列教授家吃午饭。他想见见他这位以前的法语老师，因为他想得到他的指点，或者也许是帮助。也许威克列教授和劳伦斯的姑夫弗里兹·克伦柯能帮助他在一所德国大学里找到一个职位，如在莱克多斯德尔大学之类，做“一名教他自己国语的外籍教师。”当然，劳伦斯想放弃教书职业，但他认为，在莱克多斯德尔这样的一所大学任职，也许不至于像在克罗伊登当小学教师那样会损害他的健康：他可能觉得大学的日常工作不那样令人厌恶，他也不必再去管那些小孩子了，至少威克列教授可以告诉他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因为威克列在剑桥学习时，曾在好几所大陆学校进行过研究，他曾一度在弗雷堡的莱克多学习。他就是在那里与弗丽达·冯·里奇索芬，一个比他小 15 岁的德国姑娘结婚。

欧内斯特·威克列的家是在诺丁汉的麦帕雷区，离阿诺·凡尔农庄仅一英里左右。劳伦斯以前曾去“麦帕雷那边”看望他的哥哥乔治，但乔治没有在帕兰维特路的维多利亚、克利森特这样一个高雅的街区住得很久。

许多年以后，弗丽达描述劳伦斯来到威克列家的情景，“一个瘦长的身体，行动敏捷，腿长步轻，动作干脆利落。他看上去是那样朴素单纯。然而，他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家伙？”

弗丽达将这个“家伙”带进了她的客厅，他们在午饭前便在那里闲谈了半小时。法国式的窗打开着，窗帘在春风中舞动，孩子们的声音从草坪上传来。劳伦斯对闲谈从来不感兴趣，突然开始攻击起妇女来：他已经和她们没有关系了，也没有要去了解她们的意图。他的这些话至少立刻引起了她女主人的注意，她是一个与他认识的任何女人都大不相同的人。她身上具有比英国女人更多的光彩：她有一种大陆人的自信的神态和一付沙哑的，声调奇怪的嗓音，她可以在片刻之内从老持沉重的态度变成孩子般的热切的样子。从体型上看，她是一个体格高大的金发女郎，颧骨很高，微绿的眼睛，脸上有些褐色的雀斑。劳伦斯在午饭时仔细地打量着她，看到她对她丈夫不太注意。在她的热情挽留下，这位客人一直逗留到天黑才穿过黑暗的农田，步行八英里回家。

他在那一年的 4 月 7 日复活节又去看她；与此同时他也给她去信，称她是全英格兰最了不起的女人。她在回信中则问他认识多少英格兰女人。

弗丽达在遇见劳伦斯的那段时期，如果还不是感到不愉快的话，也正陷入一种麻木状态；正如她后来所说，她当时好似在生活中梦游。她曾熟知米特勒罗巴，扩张大德国的卑士麦克，和凯萨的宫廷，现在她 32 岁，结婚已经十几年，并成了英国郡县的居民。她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孩，一个男孩，一辆轿车供她支配，以及在麦帕雷地区的漂亮住宅。但是，她感到厌倦。即使是她偶尔的情场风流也不能使她清醒。生活并非一直是这样的：她曾一度拥有过德国的广袤的森林和草地，柏林灯红酒绿的舞厅，年轻军官们的追求和香槟酒宴，而现在这个欢乐的公主成了一个 Hausfrau（注译：家庭主妇）

如果说玛丽娅·弗丽达，乔安娜·威克利——里奇索芬不能确切地算是一位公主的话，像许多有爵位的德国贵族一样，她至少是一个女男爵。（这

位矿工的儿子得到的印象十分深刻：在一些时间以后，当劳伦斯在使用她的文具的时候，他特意让他的收信人注意信笺上冯·里奇索芬的盾形纹章。）实际上，这个家族并不是一个古老的贵族之家，因为其爵衔仅可追溯到两个半世纪以前；但这是一个显贵的家族，其成员在新王朝中占据显赫的地位。此家族的祖先可追溯到一位叫塞缪尔·斯奇米特的平民，一个柏林北部农庄上牧人的儿子，1562年被一个地位显贵的贵族收养：塞缪尔·斯奇米特的孙子在1661年成了波希米亚的一个骑士，并改用了冯·里奇索芬这个名字，这位第一个冯·里奇索芬便是弗丽达的六世曾祖父。她回忆道（在1953年12月8日的一封信中），“里奇索芬的原意是Richter（法官），因为在盾形纹章中是一个身穿黑衣的法官坐在椅子上——但他们非常信教，近乎神秘。”

弗丽达的一个远房叔叔，弗丁南·冯·里奇索芬（1833——1905）是一个著名的地理学家和亚洲探险家，还有一个远房的表兄弟，曼弗雷德·冯·里奇索芬（1892——1918）后来成了个伟大的战争专家。但此家族的大多数男性成员都是外交家，例如她父亲的叔叔，曼弥尔·冯·里奇索芬曾是驻瑞典的大使，以及他的儿子奥斯瓦尔德（1847——1906），曾是外交大臣和普鲁士大臣。当然，此家族的另外许多人从事照管他们的土地。有些冯·里奇索芬在西勒西恩·兰吉思索拥有产业，他们为自己拥有数公顷的粮田和成群的美利奴绵羊而自豪。这种绵羊自弗里德里克大帝首次引进这些省区以后得到了很大的改良和增产。这些冯·里奇索芬们都是些性格豪放的骑手，他们在奥德湖钓鲑鱼，他们在卡帕希恩和莱森格·伯格一带的森林里围猎野猪和牡鹿。

冯·里奇索芬家族的大多数人在当时都过着富裕的生活，然而他们经不起弗丽达曾祖父路德维格（1770——1850）和他的儿子路德维格（1800——1880）在投机生意时的失败，特别是再加上当时降临到他们头上的灾难。那位老路德维格将家族的一大部份财产投资到甜菜生产上，这在当时是颇为合理的投资，因为当时拿破仑一世的政策使得整个欧洲的糖价上涨；而拿破仑一世的倒台导致了糖价的下跌，并几乎完全毁掉了西里西亚的这一新兴工业。因此在工业革命初期的这场灾难中，冯·里奇索芬家族的这一族系几乎丧失了所有的钱财，这和诺丁汉比阿德骚家族没落的情况十分相似。弗丽达在1953年回忆道：“我父亲，或确切地说我祖父的寓所，一幢小城堡叫拉休瓦，仍是个甜菜场的中心，在我认识的里奇索芬的男子中，我所欢喜的是他们的独立性，都是些异乎寻常的人。”弗丽达这一族系的里奇索芬们后来还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灾祸，那是在一次暴风雨中，大群绵羊被闪电击死。因为这个，弗丽达的父亲，据他的女儿艾尔丝·吉菲·里奇索芬所说，这位在战场上有过英勇战绩的军官，一辈子都惧怕雷阵雨。

人们常常提到这位弗利德里奇·冯·里奇索芬，出生于1945年，是一位将军，并说他曾担任过艾尔萨斯——劳里恩的军事行政长官。他实际上根本不是一个将军，在曼兹时，他是一个文职官员。他自1862年开始了他的军队生涯，尽管有两个姑娘违反禁令，在去军营对他和另一位军官的探访时，因炉子中的煤气溢出而中毒死亡，但他还是设法保持住了他的军职。（劳伦斯将此事作为中心题材写入了他早期的一篇故事《致命的缠绕物》）。

弗利德里奇·冯·里奇索芬，后来参加了普法战争。在1970年夏季至早秋期间，他参加了斯彻斯堡的合围战役，并参加了这一地区的其它一些战役和小战斗。他留下了一本日记，里面记叙了直到那年年底的一些事件，日

记中记录的几乎是连续不断的行军，白天处于炮火之下，晚上在乡村野地宿营，激烈的吵架和欢乐的乡宴，对雨中行军，遇到难民，同一军团里军官间的决斗，自杀，葬礼，开小差以及在被攻克的城市里听柏辽兹音乐会等等都有详细记叙。时不时地，作为一个卑士麦克的年轻的帝国创建者，这位年轻的男爵的行为举止与劳伦斯短篇小说中的那位普鲁士军官颇为相象。11月10日，“今晚在豪斯有一个疯狂的场面，我用我的军刀抽打一个炮兵军官，”11月11日，当这位男爵在他的军营与人玩牌饮酒的时候，“海因里奇（他的勤务兵）喝醉了，我揍了他一顿。”其次，还有一些有关下雪，雾霭，行军的描写。在元旦，这位男爵受伤被俘——也的伤使他的右手残废，这使他不能再继续在军队服役。

弗丽达除了德国血统之外，还有法国和波兰血统：她在一封信中对本书作者解释道：“我的母亲叫玛奇耶，本是法国人，她的祖先据说是在法国革命时躲在一辆干草车里逃到黑色森林的——我的里奇索芬家的祖母是一个波兰的女伯爵拉休斯卡。”弗利德里奇·冯·里奇索芬夫妇有三个孩子，都是女孩。劳伦斯在1912年的一封信中对她们进行过描述：“里奇索芬一家是个令人惊异的家庭——三个姑娘——妇人——最长的是个社会经济学博士——也是一位教授——其次是弗丽达——然后是最小的一位——28岁——非常美丽，有一种相当出色的，从容不迫的社交才能。他们是少见的一家——父亲是个很老的贵族——母亲几乎没有什么道德准则，十分和善。”最大的女儿艾尔丝，曾在劳伦斯和弗丽达的关系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后来成了他的德文翻译。（《虹》一书就是献给她的）。在弗雷堡的一所精修学校和曼兹的一所师范学院毕业以后，艾尔丝成了黑德尔堡大学的第一批女学生之一，她的博士论文是关于政党和社会保险法律之间的关系，是在著名的经济学家麦克斯·韦伯的指导下写成的。艾尔丝与她在黑德尔堡的一位老师，埃德加·吉非博士结了婚，他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教授，在1910年，他们迁居到了慕尼黑，在哪里的一所大学供职。她后来成了麦克斯·韦伯的情妇。

虽然，冯·里奇索芬的家是个新教家庭。但弗丽达和她的妹妹乔安娜（“纽奇”）开始接受教育时是在曼兹的一所半法式的天主教女修道院。弗丽达的丰富的感情——对此那些在她七十多岁时认识她的人也有深刻印象——在当时正处于鼎盛时期：“我那时是个野孩子。”她后来写道，“她们无法驯化我，那些温和的嬷嬷们。”弗丽达和乔安娜然后进入了曼兹的女子高中。艾尔丝回忆说，那时候的弗丽达并不是“书卷气”十足的，尽管她有一本十分喜爱的，并经常流着泪阅读的小说：《简·爱》。

当弗丽达17岁，纽奇15岁时，她们被送进了黑色森林附近的，由莫拉维安兄弟创办的精修学校。弗丽达不想离开她的家——那所在曼兹城外的，她在那里从小长大的。被花园、果树和高墙环绕着的住宅。这所房子和它的环境充满了欢乐的回忆；有一次，在凯瑟生日的时候，这位男爵的军团老友们重温了他在1870年的战争中获得铁十字勋章的情景。然后，那些士兵们将弗丽达的父亲抬到了他们的肩上，扛着他走遍了大厅，这时她的“心兴奋得剧跳”，她觉得，“我父亲是个多么了不起的英雄啊！”

约翰·密德尔顿·莫里谈及过一些有关弗丽达和她父亲之间的关系的情况，很可能这些情况是他从弗丽达那里听来的：弗丽达是个完全解放型的妇女。她十分推崇两性平等，而且在这方面还稍有些过头。她也从她父亲那里直接体验到了“男性的权威，”这不仅仅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普鲁士贵族家

庭之首，而且还是 1870 年战争之后。曼兹的第一位普鲁士军事长官（原文如此）。但是，除了这些堂皇的外观之外，她对“男性权威”的感受也是一种“男性权威”正走向崩溃的感受。在家里，男性的不负责任似乎成了一种权利——赌债累，等情况——以及，作为他和妻子之间不可避免的冷谈的补充，他不负责任地娇惯宠爱他的女儿们，她们也知道他的秘密，并对他的所作所为付置一笑。

在曼兹，弗丽达常受到附近军营中士兵们的赞美而感到高兴；他们常邀请她和纽奇去参加他们的圣诞宴会，宴会上，香肠，姜饼，雪茄烟都挂到了圣诞树上，还有士兵们为两个姑娘刻制的小木偶。在她年幼的时候，弗丽达说，只有男孩和男人们才给予她所需要的乐趣；妇女和女孩子们都使她害怕，“欢娱和社交活动”都不能使她满足。当她和她的男孩子朋友们在曼兹的工事里游戏时，她是最高兴了，在那里的伏本的工事地带，士兵们曾建造过小茅屋和战壕。（她对这些工事的兴趣后来使劳伦斯感到窘迫。）

在黑色森林的莫拉维安学校，弗丽达和纽奇都信了基督教，弗丽达对她的一位老师产生了女学生式的迷恋。当她的感情得到报答时，她感到害怕起来。在 17 岁时，她很高兴能离开学校“走上社会”，在这里，这意味着她将在柏林的奥斯瓦尔德·冯·里奇索芬，她祖叔父的儿子的家里客居一年。那时，奥斯瓦尔德是付国务大臣，后来很快成了国务大臣。对这位漂亮的年轻姑娘来说，这是难以忘怀的一年：她叔叔在梯尔加特恩宽敞的宅邸，驾着马车在大都市平坦的大街上行驶，在恩特·德安·林登的咖啡厅和酒吧，上演着从斯奇勒到斯奇尼兹勒剧团剧目的大戏院，皇家歌剧院上演的瓦格纳的不朽作品，在皇家宫殿举行的舞会，就是在这样的一次舞会上，当时纽奇也在柏林，凯萨皇帝问“那两位年轻的女士是谁，”当别人告诉他之后，他说，“啊，付国务大臣先生原来还有这么漂亮的侄女！”

也许“欢娱和社交活动”并没有真正引起弗丽达的兴趣，但那些宴会，乘马车游玩和去剧场看演出等都有男性作伴。艾尔丝记得，弗丽达当时是天真无邪的，相信“男人们的优点”，虽然她看上去欢乐无忧，但她对他们相当认真，而且，她觉得她有“使命”去帮助任何一个在当时引起她兴趣和同情的男子。他们中间的有些人想要娶她。比如卡尔·冯·马勃尔中尉和她的表兄柯特，但这位表兄娶不起她，因为她不是财产继承人；这对一个年轻军官来说将是一个很重的经济负担。在劳伦斯去世以后，冯·马勃尔写信给弗丽达说：“总而言之，你本来配我是相当合适的。我当时完全可能引起你的注意，一切都可能会很好的……当时，我们也许得等上 10 年才能得到一个上尉的军衔。现在想来，如果我当时离开军队，和你在一起，干些其它的，我也许能成为一个作家或记者什么的”。

弗丽达与威克利结婚时是 20 岁，她是在黑色森林的渡假胜地与他认识的。他把她带到了诺丁汉，在那里，她开始了她十几年的如梦生涯。

弗丽达后来写到，她当时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英国式的布尔乔亚，如何“像其他妇女一样”，在上午而不是在下午上街去购物，与其他妇人互访作客，在晚上参加晚宴。她很不快活，特别是在阴暗、灰蒙蒙的冬天。她第一次婚外恋是和一位诺丁汉的花边商，他常常驾着那种英国最早期的汽车带她去舍伍德森林。欧内斯特·威克利对此毫无察觉，对弗丽达在一次去欧洲大陆访问时开始的一段更为严重的恋爱史也一无所知，罗伯特·罗卡斯（在他写的弗丽达传记中）认为，那位诺丁汉的花边商就是威尔·道森，而弗丽达

1907年在维也纳搭上关系的那个人是奥托·格劳斯医生，一个弗洛伊德的信徒。这段恋爱史持续了好几年。弗丽达后来认为，奥托·格劳斯是在一次大战中，在军队做医生时死去的。而实际上，他是在1920年死去的。因为他的鼻腔被他所吸入的可卡因侵蚀掉了，弗丽达从来不知道他是一个吸毒者。

当劳伦斯进入她的生活时，他的直率立刻开始将她从她的困倦中唤醒，尽管在一开始她曾为他的直率动过气，例如当他对她说她对丈夫不加注意时，劳伦斯的直言不讳在其它方面也有表现。在复活节，当女佣人不在家，孩子们在花园里找鸡蛋时，弗丽达想为她的客人煮点茶，但不知道怎样点燃煤气？劳伦斯便责备她的无知，他确实是一个奇怪的家伙：这位男爵的女儿，教授的妻子，还不太习惯于男人们的责备。她知道劳伦斯正在透过那层朦胧困惑的表层，刺向那痛苦的内心。无怪乎他后来的许多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主要创作动机都与“睡美人”的主题有关。

正如安德利·莫洛伊斯在《先知和诗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女人能察觉到劳伦斯身上的那种原始的东西，那种与她们的本性相近的东西”。他有她们的那种对魔力的鉴赏力。弗丽达说“他一个人就能对人类教授生活的艺术。”由于他的孱弱和与死神的接近，劳伦斯“对欢乐的片刻时光有一种宗教般的意识。”莫洛伊斯指出，弗丽达曾说过，在与劳伦斯一起生活以前，她根本没有生活过。

一天，他在事先相约后，在德比郡的一个车站见到了她和她的小女儿，并带她们走过春天的树林，这时，她意识到了她在爱他，她是在看着他和孩子们在溪边玩耍的时候感觉到这一点的，他折了些纸船，在里边放了些火柴，放到溪水中漂行，给孩子们取乐。弗丽达看着他。孱弱而神情专注。蹲在溪边，“突然我知道了我爱他。他触动了我心中的一种新的柔情。”这使吉西·钱伯斯回想起当时她在看到劳伦斯蹲在那顶弄坏了的阳伞前时的感情冲动，“那是我们相互感知和相互爱怜的开始。”

在他的一次星期日访问时，正巧弗丽达的丈夫不在，弗丽达要劳伦斯与她一起过夜。他决然地说，他不会趁她丈夫不在之际在他的房间里和她过夜。并坚持要她与他一起离开。弗丽达正准备去德国参加她父亲的入伍50周年纪念日，这位男爵的军团老友都将届时前往祝贺。劳伦斯可以和她一同前去。在德国他们可以秘密地住在一起。这一安排显然在一开始就没有在他们之间达成一致的意見。在4月23日的一封信中，劳伦斯告诉加纳特说，弗丽达打算在5月初去德国，他也想“在那时候去，因为那样我们至少可以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在一起。”但是，他坚持要她把他的情况告诉她丈夫。

弗丽达感到很苦恼。她的丈夫对她来说已成了一个冷漠的英国人，一个只对他的书本感兴趣的学者，但他对她很和善，而且，信赖她。而且，还有那些孩子：弗丽达很清楚，如果一个女人和她的情人离家而去，那么，这个秩序井然的世界将会怎么看她，而且弗丽达可能再也见不到她的孩子们了。但劳伦斯逼得她很紧，他也是十分痛苦的；他写道，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是在生病。”他知道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滋味：“我们毫无办法，只能咬紧牙关，面壁等待。”

吉西在复活节的星期一见到了劳伦斯，她是在伊斯渥附近的一个车站与他意外相遇的。她是在等她的姐姐的时候看到劳伦斯的，他和埃达以及他们的朋友艾迪·克拉克一起站在栅栏前；吉西看了劳伦斯一会以后，他才注意到了她，我“在他的脸上看到的那种痛苦表情是我从未想象到的。”

吉西在几星期以后，在莫尔格林，又看到了劳伦斯，当时，他正在他的姐姐梅伊·赫尔布鲁克和她的丈夫处渡周末。不知道劳伦斯在那里，吉西在星期天上午与他父亲驾着双轮轻便马车从那里经过。劳伦斯看上去已与日前大不一样了；那种绝望的表情已无影无踪，心情也很好；但他却是出乎意料地沉默。自然，他除了弗丽达什么也不想，也许他不敢轻易开口，恐怕一开口就会提到她。吉西邀他搭他们的车一道回伊斯渥，但他说他姐姐希望他留下；吉西觉得这正好“暴露了他让其它人为他作决定的习惯。”但他还是和吉西及她的父亲向诺丁汉方向同行了一段路，在路上他“故作轻松地”说起不久就要开始的德国之行：吉西觉得他一定感到很不自在，因为她父亲的语调漫不经心，而以前他常常是十分热情的。劳伦斯在格里斯列前面的瓦特诺尔山下了马车，往回穿过田野向赫尔希鲁克的住处走去。在那里，他还是沉默忧郁，后来，他突然对赫尔布鲁克说：“比尔，我喜欢一个感情热烈的女人。”

然而，与吉西的分手是动人的，似乎他们俩人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了，当劳伦斯走下马车之后，他停立在路上望着马车渐渐远去。吉西记得，“我转过头看见他仍站在下车的地方望着我们。我挥了挥手，他也用那熟悉的动作举了举他的帽子。”

劳伦斯没有把弗丽达的事讲给伊斯渥的人听；在那时，他甚至没有让他的好朋友萨莉·霍普金知道这一秘密。尽管他曾与梅伊·赫尔布鲁克谈论过弗丽达。

凯斯·萨加在 60 年代至 70 年代研究劳伦斯的背景时，有几位劳伦斯的伊斯渥同龄人告诉他说，他们深信，劳伦斯认识弗丽达的时间远远早于 1912 年 4 月——这个弗丽达在《不是我，是风》中提到的时间。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弗丽达早在劳伦斯母亲还在世的时候就常带着她的孩子到伊斯渥，劳伦斯的家里去玩——而且他的母亲也赞许他和弗丽达的友谊。这二、三位老人的遥远的记忆已经很难得到证实，大部分严肃的劳伦斯研究者都不相信这种说法。然而，在弗丽达的《D·H·劳伦斯的雄心所在》（是《回忆与通讯》）中的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可以被认为她曾见过劳伦斯的母亲：“我还记得一小束二便士的紫罗兰会使她怎样的喜出望外。”当然，这也可能是劳伦斯告诉她的。

劳伦斯从一开始就对加纳特透露了真情；他告诉他，弗丽达是“妙不可言”的，她是“我所遇到过的最好的女子——你无论如何得见见她……那个著名的，古老的里奇索芬家族的女儿——她实在是好极了，……下星期你一定要见见她。我不知道她会不会来西阿纳，如果你邀请我们的话。哦，她是一个不枉一世的女人。”

劳伦斯在 4 月那兴奋的几星期里，从信件的地址落款处可以表明他的急切不安；这些信件先由莱瑟斯特发出，然后从伊斯渥，再从莱瑟斯特，然后又从伊斯渥，并提到了去伦敦的访问。他发现了他的终生女伴，但他没有钱——他当时能聚集起来的只有 11 个英镑——而弗丽达呢，虽然在家中已经感到厌倦透了，但至少还有三个孩子和她在一起。劳伦斯尽管刚刚病愈，孱弱娇纤，但他仍有一种值得依赖的个性力量；用惠特曼的话说，他是那种一露面就使人信服的人。

弗丽达将她的儿子蒙塔古留给了他的父亲，把两个小女孩，巴巴拉和艾尔莎带到她们在汉帕斯德的威尔·沃克的祖父母家去了，在汉帕斯德·希斯

车站外面，她向两个孩子告别时，她“感到一片空白和渺茫。”

劳伦斯和弗丽达在 5 月 3 日星期五离开了查林·克劳斯，越过海峡往奥斯登而去。弗丽达记得，当时海看上去是灰色的，阴暗的天，他们俩人“坐在栏索上，满怀着希望和痛苦。”

（四）新的天地

在曼兹，冯·里奇索芬家正处于 50 大庆的忙乱之中，家里挤满了各种年龄的亲戚，花园里，乐队在演奏。弗丽达和劳伦斯悄悄地住进了一家小旅馆，虽然弗丽达的母亲想她住在家里。纽奇也住在那家旅馆里。父母亲在庆祝的忙碌中察觉到了弗丽达和她的丈夫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从诺丁汉打来了讨厌的电报。弗丽达悄悄地对她的姐姐艾尔丝说，“我带来了一个男人。”她对她父母说，她想离开她的丈夫，但没有提起劳伦斯。这使她的父亲感到震惊，他说他一直认为她是理智的：“我见得多了，”他对她说，但弗丽达觉得他从不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而她却知道。

劳伦斯是第一次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尽管他和弗丽达可以有一个星期在一起，住在多伊舍·霍夫旅馆他仍感到孤独和痛苦，因为弗丽达在大部分时间中必须呆在家里，她和劳伦斯的会面是偷偷摸摸的。弗丽达的姐妹都喜欢他，虽然他穿戴着英国式的雨衣和布帽，一看就知道是个外阜人？但她们对她说，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男子汉。一个冯·里奇索芬家的老朋友，也是一个古老的世袭女男爵，来曼兹参加庆祝，她也住在多伊舍·霍夫，并与弗丽达和纽奇同桌用早餐。这位女男爵是近视眼，没有看到劳伦斯：姐妹们觉得十分有趣，便不住地嗤笑，而劳伦斯与她们坐在一起则感到十分窘迫和不自在。

劳伦斯在一个人散步时，很喜欢观望莫塞尔的峡谷及那里的葡萄园。他诅咒曼兹，那里到处是德国士兵；在附近的城镇和村庄所遇见的人中，他对法国人比德国人更有好感。在多伊舍·霍夫他有时想试着写作，修改《保尔·莫里尔》，但他告诉弗丽达说，他无法进行“工作”。在 5 月 7 日星期二，他写给弗丽达的信中说，他再也不能忍受这种境况了：“两个小时来我没有动弹一下——只是坐着静思。”

他给威克列写下了一封信。他告诉弗丽达并不一定要将此信寄出；但她必须对她的丈夫说清楚一切情况。劳伦斯不再“需要任何不诚实，任何谎言。让事情自然发展下去不再有逃避、谎言、惧怕。那样会使我窒息……我爱你。让我们正视一切，去做一切，承受一切吧。只是，我不能忍受这种躲藏在黑暗中的生活了。”然后，真相终于大白了：天，弗丽达带劳伦斯去看沃班的一处工事，在那里一个德国警察听到他们在讲英语，便把劳伦斯拘留起来，指控他是英国间谍。弗丽达不得不请她父亲去营救她的情夫。之后，劳伦斯离开了那里，去了 50 英里以外的特里尔。不管怎样，在这之前，弗丽达还是带他到她父母家喝茶；这是劳伦斯唯一的一次见到这位他后来描写为“怒气冲冲的小男爵”的人。弗丽达用使人伤心的，简洁的笔触描述过当时的情景和事后的情况：“他们都目光炯炯地看着对方——我的父亲，这个纯粹的贵族，劳伦斯这个矿工的儿子。那天晚上我梦见他们打了一架，劳伦斯打败了我的父亲。”

独自在特里尔的时候，劳伦斯也常做梦；其中一次，他和欧内斯特·威克列进行了激烈的争斗，威克列最后安静了下来，希望得到安慰。如果说劳伦斯诅咒曼兹的话，他对特里尔却是喜欢的，这里没有那么多的军营，这里是一个牧师多于士兵的城市。他在信中给弗丽达写到那里的树木和苹果花。弗丽达在 5 月 11 日到 12 日的周末去特里尔呆了几天，他们商定过几天在慕尼黑会面，她要去那里看望她的姐姐艾尔丝。

欧内斯特·威克列是5月10日收到劳伦斯给他的信的。后来，艾弥尔·德拉芬内发现在两份伦敦报纸上登载有这封信，当时是1913年的10月，是威克列离婚过程的第一阶段：

威克列夫人会告诉你一切的，你不会一个人受折磨。我们是三个人，当然我并不是要拿我的痛苦与你们的去相比。处于这种地位实在是非常难受的。我在这里像是一个遥远的朋友，你可以想象这其中有着千百次的谎言。威克列夫人不喜欢这样，但又无奈。我爱你的妻子，她也爱我，我并不轻浮草率。威克列夫人害怕不能得到自身的发展，所以，她必须按照她自己的意愿生活。女人们从本质上讲是巨人，她们会冲破一切去追求自己的生活意愿……

请不要责备我鲁莽地与你写信；在此刻我们都只是男人。不管你怎么想我，情况都不会改变。当我试图设想那最好的结局时，几乎要心花怒放了。不管怎样，我们对自己必须公平。威克列夫人必须生活得更加充实和丰富，这是她的本来意愿。对于我这便意味着未来。我觉得如果我要努力生活的话，那全是为了她，我们不能都有所谅解吗？

与此同时，劳伦斯还去了波恩东部的克伦科的莱茵普林芬兹村看望他的亲戚。在到那里的85英里的路程中，劳伦斯必须四次换乘火车；在两张保存下来的，他在路上写给弗丽达的明信片上，他说他正在感伤的旅程中。另一张明信片是寄自亨奈夫，他说他像一个伤心的乡村情郎一样坐在一条优美的，流水淙淙的小河边，等待着暮色降临，等待着我乘坐的最后一班火车的到来……几天来，我这是第一次知道我只爱你，我的超然独立也没有了，我只爱你。其它一切都微不足道。与你在一起生活将是无比的丰富充实。现在我知道了。”

这段话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在后一年中，劳伦斯在《爱情诗》中发表了那首《倍·亨奈夫》，后来又未加修改地收入了1928年的《诗集》：“小河在暮色中铮铮淙淙，/天空是疑惑惨淡的愁容，/这几乎是狂喜……”在进一步描述了他的心境之后，诗这样结尾：

你是呼唤，我是回声，
你是希望，我是满足，
你是长夜，我是白昼。
还要什么？这已够完美。

这已是完美无缺，

你和我，

除此还需什么——？

奇怪，尽管这样我们还如此受苦！

16年以后劳伦斯说，这首诗对他来说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新的开端。在《诗集》的手记中他写道，《倍·亨奈夫》一诗是他的《瞧！我们过来了》中一组诗作之首（在诗作中他是这样编排的）；而其它一些早期的诗作则“属于英国和死亡的经历”。所以，在莱茵兰这里，经过与弗丽达在英国，曼兹和特里尔三个阶段的经历之后，一个崭新的劳伦斯出现了，一个更加有经验的男子汉和情人。他看到生活是美好的，但他并无那种情感的幻想，即认为生活和爱情可尽情享受而没有痛苦——那只是一种幻觉而已。当他在黄昏时分在流水淙淙的塞格小河旁写明信片的时候，劳伦斯正开始摆脱他的过去。他只是在开始这样做，这种摆脱，与所有的男人们一样，总不是完全彻底的。但是，他与弗丽达的关系，以及对他当时正在创作的书——《儿子和情人》

的精力倾注——使他能够超越他过去的残缺不全的部分并去正视生活，去“走过生活”。

在沃德布劳尔，一个仍然使用公牛的古老村庄，劳伦斯继续着他的小说创作（他告诉弗丽达说他感到内疚），在莱因兰的风景地带漫游，匆匆忙忙地写着信，并和他的“表妹”哈娜调情。

他在给爱德华·加纳特的信中谈起过哈娜，她是个处于绝望之中的将近30岁的女人，嫁给了一个索然无味的男人；现在她爱上了劳伦斯。他对加纳特说，除了弗丽达他对其它任何女人都看不上眼，他对弗丽达只说哈娜“越来越喜欢”他了，而他只是在微醉的时候与她调调情。然而，哈娜对劳伦斯与日俱增的“钟爱”显然对劳伦斯有利。他至少能够向弗丽达投去一些不愉快的暗示，她当时正吹嘘说她在曼兹受到了她的情人们的包围。更重要的是，劳伦斯与哈娜的逢场作戏使他对爱情有了更深刻的见解：“当一个人觉得他的感情——性欲——不再是一种漫无行踪的东西，而变得沉着，冷静时，是十分有趣的。我认为，当一个人恋爱时，他的性热情会变成一种冷静，稳定的力量，而不是一种狂风暴雨。情欲，几乎能使人发疯，却远远不算是爱情。我在意识到许多我以前从未想到要去意识的东西。看看我寄给你的那首诗——我再也不会给你写那样的诗了。”他们下一次的会面一定是庄严的，一定有一种尊严；“再没有躲藏和遮掩。”若没有弗丽达，他只是“一具行尸走肉”，但他需要让他患病的灵魂得到疗养，康复一段时间，然后；他才能“将它调动起来，再与她一起生活……那将是一次婚礼，而不是一次会面。”弗丽达后来说，当时她正处于那样的一种理智和感情的混乱之中，以至于无法体会到劳伦斯信中的感情的深度：“我所想的只是与他在一起并得到安宁。”

劳伦斯在5月24日起程去了慕尼黑，在那里过了一夜之后，他和弗丽达南去23英里，终于在布尔堡渡过了他们一个星期的蜜月。许多年以后，在1929年，劳伦斯写信给他的朋友麦克斯·莫尔，“Die Frieda und ich haben unser Zusammenleben in Beueberg im Isarra angefangen - im Mai 1912——und wieschones war！”（德语：弗丽达和我一起来到了伊沙托尔附近的布尔堡——在1911年5月——我们多快活呀！——译注）

在当时，劳伦斯对加纳特说：“那河上结起了冰。巴伐利亚的村庄洁白而使人愉悦，教堂是巴洛克式的，高高的塔尖，白色的屋脊上竖着黑色的尖顶。每天都感到十分的美满。弗丽达和我散步，走得很远很久，道路旁有许多许多的阿尔卑斯山区的花，金莲花，报春花，百合花，兰花——会使你手舞足蹈……我们同涉水于可爱的小溪，我们多快活呀！（Und wieschones war！德语，见前注）

他也毫不掩饰地告诉霍普金太太，说他是那样地爱着弗丽达以至于不想谈论这件事；以前他根本不知道爱情是什么，而现在，这个世界变得“奇异而美丽，妙不可言。生活可以是这样伟大，——神圣超绝，生活可以是这样，感谢上帝让我证实了这一点。”是的——但这里有很多的异议。因为，尽管我们有爱的狂欢和壮美的景色——“奇怪的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感到痛苦不堪！”——弗丽达为她的孩子感到伤心，当劳伦斯对她进行劝导的时候，她便问，他要希望她成为怎样的一个不近人情的母亲？在写于布尔堡的《瞧！我们走过来了！》诗中，《她回顾往事》的一首里，那个男人责备那个女人做了命运的妻了；她的吻充满了刺激；在巴伐利亚，蒂罗尔的迷人景色中，她向英国眺望。然而，那位男人觉得她在根本上是与他同在的；她从未“太

顾及”过去——她有“十分之几或更多些的时间”在回顾过去，但并不一味如此：“不管怎样，对你的咒骂仍留在我心中，/ 像一个深深的，深深的烙印。/ 这诅咒是指向所有的母亲。”因此，他们并不是在爱河中涉水；如果白天经常是充满了阳光、鲜花和欢乐的话，痛苦则充斥着黑夜，因为劳伦斯也受到往事的制约。《瞧！我们走过来了！》中一系列的诗反映了——或更确切地说是折射了——这欢乐与痛苦之争的经历；这一系列诗并不是一个纪录，而是劳伦斯把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开始5年中发生的情况和他的感受，以及他所知道的弗丽达的感受翻译成了诗。

《瞧！》一组诗几乎是纯粹的表白。但是，其中许多篇除了现实的成份外，在本质上是 symboliste（法语：象征性的），常常用暗示来指意，而不是平铺直叙。在这里，不管怎样，这些诗将被认为仅仅是自传性的表现，展示了劳伦斯和弗丽达关系的具体细节。有些诗题表明了这画面的“阴影”部分：《哦，——我将不再是男人》；《肢残体缺》；《失魂落魄》，《失落和孤独》；《一个无人爱的男子之歌》，《痛苦》；《一个坏开端》；《她为什么哭泣》；《傻瓜》——这些标题应该和那些另有暗示的诗相提并论，例如：《早餐桌上的玫瑰》和《黄昏的小鹿》或与另外一些绝然不同凡响的诗作相对《天堂重入》；《一个走过来的男人之歌》；《新的天堂和大地》；《天堂乐土》——即那些在组诗中稍后出现的。仅这些标题就可使我们对他们关系中矛盾的两个方面略有所知。但是，除了在《瞧！》所有的诗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紧张和对立之外，这些诗确实有所突破，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堂和大地”。因为这些诗基本上是属于婚礼预祝歌——是写得极好的婚礼诗，是婚姻的颂贺，爱情的赞美。在与弗丽达共同生活的第一年之末，劳伦斯写信给霍普金太太说，“我将永远是一个爱的信徒”，而他的全部生涯和他的生活准则正好符合此言。

在布尔堡渡过了一星期的蜜月之后，劳伦斯和弗丽达北上，去了依萨的阿依金。黑德尔堡的阿尔弗雷德·韦伯教授，即麦克斯·韦伯的兄弟，在弗丽达的姐姐艾尔丝的纵恿下，借给了他们一所农舍式的寓所上层的一套房间，此房子的楼下在当时开了一家铺子。韦伯的这套房间由四个小房间和一个厨房组成；这两位房客在阳台上用餐，劳伦斯还在那儿写作。他觉得穿着睡衣在那阳台上吃早饭十分高雅，但他肯定地对弗丽达说，当她穿着晚睡衣时并无这种雅致。“她的体型像一个姣美的茹宾斯（茹宾斯 1577—1640，荷兰画家）的妇人像，他对加纳特说，“她的脸型几乎是希腊式的。”

劳伦斯和弗丽达在阿依金一直待到八月份，他们在那里的经历是布尔堡的重复，他们感情的钟摆在幸福和痛苦之间摇摆，他们的争吵几乎成了一种仪式性的格局：在一段时间的欢乐之后，弗丽达便会想起孩子们，逐变得悲伤起来；劳伦斯便会对她讲，他将让他们母女生活得更好；弗丽达会感到踏实一些，但她表现出这种情绪之前，劳伦斯会挑剔说她并非真的惦记“那些小家伙”。然而，他说，他已将弗丽达“钉在了”他的大车上：在阿依金的那两个月就是那么重要。随着那些在阳台上的日子的流逝——下面的路上小公牛拉着货车在行驶，麦田的地坡向河边倾斜，在远处的堤岸上有一片长着丛林的低洼地，后面是高耸的山峦——是阿尔卑斯山脉的起缘处，——劳伦斯和弗丽达之间的爱情就是在那个壮美的背景中深化起来的。

虽然弗丽达后来成了一个出色的厨师，但在这里的时候下厨做饭的却是劳伦斯。他们吃浆果和鲜鸡蛋，黑面包和啤酒。同时，劳伦斯的创作进展得

很快。在沃德布劳尔时他开始修改《保尔·莫里尔》的稿子——当他离开那里时稿子只剩下10页了——他到阿依金不久便将稿子寄给了海因曼。他一直以为海因曼拒出此书，因为他认为那是一本不洁之书，劳伦斯让加纳特将手稿寄给达克沃尔斯的出版社；稿子于7月25日寄回给了他，并附有加纳特的便条，劳伦斯答应“拼命地”进行改写，从第二天就开始；他估计第三稿将化去他三个月的时间。这是一个十分精确的预计，尽管穿越阿尔卑斯山化去了他一个月，劳伦斯在11月13日于意大利完成了这一稿，达克沃尔斯出版社在第二年就按此稿将书出版了。

在劳伦斯离开伦敦的那个月（1912年5月），《侵入者》便问世了，加纳特将书评寄到了德国。大部份的评论文章都友好地表示失望。“假如这是其他任何人的作品，也许会使人满意。”伦敦的《星期六评论》说，“因为这不是一部平常的小说，我们好几个月来一直在满怀希望地等待。《雅典女神庙》和《卡拉玛佐夫兄弟》两杂志对《侵入者》进行了联合评论——就在当时由加纳特夫人进行了翻译——对这年轻的作者大加赞美，并把他与杜斯妥耶夫斯基相提并论。劳伦斯小说中的一些情景使这位匿名的评论家联想到了“最好的俄罗斯流派”；对西格蒙的自杀和尸体被发现的描述具有“杜斯妥耶夫斯基式的诗一般的现实主义情调。”《英文周刊》在它的“本月新书”栏目里尽可能地对劳伦斯客客气气；“《侵入者》是他的第二部小说，如果说作为一部故事，此书有些不尽人意的话，但作为一篇文章，此书无疑是成功之作……这是一个自有风格的作家。我们还必须得等待作者的回音”。不知道这篇评论是不是由《英文周刊》的主编，奥斯汀·哈里森，还是（可能）出自他的助手诺曼·道格拉斯之手。

这些便是英国的评论。劳伦斯直到秋天才读到那些来自美国的评论，他当时到了意大利。米切尔·肯纳利出了美国版，1912年11月17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评论加以赞扬。评论的标题是《杀人的女人》，文章着重对海伦娜这个小说中的新型人物进行了评论：“《侵入者》不仅仅是现代严肃小说中最坦诚的作品之一，而且几乎是这些小说中的最佳之作……毫无疑问，普通小读者会认为《侵入者》平常无异和丑陋猥亵，但普通的读者根本就不应该去读它。”早些时候，当劳伦斯和弗丽达还在阿依金的时候，《诺丁汉郡卫报》——好像知道他们的情况似的——将评论标题为《应受指责的旅行》，对此，弗丽达比劳伦斯更加会心地大笑了一番。

对这一本书，他当然要比他所期望的写得更好一些；是他从休佛的阵营转移到加纳特的阵营的一次不小的成功。加纳特也许对《侵入者》不太满意，尽管他还是比较友好地接受了它，他现在在等待着《保尔·莫里尔》，在一开始劳伦斯就许诺过，此书将和《白孔雀》是同一格调的。

除了给劳伦斯和弗丽达寄去了《侵入者》的有关评论之外，加纳特还把这些评论寄给他的儿子大卫去看，大卫当时刚刚满20岁。7月，大卫·加纳特正在慕尼黑，一个人很孤单，此时，他父亲写信给他，建议他去阿依金看看。不久，他便接到了劳伦斯的来信，告诉他如何去那里，当加纳特从坐满了身穿民族服装的巴伐利亚农民的列车上下来时，他看见了一个风度不凡的英国人：他的头发是“发亮的泥土色，夹杂着一些红色”，脑后长着一撮又短又硬的乱发，不像是一个英国绅士的头发，而“难以令人置信地是平民的，混杂的，非纯种的头发”。但是，那小胡子上方的一对兰眼睛却十分生动，从劳伦斯的微笑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得到生活乐趣的人。他的鼻子，加纳特

觉得有点“太短而方正了”，而他的还未长满络腮胡子的下巴则是“太大了一些，圆圆的像个发夹的弯头”。他像一个管子工的助手，一个靠罢工和领取救济维持生计的人，一个对上层敢怒而不敢言的下层人物——实际上，大卫·加纳特看到的是劳伦斯的中学校友们，他们现在都成了矿工和伊斯渥酒牌间的常客。

加纳特和劳伦斯沿沃夫哈茨豪森河而行。弗丽达在赫斯·伏杰耐斯特等候他们，她的姐姐艾尔丝·杰菲就住在那里。路上，这位年轻的客人在“一群群牛虻的包围下”在伊沙河中洗了澡。

加纳特见到了弗丽达，她从绿眼黄仁的眼睛中射出直率的目光，像一头母狮，她的身体茁壮结实，就像火车上的那些农民大妈，但“她的头和整个身体的仪态是高雅的。”他随后又见到了杰非夫妇，他们已经迁居到了厄斯金豪森松林中的一幢房子里，在阿依金北部约一英里处高伊沙河远一些的地方，艾尔丝·杰菲记得，那时候弗丽达常到厄斯金豪森附近洗晒衣服，她将一个男人的睡衣凉晒出来的时候，使艾尔丝的邻居们吃惊不小。

弗丽达对劳伦斯照管得很仔细。艾尔丝·杰菲记得，有一天晚上从慕尼黑她乘上10点的火车，在阿依金下车，问劳伦斯是否能和她一起在黑暗中步行去厄斯金豪森。但还没等他作出回答，弗丽达就凄切动人地对她姐姐说，可怜的劳伦斯太累了——他根本不能在这样的深夜步行去那里。

8月2日，在劳伦斯和弗丽达正要离开阿依金的时候，弗丽达的母亲突然出现了，她对劳伦斯 Schimpfed（德语：辱骂之意——译注）了一小时，用德语对他大发雷霆，责问他怎么能希望一个女男爵为他擦靴子洗衣服：“凡有点教养，懂点道理的人，都不会让一个女人，一个聪敏的教授的妻子生活得像个酒吧女招待，他甚至无力为她买双鞋。”劳伦斯逆来顺受地承受了这些责备，然后，当这位男爵夫人离开时，他竭尽礼让和恭维送她上了火车。在慕尼黑，她对艾尔丝说，劳伦斯还是很可爱和可靠的。

像两只应时而迁移的候鸟一样，劳伦斯和弗丽达在8月5日离开阿依金去拉哥第加达。在他们和意大利最大的湖泊之间，阿尔卑斯山高耸入云。”这条通往意大利的帝国大路，”劳伦斯在他的第一本游记，《意大利的曙光》的开始写道，“穿过山峦，从慕尼黑跨越迪罗，经过英斯泼克和柏斯安到达弗尔罗纳。当皇帝南行或从玫瑰盛开的意大利回到他们自己的德国时，庞大的随行队列曾从这里经过。”

旅途的第一夜，劳伦斯和弗丽达是在伊沙峡谷的一个“路旁客栈”里度过的。第二夜他们睡在山中的一个茅草屋里，随后的一夜，他们住在格拉休特的加斯特豪斯旅馆。接着，他们来到了梅尔豪芬，他们好像是在8月底离开那里的，还在济勒休和多米尼克休特·米·希勒盖斯脱逗留过，这里靠近斯特辛山的山坡。从斯特辛，他们又往梅兰和泼斯安而行，到达了特里安特，然后又走遍了奥地利的所有城市，到9月7日左右，他们来到了利伐，这里是拉戈莱加达的山顶部。

劳伦斯在旅行中的最好收获是他的散文《泰洛尔的基督们》，此文是对阿尔卑斯山区沿路坚立着的基督受难着色木雕的描绘。在巴伐利亚和奥地利的迪罗北部，劳伦斯发现这些木雕是真实、笨重的农民形象，而在南部一带，它们都是些华浮的吉多·伦尼形象。这篇散文被重印过多次；劳伦斯在《意大利的曙光》中用了此文的改写稿，并不止一次地将这一素材用到他的想象性作品中去，较为明显的是《恋爱中的女人》中的杰拉尔德·克里奇毁灭的

那一段。

《山中的一座小教堂》和《山中的一间小茅屋》，《草垛中的爱情》集子中的两篇散文，描述了劳伦斯和弗丽达发现的一所小教堂，和他们到达格拉休特前在路上过夜的那间小草棚。《瞧！》组诗中的一首小诗《一个无人爱的男人之歌》是在格拉休特写的；诗中的那个男子觉得自觉失落在广袤的空间（……我太渺小/在吹浮我的风中微不足道。）

在梅尔赫芬，劳伦斯在给霍普金太太的信中详细讨论了他和弗丽达之间关系的状况，弗丽达的丈夫仍“疯狂地”爱着她，不肯“放手”。但是，他说，“对我们自己来说，弗丽达和我已经挣扎着渡过了困难时期，进入了一种奇妙的，毫无保留的亲密状态，一切都在闪烁发光，我终于知道了这就是爱情。我想，我不应该像以前那样责备女人，而应该责备自己，因为在这之前，我把爱错用在另一个女人身上。“每个人都应该有所发现，应该“坚持不懈，直到发现那个可以接受他而且他也能接受她的爱的女人，然后在这个男人或女人身上孤注一掷。但是，事情必须是两厢情愿的。不管怎样，不管将发生什么，我确实在爱，也在被爱着。我既给予了又得到了——这将是永恒的。”

大卫·加纳特在梅尔赫芬又遇到了劳伦斯和弗丽达。大卫当时是个学植物学的大学生，后来，有一种植物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济勤休的花草为他增加了不少植物标本。劳伦斯白天的大部份时间在房间里写作，弗丽达和加纳特则坐着闲谈；不时地，他会起身下厨，或有时参加他们的谈话，但一会儿，他又回到了他的稿子上。在晚上，他们三个会做些文字游戏，抑或劳伦斯会模仿一些伊斯渥人或叶芝和庞德在一次伦敦的聚会上的言行举止，也许就是叶芝滔滔不绝地独白时庞德大吃郁金香的那一次。大卫·加纳特曾说，在劳伦斯的表演中颇有些卓别林的样子；“但更加尖刻，没有那样伤感。”一天中最沉重的时刻，加纳特回忆道，是从英国或从德国的信件来到的时候，这些信件常使弗丽达想到她的孩子们。这种情况中的难堪之一是劳伦斯始终对欧内斯特·威克列十分赞赏，甚至是钟爱，这与《儿子和情人》中保尔·莫里尔对巴克斯特·道斯的态度是一样的，他的妻子也被保尔带走了。弗丽达说劳伦斯对她的丈夫“感情很深”，你记得《相会在山上》那首诗吗？诗中描写他遇到了一个棕色眼睛的农民。”

在劳伦斯和弗丽达在梅尔赫芬住下以前，大约是8月31月左右，大卫·加纳特的一个朋友哈罗德·赫卜森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是经济学家J·A·赫卜森的儿子。他们一同沿匹兹舍杰顺坡拾阶而下，德斯特辛而去，加纳特和赫卜森在那里赶上了弗尔罗纳来的列车，劳伦斯和他们一起往车站走了一段路；“天很黑”，加纳特说，“空气中有一股花的芳香，劳伦斯踏着轻柔的脚步在土路上行走，悄然无声。”

在斯特率的时候，劳伦斯写下了他的诗《苦难》，此诗是从9月2日写给麦克列沃的一封信发展而来的，在信中他谈到了山中的寒冷，刺骨的溪水，和行路的艰难。他告诉麦克列沃，“如果有一天我消失在某个地下密牢里或此山中的什么洞穴之中的话，你大可不必惊奇。”《苦难》一诗的第一行就说到“这个山中的地下密牢”，在诗的后面部份，诗人发问，“我为何不去？/我为何要在这锅中，这牢笼之中到处爬行/愚蠢无比？”

从斯特辛出发，劳伦斯和弗丽达向梅兰和泼斯安而行，这两个地方就是现在的梅兰诺和泼斯安诺。然后，在“纯粹的古老的意大利”特里安特（现

在又称为特兰脱），弗丽达“十分闷闷不乐”，劳伦斯写到，“因为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弗丽达后来回忆到“那个非常便宜的旅馆，墙上斑斑驳驳，床单不干净，卫生间十分糟糕”。劳伦斯曾看到过她“赤着脚在冰冷的，布满茬子的田地里行走，对潮湿，饥饿和寒冷都付置一笑，”现在却看到她站在一个广场上，坐在那个所有流浪诗人的典型——但丁的塑像下哭泣。

那些时候，在特里安特和利伐之间有列车通行：劳伦斯就买了火车票，这样，他和弗丽达可乘列车行完剩下的旅程。但是，当他们到达利伐时，他们已是十分穷困了，以至于不得不违禁地在房间里做饭吃，当意大利女佣人进来整理床铺时，他们就得把酒精灯和食物藏起来。不管怎样，他们的行李最后终于到了，弗丽达可以脱下她的“农夫袍子”，换上一件漂亮的蓝上装；她的姐姐也给她寄来了一些漂亮的衣服和帽子，现在，弗丽达可以在这个奥地利的要塞城镇，在被劳伦斯称为弗朗兹·约瑟夫的“巧克力士兵们”中间招摇过市了。劳伦斯仍戴着那顶从慕尼黑买来的，廉价的，没有样子的草帽。但在9月16日收到从达克华斯处寄来的50镑现金时，他便是相当富裕的了。两天以后，劳伦斯和弗丽达又在意大利的土地上向南而行了，到达了加格兰诺，二个月之后，他在那里完成了《儿子和情人》的写作。

与他那天色阴沉的诺丁汉和经常下雨的英格兰相比，这里是一种绝然不同的生活。现在，他是生活在被阳光晒得乌黑的人们中间，以后，他将称颂这里的人们。这里的一切几乎都是明媚的。这个年轻人正在改变自己去适应那个时而欢快，时而忧郁的德国女人，随着他们生活时光的流逝，白昼在阳光下变得越来越灼热，太阳在这里好象比北方更接近地球，金色的光焰热烈地照耀着大地。

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对年轻的劳伦斯很有作用。他以前经常赞美北方的自然景色，这样的赞美在《白孔雀》和《儿子和情人》中比比皆是，而且是用一中浪漫主义运动时期作家的目光和手法去进行观察和描述的，常使生活在其中的人民为之感动。但是，对南方自然景色的感受，使劳伦斯发生了变化，而且渐渐地对自己以前对工业区的自然风光的描写感到愤怒。这种感情在《儿子和情人》中还无特别的表露，虽然此书完成于南方，但对那个地方并无提及，在上一个世纪，易卜生在意大利写下了他的许多剧作，这些剧作讲的都是北方的事情，虽然，在作品的这里或那里都有一些南方的记印，例如《玩偶之家》中的娜拉跳的塔兰泰拉舞。在《儿子和情人》中没有塔兰泰拉舞，甚至在《虹》和《恋爱中的女人》这两部用在加格兰诺写下的素材而写成的小说中也没有这样的描写。

另外，劳伦斯不喜欢工业社会题材的作品，因为他读过的19世纪的各种作家的作品：托马斯·卡莱尔（那位成为工业界巨头之前的年轻的卡莱尔），马休·恩诺德，约翰，拉斯金和威谦，莫里斯，下面这些从格拉姆·马丁的《工业主义和文化，1830——1914》（1970）一书中的摘录就说明了这一点。

人们的头脑和心灵以及他们的手都变得机械了。他们丧失了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力量和自然力量的信仰。他们所希望和为之奋斗的并不是内在的完美，而是外部的联系和安排，是规章制度——这样或那样的机械主义。他们所有的努力，联系和观点都是机械主义的，都有机械主义的特征。（卡莱尔1829）

正是向这种现代最为邪恶的机器的降级和堕落，才把许多民族的人民引向为一种自由而进行的、徒劳的、无条理的、毁灭性的奋斗之中，而他们自

己也无法解释这种自由的本质（拉斯金，1853）

我曾说过，对机器的信奉是困扰我们的一种危险；我们经常荒唐地将机器置于一种不相称的地位，这样的机器，如果真有什么益处的话，就是为人民服务；可是人们总是信奉机器，好像其本身有一种内在的价值似的。（恩诺德，1869）

正是这种对商业的迷信之中有一种内在的终结，这种迷信认为，人是商业而造就，而不是商业为人而存在，在这样的迷信中，艺术也黯然失色；人们已不再是在偶然的时机借助于这种迷信，这样的迷信已充斥于我们日常生活。机器，铁路和如此种种的东西，现在确实控制着我们，但本来完全可以为我们所控制。（莫里斯，1883）

劳伦斯在《儿子和情人》中只是偶尔提到了那个主要画面中的这种丑恶之处，但此书以后的大部份作品中，这样的论述就在其后影响着他，虽然直到他感受到了意大利乡村城镇的阳光之后才意识到这种力量的存在。在加格兰诺，劳伦斯也正在使自己关于生命的力量思想定形下来。他在给欧内斯特·柯林斯的一封著名的信中说，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他的宗教；这在后来成了一种哲学，在这种哲学观点中，他试图将生命和思想置于相均衡的位置上——用劳伦斯的术语讲，“生命知识”和“思想知识”，然而，在领略了意大利的阳光和看到了这里的农民们的无忧无虑之后，他当然会从过去的阅读中记起那些 19 世纪的作家所看到的，机器主义的危险和机器主义的根本原因，工业主义的侵蚀作用。

已故的维凡恩·德·苏拉在他 1951 年的一次有关劳伦斯的题为：“D·H·劳伦斯：中西部的预言家”的讲座中，将劳伦斯置于英国文学史上的大预言家的“长列”之中，这些预言家包括“14 世纪的兰勒德，16 世纪的莫尔和拉提默；17 世纪的班杨以及 18 世纪的布莱克、卡莱尔和莫里斯”，平托教授补充道：“劳伦斯是这个行列中最晚的，但决不是最末尾的一个人物。”

（五）意大利的黎明

劳伦斯和弗丽达在加格兰诺一直逗留到 1913 年，这是他一生经历中最安宁的一段时期。如前所述，《儿子和情人》的结束，意味着他过去经历中许多艰难坎坷的结束。在加格兰诺，他开始了新的创作活动，这就是他创作生涯中第二阶段的两部成功之作，《虹》，完成于 1915 年，《恋爱中的女人》，完成于 1916 年末或 1917 年初。加格兰诺还是阿依金的延续，而且现在劳伦斯和弗丽达在一起生活不只是两个月，而是整整 7 个月。从《瞧！我们走过来了！》的诗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劳伦斯和弗丽达在他们的第一次意大利旅居中幸福和欢乐的表露；在那里写成的诗中最末一首《春天的早晨》（即被郑重其事地称为《天堂重人》一诗之后的那一首）这样说：“在粉红和蔚蓝之中 / 在天空和杏花之间 / 一只麻雀展翅飞翔 / ——我们走过来了……”

那些日子里，墨索里尼的工程师们还没有将那湖的西部石崖上的加德埃森安纳·奥西登托凿穿，“由于后面陡峭的山岩”，从利伐去加格兰诺的唯一途径就是坐船。劳伦斯从皮艾特罗·帕奥列（一个“头发灰白的意大利老头，举止温文尔雅，下巴像狗，并有一个 40 岁的可爱的妻子”）那里租用。维拉·勒盖那的底层空房，80 个里拉一个月，在那时大约合 63 个先令（不计兑换费），或 15 个半美元，“包吃包·住，服务齐全”。与绝大部分意大利语的习惯用法相矛盾的是：此旅馆名维拉·勒盖那，其字母 e 上有一个重音符号。

在那里，弗丽达第一次认真地开始操持家务，但是，炉子和铜锅是很难对付的。她不得不经常打断劳伦斯的写作——“鸽子肉烧焦了，我该怎么弄”？——然后，他会和颜悦色地过来帮助她解决种种困难。“我第一次洗床单简直如遭一次灾难”，弗丽达回忆说，“那些床单是那么大，那么湿，湿得不得了。厨房的地上像发了大水，桌上尽是水，我浑身上下都湿透了”——劳伦斯又一次来营救了，将厨房的地板擦干，将床单挂到了花园里。“如果你听说我们被谋杀的消息的话，”他给爱德华·加纳特的信中说，“那就是弗的过错。她从卧室向外面马路上倒水，浇到了一个在墙边行走的老太。我必须把所有的门都锁好，我们坐在另一间卧室里，还好那里没有警察。”

村中偶而也有喧闹的时候；伤员们从特里普尼泰恩战争的战场上回来。这些情景后来一定使劳伦斯觉得很有趣，因为，14 年后，他翻译了吉奥凡尼·弗欧加的《卡拉勒里亚·勒斯蒂堪纳》，其中，开始的一段描写了那个爱说大话的士兵托利杜，回到了一个西西里乡村，“穿着他的军装，戴着一顶红色的无沿帽到处炫耀”的情景。然而，劳伦斯在加格兰诺的生活并不全是富有幽默回味的家庭琐事和对回乡士兵的嘲讽性的观察，《儿子和情人》最后一稿的写作是一桩痛苦的事情，这比他以往任何时候的创作都更使他受折磨。

爱德华·加纳特有关《保尔·莫里尔》的眉批，是他改写此故事的指南，劳伦斯感到这些评论是“一种力量和良知的特洛伊。”当劳伦斯完成了他的最后一稿之后，他写信给他的顾问说：“我告诉你，此书获得了一种形式——形式：我——一直在追求它，用我的汗水和心血——但是这种汗水和心血远远比不上劳伦斯为摆脱过去所作的努力和所付出的代价。对此书手稿的更深刻更生动的修改，与先前一稿相比，需要更深刻地反思过去。作家往往通过写作来摆脱过去，有时这种过程是有意识的，有时却不，其效果往往取决于

涉及的感情之深度和强度。在宗教中，求得赦免的忏悔需要一种对灵魂的痛苦的搜索；在精神分析中，想要根除精神疾病的病人必须在痛苦的回忆中摆脱那些作为诱人的受到刺激的经历；在文学中，这种过程大体上是一样的。弗丽达记得，当劳伦斯写到他母亲之死的时候，他竟病倒了，他的这种悲痛也使她十分不安。他告诉她说，如果他的母亲还活着的话，她是不会允许他去爱弗丽达的：“然而，我认为他挺过来了；只不过是，这种疯狂和强烈的爱已使那个孩子受到了伤害，他没有那么坚强去经受这样的压力。”然而：“我认为一个男人应该诞生两次：首先是其母亲孕育了他，然后他必须由他所热爱的那个女人再生。”

不过，对于劳伦斯对往事的忧伤，她并不总是报以同情。有一次她写了一篇讽刺短文，题为：《保尔·莫里尔，或他母亲的小宝贝》，劳伦斯读后冷冷他说，“这种东西不能称作讽刺短文。”另一次，也许是在加格兰诺，或更早一些在阿依金或梅尔赫芬的时候，弗丽达在劳伦斯大学时代在他的作业本上写给他母亲的一首诗旁写下了一些言辞激烈的眉批：

我恨这个——天啊！！！我恨这东西！是的，真是倒霉！这写的是什么诗！是的，你是自由的，可怜的魔鬼，在心灵的家園中你是自由自在的，你将感到孤独，这是自作自受，你自由地作了这种选择！现在走你自己的路去吧——痛苦，你选了一个可怜的老妇人的痛苦，你这个可怜的人，你把你的全部力量都用在上面了。我尝试过，我努力过，为了将你与我自己以及其他人的联系起来，我简直是呕尽了心血，以前我觉得我是能够去爱的，但决不是你——现在我将离开你一些日子，我要看看让你独处一下，是否能帮助你认识的真正的我，我又将自己治愈自己，你不能帮助我，你是一个可怜的东西。我知道你的秘密和你的绝望，我曾看到过你的羞愧——我更加爱你了，这便是我所得到的报答。

这时的劳伦斯到底了解多少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是很难确定的。弗丽达在1942年告诉弗雷德里克J·霍夫曼说，“在劳伦斯写完《儿子和情人》的最后一稿以前，他已经知道弗洛伊德了。我不知道，在我们于1912年相遇之前，他是否谈过或听说过弗洛伊德了。但我是弗洛伊德的热烈崇拜者；我们有过长时间的争论，劳伦斯的观点大致上是认为弗洛伊德对于性的看法更多的是出于一个医生的观点，弗洛伊德的‘性’和‘利比多’过于局限和机械，而根源应该更深。”弗丽达至少是从以前提到过的那位弗洛伊德的信徒，但又从被其主子抛弃的奥托·格劳那里学到一些弗洛伊德理论的术语。

霍夫曼教授在一次对所有证据的仔细检查中（在他的《弗洛伊德主义和文学意向》中）认为，尽管在那本后来成为《儿子和情人》一书的故事中，保尔和他母亲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成分，但劳伦斯和弗丽达之间对于弗洛伊德学说的讨论和争论“很可能使他在小说中强调了母子关系而忽略了一些其他的东西，给那本最后出版的书一种引人注目的清晰”。然而，霍夫曼教授指出，劳伦斯直到后来才遇到了真正的弗洛伊德学者，大卫·伊德医生和巴巴拉·罗尔，他是1914年在伦敦认识他们的，他俩并且成了他的朋友。他们开始向他介绍一些有关此学说的专业解释，而他在一开始就对一些重要方面持有异议，弗丽达的信和后来他自己的创作都表明了这一点。没有什么严肃的例证可以表明劳伦斯是“处于现代德国思想的主流之中”。

在加格兰诺，尽管劳伦斯并不赞赏弗丽达那篇有关他年轻时候的讽刺短

文，但他自己也开始尝试了一些喜剧小品。他曾对爱德华·加纳特说，他希望有些观众能像他欢喜契柯夫那样喜欢他——当然，此话并不意味着他的剧作有契柯夫的风格。劳伦斯早先曾有一二次想写一些这样的剧本，有一次，他甚至与导演 B·伊登、潘恩作过交谈；但在当时并无什么结果。然而，在 1968 年春，劳伦斯的三个剧本在伦敦的皇家宫廷剧院上演了。《一个矿工的星期五之夜》、《寡居中的霍罗德夫人》以及一个劳伦斯的未完成的剧本（由他人完成）《儿媳妇》。评论和公众舆论给予这些剧作以很高的评价，将劳伦斯称作是一位戏剧家。这些剧本因为大量使用方言，长期以来被认为无法在美国上演，但在 1974 年在一家美国电视台由美国演员上演了《寡居中的霍罗德夫人》一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劳伦斯在加格兰诺写下的喜剧之一是《为巴巴拉而战》，此剧是他于 1912 年 10 月底的三天中写成的，是他在紧张的小说创作之余的轻松之作，此剧反映了劳伦斯和弗丽达在那年秋天所面临的处境。第一幕的场景是描写的是维拉·勒盖耶的厨房，那里有很大的石制的壁炉，和一只小炭炉——fornello——在另一端是碗橱，桌子，高靠背的软垫椅——挂着许多各种尺码的平底锅。

此剧另外三幕的场景在“同一郊区住宅的餐厅——一个相当宽敞的房子，有钢琴，写字台和一些旧家俱。在宽大的凸窗前，是一张很大的无靠背、无扶手的沙发长椅，窗外是一个临湖的公园。”至于剧中的角色，劳伦斯用了五个很容易被辨认的人物，将弗丽达和她的家人变成了英国人。詹姆斯·韦森，26 岁，和巴巴拉·特利斯德“一个约 26 岁的金发女郎”私奔出走。他们在离开英格兰三个月以后，在那幢郊区住宅居住了近六个星期。巴巴拉的丈夫弗里德利克·特利斯德，称那位矿工的儿子韦森是“小丑”、“可恶的蛆虫”、“小跳蚤”，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称呼。第二幕中查尔柯特勋爵夫人，巴巴拉的母亲对韦森的斥责与冯·里奇索芬男爵夫人在阿依金对劳伦斯的斥责很相似：“她是一个出身名门和受过教育的绅士的女儿。别指望让她为你送靴子和铺床！”劳伦斯将里奇索芬男爵变成了一个古板的英国绅士；他是剧中与现实人物最不相象的角色，他对韦森说：“我如果年轻一些的话，我就要揍你一顿，先生。”

那位怒气冲冲的丈夫出场了，他和巴巴拉一同出场的那场戏也许披露了弗丽达第一次婚姻的真实情况；那些了解故“事背景的人说，剧中的一些事件是真的发生过的。

E·W·小泰德洛克的《弗丽达，劳伦斯：回忆与通信》中有着有关他们蜜月插曲的两篇不同的记载，为弗丽达所写，其中一段插曲发生在柯摩湖，另一段发生在罗森尼。在这两段插曲中，这位新娘描述她自己爬到了一只碗橱的顶上。在一篇文章中记述道；过了两个小时，在她对那个相当理智和拘谨的英国人献出了童贞之后，她站在阳台上回忆那段可怕的经历，在她生活后期的一封信中，弗丽达写道：“当我们刚刚结婚时，我从那狭窄的楼梯上跌滑下来，他从他的书房里走出来说：‘天哪，我娶了一个地震！’”

在《为巴巴拉而战》，巴巴拉告诉弗里德利克——“一个形容消瘦、英俊的四十来岁的男子，褐色胡须，深褐色的眼睛，两鬓已开始微白”——说他不能使她感到“温暖”，“我本来认为我们的婚姻会是一桩乐事——我想我和这个男子会有快乐的戏娱。你还记得在罗森尼时我爬到碗橱顶上的时候吗？我以为你会来找我的，并会笑着将我抱下来。但没有，你吓坏了。你甚

至不敢进入房间。你站在门口怕得要死，于是我爬了下来。这便是经常发生的情况，——我必须向你让步。我穿着贴身背心坐在那里，你害怕极了。我必须爬下来。我对你说，对于我这是一次让步”。头脑呆板的弗里德利克问她是否因为当时他没有把她从碗橱上抱下来，她才要离开他；她最终告诉他，她从来没有爱过他，尽管她觉得她“应该”爱他。她答应努力再成为他的妻子，但后来还是食言了。此剧结尾时，她对韦森说：“疯狂地爱我吧！”

除了一些传记性的情况，这部小喜剧在今天价值极微：劳伦斯所说的“大部分情况是完全真实的”，只是那位年老的冯·里奇索芬和欧内斯特·威克利并没有去加格兰诺。

劳伦斯将此剧寄给爱德华·加纳特时，他在信中叙述了一些他在小说完成时的日常情况。他通常在8点前起床准备早餐，弗丽达坐在床上要和他谈到午餐时分，作为“一个靠灵感写作的人”，他感到内疚，但到后来他才得到了惩罚。他没有感到他真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我们生活得如此艰苦，弗和我。我已经写了《保尔·莫里尔》一书的四百页，还有这个剧本”。

露易·伯洛斯曾给劳伦斯寄去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他在11月19日收到了此信，然后又说：

我想说当我觉得我对于你是这样一个废物时，我感到十分难过。你一直待我很好——而我呢——唉，我只知道到后来我们不会有一个好的结局。但过错全在我的一方。我对你怀着敬意和感激，因为你待我很好——就此而论，我能告诉你，我觉得我自己并无欢乐可言。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说明这一点。

我在这里和一位我所爱的夫人一起生活，如果可能的话，在我回英国后，我将同她结婚，我们作为夫妻在一起生活，至今已将近6个月了，我希望我们能白头偕老。

写这些话时，我觉得自己已是一个牲畜。但我这么做，因为我认为只有这样对你才是公平的。我从未欺骗过你，无论什么事情——抑或我欺骗过你？也许我真的那样做过。——我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如果我继续往下写的话，我会更加困惑不堪的，不要说有关我的任何事情，或将这个告诉别人，好吗？我将能在春天结婚，并将这一切公诸于众，我希望如此——如果她的离婚能办好的话。

我身体从未这样好过——虽然阮囊羞涩——但相当健康。但是如果我继续写下去的话，我觉得我只能给你更多的委曲，现在搁笔还比较容易——也许更明智。

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去恨我。

我诅咒我自己在这上面签上名字。

从现存的信件中看，劳伦斯至少还给她写过一封信。好像他已经用他自己的语言说完了能说的一切，他改用他自己的那种特殊的术语来书写。在告诉她此时（此信的邮戳日期是11月25日）她可能已收到了“mon autre billet”（法语：我的另一封信——译注）之后，他又说，“Oui, l'Italie est forte-jern, importebien... Il fait un merveilleusement beau temps”（法语：是的，意大利是十分美丽——很好，……我在这里过得相当愉快——译注）

在给爱德华·加纳特的一封信中，劳伦斯提到，如果那部小说用《儿子和情人》这一书名的话，也许更好一些，他觉得这一书名要“好多了——要好上几万倍”。在10月30日，他估计他将在两周内完成最后的几百页。正

如所估计的一样，他在 11 月 13 日寄出了全书的原稿。

除了加纳特后来对此书的删节——这对劳伦斯是痛苦的——这部小说至此终于完成了。这是一本与《白孔雀》大不相同的书，后者也曾经过大幅度的修改。与《侵入者》也不一样，此书是在两个不同的时期匆匆凑成的。正如先前所指出的，《白孔雀》是通过对过去的理想来逃避过去，《侵入者》则是一次文学修辞上的跋涉，而《儿子和情人》是对过去的部分征服，因为劳伦斯在书中正视了过去并与之进行了抗争。他觉得此书不仅仅是一篇故事，他对加纳特说那是“一部大悲剧……是英格兰成千上万年轻人的悲剧……那个古老的儿子情人的名字叫俄获浦斯，新的这样的情人不计其数。”因为《儿子和情人》的写作对劳伦斯来说是一次心灵的治疗，所以他希望通过阅读此书，也能给他的同一代人一次这样的治疗。与劳伦斯的早期作品相比，《儿子和情人》在各方面都要深刻，当他完成此书时，他也结束了作为一个作家的第一阶段。当我们讨论英国文学的时候，我们认为，如果《儿子和情人》是 19 世纪最后的一部巨著的话，我们也可以将《虹》看作为 20 世纪的第一部巨著。

在“小说创作的间歇中”，劳伦斯和弗丽达发现他们自己已成了乡村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在湖里游泳，他们向当地的女中学教师学意大利语课文。劳伦斯开始觉得与意大利农民之间产生了一种亲密的感情，他看到这些农民像一些自豪而正直的“国王”，他们对工业化了的北方的焦虑和烦恼一无所知，对他现在认为是“肮脏”的“丑陋”的英格兰也一无所知。这些农民很穷，也许没有“多少思想，但他们看上去很健康，他们的生命力旺盛。”在这里，这个后期的劳伦斯开始发表他的心声。

他曾着手写一部有关罗伯特·彭斯的小说，以英国中西部为背景。这部未完成的手稿被爱德华·耐尔斯发现，他写信对本书作者说：“我看不出此书与彭斯有什么联系……它倒是与《阿伦的杆杖》的开始颇为相似。此书只有二、三个场景——一个年轻男子和一个姑娘在森林里捡柴禾时的邂逅相遇；另一次见面是这位男子去那位姑娘门口与她闲聊；第三个场景是在一家酒店。由于手稿太少，很难看出劳伦斯这一故事发展的趋向。女主人公的名字在手稿中由玛丽·彭斯改成了玛丽·伦肖”。耐尔斯在他的《D·H·劳伦斯：综合传记》的第一卷中发表了这一手稿。

劳伦斯在给麦克列沃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他 1912 年年底的情形：

《汤姆·琼斯》早于其他书籍，在星期天到了。不要再给我寄其他的了——我感到很不好意思，除了加纳特的《阿克的琼》，我没有什么其他的书可寄你了。此书多少还有点意思，请不要轻视它。

我正在为我的新小说冥思苦想，自从我又感到了强烈的冲动之后，我自己觉得已经上了路子。此书是关于罗伯特·彭斯的生平——但我将使得住得离家近一些，作为一个德比郡人，我将虚构故事的背景。我觉得我几乎能像写自传一样去写他。告诉曼森小姐，《生活》一书我已收到，并向她转达我的谢意。我正在等她的信，然后，我将给她回信，如果你有雅兴的话，请在假日去图书馆看看有什么关于彭斯的趣闻。我手头只有劳克哈特的《生活》。我想知道更多一些有关高地玛丽的轶闻。你觉得这有趣吗？

最近，我没写什么短篇或其他什么东西。与弗丽达在一起的紧张生活将一些小事情都挤出了我的生活。也许最终离婚能办成。如果那样的话，你下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将是一个结了婚的人了。现在我是一个处于种种不

利情况中的人。

哈洛德·赫卜森在这里——这令人高兴。但我宁可你在这里。我现在极需要一个我自己的朋友。我画了四幅画，——哈洛德将它们带回英国给你，你可以选几幅。但是如果你能搞到一幅《田园诗》的复制品，我也想要一幅。

谢谢你寄来的叶芝的诗。你为何不把我的名字也放进去？现在对我来说，他是一个古怪的家伙——好像他忍受不了被触摸。但弗丽达却很喜欢他。

我又将开始工作了。一个人有两个创作旺季——9月至12月初——1月至3月或4月。其它是一些收获极微的月份，我觉得我自己怒气过盛，不能写诗——是因为与韦克利之间的紧张关系，若要写诗的话，一个人必须让自己完全投入于他的生命之流之中，倾注全部的心血——但我不敢这样做。人的思维状态很像一个生意人的思维状态，他站稳脚跟，双眼圆睁，这与艺术家的思维状态不同，他们常常放纵和解脱。但我现在不敢放松自己。这种紧张状态使我的大脑感到疲倦。

赫卜森在那里的逗留，对两个情人带来了“许多欢乐”，劳伦斯告诉大卫·加纳特说，那位年轻客人的来访使他们感到轻松愉快：这是弗丽达离开她的孩子以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在圣诞日，劳伦斯写信给霍普金太太，除了些其他的事情，他还说，“即使天空像一只碟子一样掉下来碎了，我和弗丽达之间关系也不会破裂”。弗丽达在信上附言道：“我可怜的丈夫——我不敢去想他！”

尽管劳伦斯告诉麦克列沃说他“无法”写诗，他还是偶而给《瞧！》诗集增加一些篇幅。不久，他也重新开始了小说的写作。虽然他想在小说创作的间隙休息一段时间，他还是开始着手创作那部暂名为《霍夫顿小姐的叛逆》的作品。此书他在战后完稿，定名为《迷失的少女》。他放弃了彭斯的写作计划。

除了他在加格兰诺的写作活动之外，劳伦斯还继续绘画，他在12月17日写给麦克列沃的信中提到的那幅《田园诗》，是莫利斯·格雷芬海根所作的一幅情人画，画的是一个牧童和一个牧女在树林里拥抱。这是一幅劳伦斯最喜爱的画；在他母亲临终的那个晚上他已经开始临摹此画，后来他曾将这摹画送给过露易·伯洛斯和埃达。在加格兰诺他又想重操旧业。

在那里的7个月中，劳伦斯靠麦克列沃和加纳特父子给他寄去一些书刊，在他的信中他经常提到这些书，并引用书中的一些内容——例如他曾提到过叶芝的作品。在离开利伐去加格兰诺的前一天，劳伦斯要求麦克列沃“寄点什么给我读读，我已经5个月没有读到一本英语书刊了，除了《在西方人的目光下》，此书又很乏味。”他对爱德华·加纳特说他不能“原谅康拉德，因为他如此悲伤，委屈退让。”他还说他恨斯金伯格，因为此人看上去“很不自然，很做作，有些粗鄙——有些呆板，像易卜生，有些令人作呕，”这些表明了文学评论方面，劳伦斯有时还有局限。

12月2日，劳伦斯告诉麦克列沃：“我读了《制革匠小巷的革命》，我发现我自己特别喜欢路特福德。我以前觉得他索然无味，但我现在发现他是那样正直、勇敢和坚强。”他对所读的当代文学称赞很少，他对他的中西部同乡阿诺德·班内特的批评尤为激烈，他曾在10月份读过此人的一部小说：“我讨厌班内特的屈从让步”，他对麦克列沃说。“悲剧就应该真的与苦难抗衡。但《五城的安娜》看起来像是一种逆来顺受——自福楼拜以后的现代作品都是如此。我讨厌这个。我想尽快地冲洗自己，把英格兰的痕迹冲洗掉，

把那种陈旧,肮脏和痛苦冲洗掉。”另外一篇较为令人满意的批评是一篇 1928 年写的关于约翰·高斯华兹的作品局限性的论文,后来印载在《菲尼克斯》(Phoenix)一卷中。

1 月,劳伦斯写信给麦克列沃说他见到了恩利柯·帕瑟伐利和他的流动农民剧团上演易卜生和德阿能齐奥的剧本,还上演《哈姆雷特》,帕瑟伐利是个胖胖的、卡鲁索式的意大利人,他的《哈姆雷特》险些使劳伦斯忍俊不住掉出 8 号包厢:“作为一个唯一的英国人,在这里算得上是个头面人物——他们是特意为我演出的。”汉姆雷特被称呼为 Signore(先生),听上去十分有趣,这个口里嘟味着“Essere-Ononessere”的汉姆雷特在台上鬼鬼崇崇地窜来窜去,好像他在“àloCripen”谋杀了某位夫人,“是他父亲的鬼魂在追赶他似的”——然而,劳伦斯将这一切,加上其他的趣事,都写进了他的《意大利的晨曦》。

此书中的章节原是为杂志上的小品文出现的——《纺工和僧侣》,《柠檬树花园》,《剧院》——这些文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劳伦斯在加格兰诺的生活方式,因为它们都是他所见所闻的真实记录。这些文章在他的思想发展中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其中包含了他对工业化文明的第一次抨击。这一主题显而易见,但在后来的文章中却表现比较轻微;在 1915 年重写这些文章在 1916 年出版的时候,劳伦斯强化了这一主题。在重写中他还改进了文章的结构。下面一例就是他为《英文周刊》所写的有关他去教堂的描写:

我只到教堂去过一次。那里非常阴暗,有一股强烈的、缭绕了几世纪的焚薰之香味。这使我联想起了一些庞然大物的巢穴,我的神志突然醒悟过来。我期待着什么东西,我需要什么东西,我的肉体也苏醒了。我匆匆走到外面,走入外面奇妙的阳光之中。要我再进入教堂,得付出极大的努力。但是那铺饰过的门槛却像宝石一样清晰。

在《意大利的晨曦》中那一篇的不同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我走进教堂,那里非常阴暗,包孕着几个世纪以来余留下来的香气。这使我联想到了庞然巨兽的巢穴。我的神志被唤醒了,它们在闷热、芬芳的黑暗中跳跃。我的皮肤像是有所期待,像是在期待某种接触,某种拥抱,似乎它意识到了与物质世界的那种接触,与周围沉重的、充满暗示的物体之内体接触。那是一种感觉上的、闷热的、令人难受的黑暗。然而,我的灵魂在收缩。

我又走到外面。经过铺饰的门槛像宝石一样清晰,那美妙明眉的阳光在高空变得蔚蓝,好像注入了我的身心。

劳伦斯显然是在完成了《虹》之后重写此文的,然而文章中的大部分字句并没显示出他在写作这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娴熟的风格。而且经过修改后的文章中用了拉丁化的单词如 impregnated(包孕)和 affected(引起联想),这影响了文章的简洁性,被动语态的加入破坏了行文的直接性,还有重复——这是劳伦斯经常熟练应用的手法——也显得极不自然。但是,尽管有这些不足之处,第二稿还是优于第一稿,后者在承转上显得十分唐突。与第二稿相比,第一稿只是泛泛之作,第二稿中增加的词句给描述以一种肉体的直觉,将读者置身于教堂之中,这是第一稿所没有的效果。即使是那个从拉丁语派生来的单词 expectant(期待的)——在那儿是一个相当简单的词——因在“我的皮肤在有所期待”一句中也显得十分有效;还有“那闷热的、充满芬芳的黑暗”一下子把读者的感觉神经带进了教堂;充满芬芳一词用得恰到好处。

处。（对于这段文章，阿娜依斯·宁在她的著作《D·H·劳伦斯》1930年，1964年重印）中作过很有见地的评论。

劳伦斯在写作中想要捕捉的形象或象征物之一就是黑暗，与他的另一个象征物“元气”（theblow）一样，这成了他一个重要的形象。劳伦斯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然而，与许多真正的哲学家一样，他也在寻求一种理想的平衡，或在中间地带有所发现；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他后来用了极性（polarity）这个术语。

因为他认为在这个过于理智化了的世界上过于强调肉体 and 直觉，劳伦斯常常被人误解。在《意大利的晨曦》的《剧院》一文中，他不仅描写了帕瑟伐利的演技——在他写给麦克利沃的长信中——而且还谈到汉姆雷特代表了“一种肉体的退化”：从劳伦斯的哲学观点去看，他是过于理智化了的。劳伦斯“总是对汉姆雷特抱有反感：不管他是由福勃斯——罗伯特或其他什么人扮演的，在舞台上他看上去总是个卑躬屈膝，粗俗不洁的家伙，这个根据自画像和蜕变出来的鬼魂合成人物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角色”。在表现“那种来自肉体的精神上的剧烈反应”方面，帕瑟伐利是最为合适的演员，因为，他是“那种现代意大利人，怀疑、孤独、自悲，在一种肉体的堕落中挣扎。”当阿姆勒托的演出结束时，劳伦斯感到很高兴，“但我喜欢这剧院，我喜欢朝下观望那些农民们，他们是那样的全神贯注”。

《纺工和僧侣》，《柠檬树花园》和《剧院》三篇文章继《十字架》一文之后，组成了《意大利的晨曦》的第二、三、四章，它们讲的都是有关在加格兰诺的事情。在此书另外的六章中，最后两篇记叙了劳伦斯后来步行游历瑞士的经历；在这前面的四篇则描述了他们在森·高登齐奥的生活情景，这是在加格兰诺北部，位于陡峭山崖上的一个农庄，劳伦斯和弗丽达于1913年3月下旬在这里逗留了两个星期。

他们是在康斯坦斯和爱德华·加纳特的一位朋友安东尼夫人到达加格兰诺一个月之后动身去那里的。在劳伦斯的信中，这位安东尼夫人是位相当神秘的人物；除了对劳伦斯和弗丽达之外，她尽量不使自己引人注意，因为她是在惊恐地躲避她的丈夫，一个精神不正常的瑞典画家。他跟她去了英国，从那里，加纳特夫妇将她转移到了意大利。安东尼夫人实际上就是安东尼娅·赛利亚克斯，即大卫·加纳特在他的自传《金色的回音》（1954）的第一章里饶有兴趣地描写成安东纽斯夫人的那一位。

她是一位艺术家，画了一系列有关加格兰诺和森·高登齐奥的水彩画，这些画引起了一位专家缪尔赫德·保恩的注意，他对这些画的清新、简洁以及“非旅游者的目光”等特点予以好评，这些画“一笔一笔地勾描出真正的意大利，而我们的一些画都或多或少地忽略了这些特点。”保恩是在托尼萨莉亚克斯的《在意大利农民中间》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的，此书于1919年在伦敦出版。此书用散文和画的表现技巧描写了在高登齐奥的生活情况，书中作者将此地称作圣·劳伦佐是托尼·萨莉亚克斯最早偶然地将劳伦佐这个绰号告诉了劳伦斯。

《在意大利农民中间》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有关劳伦斯和弗丽达离开之后，托尼·萨莉亚克斯的小女儿去了那山边胜地后的情况。不管怎样，此书是《意大利的晨曦》的有趣指南，因为此书提供了劳伦斯在圣·高登齐奥四章中对人们的不同描写。在那里的是卡普利斯家族：他们在《意大利的晨曦》中以费奥利斯的名字出现，在托尼·萨莉亚克斯的书中则被称为卡斯特利斯。

萨莉亚克斯的那部书对这些人物和地方的描述要比《意大利的晨曦》中所记叙的详细得多，但是，《在意大利农民中间》的文笔与劳伦斯的对那些山民和他们的“非法”酒店，他们的花园和葡萄园，他们的舞蹈以及他们对美国的渴望的精彩描写是无法相比的。

就在劳伦斯动身去圣·高登齐奥之前，他和吉西终于中断了联系。他曾给她寄去《儿子和情人》的校样，曾给她去过一封信，她也回了信，他们的关系结束了——尽管吉西在劳伦斯去世后几年给海伦·考克的一封信中说：“从本质上讲，尽管他有一种深刻的感情，我对他的感情并无改变。他们所说的爱情之不可破灭，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中是非常正确的。”

自劳伦斯与吉西在1912年春天最后一次会面之后，他曾给她写过几次信。到德国后不久，他在特里尔给她寄去了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有一幅天主教堂的照片，然后，他写了一封信，可能是发自沃德布劳尔，信中他说起他还在继续《保尔·莫里尔》的写作；吉西得继续原谅他。她却感到她是否原谅他是无关紧要的。她认为，他必须对自己有所发现，“对此，只有无情的客观规律才能告诉他”。她自己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差一点垮了下来。几星期之后，劳伦斯给钱伯斯家寄去了一封描述他旅行的信，其中夹有一张给吉西的便条“pourvousseulement”（法语：仅写给你的——译注。）他兴奋地写到了“他所建立的新的归属”，告诉她要对这些情况严格保密，他对她说“只有埃达”知道这些情况。尽管此后不久，他将这些告诉了霍普金夫人以及她的朋友戴克斯夫人。他对霍普金夫人说，他已经“告诉吉西给他留个机会去摆脱我对她的影响。”

关于弗丽达的消息使吉西感到震动，尽管还没有使她大惊失色。现在她觉得她可以解除她一直对劳伦斯所承受的那种责任感了。她在信中告诉了他这一点。然而，她也意识到，她与劳伦斯关系的中止，意味着她的那个“更伟大的自我”的毁灭。尽管她是自由了，但前面的生活看上去是那样的凄惨和险恶。海伦·考克指出，这时候的吉西试图要调节她自己，却缺少劳伦斯当时的那种优越性，她“没有人物、地理或环境的变化去帮助她完成这个过程”。不管怎样，海伦和吉西在早些时候曾想去欧洲大陆度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们选择了莱因兰这个地方。

两个女人都接到了盖有那里邮戳的信，虽然吉西告诉海伦说劳伦斯去了德国，但她没有提到弗丽达。那是一个令人寒颤的假日；吉西十分沮丧，她的谈话中尽是讽刺挖苦，她失去了她原来的仪态，她侧乎是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上，忧心忡忡地”走着。在德国，8月的阳光照耀在古老的建筑上和迷人的花园里，但吉西好像对韦斯拜登、缅因兹和黑格尔伯格的动人景色视而不见，大部分的时间里，她离开海伦·考克，独自一人坐着读《卡拉玛佐夫兄弟》，从书中她看到了“我生活中的灾难”，但当她读完书时，她感到一种精神上的振奋，因为那书“将我与生活的灾难之间拉开了一段距离”。

关于吉西的那封说她已感到自由的信，劳伦斯没有作答复，但在1913年的春天，他让达克华斯书社给她寄去了一本《爱情诗》。她对诗中的大部分作品是熟悉的，但很高兴看到这些诗作被装印成册，她问她的姆妈要了劳伦斯的地址，给他去信致谢。他在1913年3月从加格兰诺给她回了信，使人惊异的是信中有许多亲昵之言，他还在信中极其荒谬地建议吉西去欧洲大陆与他和弗丽达一起旅居：“过去的一年对我来说并不尽是玫瑰。我在这里与弗丽达之间也有起伏曲折。但我们确实打算在离婚办妥之后就结婚。我们将

悄悄地在什么地方定居下来，也许在伯克郡。弗丽达和我无休无止地谈论着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来和我们呆一段时间。”

吉西实在是“啼笑皆非”，此信的语调中那种做作的轻松和想要引起她同情心的意图大大地刺伤了她。她觉得此信是。“笨拙”的，而且还“自命不凡”，使她觉得“沉闷难受”。

这时候，吉西的姐姐正好去看望她，在沮丧之中，吉西第一次给梅伊看了一封劳伦斯的信。梅伊勃然大怒——“他怎么敢给你写这样一封信！——于是，在她的建议之下吉西写了回信。她觉得这样做是一桩“残酷的事情”，但她也感到这是他们最后终结关系的时候了。不管怎样，她没有伤害劳伦斯，这一点在劳伦斯后来写给他妹妹的信中可以看出。确实，在这封信中，劳伦斯用模仿狄更斯式的签名（“你的痛苦的兄弟，D·H·戈密治”），对他妹妹说了一些许多年来吉西一直不知道的事情：他认为通过回信她采取一种很好的行动：

我们将在星期天离开这里——去圣·高登齐奥——那是离湖区约二英里远的一个农庄……

《儿子和情人》一书我收到了 50 镑的汇款。我给你寄去 5 镑，作为你对我作出的种种帮助和保障的回报。在你读过了这些校样之后，你将看到我为什么要将稿子寄给吉西。弗丽达将给你写的情况可能不是属实的。我有 8 个月没有听到吉西的消息了——也未给她姐姐去过信。我曾让出版商给她寄去过一本诗集。她答谢了我，我给她寄去过一份校样和一张便条。那张便条又转寄了回来。可能是我说错了。但假若吉西是故意这样做的——那么再好不过了。

所以，劳伦斯认识到他与吉西之间的关系终于要结束了。弗丽达在给本书作者的两封信中对此都作了评论。在其中一封信中（1950 年 5 月 27 日），她说：“劳跟我谈了数小时关于吉西·钱伯斯的情况。从劳的家庭方面去看，他欠她很多，但他们之间的人情关系并不起作用，她是一位女才子，他对她的温存要比她给他的多——她好像过于想用那种谦卑又专横的方式去驾驭他，——她很希望他成为一个温顺的英国小诗人。”（弗丽达在 english 英国的）字首用了小写的 e，这里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用法。

关于劳伦斯与吉西的关系在加格兰诺的最后破裂，以及关于吉西与劳伦斯母亲之间的竞争，弗丽达这样写道（1951 年 1 月 30 日）：

劳感到很不快，因为伤害了她的感情。她是那种“神圣的爱人”，你知道关于神圣和世俗之间古已有之的区别。她想用坚持她的“纯洁”的做法来维护她的地位，但又露出了破绽——总的说来，从人格上看，她并不是一个像他母亲那样的人，所以，好马终竟能取胜——她最终使我感到讨厌。劳和她在那本书的写作方面有些联系，但当她读过此书之后，她再也没有写过信来——在写她的过程中，他必须客观地找出他们关系中不妥之处，当然其中有许多好的地方——但是，什么是她的不足之处，她如何去承认或甚至认识它？……在他的写作中，劳伦斯必须得有一个女人作为他的验证或鉴别。

在他去圣·高登齐奥几天后写给埃达的一封信中，劳伦斯提起过他在那里继续他的小说创作。他说这部小说的写作比他寄给她校样的那部（《儿子和情人》）“要愉快得多”。此书显然是《姐妹们》后来演变成《虹》和《恋爱中的女人》两书。在同一天，他写信给大卫。加纳特说他正致力写作的那部小说（可能是《霍夫顿小姐的叛逆》）已变得“不合适了”。他说他已将

它搁置一旁，并开始写一部混饭吃的作品，他当时想的是《姐妹们》这书。然而，他又对加纳特说，此书正在发展成为一部“认真的，痛苦的作品”。

劳伦斯在4月5日以圣·高登齐奥写给埃达的一封信中提到他可能提早返回英格兰，信中还有弗丽达的一段重要的附言：

这是一个可爱的地方——高高的山腰间的一个农庄。农庄的周围有一条一英里宽的场园以及葡萄和橄榄园。我在一个被废弃的柠檬树花园里，那里的阳光是那么温暖。周围没有什么风信子。山里边尽是这种植物——还有紫罗兰。在灰色的橄榄树中，粉红色的桃花盛开，鲜红的樱桃花和洁白的梨花怒放了。我们很喜欢农庄上的人们，如此热情的人们——晚上，我们在厨房里做游戏。星期天，那里有一个四人乐队——大提琴、曼陀铃和两架吉他在房子的角落里演奏着十分动人的意大利乐曲，我们则随着音乐跳舞。山中的农民们也来了。其中有一个是拖着一条假腿的、漂亮而疯狂的家伙。他如痴如醉地与弗丽达和安东尼夫人跳舞，她是我们的一个朋友，也住在这里，她的舞跳得很好——因此，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生活相当不错。弗丽达接到你上次的信很高兴。她用此信作为攻击我的证据，以证明我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可我说你从来没有真的那样认为。

弗丽达的手笔：

是的，我也这么认为，你来信的时候，劳伦斯正把我搞得十分苦恼，以至于我开始认为我是这个世界上的多余之物，不配为人——他的烦恼全是由我所致，所以你的来信就像是来自全能者的帮助。我认为劳看上去很健康，然而，我们的生活当然是艰苦的。但我现在希望，因我的孩子们以及疾病等原因所造成的最困难的时期将要过去。不过，他确实是很好的，对他来说能对我这样是很不容易了。如能见到你我将十分高兴。我们将十分平静地生活在一起，直到我们结婚。婚后我们可能仍这样生活。（他说我给你写得太多了，他已经在妒忌你了！！）我总对他说，他要像你一样可爱就好了——所以我希望不久能见到你。

（六）欢乐的新朋友

劳伦斯和弗丽达在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维罗纳城呆了好几天，4月14日，他们乘夜车经布伦纳去慕尼黑。劳伦斯在几天以后给埃达的一封信中描述了他们客居在厄斯金豪森。杰夫家的情况，信中也提到了她临近的婚事：

首先，这个村庄是厄斯金豪森，所以你可以在它下面划上一道，然后是门契恩，那里是慕尼黑，在那里点上两点做个记号，再后是依萨托尔，那里是依萨峡谷，依萨是多瑙河的一条支流，它在英国诗歌中遇迹闻名：

依萨汹涌澎湃
波涛像严冬一样深暗
这汹涌澎湃的依萨。

此词的发音是依萨(Eser)alaAnglaise(在英语中)，荷林顿即在那里，天知道那场战争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的……

我们住在一片松林或也许是松科常绿树林像上的一幢可爱的小屋里，远处是白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大约在十英里之外。这里离开我去年居住过的阿依金不远。房子是弗丽达姐夫的。还很新，小巧玲珑。杰菲教授现在住在慕尼黑，所以这房子空着。我们将在这里生活一、二个星期——相当清静。

你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吗？

这房子建造在一片草坪上，草坪连着树林的一角，阿尔卑斯山区的报春花和立金花点缀在草坪上那一块块兰绿色的龙胆植物中。此村庄是个很小的地方。一头公牛郑重其事地将我们的行李从车站拉到了村中。我现在坐在小餐厅的灯光下。

这是一间全用木头建成的屋子。屋里有一个绿瓷砖砌成的火炉，和巴伐利亚的奇型怪状的瓷器。我就要上床去了，因为我得了感冒，当我从意大利来到茵斯布鲁克的时候，我发现这里遍地覆盖着白雪。我告诉你，我对此十分惊异，过了加达之后风吹得更猛了。但我的感冒却随着冰雪的融化而痊愈了。

现在我还说不准什么时候到英国——恐怕不能赶在你的婚礼之前了。我很高兴知道艾米·林姆和希尔达·帕帖特将作你的女傣相，还要穿上花纱上衣。看看，你是不是弄得太华贵了。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让艾迪也穿花纱上衣。

我想穿一件茄克衫。如果你坚持的话，我将穿一件白色的背心。

牧师——“是谁把这个妇人嫁出去的？”

我——“肯定不是我！”

但父亲无疑会对此机会十分高兴。不要剥夺他的父亲的权利。但关于《儿子和情人》一书你还是少说为妙。

至于离婚的事将会悄悄过去。请勿担心。如能在利普雷与你呆上一段时间我将十分高兴。我想到彭特里奇去。你还记得以前我们去那里时看到的酒吧吗？还会妇女协会。代我向每个人转达我的问候。

弗丽达很忙，她向你转达她的爱，她正在照看我。

向父亲问好。他去你那里了没有？再次向你祝福。

劳伦斯仅在两天之前也从厄斯金豪森写信给爱德华·加纳特，诉说了他和弗丽达的失望（她的“脾气很坏”），因为《爱情诗及其它》

(LovePoemsandOthers)只卖掉了一百本。后一个月(5月13日),他对欧内斯特·考林斯,他的一个笔友,抱怨说,那些评论者,甚至他的那些朋友,是那樣的含糊其辞,不敢称赞他的诗作,唯恐被人指责为不道德或愚蠢,这一切“足以能使花岗石的心破碎。”

劳伦斯对《儿子和情人》抱有更高的希望,到厄斯金豪森后他写信给爱德华·加纳特说,他知道他能“写出比英国任何文人都多的东西。我必须写我所能写的东西。我为大卫和哈洛尔德(赫伯森)这样的人而写——他们不久就会读到我的作品。我写的东西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他指的是《姐妹们》,这时此书已写了180页——他想写满300页——他说此书是“一部奇特的小说,好像是它自己生成的”,关于《耀夫顿小姐的叛逆》一书,现在已写了200页,他说此书进行得“十分缓慢”,但“非常激动人心……目前,它在我心中占次要位置。”他感到《姐妹们》一书更加重要,此书严肃地涉及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当代重要的问题。在4月26日,他写信给麦克列沃说他已写到了145页,但还不知道这将会是怎样的一本书;虽然弗丽达说这本书写得不错,可他并不喜欢,对劳伦斯来说“那像一部外语小说,我不太熟悉这种语言——我对其内容只能知道一个大概。”

在厄斯金豪森,劳伦斯又发现了德国的讨厌之处,即使是南部德国也是如此。他老是希望自然景色能倒转回去,让拉戈迪·加达再展现在他的面前。他不可能知道十五个月以后德国人的铁蹄将踏进比利时的国土,但在大战前的巴伐利亚,他已能感到大地的撼动。1912年他第一次去德国的时候他曾给爱德华·加纳特寄去过一首以沃夫哈茨豪森为背景的叙事诗,《手执带血马刺的年轻士兵》,诗中,那个士兵对马的虐待和他对一位侍女的虐待形成对照。1913年又回到巴伐利亚时,劳伦斯以依萨托尔为背景写了一篇有关一个普鲁士军官的短篇小说,他称之为《荣誉与武器》,他对加纳特说,这是他到当时为止最好的短篇小说。也许在这时期,他还写了另一个短篇《弗茵·奥汀耐尔》。像《荣誉和武器》一样,这也是一篇关于德国军队的故事,第二年发表于《英文周刊》。《弗茵·奥汀耐尔》后来取名为《肉中之刺》。

在1941年,加纳特将《荣誉和武器》的篇名改成了《普鲁士军官》,并将此名用作劳伦斯短篇小说第一卷的卷名,在加纳特的指导下,达克华斯出版社出版了此书,加纳特更名的举动使劳伦斯十分生气,也许劳伦斯感到不满的是因为人们认为这篇小说可能是应稿约而写的,因为他的通讯表明,此篇小说是在1913年春天成稿的,这是具有预言性的。而不是马后炮或赶时髦。

此篇小说所预言的不仅仅是战争所固有的残暴野蛮,因为战争毕竟是对敌人而言的,尽管这个敌人常常只不过是一个无害的老百姓。《普鲁士军官》涉及更多的是在1913年至1914年间从“扎本事件”开始的一种军国主义。扎本,离弗丽达的家乡曼兹约60英里,在前一年的秋天,这里是宣布对阿尔萨斯人实施军事制裁的地方,尽管“纯粹的”德国人认为这些阿尔萨斯人是异己分子,他们作为德帝国的一部分已有40多年了。在1913年,对老百姓的谩骂、暴力和监禁已时有发生。然后,发生了一起大多数德国人认为是暴行的事件:路特耐特·冯·福斯特纳,早先曾因侮辱阿尔萨斯应征士兵受过罚。这次,他用他的马刀砍死了一个铅皮匠。法庭最终以“正当防卫”的理由释放了冯·福斯特纳。这一决定大大地激怒了雷契斯达克的成员,于是,他们以压倒多数的投票通过了对政府的不信任表决,这起冯·福斯特纳事件

仅仅是在军队中发生的其它许多事件中的一个例证，这个军队是受到了等级社会的观念和征服的欲望所支配。劳伦斯在曼兹作浪漫游旅时曾被作为间谍逮捕过，所以，他有机会对那里和德国其他地方的普鲁士主义有一个直接的了解。

在《普鲁士军官》的故事中，他提到的另外一点是同性恋。在当时的德国大丑闻中，德国皇帝的宠臣菲利普·佐·欧伦伯格伯爵（在劳伦斯访问德国的前几年已经失宠）到底是否有罪是值得争议的；但这丑闻震撼了全国，特别是法庭和军界。劳伦斯虽然没有在一个受纪律约束的、全是男人的集体中生活过，但相当能理解在这样一种强制性的集体生活中，往往会发生一种同性恋，并常常会转变成性虐待狂。作为一个也许没有读过弗洛伊德的年轻人，劳伦斯对这类问题有一种很敏锐的洞察力。前一年的秋天，他在信中谈到加纳特的剧本《阿克迪琼》说此剧本看来是“一份历史性的文件”，是“极为”有意思的作品：“残酷是一种性反常行为。我想要论证这一点。独身生活中的牧师性欲旺盛，然后变得反常，然后变得精神错乱，于是便有了酷刑——都是由性引起的。还有，士兵们在集体中生活，只有男人而没有女人，从来不能从一个女人那里得到满足，不能像其他男子一样从街头妓女那里得到满足，便将他们过剩的性欲以及他们的沮丧和不满渗入人生命力之中，便喜爱残酷。是性欲的骚动导致了这种暴行。”

这就是他在7个月之后写出那篇关于普鲁士军官的潜在动因。1913年德国的春天为他提供了背景素材，但这个想法在劳伦斯的意识中已经蕴酿了一段时间了。弗丽达的父亲在军队服役其间，与他的其他一些同僚一样（正如我们所知）经常鞭打他的勤务兵，虽然还不到着魔的地步，弗丽达后来告诉劳伦斯的她年轻时候的事故之一是关于一个年轻的下士曾向她报露过他是怎样的憎恨军队生活中的野蛮和不公平；自那以后，军队阅兵式和军乐队对他的魅力就小多了。劳伦斯当然看不出军队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他的两篇关于德国军队的故事都同情地反映了下级士兵们的观点。确实，这两篇故事的模式是一样的，都是讲一个士兵因顶撞上司而招来灾祸，《普鲁士军官》一篇表现得更为严肃，尖锐和深刻一些。

在1914年《英文周刊》6月版发表的《肉中之刺》的第一个版本中——即《弗茵·奥汀耐尔》一稿——劳伦斯并没有指明背景，但同年12月此文在那本短篇集中出现时，他在第一段中就提到了曼兹。故事描写了弗丽达的家，她的父亲也作为一个角色在故事中出现，这位男爵的右手在法——普战争中受伤致残了。在杂志上刊登的那一篇中，对情节的描写较之后来一稿要温和得多，结尾也与后来一篇不尽相同，前一篇中的男爵这个人物要更加粗暴一些。劳伦斯可能是在弗丽达的要求下对结尾作了修改，使男爵更富有“人情味”，但也许他还记得，男爵毕竟在曼兹搭救过他：没有他的帮助，劳伦斯可能会被捕入狱或被驱逐出境，在当时正准备和弗丽达私奔的当口上，这种情况对男爵和劳伦斯的自由都是不利的。1914年7月，在劳伦斯把他的短篇小说寄给爱德华·加纳特准备出版成集时，他扣下了《弗茵·奥汀耐尔》，他说，他要将此篇重写一遍，“使之更加紧凑”。也许，在当时他觉得，作为一篇故事，将男爵写得温和一点会使故事更加有力。

不管怎样，在写那两篇反对军队的小说时，劳伦斯正处于对德国，甚至是美丽的巴伐利亚的厌恶之中。弗丽达急于要回英国，劳伦斯答应与她回去，尽管这时候他最希望的是重返意大利。他甚至考虑过在曼恩岛上定居下来，

他以前的朋友阿格尼丝·赫特也在那里协助她的丈夫主办一所学校。他在 6 月 11 日，写信给麦克列沃：“周刊（指《英文周刊》）是那樣的糟糕。你觉得《儿子和情人》一书怎样？我极想知道。你看到其它什么评论没有？图书馆开始拒收此书，后来同意了。一星期后我将离开此地，——也许回英国，但还说不准……”

当他真的回国之后，他和弗丽达去了西阿纳，在那里与加纳特太太和大卫住在一起。6 月 21 日，劳伦斯写信到爱德华·加纳特在伦敦的办公室，说那天上午他很高兴收到了达克华斯书社寄给他的 50 镑和加纳特帮他收集的有关《儿子和情人》的书评。这些评论使他感到他的回国是及时和顺利的。大部分评论对他的小说都是友善的，尽管这些评论家可能没有想象到《儿子和情人》会作为此时期的一部稀世之作，在未来被大加研究，并在未来会有那么大的声誉。不管怎样，伦敦的《星期六评论》在当时也确实肯定了这一点，评论说，“在读过了本年度的大部分”重要的“长篇小说之后，我们可以说，在趣味和力度上，还没有发现能超过它的”，并补充说，“此书的不足之处加在一起是相当大的，但只有当我们与它的全部优点放在一起衡量时才能注意到这一点。”

《西敏寺周末报》的评论员痛惜地指出，“观点的转变（我们将不称之为一个错误）将劳伦斯先生引入了一些名声卓著的小说家的行列之中，他们着重于描写感情，而不是行为”。这“使得整本书趣味索然”。但不管怎样，此书“充满了美的气息和深邃的观察力，在这方面，劳伦斯先生堪称一位大师。”《学园》杂志认为，此小说“是对严酷的生活的极好研究，使人感到十分压抑。”《雅典娜神庙》的讨论则察觉出了该小说的自传体特征，他们认为这削弱了小说的感染力，还感到那姑娘的故事若是真实的话，“则是表现得太异乎寻常了”；但是，尽管我们可能会有反感，我们还是会聚精会神地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我认为某些形象会深刻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在美国的评论中，阿尔弗雷德·库特纳在《新共和国》上说《儿子和情人》中包含着一些类似于弗洛伊德的东西，其中“充满了力量和热情，在某种程度上还无法让人理解。我们在目前不妨就直观地接受它”。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小说家路易斯·芒塞尔·弗尔德认为，《儿子和情人》“是一部极为罕见的好作品。”

这时候的劳伦斯不想在英国去会见许多人；他觉得他已经割断了过去生活的纽带。但弗丽达却结交了一些新朋友，其中包括他们后来的挚友约翰·密德尔顿·莫里，和凯瑟琳·曼斯费尔德，她曾是《韵律》的副编辑，劳伦斯曾给这部刊物投过稿，她现在主编《蓝色评论》，此杂志也将要停刊。

莫里是来自伦敦南部的一个穷孩子，曾凭奖学金上过牛津大学，（劳伦斯：“我认为牛津大学让你受害不浅。”）他后来进入了伦敦新闻界，并最终成了一位评论家，过着相当不错的生活。他在 1911 年 12 月与凯瑟琳·曼斯费尔德相遇，当时她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当她与莫里坠入情网之后却不能结婚，因为她与音乐家乔治·鲍顿之间的一段短暂姻缘还未了却。直到 1918 年，莫里才得以与她完婚，与此同时，他们时而同居，时而分开，时而争吵，然后又共同主编小刊物和进行写作。莫里在 1913 年 7 月遇见劳伦斯和弗丽达时已年近 24 岁了。他仪表堂堂，宽大的嘴，一双灰色的大眼睛；当时的发式是让一屯刘海垂到他的右眼上面。他原来的朋友亨利·高迪亚·勃雷兹卡，在一次与莫里的争吵中用石块砸碎了他为莫里所塑的头像，那尊头像表现了

当时的莫里“体格健壮，那像巨神般的头颅和俊美的面貌，就像太阳神，或战神玛尔斯”。高迪亚·勃雷兹卡曾描述凯瑟琳·曼斯费尔德是“一个漂亮得出奇的女人，期拉夫人的面型，极有头脑”。她身材不高，有一双深邃的黑眼睛，说话时嘴唇绷得很紧；她也留着刘海，她梳理的这种发型在几年之后成了一种流行款式。

在1913年夏天，劳伦斯和弗丽达去了肯迪什海滨的金斯基特，在那里度过了7月份的大部分时光。在此之前，他们去伦敦拜访了莫里夫妇（他们在伦敦是闻名遐迩的）。当劳伦斯与莫里夫妇还只有通信联系时，他曾经说他们的杂志是一份“傻瓜刊物，但大众觉得它很不错”。他和弗丽达第一次去看他们的时候，莫里夫妇在钱安斯利巷的57号住着一套三间的公寓，那里也是他们刊物的编辑社。劳伦斯第一眼看到的凯瑟琳·曼斯费尔德是在一间空荡荡的屋子里，坐在一只金鱼缸旁边的地板上，她看上去很年轻。当劳伦斯讲给凯瑟琳·卡斯威尔听时，弗丽达补充说，凯瑟琳非常漂亮，“两条那么迷人的大腿”，劳伦斯紧接着说，“如果你喜欢哑剧中扮演主角的男孩子的大腿的话（当时这一角色总是由姑娘扮演的。）”

莫里回忆他们聚会的第一天时说“劳伦斯身材细长，甚至有点孩子气”，戴着一顶成了他形象特征的草帽，“弗丽达那一头秀发在她的巴拿马礼帽下飘动”，他们一同去了苏和吃午饭，当弗丽达看到莫里夫妇在双层公共汽车的上层。在明媚的阳光中伸着舌头互作鬼脸时，她马上爱上了他们。

弗丽达认为“他们之间有一种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种只是一时的冲动和欢情”，尽管，友谊中的这种感情不能持久。对弗丽达来说，凯瑟琳·曼斯费尔德是个小妹妹，凯瑟琳不久便成了弗丽达和她的儿子，女儿之间的信使，去汉帕斯特德为孩子们捎去他们的母亲的问候和信件。弗丽达有一天早上等在孩子们上学去要经过的路上，孩子们见到她时，围在她的身旁欢跳着：“妈妈，你回来了，你什么时候回家呀？”但后来一次她见到他们时，她发现孩子们都被教得不同她讲话了，“他们只是用白嫩的小脸对着我，好像我是一个鬼怪。”与此同时，弗丽达想要办离婚的努力也没有进展。

在金斯基特，劳伦斯和弗丽达遇见了其它一些新朋友，在7月22日给麦克列沃的信中可以看到这一情况：

我们是一帮了不起的人，爱德华·马什星期天到了这里（他是个乔治时代诗中一样的人物，他是温斯顿，丘吉尔的海军部的秘书），他带我们去和赫伯特·阿斯魁斯——一位非常和善的人——首相的儿子一起喝茶。今天，我要去见瓦特拉雷爵士。

近来，我正孜孜不倦地从事于短篇小说的编纂。天哪，当此工作完成后，我将感到欣慰。我将再去德国开始我的长篇小说创作。

我们在海滩上的孩子们中间嬉戏，我在这里给你写信：这是一种无忧无虑但又淡然无味的生活。

可怜的菲利浦（史密斯）。他很快就会像亚历山大一样，再没有可以征服的世界了。但我还是想到欧洲去旅行，除了德国和意大利，不过我眼看着囊中之物即将用尽。

弗丽达向你致以热烈的问候——une bonne poignée 爱德华·马什，曾在加格兰诸写信给劳伦斯，要求将他的《金鱼草》一诗收入他的《乔治时代诗歌》：1991——1912年，通过爱德华·加纳特将他的支票转寄给劳伦斯，他知道加纳特是劳伦斯的朋友。支票转到了金斯基特，劳伦斯接到三镑后高兴

地写信给马什表示感谢，他同时也表示希望马什能去肯迪什海滨去看望弗丽达和他自己。马什本来打算在7月20日星期天，去那里看阿斯魁斯夫妇，便决定让劳伦斯和弗丽达与他一同前去。在那天晚上写给鲁帕特·布鲁克的信中，他说他们俩去阿斯魁斯家的访问“是一次极大的成功”“他看上去好像病得很厉害，恐怕真是这样——他的妻子是个体态丰满，快乐健康的德国人，看上去他们在一起很幸福”。弗丽达因为说了马什看上去不像一个喜爱诗歌的人而伤害了他的感情。劳伦斯后来对马什道歉说，他在介绍时错把他的情妇说成了妻子。

此后不久，当劳伦斯从巴伐利亚给辛西娅·阿斯魁斯写信时，不知道应该用太太还是夫人去称呼她。她曾在一次谈话中解释说，到上一年为止她还是阿斯魁斯太太，直到她的祖父威密斯和马奇伯爵去世，将爵位传给辛西娅·阿斯魁斯的父亲，于是，她马上就变成了辛西娅夫人（不是阿斯魁斯夫人）。

年轻的阿斯魁斯夫妇在伯劳兹德尔斯有一幢小房子，劳伦斯和弗丽达去那里吃过好几次饭，并和他们一起在石灰岩悬崖下的沙地上散步，有时唱着《汹涌的波涛在说什么？》赫伯特·阿斯魁斯阁下还记得劳伦斯是“一个生活在远离政治尘嚣的高原上的诗人，但又对当今社会的价值和政治领导人深恶痛绝”。关于这个时期的劳伦斯，我们还有另外一幅肖像，是来自亨利·萨维奇的回忆录，他是理查德·密德尔顿的朋友和传记作者。萨维奇在《学园》杂志上发表过对《白孔雀》的评论，劳伦斯的一封答谢信开始了他们之间长达数年的友谊。1930年，萨维奇对将近20年前的劳伦斯作了回忆：

那时他还年轻，但身体不好；他与之搏斗多年的肺结核的病根仍缠在他身上。在肯特，我曾与他呆过一段时期，——他刚刚与一位已婚的夫人进行了一次浪漫的私奔，后来，他与这位夫人结了婚——我得到过一个奇特的印象。有一次我们正舒展四肢躺在悬崖上。A Propes debottes（无缘无故地）他突然猛烈地捶打着他的胸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中维奇，”他说，“它比混凝土还要沉重。如果我不能把它弄出来，它就会置我于死地。”他可能说的是他的身体情况，但我倾向于认为，他所指的是那种黑暗的、奇怪的力量，他在后来的许多小说中找到了表达的方法。

莫里夫妇也在去金斯基特的访问者们中间。劳伦斯第一次邀请他们时，他们没有去。马什的话使劳伦斯很吃惊，他说他们可能是因为没有旅费。他曾以为莫里和凯瑟琳·曼斯费尔德的境况很不错，通过写作可以比他更容易挣到钱。他在7月22日写信责备了莫里，说他早知道就会借给他一镑钱；他又邀请莫里夫妇下一个周末去他那里。于是他们去了，并带去了他们的朋友查尔斯·亨利·高登·康帕贝尔，他是个爱尔兰人，在伦敦当一名见习律师。他们一起游泳、闲谈，玩得非常愉快。莫里后来说，凯瑟琳·曼斯费尔德的游泳技艺十分高超，他自己也游得很好——“这是我唯一能胜过劳伦斯的地方”——他们开心地吃着牛排和西红柿：“由于某种原因，这次会面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劳伦斯和弗丽达打算再去意大利度过一个冬天，他们邀请了莫里夫妇同去那里。莫里表示同意——如果可能的话。当他们离开金斯基特的时候，劳伦斯递给他们一本《儿子和情人》，让他们在火车上阅读，小说的一开始几页就给莫里以一种“温暖浓厚的黑暗之印象”。

7月底到了该劳伦斯离开金斯基特的时候了，他十分高兴离开“这个半

透明的，毫无可取之处的地方。”从创作上讲，他在那里度过的几个星期是失落笔杆的几个星期。但在前一年的丰产之后，他需要在这段时间搁一搁笔，而在此期间，他的视野得到了深化，他的艺术力量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尽管《儿子和情人》的销量不大，不能为他的未来提供经济上的保障——实际上，达克华斯书社在第一版上是赔了钱的——但此书确立了他作为一个严肃和重要作家的地位。这位矿工的儿子，可以会见首相的儿子和儿媳，并在他们家中博得牛津大学的拉雷教授的赏识。

从个人角度讲，这个夏天，劳伦斯结识了两个最重要的人物，约翰·密德尔顿·莫里和凯瑟琳·阿斯奎斯。莫里这位后来成为劳伦斯生活中敌人的人——同样，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讲劳伦斯后来成了莫里生活中的敌人——在好几年中是劳伦斯所寻求的、理想的朋友。辛西娅夫人（后来，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她被她的朋友和家人怀疑与劳伦斯有恋爱关系）则成了一个理想化了的、被崇拜的、梦中妇人。尽管，劳伦斯一直爱着弗丽达，但在他的作品中再三地暗示出一种对辛西娅、阿斯奎斯的特殊的爱情。很可能他没有对她说明这一点，他一直是她和她丈夫的好朋友，但在他的写作，以及甚至在他的绘画中，他好像间接地向她表达了他的爱情。

第三部 大战时期

（一）意大利序曲

《儿子和情人》一书写成以后，劳伦斯进入了创作的新时期。在《瞧！》一集中的诗作，一开始就预示了这一点。但在他的小说创作活动中体现出这一点，还是经过了一些时间，因为在完成《儿子和情人》后，在加格兰诺的写作仍限于他早期的模式。即使《姐妹们》的前部份还显然“只是旧题新作”而已。但尽管偶有“写作障碍”，这几年是劳伦斯突飞猛进的时期；《瞧！》诗集已预示了这一点，但正如劳伦斯本人所感觉到的，能真实估价此时期的是《儿子和情人》和《虹》两书之异处。

在完成《儿子和情人》后重返故里受到盛情款待时，劳伦斯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个人物”了。弗丽达的形影相随更使他踌躇满志。他把一个女人从他丈夫庇护下夺走，尽管她对她自己的孩子们十分钟爱；他已经成功地守住了这个女人，她曾以生母的身份回去看望她的孩子，但这也没有使她离开他。当他们又向南旅行时，他们知道他们将一起共同走完以后的生命旅程了。

那本以后成为《虹》的书，此时已在劳伦斯心中燃起了火焰。这不是一本易写之书，他得为之呕心沥血。在德国，在意大利，最后在英格兰，他都在为此书冥思苦索。当他终于在田野、矿舍和煤井上空画出一条神秘的虹，并能在它下面信笔驰骋时，那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啊！“我已完成了我的彩虹！”

但那一天几乎是在两年之后。这期间劳伦斯和弗丽达在欧洲大陆上逗留了很长时间，在1913年8月的一天，他们来到了厄斯金豪森，仍在杰费下榻，劳伦斯提到：“至少在这段时间”弗丽达“对她孩子们的牵挂稍稍缓解。”他对他的新约稿人亨利·萨维奇说：“我有一个英国人的老习惯，就是烦恼愤怒都强压到肚里，使得它们在里面折腾破坏……多亏了弗丽达，我现在也开始在学会稍稍作些发泄。”后来人们注意到他在这方面也许学得太好了。

对劳伦斯来说，这是一个不安的夏季，在巴伐利亚插曲进程中，《姐妹们》的写作进展缓慢，当劳伦斯和弗丽达在厄斯金豪森呆了五个半星期后，他俩离开时却分道而行。弗丽达还要去德国探亲；劳伦斯想取道瑞士，起初他们计划一周后在巴塞尔相会，然后一起朝南取道古老帝国路线通往意大利。但他们又改变了计划。劳伦斯独自一人取道圣哥泰关。弗丽达已爬够了山路：她的主要路线将是铁路。

劳伦斯几乎花了两周时间穿越瑞士，他发现那块国土是“旅行者涉足过多，平庸和宠坏了的地方”，尽管若干年后他还是逐渐地爱上它了。他感到他自己好像是一只昆虫沿着闪烁耀眼的雪山向上爬行，那里的村落星罗棋布，恰似悬挂在“死亡的边缘”。从山谷里的工厂烟囱中冒出的烟雾使他联想到他家乡污染的空气：“这是人间可怕的现象，可怖的工业进步给大自然带来弊端，它是那么令人受罪！”运水果进城的农夫好似想逃脱这种可怕的遭遇，但不用多久也免不了同样受罪。

劳伦斯无法自欺欺人地认为呆在瑞士很快乐，甚至在他进入意大利后仍旧感到，“崩溃的过程”没有结束。至少它还有一定的力量，当他在米兰等待弗丽达时，他有这种感觉。当他坐在大教堂广场喝酒时，他注意到他周围的居民在“完全的机械化”的威胁下，还知道一种“尚有生机”的生活，在描述及观察这种景象时，他就是在这一点上结束《意大利的晨曦》的，此书

在 1918 年出版，在这版本中，他对以前发表在杂志上的那些章节作了许多修改。

在离勒里希不远的菲亚斯彻里诺，劳伦斯和弗丽达租用的小屋相当古老但完美无缺，他们的渔村别墅是一座方形粉红色的建筑物，它被一石梯分为两片，一端有一间会客厅，厅上有间卧室，厨房在另一端，上面也有间卧室。这座盖姆勃罗西尔别墅，造在离水面很高的山崖上，背后有长满橄榄树和柠檬丛的山丘。劳伦斯化了 60 里拉租金，还付 25 个里拉给仆人。劳伦斯和弗丽达在那里整整住了 8 个月。

《姐妹们》的写作仍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当他到达菲亚斯彻里诺不久，劳伦斯说（10 月 5 日）《儿子和情人》的星星“已从我们的天空陨落，现在我正致力于一部完全不同的小说”，但到了 10 月 27 日，他补充说：“琐事弄得我心神不定：由于搬迁以及弗丽达对孩子的牵挂，还有其他别的事，使我无法工作。”他接着说，“像我和弗丽达这样做决非易事——我的精神十分劳累”。到了 12 月 2 日，写作继续在缓慢地进行，“但这儿太美了，使人无法工作”。12 月 21 日，劳伦斯对爱德华·加纳特说：“小说进度很慢，几天后我会把手稿的前半部寄给你。”

虽然他完成了《姐妹们》的初稿——他认为那将是最后的一稿——那已是 1914 年 5 月中旬。在菲亚斯彻里诺逗留的一段时间里，特别和他在加格兰诺逗留的时间相比，对劳伦斯来说是少产的时期。在菲亚斯彻里诺，劳伦斯显然没在《瞧！》诗集中增加过一首诗。在那一段时间里他显然没有写过短篇小说和文章。但他却不时地对米歇尔·肯纳利不久在纽约出版的《寡居中的霍罗德夫人》这剧本小题大做。米歇尔·肯纳利出版了《儿子和情人》的美国版本。在爱德华·加纳特的劝告下，达克沃尔斯准备用从美国进口的纸张在伦敦出版这个剧本。

《寡居中的霍罗德夫人》是短篇小说《菊香》的扩充，在这两个剧本中的情节主要人物都以劳伦斯所写的新宾斯利中的埃玛姑娘为蓝本的。当劳伦斯到达巴代利亚，他告诉肯纳利，他的手稿已经放在爱德华·加纳特那里两年多了，并且它需要“加工”。他从意大利写信说：“想到有一天这个剧本要出版，我很高兴……我真诚希望你认为我的著作是投机的好机会。我相信你们会的。请接受我对你们的感谢，感谢你们为《儿子和情人》广泛地做广告。我喜爱对它的评论。”

劳伦斯热情地写信给加纳特谈到肯纳利，他和劳伦斯一样来自英格兰中部，在许多方面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位理想的出版商，几年后，他是一位有名望的摄影家阿尔韦雷德·斯蒂格利兹有影响的赞助人。但肯纳利本人仅仅是劳伦斯在美国碰到的在出版方面麻烦的开始，他于 1914 年春开了一张日期曾更改过的 35 英镑支票；劳伦斯把这笔钱送给弗丽达作为零用钱。但斯培西亚的银行不给她兑现，银行将这张支票退还给了肯纳利，他“就此没有付这笔钱”。劳伦斯在 10 年后写道：“直到如今《儿子和情人》没有收到稿费。到了 1924 年美国把我最畅销的书分文不付地拿走了——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

肯纳利当时住在头等旅馆里，直到 1950 年忧郁自杀之前，他总是运气不错的。在埃德纳·圣文森·密雷出版的信件中对他的引证表明：他和劳伦斯的关系与他和其他作家有所不同，是有代表性的，虽然凡·怀克·勃鲁克斯反对他这么说：“从那些与他关系不和的作家那里，他什么也没有得到，有

谁会出版这些书？有谁会像肯纳利这样热情地为他们的第一本小册子喝彩？……他应该被一代作家看作是一位朋友。”这些是温和的观点，但是菲亚斯彻里诺的情人们无疑宁可要实实在在的金钱。

在经济方面，他第二次在意大利客居，对劳伦斯来说是烦恼的继续。他刚到意大利就要爱德华·加纳特从他“剩余的钱中”拿出十英镑给他。他一次又一次在菲亚斯彻里诺索取金钱：《儿子和情人》初版亏了本使他懊丧：“如果一位出版商为我而亏本，我宁愿他是一位像海因曼一样是个有钱的商贾。”他犹豫不决是否要继续与达克沃而斯这样的小公司做交易，因为有两个主要的代理人 J.B. 平克和寇蒂斯·布朗曾以有诱惑性的价格从他的出版人那里买他的小说，保证使出版人“在经济方面信任他们”，劳伦斯认为这一点加纳特是办不到的：“我必须让我的小说赚钱以维持我的生活。”劳伦斯感谢平克：“《儿子和情人》不见得能创奇迹，但我相信达克沃而斯和迈克尔·肯纳利做了出色的宣传。至于说给你一部小说——老实说，在近期内我是写不出的，我能够的话，我会写的……一年我只写一部。”

经济方面的烦恼不是劳伦斯唯一的烦恼。在菲亚斯彻里诺，他和弗丽达开始在社交界活动频繁起来，这在比较偏僻的加格兰诺是办不到的。《爱情诗集》和《儿子和情人》在经济上虽未得益，但至少它们使劳伦斯成为一个知名的作家，许多作家在路过意大利时都不惜绕道去探望他。斯培西亚海湾的英属殖民地款待了劳伦斯和弗丽达一段时间，“因而我们经常外出参加茶会或接待来访”。斯培西亚的英国总督托马斯·达克·登乐普（后来称为托马斯爵士）成为他们的好友，另外一位牧师也喜爱劳伦斯先生和夫人。（“当我们黑暗的历史过去后”劳伦斯对加纳特说，“我要大笑”）当他与弗丽达到勒里希去时，他们取道陆路，因为劳伦斯和弗丽达没有乘船，由于有一次在回家途中，他们之间发生争吵，弗丽达几乎把小船弄翻。劳伦斯还记得雪莱曾在那海里淹死。

在勒里希的英国居民中，劳伦斯和弗丽达最熟悉的两个人就是奥勃雷·瓦特菲尔德和他的妻子林娜。他是一位画家，从 1921 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是《观察》的意大利记者，后来成为新闻协会的记者。瓦特菲尔德夫妇住在阿平宁斯的奥拉，一座离斯培西亚 16 哩的城堡里。劳伦斯最早遇到的是奥勃雷·瓦特菲尔德，他和乔治诗人一起来到了菲亚斯彻里诺，他们就是拉斯塞拉斯·阿伯克隆姆贝、威尔菲里德·威尔逊·吉卜森和罗伯特·卡尔佛利·特里弗里扬，他们在一次农民婚礼上遇见了他和弗丽达。劳伦斯喜欢这些来访者，但他对麦克列奥德说，“离席去参加一小帮英国文人的气氛严肃的闲谈，实在太可笑了。”

劳伦斯和弗丽达到住在奥拉的瓦特菲尔德家去了两三次，对此地，他有两种相反的说法，在同日信件中他也写到：喜欢它也不喜欢它。

到菲亚斯彻里诺去的一位来访者是爱菲·罗，她是一位年轻的小说家，后来成为驻英国的苏联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的妻子。她读了亨利·詹姆斯于 1914 年发表在《文学时代》副刊中《青年一代》这篇涉及劳伦斯的文章后，她写信给他表示愤慨。詹姆斯曾赞扬过像吉尔伯特·加农、阿诺德·班内特、休兹·瓦尔波尔和康普顿·麦肯色，而贬低了劳伦斯。詹姆斯称赞班内特将“一艘船推下水开始了新的航行”，詹姆斯还称赞瓦尔波尔“精力充沛地划着桨”，詹姆斯继续煞费苦心地用前后不一致的隐喻说什么劳伦斯“望尘莫及”。埃迪斯·华尔顿回忆起那时的一个朋友曾一再问詹姆斯是否真的读过

劳伦斯小说，最后，他俏皮地说，“我——我对序言就不屑一顾。”

爱菲·罗对詹姆斯文章的异议是代表年轻一代的人对待劳伦斯作品的热情的反应。例如，在1914年，劳伦斯后来的朋友，菲利浦·黑索尔坦尼写信给他的音乐老师弗雷德里克·德留斯说，他刚读完劳伦斯的三部小说，“他觉得他的作品和当代任何作家相比，在见识的深度与词藻的美丽方面简直是无可比拟的”。在1915年2月27日的《新共和国》中，丽贝卡·威斯特——一位22岁的作者曾多次为劳伦斯辩解，批评詹姆斯默认对这年轻一代唯二的作家使用轻蔑的词句。劳伦斯不仅写了而且还创造了任何时代都感到荣耀的不朽作品。

约翰·高斯华兹将一些对立的看法在1914年4月13日的信中告诉了爱德华·加纳特，此事已是众所周知了。高斯华兹喜爱《儿子和情人》中的家庭场景，但他并不喜爱他所谓“爱情部分”。他认为花费时间和笔墨去描写性感状态从未尾倒数第二位的动人心弦的事，和人处于性兴奋时的实际动作，是不可取的。我们都熟知这些。这本书有“天才之处”，但并不在那些场景中。这样的评论是劳伦斯终身所能期望的来自那些官方或半官方对“文学”的反应。

高斯华兹对劳伦斯的评价代表了一种平庸的“理解”，这位《福尔斯得英雄传》的作者是个自满自足的平庸之辈，他的这部系列小说曾风行一时。70年代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英雄传》名扬天下，不仅因为它华美的服装和布景，而且也因为那些将此书改编为电视剧的作者实在要比高斯华兹要高明得多。

爱菲·罗和凡尔拉·梅奈尔一样对劳伦斯满怀热情，这两位年轻作家对她们的朋友们发出了最后通牒：《儿子和情人》的作者是天才，那些不相信这一点和对此“茫然无知”的人不能成为她们的朋友。爱菲·罗写了一封信给劳伦斯，为此，她被邀请去菲亚斯彻里诺；她把手头所有的钱购买了一张往返车票，她还向凯瑟琳·杰克森夫人借了衣服。这位夫人后来也见到了劳伦斯和弗丽达。

爱菲·罗去菲亚斯彻里诺的访问，使她头脑昏乱，心乱如麻，因劳伦斯从一开始就一一数落她的缺陷，其中好多是别人从未发现的。“大约六个星期之后”，她离去了。这对弗丽达来说如释重负。爱菲·罗在恍惚中回到了伦敦，劳伦斯动摇了这位曾出版过两部小说的女作家的自信心，她感到再也不能写作了，也只有这样才是有益的。

两位所期待的客人没有如期到达菲亚斯彻里诺，他们是密德尔顿·莫里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劳伦斯在信中建议说既然凯瑟琳每年有100镑年俸，她和莫里应该靠此在意大利生活，当莫里拒绝考虑这个主张时，劳伦斯对他说，这表明莫里不相信她对她的爱情；他必须意识到为了要给她所不需的奢侈而去工作，是对凯瑟琳的侮辱：“一个不满足的妇女需要奢侈，而一个爱着男人的妇女却愿意睡在板床上。”后来，劳伦斯在信中写道，他希望莫里和凯瑟琳不要把他看作“一个爱管闲事的礼拜日学校主管般的人”，他感到总有一天他们都能挣钱，“他们会快活地在一起”。已经受够了痛苦和患难了。

劳伦斯仍旧——这是他工作中分心的事——和弗丽达在他们的处境和她的孩子问题上发生摩擦，虽然这种情况有时在信中提到，正如他于1913年11月告诉辛西娅·阿斯奎斯说，他没有什么兴趣去写故事和小说。他于1914

年4月3日给莫里的信中说，“但目前，感谢上帝，弗丽达和我在一起，”他说《姐妹们》已写了三分之二，那是一本写我和她的著作，我以为写得很好。6月2日他对麦克利奥德说：“我认为要做的事是男子要有勇气和女子接近，在她们面前暴露自己……因为一切生命与智慧的根源在男女之中，一切生命的根源在于两者的交流，相会与溶合。”

也许劳伦斯在这受折磨的一年中，他在和弗丽达建立一种永久的关系方面所倾注的精力超过了他自己的工作。但是他当时所作的大量理论方面的工作，可能有助于使他成为一个艺术家。他最终和他的两位良师益友有了不同意见，一位是马什，曾指导他学诗，另一位是加纳特，曾指导他散文，劳伦斯摆脱了向导。

这是一个相当友好的过程，马什甚至在一月当他和友人詹姆斯·斯托拉切·巴纳斯出游时，特地来菲亚斯彻里诺访问，二十多年后，巴纳斯成了一个墨索里尼法西斯的热情支持者，他的行为甚至使许多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感到窘迫。这些法西斯分子们在巴纳斯高举的右臂和狂热的口号前只能奉承附和。

1914年巴纳斯和马什的来访是在劳伦斯批评马什在诗文中“宪兵作风”之后，但“在起初的那些日子里”马什仍与他十分友好，那时的劳伦斯“充满了欢乐和喜悦”。马什在大约25年后谦虚地写道，他曾对劳伦斯吹毛求疵，进行非难，他回忆说，他曾苛刻地推敲过劳伦斯在韵脚和音步方面的不妥之处。

劳伦斯与爱德华·加纳特不仅在学术方面有争论，而且在意识形态和道德标准方面也各持己见。劳伦斯在一度尊重他人和自我怀疑之后，便执拗地按照自己的路子走下去，就像他和马什的关系一样。虽然加纳特对《姐妹们》的批评使他心烦意乱，但劳伦斯不愿按别人建议去改写他的书。最终这就意味着他必须与加纳特分道扬镳了。劳伦斯表示他不愿再沿用《儿子和情人》中那种充满激情的言辞和激烈的风格。这本新书用的“几乎是另一种语言”，如果加纳特真的不欢喜此书，劳伦斯会感到遗憾，但他是有“思想准备”的。

1914年4月，劳伦斯通过登乐浦通知加纳特，到目前为止他把全部打好了的文稿从斯培西亚寄他了，还剩下80页有待继续完成，加纳特将在三周内能收到那些稿件。5月8日劳伦斯通知加纳特说，他希望在两天内完成全稿。实际上登乐浦的妻子美琪包下了打印的工作。在1952年问到托马斯·登乐浦爵士他是否能回忆起那部初版与后期出版的《虹》之间有何区别时，托马斯·登乐浦爵士在信中说，他和他妻子是不可能发现什么差别的，因为他们“听从”了劳伦斯的责戒，他不允许他们读他的作品，劳伦斯对他们说，那些书仅仅是为了把它们“从他的胸中抹去”而写的。虽然后来他还是送了他们一部《虹》。几乎每个作家都可能提出这种异常的要求，但只有那些极善交际的人才可能顺受。

在写给加纳特的信中，劳伦斯不时表露出对他这位导师将对此书可能作出的评论而感到的担心。他深信小说即重要又优美。他在4月里写道：“在这以前我不能把身心投入到小说中去，因为弗丽达和我之间仍有冲突与不和。现在你们可在小说中找到她和我，我认为这部小说是有我们两个人的……

《姐妹们》初版却显得很草率，时有粗俗和戏谑，我得改变态度，使我的主题确有价值。”

在劳伦斯和弗丽达离开菲亚斯彻里诺向北方去的前几天，加纳特又写信

给劳伦斯谈到那本新书，当时劳伦斯称之为《婚戒》。加纳特不欢喜它，劳伦斯直截了当地说他错了。劳伦斯承认他的作品不是完美无缺的，因他还不能按照他自己的意愿驾轻就熟，但又说加纳特无权说他的作品“语言不流畅”。加纳特希望小说要根据某些人物的主线发展：劳伦斯解释说，他小说中的人物是随着另一种韵律形式而变化的，就如用一把琴弓精巧地从沙盘上划过一样，沙盘上出现的线路是无法预知的。加纳特在人物性格方面的批评是错误的，因为劳伦斯“对我的人物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因而有必要使你采取不同的态度，可是你在思想上并无准备。”劳伦斯使他相信，书中所拥有的机智比加纳特在书中发现的多得多。此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带一点未来主义的味道”。

劳伦斯引用菲利浦·托马索·马利温蒂的话告诉加纳特，在他对未来派彻底了解的前几天，在给麦克里奥德的信中说：“我有一本他们的诗集——一本很厚的书——和一本有插图的书——我读了马利温蒂和鲍罗·勃兹的宣言书和散文以及斯科菲锡有关立体派和未来派的散文。”一年前在加格兰诺，劳伦斯对加纳特赠送给他的几个当代作家如——康拉德、倍纳特、盖尔斯沃赛的作品指出了缺点，正如他们在摆脱他的过去一样，劳伦斯也抛弃了传统主义者。在他即将离开菲亚斯彻里诺之前——那里是他一直在创造自己的非传统作品的地方，他评论了未来派的价值，他认为他们在试图摧毁陈旧的形式、信念和感伤主义等方面是正确的，但他们最终在摧毁的行动中未免太机械了，不能使他满意。

劳伦斯在写给加纳特的一封信中提到他对马利温蒂的“物体直觉心理”的观点颇感兴趣：他对人类非理性的本质对于“比旧式的理性本质更感兴趣——这种理性的本质使人们按某种道德体系想象出一种性格，使他合于一定的规范。”在劳伦斯的小说中，加纳特不该期望去寻找“一种旧式的一成不变的人物之自我，那里另有一种自我，根据这种自我的行为，人体是无法认识的，它经过各种同素异形的状态，要认识这种个体，则需要一种比我们一向用以观察那些单一不变的本质更为深刻的悟性。”这就像钻石和煤一样，它们同属于“相同的纯单元素炭，普通的小说家往往会去追溯那钻石胸历史——但我却说‘钻石吗？什么！这是炭！我的钻石可能是煤或煤烟，我的主题是炭。”

在这种重要时刻，在关键时刻，劳伦斯表明了他自己知道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他已经踏上了一个善于理解的高原，在这高原上，他可以看到他的作品与他周围世界的关系。这是一个受达尔文、马克思、尼采、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思想影响的世界，任何人都不能避开这种综合的影响。从艺术方面说，这个世界不久将属于斯托拉文斯基、毕加索和乔伊斯。劳伦斯没有从未来派那里继承什么重要东西，因而他也自觉地不从这些艺术家那里接受什么。——确实，他对他们的成就不大关心——但是，他的作品与他们的作品一样，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表现了一种现代的目光，（然而，多年来，他对先锋派主义的一个领域是比较熟悉的：原始主义。）对这一点，我们将在本节中作进一步讨论。

我们都知道，埃兹拉·庞德在一九一三年告诉哈丽雅特·门罗说，他知道劳伦斯“在我之前学会了对现代题材的处理。”在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和多萝西·理查逊的《尖屋顶》及其他现在被看作是英国现代派初期作品出版之前，劳伦斯就写信给加纳特声明了他的观点。没有迹象可

证明他当时已知道了在 1913 年 11 月出版的马赛尔·普鲁斯特的《在家乡斯旺》。关键是劳伦斯的作品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与这些作家的作品一样具有现代性。”

他在创作这本书的同时，也在创造一个新的自我和新的未来，在文学上是这样，在生活中也是如此，从我们的查考中可能看出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但是劳伦斯再也不会再有惶惶不定的时候了，尽管他可能发觉生活的痛苦和阴暗，但他再也不会再在写作中犹豫不决了。当然，有时候对他的作品还是要作彻底的修改，就如对《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三个独立的手稿一样。

1914 年 6 月 24 日在伦敦，一件对劳伦斯和弗丽达极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在最高法院下属的处理遗嘱认证、离婚及海事的法庭上，巴格雷夫·迪恩法官先生对“威克列和劳伦斯”离婚案的判决为：在限期内，若双方无异议就将作出确定的判决。

劳伦斯和弗丽达几乎提早一个月时间离开意大利。劳伦斯又一次步行通过了他仍不欢喜的瑞士，而弗丽达则乘火车往已登巴登，她在那里最后一次见到了她父亲，这位老病：交加的男爵在下一年就去世了。在去萨拉热窝前的几周中，他不断喃喃他说，他不再理介这个世界了。

这次劳伦斯由在斯倍西亚的一家维克——马克西姆工厂中的一位名叫路易斯的工程师陪同下向北方步行，他们经过了圣伯纳德大山口，后拐向因特拉肯，再从那儿向西进入法国。他们到达英国的日期不大清楚，虽然在爱德华·马什的旅行日记上记着：劳伦斯与弗丽达在“6 月 27 日星期六”都在那里，他“在默林·德奥和劳伦斯及夫人和鲁帕特（布鲁克）共进午餐，然后，一同去参加了荷兰公园的艺术家联合会。

劳伦斯和弗丽达与高登·堪贝尔呆在肯辛顿的赛尔沃德街 9 号，高登的妻子比阿特丽斯和她一周岁的儿子那年夏天住在爱尔兰。堪贝尔这位爱尔兰律师在前一年由莫里带到金斯盖将会见劳伦斯和弗丽达，他对文学颇感兴趣，同时也想着手搞小说。他比劳伦斯小一个月。当他没有在伦敦从事律师工作前，他曾在皇家工程处当过军官。他常为“爱尔兰”忧伤，使弗丽达觉得很有趣。后来他作为格里纳维勋爵回到了那里，帮助组织过爱尔兰自由州的许多重要机构。

当劳伦斯呆在堪贝尔家时，他遇见了他未来的传记作者之一凯塞琳·卡斯威尔，当时她是杰克逊夫人。他刚回伦敦不久，她为他举行过一次茶会，参加这次茶会的还有他们几位共同的朋友爱菲·罗和维奥拉·梅奈尔。杰克逊夫人立刻觉察到在劳伦斯身上具有“一种敏捷的、火焰般的品质……我意识到在劳伦斯身上有一种优雅的、少见的美，他那深陷的宝石般的眼睛，厚厚的红色头发，非常甜蜜的下唇，纤细的双手，敏捷而永不安静的动作”，弗丽达好像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德国女子，她穿一套方格花布的紧身上衣和短裙，因而没有充分显露出她健美的身段和普鲁士人的特征。杰克逊夫人后来发觉弗丽达的姣俏是穿着工装裤和农妇服装在“小屋周围走动”的时候。

杰克逊夫人已离婚几年了，她和劳伦斯的初次交谈就如久别重逢一样，她那种突然对劳伦斯表示的友情显然还不是那种会激起弗丽达妒忌的感情。杰克逊夫人虽然是劳伦斯的女性崇拜者之一，在她与他的关系中总缺乏一种个人的感情；与众不同，她对他没有情感方面的要求。不久，劳伦斯读了并评论了杰克逊夫人的处女作，那部小说一直到 1920 年才出版——一部她在格拉斯哥时青年时期生活的自传性故事。

由于劳伦斯没有失去看望莫里夫妇，使他们感到很生气。1914 年夏季，莫里夫妇是特别敏感与不快。他们很贫困，住在他们并不欢喜的房间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无法写作，莫里仍靠写文艺评论谋生，他们两人都患了肋膜炎。在后来去莫里的寓所共进晚餐时，劳伦斯和弗丽达显得相当富有；劳伦斯选中了 J. B. 平克作为他的代理人，希望从他的新出版人曼塞恩处予支 300 英镑，弗丽达正期待着对那些服装进行一次洗劫。她的迫切心情使凯瑟琳感到沮丧，她和莫里嫉忌劳伦斯结交的大部分朋友，莫里认为他交友过于轻率了，“一种并非异常的嫉忌”，莫里写道“因为劳伦斯对人的友情的伤害会是那么严重”。

此时，那些弗洛伊德主义者发现了《儿子和情人》，一位英国精神分析的先驱大卫·伊德医生经常拜访劳伦斯并与他交谈。看到人们如此严肃地讨论性的问题，莫里感到惊讶和不知所措。劳伦斯和弗丽达成了伊德家的好友——埃迪斯·爱德是爱菲·罗父亲的妹妹——即爱德夫人的妹妹巴巴拉罗，她成了一位著名的精神分析家。正如她对本人作者所说，“无疑，爱德博士的观点和知识对劳伦斯的影响很大，尽管劳伦斯深恐自己受到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正如你所想象的那样”！

有一次，劳伦斯的这些新朋友们邀请莫里一家到汉帕斯德·希斯去聚餐。当劳伦斯、弗丽达、高登、堪贝尔和莫里夫妇在汉帕斯德地铁站出现时，一声“劳伦斯”的尖叫声惊动了他们，他们听见并看到一个少妇，身着一件和服似的衣服，张开双臂，朝山下奔去并热情地呼唤着。堪贝尔喃喃地说：“我的天啊！”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说：“我巴不得这个！”当爱菲·罗跑到劳伦斯身边，他便转过身来向他的朋友们作介绍，但他们都不见了。当他后来见到他们时，凯瑟琳向他解释说，她看不惯那种感情的外露，假如她不跑开的话，她会显得满脸不高兴的。

当劳伦斯和弗丽达结婚时，莫里夫妇在场。婚礼于 7 月 13 日在肯辛顿登记处举行。莫里和堪贝尔作为证婚人出席婚礼，而马什无法从外交事务中脱身，没有参加婚礼。这里有个有趣的巧合：劳伦斯在 20 世纪英国小说作家中最有力的对手詹姆斯·乔伊斯于 1921 年也在肯辛顿登记处与他的情妇诺拉结婚。

劳伦斯立刻将他的喜讯告诉了霍普金夫人：“我觉得婚礼高雅庄重，我没有感到自己有什么变化，但我想象自己是个新人了。”他和弗丽达计划去德比郡的埃达家，但他说他们可能不会去访问伊斯猩，他说他们 8 月将去爱尔兰西部旅游。

在他婚后第二天，劳伦斯给加纳特写了一封事务信，讨论达克华尔斯出版社打算出版的那部短篇小说集，最后加纳特为这本书命名为《普鲁士军官》，劳伦斯当时则建议用《鹅市》为名。在信的末尾他随便提到了一句他私人之事：他和弗丽达正式结婚了。他不知加纳特是否会认为婚礼是无聊的排场而已。接着劳伦斯又说：“孩子们的麻烦十分突出。”弗丽达设法在律师办事处见到他们：就像她女儿巴巴拉回忆的那样，那是惶恐不安的半小时，弗丽达含泪强笑，孩子们则十分紧张。

劳伦斯在这时期写给马什的信中讨论到他的小说和一本在蕴酿中的关于托马斯·哈代的书。自从离开加格兰诺以来，他好似只写了很少的诗文。在《瞧！我们过来了！》这本集子中，只有三首诗——《维得洛克》、《历史》和《过来人的歌》——创作于一首注着“桑·高登基欧”（劳伦斯最后在那

里是 1913 年 4 月)和另一首标着“肯辛顿”(劳伦斯曾于 1914 年 6 月底到 8 月底住在那里)的两首诗。他在肯辛顿写了一首《众妇之妇》之后,在整个系列中只增加 9 首;这 9 首至少是在两年之中陆续写成的,因为最后一首是在康沃尔的乔诺写的,劳伦斯夫妇在 1916 年 2 月至 1917 年 10 月住在那里。

《瞧》后面的部分诗作全是表现一种满足的诗歌,但它们并不回避问题和冲突,它们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并正视它们,在心理的“平衡”中为这些问题寻找答案——像早先提到的那样。劳伦斯后来采用了“极性”这个名称,正是这种“平衡”——就像《恋爱中的女人》中伯金所寻求的——一直是劳伦斯在男人和女人之间,精神和肉体之间所寻求的一种理想。

这段时间内劳伦斯虽然诗写得不多,但仍被看作是个诗人。他的诗引起了美国诗人艾米·罗威尔的兴趣;她是知名的新英格兰家族的成员,是维多利亚女皇时期的大臣、诗人詹姆斯·拉塞尔·罗威尔的旁系亲属。艾米·罗威尔于 1914 年初夏来到伦敦后,她邀请劳伦斯在匹克迪利的伯克利饭店共进晚餐,此饭店目前已不存在了。艾米·罗威尔的同伴埃达·拉塞尔和英国诗人理查德·奥汀顿及夫人美国诗人 H.D 也在场。奥汀顿十多年后回忆在战争前夕的这次晚宴是“无意义的”,虽然他对劳伦斯炯炯有神的蓝眼睛和既带有讨好又怀着敌意的谈吐“有深刻的印象”。

劳伦斯踏着“轻巧自如的步子”走进了艾米·罗威尔的套间,带来了战争危机的消息。当他们坐在闪闪发亮的餐桌旁时,黄昏已降临了——整个欧洲的灯光尚未完全熄灭,匹克迪利灯火通明——罗威尔小姐和参加宴会的客人们谈论的只是在诗坛发生的那场大战,英国的艺术家和知识界人士当时对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的可能性想得很少。男学生们在夏日里参加军事训练,他们盼望秋季能进入他们所选择的大学读书。

当时,在诗坛冲突中,艾米·罗威尔正领导着意象派运动(当时这样称它),此运动是埃兹拉·庞德两年前根据 T.E 休姆的几首诗和一些理论倡导的。伯克利的晚宴旨在加强艾米·罗威尔的地位,庞德像一只企图挫败一只大熊的豪猪一样,竭力想抵制这位刚刚摆脱了传统诗歌的、来势凶猛的、热心而且富有的波士顿人,当时庞德说:意象主义应被称为艾米主义了。(Amygism 艾米主义与 Imagism 意象主义谐音——译注)在当时,这成了一个贬意的双关语。

现在她要以庞德的标准把劳伦斯作为站在她一边的现代派阵营中的年轻一员。当她要求劳伦斯成为她的团体中一员时,他回答说他不是意象主义者。作为答复,她引用了他的诗《婚礼之晨》开头的几句诗:“晨曦喷薄而出,红光闪耀/像一朵怒放的石榴花……”

劳伦斯友好地答应了并同意在意象派出版物中露面,虽然他从来没有公开对他们的信条表示过支持。他也不断地在马什的《乔治派诗集》中出版作品,但他和对方流派的成员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诗中的自然景色,那种对“大自然”的后期浪漫主义式的热烈拥抱,与乔治派诗人的那种对自然景色的温雅的描写有着天壤之别。乔治派诗人的诗句只是偶而表现出一种支离破碎,模糊不清的自然,好像是从网球场的一端瞥见的景物。

不论是意象派,或者是乔治派,或者是别的什么派,劳伦斯显然觉得 1914 年 7 月 30 日在艾米·罗威尔的套间里餐桌旁交谈的一席话很有意思。次日,他写信给哈利耶特·门罗,说他和艾米·罗威尔及埃丁顿夫共餐并“一起读了些诗”。

这至少是送别旧时代的一种好方式。

（二）战争之犬滑脱颈圈

7月31日，劳伦斯启程步行去湖村旅游。他是和一个在俄国法律局工作的名叫霍恩的人一块儿去的，霍恩带了另一位朋友同去，临行时。他又劝说与他在法律局一起工作的同事S.S.柯特连斯基一同前去。柯特连斯基是几年以前来到英国的。据说，他得到了基辅大学的奖学金，来这里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另外一种说法是，他母亲资助了他这笔来英国的旅费。作为一个激进的学生，他虽然曾是沙皇秘密警察的怀疑对象，于是，他只好继续呆在英国。他肤色黝黑，有一头卷曲的头发，层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劳伦斯发现，这位萨缪尔·所罗门诺维奇·柯特连斯基有点像耶和華。他和劳伦斯一见如故，他认为劳伦斯天真直率，但他对弗丽达一直没有什么好感。

这个步行团体——其中还包括一位俄国律师R.S.斯拉脱斯基，还有一个劳伦斯的朋友路易斯，即那个工程师——开始时是相当快乐的，虽然战争已经逼近。8月5日，在位于钢铁厂和战舰工厂之间的弗尔尼斯·巴罗的路易斯的家中，这个步行团体才得知英国已经卷入战争。整个弗尔尼斯·巴罗都激荡着一种战争气氛。劳伦斯还记得“我们当时都疯了似的”、但不久，他沿着海岸线走了几英里以后，开始对所发生的事感到害怕起来，6个月以后，他说他才刚刚从迷惘中明白过来。

返回伦敦以后，劳伦斯知道，他和弗丽达不能再乐观地打算在10月份回意大利去了。现在，甚至连到爱尔兰去的希望也都渺茫了。不久，他在离恰斯汉姆不远的白金汉郡的贝林顿巷租了一间叫“三角”的小屋，每月租金为6先令。在那里他常常生病，5个月后，也就是第二年的1月份，他迫不及待地离开了那儿。

在恰斯汉姆时，劳伦斯夫妇经常见到莫里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朋友加农夫妇，他们住在离风车不远的乔勒斯伯里，吉尔伯特·加农，当时是个颇有名气的小说家，与詹姆斯·巴里的前妻结了婚，她就是女演员玛丽·安塞尔。她是一个说话时爱转动眼睛的美丽妇女，她似乎注定了要在劳伦斯夫妇未来几年的生活中匆匆出现又匆匆消失。劳伦斯很喜欢她，但几年后他发现，她是个讨厌的人。

1914年秋，有一个年轻的画家马克·戈特勒，成了加农家的常客，他由于热衷于伦敦频繁的社交活动而使自己累垮了，可是他来到了乡间养病。此时，他也成了劳伦斯夫妇的知心朋友，但过了不久，他就像《恋爱中的女人》中的罗欧克一样并不受宠爱。通过加农夫妇，劳伦斯夫妇也结识了《罪恶之街》的年轻有为的作家康普顿·麦肯色，（劳伦斯私下里把这部小说称为“俗气的装饰品”，然而，他喜欢麦肯色本人）。

麦肯色后来在劳伦斯的一些讽刺作品中成了被取笑的对象。不过他在小说和传记中却写了不少有关劳伦斯的情况。当麦肯色到风车那边去访问加农夫妇时，加农夫妇将他带到了劳伦斯在贝林顿巷的寓所。后来，麦肯色在回忆录中称它是“我所见到过的最丑陋的屋子”。他发现劳伦斯在刷地板（“我们刚进去就看到那地方肮脏极了”）。他留着一小撮红胡子，一头红头发和有魅力的粉红带白的皮肤，看上去不上29岁。

劳伦斯（在1915年1月5日）写给麦克列奥德的信中说，加农夫妇是他们“很好的朋友”，他还提到了周围其他的人：“莫里夫妇——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他们办过《韵律》——在3英里之外的黎伊有一所小屋：因此，我

们并不十分与世隔绝”。要不然，劳伦斯夫妇的外来客人就更少了。有一次，艾米·罗威尔乘着由一个穿褐红色制服的司机驾驶的一辆褐红色的小车来到恰斯汉姆。后来与唐纳德·卡斯威尔结婚的凯瑟琳·杰克逊那天也在恰斯汉姆，不过仅此一次。弗丽达后来回忆说，高登·堪贝尔也曾拜访过他们，他看起来“像个爱尔兰的流浪汉”。柯特连斯基也来看过劳伦斯好几次。

劳伦斯呆在恰斯汉姆的几个月中（从1914年8月至1915年1月），他向辛西娅·阿斯奎斯描述到，他的“灵魂躺在坟墓里，但还没死去，它在一具已变得僵硬、冰冷的尸体之中，在它的上面覆盖着一块大石板。什么人也不存在，因为我自己不存在了。然而我并没有死——仅仅被遗忘了——被践踏了——但我一直清楚地知道，我一定会东山再起”。我们发现，他在此“死亡”期间被保存下来的信件的数量比在这5个月中的其它时间的信件要少一些。在战争后期，当他对战争更感痛恶时，他就更加明了地谈论这个话题，其言论非常之多。从恰斯汉姆的信件中，我们所看到的不总是那个“已死的”人；劳伦斯在表达他的厌恶和沮丧时还是充满了活力的。

战争爆发不到三个星期时，他写信给艾米·罗威尔，“我最大的悲伤和痛苦都是为了德国——到目前为止我仍不禁感到，德国是个年轻而可爱的国家——正处在青春期中——犯了青春期的错误，”对于这一点，他在他的“普鲁士军官”的故事和其它地方都提到过。从他现存的，发自恰斯汉姆的其它信件中，没有进一步表露出这种“为德国而感到悲伤与痛苦”的情感。同样，在另一方面，这些信件也没有显示出任何强烈的亲英倾向。劳伦斯的态度在四年的战争及战后的任何时候都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在战争早期的几个月悲伤绝望之中，他的态度就明朗化了。他开始痛恨战争本身，他觉得，从根本上说，双方都不对。但是，正如他后来在《袋鼠》中描述一个名叫苏墨斯的人物时所说的那样，“他并不是真心实意地反对战争，他所决不能同意的是这次战争的全部精神是那种匪帮精神”——那种横行霸道的行径、奴役别人的观点和个人“独立人格”的丧失。搬到恰斯汉姆后不久（1914年9月5日），劳伦斯对平克说，出于一种对战争“纯粹的愤慨”，他开始写关于托马斯·哈代的那本书，10月间他写给哈利耶特·门罗的信中说，他认为“把自己白送给一颗德国枪子的儿戏太不值得了”。他对爱德华·加纳特说，战争使他“感到十分恍惚”，并说他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无关紧要。从德国透露出来的消息，以激烈而热情的言词谈到冯·里奇索芬的年轻的军官朋友们，他在战争初期就为国捐躯。也有消息传来说弗丽达父亲久病不愈。

那年秋天，劳伦斯也因病感到不适，并仍以一种恋乡之情思念着意大利。艾米·罗威尔知道了恰斯汉姆的情况，希望劳伦斯不久能离开白金汉郡。返回波斯顿后，他写信给哈利耶特·门罗说，他认为劳伦斯是患了“肺病，那小屋很潮湿，而且一定冷得可怕”。她觉得他假如到不了意大利，至少应该在冬季去伦敦。她怕送钱他不会收，她要送他一架打字机。10月16日他高兴地回信说：

关于打字机一事，使我乐得像酒醉了一样：这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我会把它当作宝石般珍爱的。我总是说世界上我唯一的一点财产是一块银表——的确如此。现在我的王国是一架打字机：我是个有财产的人了。我感到惶恐，生怕我会招致什么新的麻烦和责任。……在同一邮局我收到了一张50英镑的支票，是皇家文学基金的补助。这件事使我烦恼，从他们微薄的周济中是享受不到乐趣的。我若能行的话，我一定会把支票贴回到那些老

家伙的鼻子上去，那些无事业心、无斗志的作家。但我不能……不要将我同济兹和雪莱一同放在保险箱里。那样，我就会像耶稣的信徒看到耶稣变容一样，吓得魂飞魄散。但查尔伦把我渡回英伦时，我很想认识一下柯勒律治。

他还感谢艾米·罗威尔为他探望了肯纳利，“只要我们两人中有一个还活着，就不要要求他再为我们出版什么了。你想对他说什么就说什么。我认为他确实很好，问问他我的东西怎么样了，好吗？其它没有什么了。”同时，他说“不久，达克沃尔斯将出版我的一本短篇集，它将叫《普鲁士军官及其他故事》，因为此书的第一篇是《荣誉和武装》。顺便告诉你，这篇故事已转卖给了美国的《大都会杂志》？”他还提到了自然景色，一些消息及他自己的面貌：“这儿正处于一个美丽而朦胧的秋天，灰兰色的天空和变化迟缓的残茬和矮矮的灌木丛。但我面容憔悴，留起了红须，我就像灌木丛中的一个生灵一般，任凭这树丛生长并将我覆盖。哦，我的天哪，今年秋天我极其痛苦，确该把我自己变成一个麻木不仁的形象。”这一次他留蓄了他的胡须。

一个月以后（11月18日），劳伦斯写信给艾米·罗威尔说到了那架打字机——由拉康尼亚船上的一位侍者从大洋彼岸捎来，再从利物浦转寄到这里——使得他“像一壶煮沸的水，快乐异常”。

他在10月份的一封信中告诉爱德华·加纳特，他和弗丽达“几乎不再争吵了”，但根据莫里所言，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实际上，劳伦斯与弗丽达之间的争吵常常是有益无害的，是两种绝然不同的个性冲突的表现。在内心深处劳伦斯和弗丽达是彼此分不开的一体。但因为他们之间的争吵很剧烈，并时常带有戏剧性，他们互相谩骂，并时不时地以砸瓶摔罐来助威。那些写回忆录的作者就往往会回忆起这种激烈的场面，而忽略了那种为时更长的，有时也许是索然无味的宁静、甜蜜和欢乐场面。劳伦斯的粗暴与他的温雅一样闻名，但据人们的记忆和记者的报导，情况好像不是这样。当弗丽达和劳伦斯初交时，劳伦斯的温柔使她感到吃惊，有一次，弗丽达的头撞到了窗台上，“劳伦斯对她表示了如此深切的同情和温存”，以前从没有一个人对她如此温柔过。应该是最理解劳伦斯的弗丽达在他去世以后说，劳伦斯和她之间经历了长时间的斗争，以求得某种真理；这是一种艰难的生活，但又是一种美妙的生活……不论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了什么，都无法改变我们之间的那种维系，无法改变时常出现在我们周围的世界里的那种美妙。

1914年，劳伦斯与柯特连斯基成了相互信赖的朋友，这个俄罗斯人经常去塞沃德街拜访他和弗丽达，在他们搬到恰斯汉姆后，他更成了他们的常客。12月初，劳伦斯从恰斯汉姆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私人信给柯特连斯基，信中谈到了他对弗丽达的不友好态度：“你不应该轻视她，在女性身上还有一种你所看不到的品质，因此你不能对它正确地进行估价。你不知道，一个女人不仅仅是一个与男人性别不同的人。她是另外的一个世界。对此你还懂得太少。你所拥有的只是这个世界的一半”。几天后，在柯特连斯基帮助他写的，有关托马斯·哈代的文章手稿的注解时，劳伦斯说，“弗丽达朝你挥着她的拳头呢”。不论柯特连斯基怎样看待劳伦斯对他的分析，看来，他不会接受弗丽达对他的任何看法。

在一封12月18日写给艾米·罗威尔的信中，劳伦斯提到一则插曲，它是一出令人发笑的短剧，它是有关弗丽达和欧内斯特·威克列的：

我们在中部访问我的友人，弗丽达则去探望她的丈夫。他的言行是一种

十足的杂耍场式的表演。这是一次突然的访问。当我们还是孩子时，我们常常欢喜模仿大人的样子，我们把一条废弃的炉前地毯放在手推车上，我妹妹坐在那里“感到十分自在”。她总是扮作劳逊夫人，我是“马奇本克斯先生”，拄着拐杖去拜访，我妹妹和我一直认为这很可笑。所以，那时弗丽达灵机一动也向房东称她自己是“劳逊夫人”。

“你”这位前夫说着倒退了几步——“我但愿永远不再见到你。”

弗丽达：“是——我知道。”

前夫：“你在这个城市里干什么？”

弗丽达：“我来看看孩子们和你。”

前夫：“你在这人人都认识你的地方露面，不觉得害羞吗？你不觉得最普通的妓女也要比你好吗？”

弗丽达：“哦，不。”

前夫：“你是要想使我无地自容吗，你这个女人？难道我连一块安静的地方也找不到吗？”

弗丽达：“你知道，我得跟你谈谈孩子们的事。”

前夫：“你看不到他们，——他们不想见你。”

接着他们的谈话发展到了粗鲁漫骂——部分内容如下：

前夫：“如果你一定要出走，为什么不跟一位绅士走呢？”

弗丽达：“他是一个伟人。”

又是一些粗鲁的谩骂。

前夫：“你不知道你是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吗？”

弗丽达：“哦，不。”

“又是一阵谩骂，然后弗丽达离去了。她没再坚持要见她的孩子。

前夫：“你可知道，如果你企图干涉这些孩子的话，
我的律师可下令有关逮捕你。”

弗丽达：“我不在乎。”

如果说此事拖了三年还不算太痛苦的话，我倒认为这是十分可笑的了。这位前夫是法国文学教授，一位莫泊桑的崇拜者，他曾在德国和巴黎生活过，他认为他是世界文化的佼佼者。但可怜的弗丽达却见不到她的孩子们。——我简直是一字不漏地把对话全部告诉了你。

大约在这段时间，劳伦斯一直在阅读凯瑟琳·L·简纳写的《基督的象征》，这本书对劳伦斯写给高登·堪贝尔的一封长信影响很大。（全部内容收集在劳伦斯《书信集》中）。劳伦斯读完了莫里对堪贝尔小说的热情介绍之后，他为其主人翁自杀未遂的行为表示失望：

如果你要写一本有关自我主义的巨著——我认为你可能会的，——看在上帝份上，请给我们写写自我主义的死亡，而不是那个罪人的死亡。俄国、德国、瑞典和意大利的文学中除了表现自我主义者自我毁灭的荣耀外，其他什么也没有。但在阿孜巴什夫、德阿农齐奥、斯特林伯格流派以及德国的曼恩兄弟之后，自我主义者作为十字架上的一个神圣形象，饱含着眼泪、爱和崇敬，对我来说已经有点倒胃口了。

劳伦斯接着说“我所知道的有关这一题材的伟大著作就是《乔布之书》，乔布是一位伟大的、奇妙的自我主义者”。接着劳伦斯讨论各种各类宗教，指出了一些象征，表明他对耶稣复活的信奉，是他终身坚守的信仰。

我现在理解你向往西方的那种热情，这是一种毁灭你自我的热情，是在

你躯体的毁灭中，对你自己的意志的胜利的感知。但在伟大的时代里，一个伟大的人是向往东方的基督、穆罕穆德、印度等等所有的一切。

我想你应当设法去掌握——不要因我的语调而生气——凯系特人的象征主义在它兴盛时期所创的完美的整体。我们都是这样一些愚蠢的自我主义者，我们看到的象征只是一种主观的表现，一种自我的表现。这些我们在处理那些旧的象征时显得苍白无力：就像叶芝一样。

旧的象征的第一个字都试图简明扼要地表达出人类的整个精神历史，若不纵观全文，它们是难以被人读懂的。所以你们今天爱尔兰人的爱尔兰是处于一种包含着—部分伟大的幻觉象征的混乱之中，就像耶稣受难一样，是一种包含着—部分伟大的宗教幻觉象征的混乱状态。

耶稣受难和基督仅仅是一些象征而已，这些象征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真像我一样历尽了人生的苦难。如果以我为例，它们意味着我灵魂历程中的瞬间。但它是全部过程中的一个瞬间，并能通过全部过程来确定它的存在。假如我不承认有圣父和天使的教会阶级组织，我就不承认基督，也不承认耶稣受难的事实。

要理解它的全部涵义是很必要的。我终于掌握了中世纪教会试图解释的内容。对我来说，拉丁文形式的解释是极其自然的。而对你来说，应该用凯尔特式的解释。我认为凯尔特象征的全部内容和伟大的构思言辞是深奥而永远无法探测的。但它一定是和拉丁文的解释相符合的。

但基督教现在在教导我们，在耶稣受难以后，经历了坟墓的黑暗之后，我们的肉体将重新站起，你，我，就象我们今天一样在肉体上复活了。像乔布一样感恩于这位圣父，分享他权力的荣耀。

使用这些陈旧的术语是危险的，因为它们听起来似乎像伪善之言。但只要有人能掌握它，把它当作是一个新的真理，那么，这对他自己的历史，对伟大的幻象，对世界最伟大时期的伟大概念都将是真实的，这样就足够了，因为这样它被更新了。

我认为一切宗教都有相同的内在联系，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你为什么不去寻找凯尔特人的完整幻象，而把它与爱尔兰混为一谈。比阿特丽斯差不多已上了路子，但她不知道她在寻求什么。所以，她是过于人性化了，也就是说她把她所采用的象征体主观化了，因而将它们的本意改变了：把它们看作是她自己的自我之表露，而不是将它们当作传达那伟大整体的言辞。在这个整体中，她的自我仅仅是一种产物，正像圣子是圣父的产物一样。

1914年在加农家的圣诞节晚会上，莫里和凯瑟琳以委婉的语言宣布他们不久后将分道扬镳。晚餐无精打采地开始了，主人也十分消沉（吉尔伯特·加农几年后由于狂妄自大而一蹶不振）。他坐在客人们面前，一筹莫展，他和他们——那些波希米亚人、艺术家、演员和作家——都无法把一只烤乳猪分解开来，但有一种活动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能参加，那就是在一些短剧中作即兴表演：他们立刻扮演起来了，一边还在大喝大饮。当柯特连斯基缠住莫里要他演“一出戏中之戏”时，莫里和凯瑟琳把他们之间的不和真实地演了出来，（这事发生在心理治疗之前）。那个年轻英俊而有病的戈特勒则扮演“另一个男人”，快到剧终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脱离了原来的剧情，不愿扮演与莫里重归于好的一幕：她坚持要和戈特勒在一起。劳伦斯出来批评此剧，并把莫里拉到一边说：“你瞎了吗？如果没瞎，你怎么敢暴露自己？”莫里——曼斯菲尔德——戈特勒在这出短剧中的三角关系就是劳伦斯大约在一年

以后在《恋爱中的女人》中虚构性结尾的有趣预示：书中的那个人部分地取材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她后来离开了那个部分取材于莫里的男人，跟另一个取材于戈特幼的男人走了。

就在这一时期，劳伦斯正在考虑把这三个人吸收为他想建立的一个名叫拉纳尼姆的乌托邦公民，这个乌托邦的名字显然是来源于一首希伯来歌谣。这个凄惨的圣诞节并没有使他消沉。他考虑了大约 20 个能参加他的乌托邦的人。他于 1915 年 1 月 18 日在写给威廉·霍普金的信中说：作为一项计划，“为逃避这个充满战争和贫困的世界而开辟一小块聚居地，那里将没有金钱，只根据生活的基本需要实行一种共产主义，一种真正的礼仪”。它将是“一种社团……并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其成员都心怀善良而没有邪恶”。这是一个理想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社团的蓝图。虽然，劳伦斯很可能不喜欢“无政府主义者”这个字眼。

但是拉纳尼姆注定是要失败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收集了一些有关岛屿的实际情况，开始向劳伦斯提出了一些严肃的问题。他知道她在讥笑他，便陷入了沉默。

1 月 5 日，在劳伦斯离开恰斯汉姆的两个星期之前，他写信给麦克列奥德说，他“仍在修改《虹》——在此书上化了不少功夫。我已经写了三百页，这是我的一种新的式样，你得去接受它。”这段话说明，他对他自己作品变化的认识是非常透彻的。他很想送一本《普鲁士军官》给麦克列奥德，“可是，那些自称是朋友的小偷把复本都拿走了，他们完全买得起这书，而我则因为战争而生活穷困”。

劳伦斯告诉麦克列奥德，他“担心麦休恩接到《虹》时，会认为这是一个被人暗中偷换过后硬塞给他的假货。因为，它与我的其它作品不同。我为此而感到高兴，我认为我的羽毛终于丰满了”，他还责备了麦克列奥德，因为他竟考虑要去应征入伍。“我痛恨并厌恶战争，因为战争只是为了那些对新生活无所企求的人而进行的。它们全错了，全是一些傻瓜，是弥天大错。为什么它还不终止？”

当劳伦斯要离开恰斯汉姆时，她于 1915 年 1 月 18 日写信给威廉·霍普金。

我们又整装待发——不是去意大利，真可惜！——而是去苏萨克斯的一处美丽的地方——普尔巴勃·格雷特汉姆，这就是我的地址，那是梅奈尔家的住处。你认识艾丽丝·梅奈尔吧，天主教女诗人弗朗西斯·汤普森的救星。她父亲在格雷特汉姆有一个大而古老的农庄，并给他的每个孩子一幢小屋。现在，凡尔拉将属于她的那幢房子借给了我们。我认为那是一幢挺大的房子，在我这样倒运的时候这一切算是很好的了，那儿也很方便……它位于离小汉普顿海边不远的地方。

劳伦斯于 2 月 2 日从格雷特汉姆写信给康贝尔，在那里他和弗丽达发现他们的小屋既漂亮又舒适；他谈及大卫·加纳特在伦敦介绍给他的新朋友：“昨天，奥托琳娜·莫瑞尔来到这里——她将要带那位哲学数学家伯特伦·拉塞尔带来”。他要康贝尔在对莫里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关系上要“正派”。但这种劝告没有起作用，因为康贝尔虽然答应了到黎伊的屋舍去会见莫里，但他并没有去，这样，他们之间的友谊在第二个周末就终止了。（直到 1949 年他们才恢复友谊。）

劳伦斯在格雷特汉姆的 6 个月中，威尔弗雷德和艾丽丝·梅奈尔很少去

那里。凡尔拉·梅奈尔在1952年写给本书作者的信中回忆说，“我的父母几乎总是呆在他们在伦敦的公寓里，因此，他们和劳伦斯夫妇一定只是一面之交，仅此而已”。大卫·加纳特叙述在四月中旬访问格雷特汉姆的情况时，描述了他到老梅奈尔家进早餐的情形，劳伦斯夫妇也应邀前去了，“男主人在翻阅《观察者》，纸在他手中沙沙作响，屋子里挤满了像圣母画像中一般的妇女和女孩；女诗人躺在榻上”。弗丽达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艾丽丝·梅奈尔好似远处的幻像一样，她被威尔弗雷德领着穿过草坪，就像比阿特丽斯被丹蒂领着一般”——那位文笔辛辣的传记作家休·金斯米尔评论道，“对这件事，丹蒂一直保持沉默”。

凡尔·梅奈尔进一步回忆道：“我认为劳伦斯一家呆在这里很快乐——只是有些争争吵吵。”显然，劳伦斯在经受了战争给他带来的初次巨大的震惊以后，在格雷特汉姆他又恢复了生命的活力。有一天，当他在海边漫步时，他说：“我又睁开了眼睛，看到了白天。”

二月里，他照顾莫里从病中复原。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已到法国去了，她想象自己已经爱上了莫里的一个朋友，他就是法国作家弗朗西斯·卡柯。莫里接受了劳伦斯一家的邀请去访问他们，他步行穿过低洼多雨的草地，到达时浑身淋湿，并因感冒而全身酸痛。劳伦斯安排他卧床数日，责怪他对自己健康“糊里糊涂”，并把他“当作小孩”一样地照料。莫里说劳伦斯表现了他在治疗护理方面的本领，就像在《阿伦的杆杖》中利利照料阿伦使他恢复健康一样。莫里在他的回忆中写到劳伦斯对他关怀备至：“我们多么想报答他！”

在莫里养病期间，劳伦斯告诉他，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所以出走是因为莫里和康贝尔在交谈时太专心致志而忽略了她的缘故。劳伦斯的话使莫里大吃一惊，他认识到如果事情确实如此的话，那就是他还缺少雅典人自知之明的美德。

莫里感到自己无法理解劳伦斯所谈到的革命的必要性。后来出版的莫里的日记摘录，表明了劳伦斯的这些谈话和他写给伯特伦·拉塞尔的信中所说的内容十分相似。莫里发现劳伦斯的新学说使人迷惑，特别是学说中所谈到的这种观点，即所谓革命应是“一种大众团结的非个人的联盟”。莫里已失去康贝尔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他怕还会失去劳伦斯：他和劳伦斯的个人关系如此珍贵，他不想因为意见不一致“而影响了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莫里认为此时劳伦斯自己已意识到了他自己厄运将来临。他告诉莫里说，写作没有什么用处。首先，必须改变目前的生活条件。他说在《虹》之后，他仅想写一部书，并说他像圣徒约翰一样，仅仅是他后来伟人的“先行者”，此人将是莫里，他的那种情性是“可贵的”，他的作品似乎“更加纯洁”。莫里感到很不自在，“劳伦斯依赖我的这种想法是十分荒谬的”。

一份电报使情形得到了缓解，每在莫里与劳伦斯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危急的时候，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总是一台退役的救火车。她从巴黎打来电话，说她将于次日早晨八时到达伦敦。莫里前去接她。她回来仅仅是“因为无处可去”，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进入受管制的军事区域去会见卡柯，但她的幻想破灭了。现在她与莫里痛苦地回到了他俩所共有的小屋，她在那儿病倒了。但不久她又返回巴黎，度了又一个短暂而狂热的假日。

劳伦斯继续幻想着拉纳尼姆，如果不是和会嘲弄人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那就是跟其他人联系起来。2月1日他写信给奥托琳娜·莫瑞尔，要她

组成一个新社团的核心，“这个社团核心将在我们中间开始一种新生活——这种生活中的唯一财富就是品格的合成”。奥托琳娜的丈夫有着五百亩地产，他们可在那里实施这一计划，就在牛津郡的加辛顿庄园。她的丈夫菲利浦·莫瑞尔（他们读成莫尔）是国会议员，一个自由党人。莫瑞尔夫妇定居伦敦，虽然奥托琳娜夫人的丈夫进了牛津的一个学院而不是剑桥，但布鲁姆斯伯瑞的文人们仍欢迎他进入他们的圈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了他们最拥护的和平主义的国会会员。

伯特伦·拉塞尔被劳伦斯称为“哲学数学家”。他是一个伯爵爵位的继承人，拉塞尔公爵的孙子。拉塞尔公爵在维多利亚时代曾担任过两任英国首相的职务。伯特伦·拉塞尔在哲学方面写过许多著作，他和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黑德共同出版了有名的《数学论》（1910—1913）。他是剑桥大学三合一学院的讲师。他对菲利浦·莫瑞尔不太注意，虽然，当莫瑞尔在议院参加竞选时，他曾为他发表过演说。但根据拉塞尔的自传中所说，他爱上了莫瑞尔的妻子。

两年后在1916年，奥托琳娜夫人和他断绝了关系。菲利浦·莫瑞尔了解此事。但在1915年以后，当她将加辛顿变成她感觉中的生活中心时，她对拉塞尔冷淡了。拉塞尔在劳伦斯的《恋爱中的女人》中是个无关紧要的角色，叫乔舒亚·梅勒森（在有些版本中写成梅赫森）。但当她将拉塞尔带到格雷特汉姆去见劳伦斯时，他们之间的关系仍保持着。

拉塞尔后来说她“敬慕我们两人并使我们感到我们也应该互相敬慕。拉塞尔的日益深化的和平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1916年他离开了三合一学院时——在他心中产生一种强烈的叛逆情绪”，他发现劳伦斯也处于同样的情绪之中。不久以后，他们决计在伦敦采取行动，两人合作作了一系列的学术报告。可是不久他们便开始争吵，最终，拉塞尔还是一个人去作演讲。他们之间怀有敌意的友谊持续了一年光景，这是劳伦斯一生中最带有戏剧性的交往。

这个矿工的儿子和这个伯爵爵位的继承人都是瘦小而精力充沛的人；可是劳伦斯再活了15年。拉塞尔遇见劳伦斯时是42岁（劳伦斯在1915年仅29岁），他讲授数学并以此为生，活到了90多岁。在遇到劳伦斯时，他常被指责过分屈从于理性，并已习惯于这种指责，拉塞尔对自己说，他感到他的这位新朋友能给他“一帖非理性的清醒剂。”拉塞尔还说“他欢喜劳伦斯感情中的热忱、活力和激情”。这两个人至少在一点上是二致的，他们都认为政治学和心理学不能分离。在一段时间里，拉塞尔觉得劳伦斯是一位富于某种想象的天才，“他的对人类本质的洞察力”比他要“深刻”。拉塞尔说他渐渐地“感到他是一种反对邪恶的积极力量”——正似不久后劳伦斯对拉塞尔的看法一样。

1915年2月12日，劳伦斯在写给他的一些极为著名的信中，以一种比较轻蔑的口吻对剑桥——布鲁姆斯伯瑞圈子中的另一成员E.M.福斯特作了描述。此人曾在劳伦斯夫妇处访问过三天。（艾弥尔·德拉芬内说福斯特带来一个不祥的谣传，说警察要对《普鲁士军官》采取行动。）福斯特和劳伦斯发生了争吵，但劳伦斯对他的态度仍是温和亲切。劳伦斯给拉塞尔看了他的一篇有关社会改革的短文。文章中说：企业、土地和一切交通工具“必须”立刻国有化，所有的人，不论有病的还是健康的都应得到工资。“这实际上能解决目前的一切经济问题。一切被剥夺财产的所有者在一段时期内——约

50 年——得到成比例的收入——不属于资本的报酬。”

劳伦斯此时即将写完《虹》，他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他的副业，即人际关系上。如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所述的那样，他说，“这种躯壳和老框框必须打破”。他又说现在的男人去找女人仅仅是为了某种快感，把它作为一种手淫的方式，最终导致鸡奸，但一个具有坚强性格的男人，应对另一个人怀有一种敬意——无论他是男人还是女人——不能把它作为手淫的工具（原文如此）。因此他应保持中立和静止，福斯特就是那样。

最后，劳伦斯强烈地建议道：我们必须“粉碎目前的生活方式的结构”。他说他下月初可能要去剑桥访问拉塞尔，去“会见福斯特的朋友罗埃斯·迪肯森（原文如此）”。“以及你将向我介绍那些好人”。

后来，在写给奥托琳娜·莫瑞尔的信中谈到拉塞尔时，劳伦斯说他感到“对他有一种特别的爱慕”。当拉萨尔答应他去剑桥访问时，劳伦斯告诉他此事使他感到“极其重要”，这个机会对他“十分关键”，他不想给人留下“可怕的影像”。但他估计事情可能会这样。他所关心的是一次必要的革命，他希望拉塞尔能做他的朋友，“但你是那样怕羞，我因此感到那么的拙笨，那么的滑稽。”他要求拉塞尔不要安排他一下子和那么多人会面：“我害怕团体，小集团，社团和派系——但不太害怕个人。”

后一个周末，3月6日至7日，劳伦斯去了剑桥拜访拉塞尔以及他的朋友。五个星期后，劳伦斯告诉大卫·加纳特说，那个星期天上午，他在早餐时见到梅纳德·季尼斯是“我一生中危机之一”。

那位未来的季尼斯勋爵也记得那次早餐，并在很久后写道，前一天夜里在聚会上，“劳伦斯在剑桥露了面”，显然，他在晚会上并不愉快。他在大厅里坐在G.E.莫尔旁边，这位刚刚写完《虹》的作家和那位伦理学的报告人冷冷地默然相对。1953年美国数学家诺伯特·威纳（他在1915年时是三合一学院的一个学生），在他的自传中生动地再现了这一情景。他说G.E.莫尔看起来像坦尼尔的画《三月野兔》，而伯特伦·拉塞尔就像坦尼尔的《疯人哈特》。然而，劳伦斯热烈而友好地和数学讲师G.H.哈代交谈，季尼斯回忆说：他“一开始就愁眉不展，沉默寡言，除了一些意义不明的愤怒的异议，什么也不说”。拉塞尔站在壁炉旁边，季尼斯忽而坐在沙发上休息，忽而站在罗索身旁，他们两人交谈着，并想把劳伦斯拉入他们的谈话。但劳伦斯坐在沙发上“弯着腰，低着头”，对季尼斯不大有好感。

几年以后，季尼斯勋爵就感情纠葛的两个原因责备劳伦斯的行为，一个是生活在两个圈子里的奥托琳娜·莫瑞尔，这两个圈子中之一布鲁姆斯伯瑞——剑桥的文人；另一个艺术圈子中有劳伦斯、马克·戈特勒和他的女友多萝西·卡琳顿。季尼斯认为劳伦斯对奥托琳娜夫人的“另一个圈子”很妒嫉，并决意要与之抗衡。劳伦斯也不欢喜剑桥，因为它留住了大卫·加纳特。“丢开妒嫉不谈，”季尼斯接着说，“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劳伦斯在战前剑桥时候的情绪更充满敌意。”他觉得劳伦斯用他那“无知的、妒嫉的、愤怒的和敌意的眼光”去观察剑桥的那些人是不公平的。然而，季尼斯承认，劳伦斯认为他们和他们的那种生活方式“无可救药了”的话，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对1928年劳伦斯在一封信中提到他是“布伯姆斯伯瑞圈子中对《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唯一支持者”。克莱夫·贝尔曾指出他也是此书的一位预订者。当然还有布鲁姆斯伯瑞的其他一些人。

季尼斯对艺术有浓厚的兴趣并加以热情支持，假如劳伦斯能成为他的朋

友的话，他也许会帮助劳伦斯。这不是奉承的问题；季尼斯根本不需要那样做。这仅仅是出于友好。劳伦斯对季尼斯的善意说过一些尖刻的话。战争后期，当劳伦斯极需帮助写信给他那些不愿相交的高职位的熟人时说，他和梅纳德·季尼斯的友谊也许是珍贵的。

但是，那个春天早晨劳伦斯在剑桥的时候，其则竭力保持独立。他无精打采地坐在炉边，而另外两个人站在他身旁谈话，并想要引起他的兴趣。（劳伦斯新蓄的红胡须与赖顿·斯特拉切的相比并不算是新鲜事。在三合一学院的那间房子里，有两个人和他一样，虽然瘦削但精力充沛，有着灵活的龟头般的拉塞尔和板刷胡须及在学生时代已得到“大鼻子”绰号的季尼斯）。但劳伦斯远远地坐在一边怒目而视。

正如我们所知，在劳伦斯称之为“我生活中的转折点之一”的早餐上，他还不能预言季尼斯最终能见到他的老朋友拉塞尔，正像劳伦斯一定会见到他一样，虽然，季尼斯没有劳伦斯的那种藐视他的态度。

季尼斯承认拉塞尔成就中的杰出之处，然而，他观察到拉塞尔的持有几个相互矛盾的观点，“他坚持认为人际关系实际上是以一种极其不合理的方式维持着，但解决的办法也极其简单容易，因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合理地维持这种关系。”季尼斯发现以这种设想为依据的言论“实在使人感到讨厌”。他还说，“忽略了人类感情中那深层更盲目的因素，无论这些情感是好还是坏，而去讨论人们的心灵都不会有什么意思的”。

季尼斯和劳伦斯的思想要比拉塞尔和劳伦斯的思想更为接近，然而，劳伦斯没有看到这一点。在此以后的12个月中，他一直在用友谊、责备、辱骂、赞美和诅咒追随着拉塞尔。

在劳伦斯访问剑桥之后，他怨恨地告诉弗丽达说，他在那里遇见到的几个人“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谈论着巴尔干形势及诸如此类的事，实际上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劳伦斯写信告诉拉塞尔说，剑桥使他感到“郁郁不乐”。由于那里的“腐败和潮湿霉烂的气息”，他也患了“忧郁呆滞症”，他不理解“病得这样的人怎能振作起来”？他自己也“过于伤感”以至于无法继续搞他自称为“哲学”的研究。他告诉拉塞尔，奥托琳娜·莫瑞尔打算让他和弗丽达在加辛顿的一幢住房住下：“她是如此慷慨，使人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人们认为只有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才肯如此慷慨赠物。”

在此期间，劳伦斯常常和她通信；他给她和给辛西娅·阿斯奎斯的信件逐渐成了一种讲座。劳伦斯与这些身份高贵的妇女之间的友谊——我们别忘记，他娶了一位伯爵夫人，本质上与利尔克很想象，此人是一群公主和伯爵夫人的非正式的牧师。当劳伦斯与弗丽达住在格雷汉姆期间，他偶尔也会见他的那些有贵族头衔的朋友们。有时他和弗丽达去伦敦，有时他们去加辛顿作客，也有时候这些朋友来格雷汉姆看望他们。辛西娅夫人到离格雷汉姆仅十英里的苏萨克斯沿海一带去旅行时，他们也见过她几次。他们也曾到小汉普顿去拜访过她。他们经常与梅奈尔女儿莫尼卡·赛利比一起出游诸如博格诺之类的沿海小镇，莫尼卡当时因婚姻破裂而患精神分裂症。

梅奈尔的另一个住在格雷汉姆的女儿名叫玛德琳，她嫁给帕塞凡尔·德莱威特·路卡斯。他们生了三个女儿，长女希尔维亚，脚有点跛。凡尔拉·梅奈尔在艾丽斯·梅奈尔的传记中回忆道：两年前在一次严重的几乎致命的事中，希尔维亚的腿被一把大刀割伤了。当劳伦斯来到格雷特汉姆时，这孩子正在动手术，当时还不知道她的那条受伤的腿是否能保住。凯瑟琳·卡斯

威尔建议劳伦斯偶而为这孩子作些家庭辅导，作为他住在她家的部分费用。在见到劳伦斯以前曾帮助过凡尔拉·梅奈尔打字和抄写《虹》的艾丽诺·法基昂，记得劳伦斯在一次这样的辅导中与那个家族中的一位长者有过接触，这位长者就是威尔弗雷德·梅奈尔，他“动情地”感谢了劳伦斯，因为他照顾希尔维亚的表妹玛丽·萨利比。艾丽诺·法基昂记得这个玛丽是梅奈尔孙儿女中的“粗暴顽皮的野孩子”。她还回忆，当威尔弗雷德·梅奈尔谢过劳伦斯离去时，劳伦斯“勃然大怒”，说他“不需要感谢，我并不是喜欢才去管教玛丽，不过有人必须这么做”。

玛丽·萨利比（当时已是玛丽·萨利比·菲歇尔博士）大约在40年后在她为爱德华·耐尔斯所作的回忆录中她曾写道：她10岁时“热衷于务农”，并“几乎一年到头在农田里乱跑，完全变成了野孩子”。她又补充说。虽然劳伦斯的教育把她从对农业的兴趣中拉了出来，但她还是很喜欢劳伦斯教她课的，显然她的表妹也是如此。不久，劳伦斯将希尔维亚写进了他们家族的故事中，其中她的父亲帕西·路卡斯是个主要人物——有关对这故事的反应将在后文提及。

虽然帕西·路卡斯很文静，对人冷淡，但大多数人欢喜并尊敬他。显然，他使劳伦斯感到讨厌。帕西是E.V.路卡斯的兄弟，此人是劳伦斯所不喜欢的那一类文人：一个上流社会的小品文作家，一个伦敦俱乐部的常客，一个文人聚会上的才子。他的兄弟帕西刚满40岁，对家谱学很感兴趣，而劳伦斯对此是不屑一顾的。甚至埃弗拉德·梅奈尔为帕西·路卡斯所著的回忆书中有许多为梅奈尔家谱所珍爱的细节竟也遭到了劳伦斯的嘲笑。什么路卡斯在“小事情上有斯巴达式的一丝不苟”，什么他是“一个高明的板球运动员”，什么在他离家参战时将那大捆大捆的“那么实际又那么令人伤感的”家谱资料整整齐齐地收集在一起——这些在梅奈尔回忆录中同情与赞美之言竟也使劳伦斯咬牙切齿。帕西·路卡斯的这些活动给劳伦斯的讽刺作品提供了武器，因为他认为帕西·路卡斯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依赖威尔弗雷德·梅奈尔的恩惠并依靠玛德琳为其精神支柱。在他的《英格兰，我的英格兰》中，劳伦斯将这些情节放进了对帕西的尖刻的描绘之中。小说中的帕西被称为埃格伯特，他寄居在克罗汉姆的戈德弗莱·马歇尔的家中。此小说的标题是对W.E.汉莱的一首名诗是一种无声的嘲笑。但是，尽管小说中的言词尖刻，对帕西的描绘中也不乏同情：故事中的埃格伯特无疑是主宰过这个家族的、乐善好施的、家长作风的牺牲品。

当然，劳伦斯以前也做过这类事——在《儿子和情人》中，没有放过他自己的家庭。但那本书是在他母亲死后才出版的，而他父亲读不懂也不够警觉，因而没有发现他儿子在小说中对他的虚构处理和刺痛他的地方；而劳伦斯的姐妹们在中西部小镇的街上走过时，不得不试着避开别人对她们的注视。乔治·劳伦斯仅仅看了《儿子和情人》一部分。1950年他对作者说，如果他那时候遇见伯特，他会“因为在书中把父亲母亲写成那个模样”而“揍他”。但梅奈尔一家是一个联系紧密的家族，不能把劳伦斯作为一个不得体的男性亲属笔勾销，他是一个陌生人，接受过他们的善意和款待，然而却对他们进行尖刻的描绘。

多年来，劳伦斯不时地对他的朋友奥托琳娜·莫奈尔、拉塞尔、阿尔丁顿、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等人进行讽刺，他们被他作品中的讽刺所刺痛，莫里被认为是最令人注目的牺牲品。只有少数几个劳伦斯熟悉的人躲过了，辛

西娅·阿斯奎斯夫人在好几个故事中曾以友好（如果不完全富有魅力）的姿态出现过。这可能是劳伦斯对她怀有爱慕之心，或者就是尊敬之情。康普顿·麦肯色后来至少在两次明显的场合中成为劳伦斯的牺牲品。他对本书的作者说（1950年于伦敦），劳伦斯在小说中常把他所熟悉的朋友加以变型的描绘，因为“他有一种生动地描写人物的环境和背景的诀窍，然后再把它转变为完全由他自己的外形”。康普顿还说，那些认识这些牺牲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离开了这个星球）的人，现在除了能看到虚构的描写外，再也不会知道原来的故事了。但怀着对劳伦斯作品的某些方面的一种钦佩，康普顿接着说，他的故事对那些不认识那些人物原型的读者具有一种艺术效果。

凯瑟琳·卡斯威尔指出，劳伦斯的《盲人》中的那位女性虽然在表面上和她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没有什么不能轻易地被否认的，但其中的描绘仍使她感到难堪，正如劳伦斯曾让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奥托琳娜·莫瑞尔，多萝西·布雷特等其他难堪过的一样。卡斯威尔夫人也说，“这里没有什么肖像性的描绘，更没什么概括性的叙述。

但这是何等生动的生活写照”！

然而，一定要强调一下，劳伦斯并没有用讽刺攻击所有他认识的人，他并没有和他们每个人都争吵。例如，他在格雷特汉姆居住时期的一位新朋友文丽诺·法基昂，劳伦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她作了十分友好的描写。她作为凡尔拉·梅奈尔的朋友，在格雷特汉姆渡过了她1915年的部分春假。她对劳伦斯作了友好的描述。当她宣布她打算步行穿过东南部丘陵草原去汉普郡时，劳伦斯表示愿意与她同行一程。他们在早晨出发，在苏萨克斯的晨雾中沿着通往奇切斯特的古罗马道路上时而迷路时而复辙地向前行进。当晚劳伦斯乘火车从奇切斯特回到普而巴勒。

他们唱着歌，并在路边小酒店中休息。劳伦斯整天很快乐（“我们似春天一般”）。但当他从山上下来到了依斯迪因、望见了屋舍上升起的炊烟时，他不再感到欢乐了，他以情绪低落的口吻说：“我了解住在那样的屋子里的人，就像我了解自己的皮肤一样。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我知道他们的生活……我恨他们！”然而，在小酒店里，他却热情地和那些从农田里来此喝啤酒和饮料的人闲聊。

劳伦斯厌恶虚假，这种厌恶可以在友谊的气氛中在接触自然时消失，但当他接到审理破产案的法庭的传票时，这种厌恶又油然而起。他拒绝为离婚案付150镑的费用；那些企图从身上榨钱的律师是“野兽，跳蚤和吸血鬼”，假如可能的话，他不会让他们从他那里捞到一分钱。出版商在《虹》一书上还欠他190镑，这笔钱将在小说出版后付给他，劳伦斯觉得这是他以后两年中仅有的一笔钱。他对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靠法律寄生的那些人的痛恨似乎比狄更斯更厉害更猛烈了。劳伦斯在4月29日写给拉塞尔的信中说，“一个十分卑劣的家伙”在格雷特汉姆给他送去了一张证券，并说他必须在5月10日前到负责登记的人那里去偿还他的债务。“这个卑劣的家伙”连同证券给了他25先令作为“劳务费”。劳伦斯茫然地盯着那枚金币，劳伦斯唾弃这种幸运。但这段经历加强了他“对整个社会机构的刻骨痛恨——痛恨这整个英国的政体。我真希望自己是罪犯而不是一个破产者。但是，慢慢地——慢慢地，我要尽一切努力在他们机构的基础中埋下一颗地雷”。他埋在那机构下面的地雷之一就是《虹》，此书预计可在秋天与读者见面。在格雷特汉姆的最后一稿中，他对故事全面地作了修改。劳伦斯在早些时候与爱德华·加

纳特的通信中提到他删去了好几个人物和姓名。在他给加纳特的一封信中劳伦斯说，“这一部分里，继原来的《姐妹们》之后，我给你寄去了《学校督学》及其它”。显然，厄索拉在《虹》的结尾处的经历是在《姐妹们》开始时就发生了。从现存手稿页数、编号和章节次序的更改中，可以看出这些经历曾被后移，这样，就显然将伯金（那位学校督学）写入了第二部之中。就这样看来，《虹》的开始部分——布兰格温的历史与汤姆和丽蒂娅早期的婚姻生活——很可能是后来增加的。具有严酷的现实主义外表的布兰格温家族史，被认为似乎属于劳伦斯写作生涯的第一阶段，而不是属于更具有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倾向的第二阶段。但我们必须记住，当劳伦斯在写作《虹》的最后一稿时，他也在写对哈代进行研究的文章。显然，劳伦斯在德国时也曾读过托马斯·曼的严肃而又华丽的《布顿布鲁克斯》——他在1913年写的有关德国文学的论文中提到此书。《虹》在某些方面与《布顿布鲁克斯》相似。两书都对几代人进行了追溯描写，每个阶段中都描写几个人物。但《布顿布鲁克斯》自始至终保持了一本家族编年史的特色。《虹》一开始也像《布顿布鲁克斯》一样，但往后就大不相同了，它是一种表达一个人物意识的工具，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

此人就是埃拉，在出版的那一稿中她变成了厄索拉。在未认识伯金之前她肯定“有过一些经历了”。劳伦斯同意加纳特的看法，对于坦普尔曼事件（她和一个名叫本·坦普尔曼的人的一段经历）所提供的那种经历的尝试是“不妥当的”，她显然与斯克莱宾斯基（在伯金之前）有过那种经历了。对于这个斯克莱宾斯基，弗丽达和劳伦斯在1952年写给本书作者的一封信中写道：“斯克莱宾斯基有点像她的一个里奇索芬表兄。”弗丽达进一步指出，露易斯·伯洛司可能在外表上是厄索拉的原型，”但内在关系是劳伦斯和我的，正象《恋爱中的妇女》的戒指那一幕一样，在那一幕里我朝他扔了那枚戒指”。1914年1月29日给爱德华·加纳特的信证实了这一点，出现在休克斯利信札集中的空白也填上了：劳伦斯曾说，那时被称之为埃拉的人物可能会分成两半——以及他们之间的渐变，这是因为嫁接法将弗丽达的角色（大致上是如此）移植到露易这个角色上。（现在存在得克萨斯大学的手稿只是《恋爱中的女人》的手稿散部，显然是第15章早期手稿。处此埃拉的姓名叫布兰格温，其中描述一对名叫伯金和埃拉的情人之间的争吵。埃拉的姐姐已被取名叫古德伦，但将要成为赫莫尔尼的那个人物在这里叫埃塞尔。）

《虹》是以汤姆·布兰格温和一个波兰贵妇丽蒂娅·兰斯基的结婚作为开场，此书现在已被认为是一部伟大的英国小说。由于此故事从布兰格温的务农人讲到厄索拉，这位世纪末的“自由”妇女，以及她生动的幻想和她惊人的历险。但此书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才得了公正的评价。

恰好在劳伦斯逝世的15年前的那天，《虹》写完了。劳伦斯把他这本带有性感暗示的小说草稿寄给凡尔拉·梅奈尔阅读，他的这条虹飞架在矿村、农田和从布利契的山丘上所能看到的伊斯渥的上空。也许就在这时候，他把吉奥托的《乔切姆》和《牧童》两幅粗糙的水彩临摹画送给了凡尔拉，那显然是根据一张照相铜版复制品而作的，因为他没有按照吉奥托画中的色调去画；吉奥托将灰白色的，光秃秃的岩石作为背景，而这个充满活力的劳伦斯则相当典型地在这块骨色般的岩石上覆盖以植物的翠绿色。他在3月2日写给凡尔拉·梅奈尔的信中说：

我已完成了我的《虹》，我把它折弯了并将它固定住。现在我在它的脚

下发现了许多珍宝。

我没有收到平克来信，但却接到了麦休恩的信，要求我对他的秋天宣言写七十个描述性的字。糟透了。

你把我的手稿打抄一下，好吗？——并告诉我其中的重复之处及其它一些什么。该删的我必须删去一些内容。

你可以将稿保存你处，把打好的稿子扎好寄给我就行了，这样我可以浏览一遍。想到此书终于成著，我感到异常高兴。

“他正打算写一本有关生活的书”。在这本书中会有“更多的虹，但它们是在不同的天空中”。他希望将它们在周刊中出版，“我的伟大而快乐的革命性首创。”这个主意是他在当年的后期创刊《签名》这本杂志的第一步。

其余一些他认为是《虹》的续写之类的材料，还有待于调整、修改和大量的重写。他最近遇见的人们和最近发生的事件还有待于写进那部最终被称为《恋爱中的女人》中去。1915年4月23日的信是将那本小说中发生在奥托琳娜·莫瑞尔身上的事情之先兆。在那封信中，劳伦斯对她的责骂显然与他对《恋爱中的女人》中对赫莫尔尼，罗迪斯的态度是一样的。劳伦斯对他朋友的预言性的惩罚的诱因来源于一个居住在莫瑞尔乡村别墅的一个比利时难民的自杀企图。这个遇到麻烦的姑娘就是后来成为阿尔多斯·休克利斯夫人的玛丽娅·尼斯。劳伦斯在给奥托琳娜夫人的信中写道：

我们对玛丽娅的事十分吃惊，真太可怕了。我不知道你是否比我以前所想象的更加邪恶了，我想你总是禁不住要折磨别人。

但我总认为此事能说明一些问题——似乎你用一种强有力的、形成已久的意志包围住了这个姑娘。因此，在这种意志中，她是生活在你的意志支配之下。后来你把她从你身边摒弃，所以，她说她是受不了被人遗弃才服了毒是很有道理的。另外，她也感到迷茫和困惑。我想她的确意识到她对她自己毫无认识。我们英国人有其形成已久的外在的自我。和那种坚强的意志以及那种发育不全的内在的自我，我认为对别的民族来说我们是令人迷惑的。在不涉及我们自身的前提下，我们常常设想去支配他人。一个年轻的异国人是不能理解这些的——像玛丽娅那样的姑娘也是不会理解的。

为什么你总要使用你的意志，为什么你总不能使事情顺其自然，而不要老是去把握什么，知道什么或去支配什么。我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现在甚至要责骂你，为什么总欢喜用权力而不用爱，用外在的控制而不用感情，我认为这是一种遗传。

劳伦斯将奥托琳娜夫人转换为赫莫尔尼是花了一段时间的。这时，他手头还有《虹》一书要写，在这部书的后半部中，尽管其中的部分内容写于此书的第一部分之前。在《瞧》的一系列诗中，以及在论述托马斯·哈代的文章中，这部书直到劳伦斯逝世后才出版，已暗示出一位新的劳伦斯的诞生。这位劳伦斯与乔伊斯和普鲁斯特一样都站到了现代派的行列之中。但是，劳伦斯显然在后来才知道这两个人的作品的。随着书中故事的发展，其主要的象征——在许多极为微妙的援引和旁证的强化下——成了书中那个主要人物的特别重要的标记，并在故事的结尾处被神化了。但这个象征对于劳伦斯也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标志着在他自己未来的作品中将出现一种新的目光和创作手法。

在《虹》的前半部分，（第四章《安娜·布兰格温的童年》）一对年轻

的恋人威尔和安娜在收获时节来到一个洒满月光的麦田里，他们决定堆起一些麦捆：他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越来越强烈的亲密之感举起麦捆大步地向中间的地方走去，他从未这样的接近过她，从未尽情地靠近她，赶上她。在这里，“在月光下只有他专心致志地搬动麦捆的往复动作，在寂静中挥动着双臂，只有在放下麦捆时的“拍擦”一声，然后是一阵寂静，然后又是“拍擦”一声。这里的以及在随后的一些段落中的语言几乎有一种催眠的效果，像书中的其它部分一样（洪水及彩虹），它暗示了旧约全书中的情节，那大步行走和手臂的挥动，那堆放麦捆时的“拍擦”一声，是极具象征意义的，这些动作促使厄索拉的父母在一种神秘的芭蕾中结合起来。

在一代人的时间以后，厄索拉和一个后来成为她情人的安东·斯克莱宾斯基经历一种不同的麦田之夜的情景。像她父母一样，厄索拉身上也具有那种圣经般的有节奏的韵律。刚认识斯克莱宾斯基时，厄索拉把他幻想为“上帝的一个儿子，他把人类的女儿看作是仙女”，劳伦斯在几部小说中都采用过一段。厄索拉还记得阿伯拉罕屋子走过的三个天使。但她在与斯克莱宾斯基的那一段麦田插曲中并不是那么老式守旧，它似乎部分像早期的斯托拉文斯基，部分像晚期的凡·高夫，但根本上是属于劳伦斯类型的：

他们朝堆草场走去，带着一丝恐怖。他们看到在那里的一大堆闪光的玉米堆变形了，在夜晚的黛兰色的天空下变成银白色，投下了深黑色的影子，威严而朦胧地堆放在那里。她像闪闪发光的游丝，当它们像冷却的灰烬升到银兰色的空气中时，她似乎在它们中间燃烧着，就像是一种火红的金色、闪烁的、白色的、金属的火焰，一切都不可捉摸。他害怕在玉米堆的上空燃起月神之火，他的心在收缩，像水珠一般在溶化。他知道将要死去了。

斯克莱宾斯基“知道”他将经历的死亡并不是肉体的，因为在她强烈的狂喜中他感到了厄索拉的力量。厄索拉当然是“新派的年轻妇女”，就像H.G. 威尔斯笔下的安·弗洛妮卡，或阿诺德·班内特和萧伯纳笔下的各式各样的女主人公一样，她是一个现代的“解放型”的妇女。但在厄索拉身上具有许多《瞧》系列诗中的象征性的黑暗，她的幻想与同时代的女性人物截然不同。在《虹》的末尾，她“杀死了”无能力和她并驾齐驱的斯克莱宾斯基，他又回到了平日的安全之中。

劳伦斯不再生活在风光秀丽的意大利了，他受着战争的折磨，他通过了《虹》的最后一稿和《恋爱中的女人》中的人物，进入了一种新的领悟，这种领悟占据了他的意识和创作。在柯休·克拉克所写的《消亡之河》中（1968年）——这是伯金在《恋爱中的女人》中用过的词语——他认为这种过程与浪漫主义运动的诗人们有些共同之处。克拉克认为劳伦斯用活力和创造力来平衡腐朽和衰败，在伯金的身上可以看到这两种力量的聚合点，但其过程却开始于《虹》。克拉克叫人们注意柯勒律治对“第二类想象”的定义，这是他在取消了幻想作为次要因素之后所提出的：

那末，我认为想象不是第一类就是第二类的。我以为第一类想象是一切人类感觉中活生生的和原始的力量，是作为无限的“自我”中永恒的创造行为的有限思想之重复。而第二类想象是前者的反映，它和自觉的意志共存，但在动力上的类型上仍与第一类的相同，只是在程度上及行为的方式上有差异。为了再创造，它分解、渗散、消溶，否则这种过程将是不可能的。然而，不论怎样，它还是竭力使之理想化和一元化。甚至，当一切客体都变得固定或衰亡之后，它仍是充满活力的。

关于在战争年代中的劳伦斯，其主要思想可见于下列陈述，即“为了再创造而分解、扩散和消融。”柯林·克拉克并不认为劳伦斯的这种思想是从柯勒律治的文章中抄袭而来的，甚至他还不知道柯勒律治的观点。但读者还记得劳伦斯在 1914 年写给艾米·罗威尔的信中说，在我回到大洋彼岸之后“我很想认识柯勒律治”。除了在年轻时读过《克里斯特贝尔》以外，（我们可以猜测他可能知道《古时的水手》）到目前还无法证实他对柯勒律治是否了解。无论如何，克拉克在此得出了一个很好的结论，即劳伦斯在他企图达到一种完美境界的时候，像柯勒律治一样，将腐朽和创造结合起来。劳伦斯对此最完美的实现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在他的《虹》中贯穿了这一动机。而这种动机在《恋爱中的女人》中体现得更具体。很显然，这种想法感染了他，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的，而我们可以把他在战争年代中的行为归因于这种理解的模式。

（三）历尽心酸

劳伦斯本打算在5月份离开格利森姆，但一直住到了7月底，继续给孩子们教课。他想搬往加辛顿的计划也未能实现。他原希望在这个靠近牛津和剑桥的地方建立起他自己的新“圣地”。不过，他还是与加辛顿——剑桥的那一批人保持着联系，除奥托琳娜夫人和E.M.福斯特以外，拉塞尔和大卫·加纳特也来格利森姆看望他。在4月，加纳特带来了弗朗西斯·比勒尔，他是纯文学作家及政治家奥古斯汀·比勒尔的儿子。弗朗西斯·比勒尔后来成了加纳特诺恩萨奇出版社的伙伴。加纳特和这位比勒尔都是拒服兵役者，他们让劳伦斯感到失望，他告诉加纳特下次别再把比勒尔带来。如同在剑桥与加纳特的朋友相晤时一样，比勒尔使劳伦斯梦见黑甲虫：“你必须离开这些朋友，这些甲虫们，比勒尔和邓肯·格伦格是不可救药了。”劳伦斯对肯尼斯则抱着“不置可否”的态度，但他不会忘记自己在剑桥的那顿早餐上的敌意和怒气。

加纳特中断了他和劳伦斯的亲密友谊，但他并没有像布鲁姆斯伯瑞的伙计中的其他成员那样成为劳伦斯的敌人。劳伦斯除了继续和拉塞尔保持关系之外，脱离了剑桥——布鲁姆斯伯瑞社交界。他的这一举动大大地伤害了自己，因为这个团体支配着英国知识界的一大部分，并是许多重要刊物的代表。他们使劳伦斯的闻名晚了一代，虽然没有忽略劳伦斯，但缩小了他的影响力。唯有福斯特是例外。

指出布鲁姆斯伯瑞对劳伦斯的贬低，并不是要否认其成员与劳伦斯之间确有分歧，或是对诸如凯恩斯——尤其是大卫·加纳特等人存有恶意。在劳伦斯尚属无名之辈时，加纳特曾不遗余力地为其鼓吹。但在这些年里，所有和布鲁姆斯伯瑞抱着同样心态的人们往往都是反劳伦斯派。布鲁姆斯伯瑞一批人各不相同——有些是著名的女权主义者；有些屈膝于知识独尊论；有些来自柏拉图的宴席座谈会——当他们看到劳伦斯从外向他们虎视眈眈时，他们只能把他看作是敌手的图腾。

劳伦斯和拉塞尔的友谊一直保持到1919年实属奇迹。1915年6月19日至20日，拉塞尔来格利森姆度周末，显然是在那时候，他和劳伦斯开始商讨有关共同举办讲座的想法。“有一段时间，”拉塞尔数年之后写道：“我们之间可能有某种松散的合作。”

拉塞尔在格利森姆时，劳伦斯热情地给奥托琳娜夫人去信，说拉塞尔的伦理学讲座和他有关“不朽性”的讲座会导致建立“一个围绕一种宗教信仰的小社团或组织”。拉纳尼姆的地位逐渐和加辛顿相融合，为那些希望逃避世俗和“思考大事”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小世界”，奥托琳娜夫人该成为此小社团的主席，此社团还将包括加农，“或许还有康培尔”和默瑞夫妇。劳伦斯向奥托琳娜夫人保证，他们是“真诚”和“有价值的”。此后不久，他又给奥托琳娜夫人去信（显然是在7月12日）说，他真应该“和拉塞尔的讲演辩论一番”，而不是和他本人。确实，他们“几乎已经达成了默契”。

劳伦斯写给拉塞尔的信件全面、直接地反映了辩论中一方的观点，它比拉塞尔在1952年充满愤慨的回忆录和1968年的自传中重申的观点更具有价值。双方的根本分歧在于，劳伦斯尚待完善的“血统论”观点使拉塞尔感到厌恶；而劳伦斯则对拉塞尔的“心灵意识”不以为然。不过，拉塞尔自己承认，他曾一度深为劳伦斯所惑，以致劳伦斯的一些批评——如：拉塞尔因自

我欺骗，没有真正意识到他是喜欢战争的——几乎逼他走上自杀的歧途。然而，他没有自我毁灭，而是活了下来——并对那个严厉地冒犯过他的人恨入骨髓。

劳伦斯写给拉塞尔的有些信是有关内阁政务方面的。弗丽达的信中对此也颇有兴趣。其中一封可能是写于 1915 年的 5 月底，信中问道：“这个合作政府是否还充满活力？显然，是“命运”主宰着这个世界的运转，除了对“法国佬”的仇恨之外，对此命运谁也无能为力。弗丽达对拉塞尔的来信表示感谢，并说她知道他“一定深为那些不合时宜的追根究底做法所困扰”。不过，她感到遗憾的是他没有告诉她“怎样才算是明智之举”。她还写道：“当我说你过于英国化时（看，我特地用大写来表示），我并不是说你不够人情味——而是说你过于代表了他们那样的英国人，你想冲他们出气，而事实上你更应该冲你自己出气——我希望你能原谅我这么说——假如你能对我作些批评的话，我将十分荣幸！”

拉塞尔 6 月来格利森姆作客之后，她又给他去信：“你有点生我的气了——也许我对你的工作不够尊重，这样的工作我将永远不能理解（这里划去了比较一词），那完全是人为的东西，你竟称之为理性，这实在是个谜，让我感到吃惊不小。”她认为，拉塞尔是在用他的理性迷惑大众：“这实在有趣，我将永远畏惧你的理性，我觉得它是敌视女性的，至少现在是这样。”

她又说：“我认为你所代表的是你们民族的热情，这会使你不高兴，因为你过份地沉湎于你们民族旧时的、鼎盛时期的那种热情，你深陷其中，而这种民族热情实在需要一种更大的、更广泛的范畴——所以你也也许信奉战争——你认为人们会这样想吗？”她相信，“除了陈腐的普鲁士主义”，她的故国“还有些优点和新的理想奉献给它自己和这个世界——要是各民族真能让相互的长处和优点得到发扬和存在，并相互学习，该有多好呢——而这些小民族现在都如此固步自封，如此互不相容——所有的人民都如此丑陋，但另外一些东西依然存在着，存在于各民族和各人之中”。

弗丽达真诚地喜爱和敬慕拉塞尔。许多年之后，她承认年轻时的劳伦斯给拉塞尔信中的语气“似乎过于傲慢了”。在《哈泼斯》杂志 1953 年 4 月首次登载了拉塞尔对劳伦斯的猛烈抨击文章之后，弗丽达在给《哈泼斯》的信中谈到了这一点。论及布鲁姆斯伯瑞，弗丽达说：“在那帮人之中，没有一涓人类善良乳汁的细流……那怕是一丁点也没有。他们为显示自己的机智和聪明而忙碌着。然而，拉塞尔能够做到与人为善。”她认为，如果拉塞尔理解并接受了劳伦斯的一些观点的话，“就如他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一样，他很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们的友谊便可能成为一段佳话……至于将劳伦斯称为纳粹主义的拥护者，纯属无稽之谈——你不妨也可将圣·奥古斯汀也称为一个纳粹分子”。弗丽达说她“确信在拉塞尔心灵的某个角落里，另有一个青年劳伦斯的形象，他视之为朋友而不是那个他要将其驱走的妖魔鬼怪”。

人们认为弗丽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亲德倾向，这一点在她给拉塞尔的信中表现得十分轻微，但福德·麦道克斯·休佛和凡尔列特·亨特在各自独立，但时常相矛盾的回忆录都认为弗丽达是个十足的亲普鲁士派。休佛和 H·G 威尔斯夫人以及凡尔列特·亨特曾结伴来格利森姆作客。当时，休佛的《安特卫普》一诗真脍炙人口。

在查林克罗斯火车站见到比利时难民的一幕触发了休佛的灵感。凡尔列

特·亨特回忆道，在谈及这首诗时，弗丽达愤愤地说，“肮脏的比利时人！谁会理睬他们”！凡尔列特·亨特继续写道，“除了美味可口的茶点之外，我还与这位瓦尔基丽共进了正餐”。（瓦尔基丽是北欧神话中的战争女神，这里谑指体格魁梧的弗丽达——译注）虽然这次作客期间正值劳伦斯在周末去了剑桥，但休佛毫无根据地说他在格利森姆，并将他描述成“一个想当然的亲德分子”。休佛回忆说，在弗丽达滔滔不绝的议论中，他只能退到了外室，因为穿着军服。他仍像往常一样四处游荡，因为直到1915年8月14日他才正式被定为军官（据英国陆军档案记载），这是劳伦斯离开格利森姆两周之后的事了。

许多年以后（在1955年），弗丽达在一封信中对这位作家作了回忆。”当他们，他和凡尔列特·亨特来到时，我对他说：“我们都是德国人吗？”对此他吱吱唔唔，颇感不安。此时正值战争时期，所以我对他不甚介意。我根本没说，‘这些脏脏的比利时人’。我从未这么想过！劳伦斯当时并不在场，也没有可供福德休息的外室，我没有发表什么长篇大论，他也没穿什么军服，只是他不喜欢我，而我也同样不喜欢他们，甚至相当鄙视他们。那是一个腐败的年代，一切都虚伪，令人伤感，那些布鲁姆斯伯瑞是如此的吝啬，没有半点脚踏实地的精神。天哪！当时确有许多东西值得劳伦斯奋起反击的！那些真是货真价实的累赘”！（阿瑟·马尔森纳在他写得十分出色的休佛——福德回忆录《最悲伤的故事》（1971年）中认为，休佛虽然直到8月14日才被宣布为军官，但在此之前他还是有可能穿上军服，甚至可能在7月份。但对这一点无案可稽。有关休佛涉及此事的可信性——这会使富兰克·哈里斯对他的模仿更加困难——实属疑问。）

离开格利森姆的第二天，1915年7月15日，劳伦斯从劳塞克斯，利特汉普敦——他和弗丽达将在那里住上几天——给维奥拉·梅纳尔去信，他用维奥拉·梅纳尔的家中的昵称开头：

我亲爱的普鲁：

这是个阴天，海峡上影子似地游荡着许多船只，海水闪烁着蓝色的光芒，细浪在发出碎响。我想，这一切实在令人舒畅，当整个大地被抛在身后，当整个英国从无数杂乱无章的房屋的重压下，回复到只有斑驳的卵石、和缓的波浪的时候，海天在水一线尽头被分割，航船的影子像幽灵悄然无声地徘徊着，令人神往。如果我们能从英国清除掉所有的房屋街道，我们就能让一切重新开始。

这最后的陈述显然和《恋爱中的女人》中伯金的一些言辞相似。

公假日之后，劳伦斯夫妇搬到了汉普斯特德的海尔斯谷拜伦维拉斯一号，在那里弗丽达可以离她的孩子们近些。劳伦斯告诉拉塞尔他对异地深感陌生，在新的环境里很不快活，“觉得好像是全交付给了那些桌椅和门垫”。他和弗丽达住在诗人安娜·威克汉姆对门的底楼套间，屋后便是那些曾给毕克威克先生产生灵感的池塘。诗人克里斯多夫·哈索尔在1954年曾在拜伦维拉斯一号附近住过，他在信中将它描绘成一幢“约建于50年前的丑陋的红色小木楼，有维多利亚式的凸肚窗，前门有一片经霜打的草地”。

大卫·加纳特在安娜·威克汉姆的《诗选》（SelecrPo-ems1917）序言中，称她是个“美丽动人的女性，”有一副“富有魅力的女低音”嗓子，充满了“媚人的幽默”；她曾在巴黎学过歌唱。她的诗《女皇》（Imperatri）可能取材于弗丽达的不忠行为。安娜·威克汉姆在澳大利亚度过了大部分童

年时光。她对这片土地的描写可能唤起了劳伦斯对这块南亚大陆的兴趣。或许正是在这个时候，劳伦斯和弗丽达结识了詹姆斯·巴利，并在菲亚希瑞诺时开始和他通信联系。后来成为巴利的秘书的辛西娅·阿斯奎斯夫人认为，“一种有趣的友谊从此确立了，但不幸的是，不受拘束的弗丽达的直率到了极端的程度，她永远无法理解金钱是让人为难的事，却认为一个殷实的钱袋匀些到一个空钱袋里去是一桩天经地义的事——假如她自己腰缠万贯的话，这种想法也同样不会改变。巴利先生，你好！他说，听说你每年有5万英镑的进帐（这对巴利实在是一件趣闻！）你干吗不送点给劳伦佐（劳伦斯的昵称——译者注），好让我们有钱去趟澳大利亚？”

巴利被将了一军，像大多数人那样，他“采取了答非所问的办法”。此外辛西娅夫人（不能排除是一语双关）进一步解释道：“劳伦斯和弗丽达还与巴利的情妇，即当时的吉尔们特·加农太太保持着密切的接触，这一点的发现也使巴利深感窘迫。”

无论是不是安娜·威克汉姆首先唤起了劳伦斯对澳大利亚的兴趣，她在许多方面都仍是个值得一提的人物。他的丈夫，“一个勇敢的气球航行家，”曾是皇家天文协会的主席。一次，安娜·威克汉姆因为他反对自己当诗人而大发雷霆，他就将她送进了疯人院。从疯人院出来后，她通过父母认识了大卫·加纳特。她常常和年轻的加纳特在汉普斯特德的希思散步，或去皇家咖啡馆。加纳特说：“她不会把我当作她的情人，我十分古板，不像她的那些乌七八糟的朋友。后来我成了个拒服兵役者，而她在起初是支持战争的。”他还说，劳伦斯曾推荐过她的一些诗作“非常好的”）希望被收入《乔治亚诗集》。他和劳伦斯曾常去希思散步，她的几个充满妒意的小儿子跟在他们后面。一场冬雪之后，他们曾用雪球向劳伦斯开火。

虽然劳伦斯夫妇曾去过苏格兰市场和普利德大街上的商店选购家俱，这说明他们曾打算在那里长住，但他们在拜伦维拉斯只呆到圣诞节，住了不到5个月。这期间劳伦斯和莫里夫妇创办了杂志《签名》（Signature），但不久便夭折了。《虹》一出版便遭查禁。劳伦斯总念叨着要去新大陆，但到年底，他却在康沃尔住了下来。

10年后，劳伦斯轻蔑地谈起《签名》时说，它的创办是因为莫里说，“让我们干点事情吧”。但莫里后来坚持认为，“我们共同有意于此”。他们在红狮广场费什街12号一家商店的楼上以一先令一周租了间办公室，劳伦斯回忆说那是在伦敦一个“狄更斯式的穷街破巷。”有十来个人经常参加星期四晚上的聚会，此时是距离劳伦斯实现他组织一个讲座系列的梦想的最近的时候。杂志在10月和11月只出了三期。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以玛蒂尔达·贝利的笔名发表了几篇小说；莫里发表了他的自传三部曲（“从前有个小人……”）而劳伦斯为每一期奉献了他的《王冠》（“Crown”）。

文章中，劳伦斯重申了他同年早些时候给拉塞尔和奥托琳娜夫人的信中所阐述过的“哲学观点”，当然它包容了劳伦斯当时最深层的思想，同时又是对《虹》的详述，小说《虹》是在9月出版的。劳伦斯后来说他的“哲学性的”创作是产生于他的想象性创作，而不是与此相反：“小说和诗歌应该自然地流注笔端，随后，人们必然需要为自己全面准备某种令人满意的思想观点和素材，从自己为作家为人生的经验中获取某种明确的答案。”这一观点虽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但它的很大部分看来是正确的。

在《王冠》中，劳伦斯首次对黑暗（darkness）的象征性运用作了重要

的解释。黑暗在此代表着肉体、感官和精神的长久的搏斗。光明和黑暗是狮子和独角兽在为王冠而战，象征着真实完美的自我。虹同样象征着这一真实的自我。它只有在每个人的真实自我完成了自我本性，即来自黑暗的磨难和来自光明的欢乐的极端冲突之后才会实现。这在哲学上毫无新鲜之处，只存在着形象上的差异。在哲学上，《王冠》是一个业余哲学家的顿悟之作，它的价值只在于它对《虹》及劳伦斯的其它作品作了注脚。

贝特朗·拉塞尔在 1915 年 7 月给奥托琳娜·莫瑞尔的信中的《签名》杂志社的人们作了有趣的描述，信中他提到，劳伦斯带他去“看望一个俄国犹太人库提连斯基，莫里和莫里太太——他们都围坐在赫尔蓬饭店对门楼上的一间办公室里，办公室空荡荡的，窗口紧闭。他们一刻不停地吞吐着俄国烟，百无聊赖，愤世嫉俗。”拉塞尔把莫里当成是个“粗俗的”人。他们都陷在“死气沉沉”和“堕落”的气氛之中。随后他们去了动物园，拉塞尔从一只狒狒对这群人明显的敌视和厌恶中得到了“相当具有讽刺意味的满足”。他显然没有意识到那动物的反感很可能也包括拉塞尔自己。

他还对奥托琳娜夫人说，他和劳伦斯一起去了汉普斯特德，劳伦斯和弗丽达及杜丽·拉德福德当时住在那里。疲劳不堪的拉塞尔告诉劳伦斯，他们“无论如何首先必须各自保持独立，而不要急于试图创立一个学派。劳伦斯一读及政治，便显得‘狂热’”，他告诉拉塞尔，真理远比事实更加重要，“他的观点狂妄存余，而诚恳不足，最起码有些模糊不清”。

过了数日，拉塞尔与 T·S·艾略特（“我的哈佛同学”）夫妇共餐后，他又给奥托琳娜夫人去信，对她又谈起了劳伦斯；他和劳伦斯一起度过的那天“糟透了”；“劳伦斯很像雪莱——同样杰出，但对现实也同样缺乏耐心”。劳伦斯的“待人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是令人惊异的诚实，但在一定时候，因强烈的倾向性而误入歧途”。拉塞尔发现他的老“同学”艾略特像亨利·詹姆斯的朋友，新英格兰画家桑枝。艾略特显得“敏感、倦怠”，显然是“为他自己的婚姻感到羞愧”。对拉塞尔来说，这当然是个不幸的日子，所有的事似乎都错了，而把劳伦斯与雪莱的类比更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劳伦斯对这位浪漫主义的前辈是极其厌恶的。

《虹》出版的数星期前，也就是《签名》杂志的这段活动期间，劳伦斯和弗丽达目睹了大型齐伯林飞机对伦敦的首次大轰炸，它预兆着被岗特的约翰称为铜墙铁壁般安全的英国就此结束了。1915 年 9 月 8 日夜，海恩利希·麦西司令乘坐他的新型 L—13，率领齐伯林飞机入侵了英国。劳伦斯和弗丽达走过汉普斯特德的希思，炮声使脚下的大地隆隆轰响，探照灯不停地划过夜空，远处的城市里升腾起一片火光。劳伦斯次日写信给奥托琳娜·莫里，说空袭像一场密尔顿式的“天堂里的战争”，虽然“不是天使们在作战”。他觉得齐伯林飞机像“长卵形、闪烁的中心发光体，在光照中平静地飘移，像新月，它的光芒在大地燃烧，要将整个地球摧毁。这就是末日——世界消失了，而我们像尘埃飘浮在空中”。

劳伦斯这种匆匆而就的即席描述和反应无意识地为他 7 年后在《袋鼠》（kangaroo）中的一段空袭描写作了准备。这段描写优于所有现代的有关空袭的描写。小说中，索莫斯和他的德国妻子看到齐伯林飞机“高高在上，渺小、灰白，使人想到遥遥在上的圣灵。城市附近传来了枪击声和令人恐惧的子弹的尖啸声，渐渐地，一片静寂。从议会山下面靠近圣·保罗的地方是一大片红红的火焰”。哈利特·索莫斯说，“想想，一些小时候和我一起玩耍的朋

友很可能就在里面”。索莫斯抬头“望着那卵形的物体，像一弯月亮”。怀疑里面是否真的有人，“仅仅是人，长着一双脆弱的腿和多情的嘴的人。他们的想象力无法达到这样的境地”。“脆弱的腿”这个词给人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因为整个人类都用它们在大地上行走；而高高在天上的“多情的嘴”更是神来之笔。

因为《虹》的查禁，劳伦斯对1915年的记忆是痛苦的。他后来说，对他以及对于所有那些敏感的反抗这种司空见惯的强制的人来说，这是麻烦真正开始的季节。”旧世界在1915年结束了”，那年冬天，“古老的伦敦精神崩溃了。在不断膨胀着的《英国牛》（JohuBull）（由赫拉图·波特姆莱编辑）的荒谬的统治之下，”人们失落在“失望、贪婪、希望和恐惧的漩涡中”。在《英国牛》开始大肆攻击《虹》之前，劳伦斯在给辛西娅·阿斯奎斯的信中表示，他不喜欢这份带有沙文主义色彩的报纸是因为报纸本身的原因，而并非是出于嫉妒。战后他说，任何像他这样充满热情的人，在《英国牛》的控制下，在他们神志清醒的时候“不会再完全地信奉民主”。帮助兴办这种报纸并使之走红的人是没有能力自我控制的人。遗憾的是，劳伦斯的战时经历——可以说是相当可怕的——使他无法观察到民主崇高的真谛。

欧洲许多敏感的文人像劳伦斯一样，拒绝为他们本国的战争效力，如法国的罗曼·罗兰和德国的海恩利希·曼。在英国，大多数富于想象力的作家却即刻从军，或加入政府部门，或从事间谍工作。劳伦斯能置身其中而持反战态度是难能可贵的，尽管他不像西格弗瑞德·萨松那样出名。萨松这位和平主义诗人曾从战壕里寄回和平主义的诗篇，而人们往往认为这是一种歇斯底里式的英雄主义热情。身体不合格的劳伦斯不久就被政府官员和官方外交家视为后方的危险分子，况且他还有个敌对国国籍的妻子。

在英国知识界中除了小说家和诗人外，有一批散文家、哲学家和记者，如布隆姆斯伯瑞这批人中，有许多真正的拒服兵役者，但他们中大多数都没有正式注册，因为他们往往都是无神论者，显然不属于宗教信仰反对杀戮的那一部分。尽管约翰·梅纳德·肯恩斯也同意他们的观点，认为战争是解决国际争端的野蛮方式，但他还是在政府中任了职（“实际上别无选择”）在他信奉和平主义的朋友们强硬地经过了严酷的审判以后，肯恩斯就会在皇家咖啡馆为他们设宴压惊，这些朋友中，利顿·斯特拉彻常常发出尖叫：“即使德国人来了这里，一切又有什么不同呢？”

肯恩斯的传记作家罗伊·哈洛德爵士曾指出这种观点的浅薄和缺乏历史常识，即便是德国和英国政治集团之间的差异在当时还不足以引起一场流血战争的话。这些布隆姆斯伯瑞的和平主义者也没有考虑到，像德国这样的制度的“根基和可能的发展势态”，与英国的差异，在这一点上，他们的错误是显然的。哈洛德说，如果奥特拉彻在二次大战时还活着的话，他要问：“即便是希特勒在这里，又有什么差别？”就会显得很不入耳了。

哈洛德认为，剑桥——布隆姆斯伯瑞这些人的错误判断和行为，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他们的崇拜者G·E·莫尔的教导——需要指出，劳伦斯对他是毫无好感的。莫尔的《伦理准则》（PrincipiaEthica）“很遗憾……缺乏道德责任方面的充分理论……至于在一次大战中拒服兵役是否正确尚须留待未来来评判。但很清楚，在莫尔的引导下，人们很容易走上歧路。”同样，肯恩斯在他的文章《我早期的信仰》中对莫尔和他的教导提出质疑，由此可以看出，劳伦斯关于“我们缺乏敬畏”的观察是正确的。

劳伦斯本人对战争的厌恶加强了他离开英国的决心，他和弗丽达此时计划去佛罗里达定居，其他兰纳尼姆的居民可以随后去那里与他们汇合。在他们等待签证时——辛西娅·阿斯奎斯的影响显然打消了弗丽达“出生于曼兹”的顾虑——麻烦发生了，这是在《虹》出版 5 个星期之后。

在 3 月 2 日写给凡尔拉·梅纳尔的信中。劳伦斯抱怨说，他还得为麦休恩的目录准备一份预告。一位麦休恩公司后来的编辑，约翰·库伦（在 1953 年 3 月 4 日的一封信中）说“我们没有劳伦斯是否自己撰写新书预告的记录，但作家草拟‘宣传广告’以供编辑作任何必要的修改是过去——而且也是现在——的惯例”。在“1915 年下半年度”的预告上，对《虹》的介绍中开头有这样一句话——“此书出于小说新流派中最优秀的作家之手”——显然不是劳伦斯所言，但其它的介绍则可能是他写的，当然经过了编辑的修改。但无论如何，它必然得到过劳伦斯的首肯。这作为作者本人对《虹》的评论是具有价值的，“这是一段布兰温家族人物在爱情、宗教和社会热情的危机中发展的历史。故事从汤姆·布兰温，一个富裕的德比郡农民，娶了一个流亡英国的波兰寡妇开始，写到他的孙女厄索拉，这个动荡和无畏的家族中的主要角色，她站在我们时代的前列，照亮了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厄索拉只是汤姆·布兰温名义上的孙女。

书评家却并不关心什么通往未来的道路是否照亮。在评价这本书时，他们倒退到维多利亚时的标准，他们大多数从中只看到了种种的弊端，极少几个评论家认为此小说并非猥亵之作，如杰拉尔德·古德（“此小说最不守规矩的地方是标点符号”）。不过，他还是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上说，小说“鄙劣、单调和枯燥乏味”。但绝大多数的攻击都基于道德的原因。对梅纳尔的朋友罗伯特·林德来说，（在《每日新闻》上），此小说是“粗俗、野蛮的男性生殖器崇拜”。在《星球》上，克兰蒙特·肖特援引了亨利·凡兹特列因在英国出版爱弥尔·左拉的作品而被投入监狱的例子：“但是与我刚读到的 D·H·劳伦斯所著的小说——《虹》这样的大鱼大肉相比，左拉的作品不过是小菜小碟。”肖特简直怀疑麦休恩公司在发表此书之前是否审阅过这本小说，因为它充满了“无度的性描写”，没有删略掉“任何这类猥亵淫秽的暗示”。但是，理查德·阿丁顿在数年后指出，这部小说“是长期艰苦工作的产物”，经过了“倾心竭力的创作和再创作”。他还指出，“没有人仅仅为了创作一部色情小说而去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这样的考虑对于伦敦警察厅的间谍检查官阿尔伯特·德雷帕来说也许还不算太极端。11 月 3 日，他组织人员在发行处和印刷处没收了一千多本小说，反对此小说的听证会定于 11 月 13 日在鲍尔街的警察局举行。

发行人没有将此事通知劳伦斯，他是从朋友那儿听到这个消息的。11 月 6 日他写信给平克，对那些好事者进行了指责，但他又说他“并不感到十分惊奇”。同天下午，他又写信给平克，说“重新思考了一下之后”，他想还是应该谈谈这个问题。下星期一（8 日）他将去加辛顿，但在去帕丁顿车站的途中他将在平克的办公室作停留：“我们必须对这查禁事件采取点措施，我们必须动员一帮人，将这局面扭转过来。”此中劳伦斯显然把没收与查禁混淆起来了。在一封从加辛顿寄给辛西娅夫人的信中——信上的日期只写了“星期四”，可能是 9 日——劳伦斯再一次提到了可能扭转局面的决定尚未作出。

在同一封信中，他对辛西娅对他签证一事的帮助表示了感谢，他现在已

收到了签证。他害怕带着“如此分崩折离，如此腐败堕落的英国的过去”离开它，但“我在这里的生活已经结束，我必须走，就像一粒种子撒入新的土地”。11日，他从伦敦回来后，写信告诉辛西娅夫人说，他和弗丽达计划在24月乘“白星”号蒸汽轮的两等舱从利物浦出发。他向辛西娅留下了几点建议，让她随后去美国，把她的孩子们从英国腐败的生活中解救出来，而她的丈夫早就应该离开英国了——不过她丈夫很可能已经麻木不仁了。“要记住，你应该始终将你自己和你孩子们，或许还有你丈夫的对生活的选择权攥在手中，决不要将它放弃”。

这可能算得上一封无意识的爱情信件，但其中并无对弗丽达的不忠之意。劳伦斯运用他丰富的想象力，将这时期的这些情况表现在他的短篇小说《顶针》(Thimble)之中。此故事部分取材于年轻的赫伯特·阿斯奎斯受轻伤后出外疗养的情况。几年后，在另一个短篇《瓢虫》中，这位对他妻子的底细一无所知的英国丈夫将他的妻子输给了一位劳伦斯式的、神秘的捷克绅士。

在一封写于196年2月19日的信中，劳伦斯告诉巴巴拉·罗尔说，辛西娅夫人使他“有些”心神不宁。但后来他的想法——或心境——有了改变，他在战争最黑暗的日子里给她写去了几封充满激情的信。辛西娅·阿斯奎斯的朋友们认为劳伦斯可能和她有过一段罗曼史。在她1916年2月18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她的一位朋友的话：“她告诉我她几乎想邀请凡尔拉·梅纳尔，但听说那位年轻人(D·H·劳伦斯)正热恋着我，她想还是作罢为好。”辛西娅夫人补充道：“人们真是太会轻易下结论了！”1917年12月19日，她记道：“我敢打赌，妈妈准以为我在两年以前就和劳伦斯相爱了。”

1915年11月11日，劳伦斯写信给辛西娅·阿斯奎斯说，他希望她能去和奥托琳娜·莫瑞尔一起住，这会给她带去些欢乐。奥托琳娜夫人“像一个具有魔法的老女皇，她知道她的一生是在与一个不值得消耗她生命的王国的冲突中度过的”，她的结局有些像伊利莎白女皇”。弗丽达没有陪伴劳伦斯去加辛顿作最后一次拜访，她在她不便这种新的友谊折磨自己时常常对自己说：“也许我该把劳伦斯交给她，他们为何不能在一起为英国尽力？我是个弱者，一个德国佬，一个无名之辈。”

一个过去除了每年例行的慈善餐会而在兰姆庄园不受欢迎的矿工儿子，现在成了一所远比兰姆庄园堂皇显贵的乡间别墅的常来常住的座上客。在那里，劳伦斯和那些知识界的头面人物和社会名流见面会晤。他在加辛顿的女主人即使在他的家乡地区也要比葛里斯雷的巴勃家族的人更有影响力。出生时，她就被称为奥托琳娜·凡尔列特·安娜·卡文迪什·本汀克，她是一位中将。波兰公爵和他第二个妻子波尔索伐男爵夫人的女儿，在劳伦斯有关中部地区的作品中，他时常提到波尔索伐这个词，因为波尔索伐靠近伊斯渥。这是卡文迪什·本汀克家族的旧地，矿区中一座废弃了的城堡。奥托琳娜夫人1873年就出生在附近的威尔贝克，即杜克里斯的中部。29岁时，她抛弃了养育她的传统环境，嫁给了一个平民，进入了剑桥——布鲁姆斯雷这个豪放不羁的文人圈子，但她没有完全放弃她的继承权。1938年弗吉尼亚·沃尔夫在她的日记中记录了奥托琳娜·莫瑞尔的葬礼，说参加此葬礼的不仅有她的文学伙伴，还有“黑压压一大批德高望重的南肯辛顿的老贵妇”。

对许多人来说，奥托琳娜夫人似乎是个怪物，她的知心朋友们则责备她偏执。她的朋友之一大卫·赛西尔勋爵在《全国传记词典》中把她描述成“一

个具有伊丽莎白式的狂放和魄力的人，有时神秘而充满占有欲，有时骚动而充满堂·吉珂德式的幻想”。奥斯伯特·西特威尔说她看上去像“一个超级的西班牙或奥地利公主”。1929年，当劳伦斯和奥托琳娜夫人在重修旧谊时他写信给她：“是的，我还记得你来苏塞克斯时的情景——你身穿紫色的丝绒衣裙，满身珠光宝气地走下四轮马车——穿过草坪，向格雷汉姆的其它别墅走去，很遗憾的是，有些事情（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对她有讽刺性的漫画！）从中作梗，使我们无法达到完美的和谐。”

乔治·山塔亚纳来到加辛顿时，发现他的女主人穿着黄色的长统袜，吊袜带像马尔伏丽奥一样交叉着。西格弗瑞德·萨松在1916年碰见奥托琳娜夫人时，看到她浓妆艳抹，染着红发，他感到奇怪，为什么她要把自打扮成一个“摩登荡妇”。在30年代，史蒂芬·斯彭德常见她手执一根牧羊女孩的弯柄杖走过布隆姆斯伯瑞的大街，杖上用丝带系着几条狮子狗，当行人用好奇的目光盯着她看时，她还感到不解。当她知道斯彭德是个社会学家时就对他说，她很同情工人，甚至愿意去爱他们，只要他们不“这么盯着她看。”

无论这些描写如何具有讥刺性，但它们都不如劳伦斯在《恋爱中的女人》中用赫米奥因·洛迪斯这个化名而对奥托琳娜·莫瑞尔刻划得那样尖刻。他在小说的开始部分中对她作了这样的描写：当她经过时，人们寂然无声，被她吸引，又感到惊异，想要笑，但由于某种原因，不敢出声。她那向上微抬的、颇有些罗塞蒂风度的苍白的长脸，像是作了麻醉，仿佛有一大堆奇怪的思想盘绕在里面的黑暗之中，而她却永远无法从中逃脱出来。”

而且，劳伦斯在书中对她行为的刻划丝毫不比任何对她的描写更为仁慈。这就是劳伦斯在1916年为兰纳尼姆选择的女皇，而这样的描写仅仅是在他作出选择的一年之后。但在1915年，他们之间还是友好的，奥托琳娜和她的丈夫给了劳伦斯夫妇30镑作为去美国的旅费，并说服了肖伯纳加了五镑（向爱德华·马什要了10镑，借了20镑，另外平克又给了一些）。劳伦斯11月11日离开加辛顿时，奥托琳娜夫人送给一双德国靴子；还有策略地送给弗丽达一大束鲜花，并答应送些绣品给他们作墙壁的装饰。

劳伦斯在对《虹》作出判决前两天到达了伦敦，但他是否出庭却没有记载，很可能他不在场。法庭要求发行人说明为什么他没有执行将劳伦斯的245本已装订的和760本未装订的小说销毁的决议。劳伦斯称此审判为“一次荒唐可笑的行径，是由‘国家净化协会’的赫顿博士和非国教组织挑起的”——显然他这里所指的是罗伯特·福曼·赫顿（1855—1934）这位引人注目的神学家，他不仅属于劳伦斯的家族所信奉的教会公理会，同时也属于劳伦斯当时生活的教区，汉普斯特德。

在鲍尔街，净化协会的那帮人借律师赫伯特·G·马斯克特之口发起攻击，马斯克斯是个资历不深的文学批评家，他以“警方专员”的身份出庭，他颇为自得地大声宣读了一些持异议的评论文摘，并陈述了他自己对《虹》的看法，声称“书中通篇充斥着淫秽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发行人申辩说，在他们的要求下，劳伦斯曾对手稿作过两次删节，但后来拒绝作进一步的合作，他们感到很遗憾，因为没有对原稿作更仔细的检查，同时还对这部小说的发行表示遗憾。检查官约翰·狄金森先生表示了同样的歉意，并补充说，当时在那些颇有名望的书检官和评论家表示异议时，就应该取消本书的出版计划。鲍尔街地方法院的登记簿上记录有约翰先生反对《虹》的裁决：“命令在7天限期内（在扣留期间）如果没有申诉，将此书予以销毁——并罚款十

畿尼（旧时英国金币，合 21 先令——译注）。

“劳伦斯和《虹》受到攻击的真正原因，理查德·阿丁顿在 1931 年写道，“是因为他反对战争……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淫秽’大放厥词。”他在 1941 年的自传中重申了这一点。同时他在 1952 年的一封信中进一步说明：“是劳伦斯本人陈述了这样的观点，我在 1952 年听到如梅·辛克莱这样的同情者中在议论，认为这‘是一个事实’”。吉尔伯特·加农 1915 年在一篇发表在纽约《先驱》上的文章中谴责了由于“思想混乱，和可能因战争状态而加剧的歇斯底里”面对《虹》所进行的查禁。

1915 年秋天，不仅大型齐伯林飞机进行了首次空袭，英国在加利波利也遭到了军事上的失败。当时的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企图在东部第二战场，但没有成功。丘吉尔从阿斯奎斯内阁辞职的那天正好是《虹》开庭受审的日子。同一天，一个文坛名家奥古斯汀·比勒尔，当时的爱尔兰大臣，在布里斯托尔的一次演讲中说：“他是一个在战争期间应该禁止创作的人。”

当日“征兵困难”的消息引出了另一个不祥的消息：因为没有足够的未婚男子自愿应征，德比爵士扬言说要进行强迫征兵。就在这个时候，广告专家赫德利·列巴斯利用当时十分敏感的负疚心理进行征兵鼓动，广告牌咄咄逼人地向妇女们喊道：“你‘最好的孩子’穿上了卡其制服了吗？……如果你的年轻人放弃了他对国皇和国家的责任，那么有一天他也会将你抛弃！”有关此战争的《官方历史》一书指出，那年秋天，乔弗雷和黑格在反攻中同样遭到失败，这次反攻“丝毫未使总局势有任何改观，除了毫无意义地损失了大量的陆军之外——一无所获”。而像《虹》这样一部小说在这种时候发表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小说中那位充满热情的厄索拉·布兰格温对她那个“最好的孩子”对战争的认真态度进行了嘲笑，“我最讨厌那些当兵的，他们全是些榆木脑袋”。

在谈到销毁所有《虹》的存书时，新伦敦警察局的警方专员声称“1915 年进行的审判完全是针对小说的淫秽内容，”但是，他并未提供对此案审判的全部记录，尽管这些记录不会清楚地反映审判是怎样悄悄地针对《虹》危害征兵的罪名而进行的。

当时的一些记者也提出相似的疑问。11 月 20 日的《新政治家》上登载了化名索罗门·伊格尔 J·C·斯夸尔的文章，他怀疑劳伦斯是否“被德国的精神分析学家迷住了”。同一天，在《雅典娜神庙》上，科普体裁作家乔治·威廉·德·顿兹尔曼指出，《虹》反映了德国“唯物主义伪哲学”。正是因为受到这种伪哲学的影响，“使我们在对德国采取行动时缩手缩脚”。这位“德”·顿兹尔曼在他的指责中始终将《虹》和对条顿民族的唯物主义的吸收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也许与他自己的日耳曼背景相违背的：他的真名叫乔格·威勒姆·冯·顿兹尔曼。不管他的信论是否有助于英国的军政，但它确实对劳伦斯的抵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劳伦斯因病重而无法就业，而现在他连以笔耕糊口的机会都几乎没有了。因为由于他身上的双重污点，即书中的“淫秽”内容和他的亲德倾向（后者因他的德国妻子而加重），他成了一个大多数编辑和出版商都不敢问津的人物。

劳伦斯的一些朋友，甚至是一些陌生人，试图为他进行辩护。凯瑟琳·卡斯威尔在《格拉斯先驱报》上对《虹》大加推崇，他因此而丢失了向这份杂志的投稿权达 10 年之久。约翰·德林克沃特，从拜伦维拉斯打来私人电话，奥立弗·路奇写来了信，他们均表示了同情，但都是在私下表示的，劳伦斯

后来说阿诺德·班内特和梅·辛克莱曾发起过“温和的抗议”。路帕特·哈特·戴维斯在他有关休·沃尔普的一本书中说沃尔普“在一封抗议查禁的信上签了名”。甚至本来不太赏识劳伦斯的布隆姆斯伯瑞圈子里的人现在也都支持他，作家协会也答应给予帮助，尽管最终无所作为。

唯一的实际行动来自菲利浦·莫瑞尔，他的妻子奥托琳娜当时还未被劳伦斯在《恋爱中的妇女》中作为辛辣讽刺的对象，11月8日和12月1日，莫瑞尔在国会提出责问，但每次他得到的只是内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含糊其辞的回答，约翰·西蒙其时正在蕴酿对付侵略者的绥靖政策，此政策后来在30年代得到了实行。他说，警方的行动是倒行公事，而作为被收缴了小说的发行人也赞同对小说一案的裁决。约翰爵士在结束11月18日的审理工作时就一位爱尔兰议员提出的有关是否存在一个官方对书刊检查程序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并说：“我希望在文学事务方面永远不存在什么官方禁令”。当然，那些让他们感到不自在的书刊可以如此轻易地被除掉时，确实毋须什么官方的禁令”。

莫瑞尔12月1日提出的问题涉及到了查禁的合法性，但约翰·西蒙爵士却说，他认为劳伦斯并没有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解释：“法律的条款得到了严格的遵守。”但是他建议劳伦斯可以再准备一本小说被收缴，这样便可以保护这本书了。”在自由派和爱尔兰议员进一步暗示在审判过程中除了道德上的查禁之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时，辩论却草草收场了。约翰·西蒙解释说，对小说采取的行动是依照坎贝尔大臣的有关淫秽出版物的法案进行的，这一法案可追溯到1857年。

艾弥尔·德拉芬尼的研究为我们了解有关《虹》的纠纷的法律背景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资料。他指出，官方没有将全部事实公布于众，“这与一般的警事法庭惯例绝然不同。”实际上，“现在有足够的可证明这完全不是一般的警事法庭淫秽案件，而是启案人企图通过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使之吸引公众的注意。”11月15日，出版商告诉作家协会主席说“考虑到我们公司的声誉，律师善意地建议我们上缴这些书，以免真的被收缴。”德拉芬尼教授相信，信中提到的律师并非是出版社方面的，而是警方的，即旺特纳先生文父子律师事务所，此事务所的主要合作者就是上文提到过的赫伯特·G·马斯克特。

另一封麦休恩写给作家协会的信件说，出版商将手头所有的《虹》的册子交给了检查官德雷珀。德雷珀告诉他们说案件将不进行公开审理，所以出版商们没有安排在法庭辩护。当审判程序公开进行时，他们感到十分惊讶。对《虹》的起诉使麦休恩的公司十分难堪，他希望劳伦斯和他的代理人平克没有向地方行政官提出裁决的请求。出版商们还劝阻克莱夫·贝尔——如前文已提到，在《虹》事件上，布隆姆斯伯瑞大部分人是站在劳伦斯一边的——让他不要撰文为劳伦斯辩护。

亚历山大·麦休恩后来在1916年成了一位男爵。劳伦斯在1925年E·D·麦克唐纳为他编撰的第一版劳伦斯著作目录的前言中谈到了麦休恩：“麦休恩出版了此书，而在法官面前他为自己出版了这样一本不洁的文学作品差一点要痛哭流涕。他说他不知道他手里是这样的一本肮脏之作，是他的读者给他出了馊主意——这位现在已被封为爵士的绅士泣求道：“知罪，知罪！”劳伦斯又说：“雨没有什么比这个秋天的早晨更不洁和不舒服的时候了。”

至少有一位劳伦斯的政界朋友（菲利浦·莫瑞尔）曾试图帮助他，除了

克莱夫·贝尔徒劳的辩护之外，文学界相当沉默。或许，文坛的态度在约翰·高斯华斯给平克的信中得到了最好的解释。高斯华斯当时在英国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被认为是一个思想开放的人。他的信首先发表在基思·萨加的《D·H·劳伦斯的艺术》一书上，这封信对《虹》的评价比他写给平克的另一封信（发表在H·V·马洛特所著的高斯华斯传记上）中对《儿子和情人》一书的批评还要严厉。高斯华斯在1915年可能意识到他是心怀恐惧的在远处俯视着劳伦斯。两年后，他见到了劳伦斯之后，他在他的日记中用恩赐的口吻称劳伦斯是个“乡村的天才，很有意思，但并非属于可以与我相处的那种类型的人”。高斯华斯的议论起码在一方面具有独到之处：他发现劳伦斯那双在其他人看来是充满了活力的眼睛，“没有活力”。劳伦斯在1925年回忆，高斯华斯“用非常平静和充满权威性的口吻”告诉他，《虹》作为艺术作品是一部失败之作。“劳伦斯注意到，年长作家的信口之言对他们自己的损害往往比他们的接受者更多”。

劳伦斯和高斯华斯的对立有些类似高斯华斯的剧本《骗局》中的主要情节。剧中一位出身豪门的绅士和一位出身下层的暴发户之间的冲突从道德上毁灭了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家庭。暴发户的举止粗俗。但剧本认为，如果这位绅士懂得如何忍让和友善的话，一切可能都会平安无事。高斯华斯写给平克的这封蛮横而愚蠢的信是极其卑劣的。劳伦斯在他1928年论高斯华斯的文章为他作了盖棺定论，这当然是后话了。

继《虹》的风波之后，文学界仍有一些人对劳伦斯抱有盲目的希望，这导致了他取消了美国之行的计划。出发前一星期，11月17日，劳伦斯告诉拉塞尔说，尽管他希望离开，但还是决定留下来，因为作家协会告诉他，他们要为《虹》进行斗争，而劳伦斯还未得到为此书申辩的机会。但此事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劳伦斯于是重新决定去美国，他请求唐纳德·卡斯威尔帮助他在货轮上找个位子。11月29日上午，劳伦斯在去加辛顿的途中（这次是和弗丽达同行）到了卡斯威尔家，但未能碰上，他就留下了一张条子——我登门造访，想知道你是否有了轮船的消息，如有请马上告诉我，行吗？他又从加辛顿打听消息。在那里，他和其他客人身穿新衣，与孩子们一起嬉戏，“像一个东方的集市”——劳伦斯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对这一幕布里特林式的场景进行了改编，即书中的布莱德比（加辛顿）一幕。

劳伦斯夫妇去访问加辛顿时，拉塞尔正巧在那里。来访的客人还包括一位名叫苏拉瓦迪的伊斯兰教徒，不一会他就许诺给下一届拉纳尼姆留下一把东方火炬；还有“一位青年音乐家”，很可能是菲利浦·黑索尔泰，他在两星期前曾遇见过劳伦斯。黑索尔泰后来用彼得·沃洛克的名字创作音乐作品。他写信给他的辅导教师弗里德雷克·德利士说劳伦斯（“也许是他这一代中的一位伟大的文学天才”）正在病中，他打算去美国。他在信中询问德利士是否可以让劳伦斯和弗丽达在他佛罗里达的杰克逊凡尔附近的柑橘园住上一段时间。

德利士从美洲大陆回信，以一个北方式的含糊回绝了，给这个海斯帕拉兹（看守金苹果园的仙女，这里指关心劳伦斯的菲利浦·黑索尔泰）的美梦迎头一盆冷水。他欣赏劳伦斯的作品，但觉得住到加利福尼亚对劳伦斯的身体健康更好些，而开销也更便宜些，佛罗里达对劳伦斯的健康可能是极为不利的。而实际上，没有什么比劳伦斯在此以后在康沃尔度过的二十多个月的时间更为不利的了，这期间的一切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也许德利士不希望这

位爱的信徒去接管这个丛林中的庄园，住在七零八落的百叶窗和快要倒塌的屋顶之下。这庄园象征着爱情破碎，岁月已逝的青春年华——对于德利斯来说，这就是那个混血姑娘柯萝伊，为了寻找她，他后来又一次来到这里，走遍了整个佛罗里达沼泽地。

就这样，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英国作曲家没有帮助这位最著名的英国作家。同作为黑索尔泰的朋友，他们本可能相互认识的。这两个同样以“难弄”而闻名的人，也许会发生争执，不过德利斯还是能够和像奥古斯特·斯特林伯格和保尔·高格因这样棘手的艺术家相处的。但是劳伦斯终究还是没能真正结识德利斯或斯特林伯格或高格因这些“难弄的”天才。直到20年代，他才有幸结识了在当时文坛占据高位的阿尔多斯·赫克斯利，这是位性格温和的年轻人，劳伦斯是1915年在伦敦第一次见到他的。

赫克斯利后来这样描写自己，21岁时，他是个“理智，谨慎的年轻人，绝不热情所左右。”他从没有遇见过，即使在自己著名的文学家族中，像劳伦斯这样的人。劳伦斯用他毫不掩饰的真诚使他感到“震惊和窘迫”。赫克斯利答应陪伴劳伦斯夫妇去佛罗里达的拉纳尼姆，但是后来他庆幸这一计划没有付诸实现，因为，“上帝之城总在崩溃”。

赫克斯利1915年写信给他的弟弟朱里安说，他觉得劳伦斯是个“好人”，甚至是个“伟人”，他想在佛罗里达建立一个由“一位叫阿美尼亚的，一个德国妻子，可能还有一位叫多萝西·沃伦的青年妇人”组成的乌托邦领地。（多萝西·沃伦是沃特琳娜·莫瑞尔的侄女，也是亨利·詹姆斯的教女，数年后，她在她的梅费尔展览馆举办了劳伦斯的画展）。阿尔多斯·赫克斯利对去佛罗里达感兴趣，但他只想作一次访问，去看看人们怎样期待着“一种对新生活的圣灵降临节般的欢欣鼓舞。”但到了1920年，阿尔多斯·赫克斯利写信给他的父亲，告诉他劳伦斯的近况，说他“是位精神有些错乱的小说家。”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发现，缠绕在他心中的“黑暗和丛生的”情结不仅带走了“他轻度的性狂热，甚至他全部的创作才华。”（信中涉及到的这类精神分析是十分荒诞的，但劳伦斯可能也知道这种谣言在四处流传，所以他在1921年出版的小说《阿伦的杆杖》中，为其中自传性人物劳顿，戏谑地安排了相似的经历。）赫克斯利通过一本名《风度翩翩》的小说中的人物金汉姆对劳伦斯进行嘲笑。但在20年代末期再次和劳伦斯相遇时，他又一次对劳伦斯表示了喜欢和赞慕，在文章中对他也是友好的。

在1915年给他的弟弟朱里安的信中，阿尔多斯·赫克斯利提到了一位美国人，他是劳伦斯的拉纳尼姆的骨干成员迪克朗·库由姆迪安。他以米歇尔·阿伦的笔名轻松地创作了1924年的畅销书《绿帽子》。这段时期，劳伦斯的更持久的崇拜者是被劳伦斯的随从人员称为布雷特的多萝西·布雷特阁下，她是厄什子爵的女儿，兰妮·萨拉瓦克的妹妹。多萝西·布雷特和她的朋友奥托琳娜·莫瑞尔一样都是贵族的叛逆者，就是在像伦敦波希米亚人（这里指生活放荡不羁的人——译注）的圈子中，她也是走在时尚前面的。布雷特留着短短的卷发，常穿着破旧的长裤。

作为一个耳聋而又羞涩的画家，布雷特害怕去见劳伦斯，第一次访问拜伦凡尔时，她请马克·戈特勒为伴。”当我们进去的时候”，她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妇人——弗丽达——和一个小个子男人莫里匆匆走了出来”。留着红胡子的劳伦斯“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恶作剧地扯着嗓子对她的助听器叫喊，与她的朋友奥托琳娜夫人开着玩笑。当得知劳伦斯夫妇准备离开英

国，布雷特在几天后在她位于厄尔斯考特街的工作室为她们举行了告别宴会。不料二十多个自带酒瓶的客人不邀而至，整个宴会成了乱哄哄的闹剧。

布雷特记得，一些陌生的女客人喝醉了，被拖过打蜡地板。凯瑟琳·曼斯费尔德坐在沙发上，“被一个男人拥在怀里”，戈特勒和他的女友多萝西（多拉）·卡林顿（她喜欢大家就称她为卡林顿，她曾和布雷特一起在斯雷德学艺）争吵了起来；劳伦斯用意大利语和凡尔拉·特利交谈着，而布雷特则拼命地弹着自动钢琴；那个“和蔼可亲，喝得烂醉的莫里不得不靠墙站立，——确实，这一切就好像是在战争前夕。两天以后，布雷特又举行了一次晚会，邀请了参加上次晚会的客人，而对其他人则保守秘密。在每次必不可缺的游戏中，劳伦斯总要装作像骑在自行车上一样在屋里乱转，碰到挡道的人嘴里就“叮叮”地学着铃响。

告别宴会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劳伦斯夫妇并没有离开英国，尽管他们在一段时期内对佛罗里达发生过兴趣。11月28日，劳伦斯告诉辛西娅·阿斯奎斯说，他现在决定去一个远离德利斯产业所在地的半岛对岸的一个地方：迈尔斯堡，在海湾附近，“一个有5000居民的小镇，其中一半是黑人——离大海九英里，在一条一英里半宽的大河边上——背靠着橘园和松林”。这都是一位美国朋友的产业。

唐纳德·卡斯威尔在一艘12月20日离开格拉斯哥去西印度群岛的不定期货轮上安排了位子。此货轮的船名肯定是劳伦斯所喜欢的，它叫“狮之冠”——在他的散文《王冠》中，他以那只狮子为之奋斗的王冠作为一种复合象征——但他和弗丽达再次推迟了行期。劳伦斯在“狮之冠”启程几天后告诉拉塞尔说，他们没有走是因为金钱和战争使一些迈尔斯堡拉纳尼姆的年轻成员无法成行。这里他又一次谈到了“新精神下的生活”，这次他邀请拉塞尔“来作我们的主席”。

莫里不愿卷入佛罗里达计划，12月19日他找J·D·贝利斯福德，跟这位小说家商量将他在康沃尔的房子借给劳伦斯夫妇住几个月。其时，莫里和凯瑟琳·曼斯费尔德在法国南部已住了几个月了，然而，从西部前线传来的凯瑟琳兄弟莱斯利的死讯使她十分悲痛。莫里无法将她从对死者的怀念中解脱出来，便先回到了伦敦。就在莫里见到贝利斯福德的当天，凯瑟琳在班都尔的维拉保林住了下来，不久来信，将莫里也拖去了。

劳伦斯发现，他无法再作出任何离开英国的打算，除非他得到免除从军证明。于是，在12月11日，他到巴特区市政厅报到并作体格检查，排队等了两小时后，他来到登记桌边，这时，他突然感到他来到这里“纯粹是一种滑稽的行为”。他决然转过身去，“走过大厅、离开了这个屈服于鬼怪的阴间”，一会儿，又看到了河对岸西敏寺教堂闪烁的塔顶上落日的余晖。这是他能如此轻易地离开征兵行列的最后一次。

12月16日，劳伦斯写信给平克，说他躺在床上，发着高烧，他感到奇怪，“一个人为什么每天要醒来，起床来到这污秽的世界上。战争的气息越来越浓”，他“急于想到”B·W·胡伯奇在美国出版的《虹》：“如果他们把它删改得支离破碎，我会气愤的。”平克一定是立刻就给他寄去了一本，因为劳伦斯写了一封署期为“星期六”的复信，这时应该是12月18日，是他在拜伦维拉斯度过的最后一个星期六：

美国版的《虹》删节之处并不多，下面是麦休恩版·220页：20——24行（3行）

（她希望他是只猫……她的肉体）

300 页：18 行（让我来——让我来）

318 页：7——10 行（4 行）

（厄索拉静静地躺着……关于她的女佣）

425 页：4——26 行（24 行）

（但空气很冷……总是笑）

446 页：10——40 行（30 行）

（她让他抱着她……她又意识到了屋子）

删节不是很多，但它们使我沮丧和愤怒。如果我们从美国散页在这里装订，我们就应该加印上这些话，把它们附在书后：只需注明：“以上所列是依麦休恩版，是现版本的漏印之处。”

我们还可书末加上本书出版过程中的那次查禁的报道。

第 300 页上的删节指劳伦斯信中引述的话，是在斯克莱宾斯塞因摩擦而性欲亢奋、“他的灵魂呻吟不已”之后被省略。318 页删去了三个小段落，其中一段，威尼弗雷德·英格说，“我抱你到水里去”。另一段的开头是这样的，“一会儿，雨水滴落在他们滚烫的躯体上，使人兴奋，充满趣味。”在麦休恩版本中，下面这段内容给小说带来的麻烦比其它任何地方都要多。

厄索拉静静地躺在女管家怀里，前额靠着那可爱的、引人发狂的乳房：

“我抱你进来”，威尼弗雷德说，

而厄索拉的身体紧紧缠住了她的女管家。

其它删去的是厄索拉和斯克莱宾斯塞之间的作爱场面，最起码“在动情的愤怒中，她斥责了他，因为，作为一个无法满足一个女人的男人，他还四处猎艳”。此句后删去的一段描写对理解故事是至关重要的：

“难道我没让你满足？”他问她，脸又白到了脖根。

“没有”她说，“自从到伦敦的第一个星期之后，你从没有使我满足过”，“你现在根本就无法满足我，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你在占有我——”。

劳伦斯带着苦涩，在冬至时离开了拜伦维拉斯，他和朋友在南郊等地呆了几天，然后和弗丽达去了埃达在里普利的家，并在那里度过了圣诞节。他在几周前记道，弗丽达“去看望过她的孩子们一两回，而且，她已经不再担忧了”。但对于他，在伦敦度过的几个月是灾难性的，《虹》被查禁，与几个朋友之间的友谊也中断了，至少是淡薄了，贫苦仍可能继续下去，战争仍在继续。在他这一时期的通信中，他常把伦敦比喻成地狱，在中西部度过的 1915 年的圣诞节谈不上有什么令人舒畅之处：劳伦斯的大姐艾米丽也在那里，但是她的丈夫和埃达都参战去了。乔治·劳伦斯当时在诺丁汉当工程师，他也来了，和他弟弟辩论着政治问题（他自称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和宗教问题（他被他弟弟称为“激进的新教徒”）。D·H·劳伦斯此时只能看到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个使人抑郁的前程，此前程对他来说就是将一切都降到了最低标准，他盼望去康沃尔和佛罗里达，指望在那里可以向着最高的目标去生活。

（四）“一片空寂、被遗忘的土地”

起初，劳伦斯对住在康沃尔是喜欢的，他仅把它看作是去佛罗里达旅途中的中转站。住在宽敞的农庄旧屋里，“就像站在窗口从英国看外界”——这是“第一次外迁，走向新的生活”。但不久，他最初感到的那些和蔼可亲的科尼什人开始使他失望了，尤其是当地一个叫霍肯的地主，他总是向人吹嘘他是怎样将一个老妇人从他的屋子里赶出去的。霍肯“自私、卑鄙、愚蠢而又狡诈”，这很可能触发着他在6年后在《袋鼠》中塑造了杰兹·特里威拉这么一个狡诈矮小的科尼什人。

萧瑟的康沃尔海岸离浪漫的廷塔吉尔不远。在那里，劳伦斯为自己能“摆脱”争端、辩论和与世无争而高兴。世界远去了，消失了，就像皇家咖啡馆的昨夜灯火——已是，劳伦斯还是带去了皇家咖啡馆的一些灯火，那个胆怯的黑索尔坦因和“吵吵嚷嚷的”柯由姆迪安——阿伦。在柯桑港的第三个周末，劳伦斯给戈特勒去信说，“我又躺倒在床上，发着讨厌的高烧，现在我只是一块破布，等待着我的末日”。接着他又继续说道：

在这里即使躺在床上也比在伦敦好，在这里，我躺在床上就能望见大海的波涛涌向乌黑的礁石和峭壁上飞溅的浪花，这实在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我喜欢康沃尔：这是一片空寂、被遗忘的土地，它不属于凯尔特人的基督前的英格兰。这里有狂风和精美的黑礁石和洁白晶莹的浪花及咆哮着的大海。这里的屋子宽敞寂静，与世隔绝。

柯由姆迪安也在这里，对此我并不在乎。他不几日就会离开的。和黑索尔坦因在一起倒是很愉快，我喜欢他，晚上我们写了一个挺有趣的剧本。

他不清楚他和弗丽达要在康沃尔住多久，他希望下一步能“走出英格兰”。莫里有消息说，他在班都尔“愉快极了”：“我们终于找到了自我和彼此，及赐福的太阳。我非常快乐。”

他期望这个春天为戈特勒和多萝西·卡林顿而鲜花盛开。劳伦斯喜欢他们“出现在聚会上。只要你放弃爱情的念头，她会更加幸福”，你总想主宰她，这并没有好处。一个人应该学会开放自己，不要庸人自扰。你把自己束缚得太紧，使她无法自由地去爱你。”这些话与《恋爱中的女人》中伯金在自我斗争时的想法如出一辙。

在休养期间，劳伦斯修改了他的游记《意大利的晨曦》的校样，此书及《意大利随想》由达克沃尔斯出版社安排在当年出版。梅特兰·莱德福德医生（他是极端费边主义者，欧内斯特和杜丽·莱德福德的儿子）从伦敦来为劳伦斯检查身体：他告诉病人注意保暖，保持安静平和。劳伦斯感到左半身麻木，左手逐渐变得不听使唤了。“神经上的压力逐渐在体内引起炎症”，劳伦斯在2月7日写信给辛西娅·阿斯奎斯说，但“所有热度、炎症，以及内热差不多都消失了，又能去海边散步了”。

弗丽达对劳伦斯的病情十分担心（劳伦斯将此归咎于“伦敦和那一系列事情引起的心灵上的伤害”），她写信邀请拉塞尔去作客：“这将给予我莫大的帮助——我感到责任如此重大——我实在难以承受——他会死的，因为这一切对他来说都过于沉重了——但他实在不该这样死去——这事（划去了“他”）不仅关系到我一个人。她认为，去佛罗里达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她还怨恨加在“所有生活”之上的重压。劳伦斯充满了各种想法，希望进行创作，但疾病使他无法做到这一点。

实际上，他正在收集他的早期的一些诗作，集入《阿莫尔斯》，此诗集后来由达克沃尔斯出版社出版。2月11日，他写信给凯瑟琳·卡斯威尔，谈及新的出版计划。他本以为他快要死了，但现在“开始觉得重新健壮起来，生命力从不可知的渠道注入进来”。他和黑索尔坦因都希望“发表所写成的任何真正的东西，为了真理的缘故，因为一部真正的书是一种神圣的东西”。

他们将以预订的方式首先出版《虹》的廉价版：“此事将是一次十字军东征……我亲爱的凯瑟琳，让我们将它进行到底”。卡斯威尔夫人能够让艾维·罗提供帮助。艾维·罗现在嫁给了威廉斯和诺盖特出版公司的一名职员，名叫麦克西姆·哈里森，这是他的化名，他的真名叫麦克西姆·列特维诺夫，是个地下布尔什维克。

劳伦斯新的合伙人黑索尔坦因当时还没有变成那个留胡须的、充满激情的彼得·沃洛克，他是伊登——剑桥的唯美主义者，胸怀宏愿，意志坚强，情感丰富，争胜好强，——《恋爱中的女人》中的那哈利迪。他在康沃尔住了两个月，无拘无束地和劳伦斯在一起。劳伦斯给戈特勒的信中提到的剧本，是一出象征性喜剧，“有关黑索尔坦因和他的美洲豹”——指的是一位索赫的艺人模特儿，劳伦斯将她用作为哈利迪的情妇，那位名叫普萨姆的（在《恋爱中的女人》的早期版本中；在以后的英国版本中，她的名字改成了米内特）。

莫里最初给劳伦斯提出过一个出版计划，现在黑索尔坦因在这方面的活动激怒了莫里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劳伦斯告诉他们说：“你们俩不要庸人自扰了，他和黑索尔坦因的友谊——他现在伦敦张罗出版事宜——不会影响劳伦斯和莫里夫妇的友情，他请求他们对他宽容些，因为他又快要垮了，他们必须重新生活在一起，“相互信赖”。

莫里在收到劳伦斯的信前，刚写成了他的一部书，是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劳伦斯重读了这位俄罗斯小说家的作品，反应强烈，认为他代表反常的精神意志。他告诉奥托琳娜夫人，他推崇“率直和光明正大的”彼特罗涅斯——他最起码并不为粗鄙地“混淆上帝和虐待狂”而内疚。劳伦斯寄来的批评没有使莫里对著作进行修改。他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正在共度他们最幸福的时光，两人相对而坐，各自写作。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及时完成了《序曲》的第一稿。虽然他们处在凡尔登战役激战正酣的国度里，他们却显然生活在与世隔绝之中。但不久，劳伦斯开始扰乱了他们幸福的孤独，他催促他们来康沃尔，与他和弗丽达住在一起。

劳伦斯夫妇住在贝利克福德的租期是到2月底为止。找了几个地方后，他们决定在曾诺住下来。2月25日，劳伦斯写信给凯瑟琳·卡斯威尔，又一次向她声称这个世界是“罪恶”的。他说，“唯一可做的是将自己从中解救出来，并在自己的灵魂中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我几乎觉得，当我们去曾诺时，一个新的天堂和新的地球就会出现。但是，承受旧世界的破碎是可怕的”。劳伦斯在新的环境中通常是乐观的，——在开始几天里，在这封给卡斯威尔太太的信中，拉纳尼姆又出现了：“我相信，我如果不能发现人间的阿美利加，总有一个心灵上的新国家能让我驻足，一片处女地……我想莫里夫妇以后会来和我们一起住在曾诺的，我始终认为，几个人在一起可以造就一个新的地球和新的天堂”。3月4日，他从曾诺的丁纳斯阿姆斯给戈特勒去信说：“为了摆脱卑鄙的人，我们几乎被赶到了地的尽头，再迈一步就该掉进大海了：要不，我们必须像鸟一样肋生双翼”。弗丽达随信给戈特勒附言，表示她将他视为知心朋友。莫里因为黑索尔坦因的出版计划而忿忿不平，指责劳

伦斯背信弃义，这使弗丽达“很愤慨，因为他们对《虹》怀有敌意，从来都不忠实”。

至于柯特连斯基，戈特勒必须告诉他，“他是个老骗子，他总是将自己装成一个谦卑的人，但在内心他都把自己看得非常伟大”。在这里，第一次真正出现了劳伦斯与他的一位老朋友之间发生矛盾的迹象：弗丽达提到她和“老奥特琳娜正在发生争吵，她会说一些有关我的坏话，——我想，一定是一些蔑视我的话，因为她富有，而我贫穷，人们常常会卑鄙地利用他人的贫困”。但这种情况丝毫没有使弗丽达担忧，其时，他和劳伦斯是真正幸福的，“生活中充满了希望和有趣的事，假如我们能过上好日子，我们是不会放弃的”。3月8号，劳伦斯告诉戈特勒，“我们在这里租了一套小房子，有两大间，年租金五镑，它依山傍海，景色优美，我们准备将它装修一下，在那里节俭地生活。我们的房子旁边有一幢大一些的房子，它们一共有七间，实际上它是由三套小房子连在一起组成的，我希望黑索尔坦因或莫里夫妇能将它们租下来（年租金16镑）。试想，这是一个多么完美的小住宅区，与世隔绝，就在特雷吉尔森高地上，即普诺的圣·伊夫斯边上。

劳伦斯对黑索尔坦因的期望是盲目的。在同一天——当劳伦斯写信给莫里，称黑索尔坦因“是唯一能成为我们的朋友的人”——黑索尔坦因从伦敦给诗人罗伯特·尼考尔斯去信，表示他不准备再回到康沃尔去见劳伦斯，他说劳伦斯“没有真正的同情心”，只希望人们信服“他自己的叛逆信念”；劳伦斯虽然是个“完美的艺术家和杰出的思想家”，但是，很难和他建立私人关系。黑索尔坦因后来又告诉德刘斯，“关于他的情况，我发现得太多了，无法在此细谈”。黑索尔坦因的传记作家赛西尔·克雷在黑索尔坦因自杀以后（1930年），在写作中表示，他不知道1916年的那“情况”指的是什么，但他猜测，此事大约和劳伦斯的爱管闲事有关。

罗伯特·尼考尔斯回忆说，当劳伦斯夫妇1916年住在汉普斯特德时，他们曾在不同场合劝他和黑索尔坦因各娶一个他们认识的姑娘，这使两个年轻人和姑娘都感到有趣。但黑索尔坦因与劳伦斯之间的矛盾可能是由奥特琳娜·莫瑞尔给黑索尔坦因看了劳伦斯的一封信引起的。劳伦斯在这封信中和莫瑞尔谈到了黑索尔坦因的女友。

不管事情如何，黑索尔坦因还是写信给劳伦斯，指责了他的背叛。而劳伦斯复信说：“我请你不要在伦敦谈论我。”于是，黑索尔坦因给劳伦斯寄来了由他凭空捏造的、对劳伦斯进行恶毒诽谤的书评摘录。黑索尔坦因兴奋地告诉德刘斯，此事使劳伦斯“非常滑稽地感到不安”。劳伦斯是可能这样的：他是个严肃的艺术家，但已受到了全国新闻界的严重伤害，而这些“评论”预示着更多的这类评论将接踵而至。但所有这一切对于黑索尔坦因是滑稽可笑的，他是个乳臭未干、内心矛盾和忧郁不幸的人，他的内心却长着残忍的倒刺。但是，他对劳伦斯还勉强保持着尊敬，并在年内又回到了他的营垒中。

劳伦斯和另一个人的友谊在1916年春天也接近尾声，而且从此再也没有恢复——和拉塞尔。劳伦斯2月11日写信给他，询问他的讲座是否“真的取得了成功，真的那么重要”？拉塞尔4天后怀着悲伤心情回信：他又一次想自杀，他告诉劳伦斯，只是由于自尊心和固执才使他没有走上此路。他自以为讲座是成功的，但它并没有产生重大的影响；他被埋在琐事之中。

劳伦斯于4天后写信责问他：“不管怎样，像你那样做，生活的意义何

在？”他希望拉塞尔“长命百岁”，但如果他要立遗嘱的话，能否让劳伦斯成为他“某个方面”的继承人，使他“有足够的钱来维持生计”。

时过月余，3月19日，劳伦斯又给拉塞尔去信，希望拉塞尔不再“因为他的说教和对人权的不够尊重而生气”，并要拉塞尔到他们的新居来看看：或许，一个“新的世界已经诞生”。他希望不久能“在春日里欢歌起舞”。他向拉塞尔保证，“没有什么事情是想好后再做的”。而将此想法告诉拉塞尔是完全错误的。

劳伦斯在晚春时节又给他去过信，但这封信显然没有被保存下来。拉塞尔根本不屑回信，只在此信后面附了言，并将其转给了莫里。莫里在9月3日写了回信（此信现在在英国博物馆）。莫里认为，弗丽达现在已完全成功了，尽管还不怎么稳定。莫里希望劳伦斯不要把矛头再对准他，与他决裂，他为拉塞尔和劳伦斯的分手感到遗憾，他认为拉塞尔是那种能够给予劳伦斯理解和宽容的人——一个有趣的错觉。

很久以后，拉塞尔写道，劳伦斯在他们相处的时候“没有真诚的爱国之心，因为他的妻子是个德国人”。认为劳伦斯如果没有一个德国妻子，就会“真诚地爱国”。这种观点几乎到了荒谬的境地。拉塞尔还说：“尽管大多数人不甚了解劳伦斯是他妻子的传声筒，‘他有文才，而她有思想’。这个观点表明，著名的逻辑学家拉塞尔也会沉陷于荒谬的误解之中。”

肯尼斯论拉塞尔的局限性的观点已被引用，而麦克伊旺·劳森在1952年的一篇文章中应证了这一点，他问：“像其他伟人一样，拉塞尔是否过久地生活在一个洞穴之中，使他一视独听，常常忽略了那些现实的领域。而这种现实构成了人类灵魂所需求的环境，使这个世界变化、发展，成为应有的样子”。乔治·桑塔亚纳逝世后，出版的自传第三卷（1952年）也作了相似的评论：“拉塞尔的资料尽管准确、丰富，但难免不完全，并以片面论点出现，他不了解也拒绝去考虑所有的东西。因此，他的判断通常以不完全的资料为基础，实际是感情偏见的产物，常常不够公正，有时甚至是愚蠢的”。

桑塔亚纳感到，拉塞尔尽管具有多面性，他也是一个“多方面的狂热分子”，桑塔亚纳未能触及他的本质，他最后断言“伯迪消失了”。但他已经存在得够久了——从不抵抗主义转变到支持战争，从相信原子弹的功效到怀疑原子弹——到侧面地攻击劳伦斯。劳伦斯在很久以前就“抓住了”拉塞尔，并借《恋爱中的女人》中的一个小人物的漫画像喻之。乔什瓦爵士（在改写过的版本中叫作马瑟森）是个“博学的、五十多岁的、干瘦的准男爵。他总是妙语连珠，并用沙哑的嗓子发出由衷的大笑”。他的“大脑神经纤维是如此的坚硬，以至于毫无感情”。

劳伦斯——莫里之间的友谊似乎是命里注定的。劳伦斯说服了莫里夫妇放弃了在班都灿烂阳光下的幸福生活，在满是石头的、阴郁的康沃尔住下来，这件事一度使他们的友谊趋于紧张状态。劳伦斯对那套与他相连的房子大加吹捧，并称之为“凯瑟琳之塔”。莫里夫妇必须来往，不要再提什么背信弃义，他们必须学会相互信任，“不要再闹什么纠纷和龃龉，让它变成为永远的默契，我们是Blwbrouder（亲兄弟），我们之间是兄弟关系，告诉凯别再那么挑剔”。但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曾在康沃尔住过，在那里，她曾见过一个妇女折磨一只猫，她了解科尼什人。在一首诗中，她说他们的眼睛“愚蠢、卑鄙、吝啬和狡诈”。当她和莫里离开阳光明媚的维拉保林时，她掉下了眼泪。4月初，劳伦斯去圣·伊弗斯车站迎接他们，那一天的天气并没有让人

充满信心，气候寒冷，天空阴晦，海鸥在空中盘旋，时时发出凄凉的叫声。为了劳伦斯，莫里夫妇强作笑颜，实际上却想哭。

劳伦斯带着莫里去圣·伊弗斯的拍卖市场购买一般的廉价生活用品，而他自己的一些家具却正从伦敦发送过来。劳伦斯将桌子和椅子漆成了淡绿色，而莫里在凯瑟琳赞许的目光下将他的家俱漆成了黑色。对此，劳伦斯“感到滑稽而又失望”。莫里夫妇在此逗留期间，始终没有从这黑色的郁抑中解脱出来，他们对劳伦斯夫妇之间激烈的争吵尤其感到沮丧。莫里甚至当着劳伦斯的面说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理解一个女人是如何能使男人激怒而进入致命的境地，“实在超出了理智判断的范围”。

那年春末，莫里最大的困难是应付劳伦斯的兄弟关系的建议。在莫里的想象中，这是一种在昏暗的荒野上，在占卜石之间举行的一种可怕仪式。后来，他才了解到，劳伦斯的这一建议类似于《恋爱中的女人》中杰拉尔德，克里奇和鲁伯特·伯金之间的友谊。在康沃尔期间，劳伦斯正对《恋爱中的女人》作最后的润色，但他并未将此事告诉莫里夫妇。他可能对小说的事只字未提，因为书中的故事与他们四人当时的情况有戏剧性的相似。五年以后，当莫里第一次读到《恋爱中的女人》时，他没能从杰拉尔德·克里奇（以伊斯渥的托马斯·菲利浦·巴勃的面目出现）和古德仑·布兰格温身上认出他自己和凯瑟琳的影子，尽管在蓬帕杜咖啡馆里，古德仑从会作弄人的哈利迪手中接过伯金的信这一幕是取材于现实生活；凯瑟琳夹着一册《阿莫斯》离开了皇家咖啡馆。在那里，一群反劳伦斯派的人正在对此书进行嘲笑。赛西尔·格雷在他的黑索尔坦因传记中说，黑索尔坦因当时不在场，但劳伦斯在小说中都将他也包括在咖啡馆那群嘲讽他的人中（书中为哈利迪）。至于莫里，他并未将自己和凯瑟琳与《恋爱中的女人》联系起来，直到数年后，弗丽达告诉他时，他才意识到，他们也在其中。这时莫里才发现，杰拉尔德和鲁帕特之间的对话与他和劳伦斯 1916 年在海伊·特莱戈森时的一次对话多么相似。

当两人漫步在荒野里，莫里坚持认为他不需要起誓：“如果我爱你，而你知道我爱你，这难道还不够吗？”但劳伦斯却对他大发雷霆，“我恨你的爱，我恨这个，你是只令人厌恶的臭虫，吸食掉我的生命。”有一天晚上，莫里夫妇听见劳伦斯在隔壁冲着弗丽达大声喝叫，“杰克在杀我”。

当然，劳伦斯坚持要举行盟誓结拜的仪式，似乎很幼稚，但是他的生活就像他的创作，象征性对他至关重要，他把从家务琐事开始的每一件事都变成了某种宗教仪式。

至于人们对劳伦斯的同性恋的一般指控，莫里在他的自传中说（如前所引），“人们通常理解的同性变一词”无法与劳伦斯联系起来，弗丽达于 1951 年 1 月 21 日给本作者的信中说。在劳伦斯——莫里的关系中，“劳伦斯从不曾有过任何性意识”，在 1953 年 8 月 6 日给莫里的信中，弗丽达坦率地说，“在你和劳伦斯之间存在着一种真正的结合力、如果把能活得更长久些，你们会成为真正的朋友，他是那样地渴望得到你的理解。我想，他的同性恋是出自内心痛苦的一种表现形式——我和他抗争，并胜了，——但他希望你那里得到更深刻的东西”。

如前所述，莫里发现《恋爱中的女人》中两个裸体男人的摔跤场面或许正是表明了劳伦斯希望得到他的兄弟关系的一种方式。在“格斗”那一章里，瘦弱的鲁帕特表现出了惊人的力量和敏捷，将肌肉发达的、强健的杰拉尔德

摔倒在地。劳伦斯将此解释为伯金学过柔道。自此以后，杰拉尔德和伯金都认为，这种运动中的肉体接触可“使人心智健全”。在劳伦斯的其它小说中也出现过类似的场面——《白孔雀》中毛巾擦身那一节和《颠狂的毒蛇》中起誓的场面——似乎暗示着一种强烈的互相补偿的欲望，一种一个虚弱的躯体与一个强壮的躯体同化的愿望，虽然这是一种想象性同感的运动。

无论如何，劳伦斯的计划对 1916 年时的莫里是太过分了。凯瑟琳独自留在家（她可以听到弗丽达在隔壁来回走动的声音），抱怨地给远方朋友写信，“我不清楚什么最使我厌恶”。她告诉柯特连斯基：“当他们在相爱之中。在相互嬉戏时，或当他们在相互咆哮时，劳伦斯揪着弗丽达的头发说，‘我要割断你这该死的喉咙，你这泼妇’！”凯瑟琳悲哀地说：“叫我如何去接受这些人，难道是我错了？”

最后她迫使莫里告诉劳伦斯，这半岛的北部海岸对她来说就像是在异国，他们必须到南部海岸去找一套房子。不久，莫里在特鲁洛河支流靠近梅勒·法尔第斯找到了一处住所，年租金 18 英镑。凯瑟琳到伦敦住了几日，莫里则将他们的东西装上了一辆马车，劳伦斯在帮他的忙，但他不肯道别，弗丽达敷衍地答应以后去看他们。当莫里离去时，他觉得他这是在与劳伦斯永别。

（五）占卜石和监视网

1916 年的兵役法使劳伦斯感到不安，他给戈特勒去信（在 4 月 29 日），“我们都有些沮丧，等待着被迫征招服役，我期望像我和莫里这样的人能够编入‘后备军’，做一些文职工作，但看来只有听天由命了”。使劳伦斯感到有趣的是，爱德华·马什开始向他讨债了。劳伦斯说，我最好寄给他几本未发表的小说来“代替所欠的钱”，向上帝祈祷也没用，因为上帝是最大的富翁，我大约还有 15 镑，但我不在乎。

劳伦斯夫妇这里偶尔会有一些客人来访，凯瑟琳·卡斯威尔、杜丽·拉德福德、巴巴拉·罗和两个来自美国的崇拜者，记者罗伯特·蒙齐亚和伊沙·安德鲁斯（蒙齐亚一度曾是劳伦斯在美国的代理人）。有一次，莫里带着他们的一位牛津的朋友弗雷德里克·古德耶来曾诺，劳伦斯很喜欢古德耶。这位爱着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古德耶去了西部前线，不久便被打死在战场上。这件事又一次提醒了这一群人们，战争正在海峡两岸严酷地继续着。但英国将军们花了数年时间才发现，波尔战争的步兵战术在机枪阵地前是无法奏效的。

劳伦斯偶而也去看望莫里夫妇，这会给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带来一丝快乐。她在梅勒的邻居试图让她参加教区集会，这使她感到烦恼。而在这一时期，劳伦斯差一点被淹死：他划着的小艇在突然而至的风暴中几乎颠覆。但是，劳伦斯在那一年的另一次应政府之邀而作的旅行则使他更为恼火。地区邮递员送来了一封可怕的官方信封，当他把信递给劳伦斯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情绪而笑了出来，劳伦斯在《袋鼠》一段取材于生活的场景中描写了他收到官方的征召命令一事。那邮递员是一个超龄的美以美教派传教士，他热衷于他人入地狱的观点，“他对他人的不幸除了具有科尼什人的那种天生的狂热外，还有一种宗教的热情”。

6 月 28 日，劳伦斯和弗丽达去了彭桑斯，他从那里被派到六十英里以外的鲍德明，他的德国妻子不得不独自一人穿过那片荒野回家去。在《袋鼠》“恶梦”这一章中，劳伦斯谈了他在兵营里的经历，以及他对此的厌恶：在监狱般的兵营中度过的两天一夜。够他这一辈子受的。医生建议他应该用某种方式来帮助他的祖国，而这些话对他就如马车驶过时留下的隆隆声那样毫无意义。

莫里因身体条件不符而到伦敦接受了在战争办公室的工作，劳伦斯却逃脱了，他似乎是当时为数极少的能够完全逃脱这种义务的作家之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战争后期，他因生活拮据而希望就业时，却连类似的工作也找不到了。

甚至剑桥——布鲁姆斯伯瑞圈子的一帮人都加入了战争工作。愤世嫉俗的和平主义者莱顿·斯特拉奇负责伯克郡·班格堡的一间房子，它是专供精疲力尽的战争工作人员度周末的，而一批知识分子则在加辛顿消磨他们的时光。作家兼掷弹兵护卫官奥斯伯特·惠特威尔回忆“一些国家智囊”，在这个“田园牧歌式的聚居地”胡扯乱混。奥特琳娜·莫瑞尔夫人则坐在绿色的 18 世纪画室中“嚼着薄荷硬糖”。西格弗利德·萨松也是个军官，创作过战争诗歌，他谈起过一次相似的访问印象：忙忙碌碌的知识分子，在夜晚来到这座庄园，“在壁炉边吸着教堂执事才抽的烟斗，幽默机智地谈论文化，并以热切认真的语调谈论艺术上的重要流派，以及军国主义的罪行。”

此时，劳伦斯正将讽刺的矛头对准了加辛顿。在 1916 年 11 月 21 日，他给凯瑟琳·卡斯威尔的信中告诉卡斯威尔说，终于给她寄去了自己的小说，“感谢上帝，我把它从屋子里拿了出来……当然，还有最后一章及尾声尚未完成：这还需要一些时间”。他希望她和她丈夫读一读此手稿，“作一些必要的修改”，指出任何不一致的地方，“不要让其它任何人看，我希望知道你们俩对它是如何评价的。我想，这是一部杰作，不管别人怎么说。问一问唐：他是否认为某部分有诽谤性——例如，哈利迪是黑索尔坦因；那位普桑，是一位叫普玛的模特儿。他们取材于生活”。他说，此外再无他人了。但几天后，他又给卡斯威尔夫人去信：

我听奥托琳娜·莫瑞尔今天早上说，据传，她是这本新小说中的一个反面人物。真奇怪，谣言是怎么传出来的——所以，我提出寄给她我的手稿——望你在我通知你以前不要将它给平克。

我接到了《运动员素描》，并拜读了。不，我不是很喜欢屠格涅夫，他太会挑剔了，像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或那种老童男。使我感到可笑的是，我们曾那样地崇拜过这些外国人，他们的艺术和我们相比是那么的笨拙，刻板、啰嗦。我能告诉你它怎样败落的，从费尼莫尔·库柏——对我们来说是无名之辈——纯洁高雅的艺术，到屠格涅夫新闻体式的大头短棒。所有这些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莫泊桑、福楼拜——都非常浅薄和粗劣。只有费尼莫尔·库柏或哈代才是优美、成熟、精巧的艺术。在我看来，我们英国艺术中最优秀的是至今世界上最精巧、优美和最完美无瑕的。但是，向一个更粗俗，原始和矫揉造作的民族屈膝，常常是一个高度发达民族的特征。以德·阿农齐奥和我的《侵犯者》为例——德·阿农齐奥是那么的粗劣和愚蠢。真的，够了。对外国人的这种糊涂崇拜该结束了。世界上最高雅的艺术是用英语写成的。

请你不要多谈我的小说了，行吗？更重要的是，不要给任何人看，唐除外。我觉得它还不会出版，所以，我不希望任何人谈论它。我希望奥托琳娜·莫瑞尔不会要这些手稿，假如你能防止巴巴拉·罗姨妈知道你拿着这本书，那就再好不过了——因为，一旦开卷，她必定会要求读完其余部分。

为什么劳伦斯突然将奥托琳娜夫人漫画成可怕的赫米奥妮，现已无从判断。尽管在前面引用的 1915 年的信中，他曾指责她机械地运用意志，但他和她不可能像伯金和赫米奥妮一样发生恋人之间的争吵。《恋爱中的女人》中的那一段显然出自想象。大卫·赛西尔勋爵在信中这样说：

坦率地说，我并不知道劳伦斯和奥托琳娜夫人争吵的全部真相，像你一样，我敢肯定，他们之间的关系有着一种“深奥”的性质。奥托琳娜夫人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实在太复杂了，以致于我无法在一封短信中，用某种方式对她作出公正的描述。保护人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向来是复杂的，尤其像她这样，作为保护人的同时又是某种艺术家——生活艺术的专家，并具备艺术家应有的气质。所以，情况复杂些，劳伦斯可能发现她太专断。不管怎样，他不喜欢生活在别人的恩惠之下。

奥托琳娜夫人的女儿伊高·文诺格拉朵夫夫人也在一封信中说：“在遇见我母亲时（劳伦斯），他们都有一种强烈敏感的热情和富于同情心的个性，所以，他们一见如故……她对那一代作家的兴趣是真正的，真诚的，近乎古板的、维多利亚式的。其帮助和促进的愿望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出自自我名利。这些在最近所写的书中都论及到了。”至于恋爱关系的可能性，文

诺格拉朵夫夫人记得，“我爸爸说：弗丽达告诉他，她不在乎劳伦斯和我妈妈有那么一种普通的关系——她不能容忍的是所有那些‘精神痴情’”。当时奥托琳娜夫人发现她自己深陷在伯特兰德·拉塞尔的情网之中。

劳伦斯写给奥托琳娜夫人的最后一封信——在他们数年后恢复通信以前——显然写于1916年5月24日。劳伦斯告诉她，他刚送回《阿姆热斯》的校样，奉献给她，除了她之外，他已划去了所有的题献者，因为人们是“这样可笑和浅薄”。达克沃尔斯版6月份发行时，题辞仅仅只有“献给奥托琳娜·莫瑞尔”；但劳伦斯显然忘记了修改休伯斯奇版本。当数月后，它在纽约发行时，矛盾出现了。题辞仍完美地写着：“……称赞她的高尚和独立的同情心，及她的慷慨和无私的理解/这些诗是感激的奉献。”

奥格斯特斯·约翰在他的自传《明暗对比画》（1952年）中回忆，奥托琳娜夫人曾坚持让他阅读《儿子和情人》。对此他持怀疑态度。最后他读了，并“急于宣布我的转变”，但反应却是“冷淡的沉默”，因为，“事实证明我已经太迟了……其时，主人多少已经得罪了信徒，他的名字不再被提及了”。

《恋爱中的女人》当然包含着比劳伦斯的近友的不太真实的肖像要丰富得多的内容，它是20年代前英国的《针锋相对》。在皇家咖啡馆——索赫——乡间别墅这一段中，劳伦斯对令他恼怒的人和制度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这些地区是一个社会前哨阵地（不管带着怎样的“和平主义”特征）。这个社会使人类机械化，机械地将人们引入了一场战争浩劫。但《恋爱中的女人》不仅仅具有社会性，其中的人物有时具有（尽管劳伦斯不喜欢陀斯妥耶夫斯基）一种陀氏的强烈感情，它对英国的描述——书中劳伦斯为读者而唤醒的也只有劳伦斯能够唤醒的英国的自然风光——那些砂砾般的煤矿小镇和奢侈了的乡间别墅；那些对伦敦“患病”部分的描写，以及在晶莹洁白的泰洛连阿尔卑斯山出现的高潮。英国已经失去如此主要的特征——丰富了英国文学的构成，而能够与此媲美的只能追溯到浪漫主义或伊莉莎白时期。但是，这一切都是在现代模式之中，有效地运用了象征，就像在那可怕的一幕中，厄索拉极端痛苦地看着伯金，向池塘中投石，以击碎池中的月亮这个女性形象——或在同样令人可怕的一幕中，一只兔子当着杰拉尔德的面，在戈特勒手臂上拉了个口子：“那浅而长的口子像划在他自己的脑门上，撕开了他意识的最深层，释放出深藏着的、从未曾意识到的、不可思议的红色领域——后者将心理学上的最新发现和未来主义最有效的方式相结合。劳伦斯曾在意大利对未来主义作过深入的研究。

在这种风格下，哈利迪在索赫的公寓房间里的非洲雕像是一极重要的象征，决定了小说中的几个主题的发展。其中的一座“奇特和令人惶恐的”。胎儿似的雕塑——一个长着“痴呆的、发育不全的脸”的生产中的妇女——使杰拉尔德震惊，尽管他同时也感到它是“很美妙的，表达了一种极端的肉感”。这里或许表达了劳伦斯对雕像的赞许。但劳伦斯绝非如黑和白那样简单，在攻击过分理智和它对现代人的危害的同时，他并没有提倡要回到原始状态。这一点清楚地表明在他的第一篇论述麦尔维尔的文章《美国古典文学研究》中（1923）（以及其它一些地方）。在文章中他说，不管我们如何强烈地反对所谓的文明，我们不能回到过去：“我们或许不得不打碎东西，那就让我们打碎吧。而且，我们的道路或许不得不转个大弯”，这似乎是一种退步。

但是我们不能回去，不管那南海岛民如何，其在生活奋斗方面要落后于我们好几个世纪。那是一种意识的奋斗，为灵魂成熟的奋斗。那里有他的女人，头披黑发，长着深色的、朦胧的、略带嘲讽的眼睛。我喜欢她，她是迷人的。但我永远不想去碰她，我不能回到那么遥远的过去。

这些话听来有些像鲁帕特·伯金。在《恋爱中的女人》的不同版本中，都在观察和思考着来自非洲或南海的木雕像。劳伦斯本人尽管羡慕土著人和农民，倾心于原始精神的清新，但是，他在写作中多次提到他永远无法降下他的“文明意识”的旗帜。当他完成《恋爱中的女人》时，他已阅读过泰勒、弗雷泽、简·哈里森和吉尔伯特·莫雷（弗罗本涅斯的作品显然要晚些时候才出现在他那儿），并通晓人类学——他在运用这些知识中确实走在大多数20世纪作家的前面。正如本书作者首先指出：（在《D·H·劳伦斯的生平和著作》中（1951））劳伦斯是在小说中改编神话的先驱。如，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通过给几个人物选用取自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日耳曼文学的名字扩充了他的含义：古德仑，是诺斯的《伏尔桑加古英雄》中的西格德的配偶，（古德仑是瓦格纳的相似著作《众神之光》中西格弗雷德的妻子）；杰拉尔德，是日尔曼语的名字（持矛人，勇士），像西格德——西格弗雷德一样早逝；而洛尔克，这个长着鼠眼的侏儒般的人物，表现了北方神话中恶魔洛基的某些特征。

至于原始的艺术形式，开始盛行于劳伦斯初到伦敦的时候，高格涅（现已长辞于世）是当时的时尚人物。1904年，德国画家柯奇纳开始传播在德累斯顿人类文化博物馆发现的非洲和美拉尼西亚艺术。先锋派的布鲁克，以此素材进行绘画创作。当时在巴黎，非洲雕塑影响了野兽派圈子和毕加索。在伦敦，罗杰·弗莱和其他人为原始艺术撰文，在其他几个欧洲国家的首都，芭蕾守护神不久将听到斯特拉文斯基“春之激情”的“粗野”的旋律。劳伦斯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引进“原始主义”的主题不仅仅是为了追赶时尚，或甚至是对此进行讽刺，或者为了修饰和形式对比——在哈利迪的寓室里，黑色肌肤和裸露的波希米亚人的洁白肌肤的对比——尽管存在着这些组合特征，但如同他触及的所有东西一样，劳伦斯以他自己的眼光采用这些材料（那位黑索尔坦因，哈利迪的原型，于1916年写信告诉德刘斯说，在他伦敦的寓所里有一尊非洲雕塑，这是对《恋爱中的女人》的有趣注释）。

《恋爱中的女人》手稿的一部分（收藏在得克萨斯大学），对此书的背景材料作了重要补充。在开始动笔创作到正式出版前几年写下的几章中（出现在《长生岛》之二中），描述了杰拉尔德·克里奇和鲁帕特·伯金相遇及他们一起穿越泰洛里斯阿尔卑斯山的旅行。同行的有一位他们共同的朋友赫斯金，他是个海军士兵——在最后的版本的第一章中，他叫鲁帕顿，成了杰拉尔德的姐夫。杰拉尔德和伯金彼此之间已经“完全承认，”他们知道，“他们彼此相爱，并且彼此都会为另一个人献身”。伯金代表这么一类人，即“冰清玉洁”和“混浊黑暗”在他身上并存。“他希望摒弃这些欲望；希望将它们忘却，但是，一个人只要能感知冷热，他就无法扼杀内心的生命欲望。”

尽管伯金总是受女人的吸引，但“只有对男人他才会产生一种只有对异性才会有的热情、激动和诱惑”。而且，“尽管他总是最起码与一个女人保持密切的关系，在而且事实上，从未和一个男人有过这种关系，但是，男性体格才使他迷恋，而他对女性体格只有一种喜爱，一种对待姐妹般的神圣的爱”。

在小说结尾部分被舍弃的阿尔卑斯山故事的片断中，厄索拉在杰拉尔德死后去了意大利（显然去和伯金在一起了）。这此片断中讲到，厄索拉在一年后收到了古德仑的来信，古德仑已经离开了洛尔克，并生下了杰拉尔德的遗腹子——费迪南德·杰拉尔德·克里奇：“他的头发就像大海上闪烁的阳光”。另一个被舍弃的结尾相对说来比较“圆满”，它与劳伦斯后来的剧本《一触即发》（1919）相类似。在这个结尾中，劳伦斯没有让杰拉尔德死去，而是让他回到了英格兰，古德仑相随而归。尽管她还怀着杰拉尔德的孩子，但是洛尔克还是向她求了婚。洛尔克此时已在考虑结婚——假如她能保证“你会比关心孩子更关心我”这个古德仑认为只有杰拉尔德才能解决的问题。这是劳伦斯式的主题的再现，在他的生活中和作品中都是如此。此主题在这里的出现，重复了《虹》中威尔·布兰格温对他女儿厄索拉的爱情主题——就如那个被舍弃的结尾部分中重新奏起的阿尔卑斯山主题和杰拉尔德“冰清玉洁”的品质，复述了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反复出现的原始艺术的象征。

在另一个重要的章节“月色中”中，伯金回忆起他在哈利迪的住处看见过一尊雕塑，不是曾使杰拉尔德感到震惊的那一尊，而是另一尊女性形象。在上面伯金了解到了“几千年来的纯肉体的、非精神的知识”。这是一种“耽于感官、止于感官的认识；一种分解、融化时的神秘知识。就像生活在腐败和无声消亡的世界中的甲虫所有的那种知识”。在“这个可怕的非洲”存在着一种必然性。但是“白种人会采取不同方式”，“他们背靠北极，冰雪般的抽象观念能够解释一种神秘的冰雪破坏力和雪一般抽象的毁灭”。这种认识，早在劳伦斯的一篇论麦尔维尔的文章中作过评论。它预言杰拉尔德在泰洛里斯阿尔卑斯山之死。他的死亡并非出于意外，而是由于他内心的某种因素，造成了“雪一般抽象的毁灭。”伯金则是通过星星看到了自己的命运，他能够意识到某种东西，如与厄索拉之间的一种均衡，“两个独立的人的均衡”，就像“两颗星星平衡地共存”。但是，同样也有伯金的“消融之河”。在柯林·克拉克的书中作了郑重的处理。作品的标题就是来源于此词。对于伯金来说，走向生命的道路要通过腐朽，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通过消融。但生命并不一定要扼杀其它成分才能存在，而是与它们共存的，就如同前面引述过的柯勒律治的文章中的“第二类想象”的成分一样。

《恋爱中的女人》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它对人际关系的处理，特别对伯金和厄索拉这样的成为“平衡星体”的关系的处理是极为不易的。正如小说的结尾所表明的那样，劳伦斯从来不是一个善于处理结局的人。他被称为“男性加文主义者”。但这一称呼放在他身上其意义未觉过于绝对。他意识到自己的那种强烈的支配欲，但他又与之抗争，如对伯金和其它几个人物的处理上。在《袋鼠》中，对R·L·索默斯的处理上尤为明显。甚至在所有“治疗性”争论中，厄索拉都是与伯金平等的。鲁帕特·伯金并非如某些评论者所言的那种自传性人物，但它经常表达出劳伦斯的思想，正如他在不断寻求的“星体均衡”那样。

《恋爱中的女人》比当时大多数小说在对现代人的基本问题认识上要深刻得多——这是生活在战争犹酣、充满恐怖的英国年代里那位病魔缠身和失望沮丧的劳伦斯的巨大成就；同样，也是这整个破坏性的世纪中的巨大成就。

除了奥托琳娜夫人之外，他的其他一些熟人显然也感到不安了，他们开始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寻找自己的形象。劳伦斯于12月5日告诉戈特勒：“在我的小说中有一个男人——不是你，我向你保证——他为一家工厂做了

一根巨大的花岗岩中楣，例如，你的旋转木马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是指戈特勒最近的一件作品。”我们认识一个人，一个德国人，他在科隆为一些漂亮的大工厂做这些大浮雕。——劳伦斯的朋友开始意识到，这种否认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人们不仅能轻而易举地从洛尔克身上看到其原型戈特勒（甚至他名字的读音也有暗示），而且，戈特勒的一幅画《旋转木马》，正如劳伦斯 12 月 5 日在信中承认的，与洛尔克为科隆附近一家工厂外面建造的花岗岩中楣极其相似。洛尔克向厄索拉和古德仑解释说，此物“代表一个交易会，农民和艺人们在纵情狂欢，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他们穿着可笑的现代服装，在旋转木马上滑稽地旋转，呆呆地观赏着展品。成群结伙的人们亲吻着，摇晃着，荡着秋千，在打靶场打着靶，一片杂乱的狂欢”。当然，这部分描写取材于威克斯——（北部一些工业城市每年一次的假日——译注）在伊斯握举行的充满生机的庆祝活动。但是，正如艾弥尔·德拉芬纳首先指出的，它也从戈特勒的绘画中借鉴了某些东西。1916 年秋天，当劳伦斯在为《恋爱中的女人》的最后一章进行润色时，戈特勒给他送去了一幅：“旋转木马”的画。劳伦斯于 10 月 9 日给戈特勒去信：

如果他们告诉你说，此书是淫秽的，那他们算是说对了。我相信在这可怕的、揪人心肺的淫秽中，有着庞贝文化艺术的某些东西。但是，既然淫秽是我们今天的激情之真谛，那么它便是艺术的唯一要素——或者几乎是唯一要素。我，作为一个笔墨文人，不能说我从画中领悟到了什么。但是，我确实认为，在那熊熊的火焰、强烈的和机械的旋转及完全的卷入、那毫无意识的激情、令人激动的极端状态之中，你得到了一种真正的、全新的发现。

在这一年，劳伦斯听说珀西·路卡斯·梅纳尔的女婿 7 月 6 日在法国因伤势过重而去世后，开始酝酿一篇根据真人真事所写的故事。劳伦斯写了平庸的短篇小说《英格兰，我的英格兰》，它首先刊登在 1915 年 10 月的《英文周刊》上，6 个月后又登载在一家美国杂志上。故事较为明显地将梅纳尔一家公之于众。因为故事中讲到了高德弗雷·马歇尔为他的女儿们建造的克劳克汉姆，一所大宅院。其中一个女儿嫁给了伊夫林·道特利（再版中改名伊格伯特），他心恢意懒地依靠着马歇尔的恩赐打发日子。劳伦斯甚至将小姑娘的意外归咎于这位女婿的粗心，他随便地将一把长柄镰扔在地上。但珀西·路卡斯。尽管年逾 40 年，并已有三个孩子，他还是自愿参战。劳伦斯可能被珀西·路卡斯少尉最后写给 E·V·路卡斯的信所感动。在信中，珀西说，他们骨盆和大腿被德国机枪子弹打伤了，他在持续不断的炮火下的弹坑里坐了 8 小时，直到担架队员将他抬到两英里外的绷扎所。他以最详尽的方式向他的弟弟叙述了这一切，没有丝毫的自怜。他从索姆被抬下来两天后，乘驳船去了后方医院。他心情烦躁忧郁，但平静地等待重返英国。护理医官写信告诉 E·V·路卡斯，“在坏疽出现以前，康复的希望是较大的。”医生截去了他的腿，6 小时后，他死了。

劳伦斯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那里听到珀西·路卡斯的死讯，写道：我希望这个故事没有发表，它应该深藏在海底”。他还补充说，不管怎样，它使他想起“男人必须找到新的表达方式，赋予生命以新的价值，不然他的女人就会拒绝他，他就必须去死。”劳伦斯后悔他“去住在葛雷特汉姆”，他还希望小说不至于伤害马德琳·路卡斯，珀西·路卡斯的遗孀：“此事至关重要。如果这故事是真实的，它就不该造成损害”。但在附言中他又说：“不，我不希望我从未写过这个故事，从长计较，它该是有益的”。1922 年，他以

此作为他的一本选集的书名。不管他是否喜欢他的那些熟人，也不管他们的喜恶，他继续对他们进行描述。但《英格兰，我的英格兰》是他依据真人真事写成的小说中最残酷的一篇。

在 1916 年期间，劳伦斯没有离开康沃尔。8 月 14 日他告诉卡斯威尔夫人：“我不能来伦敦——从精神上我不能，但弗丽达想来找她的孩子们。我宁愿做丹尼尔呆在狮笼里，而不愿亲自去伦敦，我是真的被搞怕了——我实在被如今的人们和世界弄怕了，像惊弓之鸟。”11 月 14 日，他告诉戈特勒：“这里是如此宁静和偏僻，不会和人争吵”。但是，他和弗丽达之间显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争吵。

凯瑟琳·卡斯威尔在 9 月去了特雷杰森进行了短暂的观访，她听到劳伦斯提及他和弗丽达最近的一次争吵。劳伦斯以为他们的冲突已经结束，便开始唱起歌来，弗丽达稳步走到他背后，像赫米奥妮对待伯金似地对待他，尽管没有用青金石，但她用餐勺在他头上敲了一下，他稍有耳聋，所以，没有听到她的到来。“真是妇人之举”他说。当争吵显然结束后，她又从背后悄悄接近，给了那么一下子——这一击很可能要他的命。但卡斯威尔夫人说，他并没有记恨，他可能将这次争吵写进了《恋爱中的女人》中。在《恋爱中的女人》的冲突场面中，赫米尔妮用左手举起了青金石。一位美国学者（爱德华·尼尔斯）50 年代在伦敦指出，奥托琳娜·莫瑞尔在她的这本书上，对这个问题加了旁注：“弗丽达是个左撇子！”

在她作客康沃尔期间，卡斯威尔夫人引起了她的主人的不快，因为她没有带睡衣。有一天晚上，她起来拿书时，“穿着内裤和毛背心”出现在劳伦斯夫妇面前，劳伦斯的严厉的清教徒主义的指责便通通发泄到了她身上。卡斯威尔夫人离开康沃尔的时间比她原定的要早，因为她寂寞的丈夫打电报催她回伦敦，她随即动身，这还引来了劳伦斯嘲讽的笑声。

12 月 14 日，在给杜丽·拉德福德的信中，劳伦斯说，弗丽达被准许再见见她的孩子。他觉得她应该让他们独自长大成人：“到那时，如果仍存在联系，那是无法阻止的，如果不存在主动的爱，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之产生。此事真让我感到厌倦。”弗丽达的女儿巴巴拉回忆说，弗丽达带他们一起去听了一场音乐，并给了每一个十个先令。大女儿爱尔莎在女厕所里对巴巴拉说：“你知道你不该喜欢妈妈，就因为我们得了十先令”。这些钱后来由欧内斯特·威克利正式地还给了弗丽达。

劳伦斯仍想着离开英国，12 月 7 日，他写信给艾米·罗威尔说，如果能拿到旅行签证，他想去意大利。然后，他谈到了几天前发生的英国政局变化：“我们现在有劳伊德·乔治为首相，这对英国的前途不利。阿斯奎斯时期还存在着英国旧日的正统和对自由的迟疑的爱，但是，劳伊德·乔治是一只聪明的威尔士小老鼠，极端顽固不化，缺乏独创性，软弱无能，只会进行快速和剧烈的机械运动。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会将我们引向哪里；会出现一团糟的局面。但这个无人掌管的国家还是需要他的……“上帝要毁灭人，必先使其疯狂”。

劳伦斯在他的通信中，如同在他的创作中一样，始终这样评论劳伊德·乔治。即使在凡赛尔协议以前，即使在他不敢辞去黑格的时候，尽管乔治已不信任他——即便是在这位据说是精明的威尔士小律师在帕申迪尔大屠杀期间访问弗兰德斯而被黑格的一位参谋官愚弄的时候，这位参谋官把监狱中身体强健的德国犯人都转移出去，这样，劳伊德·乔治就只能见到“一群瘦弱的”

俘虏，并会相信黑格的进攻正在挫败德军的士气。在谣传中曾一度被当作初期法西斯分子的劳伦斯，被搁在了一边。但有时，他被看作是一个具有敏锐政治目光的人。

12月21日，他写信给麦克列奥：“这位像威尔士小兔子一样的劳伊德·乔治究竟在未来会使我们蒙受什么灾难，只有上帝知道。他在无事空忙，不久我们便会发现自己晕头转向地陷入混乱之中”。两天后，劳伦斯写信给堪贝尔说，他和弗丽达无法再去伦敦了，从伦敦到圣·伊弗斯的车票现在要3镑15先令。他正在读莫里的小说手稿《静物》，他觉得这小说更像复制品，而不是创造。莫里“总是不愿意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他是个聪明的而没有独创性的人……我不喜欢他将自己想象成和最杰出的人不相上下的人物，这是他毛病的实质所在，而他所有的新花样和努力只是证实了他的这种虚伪性”。对于劳伦斯，这是一个痛苦的季节。一个“讨厌和可诅咒的”圣诞节。但希望总还是有的：“在今后的年代里，你们会看到，在我们身上去掉了一大堆东西，我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些新的开端”。

尽管他有许多不幸，1916年对劳伦斯仍是重要的一年。就在那时，他完成了（除了几段之外）他最重要的著作《布兰格温英雄传》。在此书等待出版的4年中，他没有重写《恋爱中的女人》。因为，尽管在他后来的创作生涯中也有惊人之作，但是，再也没有能够在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结合上达到象《虹》和《恋爱中的女人》那样的技巧了，尽管他的语言技巧有所提高。

随着1917年的来临，劳伦斯又一次想要逃避到美国去。在去年秋天，他向柯特连斯基感叹道：“我们的拉纳尼姆在哪里？假如我们在两年前有勇气去寻找和创造它，该有多好啊。也许现在为时不晚。”1917年1月5日，劳伦斯告诉凯瑟琳·卡斯威尔，他觉得自己像一只被逼上绝路的狐狸，他正在努力，重新申请去美国的签证。13日，他写信给她：“我们梦想那个遥远的隐身之处，它是我的未来”。22日，他请堪贝尔在签证上予以帮助：“从长计议，我希望找个地方，过上简单的生活，脱离这种文明，在太平洋上，并和几个同样心平气和的、憧憬幸福的人生活，相互理解，自由自在。”他认为，堪贝尔会理解他，尽管他犹豫不决，还不能抛弃这个世界。劳伦斯希望有朝一日他也这么做。25日，他再次请求堪贝尔帮助，并解释说，所谓“太平洋”不是指加利福尼亚，而是马克萨斯群岛，这是他在重读麦尔维尔时想到的。劳伦斯正处在写作《美国古典文学研究》初期。他问堪贝尔：“最近你读过什么东西吗？我发现费尼莫尔·库珀和赫尔曼·麦尔维尔的作品实为世珍——还有达纳的《桅杆前的两年》；它们是如此成熟，甚至超过了我们。”（1月25的信）。这最后一种观点成了他《研究》的首要主题。劳伦斯和吉西·钱伯斯一起读库珀的作品，但麦尔维尔对他是一次新的经历：在对麦尔维尔的重新评价中，劳伦斯是先声之一，他严肃地对待麦尔维尔，并把他看成是一个重要的作家。

1月9日，劳伦斯给平克去信，谈及他有关美国文学的文章：“但是，我不能在英国写有关美国的东西，我必须使自己身临其境。”这些文章，其中一些发表在1918——1919年的《英文周刊》上，其它几篇，劳伦斯当时想以《美国文学中的超越因素》的书名结集出版。但在他1922年去美国后，他重新修订成一卷。次年，以《美国古典文学研究》之出版。后来的版本总是和最初的有所不同。阿明·阿诺德编辑的《象征意义》实用地将它们收集在一起。他认为，这些早期的文章比在《研究》中的那些更好。但在二次大战

后的新读者的眼光中，是他的后期的文章给了苏伦斯巨大的帮助。这些经过修改的文章，使人们对劳伦斯的重新认识产生了兴趣。

在《袋鼠》中，劳伦斯和自传性人物索默斯也在 1917 年在康沃尔要求签证生效：“一个人处在极度的紧张之中，（这是索默斯苍白的、虽生犹死般的时刻），在寒冷的早晨，他头戴钢盔，从小邮局朝家走去，他刚寄出他的护照，申请去纽约的签证。”他感到自己似乎走在一片“被死神所控制的陌生的土地上……这几乎使他感到惧怕，‘我做错了吗’？他自问道，“我要离开我的国家。去美国，这错了吗？”

但不管劳伦斯自己是否曾有过这样的负罪感，这种感情不久变成了愤怒：“他们不会给我去美国的签证”。他 2 月 13 日给卡斯威尔夫人去信：“除非你为国家利益而去。这一国家利益是个新的恶魔。……我不能呆在英国，最起码对我是这样。我会在他们的恶臭中死去，我必须离去。”这是个“该诅咒的国家，我诅咒它，我诅咒英国人，男人、女人和儿童，让他们因为他们的国籍而受到诅咒和仇恨，永不得宽恕。”后来，在写到《袋鼠》中的索默斯时，劳伦斯气愤地谈到当局拒绝发放签证给“一个英国所能产生的最热情的英国小人物，他怀着对英国的激情，即使常常是仇恨的激情。但是不行，他们坚持认为他是个外人，哼！”

并不是因为美国是完美的，而访问记者罗伯特·蒙齐亚回到了纽约，将他的朋友留在了英国，他感到“十分悲伤”但劳伦斯说，“在他（指美国——译注）身上有着一些美丽可爱的因素，可惜，本质上他也是个凡夫俗子，屈膝于这邪恶的、毁灭性的过程，靠丑恶的战争养肥了自己，本质上，他有着很多的丑恶和贪婪，典型的美国式的”。但劳伦斯的美好的东西，也会“在他身上取得胜利”。

他刚完成《男人和女人》——这本集子后来以《瞧！我们走过来了！》的书名出版——这是劳伦斯 1917 年出版的唯一的一本书。从 1912 年开始的诗歌创作经历，在曾诺达到了顶峰：它充分体现了劳伦斯的勇气和他对希望的执着追求。所以，他以个人胜利的纪录为终结，给诗歌取了这样一个挑战性的，肯定的标题。也许，在他部分作品中反映了他生活中的失望时刻，但他大多数的作品始终是积极的、向前的，充满了探索生活的惊奇之处。在《瞧！》诗集的最后一首题为《宣言》的诗中（作于曾诺），他谈到了一个妇人给他的“力量和充实”和“所有摇摆中的加拿大麦子，正在成熟/没有像一个妇人的躯体有这般的力量”；他通过这首诗，创造了一个柏辅相成的原则，近似于伯金的“两个独立的人的均衡相联”。在这样的相辅相成中，劳伦斯在这首诗中说，我们将自由自在，胜过天使，啊，妙不可言，”还有：

每个人那时会像一朵花
自由自在……
我们将爱，我们将恨，
但这像音乐，纯粹的语言，
无遮拦地发自未知
闪电和彩虹在我们心中出现
无拘无束，无须检验
像使者一样。

在完成《瞧！》的手稿几天后，于 2 月 23 日，劳伦斯告诉堪贝尔：“春天来临，鸟儿在啼叫，天空是一片银色，我向上帝祈愿，让世界人民都处在

春天之中。“就在此时，他给凯瑟琳·卡斯威尔去了封带着忠告和预言的信，可能与她的丈夫被应召入伍而引起的不快有关：

我不知道怎样与你与卡斯威尔说，这是不幸。现在降临了，这必然会发生，外界的一切对此都无能为力。

但事实上，从长远来看，它不会真正地伤害你，你和唐之间不会发生什么不幸，请相信这一点。不幸只会伤害外在的一切：不是致命的摧残，一个人应该下决心去忍受，而不是失去信心或失去任何胜利的信念。尽管敌人一时曾抓住了我的身体，我会巧妙地调整自己，使他无法掐住我的致命部分，而当他被迫放开我时，我是强者。

我甚至希望唐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真正地摒弃这个世界。我希望他会从中吸取教训，不能抛弃他独立的个体而随波逐流。直到那时，你和他在一起才会幸福。因此，要有勇气，而不是去庇护他，应该让他自己去决定该属于哪一边。

你知道，他不能指望通过法律取得成功，这是死海之果，还是请他尝尝这个世界的家常便饭吧，而他的法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让他吃下这硬果，既然他期待的是爆炸。对他的磨难。你要硬起心肠，毫不动摇地爱他，带着对生活和新时代的期望。热爱未来的伟大精神胜过爱他本身——这是唯一的办法。

这封信（在这里只选录了它的开头部分）写于劳伦斯不太运用想象才能时期，但它却具有创造性文章的表现力。劳伦斯如利尔克一样清楚，信可以是创造性的。并如利尔克一样，他可能会说：“如果有机会”，他会“以信件丰富他的创作”。

在凯瑟琳·卡斯威尔的劳伦斯传记《野蛮人的朝圣》中，她以平等的态度谈及他和弗丽达的婚姻：“劳伦斯依靠自己的力量表现自己，他还坚持男性原则，他相信这是命中注定的，但其中没有个人主义。它让弗丽达具有女性表现力的充分自由，只要弗丽达没有企图把它变成纯粹的女性个人主义。”卡斯威尔夫人指出，也许没有任何其他女人能够忍受“他男性的正直压力”，他的“恶魔”。弗丽达是“他所遇见过的最自由的女人”，他在她身上发现了崇高的女性之真谛，以及她的健康的体魄。但是，从《袋鼠》和其它一些作品中（如前所录）可以看出，劳伦斯并不总是“坚持男性原则”——他经常与之抗争，有时会认识到，不管是不是“首领”，一个男子需要一种和女人之间的均衡关系。

3月23日，劳伦斯和艾米·罗威尔谈起了他正在写作中的一系列文章：“希尔达·阿尔丁顿非常悲伤和压抑，一切都错了，我希望情况会有好转。我完成了一些题为《和平的现实》的短文，它们对我很重要，我希望它们能在美国出版，因此，我将它们寄给你。”4月2日，劳伦斯告诉平克：“哈里森给我来信，谈到了《和平的现实》中的文章，说他将把最后3篇分3个月连续发表，我希望他能将它们一起发表……但他说做不到，所以，我想我们只能接受这个方案。或许我可以将前4篇放到其它地方去。”

奥斯汀·哈里森在1917年夏天的《英文周刊》上发表了3篇短文，但另4篇显然是丢失了。幸存下来的这3篇在《长生岛》中再次发表，但它们从未汇集成书。8月，劳伦斯告诉平克，他在写作一部新书《在门口》，它是依据更为浅显的《和平的现实》的题意写的。但这完全是形而上学的，尤其是在后来，听起来纯粹是形而上学的，它能应付专业哲学家的“攻击”。但

是，平克无法安排出版此书。他在 1920 年分手的时候，将这份手稿和别的稿件一起还给了劳伦斯。这些稿子看来也已失踪了。

1917 年春天，弗丽达写信给辛西娅·阿斯奎斯，幼稚地表达了她的遗憾。因为，赫伯特·阿斯奎斯也必须像普通的年轻人一样，参加战争，面对死亡：“做首相的儿子有什么好处？”

1917 年 4 月，劳伦斯把弗丽达留在康沃尔，和伊莎·安德鲁斯呆在一起，他自己独自去伦敦一星期。他经柏利斯都取道伊斯渥和利普雷。他遗憾地发现，霍普金夫人病倒在伊斯渥。在利普雷，他姐姐艾米莉也得了腹泻。这时正是结肠炎和肠炎的发病期。而当他回到康沃尔，发现弗丽达也病了。

卡斯威尔夫人在《野蛮人的朝圣》中提到劳伦斯夫妇的客人伊莎·安德鲁斯，她是“不幸福的，她在她的痛苦之中无法抵御对劳伦斯的依恋和她想与弗丽达相抗衡的企图——对于她，这是灾难性的”。卡斯威尔夫人曾听劳伦斯和弗丽达谈起过此事的详情。她发现梅宝·道奇·洛汉在《劳伦斯在陶斯》中，对这次恋爱事件的记载“会使人误解是不准确的”。洛汉夫人说，弗丽达曾告诉她，劳伦斯在这次恋爱事件中，第一次对她“不忠实”，并“带着一种痛苦的胜利的表情”补充说，“此事件是失败的”。弗丽达察觉到了危害，“将姑娘送出了门”，最后那一句，是洛汉夫人惯用的伊斯林恩的笔调。她在记述谈话时，常常带有些福德·麦道克斯·福德（《英文周刊》）编辑——译注）的北方风格，而很少有弗兰克·哈里斯的南部风格。

1917 年，当军事当局在 4 月再一次找到他时，劳伦斯在康沃尔生活的复杂情形又加剧了。23 日，早晨 7 点，他在石头房子的门口与弗丽达分手，准备出发穿过大田以前。他对弗丽达说，他会在日落以前回来。这一次，他所受的耻辱还算轻的。在鲍德明兵营，医生只花了两个小时就告诉他，尽管“身体不适”，但拒绝的期限已经过去，他将被编入第三类别，从事轻微的非军事服务。但他坚信，有那么多人希望加入第三类别的工作，他不会被启用的。那天只经受了两个小时的折磨，两小时的拥挤、听诊和被人窥视，然后，正如他所预言的，他在日落前回到了家里。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劳伦斯和一个相邻的农民青年。威廉·亨利·霍全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劳伦斯在《袋鼠》中给他取名为约翰·托马斯·伯杨，一个诙谐的谐名。洛汉夫人有关这段情况的描述，是依照弗丽达 1922 年在新墨西哥告诉她的话所写的。在康沃尔的“一个”青年农民：他们之间真有那种事情吗？”洛汉夫人在记述时问道。弗丽达回答：“我想是有的，我特别不高兴。”但凯瑟琳·卡斯威尔在和劳伦斯保持友谊期间，和劳伦斯探讨了这件事，他把这种科尼什友谊解释成一种神圣的事，他向她保证，其中不存在“冒犯圣灵的罪恶”。

他经常在晚上去霍金家的农场和威廉·亨利交谈，并给他弟弟斯坦利上法文课。这像过去在海格斯那样，劳伦斯和男人们一起在田里劳动，谈论哲学或农活。就像过去在葛里斯列的麦田和钱伯斯一家在一起。霍金家的姑娘梅宝和玛丽挎着篮子送来午饭，而他们坐在布满石头的荒地上一同吃饭。钱伯斯先生也几乎要出现了，并说，“有伯特在那儿，干起活来就跟玩似的”。确实，威廉、亨利·霍金 1953 年在 B.B.C.（英国广播公司）的谈话中回忆，他有一次对劳伦斯说：“你越来越像我们了。”劳伦斯向霍金家人示范中部地区捆扎麦秸的方法，但他们还是喜欢科尼什的方法。

有时，弗丽达会到农庄去喝茶，霍金一家和这个高个子太太在一起，总

比不上和他丈夫在一起那么随便。霍金家是劳伦斯夫妇在康沃尔时仅有的几个朋友之一，此外还有曾诺的凯蒂·贝利曼。他们从那里买面包、烤兔肉和藏红花饼。既使是在霍金家，受到不断滋长的对这个红胡子的男人和他的德国妻子所产生的敌意时，她仍然是他们的朋友。

科尼什人怀疑他们为沿岸的德国潜水水手提供给养。但弗丽达后来指出，即使她和劳伦斯与这些水手有接触，但他们当时穷得一天都无法剩下一块饼干。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怀疑从事各种间谍活动。（大卫·加纳特在1959年说，他相信，从事政府宣传写作的休佛，在1915年写了有关劳伦斯夫妇的坏报告，它在战争期间一直存在他的档案里）。

一天，两个军官在他们背后从荒野的一处草丛里窜出来，指控弗丽达带有照相机：“我打开帆布背包，在众目睽睽下，从里面拿出一块面包。如果他们因此而马上要绞死我的话，我必须表现出一种满不在乎的神情。”这只是许多事件中的一桩：怀疑的毒素开始渗入到他们最简单的生活细节中。有一次，弗丽达在海滩上感到欣喜若狂，便快乐地奔跑起来，她的白色头巾在风中飘舞。劳伦斯叫起来：“停下，停下，你这个傻瓜！难道你没想到他们会以为你在向敌人打信号吗？”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笔下描述过的那些狡诈的科尼什人的小眼睛，现在正每时每刻注视着劳伦斯夫妇。直到1970年，住在曾诺的一个男子还在骄傲地展示他曾用来观察劳伦斯夫妇行动的小望远镜。这段时期，科尼什“对外人的怀疑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吉斯彼·奥列奥里在他的自传《书商历险记》1937中对此作了证实。他第一次见到劳伦斯时是在康沃尔。他记得，“曾诺有一个有教养的老妇人”，尽管她在战争中没有失去任何亲人，她说她想绞死德国皇帝，吃他的心”，（弗丽达：“我，这个身处异国的德国佬！”）

奥列奥里在康沃尔还认识一位教授意大利艺术的人，他几年前娶了一个英国女人，放弃了他的德国国籍，成了一个英国人。当他出门去荒地时，科尼什人会尾随而去。在这样的歇斯底里的时期，管闲事的人享受到了英雄主义的荣耀和豁免权，他们随心所欲地对他的住所进行搜查，他的心脏太弱，以至于他无法步行到最近的彭赞斯镇去，当地的商人拒绝给他送去食品和杂货，几个奥列奥里认以的姑娘常给他送吃的。一次，警察找到了一种他留给姑娘们的便条，他那可怜的、只想要一点毫无危害的糖果的请求要了他的命。因为，他的审判者坚持说“小杏仁饼”是他准备给敌人潜艇提供油料的代号。自那以后，他受到他们的折磨，悲惨至极，最后他自杀了”。

这一类故事表明，劳伦斯和弗丽达从未想到他们自己会遭到迫害。8月10日，他给凯瑟琳·卡斯威尔去信说：“我没有告诉过你我有一架钢琴——旧的，表面是暗红色的——五个吉尼买来的——发出美妙古朴的琴声。”就是这样一架旧乐器也招来了麻烦。当劳伦斯和弗丽达在上面弹奏起赫布里底民歌并歌唱时，当地的凯尔特人会以为他们唱的是德文——劳伦斯夫妇有时确实挑战性地唱起一些德国浪漫歌曲。但在当时，犯罪+联想的技巧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科尼什搔乱的最后一章发生在赛西尔·葛雷的家里，这位年轻人对赫布里底音乐做过专门研究，劳伦斯和弗丽达那里的乐曲就是他送的。

葛雷是位作曲家，菲利浦·黑索尔坦因的朋友。他4月再次出现在康沃尔时，没有带上他新婚数月的妻子，她的原名叫明妮·露西·查宁。他住在彭赞斯和曾诺之间的一幢小房子里，并又一次地称赞劳伦斯的著作，这时他

给朋友去信谈起了《和平》随笔的重大意义。夏天，在当局开始严格征兵法时，他变得坐卧不安。在他的自传《音乐椅》中，葛雷说黑索尔坦因患“神经错乱”而有医疗证明，这使他得到了永久的豁免。但他在8月逃到了爱尔兰，在那儿差不多一直呆到战争结束。

在康沃尔，葛雷搬进了鲍斯格兰城堡，它位于紧靠海岸边的一个荒凉峭壁上。劳伦斯夫妇在8月的一个晚上去那里吃饭，对此，劳伦斯在《袋鼠》中作了回忆：

一些人破门而入：“你在打灯光信号！”葛雷后来回忆，有一块窗帘被风吹动，从中透出闪烁的灯光，这使窥探者以为葛雷和劳伦斯在和一艘潜艇联络。一些人在窗下偷听时摔倒在泥里，这使弗丽达很高兴。她记得在成群的人闯进来时，“劳伦斯只是看着这些人，他们的行动是多么果断……所有这些情况与亚历山大·索尔曾尼钦的《古拉格群岛》第一章（“被捕”）中发生的事情相似。

葛雷不得不付了“一笔惩罚性的重款”，而劳伦斯夫妇受到了另一种处罚。10月12日早晨——日前他们外出时，他们的屋子遭到了搜查——从圣·伊弗斯来的一位军官和一个警察来到劳伦斯家，这位军官以前曾拜访过劳伦斯夫妇，并对他们有好感。另外还有两个劳伦斯称之为小丑和狗的侦探。尽管劳伦斯提醒他们，日前他们刚看过他的书信和文件，那个“小丑侦探又开始搜寻，找到了这样一些战利品，诸如毫无意思的《捕豹妇人的歌》的歌词、赫布里底语发音表和一本绘有可疑图表的、劳伦斯在其空页上写有诗歌的大学植物学笔记本。他们查看了碗橱，掀起了床单，并对钟观察了好一会。

然后，军官宣读了命令，劳伦斯夫妇必须在3天内离开康沃尔，并不能住进任何“禁区”，必须向警察报告他们的方向。劳伦斯向军官询问这么做的原因，得到的回答是：“你比我更清楚。”当弗丽达谴责“英国的正义”时，劳伦斯叫他不要开口。“他是如此可怕地沉默着，但英国的严酷又一次刺伤了他的心灵，我知道他比我更加难受”。

此后不久，劳伦斯在给蒙塔古·希尔曼的信中描述了这次经历，蒙塔古·希尔曼是堪贝尔和戈特勒的朋友：“我们对这发生的事情感到莫名其妙。当然，我的妻子通过一位在瑞士的朋友与她在德国的家人有通信联系，是通过普通的邮局进行的。”劳伦斯或许是太天真了，在接到驱逐令的当天，他给辛西娅·阿斯奎斯去信，“我甚至想象不出我怎么会引起怀疑——真是一无所知”。尽管他这么说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像野外的兔子一样，与和平主义活动毫不相干，更不用说任何形式的间谍活动了”。

但军官们持有少将威威·乔治·巴尔弗·威士顿爵士签署的命令。他是前次非洲战役和这次战争的一个灰白头发的幸存者，在这次战争中他受了伤。在他在萨利斯伯力的办公桌上，劳伦斯夫妇的讨厌的名字出现在一张行政命令上，要他签署。科尼什人——赛西尔·葛雷写道——“是我所遇见过的最古板严肃，不讲情面的人——他们总想指控别人。劳伦斯夫妇没有听到传讯，便于10月15日离开了康沃尔。”

威廉·亨利·霍金是Blutbrüderschaft（德语：血缘兄弟关系——译注）的候选人之一，他开车送劳伦斯夫妇去了火车站。他已变得小心谨慎，他的一些家人没有去和这两个流亡者告别。在《袋鼠》中，劳伦斯生动地描述了乘坐大西部特快去伦敦的情形。车上到处飞扬着从普利茅斯来的士兵和水手的歌声。妻子为能离开康沃尔而如释重负，但丈夫“坐在那里，觉得自己已

经被杀死了……他总是对任何事情过分相信——社会，爱情，朋友，这是他信任感的一次沉痛的破灭”。

弗丽达在《不是我，是风》中说，“当我们被逐出康沃尔时，有些东西在劳伦斯身上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次经历加剧了他对任何形式的制约的憎恨，并使他对民主的进程永远失去了信心。

（六）无休止的战争

劳伦斯打电报给杜丽·拉德福德，询问他和弗丽达到达伦敦时是否能在她家躲避一下。拉德福德夫人感到害怕，但还是对他们表示了欢迎。10月16日，在他们到达伦敦的第二天晚上，劳伦斯到辛西娅·阿斯奎斯夫人战时住所波特曼大厦拜访。她在日记中写道：“他看上去病得很厉害，——似乎他身上的每一根神经都暴露在外。”他在抱怨，因为他必须向警方报到。但那次经历后来使他感到可笑，因为那里的警察从未听说过劳伦斯夫妇，显然，“军警两方的合作不是太好”。在给葛雷的信中谈到这一点时，劳伦斯又一次将伦敦当作了地狱来描画：人已不再是人，而成了“影子，像狐猴，实在可怕，像死者的丑恶的幽灵，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怎样才能逃出这个地狱”？

在一封从麦克仑伯力广场44号（这幢房子因住文人而著名，它在二次大战中被炸毁）发出的信中，劳伦斯记叙道：“希尔达·阿尔丁顿暂时把这里的房子借给了我们——这是一间很漂亮的房子。就住房而言，我们现在是安然无恙了。”谈到康沃尔，“我对我的那‘案子’的情况没有更多的了解，但辛西娅·阿斯奎斯正在询问，我希望它能得到解决，我想在圣诞节前回康沃尔”。

几天后，他告诉卡斯威尔夫人，拉纳尼姆又有希望了，现在移到了南美洲。他们只要一得到自由，“我们将向我们的岛屿驶去——现在是在安第斯……伊德对这个国家很了解”。现在这个拉纳尼姆中的成员包括伊德先生和太太、威廉·亨利·霍金和葛雷，可能还有希尔达·阿尔丁顿，或许还有考特和多萝西·约克”。他希望卡斯威尔夫妇也能去，尽管卡斯威尔夫人当时正怀着身孕。

多萝西·约克对劳伦斯一帮人是一个有趣的补充，她是个美国姑娘，大家都叫她阿拉贝拉，像H·D·一样，她来自宾夕法尼亚。希尔达·杜利特尔出生于伯利恒，而多萝西·约克则是出生于附近的雷丁。1917年，她25岁，比H·D·年轻6岁。这两个女人的一些异同之处在阿尔丁顿的小说《一个英雄之死》（1929年）和H·D·的《令我活着》（1960年）中有过暗示。后一部作品中提到弗丽达怂恿劳伦斯去和H·D·相爱，这样弗丽达自己就可以与葛雷去恋爱了。事实上，H·D·是和葛雷私奔的。

劳伦斯夫妇住在麦克仑伯力广场大楼一楼前部的阿尔丁顿的房间里，而多萝西·约克此时住在顶楼。“一切都令人愉快”，劳伦斯后来回忆说。多萝西是由作家约翰·考诺斯带到这个地方来的。就在劳伦斯夫妇离开康沃尔时，约翰·考诺斯和休·瓦尔波以及其他英俄委员会的成员去了彼得格勒。考诺斯生于俄国，在战争前他试图将流浪者的生活方式带到费城时遇到了多萝西·约克。

在19岁时，他在他的自传中回忆，她是“一个身材颇长苗条、体态优雅的姑娘，长着乌铜色的头发，褐色的眼睛，高高的颧骨如出自雕刻，她的肤色我得称之为红润……我认为，她还有一种娴静，含而不露的美，带着些异国情调”。这是劳伦斯《阿伦的杆杖》中的乔斯芬妮，“一个浮雕似的小姑娘，整齐的黑头发在头上紧紧扎成活泼的法国发式，她有对奇怪而撩人的瞳仁，她的肤色红润无比”。劳伦斯通过乔斯芬妮将她置身于和阿伦的恋爱之中，描写她“用她的舌尖迅速地“舔着”他相当丰满，干燥的红嘴唇，这是个怪僻的动作，使人联想起蛇吐舌的动作。”她的娴静中具有一种波希米亚

人、或巴黎人、或美国人而不是英国人的那种矜持”。

考诺斯热烈地爱上了她，时而，她也对他的感情给予回报。每当他以为自己已经摆脱了她时，恶作剧似的巧合会让他们重新碰到一起；甚至不知道她在欧洲，他也竟会在巴黎或伦敦的街上撞见她。在最后一次这样的相遇之后，在 1917 年，她向他保证她爱恋着他，但当俄国革命中止了他的使命而回来时，她告诉他，她已经和他的一位挚友理查德·阿尔丁顿相爱了。

阿尔丁顿曾多次抱怨，那些在 1917 年帮助过劳伦斯的人，几年后发现，《阿伦的杆杖》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讽刺”，除了多萝西·约克作为其中的乔斯芬妮之外。阿尔丁顿是罗伯特·坎宁汉（“一个精力充沛、胖乎乎的、穿着一身卡其衣服的英国人……他总是大口大口地喝红葡萄酒”）。希尔达·阿尔丁顿是罗伯特的妻子，叫朱丽叶，（“高高的个子，像头牡鹿似的，她躬着身坐着就像个女巫……她把她棕色的头发梳成了笔直而零乱的小束，但她仍有一种真正的美质”）。而奥古斯特·约翰则是艺术家斯特鲁瑟斯，他风度不佳，在看歌剧时总是唠叨不休。赛西尔·葛雷是赛利尔·司格特（一个娘娘腔的、面色苍白、体形微胖、戴着夹鼻眼镜的年轻人，穿着黑色的外套。）辛西娅·阿斯奎斯还记得那次演出。在去剧场的途中，她和劳伦斯在约翰的工作室前停了下来，在那里，劳伦斯喊道：“让死人去画死人吧！”约翰在他的《明暗对比法》中记述道，歌剧结束时，“劳伦斯声称他想学狗叫”。

在《阿伦的杆杖》中，代表人物和他的杖杆出现在和坎宁汉一帮人的一个妇女的恋爱事件中，但或许这次经历应该归咎于劳顿·利利。劳伦斯在第二年春天在伯克郡创作《阿伦的杆杖》时，（他于 1921 年在意大利完成了这部小说）沉重地被 1917 年后期的伦敦所牵扯。但如果说他漫画了他的熟人和对他友善的人的话，他也在嘲讽他自己，（书中他自己为劳顿·利利）特别是在“风中的拳击”这章中，吉姆·布利克纳尔的拳头击在“空谈”预言家的肚子上。

在阿尔丁顿夫妇重新想要回他们的房子时，劳伦斯夫妇在 12 月搬到了伯克郡拉德福德夫妇的小别墅，这件真实的事就发生在这里。劳伦斯在中西部地区度过了圣诞节，然后他和弗丽达在 1918 年的第一季度就住到这个偏僻冷落的住所，就在那里他接待了后来成为《阿伦的杆杖》中吉姆·布利克纳尔的那个人，这是他塑造的最成功的喜剧人物。

劳伦斯让他首先出现在肖特庄园，这又是一个兰姆庄园的变体。他给了吉姆一位爱尔兰母亲——这是重要的一笔——至于父亲，那是一个与剑桥出身的巴勃家人截然不同的人：阿尔弗雷德·布利克纳尔就是当年刁难童年时劳伦斯的煤矿帐房的阿尔弗雷德·布伦特纳尔。需要提醒的是，早已在《儿子和情人》中对他的丑恶嘴脸进行过刻划。现在，他把他置于煤矿主的家里，留着胡须，说话带着一口中西部地区的口音，以及其它一些什么。劳伦斯可能在暗示那个下流社会的小人物正跻身于上流社会，这是 20 世纪小说家惯用的主题——普鲁斯特以描写粗俗的暴发户取代了巴黎社会上层的贵族，弗克纳的野心勃勃的斯诺普斯家族也是这一类人物。但劳伦斯把布利克纳尔的儿子吉姆塑造得过于粗糙了。

在《阿伦的杆杖》的“风中的拳击”这一章中，吉姆用电报自邀自请，到利利和他的挪威妻子泰妮的乡间“劳动者别墅”去作客。他以前是军官，但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非常无能而又十分激进的革命

者”。他觉得利利是英国唯一能“帮助”他的人，尽管他不能回答利利的问题：“帮什么？”幻觉告诉他，日本和爱尔兰是“这个世界的两极”；当问他为何有这种幻觉时，他只是说那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他吃个不停，不是狼吞虎咽地吃饭，就是慢慢地咀嚼一块面包，好像是在填补内部的空虚。在用餐时，他不停地喘着气说，献祭是多么美妙，基督是多么辉煌。

利利最后告诉他，说他希望他能离开。吉姆的爱是混乱的：“假如你没有遇到不幸，它是无关紧要的。但当你由于一时疏忽而踉跄摔倒在地时——这时吉姆就会放马后炮：“我知道我该提醒他的，假如他多说一句话，我知道应该我去干了。”他对泰妮这样说。在劳伦斯笔下最富于讽刺性的喜剧场面中，利利坐在那里极力想喘过气来，并没想到他们两人看到他气喘吁吁的样子，而吉姆则不停地在说他喜欢利利“胜过我认识的任何人”，泰妮在不住地埋怨她的丈夫，并问他想要什么。

吉姆·布利克纳尔的原型是一位元帅的儿子。这位元帅是波尔战争中取得成功的几位将军之一，他儿子以高登苏格兰高地联队成员的身份也参加了这次战争。这个儿子，詹姆斯·罗伯特·怀特（1876—1946）上尉在1913年都柏林运输工人大罢工期间，帮助组织过爱尔兰国民军。在那里的工人阶级生活条件之差是举世闻名的，因此罢工开始时，工人们得到整个世界的同情，但杰克上尉训练的部队因为使用爱尔兰棒球的球棒施行了骇人听闻的暴行，这使他们失去了许多这样的同情。

和吉姆·布利克纳尔一样，怀特上尉曾一度不准在爱尔兰居住。劳伦斯在伦敦遇见了他，当时他正在代表罢工者召开会议，他们之间的这种交往持续了下去。在一次大战中，他和法国的红十字会一起工作。但在1916年因企图在威尔士组织煤矿工人罢工而服了3个月的刑期，这次罢工是为了向政府讨价还价，以制止处决詹姆斯·考诺利。怀特写了好多政治传单，并在1930年撰写了自传。他的自传使一个评论家认为。假如怀特上尉试图把自己说成是恶棍，那么其大部分恶行就都是明知故犯。这本书有个恰到好处的布利克纳尔式的名字：《不合时宜》。

不受人控制的杰克·怀特不是劳伦斯此时期认识的唯一的实干人物。很难把他看成是为苏维埃干事的人。但在1918年2月16日的一封信中，劳伦斯向凯瑟琳·卡斯威尔暗示他可能给最近派驻英国宫廷的苏维埃大使麦克西姆·列特维诺夫当助手。

因为英国拒绝从大使馆驱逐沙皇官员，列特维诺夫夫妇就在维多利亚大街的办公室里建立了“人民大使馆”，并招聘志愿者。劳伦斯告诉卡斯威尔太太：“如果你见到伊弗，请代我告诉她，我很高兴列特维诺夫得到了这个办公室，我希望她成为真正的大使夫人，我真是这么想的。这事让我感到十分鼓舞，我坐在这里喝彩。我几乎想问列特维诺夫我是否能帮什么忙——但我不认为我在这方面存多大的用处。告诉伊弗，如有什么有趣的事，我十分希望她能写下来。”——很显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当《恋爱中的女人》于数年后出版时，列特维诺夫可能会很惊奇地发现一个次要人物的名字叫麦克西姆·列比德尼柯夫，但这里有部分是柯特连斯基的形象。黑索尔坦因的一位朋友，鲍里斯·德·克鲁斯晓夫曾告诉本书作者，说自己是列比德尼柯夫的原型。）

此时，劳伦斯给戈特勒去信：“我不喜欢你上一封谈论妇女的信——即卖淫问题。我对妓女有着审美上和生理上的反感——她们在我的鼻腔内发出

臭味。”他正在写作有关“美国的”文章，但怀疑它们是否能“被发表，因为这个世界还维持着现状。确实，这世界看上去已摇摇欲坠了。但该诅咒的是，它还将这样摇摇晃晃地再维持一个世纪而不倒塌。”杜丽·拉德福德（她的丈夫精神失常了）现在想要回她的房子。“我现在钱囊空空，并且没有任何筹款的地方。你想你是否知道什么人能够资助我们让我们维持一下。这个该让我诅咒——这个该死的、吝啬的、鸡肠狗肚的、可鄙的、蠕动着，满是杂种的世界，竟然不让一个人工作，甚至不让他活下去”。他患喉炎已有三周了，“此病使我产生一种失明似的奇怪感觉”，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如今人们可以什么事都不干，而是回头看着身后是否有谁在跟上来，在你脖子后面可怕地来一下。”

在戈特勒的建议下（劳伦斯给他的一封信中表明了这一点），蒙塔古·希尔曼给劳伦斯送去了十镑。劳伦斯将这钱看作是礼物，这一点在他写给希尔曼的感谢信中写得很清楚：“我从没有这样窘迫过——在金钱和其它方面——真糟糕。但我不介意从你这儿得到一点，是的，我是高兴地从我手里拿到这钱。有人得必有人失。但我对此是无可奈何。像我的代理人平克这样该死的人，就只是用一种使人恶心的恩赐态度，将一条诱人的鱼挂在线尾，每封信都那么拉动一下，让我可望不可及。”

这里有句反话。“希尔曼 1916 年 10 月给戈特勒去信，“钱是个可怕的东西，我想让你知道，不管怎样，你始终可以随心所欲地从我这儿拿去你需要的，但这必须是在朋友之间，而且无论如何不能有任何恩赐和被迫的感觉。我不想做康威或艾迪·马什——我并不对艾迪·马什有什么微词，我相信他的用意是善良的”。1922 年劳伦斯从新墨西哥给柯特连斯基去信说：“我终于归还了艾迪·马什和奥托琳娜很久以前给我的那点钱。”马什的记录和希尔曼的显然不同，马什说劳伦斯在信中明确表示要求借款，而劳伦斯是怎样将钱还给仍在为《恋爱中的女人》而生气的奥托琳娜夫人的就不得而知了。不管怎样，这和希尔曼完全是两码事，他看上去总是在送赠而不是借出。1928 年希尔曼在给劳伦斯写信时重提了此事，他对他们之间的友谊的淡漠表示遗憾，并询问，他是否能够免费得到一本私印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作为他 10 个英镑借款的偿付。1928 年 4 月，劳伦斯给柯特连斯基去信说，希尔曼的信使他觉得“要疯了”。但他立刻寄给他 10 镑，“我不记得那笔借款了——如果他借出了，我想信他给了我一种赠送的感觉。”

到他们离开伦敦为止，劳伦斯知道他们一直在人监视之下：阿尔丁顿、葛雷和其他的客人都发现过密探在大厅里窃听。在麦克仑堡广场举行过一些聚会，诗人们在争论，还扮演伊甸园的哑剧。弗丽达记得这哑剧的情形：“劳伦斯是上帝，H.D. 是那棵树，理查德·阿尔丁顿舞动着一朵大菊花，他是亚当，而我是蛇，我对我扮的角色有些害怕。”但真正的蛇是躲在门外的密探。

甚至在伯克郡，劳伦斯夫妇也受到监视。密探还去找过威克利教授，问他是否有任何可以用以指控弗丽达的情况。在这段时间，她见到了她的儿子蒙塔古，他穿着军官训练队的军服，她的话使他吃惊：“让我把你藏在什么地方——一个山洞里或树林里，我不希望你去打仗，我不希望你在这场愚蠢的战争里被打死。”

弗丽达曾写信给辛西娅·阿斯奎斯说，妇女应该制止战争：“你在我看上去像画中的西爱那·圣·凯瑟琳。”

劳伦斯很喜欢伯克郡。他在《阿伦的杆杖》中以汉普郡的名字描写了这个地方的美丽。在《袋鼠》中它则是在牛津郡的伪装下。在他的中篇小说《狐狸》中，他用它的原名描绘了这个地区，并提到它西边的白马山。劳伦斯为他故事中人物形象选用了靠近赫密泰治的格里姆斯伯力农场上两个他所熟悉的姑娘。他和弗丽达从拉德福德家搬出来后曾在格里姆斯伯力住过。《狐狸》最初创作于 1918 年，1921 年在西西里正式定稿。在故事中，那两个姑娘——她们的真名是凡尔列特·蒙克和赛西莉·莱姆伯特——成了纳莉·马奇和吉尔·班福德。吉尔·班福德可能还部分取材于杜丽·拉德福德的女儿玛格丽特，劳伦斯不喜欢她。十分滑稽的是，狐狸似的劳伦斯总是不断地在信中抱怨玛格丽特·拉德福德想把他从赫密泰治赶走，而这恰巧是在故事中她的形象对那个年轻人想要做的，但在那里她失败了。

但在生活中，劳伦斯被迫离开他心爱的伯克郡。他在那年冬天写给赛西尔·葛雷的信中谈到了这事：“我不再需要大海、天空和那些抽象的东西，在树木身上存在着某种辉煌的东西……我从来不知道树才会是这样使人宁静，心平气和——许多的树、空地上的一片片阳光和树的精灵——这就像获得了新生。在这时候想到大海肯定会使我战栗。”

他下一步行动是向北，回到中西部地区。4 月 3 日他写信告诉凯瑟琳·卡斯威尔说，他和弗丽达准备去利普雷，到埃达家作客一周，埃达在渥克斯渥斯附近给他们找到了一幢房子，这是他在德比郡的祖先比尔德骚的家。劳伦斯对卡斯威尔太太说：“哦，上帝！那些炸弹！有一颗竟落在麦克伦伯力广场 42 号院里——44 号的后窗都被震碎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没在那里。”但他也有一些令人高兴的消息，这是有关他未发表的手稿的情况：“我没有告诉过你，乔治·莫尔读了《恋爱中的女人》，并说这是部杰作，说我还是个比他还好的作家，这实在使人大吃一惊。”

劳伦斯和弗丽达喜欢密德尔顿和渥克斯渥斯的这幢房子，在他们启程回南方时，埃达出钱为他们安排租下了它，租期一年。回到赫密泰治，劳伦斯阅读了吉朋的作品，并且对“那些古罗马的皇帝很感兴趣，”——实际上，他喜欢吉朋的所有著作。从吉朋那里他为不久后动笔的历史教科书获益不少。他暂时放下了《阿伦的杆杖》，开始为两本诗集的出版作准备。《海湾》直到 1919 年才出版，《新诗》是他 1918 年出版的唯一的书。他上年出版的唯一的一本书《瞧，我们走过来了！》还没有得到评论者的宽厚对待。1917 年 12 月，他向艾米·罗威尔抱怨：“像以往一样，评论家对我进行了攻击，《泰晤士报》说，缪斯只会在痛苦的厌恶中转过她的脸去。可怜的缪斯，我感到似乎因为我目光短浅而当众侮辱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处女。”劳伦斯绝没有想到伯特朗拉塞尔对此书的评价，奥托琳娜·莫瑞尔在早餐后给他看了这本诗集。奥托琳娜的女儿温诺格拉朵夫太太在一封信中回忆起拉塞尔的评价，“用他带鼻音的干巴巴的嗓子说：‘他们也许是走过来了，但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看的！’”

事实上，劳伦斯的创作在这些年里，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很少得到过赞扬。当他在中西部地区住了一个多月以后，他从山庄给戈特勒去信：

我收到了你昨天的来信——情况是严峻的。我刚填写了经费申请——希望从皇家文学基金里得到些帮助——但我没有低声下气和阿谀奉承。因此可能什么也得不到。诅咒他们，只能这样——再次诅咒他们，他们这些文坛的肥蚤们。

我收到从康沃尔寄来的要求重新参加体格检查的军方文件——已寄回去了——但也许哪天又会收到从德比寄来的。再次诅咒他们——不管怎样，我不会被人强迫去作任何形式的服务。你的“任职”可能使你再次上当，”让一切都毁灭吧，在这地球上没有任何希望——在这里的人们身上看不到一丝希望，我敢断言……

我们正在我出生的地方——伊斯渥度过这一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这地方感到一种亲切感——我一直恨它，但现在我不恨了。

劳伦斯以前告诉过辛西娅·阿斯奎斯，说他感到像奥维德（公元前43—17年，拉丁诗人——译注）在特洛西亚的流放中，在被称为维亚戈利亚的峡谷山边的别墅里，尽管那里景色美丽。这别墅“位于阴暗的中西部地区，”他告诉卡斯威尔太太，“靠在一个陡峭的深谷边缘，俯瞰着微暗层叠的山丘，这正是海洋的英格兰，在感觉上也正是这样。”

多萝西·约克在6月里作客于山庄，而“悲伤涕下”地回到伦敦，沉浸在与《阿伦的杆杖》中她的对应人物的相同的情绪中。在这时，劳伦斯向戈特勒问起了奥托琳娜·莫瑞尔的情况，“她是否能够再来看我们——或者我们去加辛顿？我似乎觉得我们或许有可能”——这与他在3个月前对戈特勒的抱怨截然不同，他抱怨那个“老朽”正企图阻止《恋爱中的女人》的出版。说劳伦斯对冷落的别墅感到厌倦，并向往温暖宽敞的加辛顿是很容易的：如果手头没有劳伦斯的极端的独立性的证据，这样说确实很容易。实际上，他是喜爱奥托琳娜·莫瑞尔的，尽管他在她身上发现了那些缺点。但他在时隔10年之后才重新成为她的朋友。（而她再没有从《恋爱中的女人》恢复原状，直到1932年她还向柯特连斯基描述说此书是“如此可怕……一本邪恶、杂乱、充满恶意的书”。

劳伦斯对民主失望的一些新的经历增强了他对贵族政治的敬重。他在7月3日写信告诉赛西尔·葛雷，他将为牛津大学出版社撰写一部历史教科书，他沉浸在“一种缅怀历史的心境里”。并认为人们几世纪来没有多大变化。他发现人类的大多数种族都不值一提，这些种族需要几个强人的“恰当的统治”。但这又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只有在愿意接受统治时才被统治，而这是可鄙和虚伪的”。这些观点可见于劳伦斯的一些作品中，它们引起了强烈的异议，尤其是他在结尾段落中所说的，欧洲的控制将依靠“一个被挑选出来的伟大人物”，他将“凌驾于人民的意志之上”。劳伦斯通篇都在称赞强人，甚至是俾斯麦，英国人民把当时那么多的苦难都归咎于他，而劳伦斯却觉得俾斯麦“相当伟大”。数年后，他在一首赞美阿迪拉的诗中，戏剧性地称他为“傲慢的小东西”，他“走起路来昂首阔步，神气活现。他快速地转动着眼珠子，使人望而生畏，他并对人们的这种敬畏颇为自得”。吉朋对阿迪拉的部分描述将表明劳伦斯从他的先师那里所获得的巨大的恩惠，“匈奴皇帝的这种昂首阔步的举止表现了其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优越感。他有一种快速转动眼珠子的习惯，似乎他乐意看到自己的这一动作所引起的那种敬畏感。”

其它的段落显示了一些类似的派生。虽然劳伦斯在那本书中加进了不少自己的东西，这些描述，不管抄袭与否，远比一般学校的教科书要生动得多。劳伦斯的一位出版界的朋友维尔·H·柯林斯在给本书作者的信中说，他对劳伦斯的历史知识印象深刻，并认为他不应该去写一本正规的、连贯性的教科书，而应该写一系列有关历史人物和活动的生动短篇。他建议以《欧洲历史

动态》为书名。“我认为这想法不错，于是我说服了我的负责人，剑桥大学的出版人汉姆弗雷·米尔福德（后来的汉姆弗雷·米尔福德爵士），让我去劝说他写本书交给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此书在1919年初完成后，“米尔福德把它送到剑桥让一个或更多的历史学专家阅读，我想信它得到了C.L. 弗莱切尔的首肯（他是克莱恩顿出版社的代表）。唯一的批评，我所记得的。是一些有关日期和人名的细节”。劳伦斯，这位被禁止创作的作家，同意在封面上使用化名：当此书在1921年出版时，它的作者署名是劳伦斯·H·大卫森，但在后来的版本上署的是劳伦斯的真名。

他甚至为1925年的插图版撰写了后记，但剑桥因心有余悸而没有发表，主要原因是因为像其它几次一样，劳伦斯同时提到了新任首相大卫·劳伊德·乔治和《约翰牛》的主编赫拉迪奥·鲍顿姆利，他当时因欺骗罪正在服刑。遗憾的是牛津拒绝发表这篇后记，因为此文本可以进一步澄清劳伦斯的法西斯主义者的罪名。幸运的是，这篇后记由詹姆斯·T·波尔顿在他1971年出版（为牛津）的《欧洲历史动态》上重新选用。它表明劳伦斯在1924年就写下了，“就个人而论”，他相信“一个好的社会主义体制，如果它能形成，将会是最好的政体”。如果它不是一种暴力的体制，就像劳伦斯认为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那样：在那里，共产主义者在“强迫推行他们的意志”的努力中取得了成功。他特别提到“在靠近佛罗伦萨的菲埃索尔，意大利法西斯党徒在半夜突然闯进了村长的家，当时他全家都在睡觉，村长被迫起来开门，法西斯分子抓住了他，将他推到他家的墙边，当着他妻子和孩子们的面开枪将他打死了，当时他们都穿着睡衣”。村长被杀是因为他是个社会主义者；法西斯主义“只是另一种暴力形式”。如果劳伦斯知道希特勒的话，他会更加强烈地反对纳粹暴行的。这里或许还应提到另外一点，有许多对劳伦斯一知半解的人认为劳伦斯的“血统意识”和纳粹的“血统论”理论相似，但劳伦斯所寻求的是一种均衡；如果说他强调血统的话，他是将它与人类过分发达的理智作均衡。希特勒和他的党徒并没有这种意图：他们只是要毁灭理智本身。

劳伦斯在为他的历史教科书的初版忙碌时，他和弗丽达在1915年8月离开密德尔顿一段时间，到伦敦（像以往一样的“乏味和荒诞可笑”），又去了赫密泰治，然后去迪恩森林探望卡斯威尔夫妇。劳伦斯穿着他唯一的一条打满补钉的裤子，比卡斯威尔夫妇见到他的任何时候都显得年轻和高兴。他对他们的3个月的婴儿（约翰·帕屈克·卡斯威尔）很感兴趣，弗丽达为婴儿绣了件上衣，劳伦斯将他的诗《战时婴孩》奉献给了新生的小卡斯威尔。他后来在他的短篇《盲人》中用到了卡斯威尔夫妇当时居住的教区牧师住宅。在故事中卡斯威尔太太成了伊莎贝尔·普莱温，“在她身上没有什么特别像我的地方。”凯瑟琳·卡斯威尔写道：“其描写都是可以轻易地被否认的，但有些事实使我感到极度不安，就像我不怀疑凯瑟琳·曼斯费尔德在《恋爱中的女人》中读到古德仑时为其真实性感到极度不安一样，或如多萝西·布雷特读到《公主》一样。这里虽无生动的描写，更没有总结和归纳，但这确实是一次对生活的脉动无法逃遁的阅读！”

在他回到密德尔顿后不久，劳伦斯9月11日给唐纳德·卡斯威尔去信：“今天是我33岁生日——神圣的年岁——来了文件叫我去进行体格复查。我决心对这些猪猡的命令置之不理。”第二天他写信给辛西娅·阿斯奎斯，求

她帮助他找个战争服务的工作：“我会打字——相当不行——不会速记。”这是他的命运的最低潮的标志：“当然，我是个有用的人，”他向阿斯奎斯夫人保证道。他还给在情报部的阿诺德·班内特去信：既然班内特认为他是个“天才”，他是否能帮他找点事干。弗丽达回忆，班内特回信说这不是他该为劳伦斯找事干的理由。凯瑟琳·卡斯威尔合情合理地评论说，劳伦斯的天才在班内特管辖之内的任何岗位都会成为不利条件。卡斯威尔夫人认为劳伦斯应该去学校授课，但又疑虑“有哪一个学校会向一个其著作因内容淫秽而被公开起诉的人敞开大门？”劳伦斯在后来才发现班内特私下替他还了平克的钱。劳伦斯后来询问平克那个替他偿还借款的“E·A·班内特是谁”，1930年劳伦斯去世一个月后，在许多讣告充满恶意的時候，班内特曾为他写过一些同情之词。但班内特后来又说，他决不会像E·M·福斯特那样，称劳伦斯是“他那代人中最伟大的、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

12月26日，劳伦斯到德比的一所学校里报到进行体格检查。在《袋鼠》中，这作为索默斯的一段经历是写得十分透彻、尖锐的：“他用他那可笑的瘦腿站在那里，穿着可笑的瘦上衣，但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傻相。”在这里，在他自己的同胞中间，他却被另眼相看。（“他们认出了他，但又好像没看见他。”）好像他没有在康沃尔进行过体检一样。这时他的脸色镇静，尽管他知道自己脸色是苍白的。并微微地抬起头，像狗在表示厌恶、深沉的、毫不慌乱的目光使鉴定桌旁的人都鸦雀无声，甚至是那些自负的医生。“直到他走出大门，上衣遮到他的瘦腿上，翘着胡子，走出门去，”他们才“抬头发出最后的一声讥笑。”

假如劳伦斯——索默斯感到自己受到了某种迫害的话，他是无可指责的。尽管他自己家乡中西部地区的人民不是康沃尔的偷偷摸摸的窥视者。既使在诺丁汉和德比这种地方，他们也感到了这场战争不仅仅是劳民伤财。7月在诺丁汉的一家军火工厂发生了爆炸，而前一年伦敦警察局在德比发现了一些不抵抗主义分子企图暗杀劳伊德·乔治的阴谋。劳伦斯，不管他怎样引起了热情的爱国主义者的怀疑，知道他自己实际上是无罪的。但像许多他身前后的人一样，他是一个在这个恐慌的年代里因头脑过分简单而自上邪路的那些人的牺牲品。

在《袋鼠》中，劳伦斯——索默斯看到一个人的身体像家俱一样被人摆弄，决意不再让自己的身体“被人触及，因为他们摆弄了他的私处，并仔细查看。他们的眼睛该爆裂，他们的手该萎缩，他们的心该腐烂。”

劳伦斯在作完体格检查回到在山庄的家后，写信告诉辛西娅·阿斯奎斯说“这些该诅咒的人”，再也别想“粗鲁地摆弄”他了。他再次请她帮助，希望能在教育部给他找个工作，他已受够了“像个旧罐子似地被人乱踢……如果军界的恶棍要我干任何他们的脏活——我只适合干案牍工作——我将干脆搬家，做个逃兵。”同晚他给卡斯威尔夫人去信，说他“已厌倦了社会和人——工党和军队——统统都见鬼去吧。”他想寻找快乐的个人生活，和几个友人一起相处，其他人爱怎么干就让他们怎么干吧”。

他的心酸从来不是因为反对生活本身，而是反对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蠢事。他的愤怒是对着大楼里的钱商，而不是对着大楼本身的，甚至也不是，确实不是，对着钱币本身的。而除了他有时的愤怒外。正如他所言，他通常是“快尔的”。就是在他去伦敦的这段乏味的时间内，病中的凯瑟琳·曼斯费尔德在信中记述道，劳伦斯还一天天来到她床边宽慰她，“还是他那个快

乐，风趣的老样子，谈笑风生地对她描述各种事情，并进行形象的描绘。对未来充满了激情和兴奋……那时我们都将成为‘流浪者’，哦，在他身上和他的渴望里和他对生活的那种热情渴望中有着一种十分可爱的东西——只有充满情爱的人才能这样。”

凯瑟琳·曼斯费尔德这个以前曾嘲笑过拉纳尼姆的人，现在看来几乎也在向往这一梦想了。莫里从他战争办公室精疲力尽地回到家，听到这些有关将来在另一国家的新生活的快乐交谈，感到“格格不入”。一位专家告诉他，但没有对凯瑟琳说，如细心照料，她还能再活四、五年：“在这样渺茫的前景中，你是不可能在一个新的国家里开始新生活的。”

劳伦斯和弗丽达在伦敦得了流行性感冒，11月回到赫密泰治去疗养。他们原不准备回德比郡，现在打算回去，可能因为他们的出走惹恼了为他们付房租的埃达。从赫密泰治劳伦斯给艾米·罗威尔去信，谈起了他刚完成的一个剧本《一触即发》，这是《恋爱中的女人》的姐妹篇，有几个相同的人物，但丝亮没有小说中的那种魅力。“它灭亡的魔符可能不是狡诈而是过分的诚实，”他在信中对艾米·罗威尔这样说。而凯瑟琳·曼斯费尔德却发现此剧本是对矿工们的玷污。

停战时，劳伦斯夫妇在赫密泰治。在《袋鼠》中，索默斯和哈利叶特“在遥远的乡村小屋唱起了德国歌曲，她哭了——他不知道这是为了何故”。理查德·阿尔丁顿证实劳伦斯夫妇在那里度过了11月11日这一夜，但大卫·加纳特坚持说他们是在蒙塔古·希尔曼在埃德尔菲的寓所的聚会上。奥斯伯特·斯迪威尔爵士和其他人曾对这次聚会有记述，布隆姆斯伯瑞的许多人在那里进进出出，或来到他们在高登广场的旧总部。加纳特回忆，劳伦斯在希尔曼的聚会上发表了言辞激烈的长篇反战演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加纳特在给本作者的信中说，“这天的所有事情我都记忆犹新，我从那天起开始了一个农业工人的工作，那天晚上给我的印象是，我的自我解放突如其来。当然，我对劳伦斯杞人忧天的悲观主义是不感兴趣的。”

加纳特在其它场合记述，在希尔曼的华丽堂皇和充满欢乐的骚乱的聚会上，劳伦斯“指出一场更厉害、更具毁灭性的战争将随之而来。”劳伦斯以这种“预言和仇恨的情绪”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劳伦斯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提前了大约20年。最起码他应该受到称赞，因为他透过这纵情狂欢的停战之夜，看到了这场大战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即使是同在聚会上的卓越和老练的肯尼斯在几个月后才发现了这一点，并在1919年写的《和平的重大经济意义》中提出了这一看法。

（七）再见，我的英格兰

停战后，弗丽达继续留在伦敦，而劳伦斯则尽本分地回到了德比郡。从那里，劳伦斯以抒情的笔调给凯瑟琳·曼斯费尔德写了一系列十分精彩的信。他从11月底到达当地开始，描述了那个漆黑的、下着瓢泼大雨的夜晚。当地的马车夫等在他称之为“维克塔赖”的地方，随后在黑暗中“穿过哗哗积水的道路”到达了小屋。邻居道克西太太在壁炉里生起了火，准备了茶。第二天清晨“世界变得很像麦克佩斯眼中的景象——头顶上是褐色的落叶松的小枝，棕色卷曲的欧洲蕨蔓延到屋檐的阴影里”——在写给伦敦的那位病中的妇人的信中，他几乎都用了这种抒情的笔调。给她写信时，劳伦斯在进行创造性的、富于想象力的思考。他后来在故事中使用了这些诵现在他散文体的信中的这些构思和笔调。

如有一次，劳伦斯告诉凯瑟琳，在大雪后，有一只雉跑到了他们的屋子附近来躲避，对这只雉的描写（“绿色的头和长长的笔直的羽毛清晰可见，仪态端庄地站在雪地里”）能和劳伦斯在给辛西娅·阿斯奎斯的信中所描绘的那只孔雀相媲美。他想象这只孔雀在半空中被两条狗咬伤，鸣叫不止直至跌落到地上，“一个妇女从不远处的小屋中跑过去，说它会好的”。这些记忆和形象不断溶合，可能触发他写作了《冬天的孔雀》这个故事。

在写给凯瑟琳·曼斯费尔德的另一封信中，劳伦斯谈及了12月乘火车在渥克斯渥斯和利普雷之间的一次旅程。旅途中，他看到从巴特雷水库那边的钢铁厂升起的火光，映照在月台上，将一切都映得通红——有一个人长着暗红的眉毛，奇怪得不像个人。我能为他写个故事，他使我想起了埃舍班尼帕尔（阿西利亚的最后一位君王——译注）。劳伦斯确实创作了一个故事，开头是这样的：“当他在人群前转过头来时，火光映红了他的脸，月台上的人群中都是一张张映红在火光中和藏在黑暗中的脸”——这篇故事，《凡尼和埃尼》，像《冬天的孔雀》一样被收入了在1922年出版的《英格兰，我的英格兰》短篇集中。实际上，《凡尼和埃尼》是一篇战前的故事，开头的段落可能是后加的。

在一封显然是写于1918年12月初给卡斯威尔太太的信中，劳伦斯提到了他另一种最新的尝试：“我为《泰晤士报》写了四篇小文章——《人民的教育》——很不错，但很革命。因为谈的是教育，不是政治，弗利曼本可以出版这些文章的”——但他没有。乔治·悉尼·弗利曼，这位《泰晤士报》的编辑将文章退还给了劳伦斯，建议把它们编成集子。劳伦斯1920年在西西里显然作了重写，但它们直到他死后才被收入《长生鸟》得以发表。劳伦斯在1918年晚秋写的这些文章的动机，可能希望想使自己成为某种教育权威，以便在这一领域获得一个行政职位。

在一封1918年12月6日写给伊利诺·法基昂的弟弟赫伯特的信中，劳伦斯向他借阅人人出版社版的《夏勒曼传奇》（布尔芬奇著）作参考用，但看来他没有将它作为资料使用。

弗丽达从伦敦回来时正好赶上1918年的圣诞节。这年的圣诞节她和劳伦斯是在利普雷度过的。这是一个欢乐的英格兰式的聚会，老少在一起纵情欢聚。圣诞节的第二天，他们中的一些人“在黑夜里欢呼着去了费洛齐医生家——他是个印度祆教徒——又喝了两瓶麝香葡萄酒，并在他宽敞的房间里跳起舞来，直到我们摇摇晃晃，昏昏欲睡。”劳伦斯从来不让一个有趣的人物

白白浪费掉，在《阿伦的杆杖》第二章中用到了费洛齐医生。小说中（在圣诞期间）这位有些幼稚的东方人“——也是个医生——在一个小酒店里和阿伦发生了争论。阿伦在这个人的“黑色，深邃，闪烁的目光中”感到了一种威胁”。

圣诞节后，劳伦斯“一想到以后的几个月就感到恼怒，因为一个人无能为力地等待着某种解脱。”他对凯瑟琳·曼斯费尔德说，“我感到好像是被关在笼子里——我无法想出如何能赚到足够的钱维持我们——这使我发疯。”他们仍然感到美国的吸引力。在他回家后的第二天，他写信给艾米·罗威尔：

现在圣诞节过去，我们必须为新年作准备，我希望它是个真正的新年，同时是个新的开始。过去的一年够糟的，——11月里我在伦敦——探望休假在家的理查德（阿尔丁顿）。他很健康，期待着和平和自由。希尔达也在城里——但不是那么太好。她似乎又要有个孩子了，我希望她会好起来。或许她该静心些，她的神经太紧张了，也许这个孩子能够使她感到安慰和镇定，我希望会这样。

英国是阴郁和不舒服的。到夏天的时候，我想去美国。我觉得我要到一个新国家去。我期望在和平签约后我们去瑞士或德国。弗丽达想去看她的家人。她姐夫现在是巴伐利亚共和国的财务大臣，我的一位朋友是其它方面的一个要人，而弗的表兄——哈特曼·冯·里奇索芬6个月前刚被人从法国国会驱逐出来，因为他要和平——他现在是柏林一个极有活动能力的人物。所以德国对我们是个令人激动的地方。但我想来美国：不知道为什么，这块土地本身吸引着我。

《新诗》1918年是由马丁·塞克出版的第一本劳伦斯作品。他从1921年起直到劳伦斯去世，是劳伦斯在英国的主要出版人（在1930年大萧条时期由他原来的出版人海因曼出版社负责）。弗兰克·斯温纳顿描述塞克“在取舍方面很果断”，但“有一颗善良的心，并不愿造成伤害，这常使他陷入困境”。他的一些新作家步入文坛作过极有影响的帮助，如麦肯齐、加农、和沃尔普。1918年当他接受那个被人忽视的劳伦斯时，表现出了一种冒险精神，因为可以设想，《新诗》在当时的版量可能是很小的。

匿名的评论在1919年2月号的《雅典娜神庙》上具有代表性地，说劳伦斯很久以来就“用一种神经质的狂怒虐待他的诗歌天赋。”不过，劳伦斯的“天赋重新在挣扎着显露出来”，部分是由于他“恢复了传统的诗歌形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部分的“新”诗是旧诗，远可追溯到克罗伊登或更早的时期。有些甚至带有些王尔德、西蒙和勒加里恩纳的唯美主义痕迹。如《夜晚的堤岸》：“流浪者在流浪——呵，歌唱着的大厦/灯光灿烂的高楼/电车驰来，喘着粗气驶向黑夜！”

劳伦斯准备好了一叠真正的新诗（《海湾》）交由西里尔·布蒙特出版。但他直到1919年11月才将它们推出来。1918年12月，劳伦斯向辛西娅·阿斯奎斯抱怨，说布蒙特已将他的那些诗搁置了至少有6个月，在“等待什么机会或其它什么原因”。劳伦斯在1917年唯一成书出版的是《瞧，我们走过来了！》，而1918年是《新诗》，因此在1919年《海湾》标志着他唯一的一本成册的书。

《海湾》在他离开英国的同月出版。布蒙特在《第一次得分》1927年上说推迟出版是劳伦斯的过错，因为他当时在地中海一带漫游。但劳伦斯是直

到 11 月中旬才去了南方。布蒙特肯定是弄错了。

1919 年对劳伦斯来说是继续被人忽视，贫病交加的又一个年头。在身居寒舍的那些日子里，他的信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有一份健康情况表：一会儿他说弗丽达得了感冒，几天后又称他自己也染上了。以 1919 年 1 月 23 日为例，他告诉凯瑟琳·卡斯威尔，弗丽达得了重感冒。他为卡斯威尔的小孩恢复了健康而高兴（“我的上帝，都出牙了！还没等我们明白过来他就该当着我们抽烟了”。）但这以后不久，2 月 5 日他在给艾米·罗威尔的信中写到他自己的身体不佳，说：“这里很冷，我们都生病了，我急切地需要春天和夏天。”在不到 1 个月的时间里，他连续患流行性感，差点一命呜呼（4 月 5 日，他告诉艾米·罗威尔，他差点“摆脱了尘世的烦恼”。这以后，他恢复得很缓慢。

在这段时间里，他和已经成了《雅典娜神庙》的编辑的莫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争吵。莫里建议他成为撰稿人，劳伦斯表示同意，并说他会“尽力以和善的老面孔出现”，他甚至主动提出以匿名发表文章。他贡献的第一篇作品是《鸟鸣悠悠》，以格兰托托的署名在 4 月 11 日出现。这篇文章标志着他从病魔和战争的危险中重新恢复了生命力。他描写了霜消雪融，暖风吹拂以及归鸟的胜利啼唱。

莫里喜欢这一篇，但回绝了《阿道夫》。此故事是有关劳伦斯孩提时代的那只兔子，它在文章的末尾晃动着白尾巴，似乎在当着读者的面说：“他妈的！”然后便消失了。——这对《雅典娜神庙》的严肃的读者们是很不适的。莫里感到他的位子“不稳固”，希望慢慢地将杂志从“改编性的杂志”变成一份文学性的刊物。而劳伦斯即便用了笔名也还是太锋芒毕露了。

凯瑟琳·曼斯费尔德 4 月 7 日给柯特连斯基的信中谈到了与劳伦斯夫妇之间的一次“争吵”：“我看到了这次‘争吵’——你呢？弗牵着一头张牙舞爪的、想象性的动物——像尤娜牵着那头狮子。显然，这使我感到在弗的背后有一位戈戴娃夫人。”凯瑟琳不想再看到这个：“我的屋子现在不是供吵闹用的，我的院子太小，他们会吃光那里所有的植物——根和所有的东西。”劳伦斯在一封“星期四”（4 月 10 日？）的信中告诉凯瑟琳：“将杰克和你和弗和我放到一起是极其复杂的——尤其是杰克。”劳伦斯相信“凯瑟琳自打康沃尔起，对杰克来说是安全的——，而假如你确实忍受他的作法，而他如果永远不愿和我们一样——这很可能！事情也许可能自己解决”。但是，“事情”永远也不会自己解决。

租期满限后，劳伦斯夫妇迁回到伯克郡的拉德福德家中。在 5 月，劳伦斯夫妇离开山庄 1 个月之后，对这种“吵闹”采取了行动，莫里听说在纽伯利附近有一幢别墅，他感到这里对病中的凯瑟琳可能更合适。在去看房子的途中，他去看望了劳伦斯夫妇。他们俩随他一起去看房子，并在劳伦斯的劝阻下没有租下这别墅。劳伦斯面有病色，疲惫不堪，但仍在梦想着拉纳尼姆，并希望在一个新国家有一个新的开端。莫里“对这个设想没有什么特别的信心，因而不愿进行冒险”，所以他在劳伦斯诅咒英国时沉默不语，不作反应。

莫里对这次见面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从小灌木林捡来的明黄色的小木块”：劳伦斯在这段时间的许多信中都提到了这些，并在后来的《袋鼠》中对此情景进行了回忆。他描绘了榛子林和“真正的古老的英国小村庄，它们依旧如莎士比亚时代的一样——也像哈代笔下的树林”。莫里说这些伯克郡的木块“比任何其它的更金光闪闪……我从未见到过比这更好的”。

在离开德比郡前不久，劳伦斯和伊德医生商讨过去巴勒斯坦的可能性——伊德此时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委员会的行政官。但劳伦斯不久又想到了美国。5月20日他从赫密泰治写给艾米·罗威尔的信中表示了这一点：

前些天我收到了（B·W·）休勃斯奇的来信。信中谈到了诗歌出版等问题，他似乎很讨人喜欢。他说他会安排我去美国讲学。我对讲课并不在行，但如果必须这么做，也不在乎。我正为8月或12月去纽约做好了一切准备。我迫切希望改变我自己。休勃斯奇说你告戒他认为波士顿不是我讲课的地方，你是对我有戒心吗？——或许我不应该有这样的疑虑？我希望不会。我觉得你实际上是我在美国所了解的唯一的人，所以我希望在我来时你能帮点忙，让我有块立足之地。不管怎样，告诉我你对此事的想法，行吗？我可能独自来，弗丽达随后再到。如果你不希望被打扰——我承认这会给你增加麻烦——请告诉我——我真诚地希望你已恢复了健康。

艾米·罗威尔怀着恐慌告诫劳伦斯，新英格兰不会真诚地欢迎他。即使享有盛誉的波士顿雅典娜神庙图书馆也认为有必要在阅览室将“杰出的”《儿子和情人》掩藏起来。她接着说，美国只能使劳伦斯感到失望。因为美国人无法同时从肉体上和精神上全面彻底地看待生活与詹姆斯·乔伊斯的那种信口胡说的纯粹的淫秽之间的差别”。

劳伦斯复信说他知道美国并不是一个黄金之邦，他不急于开讲座，他认为他可以凭写作生活得相当不错。“我想的只是让自己觉得在必要时有个去外，和可以找到能帮助人的人”。艾米·罗威尔曾为现代诗歌顽强地奋斗过，并在波士顿和布鲁克林强迫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她的那种豪放不羁和抽着雪茄的生活——总而言之，她是个罗威尔——但劳伦斯夫妇可能在那里的出现使她感到惊慌。她给他们分别去信劝说他们不要前去。这建议被接受了，劳伦斯在秋天离开英国时，去了意大利。在他出发前，他以5镑的价格将艾米·罗威尔送给他的那台打字机卖给了凯瑟琳·卡斯威尔的弟弟。

尽管劳伦斯不得不继续在近于贫困的寒舍里苦度光阴，但在1919年他的经济情况有了改观。5月5日他给平克去信，“谢谢你寄来的55镑支票。星期六我收到时非常高兴。”5天后，他向爱德华·马歇尔表示了谢意，感谢他按鲁帕特·布鲁克的遗嘱给他寄来了“20镑”。“奇怪，能从死者那儿收到钱，就像是从漆黑的天上掉下来的。”他虽然不喜欢奥列佛·劳奇的带着“旅馆帐单和领扣”商标的唯灵论，但他相信“死去的鲁帕特与他同在，一起抗争。充满热情的死者，虽不像送信人和旅馆搬行李工人，但确实活动在我们身心的内外。而那些我们不愿答理的活着的死人——我们能理解他们的沉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克利斯朵夫·哈索尔在爱德华·马什爵士在1953年死后透露——布鲁克并没有特地给劳伦斯留下钱，送钱这事表现了马什在执行处理权时的善意。

在7月的第一个星期——此时海军的封锁使德国人倍受饥饿，被迫签定了凡赛尔协定——劳伦斯决定去伦敦，再次申请签证。他告诉辛西娅·阿斯奎斯，“我们在1915年持有那些通行证时没有结关离开是个极大的错误”。他认为，尽管艾米·罗威尔发出了忠告，但他还是能相当容易地赚够钱在美国生活下去的。”

在7月下旬，劳伦斯和弗丽达作为罗莎琳·班尼斯的客人去了潘格堡。他们是通过伊利诺·法基昂认识她的。她的弟弟赫伯特娶了罗莎琳·班尼斯的妹妹。罗莎琳·班尼斯1913年嫁给高德温·班尼斯，他是个荣格学派的精

神分析学家。他们已有了三个孩子。她的父亲，哈莫·索尼克劳夫特爵士是制作克伦威尔塑像的雕塑像家，这座在众议院外的塑像在二次大战中被一颗炸弹炸倒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建筑在白厅顶上的查理一世的雕塑却安然度过了风暴。

8月，在潘格堡的马特尔别墅，劳伦斯给卡斯威尔去信，叙述了夏天的情况。信中他说到了他在《狐狸》中引用的那些农场姑娘的形象：

“ 托马斯·库克说只有和平被认可后，护照才能签出。上帝知道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唐务必要填好护照，交给托马斯·库克。不管怎样会准备好的。

我想我们在这里将呆到25日——然后去赫密泰治，或者住到山庄去，或和那些农场姑娘们住在一起。讨厌的玛格丽特（拉德福德）现在住在山庄——她把我们赶了出来。她将于23日离开，但在9月又要回来住一两个星期——所以我们将住在农场。我妹妹上星期到我们这儿来了——现在我的姐姐在这里。

我对前景没有确切的估计，但当前我不会去德国——甚至也不去美国。当我想到美国——纽约、威尔士王子等等——我感到沮丧……

没有什么其它的消息，只是马丁·塞克想出版我的《诗选》——为什么，只有上帝知道。

“ 没有什么消息 ”，就创作而言，这确实是一个相当平凡的夏天。劳伦斯的主要活动似乎是在改写《狐狸》，这是凯瑟琳·曼斯弗尔德在劳伦斯的故事中最喜爱的一篇。那年夏天，平克退回了小说《落花生》，这是关于一些伯克郡的士兵遇见一个名叫斯脱克斯的战时农场女工的小喜剧，这姑娘可能是根据一个名蒙克的农场姑娘而写成的，劳伦斯在《狐狸》中也用到了她。

其时，他还为他的剧本《一触即发》撰写了序言，其中他谈到了剧本中发生的劳工问题，并说高斯华斯的《斗争》是可悲的。更重要的作品是在潘格堡为美国版的《新诗》所写的序言，诗集将由休勃斯奇在第二年出版。劳伦斯认为序言实际上是属于《瞧！》诗集的，“ 但为一本出版已久的书发表序言是不合适的 ”。

《新诗》的序言可作为劳伦斯所有诗歌的引言：“ 诗歌，若不是遥远未来的声音，高雅、飘渺，便是往日的回响，富丽、豪华…诗歌自始至终必须有精确的目的性和完美的形式。” 但还有另一种诗歌，它是“ 即刻的、现时的 ”，这类诗中“ 没有完美的形式，没有结果，什么都未完成。所有的线索都在飞舞颤动，缠结成一团，流水在摇晃着月亮 ”。因为“ 生活这一不断的呈现是个没有终止、没有完成的结晶体 ”。

在这样的诗歌中，杰出的作品是惠特曼的。他“ 实实在在地展望过去和未来。但他并不为不存在的东西而叹息。” 大多数的自由体诗人，劳伦斯认为，错误地试图将他们的材料形式化！在打破了“ 格律诗的可爱形式后 ”，他们没有意识到“ 自由诗也有其自己的特征，它既不是星星也不是珍珠，而是瞬间即逝的等离子体。” 这篇序言作为对劳伦斯诗歌“ 秘密 ”的解释，和他那篇谈论散文的态度的文章《小说》（自《关于一只豪猪之死的反思》）正好配对成双。如在《新诗》的序言中一样，几年后的《小说》一文揭示了劳伦斯的想象力的源泉。文中，他谈到了“ 所有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就像“ 水银 ”一样。

护照终于来了。弗丽达10月离开了英国，但劳伦斯拒绝一同去德国。索默斯在《袋鼠》中与他妻子分手时，“ 在大东部车站道了别。当时她坐在荷

兰的哈维奇霍克的特快列车上。火车启动后，她脸上几乎是露出了一种复仇成功的神色和一种几乎是恶意的爱。就这样，他向她那毫无意义的别墅走去”。但劳伦斯不久决定离开，并安排刚退伍的阿尔丁顿照管房子，这件事引出了一桩喜剧性的故事。因为出租房屋的拉德福德夫妇总是忘记将阿尔丁顿的房租转给原主人，最终不得不雇了律师来帮他处理这一麻烦。但那时，劳伦斯已离开英国。而意味深长的是，他战后的两篇小说《迷途的少女》和《袋鼠》中的两个主人公，在离开英国时，都将它看成是向大海漂去的一具棺材。

英格兰劳伦斯对它了如指掌，从他度过童年的矿村和森林密布的中西部到科尼什沿海和南部各县的小灌木林；他在伦敦的南端住了3年半，并时常去伦敦；他曾游览了弗尼斯的班罗，到过约克、林肯、肯特及威尔士海岸——英格兰对于他可谓刻骨铭心，但它却没有收留劳伦斯的遗骨和骨灰。

1919年后，他回英国的次数很少，旅程很短：1923年、1925年、1926年。每次劳伦斯都发现这个地方是“可恨的”。他产生这种感情的原因，可追溯到他的童年，尽管他当时没有完全意识到。当时，那些“没有心肝”的矿主让大批的男人像鼹鼠一样在地下干活。而恶毒的禁书增加了他对英国的憎恶，再加上战时的官吏们的霸道和爱管闲事者恃强凌弱的行为，虽然劳伦斯可以承认有些罪恶是“必要的罪恶”。“征兵，以及战争中的所有行为都是环境的必然需要”，他在《袋鼠》中就是这样写的。“甚至检查一个人的私处都是必要的。无可非议！无可非议！但是——”他要说的是这个：“但是——在他的心底蕴满了愤怒和仇恨的溶岩。他知道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他感到受了玷污。”

这种愤怒具有一种超出个人的特性。劳伦斯从不感伤地看待自己的困境，从不沉湎于自我怜悯之中；他典型的男主人公保尔·莫里尔在《儿子和情人》中并不喜爱他严酷的命运，但他接受了它，没有叫嚷。“这为什么偏要发生在我的身上”？只有一次，在《儿子和情人》的最后一篇中，保尔啜泣了一阵，但他应当允许有这样的时刻，他毕竟经历过来了；保尔在小说长长的经历中再没有其它任何的感伤情绪和自我怜悯。劳伦斯后来的自传性的主人公也没有自我怜悯的迹象。他们像劳伦斯一样，常常是愤怒的人，但他们是为善良人的堕落和被欺骗而愤怒。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劳伦斯从不诅咒生活本身。“一旦从这个人为的世界上幻灭”他在1926年写道，“你就能看到另一种生活中的一切神奇美丽和精妙的真实。”像少数几个他的同时代作者那样，劳伦斯具有一种既深刻又始终如一的价值观念，他总是以生命固有的和发展的观点同情地看待所有事物。当他看到生命被扼杀，发展被禁锢，他的愤怒便会不由自主地迸发出来，他自身便成了发泄这种愤怒的渠道，但只是为了生命和发展而愤怒。

在1919年，“这个和平的英国像具僵尸”；生命和发展是在其它地方。在11月的黑暗里，他又一次向往地中海南部阳光明媚的大地、果园、鲜花盛开的山谷和色彩斑斓的大海。他将去意大利，弗丽达会像以前一样在那里迎接他。他听说靠近卡西诺的山中有一个农场，这是一个暂住的好地方。

在他即将离开时，劳伦斯和理查德·阿尔丁顿一起走在一条拥挤的伦敦大街上。阿尔丁顿看到过路人怎样对这位留着胡子的人投来敌视的目光，甚至对他发出几声嘲笑，而他并不理会。当“这个高高的纤弱的身影迈着稳健的步伐迅捷地走下地铁站的阶梯时，阿尔丁顿如释重负——阿尔丁顿以为这

是最后的一眼了，他错误地以为他再也见不到劳伦斯了。阿尔丁顿感到，无论如何，他离开是上策，因为他在本国的出现会招来陌生人的冷眼和嘲笑。”

11月14日，卡斯威尔夫妇到车站为“这位孤独的朝圣者送行”，劳伦斯突然“感到一阵离别的悲痛，但他是快乐的，很快乐地离开了”；他将永远不再在英国居住了，像《袋鼠》中的主人公一样，在现在“离开了英格兰，他如此苦苦地，苦苦地爱过的英格兰——现在要离它而去了，独自一人，心中充满了无法言说的感情。这是寒冷的一天。积雪像裹尸布一样覆盖在英格兰东西部的丘陵草原。他从船上回首望去，他们已将弗克斯通抛在了后面，只有英格兰还隐约可见，看上去像具灰白色的棺材的英格兰和它覆盖着的破布般积雪的死灰色的峭壁在他身后的大海中渐渐地沉没。”

第四部 漫游岁月

（一）到南方

劳伦斯拮据窘困，已买不起卧铺票了（如果有的话），他准备坐穿越欧洲的喧闹拥挤的列车。他发现“巴黎俗不可耐”而法国则令人反感。他眼睛红肿、神情紧张地到了都灵。他在那位富有的英国老人的别墅中与他闲聊了两天。除了名字的改换以及将背景改到了诺瓦拉以外，劳伦斯在《阿伦的杆杖》的第12章和第13章里，真实地描述了这次访问，这使他的主人很恼火，他后来指责劳伦斯将他描述得过分呆板，以及还有其它一些不足。理查德·阿尔丁顿除了明言反对劳伦斯在小说中对阿尔丁顿的处理外，还深信威廉爵士和弗兰克夫人的原型“对于一个语言艺术家来说，”应该“作为模特儿而置于受人尊敬的位置上。”

像小说中的阿伦一样，劳伦斯半嘲弄地与这位老人争辩着，他针对劳伦斯“无担保的自由”要求得到担保人和银行的一次付清。这位老人是侨居意大利的最著名的英国人之一。他自1880年以来，作为都灵和西西里的船王面积聚了一大笔财产。战争期间，他曾参与慈善活动，在促进不列颠的地方事业中起过领导作用。威廉·弗兰克爵士的原型说是瓦尔特·贝克爵士（1955年—1927年），他是在遇见劳伦斯的前一年受爵的。

在继续南行的途中，劳伦斯怀旧地在勒利西停留了一天，于11月19日在寒冷的暴雨中到达了佛罗伦萨。诺尔曼·道格拉在他自己的公寓巴勒斯特利，为他准备了房间。在这里，劳伦斯住在一间很大的、“石砌的、不舒适的房间”里。道格拉斯有一个拍马者，他是一个美国人，名叫毛利斯·马格纳斯，他“用当演员经纪人的世俗的、精明的、傲慢的目光”盯着劳伦斯，“他是个世界主义者，寒酸地在世界各地奔忙”。劳伦斯向道格拉斯打听有关马格纳斯的事，道格拉斯说，他的这位伙伴曾是伊莎多拉·邓肯的经纪人，又是一名记者，大战前《罗马周报》的编辑，他对欧洲大多数国家的首都的大街小巷都了如指掌。后来遇见马格纳斯的弗丽达回忆起劳伦斯敬畏地看着他向高傲专横的道格拉斯谄媚的情景：“按照劳伦斯的思维逻辑和清教主义的思想，马格纳斯在人际关系上是个难题。”健壮的、脸色红润的道格拉斯告诉劳伦斯说：“对我来说这再好不过了，哈哈！——如果他愿意为我而团团转的话。我亲爱的朋友，我不会去制止他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他愉快。”

在与马格纳斯的会面中，劳伦斯——这个裁缝的孙子，立刻对他进行了目测：“他前部挺出，颇为肥硕，像只鸟，而他的双腿看起来极似鸟的双腿长在后部。”劳伦斯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人，衣冠楚楚却又穷困潦倒；他试图使马格纳斯相信他的头发和胡须（“多么可爱的颜色！”）不是染就的。

当马格纳斯去罗马时，他“十分高兴”。虽然他对男士的一等车厢吃惊不小；甚至道格拉斯对此也似乎有点不知所措。劳伦斯身上只带着9镑，还有12镑存在伦敦的银行里。在去德国的途中，弗丽达好像做了个“乱七八糟的恶梦”，耽搁和辛劳中，她的皮箱在荷兰被窃。马格纳斯搭乘午夜的火车离开了佛罗伦萨，咕味着旅行实在是太糟糕了，为什么一切不是井然有序呢？

弗丽达找到了她的皮箱，但没有找到箱子里的东西。当她在12月3日早晨4点到达佛罗伦萨时，劳伦斯雇了一辆敞篷四轮马车带她兜风。她在月色朦胧之中，欣赏着大桥和高楼：大卫的复制雕像和其它一些公共场所的雕塑

向她表明，这个城市是男性的。然而，当她对英国的侨居地有所了解后，她却认为佛罗伦萨是一个极乐之邦，一个男性的极乐之邦。“在那里，邪恶就像是一个老处女在私地里。在邪恶之中自得其乐。”劳伦斯在《阿伦的杆杖》的咖啡店和聚会的场景中，突出了佛罗伦萨的这一方面。在这些场景中，他巧妙地将奥斯卡·王尔德的朋友，小蜂鸟……角色的里基·特纳描绘成阿尔基·康斯坦伯尔。甚至那位著名的艺术批评家和鉴赏家伯纳德·贝伦逊显然也被草草地写成了瓦尔特·罗森。道格拉斯则以阿杰尔的身份出现，他在几年后的一本反劳伦斯的小册子中，愤怒地抗议道：“显而易见，我成了杰米·麦克塔戈特或诸如此类的苏格兰人……一个老朽、专横、狂妄自大的人。”

劳伦斯收集了所有这些佛罗伦萨的素材，以备后用。他总共在这个城市逗留了三个星期。12月9日，他和弗丽达动身去南方。在罗马，他们出现在那所公寓里。凯瑟琳·卡斯威尔在意大利的表妹艾丽丝·桑托罗在那里为他们租下了房间，但是，如果房主发现弗丽达是德国人的话，是不会允许他们住进去的，艾丽丝·桑托罗将他们带进屋里，就立刻发现，有人趁她家中混乱之际打劫了他们。窘迫中的劳伦斯什么也没说，因为女主人拒收他们的膳宿费，并执意要偿还他们被窃的损失费。

几天之后，劳伦斯和弗丽达继续南下，到了喀塞塔省境内，住在匹西尼斯科山村的一个农庄里。这个地方极其寒冷且相当原始，他们不能把这里介绍给罗赛琳·班尼斯和她的孩子们作为安居之处。

劳伦斯夫妇的旅行在他的《迷失的少女》中作了详尽的再现：乘火车去卡西诺，它位于匹西尼斯科北面6英里处，随后，望汽车穿越布满冰凌的山地。从匹西尼斯科（《迷失的少女》中为佩斯柯卡拉西奥）开始，劳伦斯和弗丽达不得不像山羊般地沿着一条极高的、足有两英里长的山间小步行，到达了塞维的简陋的家中。在这里，班尼太太的父亲的原型桑克洛弗特，意大利农场主奥拉齐奥·塞维（小说中为潘克拉齐奥）盛情地将他们迎进了家里。庄上一只只母鸡正在悠悠漫步，骡子站在门前的路上拉屎。

这两位朝圣者没过多久就受够了。圣诞节前的星期六下了一整天雪。星期一，劳伦斯和弗丽达一大早就起床，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徒步数公里路，找到了那辆去卡西诺的公共汽车，在颠簸的车上，劳伦斯看到在峻峭的山上“耸立着举世闻名的那所修道院，但却叫不出它的名字……我们向南方逃去”，进入了开普利的明亮的阳光之中。正如他在写给马丁·赛克的信中所说的：“匹西尼斯科实在是天寒地冻，我们逃到了这里，像你一样，在一只小船的摇摇晃晃的船舱里度过了一夜，离开了索伦托。现在我们在这里租了一套小房子，它位于摩根诺（一家咖啡馆）的右边，在开普利的颈部，右边是大海和那不勒斯。左边是大海和苍穷，中央教堂位于我们的正前方，这个令人讨厌的宝贝。”

劳伦斯夫妇在开普利逗留了两个月，那里的人都是爱闲聊的、孤独衰老的、长着两块隆肉的石灰岩雕般的矮胖人。”那里的流言蜚语会使斯维都尼亚（2世纪时罗马的传记作家及历史学家——译注）脸红，使泰比留斯（公元14——37年为罗马皇帝——译注）“感到遭了蚤咬”。劳伦斯不久就准备继续南行。

其时，凯瑟琳·曼斯费尔德对意大利的里维埃拉市以及那个有象征性的名字奥斯佩德勒提感觉极糟，于是便搬到了门顿。当劳伦斯2月上旬写信给她时，她就住在那里。劳伦斯说：“我诅咒你，你使我对你的所作所为大倒

胃口，意大利人不愿与你有任何交往是非常正确的。”莫里是“一条肮脏的小蛆”。这些话都转到了莫里那里，他当时在伦敦。他后来说：“这封写给凯瑟琳的信如此荒谬，如此残酷，毫无人情味，所以我写信告诉他，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真心希望我们将永不重逢，因为，如果我们再相见的话，我会揍他一顿的。”

劳伦斯在开普利时似乎比往常更爱发牢骚。他没有注意这个地方的许多优美景色，那高耸的悬崖和爬在上面的白房子，那柏树和橄榄树，以及那些当地的茂盛的棕榈树。

劳伦斯于2月13日写信给艾米·罗威尔：

今天我收到了你的来信和1300里拉的支票。你真好，在这新年之际还想着我们。但我希望我不拿这些钱，这使我感到有些不安，既然我做着这一工作，我为什么不能赚到足够的钱呢？再说，你知道，受人施舍会使人觉得恼怒。这并非来自于你，真的，因为你是一个艺术家，而那常常是一种合作关系。但当加农写信告诉我时，他已经积聚了一些钱——当然，还未收到——他写信告诉我他正在攒些钱，但后来就再也没有提起过。加农的那种假仁假义我非常生气。他还在美国出版界说了一些有关我以及许多其他人的荒谬之言。很明显，我是个文学的慈善孩童。当一个人的正当权利被否定之后，他就得受施舍的侮辱。呸！去他妈的——但我觉得你对我有一种奇特的而又又是天赋的理解，所以，当我接受你寄来的里拉时，几乎没有厌恶感，只是有一点点不安。无论如何，一个人必须对少数几个人保持忠诚，除此之外就是忠诚于上帝……

不，现在不要去英国，那儿的情况太使人沮丧、忧虑和厌倦了。它连意大利都不如。意大利是一块令人振奋的土地，虽然这已成了历史，但我仍然深深喜欢意大利。那明媚的阳光，闪烁的岩石，以及如同花瓣般的海浪。与英国相比，我更喜欢这里——这里虽然物价昂贵，并且物资不甚丰富，但是，一个人生活在英国，大概也需要花同样的钱；而在这里，一个人能够更自由地驰骋在天空和大海里。南面，古老海岸的岩石隐约地闪现着，远处，是莎琳群岛（莎琳是希腊神话中意大利海岸的三女神之一，以歌声蛊惑过路的航海者并使之灭亡——译注）。这是真正的希腊——尤利西斯的船在浪涛之中离开了它最后的港湾。但即使是无畏舰队也无法越过这变化莫测的黎明之海……

我们在古殿的顶上弄到了两间漂亮的房间，地处开普利的中心，两侧都是大海。康普顿·麦肯色也在这里——他是个受人信赖和喜欢的人，就第一印象来说——要比加农更受人信赖。——但是，要继续住下去的话，开普利这地方似乎小了些。我也许将去大陆——也许不去。不管怎样，你总能在这地方找到我。我刚开始一部新小说的创作。

劳伦斯发现，开普利是“一只半文盲的猫的墩锅。”不久便迁居到了西西里。但在迁移之前，他又到欧洲大陆去了两次。一次，他和弗丽达一起，是试图去阿马尔菲海岸找一所适宜的房子；另一次，则是去拜访在蒙特卡西诺的毛利斯·马格纳斯。

诺尔曼·道格拉斯在他写于1917年的小说《南风》中，曾对开普利及其居民作了讽刺性的描绘。他没有再在那里生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开普利随记》（1952年）中，他写道：那里的“外侨很有钱，但一无所长，什么事也不干，他们分裂成了几个争吵不休的小集团（康普顿·麦肯色

在他的两本书中，对此作了令人捧腹的描绘），使得此地几乎不适宜于这些人居住了，他们拒不互相交往。”

从艾米·罗威尔送给劳伦斯的钱中，他汇了5镑给马格纳斯。劳伦斯在开普利听到了他所说的感觉到了他需要钱的弦外之音。收到钱后，马格纳斯立刻去信说他们救了他的命，他已陷落到地狱中了。他说他现在正在去蒙特卡西诺的途中，劳伦斯应该到那里去与他碰头。对于劳伦斯来说，这种暗示的灾难近乎美国式的夸张。但是，马格纳斯的邀请之辞十分动听，因为尽管“他是一个普通而可怜的鲁莽之人”，他还有着“一种非常奇特的细腻、温柔和忧愁。”劳伦斯推迟了行期，然后，又收到了他的另一封信，在这封信中，马格纳斯似乎在伸手索取更多的钱，“好像他有权用这钱”。这使弗丽达感到恼怒，但劳伦斯想去看看那座修道院。于是，在2月的一天，他天未亮就起身，准备横穿大陆：“在漆黑的严冬的清晨里，大海在呼啸，由边窗望去，那不勒斯微弱的灯火，在遥远而又遥远的天际明灭闪烁。”

劳伦斯在长途的火车旅程之后，又步上了那条曲折的山路，于当天傍晚到达那座修道院。马格纳斯赶紧出门迎接他，他匆匆忙忙地走来走去，似乎对这地方非常熟悉和感到自在。他是个皈依了宗教的人，是客主唐·马迪诺的好朋友。唐·马迪诺后来以唐·贝纳多的身份在劳伦斯关于马格纳斯的回忆录中出现过。唐·马迪诺见过劳伦斯后，为他安排了一个房间。此房间俯瞰着“海湾，这是世界著名的谷地”，远处山上，雪峰仍反射着暮色。马格纳斯对此景色热切地叫唤道：多么宁静——有什么地方比那里的天暮时分更好的呢？确实，当劳伦斯第二天清晨眺望那谷地和山峰时，他感到了——一个生活在现世中的孩子的极度痛苦：修道士们在下面的花园里，农夫操着犁耙正在田中耕耘，这完全是堂皇而可怕的中世纪的景象，其中包含着那种冷漠、庄严和暴力。南边远处火车喷着浓浓的白烟，停靠入站。那里有汽车等待着，苍蝇般的人群在车子周围推揉拥挤着：“从修道院看着这一切，中世纪仍在一种痛苦的挣扎中延续，如像蒂索诺斯一样，这种时代永远不会结束，对我的灵魂来说，这近乎亵渎，留下了创伤。”

劳伦斯在他后来为马格纳斯的《侨居回忆录》一书所作的长篇导言中，描述了蒙特卡西诺。24年后，当炮弹摧毁了修道院时，劳伦斯的纪实文章仍然能将人们带回到此地的旧情旧景之中，这是其他人的描述或照片都无法比拟的。劳伦斯是在他游历了蒙特卡西诺两年以后写下他的马格纳斯回忆录的，不过，他对气氛的渲染是真切动人的，就好像是在当时记下的一样——也许更甚于此，因为他那清晰的视觉记忆常常能在追溯中得到最好的发挥。他能在很长时间后，精确地记起一个地方的点点滴滴，并带有一种丰富的诗意，且能对那些细节进行超出一般性叙述的提炼升华。在描述蒙特卡西诺时他就是这样做的，那长长的带着寒意的拱顶走廊，那巨大的大理石教堂，那设有廊柱布拉曼德式（公元1444—1514年意大利建筑家）庭院，和那使人陶醉的南部世界的全景。

劳伦斯将马格纳斯写成了这样一个人物；一个爽直、可怜、说起话来短促刺耳的人，他试图真诚待人，但又常常谄媚地依附于教堂和道格拉斯。他在某地有个他遗弃了的妻子。但他母亲“是他伟大的偶像”，他总是随身带着她的那张颇有戏剧性的照片。马格纳斯给劳伦斯看了这张照片以及他写的有关法国外国军团的手稿。他参加这军团是因为他错误地认为这样他就可以与他所痛恨的那些德国人打仗。在稍稍体会了北非的兵营生活之后，他就开

了小差。劳伦斯找到了《德雷格斯》，这是马格纳斯最初称作他的小说之作，写得极其蹩脚而且没有主题，与生活中的他本人如出一辙。他这个人总在“忙忙碌碌，但从未像样地做出过什么事情”。他似乎常常期待着得到劳伦斯的钱，因为这一根本原因是，劳伦斯得有节制地开支。他故意把存折留在开普利，虽然他与马格纳斯均分了袋里的钱。但当劳伦斯在分手给他 25 里拉时，马格纳斯伤心地拒绝了这微不足道的馈赠。

劳伦斯在修道院呆了两天（而不是一周）后，就离开了——似乎是仓皇出逃。他在那里的经验已经形成了一种关于“现代人的方式”的被强化了的观点，并以一种受诱惑的方式显示出来。修道士们住在冰冷的大理石房中，（劳伦斯穿着件借来的外套，坐着冷得直发抖）试图再经历过去的生活；农民则生活在山坡田野里，靠血汗愚笨地生活着。然而，金钱“则完全是他们神秘物中之最神秘者。”而马格纳斯，一个货真价实的现代人，分化成了另一类型，而更加令人生畏：这个神秘难测的可怜的城里人把自己关在并不舒适的修道院中，差不多像修道士一样消磨着时光。

所以，劳伦斯像约瑟夫（“圣经”中希伯来人的祖先之一，是贾克尔最宠爱的儿子，因受其兄弟之嫉，被卖到埃及做奴隶，后为埃及长官——译注）一样逃避了，扔下他那借来的外套，从“古老世界的最终据点”，逃到了“民主主义、工业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红旗和法西斯的红、白、绿三色旗下。这是另外一个世界……贫瘠得像铁路的煤渣路基，只剩下了两条钢轨。然而，这是他的可以逃跑的大道：“坐在餐车里，在肥胖的那不勒斯人中吃着他们的通心面，大玻璃上布满了水蒸汽，雨点在外面敲击着。我任凭火车把我带走，从修道院，从马格纳斯身边，从一切世事中带走。”

2 月 26 号，他回到开普利的第 5 天，劳伦斯穿越西西里，以找寻栖身之地。他在开普利喜欢的人屈指可数。麦肯色是其中之一。劳伦斯写封信告诉艾米·罗威时曾友好地谈起过他，他在给另一些人的信中又嘲弄他：“一个人感觉到有几代演员跟在他身后，不能太一本正经”。如果只是说“他似乎很富裕，生活得很好，走起路来十分潇洒”。是劳伦斯所不能满意的。麦肯色待劳伦斯仍很亲切。由于他的努力，麦肯色使得马丁·赛克成了劳伦斯作品的出版人，这是个极佳的选择。麦肯色还借给劳伦斯一台打字机。很久以来，麦肯色向往着去南海诸岛，并买了许多有关的书籍。他正计划撰写一部自传。如他妻子费思回忆所说，“正在谈论接受一部电影剧本”。他写信给他的代理人说：“劳伦斯也在考虑担任一半的写作任务。”因为他的费用将得到偿付，所以考察队将需要一大笔钱作保证。劳伦斯没有十分认真地考虑过去太平洋作短途游览的建议，正如他在 1 月 25 日的一封写给辛西娅·阿斯奎斯夫人信中所说的一样。麦肯色“风趣而和善”，他大谈“南海以及我的去处。不过可惜的是，这是一次沽名钓誉的旅行，写成文字，名扬海外，甚至拍成电影。唉，我不能被拍成电影。要不我会觉得自己像个野蛮人，并觉得他们窃去了我的‘情报’”。

麦肯色甚至还在《泰晤士报》上登广告招聘一名秘书。他妻子后来写道，塞克“用友好的计谋”（因为他不想让麦肯色走得那么远）提醒他注意《泰晤士报》上的另一条广告，说的是海峡群岛的一些岛屿可能被英国政府出租。麦肯色后来未定居在耶索，为此，他每年得付 1000 镑。他的这种做法，成了后来劳伦斯一篇纪实小说的主题，此小说就是《爱岛的男子》。

麦肯色在他的自传中记载了他自己曾对劳伦斯说过的话：“除了这两个

沉湎其中的人之外，性活动只是一种可笑的行为。”（在对本作者叙述这些情况的时候，康普顿爵士用了一个比“性活动”程度更强的劳伦斯式的术语。）劳伦斯变了脸色，便告辞了。第二天，他回来作评论道：“你也许是正确的，而如果你是正确的话……”他的姿态是对人类的一种绝望的表示。

麦肯色还记得与劳伦斯的另一次谈话。当他们一起沿着特雷盖纳路散步时，劳伦斯突然宣称不再会有另一次战争了。随后又突然高声叫道：“我不希望再有一次战争。”麦肯色觉得已超出了“自我中心的极限”，可劳伦斯则说这并非为他个人，而是为所有人。在对马格纳斯的描述中，劳伦斯说他正从事一场战争，反对“这些肮脏的机器和那些人们所作的奇妙发明……我将使魔法把那些肮脏玩意儿变掉……我不是一个人，我代表许多人，是大多数”。

不过，劳伦斯仍然强硬地维护他的个人独立性。他热情地写信给伊斯渥的朋友霍普金夫妇说，他们送给他的圣诞礼物——那方花手帕立刻被一个罗马尼亚人占有了，此人怀有与他们相同的政治信仰，是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肯定是马上小心地折好这方帕围在脖子上，他看起来“非常高兴，眉飞色舞”。然而，劳伦斯发现除麦肯色外，开普利还有他所喜欢的人，例如老查尔斯·艾林汉、布鲁克斯，他是岛上的流浪汉，一个曾翻译过古希腊、罗马的经典的的老学究。劳伦斯夫妇为能在开普利认识玛丽·加农感到特别高兴，在失去了吉柏特之后，她便是那里的“最正派的人”了。

大约正是此特，吉柏特·加农被证实患有精神病，尽管阿尔丁顿在此前不久看见过他，没有发现他行为举止有任何不正常的地方。“一个因蒙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欺骗而激怒的精神极度紧张的人，很可能说出或干出一些两个平庸的医生可以下诊断的言行来”。阿尔丁顿补充说，劳伦斯赞同他的论点，认为加农并不比常人更不正常。但是，莫里却常常感到加农的潜意识中有一种夸大妄想的迹象。加农从美国回来以后莫里见到了他，这是一次“令人焦虑不安的”会面，“他令人不可思议地谈论着他在那里的辉煌成就”。看到加农不着边际地信口开河，莫里痛苦地逃走了，“从他那疯狂、视而不见的眼睛的凝视中痛苦地逃走，并发誓我永远也不想再触到那目光了”。然而，劳伦斯不久将会遇到这种目光，因为加农要南下地中海了。

这是劳伦斯搬到了西西里的塔奥米拉以后的事了。他为了寻找栖身之地，便和通俗小说家弗兰西斯·布雷特·杨及其妻子杰西卡到了那座岛上。马格纳斯曾说过，西西里已在从狄奥克里塔（公元前3世纪时的希腊诗人）时代起就在等待劳伦斯去了。所以，他动身去那里寻觅一幢合适的别墅，此次，弗丽达未随同他去。在格尔吉提（现在为阿格里吉托），他告诉布雷特·杨说，他们遇到的那些硫磺矿工很不友好，“可能会向我们扔掷石块”。这一说法后来流传开来，说那些矿工真的向他们扔了石块，而实际上，他们并未这样做。

当夜幕蓦然降临并刮起了猛烈的大风时，劳伦斯失踪了。布雷特·扬大声呼唤着他，但听不到他答应。回到旅馆，布雷特·扬对妻子说，劳伦斯肯定会回来的，如果不回来的话，就派出一队人提着灯笼去找他。劳伦斯果然回来了：“哦，我被大风拽着，像一张废纸似地被吹过了一个墙洞。”

他宣称，他们必须尽早离开那里。所以，他的同伴们都被迫跟他一同于清晨4点乘上了火车。在锡拉库扎，他差点租下那幢被布雷特·扬夫人称为“其貌可怕”的房子，但她和她丈夫把他拖走了。他发现艾特纳山附近的卡

塔尼亚那被熔岩覆盖的土地“太充满火山气息了。欧洲完了，我能去哪里安身？”然而，他在塔奥米纳找到了一幢可人的别墅。在布雷特·扬要回开普利去时，劳伦斯给弗丽达拍去了电报，要她到那里去。

弗兰西斯·布雷特·扬写信给塞克时，将劳伦斯描绘成一个“胆小的畏畏缩缩的，自负的、厚颜无耻的家伙。”但又补充说他们没有争吵过：“我发现他有一种焦躁不安，令人讨厌的性格，但不管怎样，能引起别人的同情心。”布雷特·扬 1921 年的小说《红衣骑士》中的某些情节是有关他本人与劳伦斯的这次旅行的。

1920 年 3 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劳伦斯在塔奥米纳租下了福恩塔娜·威克切亚公寓的上层，期限为一年。这是一幢宽敞的古旧农舍，有一个花园，里面种着杏仁树、柠檬树和橄榄树。上层的大厅里，有一个装有烟罩的壁炉，里面熊熊的火苗燃烧着西西里的松木柴。劳伦斯在寒冷的天气里，就坐在炉边写作。哥特式尖角窗子的外面，变化着四季的景色。当他向前方凝视时，他看到，“爱奥尼亚海鳞波闪烁，既像加莱贝丽娅那变幻莫测的宝石，又像颗在阳光中移动的火蛋白石”。当他转向另一个方向时，看到艾特纳山脉在“苍穹之下，宛若纤弱而白皙的迷人女子，悠悠地挥舞着她的橙黄色的烟纱，有时还呼出缕缕玫瑰色的烟霞”。希腊人看到艾特纳山是世界的偏僻之地，便称之为“天堂的柱脚”。他们“对事物的神奇的真谛有一种直感。感谢上帝，人们对世界已有了足够的了解，终于能够发现其事物的相互关系了。”

劳伦斯发现西西里非常“和平宁静”，地上长满花草灌木，显得“生机勃勃”。他喜欢“这里的人们所具有的强壮的撒克逊人的素质”。他和弗丽达迷恋着这里葱绿的大地和鲜丽的花朵。“西西里巍然屹立着，永远向着她那如宝石般闪烁的峰巅、金色的黎明和永恒的魅力”。……我对西西里并不谙熟，地中海的拂晓是辉煌如紫晶色的，它像我们时代的黎明，我们新纪元的奇妙的早晨一样。劳伦斯是在经历了战后英格兰的黑暗、严寒、布满雾霭的岁月后，走进这辉煌、温暖之中的。现在，他的想象力在地中海的阳光中臻于完美。这种想象力在开普利的流言蜚语中没有受到什么损害。

在他居住在福恩塔娜·威克切娅的两年中——因去马耳他·撒丁岛旅游，有两个夏天都住在欧洲大陆，这两年的客居是断断续续的——劳伦斯完成了《迷失的少女》和《阿伦的杆杖》，他在不知不觉中写成了这两本书。还创作了许多优美的短篇小说，以及诗集《鸟，兽，鲜花》中的大部分诗篇，尤其是这些诗篇闪现着浓烈鲜明的西西里色彩。

这些诗中最为著名的一首《蛇》，叙述的是他的一次经历。那是“西西里 7 月的一天，天空散漫着艾特纳烟缕”。他下楼走到水槽边，“因天热而穿着睡衣，正要喝水时，”他看到一条黄褐色的蛇“张开它那端方的嘴啜饮，/ 轻松地抵上整齐的牙床，让水流进它懒散的长身，/ 万籁俱寂，阒然无声”。数年前，在《和平的现实》中，劳伦斯写道：

假如我的灵魂中潜伏着一条蛇和可耻的欲望，请允许我不用棍棒将它逐出我的意识中吧。让我将它携至火边，看看它倒底是什么吧。因为蛇也是上帝所造，有存在的理由。它的存在中，有着它的妙处和真实。我必须在我真正的恐怖中接受它，而不能将它排斥于我的悟性之外，……那么来吧，满身斑纹的讨厌鬼，你拥有你的存在，你的正当理由，对，你还有你称心如意的妙处。……但是好好保持你的生存方式和你的存在吧！爬进杂果丛中去吧，那里的灌木丛，是鸟雀在婉转欢歌的地方……但既然我已与春天作伴，蛇就

必定会隐隐地沿着它的小径爬行，如果我看到它在阳光中酣然入梦，我将会在它的所处由衷地赞美它的。

这是那首诗的一颗种子，它深潜于劳伦斯的意识之中，直到他在那个炎热难熬的西西里中午，看到了那条蛇。他喜欢它，尽管它受过人类的教育，这种教育告诉他说，金色的蛇是危险之物，必须杀之。这时，他的那颗种子萌芽成长了。“因为我胆怯，不敢打死它？/因为我反常，渴望向它诉说”？他感到很荣幸，因为这条蛇竟会向他表示殷勤。不过，当这条蛇爬出，蠕行而去，“爬进那可怕的黑洞之中”，那人突然感到恶心，他操起一根木棍向它掷去，那蛇“闪电般地扭动着逃窜而去”，留下了他这个对自己的鄙陋懊悔不已的人，但深深地忧虑起来。因为这条蛇看起来“仿佛是一个被放逐的国王，被夺去了皇冠，流浪在社会的底层/现在应该重新登基加冕了”。与此同时，此人觉得他已错失了“与一位生命的主宰/邂逅之机”。然而他有了某种东西得以补偿，那就是：偏狭之心。

这是意识的分裂，是赞美与厌恶两种感情的分裂。这种分裂又一次揭示了劳伦斯的最本质的两极，像《恋爱中的女人》中的伯金一样，他看到了鲜花和它植根于其中的泥土，《蛇》这首诗也使人联想到劳伦斯 1915 年的随笔《皇冠》中两种相对的力量；在劳伦斯身上，永远存在光明与黑暗的搏斗。《蛇》是劳伦斯最优美的诗篇之一，也是他最富有展示性的诗篇。

另一些写西西里的诗也与此相类似，它们是他的经历的真实反映，其中渗透着一种“哲理”。因此，这些诗篇不但描述了那些难以忘怀的地方和景物的形象，而且也是劳伦斯心灵深处的写照。在《秃兀的无花果树》里，劳伦斯对无花果树作了细致的描绘，并将其描述成了一个迷宫，它们一条条“弓一样的嫩枝”交错盘缠，互相分割，又各自超越自身，如同蛇盘在美杜莎（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被其目光触及者，均将化为石头——译注）的身上一样。在《木槿与鼠尾花》里，劳伦斯描述当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像星期戴的钮扣花一样将木槿花戴在身上，他便问他们：“来吧，说到权利，你何权占有此花？”在《和平》中，乌黑的熔岩凝结在岛屿前面的石阶上，但火山的顶部沸腾着“白热的熔岩”，正孕育着新的爆发，再次覆盖地面：“能称此为和平？”有同样盛开着的杏仁花，和在另一季节中，像铁杆般秃兀的杏仁树，南方夜空中的红月亮，银莲花和仙客来。所有这些，在另一些诗篇的字里行间，都显示了异常蓬勃的生命力。

在这段时间，劳伦斯的散文创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收到了他未完成的小说《霍夫顿小姐的叛逆》的手稿，它寄自艾尔斯·杰菲；它在战争时期被留在巴伐利亚。劳伦斯将它重写，改名为《迷失的少女》。他一度还考虑过将它定名为《乱婚》以及《苦涩的樱桃》。

伊斯渥（书中的伍德豪斯）对于阿尔威娜·霍顿这位劳伦斯的女主人公的早年生活的影响，我们在前文中已有谈及。因为，书的最后一段中，如我们可以看到的，劳伦斯用到了他在意大利山区的经历，尽管他没有让阿尔威娜逃走，就像他和弗丽达那样。

小说中阿尔威娜的意大利情人，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他的绰号叫弗兰西斯科·卡科帕多，这是劳伦斯借用了福恩塔娜·威克切娅的房主人的名字——弗兰西斯科·卡科帕多·西克西奥（在英国的版本中为西西奥）——关于此人的“罗曼史”，劳伦斯在 6 月 26 日写给艾米·罗威尔的信中谈及了。其时·西克西奥·卡科帕多在去美国的旅途中。劳伦斯写道：“杰玛和

她的一家，以及另外一千名难民，在奥地利人攻进来时，被人用船从威尼斯运到了这里。”杰玛，她的母亲，她的9个兄弟姐妹，都是光着脚丫到达此地的，他们身无分文。“西克西奥与她坠入了爱河。塔奥米纳因为西克西奥的富有和能说三种语言而感到恼怒，一个女人愤怒地对杰玛进行攻击，并撕破了他的衬衫”。与此同时，杰玛的家人莫塔斯对西克西奥疑心如狂，说他想把可怜的杰玛做他的情妇，他们还不相信他已结了婚。所以，这次他离开波士顿之前，他携带妻子去了威尼斯。我想，她是这么打扮的：穿着长统丝袜，小山羊皮鞋，乔其纱外衣，西克西奥为她买了顶帽子，但在这以前，她还从未戴过帽子：一个十足的农妇。

6月26日，劳伦斯写信给出版商塞西尔·帕尔默：“《美国古典文学研究》一书十天前我已修改完毕，大约7至8万字。赛克想将此书送到美国去，他将为英国购买书页。我倒希望它在英国出版，但我正在与美国出版者谈判。”——美国的托马斯·塞尔泽最终在1923年8月将书出版了，这比赛克在英国将它重新出版早了10个月。从他的《恋爱中的女人》的完成，到他那富于想像力的天才在西西里再度闪烁出奇光的这些年中，劳伦斯一直撰写那样的随笔——他后来在美国重写了其中的一些段落——《研究》一书是给人印象最深的、最富有创造性的成果。同时，它还是一本权威性的批判著作：恢弘渊博，只是常常有些随笔之意。尽管此书出版之后，使得许多评论家迷惑不解，但后来，探索着他们本国文学的美国批评家们（如埃德蒙·威尔逊、奥斯丁·华伦、阿尔弗雷德·卡辛及另一些人）对此书的奇光异色和巨大影响力表示了满意的惊诧。桑德·威尔德在为他哈佛的讲学准备他美国文学研究的讲稿时，写信给本书作者（1950年6月22日），谈到了劳伦斯的《研究》一书，“书中有些章节纯属胡说，但也有许多使人兴奋的见解和独到之处”。当20世纪最伟大的批评家（在英国）埃德蒙·威尔逊于1943年在他的美国文学批评论文选集《认识的震动》中再版了《研究》时，这使劳伦斯成了美国文学批评中的强有力的头面人物。

批评家们普遍认为，他关于麦尔维尔和坡的评论是《研究》中的佼佼者。在《莫比·迪克》中，《皮科特族人（17世纪初住在美国新英格兰南部的印第安人的一支）》是“美国的灵魂之舟”，而那白鲸是“白色种族最深远的血统，……他被我们白色的精神病意识的狂热盲目追赶，追赶、追赶着。”“坡”注定会处于那巨大的、连续不断的崩溃的骚动的灵魂深处，并注定要去记录这一过程。而且当他去展示那些人类经历中最为痛苦的过程时，注定会为其灵魂而哭泣。——但是，麦尔维尔和坡作为美国意识的典型代表，在其广度和深度的拓展上，还有更多的东西。麦尔维尔从他的《家里》和《母亲身边》逃到了南部诸海，然后，又从那炼狱中逃回到“家里”和“母亲身边”。在经历了一次次的挫折和南部诸海的渴望之后——坡是“一个进入了人类灵魂的深处、进入了人类灵魂中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秘密小径之中的冒险家。”另外，还有许多关于霍桑·韦兰克林、惠德曼和戴纳的论述，他运用了通俗的口语风格，这种风格比一般的文人学者正统笔法的效果更为突出。劳伦斯也许不知道该如何评述亨利·詹姆斯，因为和马克·吐温（死于1912年）一样，亨利·詹姆斯对他来说也许太现代化了。尽管他饶有兴趣地评论了《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但是，《研究》中没有论及梭罗，这是一个最大的疏漏。

（二）鸟、兽和西西里

劳伦斯所到之处都有传奇伴随，在西西里也不例外。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传奇的色彩愈加浓厚。例如，米兰一份名叫《科列雷德消息》的报纸，在1947年12月登载了一则关于劳伦斯在塔奥米纳的长篇故事。这是关于他主持一次早餐的报导——这则报道说，这是他唯一愿意见人的时候，他然后便给他们送来黄油面色，火腿、鸡蛋和牛奶。他就是这样来招待地方行政官员的重要客人的。照此故事说，一天早晨，市长来吃早饭，刚刚坐下，当他抬头看见半空中的一盘油煎土豆由劳伦斯向弗丽达扔来时，市长立刻就走了。尽管劳伦斯的农场主，弗兰西斯科·卡科帕多，也叙述过这扔盘子的故事，但这一位报道者——也像陶斯那群人一样，极富想象力的描写劳伦斯——所说的情况是值得怀疑的。他说，在塔奥米纳，英国国王曾悄悄地上岸，微服私访过劳伦斯，并向他表示了敬意。

然而，劳伦斯在意大利几次冒险，差不多与他人替他杜撰的故事一样的奇特，其中一个是说他在1920年4月和一群包括雷妮·朱塔汉萨德夫人在内的新相识的朋友组成考察队去锡拉摩扎的情况。朱塔后来写下了《关于科西嘉》（法国的科西嘉岛）和《戛纳和山丘》一书。这群人中还有雷妮·朱塔的兄弟简，他是位年轻画家，后来他为他妹妹的旅游书和劳伦斯的《大海和撒丁岛》画插图。简和雷妮是南非凯普顿的亨利·朱塔爵士的孩子。在西西里的旅程中，劳伦斯夫妇和朱塔兄妹都由艾伦·英索尔陪伴着，他也是个画家，是个富裕而又年轻的威尔士人。弗丽达对雷妮·汉萨德的做法印象根深。她以一个真正殖民者的经验，提着一只装食品的大篮子，带着一盏酒精灯，可以立刻将一节火车车厢变成一间临时房屋。劳伦斯在《阿伦的杆杖》中为其中的年轻游客借用车厢中的酒精灯的办法。他记得关于那次旅行的事，最有意思的是“那些可爱的日子，银莲花洒在西西里的田野上嬉戏，玉米强壮地举起她的洁白的皇冠。”但是，劳伦斯没有将此次旅行的撼人心旌的部分写出来，至少没有成书出版。

这是去兰达佐的一次游览，这是位于艾特纳黑色溶岩斜坡上的一座城镇。其地使得劳伦斯神魂颠倒。但他在马尼阿斯附近那座城堡的逗留却使得他十分恼怒。在城堡中，劳伦斯和其他一些人是亚历山大·尼尔逊·胡德布朗蒂公爵的座上客，此人是尼尔逊勋爵兄弟的后裔，公爵的爵位最初是授与他的。如简·朱塔所记载的那样，当劳伦斯夫妇和他的朋友们骑着骡子来到城堡时，公爵的六七位仆人蹒跚着出来迎接他们。尼尔逊·荷德的老态龙钟的仆人们穿着颇像教皇瑞士卫兵那样的一色的服装，这些颤颤巍巍仆人中的其中一位懂些英语，取下帽子，代表主人向他们躬身表示欢迎。一行人进入城堡，它那极其正宗的诺尔曼式的外观与其维多利亚式的内部装饰极不谐调，尽管这些与尼尔逊·荷德的妹妹的外表恰如其分，她非常喜欢仿效亚历山德娜女王的生活方式。这位公爵亲自来回走动，通过一块单片夹鼻眼镜注视他的客人。劳伦斯在愤怒之中和朱塔兄妹拟出了关于这个地方的讽刺短剧的概要，但不久他的幽默感全然丧失，并不得不溜之大吉。

他回到了塔奥米纳，经历了一次异乎寻常的冒险。到那里的第一天早晨，黎明时分，他听到楼道上响起了一阵走向平台的脚步声，发现马格纳斯在蹑手蹑脚地走来走去，“一件可怕的事发生了”。劳伦斯厌恶“麻烦事和惹麻烦的人”。当时，他听说了马格纳斯从蒙特·卡西诺逃跑。以及警察接踵而

至的情况：我不能让自己在那里被逮住，对不？因为修道院太庄严肃穆了。这位客人反对当地的清规戒律，实现上是从修道院的基金中抽钱借给了马格纳斯，他是匆匆下山，乘上了一列开往南方的火车：“我直奔你来了。当然，我内心是忐忑不安的：你可想像一下！在厕所间度过了大部分时间，直到那不勒斯。”劳伦斯问他是坐几等车来的。他坐的是二等车，但是当他终于到达（“累得死去活来了”）塔奥米纳时，劳伦斯正好在，他于是立刻住进了价钱最昂贵的旅馆中，满心期望着劳伦斯会用马格纳斯“手稿”的可能得到的收入替他付帐。马格纳斯绕着庭院大摇大摆地走来，赞美着这座别墅，言语之中暗示着劳伦斯一定十分阔气，那里有许多房间：“宏伟、壮观、极其富丽！……是塔奥米纳最漂亮的房子。”马格纳斯没有明确提到他的麻烦是什么，劳伦斯也不想知道，但他准确地猜想到这是他的一个骗局，他不愿将马格纳斯带到福恩塔娜·威克切娅那里去，不过，他还是付了旅馆的帐。马格纳斯三天中的开销比劳伦斯一周的生活花费还高。

弗丽达第一次见到马格纳斯时，就鄙视其为吸血鬼，而责备劳伦斯纵容了他。马格纳斯倚仗劳伦斯的经济实力，搬进了当地的一家别墅，在那里过着非常奢侈的生活，直到房主为他不付报酬，忍无可忍而将他撵走。在“受辱”之后，马格纳斯离开他那里，去了锡拉库扎，又启程去了马耳他和埃及。尽管劳伦斯“因他离去而自由了”，但他还是对马格纳斯怀有一种使人害怕的责任心：既然你厌恶这一寄生虫，就不能助长他狂傲的气焰。虽然劳伦斯极为谨慎地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但他从内心还是憎恨资产阶级。马格纳斯在一定程度上是个流氓，一直到马格纳斯死去，劳伦斯才了解到这个愚蠢而又可怜的流氓是显贵贵族的后裔，而对这一阶层是劳伦斯很少指责的。离开塔奥米那之前，马格纳斯叫劳伦斯到卡西诺去取衣服和手稿，但劳伦斯拒绝了。这不仅因为旅途劳累，而且更因为他不想受马格纳斯纠缠。尽管他对马格纳斯的行迹已是半信半疑了。

其时，如同大多数接触过劳伦斯的人一样，马格纳斯已经被他作为文学素材了。作为劳伦斯后来为马格纳斯的“自传”所写的导言的初稿，他将他写入了《迷失的少女》中，书中称他为梅先生，是一个英国小镇的美国剧团经理。在作品中，他揭示了马格纳斯最丑恶的一面；一个爱出风头的戏剧背景中的庸俗之物，诡计多端，牢骚满腹。诺曼·道格拉斯也在其中，他是以兰卡斯特的医生米切尔先生的身份出现的。

劳伦斯是1920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写完《迷失的少女》的，马格纳斯正是此时离开了塔奥米娜。数星期前，塞克最终给劳伦斯提供了他所要的帮助：出版《恋爱中的女人》和《虹》，版税是：前2000册，每本1先令，2000至5000册，每本1先令6便士，5000册以上，每本2先令。

与此同时，美国新兴的小出版社托马斯·塞尔特译出报社也在与劳伦斯和缪恩特塞磋商出版《恋爱中的女人》的事，这是那年12月所出的一种高档的版本。那时，劳伦斯已甩掉了平克，他在贫穷的战争年代为他的利益所作出的真诚努力大部分是徒劳的。两人十分友好地分了手。在此后一年左右的时间中，平克偶而也给劳伦斯寄去一张支票，支付他的一些拖延出版的作品。他还寄回了一份手稿，这手稿中的故事，不久便卖给了柯梯斯·布朗的杂志，他是美国报人，创办了伦敦一家最大的报业中心。这些故事大部分收入了1922年的集子《英格兰，我的英格兰》中。不过，有一个例外，这就是短篇小说《狐狸》，它由劳伦斯在塔奥米那再次修订后，收进了1922年出版的中

篇小说集中：一本是美国版的《上尉的玩偶》，另一本是不列颠版的《瓢虫》。

完成《迷失的少女》仅两天，他就一头扎进了新小说《诺恩先生》的创作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他由来已久的要创作一部关于英国中西部的罗伯特·彭斯的小说的志向的一次实现。他以伊思猩为背景，在《迷失的少女》中称之为伍德霍斯。甚至将阿尔维娜·霍夫顿也写成了一个次要角色。他的主人公，专嗜调情的校长吉尔伯特·诺恩，又是他的“堂璜式的”朋友乔治·尼维尔，他曾在劳伦斯的戏剧《已婚的男人》中作为医生的形象出现过。迄今为止，《诺恩先生》还只出版了第一部。不过，劳伦斯还不止写下这一部分，其余的部分被发现于1972年在纽约举行的一次拍卖中，其卖出价为17000美金。

在他开始写作《诺恩先生》的同一个月，劳伦斯借同弗丽达和他的一个老朋友去了地中海的另一岛屿。他在5月28号给凯瑟琳·卡斯威尔的信中写道：

玛丽·加农在引诱我们去马耳他——我们准备只逗留两天，——不巧遇到了船抛锚。所以，我们只好闲居了12天后，于今晚才回去。呵，这里的東西极其昂贵，我感到特别不舒服，马耳他是个怪异的世界——一个干燥，砖窑似的岛屿，它干燥得使人们觉得自己会像爆米花一样爆裂开来，到处白光耀眼，使人牙齿发酥。瓦莱塔港是一处游览胜地，景色非常优美！不过，我对英国政府很反感，我相信，这是很正常的。只是有些扼杀生命的嫌疑，这阻碍了人的创造活动的充分发展，让人常常产生出折衷而又不舒适的情感来，这是我全然不能接受的。

我找到了你的两封信和支票，你明白，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动用的，我为你保存在这里，以便你需要时用。

卡斯威尔夫人又拿出的这50镑，是她的小說《打开门》获头奖所得的奖金的五分之一。5月31日，劳伦斯给她写信说：“至于支票，我突然决定把它烧掉。我从美国得到了两千里拉，足够花销了。我为什么要用你的钱呢。所以，我虽然把它作为礼物接受下来，但还是将它烧了”。一个自己并不富裕但又不愿意接受友人慷慨解囊的人，是有点对马格纳斯这样的寄生虫发牢骚的。当然，尽管道格拉斯高傲地嘲笑劳伦斯保持着“中产阶级的传统”（道格拉斯语），即守着“介于我和世界之间的数镑钱”（劳伦斯语）。

在马耳他的旅途中，劳伦斯自然又遇到了马格纳斯，首先是在锡拉库扎，因为轮船抛锚，他被阻留在那里。他又一次给劳伦斯一张旅馆费帐单，劳伦斯又为他付清了。在马耳他，他发现要避开马格纳斯是不可能的，因为马格纳斯将他介绍给了两个年轻的马耳他人，而他们又是蒙特·卡西诺旅馆主人的朋友。以后数月，每当马格纳斯那无法躲避的债务必须偿还时，这两个马耳他人就表现出劳伦斯似乎应当为他的困窘负责的样子，尽管他们在遇到劳伦斯时就知道了马格纳斯是个什么货色。

一回到塔奥米那，他“庆幸自己又在家里了”，并确信马格纳斯“也被安全地禁闭在那令人厌恶的岛上”。但没有多久，劳伦斯又一次离开了“家”，——正如他后来在同年于一封未曾出版过的、写给凯瑟琳·卡斯威尔的信中所说：“6月以后的塔奥米那太炎热了”。——但他还不愿意陪同弗丽达去德国。所以，他们8月2日回到大陆以后，分居了一段时间，于秋天又回到佛恩塔那·威切娅。此时，劳伦斯去了那不勒斯、阿马尔菲、菲乌济、（后来为安拉科利）。罗马、佛罗伦萨和意大利北部的许多地方。

劳伦斯后来重新回忆起 1920 年穿越这个国家的那次旅行，觉得此行给他的印象十分深刻：“佛罗伦萨正陷入持续不断的社会主义暴乱之中。突然枪声大作，石块飞进人们还正在喝咖啡的餐厅，所有的商店都突然因遭禁而关闭。”当他再去佛罗伦萨时，所见到的都是意大利法西斯党徒的游行队伍和书写着“国王万岁”的旗帜了。劳伦斯颇富有洞察力，他在后来的几年中，将这些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写入了他的《阿伦的杆杖》、《袋鼠》和《疯狂的毒蛇》几部“代表作”中。

劳伦斯于 9 月 12 日在佛罗伦萨的边境写信给艾米·罗威尔说：“我已在绕科默湖和威尼斯游览，眼下我正在一家被炸坏了的别墅里，我将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这是一位朋友为我提供的。”——这位朋友叫罗莎琳·班尼斯（后来的 A·E·波费姆夫人），她前一年夏天在潘格堡时是劳伦斯夫妇的女房东。她在佛罗伦萨北方的山地租赁的别墅的窗子已因附近弹药库爆炸而毁尽。她搬到了高处，住在菲索尔。劳伦斯在住在无窗别墅中那段时间时常去那儿，坐在她的阳台上喝茶或者进餐。

在这所卡诺威亚·圣·杰瓦西奥别墅里，劳伦斯写下了《鸟、兽和鲜花》中的大部分诗篇，还包括《石榴花》，后者排在集子的前面，是以这么几句现在已经闻名的诗句开头的：“你说我错了，/你是谁，谁有资格对我说我错了？我没错。”在威尼斯这个“令人讨厌的、绿色的、使人难以捉摸的城市，”石榴花“像一个例挂的、镶着绿色金属的皇冠，”不过现在塔斯卡尼的“石榴暖人之手……如果你有勇气，不妨触摸它的裂缝”！在《桃子》一诗中，劳伦斯又一次找到了阴门的暗示：“为什么有槽缝？/为什么有着两瓣可爱的圆唇？”这是在人工制作的桃子中找不出来的，“因为我这样说，你会向我投掷什么东西，/来吧，你可以拿去我的桃核。”《无花果》一诗叙述的是他在圣·杰瓦西奥的另一次经历：

无花果是个十分羞涩的果子如果你注视着它竖立的茂枝，
你马上会意味到它在象征
生气勃勃的男性。
不过，你若追究它的深义，
你将会附和罗曼司，它是女性……

此诗的另一一些诗引是对女性之隐秘的探索和女性最终想摆脱掉这种隐秘的愿望，从而得到即刻的“证实”。但是，“绽开的无花果将不再为人珍爱”，这些诗句以及那些描述佛罗伦萨近郊生活的诗引，都不是纯粹抽象的了。《山楂树和花楸果》一诗赞美了俄耳浦斯和狄俄尼索斯在地狱中的恋爱，以及在“地狱的风飕飕、浓荫遮日的宁静小道”上的永别。他发现“它的自我孤独”在“所有奇异的伴侣中最奇异，/也最美丽”，“最终陶醉于浓醇的孤寂”。这一组诗中的最后一首《葡萄》，赞美了浓烈的美酒，它将人带进“一个碧绿、模糊、蹒跚、全然无声息的世界”，它是《圣经》中大洪水之前的世界。但是，现代人紧紧攫住了他们，“种种民主的权利、林荫大道、电车、警察”，寻求着苏打水以保平安。

左圣·杰瓦西奥，劳伦斯还创作了《传道的野兽》，是关于《福音书》的四位作者的。在这段时间，他可能还在佛罗伦萨或附近写了《乌龟》。当他回到威尼斯与弗丽达相会时，他于弗丽达到达的前一天 10 月 7 日告诉凯瑟琳·卡斯威尔：“我在佛罗伦萨写了一本我极喜欢的小诗集。”也许是指六首《乌龟》组诗。在乌龟的形象中，劳伦斯渗入了男人的性经验，在处于一

种同情、取乐和介入的心情的劳伦斯看来，它是细腻而又浮躁的。乌龟是一个“可怜的、世俗的、喜欢居家守室的地狱判官”，它外壳上的痕纹是性的十字架。

在那封从威尼斯写给卡斯威尔的信中，劳伦斯说他“仍在我的那部小说《阿伦的杆杖》的写作之中。但在塔奥米那，我将加紧工作并开始新的计划”。同时，“威尼斯看上去挺漂亮，但生活很不景气。是个渡假胜地，意大利唯一的一个。意大利让人觉得很难以捉摸，我第一次感到有些惧怕，意大利人在一种突如其来的‘红色’情绪中会干出什么来。不管怎样，西西里将是相当安全的”。

在他的漫游中，劳伦斯曾写过一篇散文，《阿美利坚，听听你自己的声音》，此文登载在12月的《新共和国》上。他描述了美国人对欧洲的博物馆陈列物的敬仰，然后说他们“必须步红种印第安，阿兹台克，马雅和印卡斯人生活的后尘……他们必须继续被考迪斯（1485—1547，西班牙征服者——译注）和被哥伦布扼杀了的生命之脉搏……他们的总统该回顾的不是格兰斯通（1808—1898，英国政治家、首相——译注）、克伦威尔或希尔德布兰（即英国国王乔治二世——译注），而应该回顾一下蒙梯佐马（1466—1520，阿兹台克国王，被西班牙征服者所杀——译注）哦，阿美利坚，听听你自己的声音吧，别去听欧洲的声音。《新共和国》杂志的编辑之一沃特·利普曼对此文作了答复（是通过玛丽·奥斯汀作答的，她后来在新墨西哥遇到了劳伦斯）。利普曼说，美国“是一个移民的民族占据了一片几乎是空无人烟的土地，”消灭或拘禁他们在那里发现的“土著人”。利普曼在1920年曾指责美国人以压倒多数的优势选了一个总统（哈丁），他在反对优秀人材方面可谓登峰造极，他认可美国人的低级趣味，认可那些官僚主义者禁止劳伦斯的小说邮寄入境。然而，在利普曼看来，劳伦斯对美国及其传统的“高贵而野蛮”的看法是“相当肤浅的”。显然，利普曼没有读过劳伦斯登载在《英文周刊》上的《研究》，或也许没有看到文章中那些随着时间推移而越来越明显的独到之处。劳伦斯也许没有理解利普曼对他那些半诗化的陈述所作的书面答复，显然，他没有再作辩驳，尽管他的一些去新墨西哥以后的作品表明，他已改变了他的观点。在诸如《骑马出走的女人》和《癫狂的毒蛇》中，他虽然赞颂了古代印第安人的礼仪，但他常常意识到他与红种人之间是有一种差异的。他1923年的文章《印第安人与英国人》阐明了这一观点，尽管这篇文章，像在他的新墨西哥诗作《红狼》中一样，展示了他的一种矛盾心理。在《印第安人与英国人》的末尾他说，“我从不曾否定他们，或与他们绝然分开。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永远往前，愈来愈远……我站在他们篝火的边缘，既未被拒绝也未被接受。我的道路是我自己的，年老的红胡子的父亲，我不能再敲打我的鼓”。这些章句当然是对劳伦斯前途的预见，但在这里，它们对劳伦斯在《新共和国》上的文章和利普曼的书面答复作出了评论，它们也为劳伦斯后来的态度提供了线索。在他写此文章的时候，他正在阅读美国作家的美国文学作品，对有关印第安人的故事印象尤为深刻，尤其是库柏的作品，尽管他在《迷失的少女》中曾取笑过印第安人。不管怎样，利普曼触到了劳伦斯思想的弱点，他性格中的那种荒唐的极端之念，后来促使他写下了《癫狂的毒蛇》一书。

劳伦斯和弗丽达在10月20日回到西西里，此时正值毛利斯·马格纳斯在马耳他受到窘困。在22日，那位为他作担保而使他能够继续留在那里的马

耳他人撤消了他的担保，因为他得知，马格纳斯正在“寅吃卯粮”，而且在当地债台高筑。11月4日，两名警探来传讯马格纳斯，并与他们同去警察局。他们没有言明他们在警察局有送还罪犯回国的证件。马格纳斯将警察锁在门外，写信给他在蒙特卡西诺的主人（“我无法再生活下去了，请为我祈祷吧”。）然后他便喝下了氢氰酸。警察破门而入，及时请来了一位牧师，在马格纳斯临终前为他行了涂油礼。

从马耳他和蒙特卡西诺来的信件和报纸给劳伦斯带来了这一消息：“我知道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曾说过，‘是的，如果他找不到自己的路，他就得去死’。”除此之外，此时，劳伦斯还“意识到了——一个穷愁潦倒，陷入绝望的人的处境：一切都显得静止不动了。如果我把我的一半钱分给他，也许能救他一命。但我宁可不去救他”。因为，马格纳斯有罪于“犹太式的背叛”，他将劳伦斯的善意出卖，以换取他想得到的几个银币。然而，在他的妄自尊大中有一些英雄气概，“他是一颗奇特的、颤动的小星座”。而且，劳伦斯还发现，马格纳斯甚至带有皇家血统。他对德国人的憎恨是多余的，因为他的母语是德语而不是英语：“但也许当他的血统被带到美国之后，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根据对欧洲重大的政治秘闻无所不晓的大修道院的唐·马迪诺所言，马格纳斯从其母亲方面追溯，是德国皇帝弗里德里奇三世的非婚生孙子，弗里德里奇是威尔赫尔姆二世的父亲。诺曼·道格拉斯则认为，马格纳斯是更早一位德国皇帝，威尔赫尔姆一世的孙子。

马格纳斯曾留下一张便条，说诺曼·道格拉斯是他的遗稿保管人，但他在马耳他的那些债权人拒绝将他的手稿转交给道格拉斯。他们将外国军团的（退役军人俱乐部——译注）《回忆录》寄给了劳伦斯，劳伦斯同意将它准备出版，尽管直到1924年它才出现在他的书中。然后，道格拉斯在他的一份小册子《D·H·劳伦斯和毛利斯·马格纳斯：争风吃醋》中抨击了劳伦斯，文章指责了劳伦斯在外国军团的介绍中，对马格纳斯（以及道格拉斯）的做法，还指责劳伦斯从马格纳斯的遗稿保管人道格拉斯那里非法获利。

阿尔丁顿报告说，道格拉斯在写此篇攻击性的文章时，受到了一位憎恨劳伦斯的有钱妇人的纵容，她给了他100镑，让他撰文攻击劳伦斯。道格拉斯在《迟晚的收获》（1946）中否认了此说：阿尔丁顿在《匹诺尔曼》（1954）中说这种否认是无效的。（阿尔丁顿和劳伦斯在1954年的一篇杂志的文章中都受到了南茜·坎纳德的指责，这篇文章是在她为道格拉斯所写的传记《伟人》出版后不久所写的。）

劳伦斯对道格拉斯的《争风吃醋》一文一直未加注意，直到1925年，当道格拉斯将此文重新发表在他的《实验》上时，劳伦斯才担心“自己可能会受到诽谤”，便在《新政治家》上作答（1926年2月26日），说他对马格纳斯的描述是真实的，他为马格纳斯撰文只是为了帮助他在马耳他的那些债权人，而且，说服出版人出版那本书化了好几年的时间，因为出版人只想出引言部份，而此书出版后的收入，只能偿付劳伦斯借给马格纳斯的部份钱款，而那位马耳他的主要债权人米歇尔·鲍格，却能得到全部的偿还。劳伦斯引用了道格拉斯（1921年写给他的一封信中的斜体字：“你可用任何方式，按你的意愿处理这些手稿……你自己可收下所有的钱款。”

有关这场纠纷的不愉快话题随着他的下葬而告结束了，他的几位马耳他朋友出钱为他在贫民墓地举行了葬礼——后来那位寡妇出钱重修了墓。马格纳斯在将那位警察锁在门外，喝下毒药之前写下的遗言中说过，“我希望得

到一等的葬礼 ”。

（三）欧洲大陆的中部

1921年1月的第3天，劳伦斯和弗丽达在拂晓前起身，启程去撒丁。从对这第一天早晨的描述（“这位社交界女皇穿着半露的衣裙颤抖着，不高兴地挥动着蜡烛，”外面，“在黑暗的天空和黑暗的爱奥尼亚海之间有一道长长的、预示着不祥的红色狭缝，可怕的老牡蛎将生命如此长久地衔在它的双唇之间”）到最后一页（乘蒸气轮回来时，早晨在几片抹着金色阳光的白云中来临：西西里海岸在远处露出了一抹青灰色”）——劳伦斯的游记《大海和撒丁岛》是他们旅程的完整记录。

书中有关于乘坐沿海列车去巴勒莫长途旅行的描写，“雨，下个不停的雨，一抹湿灰色的天空，一抹湿灰色的大海，一列灰色潮湿的列车沿着一个个小海湾曲折向前，穿过长着柠檬树的山丘下的隧洞；书中有卡利亚里，他们在撒丁岛的第一个港市，”一个裸露的城市，高耸的陡坡，陡坡，金光闪烁……没有树木，没有遮掩，光秃秃而骄傲地峙立着，好像是在遥远的过去，像一个在弥撒书中的僧侣们的城市……它确实有这种奇怪的外观，好像只能看而不能进入”；书中有那些农妇村姑，她们穿着长裙，上面是深兰和红条相间的图案，”所以，当她们行走时，“显得五彩缤纷，好像是丽鸟在炫耀它的羽毛”；书中有那穿着脏衬衣的酒吧男招待，在那个山石嶙峋中的小酒吧里，那个人“没有眉毛，笔直的黑发直垂到他的眼皮上”；书中还有……但是，像《大海和撒丁》这样一本充满诗情画意、色彩缤纷、充满了运动和感情的巨著，是无法予以概括和解释的；你必须得亲自去读。

劳伦斯和弗丽达从岛的南端卡利亚里，到了岛的北端特拉诺瓦，劳伦斯画的一张小地图标明了他们的路线，坐火车或乘汽车，上山或下山。在岛的腹地，天气很寒冷，食物很差，大多数的旅馆房间都很脏。对劳伦斯夫妇来说，这是一次“追溯久远，久远往事的旅程”，最后他们终于意识到“一切都解决了。一切都知道了：明白了，明白了”，劳伦斯感到，人类必须向前行进才能得以完善，必须向前走到那些“未被人知，未被开发的土地上，那里的盐还未失去它的原味”。

劳伦斯和弗丽达乘火车向意大利南部行进，他们从撒丁坐船到了契维塔韦基亚，又从那里到了那不勒斯，在那里，他突然看到了高山之巅的蒙特卡西诺，又一次地被它吸引。“在一阵狂热之中”，他向弗丽达建议说他们下车去那里住一夜，“去看看另一个朋友，那些身在世外而熟知世事的僧侣。”弗丽达对此主意感到不寒而栗，她不愿“在这可怕的寒冬中去那个没有一点火星的庞大的石砌修道院”去过夜。计划因此而放弃了，劳伦斯在卡西诺车站只下车呆了几分钟，”去弄了点咖啡和糖糕。”

回到塔奥米纳后，劳伦斯给好几个朋友去信说撒丁岛不是个久居之地。（这当然是在那里的海滩变得出名和许多现代式的旅馆建立之前。）至于托斯卡纳，尽管要比西西里更有生机，但他还是情愿在塔奥米纳多呆一些时候。他曾说要去探望他的姐妹，但他不能渡过海峡跨上“悲哀凄凉”的英格兰大地。如果他“知道如何联系的话”，他可能会加入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行列，因为“进行一次真正的斗争的时间到了。那是我唯一关心的事：一场殊死的斗争。”他不喜欢政治，但他觉得“必须而且应该很快就开始一场激烈的革命”；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会加入进去的。

与此同时，劳伦斯的作品在英语国家里又一次地被大量的出版。美国版

的 1920 年的《新诗》引起了大多数言辞尖刻的评论家的注意，评论主要是针对其前言的；雷蒙德·M·韦弗在《读书人》上说，那诗集表现了“ 对一个在缪斯的画像前卖弄的可怜的小人物的同情之心。” 由托马斯·赛尔泽在 1920 年 11 月出版的《恋爱中的女人》的删节本也引起了广泛的评论；埃佛琳·司各特在《罗盘》中称此书是一部忏悔录：“ 写了此书之后，劳伦斯可能会变成哲学家或牧师。” 她对他的结尾部分感到不满：“ 如果劳伦斯先生是个俄国人，他或许能从艺术中找到生活的答案，” 但因为他属于“ 英国的道学家那一类”，他就得坚持“ 寻找出一些生活现实中的答案”。

在 1921 年 5 月，即牛津出版了他的历史书（以劳伦斯·H·大卫森署名）的两个月之后，《恋爱中的女人》在赛克的印刷标记下大胆地出现了。博顿利的《约翰牛》不失时机地对小说进行了攻击，称此书是“ 对性剥夺的丑恶的研究，会导致青年人陷入一种无法启齿的灾难”。莫里没有在杰拉尔德·克里奇的形象中认出自己，全神贯注地也读完了“ 500 多页充满炽烈感情，一波又一波夸张的、愈演愈烈的、推向遥远的不可见的结尾的描写，” 读罢掩卷，莫里觉得此书不知所云。当然，他也发现了此书是淫秽之作。早些时候，当赛克出版了《迷失的少女》时（1920 年 11 月），莫里就宣称劳伦斯也进入了一种“ 衰退” 的阶段。劳伦斯的作品在他的一生中唯一得到的官方承认——1921 年爱丁堡大学的詹姆斯·退特·布莱克奖——是劳伦斯小说创作中成就最小的几部作品：《迷失的少女》以及《侵入者》和《处女和吉普赛姑娘》为他赢得的，此奖的奖金为 100 英镑。劳伦斯写信感谢了拉歇尔·安纳恩德·泰勒，他作教师时的一位朋友。感谢他在评奖中对《迷途的少女》的推举。

1921 年 4 月初，弗丽达启程去巴登—巴登，劳伦斯陪她同行到巴勒莫。艾尔丝·贾菲来电报说她母亲病了，劳伦斯起初以为这是一个花招，但后来的通信表明了并非如此。独居塔奥米纳时，劳伦斯感到“ 弗丽达不在时，屋子显得空荡荡的。很不喜欢，” 虽然人们时常请他去喝茶用餐，但他不想接受邀请。在一个月的寂寞生活之后，这个月中米利森特·贝弗里奇为他画了肖像（“ 在我看来他是个非常可爱的年轻人” ），劳伦斯决定去德国与弗丽达相会。但在路上，他时时停下来作些访友活动。

在开普利，他遇见了厄尔和阿克沙·布鲁斯特夫妇。数年以前，这两个美国人曾在芳塔娜·凡奇亚度过了他们的新婚蜜月。他俩成了劳伦斯的莫逆之交。他们对绘画和佛教感兴趣。数年后劳伦斯他的故事《玩艺儿》中对这两个被詹姆斯国王放逐的美国人进行了嘲讽。在开普利遇见他们不久之后，他便将《阿伦的杆杖》的情节详尽地告诉了他们，甚至讲到了阿伦离开他妻子的细节。于是他们建议，阿伦必须“ 去蒙特卡西诺并作忏悔，或重新走过整个经历”。劳伦斯笑着表示同意，因为他开始打算将阿伦放进修道院，但现在他决定应该让他“ 经过毁灭然后从深渊底部自己寻找可行的道路”：而不是根据劳伦斯式的本尼迪克特的规则。

劳伦斯对布鲁斯特夫妇的建议的采纳使他们很高兴。他们本以为劳伦斯是个愁眉苦脸的人，没想到他原来是一个快乐的伙伴。布鲁斯特夫人认为，劳伦斯的短小扁平的鼻子很像苏格拉蒂——而从他留着的胡子看，他有点像威斯特勒为卡莱尔作的肖像。在离开塔奥米纳之前，他去参观了一艘地中海帆船，如果他有钱的话，他很想买下这艘船。他对布鲁斯特夫妇说，如果他们拥有这么一艘船该有多好，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航行世界的任何地方。在

与他们的通信中，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这个想法。

在离开开普利之后，劳伦斯在西行的旅途中在罗马和佛罗伦萨作了短期逗留。在佛罗伦萨，诺曼·道格拉斯将他介绍给了丽贝卡·威斯特，她是他最热情的崇拜者之一。她发现他像孩子一样易交朋友，抑或像一个年老的哲学家，能够一眼就发现另一个人性格中的优良之处并与他倾心相交。在带她去见劳伦斯之前，道格拉斯笑着告诉她说他的这位朋友刚刚到达，并说他有习惯，就是当他一到某个地方，他常常径自走进他的房间，对这个地方作详尽细致的描写。当他们来到他在阿诺（或许是贝尔切丽旅馆，即《阿伦的杆杖》中的贝尔托利尼）的下榻之处时，他们果然发现劳伦斯坐在一架打字机前。道格拉斯问他是否在写一篇有关佛罗伦萨的文章，他说是的。听此回答，道格拉斯放声大笑起来。这种笑声，丽贝卡·威斯特回忆说，“像一个色情狂一样充满邪恶”。

劳伦斯向她和道格拉斯以及雷基·特纳诉说了旅途的不适。她后来意识到，“这种旅行对某些神秘人物来说总是必要的”——当然这是对劳伦斯的那种众所周知的不安情绪的最好解释。丽贝卡·威斯特认为他的漫游像印度的游方修士和俄罗斯的先圣一样，经历的是精神上的旅程，而不为了到达某个地理上的目标：“看来，劳伦斯漫游四方，是为了寻找他一次又一次痛苦地捕捉的那种人类的启示性幻象。”

在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劳伦斯启程去德国，途中经过了瑞士。在巴登—巴登，他发现他的岳母已经开始康复，他便和弗丽达远去3英里，在爱卜斯坦堡村的一个叫克罗思的简陋旅店住了下来。在此以前，弗丽达和她的母亲住在路德维格·威尔海尔姆斯迪夫特，这里是露易莎女公爵为上流社会的寡妇创建的一座休养院。劳伦斯对那里的老妇人们很客气，当他笑着向她们点头致意时，她们称他为医生先生。但那位巴洛宁·冯·里奇索芬太太却提心吊胆，生怕一些妇人们会去谈他的小说。

6月16日，劳伦斯写信给艾米·罗威尔的伙伴，埃达·拉塞尔夫人：“我们来德国已两个月了，因为我的岳母病得很厉害。”但她已经好多了，将很快去爱卜斯坦堡与他们同住。爱卜斯坦堡“确实十分可爱——一个黑白相间的小村，周围绿林环抱，位于黑色森林的边缘，远处下面的平原上，流淌着莱茵河，平原的远处是孚日山脉”。德国看上去是“如此辽阔，如此静谧：陌生而沉寂，与战前大不一样。在这样一个人们不像其它地方那样财大气粗的国家里是比较愉快的。”可惜的是，他不得不补充道，“人们不再有什么钱了，除了那些投机商人，主要是犹太人。巴登·巴登到处是这些犹太人”。像平常一样，他忽略了巴登—巴登之间的分号，但更为严重的错误是，他将犹太人同暴发户等同了起来：历史研究表明，在霍亨索伦帝国的威玛共和国时代的德国，富裕的犹太人是为数不多的。确实，在希特勒上台时的1933年，德国的犹太人仅50万，不到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一。从20年代到40年代期间，纳粹的宣传基本上是个谎言，这一点劳伦斯应该看得清并加以反对的。

应当承认，他有一种反犹太人的倾向（但与纳粹并无共同之处），这种倾向时有表现，如在一封信中他曾提到过威廉·海因曼的“犹太血统”，在另一封信中谈到他后来的出版人托马斯·塞尔译时，他称他为“一个小犹太人，但是在我看来是可信的”——他是用了那个可怕的连词后才接受他的。

有些评论家认为弗丽达出生于一个犹太人家庭。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对于劳伦斯偶而的反犹太人言论是一个特殊的讽刺。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

何研究者可以证实冯·里奇索芬家族是犹太人。弗丽达的女儿巴巴拉·巴尔夫人 1961 年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一次谈话中说，她的外祖父，冯·里奇索芬男爵曾对他的几个女儿说他不在乎她们选择什么样的丈夫，只要他不是个赌棍，或一个教师，或一个犹太人——不幸的是，他的三个女儿接二连三地违背了他的告诫。

在劳伦斯的反犹太人的言论中，最不可原谅的也许是他注入《袋鼠》中的索默斯——劳伦斯意识中的那些观点。在战争期间，他想到也许会被“德国军国主义分子的铁蹄所践踏”。但是：“如果一个人注定要被践踏的话，宁可被一只铁蹄践踏，也不要被一个犹太钱商踩上一脚。”这段话出现在 1923 年 9 月马丁·赛克出版的该书的伦敦版上，后来在托马斯·塞尔泽不久在纽约发行的版本中，这段话就不一样了。劳伦斯修改了上引的那段话，所以后半句改成了这样，“也不要被一个口蜜腹剑的钱商踩上一脚”。也许是出于对他的出版人的尊敬他才作了这样的修改。1923 年 8 月，他在塞尔泽的新泽西的住处对美国版的校样作了修改。不管怎样，也许仅仅是因为面子关系，他才决定从这本匆匆而就的小说中改去那个攻击性的词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新的美国版《袋鼠》中，像最新的英国版一样，又出现了“犹太钱商”这个词——这是缺少对劳伦斯正式版本的注意和对作者最后想法的遵守的又一例子。

一位美国评论家在评论此话题时，对所谓任何人的“稍有些反犹”的讲法很不以为然；在此问题上，就像一个人不能“稍有些怀孕”那样稍有些这样的倾向。这是一个有局限性的观点，因为许多英国人、美国人和法国人在本世纪初还稍有些反犹的倾向，但在希特勒上台之后便改变了他们的看法。怀孕是一个绝对概念，而反犹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然这对于那些疯狂的极端则另当别论了。遗憾的是，这样的极端分子在我们中间仍为数不少。

劳伦斯的反犹倾向，尽管这种倾向是那么的愚蠢，是和当时许多中产阶级英国人的观点一样的（从许多方面来看，他已经成了这个阶级的一员），并不深刻、恶毒或疯狂。相反，这种倾向是温和的，不加思考和随心所欲的。如果劳伦斯活得再久一点、知道纳粹的死亡集中营的话，他的这种观点在布痕瓦尔德（德国市镇，1934—1945 年德国法西斯曾在此设立集中营，残杀爱国者和战俘）之后肯定会荡然无存。

1921 年在爱卜斯坦堡期间，劳伦斯撰写了他《无意识的幻想》一书的大部分作品，此书是前不久在纽约出版的《精神分析和无意识》的续篇。乔治·索尔在《民族》杂志上评论后一本书说：“在其可怕的外表之下，书中所论看来与我们今天所感觉的东西似乎有一种模糊的联系。”索尔继续说，如果劳伦斯在表达他的这种思想时用了“小说或诗歌的形象而不是他不在行的专业术语，他也许能写出一部伟大的小说。”索尔这位在经济学和精神分析学方面都有权威的评论家所作的这一判断，也许对劳伦斯这两本有关无意识的专著都适用。这两本书是更全面地了解劳伦斯的指南——他指出它们是他小说的“解释”——书中包括了这样一些有趣的论题，如人际关系、教育以及关于爱情的正确或错误见解。其中有些观点和术语来源于神知学，对人体的“上部”和“下部中心”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其中也有些关于那个沉沦了的阿特兰提斯洲上原先存在着一个比历史的传说所称的更为“伟大的”社会的荒谬之说，尽管如此，劳伦斯的观点毋须受到 H·L·门肯对那本书第一卷的精明老练的评判。门肯认为那书“有效地间接证明了现在的看法，即劳伦斯并非

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他的书并不算坏，但完全是孩子气的。”劳伦斯自己并没有像对他的其它作品那样，为这两本书作什么辩护。在后来的几年中，他很少提到它们。至今为止，也没有发现他在什么信件中认为这些书是重要之作，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他艺术构思的部份显示：在爱卜斯坦堡完成的《阿伦的杆杖》的最后部分显然与《幻想》一书有密切关系。一位近期的批评家，彼得·巴尔伯特（D·H·劳伦斯和韵律心理学）在评价《虹》一书时指出了这些“过分乐观”之作（劳伦斯语）的价值。

劳伦斯在西西里写完《幻想》的最后一稿之后，他写了一篇较长的跋。早些时候在德国时，他曾写过一篇较为简短的跋（后一篇是根据前一篇修改的）。这篇跋到最近才被发现，在这里是首次发表。此文表明了他当时（1921年6月）的一些想法，尤其是有关美国的：

该死的哥伦比亚！——我为你撰写了此书，不管你是否喜欢它。我想哥伦比亚指的就是美国。我想从词源学上来说，此词的意思是一窝斑鸠（Columba）一词在拉丁语中是野鸽子之意。在星条旗的树杆上的一窝可爱的斑鸠。

不管怎样我为你撰写了此书，哥伦比亚，如果你感到受了恭维的话，该有点受宠若惊吧。我将把此书轻轻地放在你的自由女神像的脚下。如果这位夫人不喜欢它的话，她也不至于将它踢到海里去。不然，我将再把它拾起，将它挟在我的腋下，就去找老山姆大叔。我对他的智慧更为信赖。但曾经能阅读，而且能精明地阅读。所以我印象中有他鼻梁上架着老花镜的形象。

实在是有人该有所行动的时候了。而老是像走马灯似的兜圈子是无济于事的。白云在那里有一根云柱，如果你真想睁眼看一看的话，在晚间它就是一根火柱了。我已经亲眼目睹了它，让我们从毗斯迦山（《圣经》传说摩西从此山眺望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迦南地方——译注）的高处下来然后启程再一次去穿越那片荒野吧。因为我们太自高自大了。

尤其是你，阿美利加。你是否认为你的民主会使你延年益寿？不会的。它已经日薄西山。它已经临近了周而复始的那个起点。你只是从欧洲带来了一棵半大的树，将它移植到你的苍穷之下，让它长成一棵巨枝大树，大得无法长久地生存下去。现在这棵树的中心已经蛀空，你必须去播种新的种子了。

我认为我的这本书是一本真正的美国书。如果没有美国，我就不会写此书。所以，现在你不能对它置之不理。

我将它奉献给你。我要让你看看我这匹馈赠之马的牙口（英语谚语：馈赠之马指价值有问题的礼物——译注）。这匹马的牙口还完好无损。但因为这是一匹杂色的小公马，你可不要去抽打它的臀部，或在它的尾巴下放热煤渣。假如你那样做的话，它会感到悲伤的。

我打算过些时候再为你撰写一部关于一些更为复杂的事物的书。但不是马上能写出来的。

啊，哥伦比亚，亲爱的西方的小鸽子。我为你写了此书。我是在1921年这个恩赐甚少的珍贵年头的6月于巴登·巴登的爱卜斯坦堡附近的森林中写下此书的。亲爱的哥伦比亚，我知道我跑到邪恶的德国去为你写此书是不太体面的。但我不得不使你这样惭愧难当。

不要怀恨在心，亲爱的。如果你真是那样去想，就将一切都向山姆大叔倾诉吧：如果这位可尊敬的绅士还健在的话。但如果他已不在人世，那么就让自由女神将这本书、这匹杂色的小马驹和这一派胡言乱语踢到垃圾箱里去吧。

7 月中旬，劳伦斯和弗丽达穿过了瑞士进入了奥地利山区。从策尔越过了湖之后，他们到达了萨尔茨堡附近的苏默斯巴什，住在弗丽达的妹妹纽奇，当时的麦克斯夫人家里。纽奇正要结束她与一位退役军官之间的尴尬婚姻。这位军官可能是中篇小说《上尉的玩偶》中瑞杰朗斯特拉·特雷普特先生的原型，此故事的后半部分发生在泽勒地区，劳伦斯离开那地区不久便写了此书。弗丽达和她的妹妹是故事中汉妮尔伯爵夫人和米契卡男爵夫人的现成原型。至于那位苏格兰军官，劳伦斯可能是借用了唐纳德·卡斯威尔的外型，他曾向卡斯威尔询问过有关军服的具体细节。但到了后来，这个人物变成了劳伦斯自己，说着劳伦斯的言语。

奇怪的是，《上尉的玩偶》没有被妇女解放运动作家凯特·米雷特用于《性的政治》（1970 年）之中，此书不但对劳伦斯进行了攻击，亨利·米勒、简·吉尼特以及诺曼·梅勒都在被攻击之列。这其中的最后一位后来写了一本生动、有趣的书对这些作家进行辩护（当然也包括他自己），此书就是《胜之囚徒》（1971 年）。在《上尉的玩偶》中，赫普伯恩上尉一定要汉妮尔伯爵夫人在订婚仪式上使他相信她将无愧于他的“荣誉并信守”诺言，他才肯同她结婚。这里，妇女解放运动确实能抓住劳伦斯一些把柄对他进行攻击。但就故事本身而言，我们可以看出，汉妮尔将那个穿着紧身格子呢裤的赫普伯恩变成了一个小玩偶。在故事的结尾处，当他看到这玩偶在一幅画中再现时，上尉对伯爵夫人说，“你可随便说什么，但现在的任何一个女人，不管她多么爱她的男人——她随时就可能将他变成一个玩偶。这个玩偶就会成为她的英雄：而她的英雄至多不过是她的玩偶。”这就是赫普伯恩的“男子至上主义”的辩护。

阿尔彭西别墅（“棕色的阳台一层叠着一层，鲜红的天竺葵如火如荼，遍及四野，紫如菱树在一角摇曳”）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上尉的玩偶》之中，还有那奇热的夏天里时时进行的沐浴。纽奇孩子们的有趣的形象也出现在故事里。劳伦斯在 9 年以前一个遥远的夏天当他和弗丽达穿过他们头顶上的那座大山的，曾在山中绘过奥地利部分阿尔卑斯山的素描。在策尔，在纽奇时时激起的欢乐气氛中，劳伦斯变得像故事中的那个黑良心的赫普伯恩上尉那样好干预和格格不入。

在策尔的一天，劳伦斯去钓鱼。当他用鱼钩钓起一条活蹦乱跳的鱼，“那鱼在我的手中扭动挣扎”时，他深深地感到了一种负罪感。他从“鱼的嘴中”取出鱼钩，看着那鱼的“充满惊恐”的眼睛。

我暗自原谅我自己

想道：我并不是那个创造之物。

它让我无法捉摸，这鱼。

.....

他生于我的太阳升起之前，

在我的生命之先。

他启程在我的前面。

而我，一个光天化日下的多指的恐怖者

已将他置于死地。

.....

在起初的时候耶稣曾被称作是鱼...

最终也将如此。

（四）向东方和南方航行

劳伦斯和弗丽达在8月下旬去了南方。在佛罗伦萨，他们住在他们的朋友纳利·莫利森的宽敞的公寓里，莫利森正好外出了。这幢在德巴迪大街三十二号的房子原先是乔治·艾略特用作她的小说《罗莫拉》的背景的，现在成了劳伦斯的诗《蝙蝠》（在此诗中，诗人从阳台上向外看去，看到“一些东西在飞舞……燕子衔着黑线在将阴影穿织起来”）和《人与蝙蝠》（描写在他的栖身之处的“小房子”里与一只忽闪扑动的东西搏斗的情景）的背景所在。但除了这些蝙蝠之外，那里的寓所还是不错的，劳伦斯夫妇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星期。玛丽·加农从法国来，对此公寓大加赞赏，并打算在顶层的房间里住下。

卡斯威尔夫妇也来了，他们将他们的小儿子留在了英国。劳伦斯努力显得友好，但似乎有些敬而远之。凯瑟琳·卡斯威尔的一些意籍英裔的表兄弟将劳伦斯看作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并对他进行了侮辱，但即使这样，劳伦斯也未动声色。卡斯威尔夫人注意到，玛丽·加农现在已经引起了劳伦斯的讨厌，尽管他还努力对她以礼相待，不表露他的真实感情。他作了安排，与卡斯威尔夫妇去锡耶纳远足；但到了那里以后，他马上就开始诅咒那个地方，不愿在那里久留。在9月21日他从锡耶纳给凯瑟琳·卡斯威尔去信，“我们必须在今晚离开——必须去开普利看望布鲁斯特夫妇，他们就要启程去印度了。很抱歉未去看你。”显然他曾匆匆回过佛罗伦萨，但没去找卡斯威尔夫妇。

在开普利布鲁斯特的别墅，劳伦斯对他们小女儿哈伍德所写并加了插图的短篇小说集大加赞赏，他模仿了数年前在一次文学聚会上弗洛伦斯·法尔弹着八弦琴朗诵叶芝的诗歌的情景，这使大家非常开心。

几天以后，劳伦斯夫妇启程去塔奥米纳，在9月28日，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上到达那里。第二天，劳伦斯向卡斯威尔夫人发出了一张慰问性的明信片（“好像我们刚与你见过面——但我深表同情”），在此明信片中，他说他“能休息一阵非常高兴”；不管怎样，他还是喜欢“这个地方”的，“大海向东方敞开着胸怀，向着东方的中心，远离欧洲”。同一天，他写信给布鲁斯特，他曾在这幢别墅里度过了他的蜜月。劳伦斯在信中向他提到了芳塔挪·维契亚的“宽敞的窗外的东方天空，在大海的那一边。并说，到春天来临的时候，他将“去东方，最后再返回西方”。在塔奥米纳的邮件的耽搁使他很恼火：邮件中有《约翰牛》评论《恋爱中的女人》的激烈言辞，这些评论使赛克不寒而栗；还有代理人对《阿伦的杆杖》的责备；以及一位律师的一封对劳伦斯和赛克的威胁信，因为《恋爱中的女人》中的哈利迪的形象使黑索尔坦因非常恼怒，并执意要报复。劳伦斯在他断断续续的日记中，在10月26日这一天记道，“我将哈利迪描写成黑头发、黄皮肤，但他大为不满。”他还写道，“这一个月来，我讨厌每一个人，特别是那些英国的愚民。那些流氓！”他在英国和美国的代理人，柯迪斯·布朗和罗伯特·蒙齐亚，也被他写成是“无赖”，因为他们写来的无礼的信件。11月2日，劳伦斯写信给布鲁斯特说他刚完成了一个短篇，目前正在写《上尉的玩偶》（“一个非常有趣的长篇故篇”），他还说；“如果我没有自己的故事聊以自娱，我就会因忧郁而死去。”

在离开英格兰的灰色的天空和对它的痛苦的记忆将近两年之后，劳伦斯

变得温和了一些，脾气也变好了。但是现在，这些频频责难的代理人，吹毛求疵的批评家和战战兢兢的出版人将《虹》和大战的往日带了回来，也重新激起了劳伦斯他本国同胞的憎恨。但他能去何处呢？意大利，他觉得“已经腻味了”，而塔奥米纳毕竟只是一个“欧洲大陆狂徒的茶宴酒席”。这是10月下旬他写信给卡斯威尔夫人的信中所谈到的。几星期之前，他曾写信给厄尔·布鲁斯特说他的计划是“最终是想在什么地方找一个我自己的农场，在墨西哥、新墨西哥、洛基山脉或不列颠的哥伦比亚。”劳伦斯对新墨西哥的提及也许能给心灵感应论者一点安慰，因为在他写下此信后不到一个月，劳伦斯便接到了要他去新墨西哥陶斯的邀请。这个城镇在他心中呈现已有些时候了。不久以前，他曾在佛罗伦萨附近的列奥·斯坦因的家中看过此城镇的照片，在安提柯利他看过，或至少听说过最近曾在陶斯住过的毛利斯·斯特恩的作品。

就是这位画家的前妻，梅宝·道奇，斯特恩从陶斯冒冒失失地写信给劳伦斯，为他在她的宅地上提供了一幢土砖房子。她曾读过《大海与撒丁岛》，认为劳伦斯的表达能力应该用来描绘她可爱的陶斯，于是她写信邀请他前去。劳伦斯写信给她，他是想离开欧洲，陶斯是对他有吸引力，并特别询问了有关费用的事：斯特恩夫人没有说清楚她是否为她引入围栏的狮子们提供食物。弗丽达给她的信中则是热情多于谨慎。

他们之间的通信往来持续了几个月，劳伦斯时而急切，时而犹豫，斯特恩夫人则不时地来信或来电报催促他。劳伦斯曾试图给她泼点冷水：她谈到了精神分析以及受到弗洛伊德的门徒A·A布利尔的亲手治疗的情况。而劳伦斯在回信中不无讽刺他说他情愿死于精神病：“一个真正的精神病患者是半个魔鬼，但一个治愈了的精神病患者则是一个十足的魔鬼了。”并说整个精神分析的过程过于机械。在另外一些信中，劳伦斯问陶斯是不是一个艺术家的聚居地：他知道“所有那些“自命为文人雅士”的家伙，他们全是些“假作斯文”的白痴。

这些显然没有使斯特恩夫人感到吃惊，她是一位富有的女人，曾有过她自己的信条和做法。当财富不能使这些信条和做法兑现时，一点神秘主义也许管用。她后来诉说了她是怎样让劳伦斯“下决心”去陶斯的：每天晚上在入睡之前，她潜入她自身存在的核心之中，并跨越空间去和劳伦斯的核心交融。她告诉安东尼奥·洛汉，她在摆脱了她最后的一位丈夫之后新找的大块头印第安情夫，说劳伦斯的到来对陶斯有益。托尼有点半信半疑，但她“凭意志的力量”使他服从了，然后他也帮助她在黑暗之中“召唤”在远隔重洋之外的犹豫不决的受诱惑者。

与此同时，劳伦斯已经写完了《幻想》的前言，将全部手稿寄出，并写了几篇短篇小说，他还写了有关马格努斯的介绍，又为《狐狸》增长了篇幅，正如他所说，给它一个长一些的尾巴。他对赛克大发雷霆，因为他让黑索尔坦因对为进行威胁而使他向黑索尔坦因付了5镑10个畿尼，因为后者曾威胁要以诽谤罪对劳伦斯进行起诉。在黑索尔坦因死后发表的他写给他的律师的信中，可以看出劳伦斯使黑索尔坦因保持沉默的做法是否有必要。黑索尔坦因只是讹诈一下而已，他并无意将此事交诸法庭，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钱去打官司。

过了年之后，劳伦斯写信给他《撒丁岛》一书绘制插图的简·朱达，他正准备去他的故乡南非访问：

今天收到了《大海和撒丁岛》，所以我们不由地想到了你。我想你也拿到此书了吧。你觉得如何？红色的运用有些使人失误——我不太喜欢色调中的一些过于鲜艳的地方——除此之外一切都很不错。请告诉我你的印象。我想书中的文章可能使你感到有些意外——如此的荒凉和缺少诗意。看看你自己和 M·阿兰吧！我敢打赌你们俩都会觉得太不够完美了。没有关系，你们已经向人们鞠躬示意了。书的封面真让我啼笑皆非——但对这些美国人只能无可奈何……

这里天气奇冷，白雪覆盖着蒙特维纳和福扎，一片耀眼的洁白——埃特纳火山显得神秘恐怖。我讨厌寒冷的天气。但是，第一枝杏花已含苞欲放，还有被艾伦称为维纳斯之泪的银莲花也初吐芬芳。

我一直在准备去陶斯的行程。如果我身体好的话，我们本来要在本月的 15 日从波尔多乘船去新奥尔良的。现在可能改期于 2 月 5 日动身。我们将坐船从巴勒莫到纽约，然后在那里改走陆路，除非有什么便船可搭乘。我希望能在 3 月里到达陶斯，然后你若愿意也可前去；不管怎样，那些美国人总会喜欢一本关于他们国家的书的，关于洛基山的，或印第人的或沙漠的——陶斯的南面有一片大沙漠，在六千英尺的高原上——或关于墨西哥人以及牛仔的——你该去找些什么画画，我也去找些什么写写。

谢天谢地，今天我寄出了我的最后一批手稿——三个中篇故事。此三篇故事能偏成一本非常有趣的集子——《狐狸》、《瓢虫》和《上尉的玩偶》。然后是一本短篇小说集，其中大部分的故事是重写过的。哦，我很讨厌看到这些手稿，也讨厌去想出版的事。哦，我对一切都感到腻味：在这个使人感到双倍厌烦的塔奥米纳。

但我们弄到了一些很好很干的橄榄树木，起居室还算温暖，谢天谢地，风也小下来了。但明天还有 5 个家伙要来喝茶。——顺便提一句，你听说吉尔伯特·加农离开了南非了吗——和年轻的蒙德以及那位一妻多夫的妻子格温？玛丽·加农一定像一个失魂落魄的人一样离他们而去。但我无动于衷。

信中的“看看你自己和 M·阿兰吧”一句是指在《大海和撒丁岛》的最后一章中对朱达和艾伦·英索尔的描述。在罗马火车站外面遇见劳伦斯夫妇时，这两位年轻人“神情木然地从一节车厢里下来，一个（英索尔）用好奇的目光从单片眼镜后面向电车轨道的另一端凝视，另一个（朱达）个子很高，机敏而潇洒，看上去好像他希望我们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让他看个仔细”。

劳伦斯在写此信的时候，正沉湎于对陶斯的向往之中。但不久他又开始犹豫不决起来，特别是在他对梅宝·道奇·斯特恩的了解越来越多之后。在 1 月下旬，弗丽达告诉她他们准备去锡兰：“劳伦斯说他还不能正视美国——也还觉得不够强壮：“所以弗丽达在第二天的一封信中提出了一个建议，劳伦斯也表示附合，她让斯特恩夫人去锡兰与他们会面；然后他们可以同去美国。这使斯特恩夫人意识到，劳伦斯夫妇是“心有惶恐”：像往常一样，人们一定劝他们要对她要存有戒心。于是她和托尼又开动起他们的意志机器，向劳伦斯的“中心”发出更强的意志之波。此时劳伦斯和弗丽达已启程东行。

但是，他可能已经在芳塔娜·维契亚留下了记印。正如珍妮弗·普林在 1973 年的罗马《美国人日报》上指出的那样，这幢别墅里曾住过一位德国的音乐家和一位英国的电视制片人。（还有美国作家杜鲁门·开波特，据说也在那里住过两年。）这位英国广播公司的英国人报道说在深夜里有说话声和

脚步声将他惊醒，并看到墙上出现了神秘的影子。他向当地的秘术专家询问，那位秘术专家告诉他说，在这座别墅住过的另外一些住客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而且看到过一个，满脸胡须的男子。如果说这类传奇伴随着劳伦斯去了西西里的话，在劳伦斯于 1922 年离开那里之后，些传奇就在那里流传了下去。

在启程去锡兰的前一天，劳伦斯坐在芳塔纳·维契亚别墅里看着他和弗丽达的行李，4 个箱子（一个是装书的），两个旅行包，4 个小背包和 1 只帽盒。他觉得“像亚伯拉罕（基督教《圣经》中犹太人的始祖——译注）去寻找新的土地”，他的心因离开“家园”和西西里的人民而痛苦地颤抖。也许，正如艾尔丝·贾菲所言，有朝一日他和弗丽达会重返芳塔纳·维契亚：但现在，他竭力使自己去想那些孔雀、猴子、大象和棕榈树。

2 月 20 日，星期日，劳伦斯夫妇启程途径墨西拿和巴勒莫去那不勒斯。26 日夜里，他们乘上了奥斯特雷号客轮开始了去锡兰的两星期的航程，途中经过了萨得、亚丁和苏伊士以及红海。劳伦斯写信给弗丽达的母亲说他们“穿过了墨西拿海峡，然后在数小时的航行中我们看到埃特纳火山像一个洁白的女王或一位洁白的女巫，如此神秘动人地站在苍穹之下。她在对我说，‘你要回到这里来’，但我只是说‘不’，但我的内心在哭泣，因离别而忧伤地哭泣”。对劳伦斯来说，虽偶而也尖刻地挑剔过塔奥米纳，但他毕竟在那里度过了愉快的时光。他在塔奥米纳期间的信件大部分是热情洋溢的，充满了他对这地方的深深的爱。

当他和弗丽达向东方和南方航行时，他们看到了克里特岛上白雪覆盖的山峦，使人眼花缭乱的莱万特尼港和“像干血一般红的”西奈山脉。这是一次令人瞩目的、尽管是暂时的向欧洲的告别。劳伦斯在船上进行着对吉奥伐尼·威加的作品翻译，墨水瓶掉到了甲板上：“这条”奥斯特雷号船将永远带着我的黑色记号了。”

（五）寺钟、袋鼠和淘金者

1922年4月17日，劳伦斯在锡兰给艾米·罗威尔写信：“我们来到这有6个星期了——这是一个观光游览的好地方，但天气太热，不能久住。现在我们准备去澳大利亚——如果我们不喜欢那儿的话，我们就再去旧金山。”在澳大利亚，劳伦斯写信给厄尔布鲁斯特，说他在锡兰访问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患了有生以来最重的一次病。

布鲁斯特夫妇住在那里的一座山顶上的一幢非常宽敞的平房里，从房顶的凉台上可以看到丛林那边的康提湖和远处的山丘。当劳伦斯夫妇刚刚到达那里时，弗丽达立刻声称那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地方，劳伦斯也说，“我将永远不离开这里”。布鲁斯特夫人在回忆这段情景时补充道：“那是他们到达的第一天。”不久，使人窒息的炎热开始使劳伦斯每天下午都发病；其他人也受到传染。那里的生活是华丽多彩的，但白天的炎热使人喘不过气来。劳伦斯几乎没做什么创作性的写作；每天上午，他坐在房顶的平台上翻译威加的小说，但当寺院的钟声从树林边传来时，他总会心猿意马起来。他拒绝所有的外界冲动进入他的心灵；当看到布鲁斯特每天早晨去附近的寺庙听经拜佛时，劳伦斯认为这是一种虚伪的虔诚。他开始对佛教表示异议——在后来的一些年里，当他和布鲁斯特在一起看到一尊佛像时，劳伦斯会说，“哦，我希望他能站起来！”

他对东方的兴趣由来已久，他对比桑，伯勒伐斯基和普莱士作品的兴趣说明了这一点。布鲁斯特指出，尽管劳伦斯在锡兰失去了对佛教的兴趣，“但他对印度文化的其它形式还保留着兴趣。”一位锡兰的辛纳利族作家马丁·威克拉马辛说（在他的《劳伦斯和神秘主义》一书中（1953年））劳伦斯与一种来自印度神秘主义的称作坦契克的秘术有密切的关系。斯里·奥罗宾多指出，也许“劳伦斯是一位瑜伽信奉者，他迷了路，错投了欧洲人的胎，现在要来超度困境”。但是在锡兰，劳伦斯意识到“我们背弃英国，走出我们生活的外面是一个错误。总而言之，塔奥米纳、锡兰、非洲、美国——无论我们走得有多远，都是与我们自己的立足点背道而驰的：我们就像是约拿（《圣经》中希伯来的预言者——译注）在背离那个属于我们的地方”。

劳伦斯躲避了梅宝·道奇·斯特恩的意志之波，以至于到了3月底，他竟准备要在夏天回英国去了。将英国交付给霍拉肖·博顿利夫妇是一种罪恶：英国是有良智的英国人的希望所在，他们必须在那里联合起来。他觉得佛教、印度教、甚至天主教——对这最后一个劳伦斯还抱有一些希望，但是在宗教上而不是在政治上——全都是逃避。东方的淫逸妖烧唤醒了他身上的那个英国人。然而，在他考虑可能回英国的时候，他还想着澳大利亚。斯特恩夫人这时给他寄来了信件、电报和钱，而且还有用密封袋寄来的项链和书籍。劳伦斯4月3日给她去信说：“锡兰是个好去处——但天知道，不是一个久留之地。”

他在锡兰的少量创作之一是诗《象》。此诗描述了3月23日在康提的情景，那位“脸色苍白、精神萎靡”的威尔士王子（后来的温骚公爵）坐在火把簇拥着的高高的象背上。劳伦斯看到疲惫不堪的“王子的恍惚的身影”。在这首带有预兆性的诗中，像“公众的苦役”，又像是那痛苦的大象：“一个恪守着‘我愿效劳’这一座右铭的异国的、胆怯的孩子”——劳伦斯是在1922年预言性他说了那句“我愿效劳”的双关语。

在康提，劳伦斯完成了《吉苏亚尔多先生》的翻译，此书第二年由塞尔洋在纽约出版。这是劳伦斯第一次翻译的整本书。后来他还翻译了威加的《西西里的小故事》（1925年出版）、《乡村骑士及其它故事》（1928年出版）以及伊尔·拉斯卡的《蒙纳特医生的故事》（1929年出版）。在此以前，他还帮助过柯特连斯基翻译过伊凡·布宁的短篇小说《旧金山来的绅士》，虽然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译著《旧金山来的绅士及其它故事》的封面上，此译著是由霍戈斯出版社于1922年出版的。在译著的首页上，柯特连斯基和列奥纳德·伍尔夫以译者署名，只是在一张勘误说明上提到“由于印刷错误，劳伦斯先生的名字在首页上遗漏了”。实际上，在首页上应该说明劳伦斯是柯特连斯基的主要故事的合作者。

伦敦的书商伯特兰姆·罗塔发现，由劳伦斯撰写前言、赛克出版的列奥·谢斯托夫的《事事皆有可能》的翻译也是劳伦斯和柯特连斯基合作的结果，尽管在此书的首页上只署有柯特连斯基的名字。当伯特兰姆·罗塔发现译稿是劳伦斯的笔迹时，他询问了柯特连斯基。后者说，第一稿英语译文是他翻的，劳伦斯则对译稿作了大量的修改。罗塔对本书作者说，“在有些地方，劳伦斯对原意作了修改，而当柯特连斯基向他指出这一点时，劳伦斯不耐烦他说他不能容忍书中的谬误之笔，他觉得有必要对原著的不当之处作修改……柯特连斯基说，劳伦斯的名字没有作为合译者出现在这本译著、或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大检察官》或其它一些他们合译的书上，是因为劳伦斯认为以一个译者的身份出现在出版商那里会损害他的名誉。有许多他所写过前言或作过部分翻译的作品上都没有劳伦斯的名字。”这是一条有趣的情况，说明劳伦斯长期以来翻译过不少东西，但又不属于从事这类工作。但是，如果他确实帮助了柯特连斯基翻译过《大检察官》，并为译著写了前言的话，那么当此书在1930年8月，他去世5个月之后发表的时候，他没有以一个合作者的身份出现就有些奇怪了。当然，此事发生在很久以后，距劳伦斯在1922年翻成威加的第一部作品已时隔很久了。

在离开锡兰整整六个星期之后，劳伦斯和弗丽达去了西澳大利亚，然后到达了悉尼。劳伦斯在1922年5月20日在“马尔瓦”号蒸气轮上写信给简·朱达，说“锡兰是个观光游览的好地方，但不能久住”。塞尔泽曾出版了劳伦斯所著、朱达加了插图的《大海和撒丁岛》现在他又想让他们俩合作写一本有关印度的书，但劳伦斯“表示没有兴趣”。他曾发现，“一个人可以很舒服地坐这些船的二等舱去旅游，——比一等舱要好、方便——因为现在很少有人这样出门。”船上坐二等舱的不是30人，“都是些单纯、有趣的人”。他补充道，“我觉得我一旦离开了欧洲，我就将不停地四处漂游。我很喜欢这样。但弗丽达总有些思念‘她自己的小家’。我却无所谓。——我喜欢随心所欲地四处游荡”。他和弗丽达在到达西澳大利亚两星期后，便取道去了悉尼。他发现这块大陆有“一片奇秒的天空，湛蓝清新的大气，和苍穹之下那片古老的大地、像一位被几个世纪的尖埃所覆盖的睡美人。不知道她是否还会醒来。”他没有做什么创作工作（尽管在他离开澳大利亚之前，他写了一本有关这片大陆的小说《袋鼠》）。他告诉朱达说他不知道贝蒂娜在什么地方，不然他想给她去信。

劳伦斯所说的这位贝蒂娜是指朱达的未婚妻，伊丽莎白·休姆斯，一位美国（南方）姑娘，劳伦斯在开普利遇见过她。她对劳伦斯对她生活的干预很不高兴，因此她离开了开普利，但他好像并不记恨于此，在后来的通信中

他总是愉快地谈及她。在他后来的中篇小说《圣莫尔》中，她的美国姑娘罗·卡林顿的形象并无不当之处，尽管她的母亲——小说中的那位母亲威特夫人，部分是梅宝·道奇·斯特恩的形象——的遭遇要糟糕得多。但在劳伦斯遇见斯特恩夫人之前，他对那些受意志支配的美国妇女的评价是不高的。也许因为伊丽莎白·休姆斯蔑视过劳伦斯，他将她在《圣莫尔》中描写成一个精神意志极强的年轻女人。

劳伦斯夫妇在西澳大利亚的琅思逗留了数日之后，便东行 16 英里去了内陆城镇达林顿，此镇位于丛林的边缘。他们是在一位澳大利亚妇女 A·L·杰金斯夫人的鼓动下去珀思的。他们是在“奥斯特雷”号船上认识这位杰金斯夫人的，她也许是《袋鼠》中维多丽娅·卡尔考特的原型。她和她的一位朋友，梅·爱娃·高勒夫人，一起带劳伦斯夫妇去野餐，高勒夫人是一位有名的植物学家，她向劳伦斯介绍了澳大利亚的植物区系。劳伦斯在珀思几天的短访激起了一点波动。他在扎贝尔夫人的爱书者图书馆会晤了当地的文人墨客。一位住在琅思附近的女作家凯瑟琳·苏珊娜因期望与劳伦斯会面而兴奋异常，以至引起了早产。

劳伦斯在达林顿还遇见了另一位作家，他后来的合作者，莫莉·斯金纳护士。就是在那里，他获得了那段在《袋鼠》中索默斯所体验到的经历。一天晚上当他独自走进丛林时，他看到“一轮大大的、令人惊异的月光，无比硕大，那些树干像赤裸的、苍白的土著人一样站在深黑色的树叶之中。月光下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丝毫没有，”尽管因为空兀，那地方似乎有鬼魅出没——劳伦斯——索默斯觉得脊背生寒，仓惶逃遁。

劳伦斯夫妇在悉尼只呆了一天，但这已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登高眺望那“犬牙交错的港湾”，有足够的时间去发现在“悉尼市开销大得吓人”。他们又南行 40 英里到了海边的蒂罗尔，并在靠海的悬崖上找了间房子，这幢房子有一个澳大利亚式的双关语名字，叫“怀阿伍克”（其发音意为“干吗工作”——译音）。在那里的开始几天中，劳伦斯开始了《袋鼠》的创作，除最后一章“再见，澳大利亚”之外，他在 6 个星期中写完了该书的其它章节。尽管此书的大部分内容是想象性的，但这是《儿子和情人》之后的又一部自传体性质的小说；当然那些创造性的片段代表了那些使劳伦斯感到困惑的问题。

故事是从悉尼开始的，讲的是两个异乡人在那里找寄宿之处：“一个瘦小的男人，脸色苍白，留一脸黑胡子”，和“一个丰腴、漂亮、容光焕发的女人，她可能是个俄国人”。《袋鼠》的大部分内容是精彩游记，其中也不乏富有哲理性的评论以及一些记叙性的闲谈。因为劳伦斯和弗丽达在悉尼或蒂罗尔没有什么熟人，另一些人物只能从过去的经历中选用：袋鼠本人，这位犹太律师本·柯利，是柯特连斯基的形象，尽管如往常一样，劳伦斯在一封信中否认了这一点。弗丽达说，大卫·伊德医生也是此形象的一部分。至于本·柯利的法西斯似的淘金者们，劳伦斯从澳大利亚早期的历史人物那里借用了一系列的名字。

杰茨这个从“科尼什告密者”詹姆斯·特鲁赫勒那里移植过来的人物，是劳伦斯对阴险、狡滑的科尼什人，特别是对考森港的贝尔斯福德旅馆房东的回忆。但维多丽娅·卡尔考特和杰克必须是澳大利亚人。杰克有像袋鼠般的大粗腿，而维多丽娅则是一派“殖民者”的高雅风姿：劳伦斯可能是根据他在珀思和达林顿或在船上遇到的人对他们进行描述的。

在“怀阿伍克”，劳伦斯常常谈一份叫《悉尼新闻报》的报纸聊以消遣，这份报纸风格独特的报道使他写成该书的一整章。“闲言碎语”；这种风格带有些 1922 年的时尚，但实际上并没有给故事增加色彩。在新闻报道上读到了关于那位悉尼著名的律师和工程师约翰·蒙那什爵士（此人曾在一次战争中统率过澳大利亚军队）的故事之后，劳伦斯也许为本·柯利找到了外部形象：像袋鼠和犹太人一样，蒙那什的照片和劳伦斯所描绘的长脸形象是一致的；在那时，蒙那什的照片时常会出现在《新闻报》上。同样，如本书的第一版（1954 年）所指出的那样，劳伦斯可能在那份报纸上找到了那位社会主义者领袖威利·斯特鲁瑟斯的外部形象，因为当时报上常常提到工党领袖詹姆斯·赫尔曼的情况。但尽管威利·斯特鲁瑟斯可能长着赫尔曼的脸，而他的声音却常常是威廉·霍普金的。

从政治上看，1922 年是澳大利亚平静的一年，没有如小说中所描写的澳洲兵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在劳伦斯夫妇离开了的 4 个月之后，一次全国性的选举在 12 月如期举行。作为这次政治竞争的一部分，休斯首相在全国作了游说，尽管选举从根本上说并无精彩之处，但双方还是用激烈、尖刻的言辞互相攻击了一番。劳伦斯在报上谈到了所有这一切情况，并回忆起他在意大利和西西里最后几年中的所见所闻，即新生的法西斯党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争斗。他创造了一个法西斯团体作为袋鼠实施领导权的武器。另外，如柯蒂斯·阿特金森在澳大利亚的杂志《明镜》（1965 年）上指出的，1921 年，也就是劳伦斯来到的前一年，在其它地方发生过游行示威，而劳伦斯肯定从他的澳大利亚朋友那里听说过这些。这些骚乱主要是由“退伍军人政治同盟”引起的。此时期中，这个同盟的 10 万多名成员在全国各地的会议上起哄闹市。

在《袋鼠》的社会政治对话描写中，劳伦斯追溯到了 1915—1916 年和拉塞尔的言论以及战时康沃尔的苦涩记忆（这一点由拉夫·莫德作了详尽的表现）。确实，到达蒂罗尔的第一天，劳伦斯写信给他的岳母说：“天空灰蒙蒙的，使我想起了康沃尔。”

作为一场个人与社会的长期斗争，劳伦斯这次抗争——或再抗争的对象是他的想象。在小说中，他不愿跟随那位强悍的领袖和他的法西斯似的澳洲军，也不愿接受那位社会主义者要他主编“一份建设性的劳动者的报纸”的请求，而宁可“依附于独立的个体和他所信奉的上帝”——这是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最易于采取的方式。这对于一贯反对民主的劳伦斯无疑是一种讽刺，但是，这无碍于此书成为一种现代社会最为深刻的政治条约。”这就是米德尔顿·莫里的评判，也是他对劳伦斯作品的最为热情的评论：他指出，《袋鼠》“表明了对现代人的政治意识的完整的道德要求。劳伦斯对这种要求的拒绝——‘他的伟大的拒绝’——并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即他是一个意识到这种完整要求之严酷的第二个现代英国人。”

此书对澳大利亚的沿海作了充分的描述。确实，此书的抒情和游记特征和其主题故事同样重要。迄今为止，只有莫里和马丁·贾瑞特—克尔主教以及一两位其他的评论家将《袋鼠》放在劳伦斯的重要作品之列。作为一部小说，它不能与《虹》和《恋爱中的女人》相提并论，部分是因为它不是一本真正的小说，而是一部特殊的作品，可与卡莱尔的《文学箴言》或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列为一类。单从文笔上来看，它位于 20 世纪文学之冠：海边的那些黎明，那个在南海上游弋的男子，那些参差散落的尖顶农舍，那将

索默斯和他的妻子围困在那间小屋里的四天的瓢泼大雨——这些情景在许多小说家的笔下可能会写得平淡无奇，而劳伦斯却以他的极强的语言表现力将他的这些经历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澳大利亚时，他收到了塞尔泽于4月出版的和赛克在6月出版的《阿伦的杆杖》的文本。劳伦斯将此书寄给他的许多朋友时说他们可能不会喜欢这本书。对此书的评论也不外乎是不喜欢劳伦斯或不理解这部小说——或两者皆有之。出乎意外的是，莫里在《民族和雅典娜神庙》上对此书作了极为热情的评论：“谈一谈《阿伦的杆杖》，就好像是饮一口生命之泉...《阿伦的杆杖》是战后英国文坛上发生的最为重要的事件。在我看来，它比《尤里西斯》更为重要”（这里也许也该提及莫里是乔伊斯小说的最早欣赏者）。但其他的评论家对《阿伦的杆杖》的反应则冷淡得多。

在美国，H·W·鲍因顿在《独立》上毫不掩饰地怀疑此书作者“不过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性反常者”。约瑟夫·伍德·克鲁奇在《民族》上认为《阿伦的杆杖》有“生动、力量和新鲜之感”，但也是“一部对一些有趣事物的歇斯底里式的过分强调之作”。L·M·R·在《自由人》上说，此书“并非劳伦斯先生的杰出之作”；多萝西·奥格本在《纽约晚报》的文学评论栏上认为该书实在应该算作是一本精神分析学家的专题资料汇编，并指出该书的作者一定是“一个任性的性变态的年轻人”。英国方面的评论不像美国的那样尖刻，尽管劳伦斯的老朋友《英文周刊》认为他怀有一种渴望，并仍“一直在探索”；一直对劳伦斯态度友好的丽贝卡·威斯特在《新政治家》上称《阿伦的杆杖》是“癫狂愚蠢”之作。（泰晤士文学副刊）认为劳伦斯像斯特林伯格（1849—1912年，瑞典戏剧家和小说家，厌恶妇女者，尼采的信徒——牵注）一样冷酷无情，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尽管那些冷淡的非议或不太热心的赞扬，《阿伦的杆杖》的境遇不错。塞尔泽马上着手准备第二次印刷，在英国，在到作者最后去世前的几年中，赛克不得不几年就将此书重印一次。到1922年为止，劳伦斯发现他的战后读者、文学界的少数读者能使他维持下去，直到他的那本黑市畅销书给他带来了第一笔“可观的收入。”

1922年在澳大利亚，他可能在7月18日告诉梅宝·道奇·斯特恩他已完成了小说《袋鼠》——他开始创作的六个星期之后（当然，如前面所提到的，他后来增加了“再见，澳大利亚”一章；这是在他到了陶斯之后再写的）。斯特恩夫人发来了一份电报，电文中所用的那个分词听起来非常专横：“期待着你。”劳伦斯曾给凯瑟琳·苏珊娜·普利查德（就是那位因听说劳伦斯到了珀思，过分兴奋而导致早产的妇女）去信说，“当一个人已经受够了这个世界的一切，——当一个人感到已与世无争的时候，”澳大利亚是一个栖身的理想之地。“……不，澳大利亚只是个漫游，生活、遗忘和了此一生的地方”。在另一封信中，他对她说，“这是一个黑暗的国家，一个悲惨的国家，像是在无底的深渊之中。然而，当天空重新显出温柔和蔚蓝，绿树的树枝向遥远的天空伸展，一切都使人着迷，那是一种无法言表的神韵！巨大的魅力，但在这种魅力之下还有一种阴郁凄凉的恐惧”。他打算在六天之后离开。

8月10日他和弗丽达乘上了开往旧金山的“塔希提”号船，途中在新西兰的惠灵顿、拉罗通加的阿瓦蒂乌和塔希提的帕皮提作了短暂停留。从惠灵顿他给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寄去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只写了“思念”一词，

这张明信片打破了他们之间几年来的沉默。仅在此前一天，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在离开瑞士去伦敦之前立下了她的遗嘱，将劳伦斯的名字列在那些可以接受她少量纪念品的朋友之列。《阿伦的杆杖》重新激起了她对作者的爱慕，所以她能够原谅劳伦斯。在7月，当她读到此书以及劳伦斯早先的一个短篇《玫瑰园里的阴影》（在《普鲁士军官》一书中）后，她在给柯特连斯基的两封信中谈到了她的这种爱慕之心。劳伦斯的《玫瑰园》是“他所写的一篇笔力最弱的故事”，然而“它是那样地不同于其它所有的作品”，她怀着欣喜之情读完了它。当他提到醋栗果时，这是些由花匠采集来的、在碟子上滚动的鲜红而成熟的醋栗果。当他咬苹果时，那是一只刚从树上采下来的、微酸、香甜和新鲜的苹果。她认为《阿伦的杆杖》的缺点是微不足道的：此书充满了活力，在读过由那些无病呻吟的作家们写的简易庸俗的小作品之后”再来谈一谈这本书实在是一件轻松愉快之事！她对劳伦斯的许多观点不能苟同，他有关性的看法在她看来毫无意义的，“但我觉得我比任何人都更接近劳伦斯。在这最后的几个月里，在许多方面，我所想的与他所做的不谋而合。”

确实，这两位作家在他们的自然视野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只要仔细检查一下他们的文章就不难发现：在当时那个新闻笔调平淡低劣、文风苍白无力的年代里，他们俩的作品都有一种内容具体，色彩鲜明、文笔生动的特点，他们各自又有一种自己的鲜明风格。（在1954年7月出版的《文字批评文集》上罗伯特·列德尔写道：“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认为劳伦斯有三个形象：一个是她所憎恶的黑色魔鬼，一个是她所不信任的预言家，再一个是她所热爱和尊重的人和艺术家。现在，他逝世已有24年了，我们还不能摆脱我们心目中的那个魔鬼和预言家——这是一个没有未来的预言家——的形象，去发现那个不朽的人和艺术家吗？”）

在去美国的途中，劳伦斯还给另外一些人寄去了明信片：在每个停泊的港口都给埃达·克拉克寄去信片，在一些地方还给布鲁斯特夫妇、凯瑟琳·卡斯威尔以及其他的人送去消息。劳伦斯告诉卡斯威尔夫人说他觉得塔希提“很美丽——但帕皮提是个贫穷、单调、不伦不类的地方”。两个星期后，他给她去信说旧金山“令人愉快，但非常嘈杂，车水马龙，生活昂贵。”对于劳伦斯在旧金山的那五天的情况，哈佛大学英语系的一些体面人物曾制造过一种十分荒谬的谣言，说他在这五天里离开了弗丽达，去经历了一次伤风败俗的冒险勾当。但弗丽达坚持道（在1951年1月24日的一封信中），我在旧金山一分钟也没有离开他”。她认为那故事是“有趣的谎话。”

（六）在高高沙漠上空

正如劳伦斯一抵达陶斯就意识到的那样：选择陶斯是一个错误。在陶斯断断续续的3年旅居中，他难得真正在那里住上几日——“陶斯太令人应接不暇；不甘寂寞的梅宝·斯特恩，五花八门的晚宴，扰人清静的发动机的噪声，还有那些接踵而来的不速之客”——因而，他是住在与那个恶欲横流的中心相距20英里的山区牧场。在这期间，劳伦斯曾数次去墨西哥旅行，还有一次是去欧洲。从1922年9月11日来到陶斯直至1925年9月10日起程离开，劳伦斯在陶斯地区落脚的时间仅为80个星期，稍稍超出那3年时间的一半。而且就像已经特别提到过的那样，在这80个星期里，他真正住在陶斯的时间只是其中少得可怜的一部分。他喜欢新墨西哥洲，但又希望尽可能地回避梅宝·洛汉夫人，和那些逗留在她称为梅布尔顿的她的住地的人们。

对于劳伦斯曾在奥托琳娜·莫瑞尔身上发现并加以讽刺嘲弄的那种特性来说，斯特恩夫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美国妇女具有比她的活动能力强得多的竞选基金。而奥托琳娜夫人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古老文明的产物，而不是一种新兴文化的产物，她是具有杰出个性的非凡女性。如果按照一种标新立异的说法，她完全令人信服地继承了她祖先出类拔萃的、具有学者风度的温切尔西伯爵夫人的优良传统。但奥托琳娜夫人的弱点几乎显而易见。斯特恩夫人（以后成了洛汉夫人，为方便起见以下仍称呼为斯特恩夫人）在一本声称是介绍劳伦斯的书中，尽善尽美地表现了自己。等到劳伦斯去世，她便即刻付印了那本名为《劳伦佐在陶斯》的回忆录。

在有了与洛汉夫人两个月的交往之后，劳伦斯在致岳母的德语信中写道：“您曾向我打听梅宝·道奇，她是美国人，来自伊丽湖边的布法罗市，独生女，银行家，42岁，腰缠万贯，以前有过三位丈夫——一位是伊文恩（已故），一位是道奇（离婚），另一位是莫里斯·斯特恩（犹太人，苏联籍、画家，也离了婚）。现在，她的丈夫是一个名叫托尼的印第安人，那家伙身强力壮、精力充沛。她在欧洲住的时间颇长——巴黎，尼斯、佛罗伦萨——在纽约小有名气，却少受爱戴。作为一个女人，她绝顶聪明，是一个‘文化传播者’，喜欢充当保护人，痛恨白人社会，对印第安人的爱超过了恨，非常‘慷慨’，想做一个‘仁慈善良’的人，实际上却非常邪恶，有一种可怕的权力意志观。你知道，她想成为一位巫婆，同时也想成为耶稣门下的贝特尼的玛丽——一只白色的乌鸦，一只咕咕叫着的有着不祥之兆的乌鸦，一头白野牛。”

关于劳伦斯接下去在新墨西哥州的经历的记载，对洛汉夫人的《劳伦佐在陶斯》一书要尽可能少作依赖。它记叙的事件有一些可能是真正发生过的，这样就不能不使人引起注意。尽管为了生动和较为严格的事实，你很快又转为求助于关于这个时期的可靠回忆。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将注意力转向劳伦斯自己的、表明他神志健全的信件。

洛汉夫人曾经关切地打电话给劳伦斯夫妇，告诉他们乘坐从旧金山开往陶斯的特别舒适的普尔曼火车卧车。实际上，她对入常常是关心眷顾的，并极力做到与人为善，助人为乐，但是，她的那种仁慈常常被她的专横的方式所扼杀。在劳伦斯37岁生辰的前日，他和弗丽达在新墨西哥州的拉米下了火车，介入了这个矮胖、方脸、爱热闹的小妇人和她的丈夫托尼的旅程。她是由丈夫托尼·洛汉开着她的价格昂贵的小汽车送到那里的：托尼·洛汉是一

位坚定而冷静的印第安人，很难属于劳伦斯正在寻找的所谓野蛮人中的高贵分子那一类。梅宝立即感到：弗丽达正试图用“性感的眼光打量”她和托尼。他们在一起驾车越过沙漠。此时，洛汉夫人的第一感觉是对弗丽达怀有敌意，劳伦斯在她心目中则是易于征服的，如同她对这一心理所进行的荒唐描述那样：“我心中有一种难以驾驭的欲望在驱使我伸出手去将他抓住。”在去圣塔非的途中，小汽车抛锚了。当托尼、洛汉乒乒乓乓地修着发动机时，劳伦斯说道：“作为一个男人，世界中的男人，我是一个失败者。”——洛汉夫人的这个故事的可靠性还有待考证。带着对机器的憎恨，劳伦斯觉得那些知道怎样安装它们的印第安人是堕落了。

他在陶斯长住以前，就开始将一般意义上的对机器的憎恨特别地指向了汽车。虽然他对机械化的原始的厌恶几乎无所不包，这毕竟是一种新的倾向：甚至在《恋爱中的女人》中，理想化了的伯金驾驶着小汽车飞驰而没有受到心灵上的严厉惩罚。现在，劳伦斯在信中开始抱怨“梅宝和汽车”了，而他在10月致贝西·弗里曼的信中告诉她：他不“喜欢”汽车。这种厌恶的情绪在继续着：数年后，在意大利时，阿尔德斯·赫克斯利想劝说劳伦斯接受他那辆旧汽车，但劳伦斯拒绝了：“为什么要一个地方接一个地方地冲来冲去呢？”在他首次有了在美国生活的经历之后，他似乎将梅宝·洛汉、她的汽车化了的印第安人与汽车、横冲直撞以及机械化的意志等同起来。向他的岳母描述了洛汉夫人之后，劳伦斯说道，“美国人都想得到权力，但只是一种可怜的个人基本的权力：以强凌弱。他们全是以强凌弱的人。”

劳伦斯赶到新墨西哥的第一个晚上，时间已经晚了，当时，这个国际团体已经抵达圣塔非，托尼已无法越过75英里去陶斯。梅宝·洛汉安排劳伦斯夫妇住在当地诗人和翻译家威特·宾纳的小砖房里。宾纳后来在50年代，每个人都认为，不会再有对劳伦斯怀有恶意的文字发表的时候，才抛出了他的《与天才一起旅行》。

该书的出笼是不合时宜的。它将时钟拨回到了20年前的那段遥远岁月。那时，劳伦斯阵营的追随者们正在为他的传记而将人们远离他的创作。到了50年代，劳伦斯作品终于由于自身的光华而争取到了读者，这时候，宾纳才再现了劳伦斯这位古老文化的攻击者和痛苦的抛弃者的形象。理查德·丘奇在《约翰伦敦周刊》上写道：“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才宣扬他对一个天才人物的社会性病态所作的愤怒的记录，读者可以问一问宾纳先生是否据有真凭实据”。马克·肖勒在《纽约时报》上针对宾纳的传记评论说，在19世纪50年代的10年之间，不会再出现第二本“这样心怀叵测”的书了。在那本书中，劳伦斯的“不良行为”被描述成“仿佛是艾米莉·坡斯特和赫达·霍伯之间的混合物。而实际上，接下来的几十年都不能与这次旅行”相比。宾纳迟来的攻击并不会使劳伦斯感到意外。他在1926年写给洛汉夫人的信中曾说宾纳是“一种过了季节的蚊子式的人物。”

然而，宾纳的书并不只是对劳伦斯的一次攻击，它还充斥着一系列的自命不凡的自我表现。宾纳再三地突出了这样的情景：“他毫无顾忌、盛气凌人地大声教训劳伦斯，一次又一次地使人觉得他是一个中气不足的先知。”

恰似马克·肖勒阐述过的那样，宾纳的“恶意”显然产生于对洛汉夫人带到他家来的这个男人的初次印象：“劳伦斯的出现从一开始就给我这样一个印象：“一个坏孩子化装成了一个善良的摩菲斯特。（德国伟大诗人歌德所作《浮士德》中的恶魔——译注）这就是宾纳其人对于早已成为一流作家的

劳伦斯的最初反应——千万不要让那个三流诗人来形容和描写。

劳伦斯夫妇来到新墨西哥州的第一天晚上，威拉德（斯巴德）·约翰逊看完汤姆·米克斯的一部电影回来，发现劳伦斯夫妇已在卧室安顿下来，便与宾纳撒进了工作室。他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读过宾纳的诗歌创作班，随后，又同他留在圣塔非。弗丽达看见了威拉德，便对梅宝说：“Unmenage, hein? 这个瘦瘦的年轻人好像挺不错啊。”（法语：一家子，是吗？——译注）（弗丽达后来声称她从没用过hein这个词）。

就寝前，他们一起在厨房用了晚餐，其中还有一些熟人在座。当宾纳第二天早早起来准备赶在早餐前洗刷好碗碟时，他发现劳伦斯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为他代劳了。也许，这样做反而与他认为的好习惯背道而驰。

那天，劳伦斯对新墨西哥有了第一次观感：“这一刻，我看见辉煌壮丽的，骄傲的朝阳在圣塔非的沙漠上空高高地照耀着。有什么东西静静地停立在我的灵魂里，使我充满着期待”。他找到了那个地方，那就是新墨西哥州。那里的生活会成为“我有生以来来自外部世界的最伟大的经历”。当他发出这样的感慨时，他总是孳肌分理地分析和区别着高高的、光彩夺目的苍弯，和“保持着如画景色的、作为西方国家的游乐之地”的新墨西哥，还有“大量的爱好者捆在我们陈旧文化的绝对卫生而又光亮油腻的钞票中的新墨西哥。”

他在梅宝·洛汉家里发现了这种情形：那种豪放不羁的，华而不实的、仿西部农场的休养处所十分原始。在他家里，即在陶斯的第一个晚上（住在宾纳家之后），——那天，恰恰是劳伦斯的37岁生日——当他和弗丽达坐下来共进午餐时，在屋外的像是在格林威治村（美国纽约市作家、艺术家等的聚住之地——译注）一样的朦胧的黄昏中，房子呈现出装饰品似的青铜色，劳伦斯吃吃笑着说：“它真像印度的那些邈邈的小庙宇”。第二天，洛汉夫人帮助劳伦斯夫妇搬进“他们的家”。大约一周后，劳伦斯向布鲁斯特描叙说，它不只是一幢小砖房，还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小房子”。“缺点嘛，自然是属于‘主人’”。洛汉夫人极力想做得“好”一些，但劳伦斯告诉布鲁斯特，他不知道他能接受多久，“也许、作为一种对我的教训，一直到春天吧。”

早些时候、劳伦斯在到达陶斯的那一天，给布鲁斯特一家寄过一张加急明信片，说他“仍然感到迷乱和渺茫”。但也没能真正地歇上一口气，洛汉夫人让托尼突然将他带进他的小汽车，去参观阿帕切人（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的一族。——译注）的宗教节日活动，他是“应该”去看看的。洛汉夫人还说，“托尼不想带劳伦斯去，是我说服了他！”

洛汉夫人本打算也去看看节日盛况的，但随后又放弃了，因为小汽车里已经容不下她和她的客人弗里曼夫人及弗丽达了。于是，只好让这位贝西·威尔克森·弗里曼来陪伴劳伦斯和托尼。弗丽达和洛汉夫人都认为，这个浅色头发的小寡妇，这个从布法罗来的洛汉夫人姑娘时代的朋友充当她们的男人的陪伴是足够“安全”的。结果，劳伦斯却与她产生了一种颇不寻常的关系：在她离开陶斯之后，他写给她的信比他通常的信件内容要丰富得多。

在陶斯的5天时间里，劳伦斯外出观赏宗教节日活动，弗丽达则和精力旺盛得令她钦佩不已的女主人及另一位客人爱丽丝·科尔宾·亨得森一起消磨时光。亨得森夫人是数部诗集的作者，丈夫是一位画家。劳伦斯动身前，弗丽达写给女主人一张条子，说“劳伦斯对人们高谈阔论，而人们请他讲话

只是为了‘看看他的德行’，之后便嘲笑他，这种时候，我总是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但在劳伦斯离开之后，弗丽达觉得她失去了一次特别好的分享“德行”的机会。她爽直地告诉洛汉夫人——或者说洛汉夫人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在康沃尔，劳伦斯曾两次躲避她。多少有点不幸的是弗丽达的信写迟了。洛汉夫人和亨得森夫人“问了我许多问题，我都一一如实回答，像平常那样和盘托出”。

劳伦斯将对阿帕切人宗教节日活动的印象留在他的随笔《印第安人和一个英国人》里。他发现，这一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颇具特色，令人难忘，但大部分内容似乎类似于印第安人式的那种胡闹。这种胡闹他曾在他的《迷途的少女》中的一些喜剧性章节中嘲讽过，其中就有流浪演员上演一场红印第安人的传奇剧的情节。劳伦斯这样描写阿帕切人的宗教节日活动：“它很像一部用高度的严肃情调来表演的轻喜剧”。后来，在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这种印第安人的舞蹈使他激动起来，但当时他还不能完全接受。那古老的鼓声唤醒了他血液中的某些东西，是的，但“我的路是我自己的，红皮肤的老父亲，我再也不能听从你的鼓声的召唤。”

从另一方面来看，现代美国人的生活同样不能诱惑他。虽然，他对这种生活的观察还不够充分不够细致。但即使在比较偏僻的陶斯，城市的影响也相当明显。劳伦斯对布鲁斯特说，他能理解布鲁斯特为什么不想在美国生活：“这只是生活的表面和表面上的生活。依我看来，这不是真正的生活”。这阳光是令人赏心悦目的，还有“这自由奔放的沙漠和这欧洲的沉闷状态的消失……但这里的荒唐的强制意志，和那种作人主人的傲气，以及那种使人感到低人一等，即力求向其他的每一个人遍施恩惠的倾向等等，据我看这些都是可耻的”。在同一封致布鲁斯特的信（9月22日）中，劳伦斯得意洋洋地宣称“那些‘邪恶的’人禁止发行《恋爱中的女人》和其他一些书的努力失败了：塞尔泽彻底胜利了”。这里，他指的是乔治·W·辛普森不久前在纽约市西方法庭上的裁决：即针对约翰·W·萨姆纳对三本塞尔泽书籍提出起诉。这三部书中的一部是劳伦斯的，一部是施尼茨勒的小说，还有一部是弗洛伊德的带序的作品（《一个少女的日记》）。辛普森在他的裁决中宣布：“在这些著作中，我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认为是猥亵的、邪恶的、色情的、败坏的、粗俗的或者令人讨厌的东西。相反，我发现它们部部都是对当代文学的杰出贡献。”这对劳伦斯在不远的将来的出版前景是一个好征兆。

参观阿帕切人宗教节日活动回来，他和梅宝·洛汉讨论合作写一本关于她生活的作品的可能性。弗丽达在她的传记中回忆起这件事时说：“我不希望这样做。”她开始闯入这对合作者的小聚会。洛汉夫人声称，劳伦斯向她诉说他“对那沉重的德国女人的肉手”感到恐惧。无论他是否这样说过，我们不妨可以有趣地想象一下他是这么说的。洛汉夫人在肉体上对劳伦斯并无吸引力，但她说，她感到必须同他建立肉体上的关系，因为肉体是通向心灵的门径。“有一天”，弗丽达回忆道，“梅宝走过来对我说，她认为我不适合做劳伦斯的妻子”。弗丽达则反唇相讥，“那么你来试试看，看看同一个天才一起生活是什么滋味，有多容易。如果你能够，那你就征服他。”

洛汉夫人却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尽管她一直为之而不懈地努力，甚至在劳伦斯死后，她还企图从弗丽达那里偷走他的骨灰。但有人告诉了弗丽达，于是，弗丽达将骨灰用钢筋水泥密封在一个祭坛内。无论是洛汉夫人的意志力量和金钱力量都对之无能为力。而正是由于意志和金钱这两种力量威慑住

了劳伦斯，使他在生活中与洛汉夫人保持着不可逾越的距离。他不久就发现，她是怎样想做印第安人的女皇。她的活动对城镇居民和印第安人他们自己来说迟早会变成一种烦扰。正如它们给劳伦斯带来的一样。最后，郡的长官们会将陶斯重新分区，以便将她的住处排除在选举区之外。一个年轻的印第安人在《陶斯之星》上向她写了一封公开信。他代表的是他的同一代人而不仅仅是他自己。他的信是对洛汉夫人的一些公开主张的挑战，内容是说新一代印第安人并不真正需要“进步”，不需要“汽车、炉子、房子以及其他东西的可怕增长”，因为，“他们祖先的血液在他们身上的力量真正要比他们对‘物品’的需求大得多”——许多半劳伦斯式的观点由于缺乏劳伦斯表现的魔力而显得虚弱不堪。那个名叫丁·R·马提内斯的年轻印第安人在信中间刚刚搬进具有隔音设施的卧室、装备先进的厨房和几套高级浴室的新居的洛汉夫人，她是否愿意与他调换一下住处：“你可以得到你需要的所有马匹和马车；我则得到你的崭新的高级汽车。你喝从山上流下来的黑呼呼的脏水；我和我的五个孩子则从你的水龙头里饮用纯净的优质水……这样你就不得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希望像人一样，而不是像畜生那样生活。”洛汉夫人和她那些自命为艺术家的朋友们曾经像对待猴子一样用花生喂养他和他的人民：洛汉夫人，将你的花生拿到其它地方去吧。”

这封信是在劳伦斯离开陶斯很久以后才发表的，不然他真会大声嗤笑这封信，因为他完全有可能鄙视——带着一些愤怒——这种对他的学说的拙劣的模仿。劳伦斯刚来到陶斯，就使自己卷入了一场针对印第安人的伯萨姆法案的论争。他在10月末给弗里曼夫人的一封信中提到了这一点，也提到了另外许多人在当地的活动，其中包括洛汉夫人的一位来自布法罗的朋友，她嫁给了一位独臂的名叫李·威特的前任司法长官。还有洛汉夫人的儿子约翰·甘森·伊文思、托尼·洛汉的朋友琼·康查和社会学家约翰·科利尔：

这恰恰是一个说说你好，你在哪里和你在干什么之类的阶层。在这儿，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像往常一样模糊不清简直更加模糊不清了。于是，就发生了伯萨姆法案的事情，直到我们厌烦它。我写了一篇文章；爱丽丝·科尔宾也写了一篇；约翰·科利尔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最后提到的这一位还在为他变化不定的也许是祖尼族方式的使命而奔忙。我们应该在9月5日星期日去圣多明各与他会面。来自所有印第安人村庄的所有长者都要聚集在此地，并举行伯萨姆法案的预祝典礼。梅宝·斯特恩非常渴望成行。你的那位观访了阿帕切爾的老朋友却不怎么热心。他不喜欢小汽车。另外，这两天又下了雪，冷得我都快要哭出来了。如果情况是这样，我是不会去圣多明各的。

托尼在家里，他不得不甩掉了约翰·科利尔，就像约翰·科查一贯所说。因为托尼他在圣塔非的时候牙痛得要命。幸运的是，当他在家时，牙痛就好多了。——这便是一种综合考虑。

约翰·伊文思昨晚从怀俄明回来了，从星期三开始，行驶了100万英里（原文如此——译者）——在他的新汽车里。现在他想在四个星期之后，娶年轻的爱丽丝·（亨得森）为妻。1月4日带她去布法罗祖母家，然后，我们这位年轻的绅士便正式长大成人了。他是否能达到这种速度，还有待证实。爱丽丝·科宾现在还在此地，明天将要离开，带着她对梅宝的赞美，又带着她那女性所特有的那份担忧。豆蔻年华的爱丽丝还不到16岁。李·威特有两个星期没有回家去见尼娜，而是去了他的墨西哥女人那里，还和她一起得了流感。尼娜怒火中烧，提出离婚。于是，他变得老实起来，说如果贝里夫人

去的话他就回家。贝里夫人去了，他回到了家里，哭了。尼娜的心软了，离婚的事便抛到了九霄云外。

不再啰嗦了。我们仍然醉心于骑马；星期天，扬鞭催马穿过白雪覆盖的格洛里塔，真令人心旷神怡。我的矮种马格兰弗尔真有点像我，它和弗丽达寸步不离。当地不想骑它的时候，它几乎将自己吊死在带刺的铁丝上，而我们却独自一路小跑地溜了。我总认为你是我的第一个骑伴，我的第一个印第安人伙伴。如果有谁发表我的《印第安人和一个英国人》这篇文章，你就会在那里见到你自己。

劳伦斯关于印第安人的随笔不难找到发表的园地：《一些印第安人和一个英国人》登载在 1922 年 12 月 24 日的《纽约时报杂志》上；而《印第安人和一个英国人》则发表在 1922 年 2 月的《罗盘》和 11 月的《阿德尔菲》杂志上。劳伦斯对约翰·科利尔的描写十分辛辣，说他“为他的改革使命而疲于奔命，真有一点儿祖尼人的样子”。这可能是他在恶劣的环境中遇到科利尔的结果。其实，科利尔有一种劳伦斯式的对印第安人的同情。作为印第安人事务的地方长官，科利尔在一种对人权比土地占有或一种不顾一切的“自由事业”的利益更感兴趣的管理下（F·D·罗斯福式的），终于制定了保护他们的方针。在劳伦斯年轻时，新墨西哥州参议员伯萨姆和他的继承人阿尔伯特·福尔参加了军队，图谋剥夺印第安人的土地。福尔在去联邦监狱前曾离开他的参议院的岗位去当哈定的内务秘书。后来，印第安人纳瓦霍人的工地上发现了石油，而正是石油最终导致了福尔在公众面前失宠。

科利尔提醒印第安人注意那种威胁性的土地掠夺，劳伦斯甚至也对在《纽约时代周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前面已提起过）对伯萨姆法案展开一场笔战怀有浓厚兴趣。印第安人的代表团西行、抗议印第安人事务局进行的劫掠，并要求得到保护。因为甚至在福尔被撤职时（1923 年 3 月 4 日），这个机构的态度也没有改变。福尔以前的同事们将印第安人定成共产主义者——即所谓“莫斯科的代理人”。不管怎样，印第安人掀起了足够的风暴来反抗对他们世袭的土地的大规模掠夺。尽管实际上他们还得等待一些年，直到罗斯福·伊基斯和科利尔制定了科利尔所称的“印第安人新政策。”

劳伦斯未能预见到这一点，否则，他大概会找出它的岔子，“不知道在什么地方”。1922 年 11 月，他在新墨西哥给梅宝·洛汉的信中说，“印第安人懂得你和科利尔会带着你们的救世军式的、又是包藏祸心的白种人意识来消灭他们。”但是，劳伦斯对约翰·科利尔的洞察受到科利尔同一个女人的交往的妨碍。这个女人至少会使劳伦斯的一部分判断得到证实。她的策略会激励新一代印第安人去争取得到公正的定居权力。直到 1971 年，印第安人才得到他们位于陶斯山的神圣的兰湖的所有权。

到新墨西哥州一个月之后，劳伦斯在与年轻作家莫里斯·莱塞曼的一次骑马会见中说，他发现，美国人“作为一个民族是危险的，比欧洲大部分民族要危险得多”。但他又已经开始认为，美国是拉纳尼姆的场所了：“我愿意看到年轻人的欢聚”，他告诉莱塞曼，“欢聚在远离城市的某些地方，欢聚在某个生活比较廉价的——就像这样的—一个地方。让他们拥有一个农场或牧场，里面生长着骏马和牛羊，但不要指望它会产生效益，也不要让他们试图从中大获其利，就像布鲁克农场一样。但要让他们通过写作。绘画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活动来维持他们自己”。这样，“他们就能在这个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将创造一个核心，而且，“能够逐渐地扩大影响，能防

止一些其它不良现象的发生。至少他们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仿佛是对这些观点的反应，70年代的“嬉皮士”在陶斯附近建立了群居点，建造了一些迪马克辛因式的建筑。这些建筑代表着他们的一位英雄巴克米尼斯特·富勒的风格。

这是对莱塞曼娓娓而谈的早年在新墨西哥州的劳伦斯，是每天骑着印第安人矮种马奔驰的劳伦斯，是穿着牛仔靴、白色骑马裤、蓝衬衣、戴着班丹纳花绸领带和宽边帽的劳伦斯。他在10月31日给弗里曼夫人的信中，提到了关于拉纳尼姆的新观点，由于这一点，也由于信中第一次提到了他后来想象为拉纳尼姆总部的那种农场，这封信便显得至关重要了：

我昨天给你写信时并不知道梅宝给你打了电报。今天我们去过了约翰（约翰·伊文思，梅宝的儿子）的牧场——离这里约20英里。那儿是如此幽静，如此安闲，远远胜过此地。弗丽达想去那里，并在那里住下。我们想去试住一个星期，因为天气将会变得更冷。但我想我们会去的——希望在那儿创造真正的生活。那儿的生活远比这里的灿烂，比这里真实。你应该光临一次，你会发现你多么喜欢它。

梅宝说你想卖掉洛杉矶的房子。卖掉它吧。如果可能的话，在你来这里之前就卖掉，或者交给一个代理人，然后启程前来。我们一起来设计一种新的生活。我在想，你应该需要一块与我们相邻的“家宅”地皮，有你自己的房子；梅宝则占据另一块相邻的地皮。我们将形成一条规矩：不请佣人。我们一切都将依靠自己。在这里，没有故作高深的学者和对发音不全的事物的担心。我们应当建立一个中心农场，使它完全名副其实。这对我来说也许太不现实了。

这就是我的想法。无论怎样——如果这对你有吸引力的话，我们可以更详细地谈一谈。

劳伦斯很快发现在他迁往山区的道路上有着障碍：11月24日，他写信给弗里曼夫人说：“今年冬季我们不能去牧场了。房子坏了，要修理。但时间已太迟了。所以只好呆在现在的房子里。”

通过邀请当地艺术团体成员们在他的靠近“梅宝城”的房子里举行社交聚会，劳伦斯至少从这种打扰梅宝·洛汉的活动中得到了乐趣。那座房子是托尼·洛汉的，劳伦斯坚持要付给房租。

而他对那些“自命的”艺术家们所表现出的厌恶，又给了洛汉夫人一个心满意足的机会，来保持与那些名流男士和名流女士的关系。但此时，劳伦斯却心甘情愿地当众暴露了自己的私生活。有时候，他和弗丽达会当着别人的面吵嘴。一天晚上，当梅宝·洛汉在场的时候，据说，劳伦斯对弗丽达大声嚷道：“扔掉你嘴上脏呼呼的烟头吧！不要挺起你那肥胖的肚子！”——弗丽达则反击道：“你最好还是住嘴，否则我就将你的事情全都倒出来。”那些在场的、不了解劳伦斯夫妇的人惊讶地发现，他们能够迅速消除烦恼，而不是让双方陷入怨恨之中。事情刚过去几分钟，劳伦斯和弗丽达便手挽手地在皎洁的月光下并肩散步，“沉浸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宁静世界之中。”

劳伦斯和弗丽达觉得，维护他们的“宁静世界”的最好方法是去攀登落基山。两星期之后，劳伦斯于12月15日致贝西·弗里曼的信中记述了在那里的生活：

你知道我们已经迁居：梅宝作为邻居离我们简直太近了。我们来到了霍克斯的牧场——与约翰·伊文思的牧场相邻——离陶斯约70英里：有一座古

老而精巧的小木屋，非常舒适。我们计划住到明年4月，这样，到那时你也许能顺利地卖掉房子。你不必卖掉你那些切宾代尔式的家俱，也许这样做是对的：如果它们对你是一种享受的话。看来我们还是和你见上一面。

我们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闻：24日我们将涉足一次陶斯，与哈伍德夫人一起度过一两天时光——你该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就是从她家折回的。托马斯·塞尔泽（我的出版人）和他夫人约在25日抵达陶斯，然后，我们一起返回此地。梅宝将处于婚礼和圣诞节的喜庆之中，全然不同于我的命运。约翰·伊文思这个月20日同年轻的爱丽丝·亨得森结婚。她只有16岁，伊文思明年1月满21岁。我不大喜欢他：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很难让人信赖的年轻人。置身于这些事之外我感到非常高兴。这对年轻夫妇将住在我们这座（托尼的）房子里——等爱丽丝成年以后便去东部他祖母家。至少，有这个计划。对我来说全都一样。——亲爱的贝西·弗里曼，我必须告诉你，我不太喜欢梅宝·Ellemeparaitfausse.Lastrege，（法语：在我看来，她很虚伪。——译注）

我们在这里过得相当愉快：砍倒了一棵大树，然后，拼着老命将它锯开、劈好。噤，它们烧得那样快，全变成了红通通的烈火。看着红色的余烬，我不情愿地想：我的全部劳动都化作了青烟！这是一棵香脂冷杉树，烧起来火光特别闪亮耀眼。我们同狐尾大林鼠、猪和猫作斗争。我们养了一只洛林的小黑狗，现在它已经长成一个爱吵爱闹的年轻“女郎”了，我们出去骑马：我骑的是一匹高大的栗色纯种马，当我分开双腿坐在上面时，它几乎要将我撕成两半。——在一幢有三间房的小屋里住着两个年轻的丹麦人。他们是画家，人很好，是我们的好邻居。下个星期蒙齐尔会来。我们的周围积雪很厚：但沙漠下面是没有皑皑白雪的。草原狼凄厉的嚎叫从门外不停传来……我们想夏天去格陵兰岛，你说我们会去吗？

“我们仍然是梅宝的‘朋友’”，劳伦斯曾告诉他的岳母：“但是，不要将这条蛇放到我们胸口上来”。劳伦斯夫妇与他们的新房东A·D·霍克建立了一种非常愉快的关系，还成了霍克家年轻一代威廉和他妻子雷切尔的特别好的朋友。在那个冰天雪地的冬季，住在德尔蒙特的另一座小房子的两个丹麦人是克努德·梅里尔德和卡伊·戈兹切。劳伦斯同他们一起隐居山中，这激怒了梅宝·洛汉。她在陶斯时曾冷落和潮弄过这两个丹麦人。

梅里尔德后来写了一部关于劳伦斯的回忆录《一位诗人和两位画家》（1939年），主要是描述那个不寻常的冬天。此书引人注目只是因为他在观点的不偏不倚上付出了自觉的努力。该书的大部分内容是与劳伦斯的对话的再现，有些地方取材于劳伦斯的部分作品。这种方法使作者资格变得太易于确定又太混淆不清。梅里尔德有时错误地使用了这种方法，例如，从斯蒂芬·波特关于劳伦斯的书中摘取一段，并错误地将那段文字说成是劳伦斯所作。那是一些试图否认劳伦斯的同性恋倾向的文字。不管怎样，提及的这种评论属于这个丹麦人自己的主张，产生于与劳伦斯的密切接触中。在山顶上的那个冬天，及后来亲密的共同旅行中，他得出的结论是，劳伦斯确实不是同性恋者。

梅里尔德的书中还有另外两个令人感兴趣的地方——那个多事之冬的一些事情，其中之一就是一个名叫米塔·莱曼的姑娘的来访。她从陶斯步行来访问两位丹麦人，因为如果当天再走回去行程未免太长，两个丹麦人便将她安置在他们的小屋中的一间房子里过夜，这事触怒了清教徒似的劳伦斯。另

一件事与劳伦斯的狗比布尔斯有关。它是以这个名字成为劳伦斯的一首诗歌的女主人公的。那就是《飞鸟、走兽和鲜花》中一首“当我是一个少年，我最先拥有的活着的东西，是兔子，垂着耳朵的小兔子，我没有那些太会生育女的白鼠，没有阿道夫、没有国王”。布满皱纹的小黑脸，热情的态度和乱交朋友的方法（“太多的人情味有时对你是一种困惑”）——比布尔斯的这幅肖像是劳伦斯最有生命力、最有趣的创作之一。这条“茨特·惠将曼式的小母狗”成了劳伦斯所不齿的各类美国人的特点之象征。梅里尔德说，有一次，劳伦斯在盛怒之下用脚踢了比布尔斯，当梅里尔德 30 年代在圣塔非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他书中描写这件事的其中一节时，一些了解劳伦斯的人发表文章，强烈地否认这件事。梅里尔德说，当时他几乎要动手打劳伦斯。他进一步说道，第二天，劳伦斯仿佛是为了缓和气氛，带给他和戈兹切一块他自己烤制的蛋糕。

1 月 24 日，劳伦斯写信给弗里曼夫人，“现在我对冬天有一点厌倦了；地面上的冰冻是这样旷日持久。我不太习惯”。至于弗里曼夫人那位来自布法罗的老朋友——哦，她可是“一个爱说谎的人——虚伪得可怕”。来自陶斯的传闻大意上说，她正在陶斯逢人便告，“我不得不摆脱劳伦斯夫妇”。据说，她的儿子也这样对别人说：“我母亲不得不将劳伦斯夫妇逐出家门”。可她同时“写来这样一些友好的书信，谆谆劝告我们下山，同他们去墨西哥旅行，等等，等等。那不是虚伪是什么？够了！我再也不会去见她了。”一次，当洛汉夫人的小汽车出现在牧场附近的公路上时，劳伦斯和两个丹麦人跑进树林躲了起来，留下弗丽达一人独自接待了她过去的女房东。

在 1 月份的那封信中，劳伦斯告诉弗里曼夫人，他“担心任何一个住在陶斯、任何一个不是无赖然而参加了一次输掉了的比赛的人”。他整理他的手稿。准备“再一次迁移，我不知道走哪条路——是否东行，经格陵兰岛至俄国——或者仍然南行，也许经棕榈泉至墨西哥、然后直抵欧洲”。

陶斯被闹得满城风雨，这是因为据说劳伦斯这样说过梅宝·洛汉：她曾试图使劳伦斯爱上她（因为她承认自己绝望地说过：“我怎能放弃我的目标呢”）如此这般，不一而足。一天，当她系着鞋带的时候，她突然停了下来，失去了知觉，昏过去 24 小时而脸上却带着笑容。医生们硬劝她服用白种人服用的药。托尼坐在她的卧室的地板上祈祷看不见的上帝。在她康复之后，从劳伦斯所在的山上，她听到了他所作的诊断，那就是她失败了。说她垮下来是因为她的愿望遭到了第一次的挫折：“对于劳伦斯来说，他想到这些时，一定会觉得那是一个辉煌的日子？”

2 月初，劳伦斯从莫里和柯特连斯基那里得知了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去世的消息。她曾一度离开莫里，去那充满神秘感的枫丹白露市戈德杰夫学院小住。她觉得劳伦斯和 E·M·福斯特是“能够了解这个地方的两个人……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做的话。但我认为劳伦斯的骄傲会阻碍他的发展，没有一个人会比另一个更了不起”。她死于 1 月，即莫里第一次拜访该学院的那一天。听到她的死讯，劳伦斯写信给莫里说，“这最后的 4 年是一段极为残酷的人生旅程”，他还写道，“死者并没有死去，他们仍在注视着这个世界，仍在起着他们的作用”。

这个时候，劳伦斯还在计划去墨西哥。他已经完成了《飞鸟、走兽和鲜花》，还包括几首到达美国之后创作的诗歌，如《比布尔斯》、《新墨西哥的鹰》（“太阳可需要血的河流，你可认为 / 在美国，它仍然需要 / 雄健的

鹰”？）《新墨西哥的人们》（“巍峨的山脉包围 / 环绕着白色熔炉的大沙漠）、《陶斯之秋》（“……尖尖的黄黄的白杨树簇拥耸立，像羽毛迎风飘展”。）另外还有几首诗歌，它们再一次表现了劳伦斯对“一地之精华”的敏锐观察和洞察入微的能力。这些诗歌大多数具有象征性，其中一些包含着对社会的批评，如《美国鹰》（“你愿意永远靠这繁荣经济的冷肉生存吗”？）。一首显然是在萨莉·霍普金去世时写的《灵魂在西方招唤》，怀着思乡情绪，“在我看来，英国布满了坟墓， / 女人的坟墓”。

2 月，劳伦斯写信给柯蒂斯·布朗，谈起了这些诗歌，也谈起了他的其它一些创作出版以及旅行活动和计划。他开出那个月的税收清单时，发现到那时为止，前一年是他在财政上的最佳的一年。1922 年他的总收入是 5439.67 美元。除去折扣，他还欠 70 美元的税收。正如他告诉布朗的那样：“在这儿，我正在得到我有权得到的东西”。

（七）墨西哥的早晨

1923年2月24日，在墨西哥城蒙特卡洛大旅馆（《癫狂的毒蛇》中的圣利摩旅馆），劳伦斯写信给贝西·弗里曼：

昨天晚上到了这里——真是一次长途旅行。——找了一家美国人开的旅馆但不太喜欢它：这是一个优美的小天地。天气温暖而不躁热——常下一点小雨——一个令人愉快的城市，与其说是美洲，倒不如说更像意大利南方——除了四处游逛了一下，别的什么也没干。我想我们会喜欢这地方的。

他和弗丽达19日匆匆经过陶斯，以躲开他们先前的女房东。他们已有一年零三天没有回到那个地方了。在圣塔非和厄尔巴索作了短暂停留之后，他们直抵墨西哥城。他们停留在墨西哥的一个星期内，威特·宾纳和威拉德·约翰逊一直形影不离。约翰逊的小型杂志《可笑的家伙》被禁止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发行，原因是刊登了劳伦斯对本·赫克特的《范塔尤斯·马拉尔》的评论文章。劳伦斯断然声称，其男主人公是“一个可怕的手淫患者”，采取一种精神上的机械的性方式，对该书产生的不良后果，劳伦斯作了具体的分析。

考古学家齐利亚·纳托尔在科约阿坎欧区为劳伦斯夫妇安排了房子（他们没有去住）。1901年，她出版过《世界新旧文明的基本原理》一书。据弗丽达回忆，劳伦斯读过该书。她将此书告诉了威廉·廷德尔。廷德尔在他关于劳伦斯的著作中断言，纳托尔的著作是《癫狂的毒蛇》的创作来源之一。劳伦斯是在5月定居在查帕拉时开始创作此书的。弗丽达指出，廷德尔说劳伦斯曾在纳托尔家住过，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她说他去那里吃过三餐饭。然而，认为纳托尔是莫里斯夫人，即《癫狂的毒蛇》中郊区女房东的原型，在这一点上廷德尔是对的。（附带说一句，纳托尔自己的房子正好在几年后里昂·特罗斯基被暗杀的街道上的那座房子的对面。）

在劳伦斯夫妇第一次漫游墨西哥的时间里，他们和宾纳及约翰逊多次游览了墨西哥城以外的地方，如特奥提瓦坎、索钦里科（像宾纳回忆的那样，是“一座毁坏了的修道院”）、普埃布拉和奥里萨巴，参观了墨西哥人的村庄和阿兹台克人的遗址。在特奥提瓦坎，劳伦斯观赏石金字塔，在阿兹台克人信奉的立神突出的头像前流连忘返。对阿兹台克人的蛇神的想象无疑有助于激励劳伦斯对这部描写墨西哥的小说的创作冲动——宾纳的推想可能是对的。

在4月23日的信中，劳伦斯告诉艾米·罗威尔，如果不是他发现在墨西哥很难打破环境的困扰，他将非常愿意写一部另外的小说。这个国家本身是多姿多彩。天趣盎然的，但他“还没有真正了解它”。在墨西哥城，他的大部分时间化在与讲英语的人的接触中；他并不总是快乐逍遥：至少有两位回忆录作者（卡尔顿·比尔斯和威廉·宾纳）透露，劳伦斯曾在他的旅馆里大声用一种侮辱性的语气表达了他对一些试图拉拢他的美国记者的厌恶。还是这两位作者写道，劳伦斯偶尔会对弗丽达大声叫嚷，让她不要分开两腿坐着“像一个邀遏女人”。后来劳伦斯将宾纳作为欧文·里奇的原型写进了《癫狂的毒蛇》中，因此而激怒了宾纳。书中，里奇和他年轻的朋友维利尔斯（威拉德·约翰逊）观看了一场斗牛比赛，那惊险惨烈的场面几乎使他们两人晕倒，但他俩却要歇斯底里似地硬着头皮看下去，因为他们是美国人，对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他们都应该“见识”一番，哪怕使他们感到恶心，弗丽达写信给梅里尔德说，她和劳伦斯看斗牛，“10分钟后就溜了”。但坚持到底的宾

纳和他的伙伴被劳伦斯请进了他的小说里：“怎么会有人像这些美国人那样，面对残羹冷餐如获至宝，激动万分地精心挑选，然后像食腐肉的恶鸟一样狼吞虎咽呢？”

劳伦斯不久便觉得，他住在墨西哥的时间已经足够了。他在一张明信片上（4月2日，奥里萨巴）对A·D·霍克谈了自己的想法，同时也提到了一场斗牛：

在墨西哥的时间已经够了——下个星期将去纽约——地址是托马斯·塞尔泽的：第50大道西区5号转。这个国家在短时间内是令人感兴趣的，然后便会想同她再见。——我真心希望霍克夫人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天气变得暖和起来——我们看了斗牛——真是太令人作呕了。

但劳伦斯并没有去纽约：他当时给许多人的信中表现出他的一些混乱。有时候他会告诉一个人他将离开墨西哥，同一天他又会告诉另一个人他将留在那里，并找一个地方住下来。

从奥里萨巴回到墨西哥后，他期望在4月26日同公共教育部部长乔斯·瓦斯康塞罗共进午餐。这位自称为“克利奥人（西印度及南美各地西班牙、法国移民的后裔。——译注）的尤里西斯”（即希腊神话中曾参加围攻特洛伊城的智勇双全的奥德修斯，亦为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主人公。——译注）的知名学者素有“马背上的部长”之名，因为他是一位文化的传播者，亲自到印第安人中去负责教育的普及。（1923年，他积极帮助本地画家如里韦拉和奥佐尼，委托他们绘制政府部门的建筑壁画。劳伦斯在他当时的谈话中，及后来在他的《癫狂的毒蛇》中挑剔了这些绘画的作品——时间证明他完全错了——他说这些壁画是拙劣的，因为它们是一些画家在仇恨和政治宣传的双重刺激下创作的：“那些平脸的印第安人，是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令人生厌的经文中的象征。”

但劳伦斯又写信给莫里，说奥布雷政府是“优秀的明智的理想主义者”，尽管他感到他自己“像平时那样置身于这些事物的系统之外”。有一天，当劳伦斯同弗丽达及几位记者前去赴约，与瓦斯康塞罗会面并共进午餐时，他更加明显地将自己置于这些事物之外了。他来到了瓦斯康塞罗的办公室外面。因为正处在一场危机的紧要关头，正忙得不可开交的瓦氏只得派一名助手去问他们一行，午餐是否能推迟到第二天。弗丽达和其他几位都同意了，唯有劳伦斯激烈反对。宾纳在传记中友好地推测劳伦斯的愤怒是由于他肚子裡的酒精引起的，但对他这个小插曲所作的宽容的解释并不能自圆其说，因为那时劳伦斯一行还没有去过任何一家酒馆。宾纳不得不补充道，如果不是宽容地原谅他是由于酒精的作用，这一次劳伦斯简直是有点疯了。多年以后，瓦斯康塞罗写了关于死去已久的劳伦斯的文章。据L·D·克拉克评论《癫狂的毒蛇》的著作《躯体的黑夜》记载：“1951年至1952年，瓦斯康塞罗在墨西哥的《消息》杂志上撰写了三篇评论那部小说的文章。文章说，“它是曾经产生过的写墨西哥的浪漫主义作品中最优秀的一部”，然而，它的作者却为那次因故取消的午餐而无理取闹：劳伦斯是一个“二流的白痴”。

那次预约的午餐被取消的当天晚上，劳伦斯起程前往瓜达拉哈拉，想在那儿找个地方住下来。他写信给他的岳母，说他现在还没有返回欧洲的意愿，并说她肯定在为欧洲大陆上的那种“德国的悲剧”和唯物主义而担忧。墨西哥也存在“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和革命以及它带来的其它的一切”。然而他却袖手旁观，像印第安人那样，在各种革命和改革中保持原样。”他

们是设有我们的意识的团体。他们就像一汪黑水，让我们的肮脏的轮船带着恶臭和噪声在上面行驶——这汪黑水变脏了一点，但并没有真正改变”。

劳伦斯在哈利斯科州的查帕拉村找到了一个住处。几天后弗丽达同他会合了，宾纳和约翰逊接踵而至。弗里曼夫人显然曾将陶斯比作衰落的罗马。劳伦斯在给她的信中这样写道：

你有关梅宝的信收到了。不，那是不能与吉朋相比的，它就像沉入大洋的阿特兰提斯洲。（传说是史前位于大西洋直布罗陀以西的一个洲或岛。古代著作家认为它是因地震而沉入大洋的。——译注）

我想下一次你会来的。

我们在这里租了一幢房子——非常舒适——景色优美，空气新鲜——一个叫伊莎贝尔的墨西哥姑娘负责照料我们——屋外是碧波粼粼、一望无际的查帕拉湖——这是一个叫查帕拉的小村庄——在它的同一侧有一个瓜达拉哈拉湖的湖边度假胜地，离这里约 35 英里。

天气不太热，如果你有点想南下的话，那就毫不犹豫地来吧。我不会安排你住我这幢房子，因为伊莎贝尔的服务肯定达不到你的要求，即使你亲自教她也不行。但这儿有一家很不错的旅馆，短住，一天 4 比索，住一个月则为 3 比索一天。一个比索约合 49 美分，够便宜的。

不知道我们将住多长时间——一个月或两个月吧。

打破查帕拉的平静是来自陶斯的一条令人兴奋的消息，即梅宝·斯特恩的突然结婚。最后她正式成了洛汉夫人。托尼·洛汉毕竟是政府的一名监督，从别人对她的这一暗示中，她预见到托尼对她的一些活动的官僚派头的愤怒久而久之可能使她的这位来自印第安民族的情人疏远于她。于是，她匆匆地嫁给了他。劳伦斯为了激怒梅宝，寄了一张明信片给他曾在陶斯“漫骂”（洛汉夫人语）过的尼娜·威特：“我听说梅宝嫁给了托尼。这是为什么呀？”这位新婚的洛汉夫人反唇相讥：“这不关他什么事，你没有告诉他么？”她承认：“我从尼娜那里偷走了明信片。”

5 月 30 日，弗丽达写信给格汉夫人少女时代在布法罗的另一位朋友贝西·弗里曼：“当你听说梅宝和托尼结了婚时，你一定会目瞪口呆；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对自己说：“为什么不可能呢？但我的心中又响起了另一个声音：这真是那样令人难以置信”。梅里尔德写道：印第安人不喜欢这桩婚姻，陶斯人也不喜欢，但他们却因此有了闲聊的话题，对这一点，他们是喜欢的。弗丽达对洛汉夫人仍然抱着友好的态度，她说：“不管怎么样，她在生活中是失败了，然而，生活又太容易使人失败了”。弗丽达透露，劳伦斯正在写一部小说，并且已完成了 250 页。“晚上，我们的卧室外面睡着一个荷枪实弹的警察，因为，这里充满了对暴徒的恐惧！”——这一情况与那部小说中的警察不得不睡在凯将房外的描写毫无二致。

劳伦斯每天来到那明澈如镜的大湖岸边，朦胧的湖光映照着他的《疯狂的毒蛇》。他坐在柳树或木兰树下写作，像约翰逊回忆的那样，“在厚厚的蓝色空白簿上写下他极为秀丽，明快的文字。”他称他写的那个故事为《克察冠阿特尔》（墨西哥印第安人阿兹台克人信奉的主神——译注）。这便是他想为他的小说取的名字——这个哥伦布之前的时期的地狱判官的名字。

约翰逊还回忆道，在湖边，当劳伦斯不是在写作或者不是在观察打渔人、洗衣妇、“出卖湖中的馈赠物的小男孩”时，他便潜心研究墨西哥的民间文

学和历史。在墨西哥城，他读过拉腊和平乔的《墨西哥人民：他们为自由进行的斗争》。在《D·H·劳伦斯和他的乳牛苏珊》一书中，威廉·约克·廷德尔记载了纳托尔夫人的著作中未曾提到的另一些关于劳伦斯的原始材料。他指的是较早的情况，看来“劳伦斯对阿兹台克人的神话颇熟悉。劳伦斯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对弗雷泽、泰勒以及哈里森的认识对这些神话加以利用。”从他的著作中，廷德尔继续阐述道，“以他写给洛汉夫人、威特·宾纳和劳伦斯夫人的信件中，我发现，他在新墨西哥州和墨西哥期间或之前，读过普雷斯科特的《墨西哥的征服》、托马斯·贝尔特的《尼加拉瓜的自然主义者》、阿道夫·班德列的《阔佬》、伯纳尔·迪亚兹的《墨西哥的征服》、亨博尔的《山峦的景色》以及数卷《墨西哥民间艺术研究》。

廷德尔进一步推想，劳伦斯也可能读过刘易斯·斯宾斯的《墨西哥的众神》，而且阿兹台克人的赞美诗可能为他的小说中类似的赞美诗提供了原始材料。这种情况大概是在劳伦斯去查帕拉之后，而不可能早在劳伦斯7月动身之前发生，因为斯宾斯的书是在1923年出版的。但他有可能读过斯宾斯1921年出的集子《古代墨西哥和秘鲁的神话》。

而劳伦斯在思索着他自己的生命的赞美诗——矿工教堂的歌，如《有人将走进天国之门》。罗杰·达托勒认为，这首赞美诗与《癫狂的毒蛇》中阿兹台克主神的信奉者们唱的赞美诗如出一辙：

《天国之门》

门关着的时候会有人来敲。

不一会儿，不一会儿，

有个声音在说：我不认识你。

是你？是我？

是你？是我？

《癫狂的毒蛇》

门关着的时候会有人来敲。

是你？是我？

有个声音在说：我不认识你。

是你？是我？

在一个墨西哥村庄，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这位红胡子男人坐在树下，让劳动的船夫、蹦蹦跳跳的孩子和路过的牧羊人包围着，让自己的意识回归到那个乡村煤矿的黄昏时刻。那些满脸煤尘的人们从矿井和酒店赶回家，在一起纵情歌唱。劳伦斯在湖边的创作中，捕捉住了墨西哥人生活的光明的表面——“西方，从平地上升起一派破败景象的别墅和教堂的白色双塔。这教堂的双塔尖仿佛是在深红色的凤凰树和灰黄的芒果树上伸出的两个手指”——然而，在这生活的深层，劳伦斯见到的一切总是黑暗的。太阳本身就有一个阴暗的核心。镇上和从乡下来的人们成了他的小说中的阿兹台克主神虔诚的崇拜者。晚上，他们在集市中心唱着赞美诗，鼓声应和着关于耶稣复活的赞美诗，“睡着的将要醒来！睡着的将要醒来”！

在弗丽达提及劳伦斯大约在1个月内完成250页写作的第二天，他告诉岳母，他已经完成了10章。一周之后（6月7日），他写信给卡斯威尔夫人，“我感到有一部小说正在我心中酝酿，所以我来到这里，来到这个景色如画的大湖岸边，看看我是否能将它写出来。现在，我的进展十分顺利。如果能在这个月底完成初稿，我将会特别高兴”。但在那个与宾纳有约的最后1个

月里，他未能完成他的目标。他们约定去瓜达拉哈拉作一次短途旅行，并划船游览方圆 90 英里的大湖（弗丽达激烈反对这个计划，但约翰逊对此却保持沉默），6 月底左右，劳伦斯写信给当时在洛杉矶的梅里尔德，说墨西哥对他充满了诱惑但又具“危险性”。那里有可能再爆发一次革命。当一个地方受到破坏性的威胁时，一个人为什么要在那里居住下来呢？“所以，现在我放弃了那个计划”。就在同一天，即 6 月 27 日，劳伦斯写信给弗里曼夫人说：“这部小说已经接近完成——我也该走了——我必须前往纽约——到美国去”。

在火车向北穿过墨西哥稠密的雨区之后，劳伦斯和弗丽达沿着得克萨斯州南部奔赴新奥尔良，“一座静寂而又生机勃勃的、有点类似于马丁楚兹威特的城市”。旅行去纽约的前景是索然寡味的，但他和弗丽达依然成行。到达那里之后的一个星期五（1923 年 7 月 20 日），劳伦斯在纽约写信给弗里曼夫人，用的是托马斯·塞尔泽的信笺：

我们昨天到达了目的地——今天又要动身去新泽西，去住在一座安静的别墅里，我可以在那里改正校样。具体地址还不太清楚。但是出纽约只有 50 分钟路程，所以，你一到纽约就可以来看我们，或我们去看你。城镇的环境使我感到厌倦。

我们可以在一起谈论墨西哥，谈论我们的未来。

又及：塞尔泽可以给你确切的地址——那是他的房子。

那座小别墅靠近莫里斯平原，位于莱克瓦纳铁路线上，“在百万富翁柯芬的住宅后面。”劳伦斯在信中告诉宾纳，他们在那里生活很“愉快”：“这儿山明水秀，风光旖旎，环境优雅宁静。然而这些对我都是暗淡飘忽的，不是实实在在的美的体现。纽约也是如此，像一座竖着广告牌的房子”。在那儿，劳伦斯最感兴趣的是一群群“人们躺在草地上”的场景，那是一幅充满田园风格的风景画。他说他“实际上门可罗雀，几乎与世隔绝”，尽管他的那些没有发表的信件表明。他曾与《民族》杂志的编辑们一起吃过午饭，而且塞尔泽夫妇也曾在他们的住处和劳伦斯最不喜欢的地方阿尔贡金为他设过宴。

莫里斯草原上的人们对劳伦斯在那里的游历记忆犹新，他们说，他常常在下午与托马斯·A·爱迪生一起作长时间的散步。似乎有点奇怪的是，劳伦斯很有可能——尽管他不太相信科学——喜欢上了这位著名的发明家。无论怎样，这两位顶着仲秋的余热。沿着乡村公路溜达的名士的思想之光辉是迷人的。由于爱迪生耳聋，劳伦斯大概不得不提高他的讲话音量，让他那预言家一般宏亮的声音在新泽西草原的上空回响。

劳伦斯曾打算同弗丽达一起坐船回国，因为弗丽达很想念家乡的孩子们，但就在启程的日子临近时，他却改变了初衷。8 月 7 日，他在致艾米·罗威尔的信中说：“我怀疑我是否应该让自己的足迹远至英国，可弗丽达将于 18 日乘船回国——而我迟早也要动身。”8 月 7 日他告诉岳母，“我发现我的灵魂在阻止我去欧洲，它就像先知巴兰的驴子，不能向外远离一步”。

弗丽达动身的那天，他送她到船上。她请求他留在船上，就这样不带行李，同她一起返回欧洲。他没有同意，于是，夫妇之间爆发了一场他们的朋友凯瑟琳·卡斯威尔认为是他们共同生活中“也许是最厉害的”一次争吵。他们气嘟嘟地分了手，都感到这次分手将意味着永远分道扬镳。但是，当弗丽达乘坐的轮船穿过茫茫大西洋时，她又恢复了往常的好情绪。当船抵达英

国的时候，“她打了一份情意绵绵的海底电报给劳伦斯，”请求他即刻回去与她团聚，因为此刻她比往常任何时候都需要他。但劳伦斯的双脚却依然稳稳地踏在西半球上。

弗丽达乘“奥比塔”号轮船航行了两天之后。劳伦斯便计划去加利福尼亚。8月20日，他写信给贝西弗里曼：“我希望她能在10月回到这里，或者我到美国的某个地方同她会面”。在西行的途中，“我将非常愿意在你的布法罗——也是梅宝和尼娜的布法罗——停留一晚。”一周之后，她感谢弗里曼夫人在布法罗做了他的热情的女主人：

非常感谢您让我在布法罗度过了四天充实而欢乐的日子。我觉得，在那儿的一瞥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充分地看到了昔日真正的美国，以前我仅仅了解在陶斯的另外两个布法罗人，而真正的本地的布法罗人比我期望的要好得多。唯有萨拉·M使我感到压抑：她的死给我的心灵带来了重压，至今我还为她感到难过——为什么没有人写你的理想之邦，布法罗就是一种理想之邦。

芝加哥阴雨连绵，恶雾迷漫，泥石流般的人群在街道和峡谷中川流不息。而对我来说，这里比纽约更真实，更有活力。

您对我非常好，我极为感激。这是我的人生历史中难以忘怀的小小的一页。

劳伦斯在洛杉矶住了1个月，其间，在圣塔莫尼卡、圣塔巴巴拉和棕榈泉作过短暂逗留。他曾与梅里尔德和戈兹切前往龙坡克镇观看日食。一位先锋派女诗人在一个乱石林立的山顶上观看，与劳伦斯站在同一群人中，但事后她对劳伦斯却一点也回忆不起来。

梅里尔德发现，没有弗丽达在身边，劳伦斯显得孤独寂寞，坐卧不安。他觉得洛杉矶“乱糟糟的——汽车特别多，使我对它产生疲倦和麻木的感觉”。最后他提议让那两个丹麦人陪他一起去墨西哥。梅里尔德是属于在言行上需要一贯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的那一类人。他回避了这个问题；单纯和随便的戈兹切则表示他愿意随同前往。即将动身之前，劳伦斯写信给弗里曼夫人：“不，我不相信梅宝有偿还她的债务的打算。她欠我什么我心中有数。作为一场长期的斗争，我已经作好了准备。不管怎样都要对她进行迎头痛击。现在我已经和她绝交了”。

那是一次凶险、勇敢、热烈和神经紧张的旅行。那一个月他们从洛杉矶去瓜达拉哈拉，火车走走停停。在福兹，他们摇摇晃晃地越过山路，在马背上和骡背上继续他们的旅程。沿着海岸的一部分道路仿佛是包围着劳伦斯和戈兹切的马戏场，整夜伴随着他们的是狮子的惊心动魄的吼叫声。然而，劳伦斯不顾这种旅行的危险和劳累，在旅途中仍进行着小说创作。

他在改写的那部手稿，是他和弗丽达在澳大利亚结识的护士M·L·（莫莉）斯金纳不久以前交给他的。她创作了一部描写澳大利亚边远地区生活的小说《爱丽丝的房子》。劳伦斯在加利福尼亚给她写了一封信，称她为文学创作奉献了一份珍贵的礼物，但此稿还需要改写，他提出让他来完成这一工作：按两人合作署名或用一个笔名。

她打海底电报给他，同意他按照他自认为合适的方式改写该稿。在他发出他第一封信的3个月之后，他又写信告诉她，他在旅途中一直进行着改写工作。他紧扣原作的故事情节但给了它“一种和谐，一种韵律和略有提高的艺术感染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结尾不得不作了大的改动。“当然

你可以反对”，他告诉她，“我那样做了”。她回忆道，“结果是我哭了”。劳伦斯在书的结尾增加了杰克·格兰特的女人的数目。莫莉·斯金纳喜欢原来的书名，而劳伦斯告诉她，“在出版的书中类似的书名太多了”。很显然，他们俩都不知道有一部早在1869年出版，1885年重印的澳大利亚小说的书名就叫《丛林中的男孩》。

劳伦斯和斯金纳合作的小说出版了。它是在澳大利亚边远地区复杂的背景下发生的一个动人的冒险故事。斯金纳补充道，它牢牢地抓住了劳伦斯的心。实际上，劳伦斯自己不久前的经历，如在德尔蒙特草原和在墨西哥与戈兹切旅行期间的骑马活动，无疑大大帮助他改写斯金纳小姐的小说。这是劳伦斯的一部奇特的作品，由他的合作者提供的精彩原作为前提，它也是一部令人满意的作品。

至于该书究竟有多少内容是劳伦斯自己的，至今仍是一个谜。他说他从头到尾将它改写了一遍，而莫莉·斯金纳的一些朋友则声称，劳伦斯的贡献并没有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突出。当然，斯金纳小姐提供了故事情节的材料，还有主要人物（包括主人公，她的兄弟杰克）和19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人生活的整个画面。斯金纳小姐在1924年对伦敦的一次访问中，同爱德华·加纳特会面。她在劳伦斯改写的该书手稿（现保存在得克萨斯大学）上作上记号，指出她记得的书中哪些部分是完全属于她自己的。这部小说被劳伦斯的批评家们忽视或轻描淡写地放过了。斯金纳小姐将改动较大的最后两章及比它们更出色的该书的大部分内容记在劳伦斯的名下，而这一大部分内容也比其它的章节出色。（关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可见此书1971年、1972年美英两种版本中本作者所作的长篇序言）。

对斯金纳的手稿的改写并不是劳伦斯在1923年的那个秋天进行的唯一的写作活动。在那段时间里，劳伦斯还在一本作文簿上写下了一些零零碎碎的随笔。其中一篇是《论言教》。它只是以这个题目出现在1924年的《阿德尔菲》杂志上的那篇文章的一个雏形。原先的那个版本（以前从未完整地发表过）是对他的宗教信仰的极为重要的阐述：

在我和基督教之间不存在真正的斗争。也许有某一种斗争存在于我和非国教主义之间，因为在我的灵魂深处，我的本性是仁慈宽厚的。但我信奉无所不在的上帝。我相信耶稣是上帝的一个儿子：（删去了“唯一”二字——原注）然而，不是上帝的唯一儿子。我想，那些认为上帝无所不在的人们将很愿意创立一门上帝的教派。这就说明，我们信奉一门教派。我们信奉神秘的教义，以反对非国教主义的庸俗。我相信入教的教士和秘传的知识的流传。我相信教会的威信和教士授与忏悔式的权力。

因此，在宗教原则上，我与天主教会之间不存在分歧。

但我不能相信基督教会，耶稣只是万能的上帝的儿子中的一个。世界上有许多人类的拯救者——而上帝却只有一个。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拯救者，而上帝却仍然是一个。

因此，未来的伟大的教会将知道人类另外的救世主：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世纪，得到不同的拯救。一个根据全能的上帝而创立的教会，而能为其他各种各样不同的救世主建立起教堂和庙宇是人类真正的（教会！）。

宗教最大的不幸就是每一种宗教都有排他性，都倾向于主张和维护自己独有的救世主。有人仇恨基督教，因为它声称通向上帝的路只有一条。一个真正的教会应该理解，通向上帝的道路有几条（删去了各种各样的——原

注)，还有许许多多的小路。

“我就是通向上帝的这条路”。——甚至耶稣也不能这样向他所有的臣民宣布。对特别多的人来说，耶稣不再是这样一条路。对我来说也是如此。但这有什么要紧？他还是上帝的一个儿子。而我也愿意且非常高兴地点燃一支蜡烛，将他照亮。

而我必须寻找另一条路。上帝，伟大的上帝，永远是万能的上帝。而我们永远必须寻找通向他的路。这条路曾是耶稣，而这条路现在不再是耶稣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路。上帝就是上帝——可他还没有送给我们一位先知。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放弃寻求、尝试和冒险。

在南下的途中，劳伦斯和戈兹切停留了数日，拜访了一位瑞士人，那人在纳瓦霍拥有一座银矿。劳伦斯将洛汉夫人置于这个背景之下，写出了《骑马出走的女人》。

在瓜达拉哈拉，劳伦斯和戈兹切有一天坐小汽车去了查帕拉。戈兹切在那个时候描述给梅里尔德的内容时有歪曲性质。他说，尽管劳伦斯带着对弗丽达几分伤感的蔑视，但当他故地重游时，他看上去“深深地动了感情”。但戈兹切认为那是不真实的。佯装的，实际上，劳伦斯是在深深地怀念他那仍然拒绝返回美洲的弗丽达。

弗丽达后来说，看来做错的是她这一方。而当时她却坚持要劳伦斯回英国同她团聚。戈兹切认为，劳伦斯那时正处于间息性神经错乱之中。他相信劳伦斯“在激起自己返回英国的愿望。”而莫里站在弗丽达一边，规劝劳伦斯回国：由于《阿论的杆杖》和《幻想曲》的吸引，他创办了《阿德尔菲》杂志，通过它将自己的意见传给劳伦斯并写信给他，说他只是一个副手，完全只是一个地产拥有者，他在等待劳伦斯回来接收。

自那次单独的旅行之后，住在伦敦的弗丽达茕茕子立，孤独之感变得越来越强烈了。她发现她的孩子们已经长大，对她不再觉得有小孩子们那种最初的本能的需要了。

还不只是在孩子们面前失意才使弗丽达产生一种与劳伦斯团聚的渴望；她还受到了莫里的冷落。9月份，莫里曾陪她一起去德国。在他去世后发表的1955年的日记中，记载了他对那件事的回忆。那次，弗丽达打算去巴登——巴登，莫里则前往弗顿贝格就J·S·文略特的妻子维维恩的精神失常问题请教一位专家。1923年9月，在火车上莫里和弗丽达发现他们相爱了。莫里控制住了自己：“不，亲爱的，我不应该让劳伦佐伤心——我不能。”但后来他又为这种“伟大的抉择”深感痛惜。

劳伦斯觉得，他和弗丽达无论如何将会永远地分道扬镳了，就像11月10日来自瓜达拉哈拉的一封惊人的书信所表明的那样。那是一封简短的信，缺乏劳伦斯平日惯有的那种朝气蓬勃的活力。那封不寻常的、马马虎虎的信的一部分内容显示出他们分居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局面：

我们（劳伦斯和戈兹切）一直想找船，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努力没有结果。我们想从曼萨尼亚穿过巴拉马海峡：我们也许还有可能找到一艘货船。倘若不能如愿，我们就赶到墨西哥城，搭从委拉克鲁斯开出的一次航班——如果那个地狱般的港口开放的话。如果还行不通，就去坦皮科。我并不喜欢坦皮科，因为那里热病流行。我感到我马上就不能再看一眼美国了——最快的轮船是“荷兰人”号和“汉堡阿美利加”号——它们用三个星期的航行能

到达南汉普顿或普利茅斯。

墨西哥仍然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使人神往的地方：它并不单调，也不沉闷。在瓜达拉哈拉，有时候你能见到挎着弓箭的、几乎赤身裸体的野蛮的基切特印第安人。他们显得如此怪模怪样，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动物在广场上倾听乐队的演奏。——这儿下了几场雷阵雨，但现在又是雨过天晴，风和日丽了。我喜欢这块环绕着瓜达拉哈拉的平原，有座座青山点缀其中。比起这个湖泊来我更喜欢它。那景色如画的大湖太沉闷了。

——而这个深深的峡谷也令人难忘——你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景象——我希望我仍在离这个城市不远的某地度过冬天。我仍然不相信欧洲、英国、成就，宁静，adelphis《原文如此——原注，指莫里的杂志《阿德尔菲》——译注），或任何这一类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变质了。但我将回来对你说一声你好！就是这么回来。如果你在家里同孩子们过得很愉快，我将非常高兴。不要为钱担心——如果你希望这样的话，我回来后将有有条不紊地作出安排，如果你愿意，止你得到一笔收入。我要告诉你，银行将把 100 英镑转帐给你。——我不知道塞尔泽是否在英国。我已有三个星期没有得到他或阿黛尔的音讯了。所以不知道他们的情况。——这部写澳大利亚人的小说（《丛林中的男孩》——原注）马上就要完成了。

（又及）附上梅宝的短简——她说她仍希望与我们保持联系。

弗丽达是否真正忽视了这封信的令人不快的一面（此信毕竟宣布了劳伦斯返回英国的打算，）或者劳伦斯是否留在墨西哥定购船票的 12 天里写了较为友好的信，不管怎样，弗丽达怀着喜悦的心情在等待着他的归来。马克·戈特勒为了逗乐，常常在他的朋友面前模仿弗丽达冲进他的工作室大喊大叫的神态：“你快准备一下，——劳伦佐来了！”

劳伦斯前去墨西哥城办理自己去英国和戈兹切去丹麦的船票。他在那里写信给贝西·弗里曼：“梅宝和我已经休战。她给我写了一封 *Peccavi*, *prccavi*, *c'est ma faute*！（拉丁，法语：对不起，对不起，是我的错——译注）的信”。在给洛汉夫人的回信中，劳伦斯像以往那样劝告他不要总是试图压制生命。

11 月 22 日，他乘坐的“托利多”号轮船启航了。该船在哈瓦那停留两天后继续驶往普利茅斯。劳伦斯从那里乘火车去伦敦，走的正是 6 年前他从康沃尔出走时走的同一条路线。这一次弗丽达却没在他身边。但前来迎接的弗丽达和莫里、柯特连斯基在伦敦帕丁顿区同他会了面。随后，劳伦斯夫妇去凯瑟琳·卡斯威尔的兄弟在伦敦汉普斯特德房子里住下。凯瑟琳说劳伦斯很快就对弗丽达与莫里“亲密关系”感到怒不可遏。据莫里回忆，当劳伦斯走下火车时，他的脸色“苍白中带着绿色，”他在对伦敦的第一瞥中带出的是这样一句话：“我不能忍受这种事情”。

后来，他交给莫里一篇随笔《归家随记》，莫里是不愿将它发表在《阿德尔菲》杂志上的。这篇随笔描述了劳伦斯从海外归来时的心情：“自从我在一场冬天的小雪中看着肯特郡的死灰色的海岸渐渐远离到现在，已经 4 年了。”此刻他写道，“日落后，当你向海上，向墨西哥湾靠近时，我的国土的末端的灯的微光是那样遥远。”上岸后，他发现英国笼罩在“死一般的宁静之中……而踏上旧金山的土地给我的感觉是难以忍受各种噪声的肆虐，而伦敦给我的感觉是一种压抑的宁静，仿佛任何东西都没有一丝回声。一切事物都被裹住了，或是缄默了，任何地方都没有热烈的接触。没有激烈的反应”。

尽管他认为他的祖国人民是“世界上最优秀最文明的民族”，但他看见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的至关重要的事情是将自己关在一个独立的、自我的箱子与幻想中，后来又关进他为自己的安全而设计的其它所有箱子中。他们丝毫也没有继承“古老英国的勇敢，不顾一切和男子汉气魄……不信你看看我们。裹在所有千千万万条裤子中的这么多人当中没有留下一个男子汉……你可以笑着对这些不计其数的保险箱里的人们大喝一声。除非你还是英国人，那么就会大吃一惊。而我的，我自己的故国正是这样，使我瞠目结舌”。

（八）新世界的最后疆土

劳伦斯在欧洲的三个月非常糟糕。在他到达英国后不久写信给宾纳（12月7日），“可怜的D·H·L痛苦不堪，好像是在坟墓之中”。在他离开前五天他写信给画家和神秘主义者弗里德雷克·卡特（1924年2月29日）说后一个星期三他将乘“阿奎塔尼亚”号轮去纽约：“我对欧洲及其那种小题大作，故弄玄虚的风气感到厌烦。”

在伦敦他又与莫里争吵了一番，并想为新墨西哥的拉纳尼姆招兵买马。他敦促莫里用《阿德尔菲》对“一切事物进行攻击”然后与他一同去美国。“如果我真的跟他回去的话，”莫里后来说，“我纯粹是出于对他的爱而那样做的；我把这话告诉了他，不！他坚持说，这里面不得掺杂任何个人的感情。”对莫里来说，美国之行在当时无论如何是一件个人的事情：他认为如果那种新的生活是依赖于去新墨西哥人的充足的收入的话，这件事情是不值得考虑的。莫里认为劳伦斯的身上具有双重的性格，他曾对劳伦斯说：“你总是否定那个实实在在的你。你拒绝承认那个现实存在中的劳伦斯。莫里回忆劳伦斯当时说，“对不起……对不起”。

劳伦斯所没有察觉到的是莫里和弗丽达已坠入情网，虽然他对此事可能稍有些怀疑，正如他后来的故事，如《边界线》等中所暗示的那样。但莫里作出了他称之为“极大的自制”。

在劳伦斯到达伦敦之后，那著名的“最后的晚餐”是在皇家咖啡馆举行的。即使是凯瑟琳·卡斯威尔的最富于同情心的对这次晚餐的叙述，也没有掩饰对这次晚宴的厌恶之感。劳伦斯曾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将此咖啡馆称作鲍姆帕道尔，这实际上是这家咖啡馆的一间私人宴会厅的名字。这几乎与在陶斯时的那些场合一样的糟糕。洛汉太太对当时情景的模仿重演似乎要将这伦敦的怪剧变成陶斯的热病传奇的一部分。在皇家咖啡馆，劳伦斯夫妇是主人，客人有卡斯威尔夫妇、莫里、柯特连斯基、多萝西·布雷特、玛丽·加农和戈特勒。劳伦斯邀请他们与他同去美国在洛基山脉的坡地上创建一个聚居地。但大部分人的回答是敷衍和回避的，除了多萝西·布雷特——她后来与劳伦斯夫妇一同去了新墨西哥。

柯特连斯基跳起来并开始摔酒杯，还叫道：“在座的或其它任何地方的女人都不能理解劳伦斯的伟大之处！”如果劳伦斯还记得他早年给柯特连斯基所写的那封谈到弗丽达的信的话，他就会觉得此情此景是有讽刺意味的。他当时在信中说：“你决不能抵估她”，并还说：“女性之中还有另一种品质，你是无法估量这种品质的。你不知道一个女人不仅仅是一个具有不同性别的人。她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你对那个世界还没有足够的了解。你的世界只是一个半球。”

在那个可怕的皇家咖啡馆之夜，在柯特连斯基开始砸酒杯之前，那些圣餐接受者们已经喝了不少的圣酒——莫里一会儿说：“我爱你，劳伦佐，但我无法向你许诺说我永不背叛你”——最后，那个“平日点酒不沾”的劳伦斯醉如烂泥，并开始呕吐。

莫里和柯特连斯基将他架入一辆出租车里，车子将他送到了汉普斯特德。在卡斯威尔的住处，劳伦斯的两位朋友将神志仍然不清的他扶上了楼。在楼上，他们踉踉跄跄的脚步声惊醒了卡斯威尔的兄弟，他后来在对他的姐姐叙述此事时，又增加了故事的神奇性。他说当他朝楼下望去时，“他清楚

地看到他眼前是圣·约翰和圣·彼得（或也许是圣·托马斯中间架着的是他们的一瘸一拐的先师。”

第二天早上，劳伦斯又恢复了他那种矿工的儿子所特有的机智和幽默感，他对卡斯威尔夫人说他出了洋相。“我们大家肯定不时有人倒下。只要我们首先承认，然后将它忘掉就无伤大雅。”

在此次英国之行中，劳伦斯和弗丽达——通过莫里——结识了南非作家萨拉·葛屈德·米林。她和她的丈夫邀请了他们三人以及柯特连斯基去共进午餐。莫里问他是否能将“那个世界上最迷人的姑娘”也带去，此姑娘就是多萝西·布雷特，她总是带着一个盒子，里面装的是她的助听器。莫里私下告诉米林夫人，说多萝西·布雷特是故意装聋，那样她可对她的贵族家庭中的谈话充耳不闻。

劳伦斯夫妇姗姗来迟，而柯特连斯基没有与他们一同前来。因为他和劳伦斯刚就托尔斯泰的作品发生过争论。劳伦斯在席间说了些轶闻趣事，而米林夫人则认为这次宴席是“一次失败。”

在伦敦访问的时候，劳伦斯听说卡斯威尔夫人想写一部小说（根据她读到的一些事情），此书是关于一个原始部落将一位年轻的姑娘幽禁起来，希望她变成一位女神的故事。劳伦斯说卡斯威尔夫人应该与他合作撰著此书。他即刻拟出了一个提纲，并让她着手写前几个章节。但她在这个计划前畏缩了，没能进行创作。只有劳伦斯的提纲保留了下来：

一位妇人约 35 岁，美丽动人，稍有点神经质，走进格拉斯哥的一家轮船售票处打听到加拿大的船期消息。她自报姓名叫奥列维娅·麦克勒尔。票房的服务员问她是否将拒绝麦克勒尔向她发出的去一家古堡赴宴的邀请。她大笑起来——但是轮船启程以前在格拉斯哥逗留的日子是孤独寂寞的，她终于动身去了麦克勒尔岛。

这位麦克勒尔自称是家族的首领，约 45 岁，身材瘦小、眼睛乌黑，充满活力，但显然经历过许多坎坷磨难。他在自己家乡的小岛买下了那座古堡。他在美国生活过 10 年，在墨西哥的一个银矿上生活过 20 年。他两鬓有些微白，右太阳穴上有一道疤痕，这疤稍稍将他的右眼吊起。他的主要特征是他的那双敏捷、机智的褐色眼睛，它们好像能够洞察危险。他那瘦小、稍有扭曲的身体充满了活力。他对文明妇女敬而远之，只是偶而与一个住在山地的一位印第安妇人往来。他对他的族长地位充满了奇思异想。

奥列维娅提前一天来到了古堡。麦克勒尔穿着宽松的工作服在忙碌着作准备工作。他看上去像一个科尼什矿工，总是匆匆地赶来赶去，在观察事物时总有一种女人般的敏锐的洞察力，并时不时地喝上一口威士忌。他用那种敏捷的墨西哥人的怀疑打量着奥列维娅。她处于神经错乱之中，几乎不感到任何的窘迫。有些事情使她烦恼不堪，以致她没有意识到她早到了一天。当她意识到时，她也没有在意。

他一见到她，就非常随和、热情，但怀有戒心：他总是对危险怀有警惕。不久，他被她迷住了。她由于心中的压抑，对任何事情都显冷漠无兴趣。她与他友好地交谈，但言不由衷：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他的存在。他，一个 45 岁的男人，第一次痴情地坠入了情网。但她总只是对他不冷不热。

她在那座整修过的古堡里过了一夜——他则几乎是小心翼翼地古堡下的小屋里睡了一宵。第二天，她做了那怪诞的宴会的女主人。晚上，他请求她不要离去。他的狂热的，稍有点怪异的感情触及了她的良知。她同意留

下。

经过了两天提心吊胆，怕她离去的焦虑之后，他向她提出了求婚。她非常惊奇地看着他——对于她，他只是一个陌生人。但是她还是答应了。她心中总有什么东西隐现在灵魂深处——她原先的那种失望与烦恼。他感觉到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但无法理解。在与她苦恋了6个月之后，他回家时发现她已经死去，并留下了一个女婴。

然而，在他看来这位母亲是不朽的。她是一位来自仙境的神秘女子。而那个女婴，他暗暗相信，是一位天使。他渐渐地把这种想法灌输给他周围的人们和那个女孩自己，这种观念在不知不觉中占据了他们所有人的心灵。

这位小姑娘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与众不同的待遇。但她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非凡之处。男人在她看来就是男人：她属于另一个种族，是仙国的天使。但她对此闭口不谈：没人谈论此事。但这是一个事实，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接受了。

她的父亲雇来了一位穷学者作她的家庭教师，她得到了一种普通的教育。但她没有真正的朋友。没有人是与她同一个种族的。有时她随她父亲去格拉斯哥，去爱丁堡，或去伦敦。世界对她充满了吸引力，但她不是属于这个世界。她对这个世界有些惧怕，这不是她种族的那个世界。

在她17岁那年，她的父亲突然被杀了。除了她的家庭教师，她孑然一身。她每年大约有300镑的收入。她决定去伦敦。战争爆发了——她成了一名护士。她护理着男人们，熟知他们的伤情和他们的需要。但她只是将他们当作羊羔或其它娇弱可爱的动物来护理照看。他们的血不同于她的血，他们的需要不同于她的种族的需要。

男人们纷纷爱上了她，这对她来说是可怕的。她在等待着她同类中的白马王子。她的家庭教师也附和她的这种玄念。等待吧，他说，等待仙国给你送来你的伴侣。你不能与一个凡夫俗子结婚，你要等待一个在眉心有一颗痣的人。

她终于在街上看到了他。她对他一见如故，她认识他眉心的那颗痣。然而她又感到害怕。有生以来她第一次对她自己的本性感到了害怕，对她自己的神秘性感到了害怕，因为在她看来，她的种族要来毁灭人类了。而她就是来毁灭人类的。她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惧怕。她再也不想见到那个眉心长着一颗痣的人。

有好长一段时间她没有再见到他。然而，渐渐地，她担心再也见不到他的焦虑变得比什么都强烈起来。她希望与他一起接受命运的主宰，不管发生什么事。除此之外，他什么都不要。

在劳伦斯的那些最亲近的朋友圈子之外，他的作品在那年的秋天和1923—1924的冬天如往常一样得到了公众的评论，褒贬大约是平分秋色。在《伦敦墨丘利》上，J·B·普里斯特利在评论《袋鼠》时暗示，劳伦斯的大部分崇拜者都是些少男少女，并说如果劳伦斯仿效一下19世纪的小说（正如普里斯特利自己准备做的那样），他也许能将此书写得更好一些。普里斯特利最后“下结论说，从目前来看，墨守成规要比别出心裁更加危险和困难。”在伦敦的《星期六评论》上，杰拉尔德·古尔德也认为《袋鼠》超出了他所能接受的限度。他认为此书是一个“似乎连小聪明的劣作也不想写的人”所写的“自我意识的幻想之作。”但马丁·阿姆斯特朗对此书的评价甚高——“散发出一种劳伦斯称之为澳大利亚的奇异美妙的气息”——此评论发表在

《旁观者》上。J·C·斯夸尔，他后来在《伦敦墨丘利》的称赞《飞鸟·走兽和鲜花》有一种奇异的活力，但在9月的《观察家》上对《袋鼠》的反应并不热烈，还是像以往一样，认为劳伦斯“有天才，但思路混乱”，以及“非常诚实，但有些迷惘，具有一种言简意赅的表现力，使事物跃然纸上。这种风格使他所写的任何作品都能引起读者的注意。”

在《民族与雅典娜神庙》上，J·D·贝尔斯福德认为《袋鼠》的不足只是白璧微瑕，必须“毫无保留地承认这是一部天才之作，是一本与众不同的小说。”《纽约时报》也发现了“《袋鼠》的成熟之美……没有一个段落不给人以一种辉煌的启迪。”

到此时为止，劳伦斯还是没对这些评论不加注意；在墨西哥他曾对宾纳说他不再去读那些评论，他在此时及后来的信件中很少谈及这些评论。如前所述，他已经巩固了他的读者界——这不仅仅是由少男少女和他的崇拜者组成的。这位少数人的作家从他那些不妥协的作品中得到的收入，可以允许他乘坐二等舱位去任何地方旅游，如果 he 不想久住在一个丰衣足食的环境之中的话。

劳伦斯将弗丽达留在伦敦，只身去了中西部与他的姐妹共度圣诞。在1924年的第一个星期里，他去了希罗普郡的庞迪斯伯力，在那里，他在弗里德雷克·卡特夫妇处逗留了数日。劳伦斯是在卡特将他的《炼丹士之龙》的手稿寄给他以后与他认识的。此事使劳伦斯很高兴。他在1923年6月18日写了一封长信（此信收入《书信集》），信中谈到了占星术和神秘主义。劳伦斯这方面的知识主要是来源于对布拉伐斯基夫人的这类作品的阅读。“最微妙的事，”他写道，“是微观宇宙和宏观宇宙之间的关系，如能领悟这种关系——我认为黄道带的人知道这种关系——你就能得到启示的直接线索。——古代人是用形象思维的。”与他关于无意识的论著相呼应，劳伦斯在信中谈到了“灵感的四大中心”，他将这些中心与星座联系起来。他还说，“你决不要让你的普通的出版商去出版此书。这对普通的读者来说完全是一部天书。但在此书的字里行间有一些惊人伟大之处：它使生活又变得高尚。”他还写道，“如果我来英国的话，我们可再作详谈。”

卡特在一封信中提到（1952年5月7日）劳伦斯在庞迪斯伯力的“短访和关于启示录中的象征物的讨论。”他在希罗普郡的经历为他的《圣·莫尔》以及那匹红马提供了背景资料。女人和龙的双重象征则成了《癫狂的毒蛇》的主题。

在拜访了卡特夫妇之后不久，劳伦斯和弗丽达便飘洋去了欧洲大陆。1月25日（或24日）劳伦斯在巴黎的凡赛尔饭店写信给凯瑟琳·卡斯威尔：“我们的旅途轻松愉快——在阳光和银霜之中，巴黎显得十分可爱——相当静谧，但确实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我俩都感到很疲乏——在伦敦差不多要呆傻了。”第二天他在信中对她作了更详尽的描述：“今天天色阴暗，下着雨，很像伦敦。来这里实在没有多大意义……我要多睡点觉，聊以打发日子：也许下星期我们会去巴登——巴登以摆脱这种心境。无论如何，我对欧洲作不出什么反应。巴黎有不少迷人之处，——但只是像一座博物馆。当你从露弗里博物馆的窗子向外望去时，你会不知道是窗内还是窗外更像一个博物馆——不知道整个巴黎，以及它的和平大街和伊里赛田园是否都只是一个博物馆”——显然是在这个时候，这种心情中，他写下了他的“巴黎书信，”这些书信初见于1926年4月的《笑马》。劳伦斯不喜欢那些博物馆展品之间的人

群，他在这些书信中谈到了他民主的失望，但又说，“然而，我也无法相信旧式的贵族政治，也不希望它们卷土重来，尽管它们是那样的富丽堂皇。我所信奉的是旧式的荷马时代的贵族政治，那时的大帝生活在民众中间，住在简陋的木屋之中。”劳伦斯最后说“纪念碑、博物馆、终身爵位和老古董都令人讨厌，但伟人层出不穷，他们是唯一有价值的东西。”

2月5日离开巴黎之后，劳伦斯不久就到了巴登——巴登，又笑逐颜开地周旋于路德维格·韦尔海尔姆斯迪夫特家族的老贵妇人中间。她在那里的两周中写的故事是《边界线》，其中有一个“勇敢的人”作他的主人公，他叫艾伦·安斯特鲁瑟，那个红头发的，好斗的盖尔特人。他娶的那位妇人，“一个德国男爵的女儿，”无疑是弗丽达的形象。他们离开了巴黎的“露弗里博物馆、卢森堡和天主教堂”，启程去了斯特拉斯堡，这是劳伦斯夫妇东行旅程的写照。2月19日，即离开巴登——巴登的前一天，劳伦斯写了《德国来信》（他生前没有发表），其中有许多类似于那篇故事的情节描写，安东尼·韦斯特在他论述劳伦斯的书中援引了一些相似的片段。

正如许多读者在《德国来信》10年后出版时所看到的那样，此故事具有很强的预言性，因为在1934年此故事发表时，纳粹已经控制了整个国家。而在1924年2月，这些纳粹分子还鲜为人知，而希特勒因为前一年11月所谓的“啤酒店政变”事件仍在狱中服刑。劳伦斯显然对希特勒了解甚少或一无所知，在作品中从未提到过他：他还没有发表他的《我的奋斗》，直到1924年11月，纳粹党人才在国会中争得了一些席位。劳伦斯在1924年的早些时候就感觉到了这个国家的那种不安定的因素，他认为，这种不安定的因素可“追溯到鞑靼人的野蛮倾向，是与基督教欧洲文明倾向相背的……这些青年社会主义的党徒（他是否是指青年纳粹党徒？——原注），这些小伙子和姑娘们的非实利主义的信仰，和他们的那种半神秘化的观点使人们感到莫名惊诧。他们像一些原始的，流离失所的游散部落，在过去的三年中，他们给人的感觉是，在欧罗巴的血管中的血缘传统已经改变。”劳伦斯觉得，德国人正在向着一种死亡之境迅速倒退。“退回到地狱般的中世纪日耳曼，然后倒退到罗马时代，然后退化出没在寂静的森林之中、行动危险而诡秘的野蛮人”。

《边界线》是劳伦斯的第一篇性感幻想的小说，而且显然也是他的第一篇含有莫里形象的短篇。故事中莫里以一个记者的形象出现，那位强壮的安斯特鲁瑟从坟墓后面出来将他击败。《边界线》以它的超自然因素和它的对于斯特拉斯堡天主教堂的极度的夸张描写——“微红色的石头，在夜色中闪烁，像深色的肌肤”呈现在“我们文明的死灰色之中”——具有一种梦幻气氛，这种梦幻气氛使故事成了一种对劳伦斯重返欧洲之旅程中所发生的一切的梦境复述。

在2月12日，他曾从巴登——巴登给卡斯威尔夫人去信：“我们将在这儿再呆一个星期——然后回巴黎去打点行装。应该在26日到达伦敦。那个可恨的塞尔泽未给我们写过一个字——看来他想要什么花招。我将尽快返回纽约。”他只准备在伦敦逗留一个星期：“你知道城里有什么安静一点的旅馆吗？”但是：“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来伦敦的消息。我不想见任何人。”欧洲大陆使人感到“非常厌倦——旅行单调乏味，至少在冬天是这样。远不如在家里养精蓄锐。”

三个星期之后，在重访过巴黎和伦敦以后，劳伦斯夫妇离开英国去了纽

约，他们乘的是“阿奎特艾尼亚”号轮。在此时期的好几封信中，劳伦斯一再提到了塞尔泽：他去美国的原因是因为他必须在那里见到他，尽管劳伦斯在3月1日给贝西·弗里曼的信中这么说：“谢天谢地我们总算离开了欧洲。它已使我腻烦不堪。”弗丽达在附言中也说：“我很高兴又回到了美国——除了与我孩子们和母亲的会面，在欧洲的那些日子是乏味、凄凉的。”

多萝西·布雷特作为拉纳尼姆的唯一成员，与劳伦斯夫妇一同去了美国。在3月10日写于船上的一封信中，劳伦斯对戈特勒提到了一块蓝色的石头，是一块大如皮球的青金石，此石头可能就是《恋爱中的女人》中赫曼奥妮用来砸伯金的头的武器：

我们将于明晨到达纽约——行程匆匆。到昨天为止，天气还很暖和——我们位于海湾暖流之中。现在我们已接近美国，天刮起了强劲的北风，大海吞吐着它的朦胧的雾霭和黑色的波浪，船在沉浮摇晃。但我们并不惊恐，只是弗丽达有点不适。无休止的摇动使她感到不安。我倒是十分自在。布雷特自然是兴奋并在自我乐趣。突然我看到她佩着一枚小蓝别针，我认出那是几年前我送给奥托琳娜的——是一块玉髓石。我一直很喜欢那块色泽柔和的蓝石。奇怪，事情怎么会如此凑巧……

星期二下午——我们在猛烈的雨夹雪和大风中到达了纽约。塞尔泽和我们一起——心情不太好——他的生意不太景气。布雷特现在有点迷惑慌乱，不知所措。

3月22日，劳伦斯和弗丽达回到了陶斯。在一封3月1日从伦敦发出的信中，劳伦斯曾告诉弗利曼说他和弗丽达打算去纽约“一星期或10天左右，然后可能去陶斯，作为旅行的终点。当然，我想回到墨西哥去：如果我要想在那个安静的地方完成一部小说的话。我不知道我们将在陶斯呆多久——两个星期吧，不会太久的”。但是，他在陶斯地区逗留了7个月。与在作为陶斯的屏障的洛伯山区牧场的收获相比，他在陶斯的经历则是一种退步和衰落。

他需要这样一种衰退。洛汉太太的家中添置了一些新的陈列品，特别是克莱伦斯和杰米。克莱伦斯·汤浦森，被洛汉太太描述为“温雅并有些女子气”，但经常发脾气，因为“他在精神上崩溃了；他从孩提时代就被毁坏了”，是一个艺术领域里的无法避免的小市民，一个常年的社团附庸。然而，杰米·德·安古洛则是荣格和印第安人研究的严肃的学生，在他1950年去世以前，他在探索红种人的秘密方面取得了不少出色的学术成就。但是，在1924年洛汉太太于陶斯对他的描述中，他成了一个怪人。当然，在她书中的所有其他人物也是这样，书中提到了马修·阿诺德对于那个比较温文有礼的雪莱圈子的言论：“怎样的一帮子！怎样的一个社会！”

可能是出于厌恶，理查德·阿尔丁顿在他对劳伦斯的颇为详尽的传记中对克莱伦斯和杰米只字未提。阿尔丁顿很快地就写到了劳伦斯上山的情况。事实上，他是在五星期之后才去路伯山区的约翰·伊文斯的牧场的，后来这里被劳伦斯称作基奥瓦。洛汉太太把这个牧场送给了弗丽达，而弗丽达则赠以《儿子和情人》最后一稿的亲笔手稿作为回报。但没想到这一做法却得罪了洛汉太太，她后来将此手稿给了一位精神分析医生作为部分费用的付帐。这份手稿在许多年后才发现，现存放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里。从此手稿中可以看出，爱德华·加纳特对出版的一稿作了何等大幅度的删节。

此手稿被送给A·A·布里尔医生倒是相当合适的，因为洛汉太太所说的

劳伦斯重回陶斯之后的所作所为是属于精神分析文学而不是其它什么领域。洛汉太太马上对那个到处跟着劳伦斯、并将她的“助听器”托比伸到每次谈话中间的“可怕的俄国白痴”布雷特产生了憎恶。洛汉太太觉得托比像个“间谍”。当她将此告诉劳伦斯夫妇时，弗丽达会心地大笑起来，她自己对无处不在的布雷特和托比也不太喜欢，但是，按照她的克劳塞德奇战略，她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然后用致命果断的一击消灭敌人。

与此同时，忐忑不安的洛汉太太进行着她的老游戏，将周围的人像棋子一样搬动着。其结果是一场混乱。甚至托比也在一天晚上走了出去（“我想我们在劳伦斯夫妇这里受够了”）克莱伦斯声称要揭露劳伦斯要“谋杀梅宝”的阴谋，杰米也怒气冲冲地离开了陶斯。洛汉太太在她的书中对这场混乱的描述听上去像一次精神病院的暴乱；读者如要对此有个确切的了解，可查阅一下此时期劳伦斯的信件。这些信件中也有一种不正常的迹象。

在一封6月3日去牧场一个月以后写给弗雷德里克·卡特的信中（劳伦斯将飞心牧场改成了洛伯或华尔夫）他对这个他后来称作基奥瓦的新家作了描述：

今晚接到了你的信。很高兴读到《烽火》上的消息——以前从未听说过此刊物。《阿德尔菲》毫无可取之处。我有一个代理人在纽约与我的出版商打交道，事情将会得到解决——但大约要一年时间，情况不是太好。

我的妻子在这里有一个小牧场——大约150英亩，在山脚的坡地上，大部分是松树，但有两块耕地——虽然水不多。我们这里离德尔山牧场约有两英里，取邮件要去那里。这里地处偏僻——风景优美——海拔8500英尺。我们有二间房子和一间小木屋。一个月来，我们像黑奴一样劳作，把一间快要倒塌的房子修建好，给另一间房子盖屋顶板，我们请了四个印第安人干这活，还有一个墨西哥木匠。最后几个印第安人今天也去了陶斯——17英里，就剩下我们，除了一个朋友多萝西·布雷特，她在这里作画——她是厄什子爵的一个女儿。——我们有五匹马——常驾车去德尔山买牛奶和黄油。我刚刚和其中的三匹马进行了一次搏斗——它们受惊了，见鬼。这些日子，还得一个人在这里照看它们。很遗憾你没有钱来这里尝试一下这里的生活。不然你可以住在另一间屋子里，卡特太太可以开办一个小庄园。这里一切都很好，除了那条从峡谷向上引水的水渠。但这里冬季很长、很冷，也很寂寞——去年冬天我们在德尔蒙特。——这里有春天，但没有足够的水去灌溉土地。——我倒是希望看到卡特太太来治理这个地方。——至于我自己呢，我是一个游荡的灵魂。我将在9月底去墨西哥，我的妻子将和我一同前往。那将意味着抛弃这个地方，挺可惜的，我们也许在下一年的4月再回来。

自去年秋天以来，我没写多少东西。这个冬天和去欧洲的访问很令人沮丧。要摆脱这种心情需要一些时间。

至于这场战争，它根本地改变了我。战后的情况又加深了这种变化。

劳伦斯没有告诉卡特那位在牧场上工作的“墨西哥木匠”是个酒鬼，因为他叫弗丽达“肥母猪”而被他解雇。劳伦斯夫妇后来和两个年轻的印第安人在一起，那个留辫子的钦尼达德和他的妻子鲁芬娜。此牧场成了劳伦斯在那个夏天写的中篇小说《圣·莫尔》最后一部分的背景，（英国的劳伦斯学者凯斯·萨加认为此书名一定是与时间（hour）一字同韵）。前面已经说到，卡特辨认出此故事的开始部分是以英国为背景的（什罗郡的庞迪斯伯利）。劳伦斯用了好几个庞迪斯伯利人作为书中的次要人物，包括卡特本人，他在

书中是以卡特赖特的名字出现的，长着“一副翘起的眉毛，眼睛闪烁着，貌似山羊，还有一副像潘神般的尖耳朵。”

至于两个主要人物，劳伦斯还是（正如我们所见）在他的开普利的过去经历中挖掘出了伊丽莎白·休姆斯（刘·卡林顿）和她的母亲（故事中的母亲惠特太太）。劳伦斯看到过在他们自己的背景中的美国人，他现在可以将这两个女人放到欧洲和美的双重背景之中：他在《圣·莫尔》中对那位固执的马格娜·梅特（此人同样也是洛汉太太）每天驾车穿过海德公园的描写是劳伦斯最好的喜剧片段。

但在所有的这些人物之中——那些惶惶不安的美国妇人，他们的红种印第安仆人和他们骄傲的威尔士马夫，他们的伦敦上层社交界和乡村别墅的朋友们，那个头脑顽固的西部乡村教区牧师和他的教区居民们——那匹赤金公马，圣·莫尔的形象在故事中始终是一个最主要的角色和象征物。在劳伦斯1924年1月在英国时写给威勒德·约翰森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故事的萌芽；为了与约翰森的《笑马》杂志的刊名打浑，劳伦斯为那些马匹、半人半马神、赫伊尼姆斯，甚至木马、竹马大声说话。“这里的这匹马已经死了……哦，伦敦这地方糟透了，这么阴暗，这么潮湿，这么灰黄，这么破碎零乱……马，马，任你去沉默不语吧，但请让我骑到你的背上再离开这里去新墨西哥吧”——这就是《圣·莫尔》的主要情节。

劳伦斯以前也用马作过象征物，他在1929年写的《启示录》中，对此动物又有过一番议论：“他是一种卓然超群的象征物：他给予我们一种贵族风度：他把我们联系起来，是与容光焕发的全能者的第一次明显的、激动人心的联系：他甚至已经成了我们肉体之中的神灵……这马啊！这人类的汹涌的潜能和力的运动的象征。”

这匹傲慢的马，以圣·莫尔的形象在书中出现，它是1924年杰拉尔德和他的阿拉伯母红马的故事的翻版，1916年劳伦斯在《恋爱中的女人》中曾描写过这一情节：上层社会的那个年轻人（在波尔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可能要虐待那匹马，并让火车惊吓它（都是杰拉尔德自己的机械化和他对生物机械式的驾驭的象征。）但那匹战后的圣·莫尔是无法驾驭的，并能伤害那位上层社会的、想控制它的里柯。圣·莫尔使那两位美国妇女得到了教训：她们离开了里柯和他的上流社会以及乡村别墅的朋友们，带着圣·莫尔去了美国的西南部，去了它应去的自由之邦；这两位妇女则去了西南部的另一个地方去寻找她们自己的自由了，这就是基奥瓦牧场。（劳伦斯在故事中称之为拉斯·奇伐斯母羊。）

这山坡上的牧场世界，在当时可能成了惠特太太和刘两人形成劳伦斯化的最后一个阶段；但其过程并没有明显地显示出来；此书最后一部分的全部力量是在于对自然景色的动人的描绘，这可能是与这部中篇小说前面部分中所描绘的那个堕落的社会的最好的对照。迄今为止，在所发表的对《圣·莫尔》的研究中，F·R·利维斯的探讨最为详尽，他称此书是“一篇戏剧诗”，“在我看来，此作在创造性和技巧上的独到之处并不亚于《荒原》，而且毫无疑问，它比那史诗在独创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为丰富。读者所得到的印象不会是别的，只会认为这是一部重要作品。”此话应该在上下文中去理解：利维斯的这篇通过非常周密的推理得出了上述结论的文章出现在《D·H·劳伦斯：小说家》（1955年）之中，此书的附言是重印了对帖弗顿主教（马丁·杰瑞特——柯尔主教）所著的《D·H·劳伦斯和人类生存》一书的“评论”：

利维斯的“评论”并无别意，只是对 T·S·艾略特的一次攻击，因为后者给帖弗顿主教的书写了序言，而利维斯对此书的基本内容是不屑一顾的。

劳伦斯在 9 月 30 日前完成了《圣·莫尔》然后便将稿件寄给了他的代理人：8 天之后他在他的日记上写道，“24 年 10 月 8 日，打点行装准备离开牧场——天下着雪。完成了《公主》。”这就是首先由凯瑟琳·卡斯威尔辨认出其主要人物是多萝西·布雷特的那篇短篇小说。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新墨西哥的背景，那位在牧场休养的游客（一位中年处女）跟着一个叫杜明哥·罗麦洛的导游上山走进了充满阳刚特征的洛基山的高原森林之中。这位受到庇护的“公主”，对生活的了解只是来源于遥远的莫泊桑和左拉，想要“尝试一下”男女之爱——结果非常糟糕。

当她开始讨厌这种事情时，罗麦洛这个一度显赫的地主家族的幸存者将她当作一个俘虏一样看守起来，下流猥亵地对待她，直到她的“营救者”将他击毙；在此以后，这位屡遭凌辱的公主离开了那里，“精神有些失常”，后来嫁给了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与那篇墨西哥的故事《别管那一套》一样，这一故事是劳伦斯经常采用的“睡美人”或“蔷薇莓”主题的翻版，在那篇故事中那位被称颂的公主由于“王子”拔开了她身旁的荆棘而苏醒过来。在这两篇故事中，那两位用意志去体验生活的妇人——如《公主》中的杜丽·厄奎哈特和《不管那一套》中的埃塞尔·凯恩——都遭到了失败，这与那些具有魔力般美质的妇女的觉醒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马商的女儿》、《处女和吉普赛姑娘》中的姑娘以及《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小康妮·恰特利。

以莫里为原型塑造的一种为劳伦斯所憎恶的男性人物在此时期的一些短篇小说中也受到了劳伦斯的抨击。莫里即是吉米（一副狞笑着的半人半兽的脸，处于没有微笑的伤感时刻），此人是一份卖弄学问的杂志的编辑，在《吉米和绝望的女人》中他和一位矿工之妻发生了喜剧性的纠葛；他也是《最后的笑声》中的马奇·班克斯，而多萝西·布雷特则是其中的詹姆斯小姐，带着那个助听器。这是另外一篇鬼怪故事，马奇·班克斯因摒弃生活而受到了惩罚：他寻求一种机械的性爱，在他的虚假的视觉中，降落在城市的白雪像是石灰水。魔鬼在夜间进入了伦敦，隆冬的空气中充满了杏花的芬芳：这是弗雷泽的《金树枝》中的性象征。此故事的形式与《边界线》颇为相似，它是后来那篇超越自然性爱故事《快乐的鬼魂》的先声。劳伦斯在 9 月 30 日把《圣·莫尔》，《最后的笑声》和《吉米和绝望的女人》寄给他的代理人的同时，他还寄出了《骑马出走的女人》，这篇故事讲的是一个在墨西哥的美国妇女在嫁给了一个荷兰矿主（机械压迫的象征）10 年之后骑马出走，来到了一个被遗忘的印第安部落中，被他们作为牺牲品接受下来，——《癫狂的毒蛇》的一次预演。关于《骑马出走的女人》的背景材料，很显然劳伦斯有两个来源，其中之一是一座瑞士矿主的银矿，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劳伦斯和格士奇在他们去墨西哥的旅途中曾访问过这个地方，在纳瓦霍附近。背景的另一部分好像是陶斯北部的山区，此背景在《公主》中也运用过。

在 1924 年夏天，洛汉太太和托尼及克莱伦斯曾去过牧场一次——但仅此一次。洛汉太太邀请过劳伦斯，希望他去看她，并哭泣着问他为何要“那样”对待她？劳伦斯曾因为她和托尼杀死了一只豪猪而责备过他们——也许这就是《关于一只豪猪之死的反思》一文的起源——托尼的妻子将这一责备当作是对她个人的侮辱。劳伦斯对这位哭泣着的妇人说，“唔，我忍受不了你走路的那个样子。就像你今天早上走过我窗前那样……”——听了此话，她哭

得更响了。就这样，劳伦斯夫妇和布雷特在牧场隐居了起来。

但不久之后，在8月间，劳伦斯和弗丽达及洛汉太太和托尼四人一起去了亚利桑那的霍比去看蛇舞。在这次旅行中，托尼驾着车一路唱着歌，劳伦斯夫妇争论着或赞叹着沿途的风光，而洛汉太太则觉得像个木乃伊一样，寂寞得要死。洛汉太太感到劳伦斯一次对蛇舞的描述是平淡无奇的，尽管她很喜欢那几篇后来发表在《墨西哥的早晨》中的散文。这次旅行之后，洛汉太太使匆匆去东部看布利尔医生。劳伦斯写信给她这样说很好，是的，她需要一个医生，她必须学会克制她的意志，在她回来以后，他们匆匆见过一面，此后不久，劳伦斯夫妇便和布雷特一起在10月份离开了墨西哥。（在牧场我的胸膛感到十分胀痛：那里的海拔太高。）看上去他们都很友好，但在劳伦斯一帮人离开之后，洛汉太太写信给劳伦斯，说他邪恶无信。从此他们没有再见过面，尽管在他回欧洲之后他们还通过信，但第二年他回到牧场去的时候也没去看她。

1924年10月3日，当他准备离开基奥瓦的时候，劳伦斯告诉莫里，在9月10日，也就是他自己39岁生日的前一天，他的父亲去世了：“我想去南方，那里没有秋天，那里的寒冷不会像一只蹲伏着的，伺机扑跃的雪豹一样，一下子窜到人的身上。北方的内心是寒冷的，寒冷的手指是尸体的手指。”

在离开牧场的前三天，劳伦斯在日记中写道（10月8日），“英国银行结余303镑。蔡斯国家银行，第4大道23号街的都市分行结余2281美元。”然后，在11日，携同布雷特和弗丽达离开了那里去了墨西哥城。他和弗丽达“得了重感冒。”劳伦斯遇到了W·索马萨特·毛姆，并将他写成为“一个心胸狭窄的‘艺术家’说话结巴……难以交往，无幽默感……有些令人讨厌。”毛姆在给本书作者的一封信中解释说，劳伦斯觉得他受到了冷遇，是因为与他在电话中联系的是毛姆的秘书，而不是他本人，因为毛姆在电话中讲话比平时口吃得更厉害，所以他一般都避免接电话。

在墨西哥城的两个星期中，劳伦斯去笔友俱乐部参加了一次宴会，在会上他应邀作了讲话。在他和两位妇人转途去了沃克萨卡之后，他在11月14日写给威廉·赫克的信中描述了这次旅行：

今天接到了你的信，感谢你四处奔忙照看那个地方。当我想起它时，我真希望我已经回去了。

我们于星期天晚上到了这里：从墨西哥城到这里花了两天时间，虽然路程并不很远。沃克萨卡是个小城市，约3万人，孤零零地独处南方，气候十分宜人。市场上尽是玫瑰和紫罗兰，花园里百花齐放。每天都是阳光明媚，中午时稍热些。当地的居民大部分是扎波坦克印第安人，身材矮小，但十分正直、机敏，充满活力，实在非常好。那里有一个大市场，熙熙攘攘的像一只蜂房。在那里你可以买到任何东西，不过他们都认为每位“富人都是敌人。——在墨西哥城也许有一个糟糕的闹宴：但一切又会悄然逝去。然而，我不喜欢这种感受。要不是冬天。我们真想明天就回到牧场去。我对人们感到如此的厌倦——人，人，人，以及所有这些骗人的废话，不管怎样，还夹杂着政治的和自以为是的偏见。——所以，我们可能会在这里找一间屋子住上一两个月。谢天谢地，我的胸腔和嗓子都好一些了，因为这里的空气温暖柔和。我想在这个冬天巩固一下，下一年可以在牧场上呆得晚一些……

布雷特的托比丢失了，现在已经让一位白铁匠为她作了一个替代物，形状像个漏斗：她使用它时在当地人中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她的身体机器工

作得非常妥当，以致没有耳福了。——弗丽达当然思念着她的牧场和自由自在的生活。我也确实如此。

四天以后，劳伦斯夫妇从弗朗西亚旅馆搬了出来（布雷特留在那里），住到了一位英国牧师理查兹教父的家中，他是英国驻墨西哥城副领事的兄弟。他在比奥苏拉大街 43 号的房子在《墨西哥的早晨》的散文中被描述过，那里有“黄花伸过天井的院墙，还有摇曳着的、泛着红光的叶子花，以及如火如荼的猩猩木。”布雷特说劳伦斯认为沃克萨卡要比查帕拉原始得多，后者已经“游人涉足过多了”。但沃克萨卡的印第安人使他感到恼怒，因为他们朝他指指点点，并窃窃私语道：“外国人，外国人！”

劳伦斯开始写作《癫狂的毒蛇》。布雷特帮他打字。弗丽达对布雷特变得越来越敌视了，虽然布雷特住在旅馆，但还是设法与劳伦斯呆在一起，他们俩人曾好几次去沙漠，坐在灌木丛下，写作或画素描。一天傍晚，劳伦斯在和布雷特以及一些当地的盎格鲁殖民者喝了一些酒后，回家迟了，弗丽达便大发雷霆，她对劳伦斯说她不再希望在他们生活中出现“那个布雷特”，他开始很为难，然后便想开了。他给布雷特写了一封她认为是残酷的信，信中叫她打点行装动身离开。她拖延了几天，于是弗丽达去了旅馆对她大发雷霆，说劳伦斯和布雷特有暧昧关系。布雷特离开了那里，去了墨西哥城，再从那里去了陶斯和牧场。

与此同时，劳伦斯给莫里写去了言辞激烈的信，嘲笑他的《阿德尔菲》和此刊物上登载的一切。“你若不是继续推你的独轮车在剑桥演讲并使内心变得越来越阿谀柔弱，就是与你自己打一场硬仗，使自己振作起来，坚韧起来，将你的多愁善感扔到阴沟里去，像一个战士一样去正视这个世界。——当然，你不会这样。”

这时候，劳伦斯自己也正要准备“打一场硬仗，”在 1925 年 2 月完成了《癫狂的毒蛇》，作为他三部领袖小说中的最后一部（前两部是《袋鼠》和《阿伦的杆杖》），《癫狂的毒蛇》是他所有长篇小说中的一次最大的失败。他在墨西哥没有找到真正的“领袖”，为了塑造他的唐·莱蒙，他显然是从那位他不喜欢的乔西·伐斯康赛罗斯的生平中汲取素材。当然，唐·莱蒙的一部分也是他自己，还有赛普里阿诺将军也是这样。在三年之中，劳伦斯便否定了他小说的主题，在 1928 年 3 月 13 日他在给拜纳的信中谈到此书时说，“这位众人之首是过了时的人物”。

然而，即使不喜欢这个主题的读者也承认，《癫狂的毒蛇》中有许多劳伦斯最好的文笔，其中有墨西哥的热烈丰润的色彩；他在第一章中，就从斗牛中抓住了这个国家充满暴力的表层——种古代宗教礼仪的商业化堕落——以及书中结尾处对唐·莱蒙庄园的攻击。这后面的一段描写，是受一次相似事件而写成的，此事件就是指那些觉得私有财产国有化的进程不够快的激进的“农民们”对一些大庄园发起的攻击。在墨西哥城，就在劳伦斯开始写作《癫狂的毒蛇》最后一稿之前，他从纳托尔太太处听说了她的朋友罗莎莉·伊文斯在几个月前死去的详细情况。伊文斯太太是一位英国妇人，其庄园曾好几次受到围攻，最后她在普埃布拉城附近遭埋伏被杀，劳伦斯前些年曾在这个城市生过病。

《癫狂的毒蛇》中的景色，土灰色中点缀着红色的木槿，不时又被柳树的绿色所柔化，大声呼唤着暴力和死亡，这些景色十分精彩地跃然出现在纸上，贯穿全书，将读者身临其境地带到了墨西哥：“好像近在眼前，参差不

齐地摇动着的香蕉树，突兀的山丘上肃然静立的仙人掌，左边是一座大庄园和苦力们方盒似的小泥屋。”或者：“早晨晴朗而炎热，那淡褐色的湖水十分宁静，像一片幻影，人们在岸边移动着，在遥远处，像一些小白点：那些小白点似的人形跟在驴子后面的尘烟之中。”或者：“湖水的颜色根深，像一座巨大的矿井。突然刮起一阵狂风，在芒果树林上掠过，发出一种撕裂声，好像有些羊皮纸被撕碎了。”或者：“她可以看到萨于拉；那教堂的刻着白色沟槽的双顶，方尖塔状的尖顶伸过了胡椒树梢；在远处；站着一座孤零零的小丘，山上有一些干枯的灌木丛，非常显眼，有些像日本山丘的样子；再远处，是绵延起伏的，主脉幽蓝，侧翼缓坦的墨西哥山脉。”或者——书中诸如此类的描写比比皆是，带着墨西哥的热气，气息和色彩。然而，那里也有“另一种墨西哥”，那神圣的阿兹台克众神通过唐·莱蒙和赛普利亚诺的模拟而复活，还有那位作为他们的不坚决的补充成员的欧洲妇女凯特。

对此书的最终印象是一个蹩脚的歌剧脚本中有一段华丽的音乐。也许对《癫狂的毒蛇》的最尖刻的批评是阿尔多斯·赫克斯利的《在墨西哥湾的远处》（1934年）中结尾处的那段话了。在他的朋友劳伦斯去世三年之后，赫克斯利去中美洲和劳伦斯在墨西哥住过的一些地方（沃克萨卡、普埃布拉、墨西哥城）进行了游访。此书与赫克斯利的其它所有的游记著作一样，充满了敏锐的观察力和对美丽景色的赞美；此书也记录了幻想的破灭（在《加沙的无眼人》（1936年）中进行了虚构性的描述）。赫克斯利在《在墨西哥的远处》的最后几页中省略了他最后的幻灭，这时他已经在离开墨西哥的船上读着《癫狂的毒蛇》。他意识到了“一段段对事件作的精确的描写。”但在读了占全书的前三分之二的，经过娴熟的艺术处理的内容之后，他发现剩余的那一部分显得支离破碎，因为劳伦斯对故事失去了信念。劳伦斯心中充满了疑惑，又“不得不强扯着嗓子叫下去。但他越是叫得响，他就越不能使他的听众信服。”

另外，《癫狂的毒蛇》中充满了明显的矛盾。在凯特遇到唐·莱蒙之后不久，他对她说，“对于一个男子来说，无自由可言，除了上帝他自己……当一个男子一无所有，只有他的意志要维护时——即使是他的善意——结果总是恃强凌弱。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一种恃强凌弱，资本主义又是另外一种：自由是锁链的一种变化。这些话听上去很像R·L·索马斯在《袋鼠》中的议论，在澳洲时，他在政治思想方面达到了一个顶点。唐·莱蒙继续说道，我已经意识到，不管我有多少才智，我的意志只不过是这个地球表面上的多余之物，其他人的意志则更加糟糕。”这些言辞出现于第四章《是去还是留》，此标题指的是凯特的优柔寡断。

但她还是留下了。大半是因为那位风采迷人的小赛普利亚诺吸引住了她。但到了第14章，凯特看到莱蒙和赛普利亚诺使旧神复活的行动主要是一种意志的显示，总之：“从她心灵深处对这种纯粹的意志显示产生了一种厌恶，……老是意志、意志、意志、毫无自责或怜悯。对她来说，这便是美国：所有的美洲人。绝对的意志。”她留在那里，但并不是情愿的，全书的最后一句则又是劳伦斯特意留下的不是终结的终结。“你不愿让我走！”

书中还有一些不为凯特所知的阿兹台克主神复活的情况，尽管书中的大部分情况是她所经历过的，在莱蒙和赛普利亚诺举行神秘的血缘兄弟关系盟誓仪式时，她当然没有在场。更重要的是，她可能并不真正知道赛普利亚诺和他的士兵们离开国家后在外面的行为：

他动作敏捷地追赶匪徒。他剥光了他的俘虏的衣服，再将他们捆绑起来。但如果他觉得一个俘虏是个勇敢的人，他便会让他宣誓入伍。但当一个俘虏看起来是个无赖、是个奸诈的歹徒时，他使用刺刀戳进他的胸口，说道：“我是红人赫伊兹洛帕奇利，此刀的主人。”

也许，让赛普利诺借用一个神的名字并没什么特别的过错，然而，是什么给予他这种权利去表现一个像神一样的生死裁决？在这里，劳伦斯确实离法西斯主义很近了，这是他所不喜欢的（关于对劳伦斯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指控在本书的其它地方有答复），同样地是相当愚蠢的。当那些信奉阿兹台克神的人们在唐·莱蒙和赛普利亚诺的率领下，将天主教的标志抬出教堂时，莱蒙妻子的歇斯底里般表示反对的喊叫声的情节显得很做作。但是，如前所述，《癫狂的毒蛇》在描绘真实的墨西哥中有一种魔力。其中，有许多是描写那些身穿白色服装的人们晚间在广场上同唱阿兹台克神赞歌，然后在全城响起低沉的轰隆声的情景。

但此书也有它的赞美者，劳伦斯的天空中有两颗本来相距遥远的明星，凯瑟琳·卡斯威尔和梅宝·道奇·洛汉认为《癫狂的毒蛇》是劳伦斯的杰作。一位颇有名气的批评家，威廉·约克·汀道尔，曾在《D·H·劳伦斯和他的母牛苏珊》（1939年）中开玩笑地谈到劳伦斯与一头母牛的“神秘的关系”，他也认为《癫狂的毒蛇》是劳伦斯的最好的长篇小说，汀道尔教授在1950年此书的简装本的序言中又对它作了称赞，他在序言中说《癫狂的毒蛇》是对现实感受的出色的隐喻。由于受到地方和当时政治的局限（有关这一点此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噩梦般的景象），那种感觉是对所有事物的惊异之感，——甚至于这种政治。凯特总是在呼唤着这种魔力和惊奇。她的故事便将这种魔力和奇迹带了回来。”在《D·H·劳伦斯杂记》1959年中，贾斯恰·凯斯勒称道了《癫狂的毒蛇》中的神秘人类学的特征，L·D·克拉克的《躯体的黑夜》（1964年）整本书全是赞美之辞（此书同样也是一部极有价值的旅行报告，其中有许多与劳伦斯有关的墨西哥各地的照片），基斯·萨加在其《D·H·劳伦斯的艺术》（1966年）中对此书作了一个中庸的评价。还有《D·H·劳伦斯小说中的冲突》（1969年）此书是从利兹大学的一篇博士论文演变而成的，著者只署名为由迪斯塔，此人认为劳伦斯是个圣人，不可能有什么失误，故对他，尤其是对《癫狂的毒蛇》这部“奇特而重要”的作品不宜作文学批评。但许多其他的劳伦斯评论家不喜欢他的这部墨西哥小说，他的最热情的支持者，F·R·利菲斯发现“在此书持续不断的，认真执着的意图中，《癫狂的毒蛇》似乎是一种假货。”

在70年代，美国大学教授劳伦斯作品的教师发现，他们的学生们都喜欢《癫狂的毒蛇》，也许这就像他们的许多同代人都喜欢卡洛斯·卡斯塔内达的书（描写的是一个唐·璜而不是一个唐·莱蒙）以及像马哈拉加·齐这样的头面人的。然而，劳伦斯本人的包含诗意而又平常的言词经常会而且继续会将许多充满诗意的智慧传输给后代人。

在劳伦斯快要结束《癫狂的毒蛇》一书的创作的时候，他的病情变得异常严重起来，在他刚刚完成此书不久，在2月7日，他写信给威廉·赫克，“我的这次旅行很不走运：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不会再到墨西哥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老是不见好——曾想这可能是老感冒的后遗症——果然如此，还伴有疟疾。我看过医生，注射了大量的奎宁，自己觉得像个废人；但已经好多了。”

然后，他最严重的旧病又一次复发了，他对弗丽达说她可以将他埋葬在当地的墓地里，但她苦笑着说：“不，不，那个墓地太丑陋了，你别去想它。”就在这个时候，一次地震几乎毁坏了他们的房子。劳伦斯和弗丽达搬进了当地的一家旅馆，弗丽达也病倒了。

终于，在2月底，他们在炎热中乘上了一趟去墨西哥城的火车，准备在那里转途去英国。厄尔费尔德医生当着劳伦斯的面直率地告诉弗丽达：“劳伦斯先生得了肺结核。”像往常一样，劳伦斯在他的信中提到了他的病，但未说明具体的病情。他听从了医生的劝告。医生的意思是说在这时候进行一次海上旅行可能会致命的。所以，劳伦斯和弗丽达准备回到基奥瓦去。

劳伦斯是在他的这次墨西哥的重病之中开始他的未完成作品《飞鱼》的写作的，他在此书的扉页上注明是献给弗丽达的。1928年，当他在瑞士将此书的未完成稿读给厄尔和阿克沙·布鲁斯特听时，他们希望他写完这篇故事，但他说此书“是在离死亡线那么近的地方写的，所以我再也不能在白天的冷光之中将它写完”——后来在一封信中他告诉他们此故事仍“毫无进展”。

事实上，这是劳伦斯的最优秀的文章，故事讲的是一个叫戈辛·戴伊的英国人，在墨西哥得了重病，想要回家：“在戴伊布鲁克没有戴伊，因为山谷是一片凄惨的景色。”此故事的主题之一正好将“印第安人的毁灭性大节日”与“白人的小题大作，忙忙碌碌的小日子”形成对照。劳伦斯告诉布鲁斯特夫妇说，“最后的那部分说的将是一个再生的人，一种在伊甸园式的生活。”但是，这个故事还是成了一篇重要的未完成作品。

在沃克萨卡的盎格鲁殖民者们在劳伦斯病中对他十分友好，并提供了不少帮助。墨西哥城的那些人也是这样，在那里，病愈的劳伦斯夫妇对几位新结识的英国朋友作过几次愉快的拜访，他们是乔治·R·G·康威夫妇。作为一个电气铁路方面的专家，康威是墨西哥光电公司的董事和经理。他也是位作家，又是有关墨西哥和西班牙征服者问题方面的专家。1925年4月2日，劳伦斯在回到美国之后给康威太太写去了第一封信，当时他们是在新墨西哥的奎斯塔：

我们昨天到达这里——山峦白雪皑皑，风急而冷，但阳光明媚。我还没有完全到达这里；像后到的行李一样，我的一部分好像仍在路上。我们与我们的邻居呆了一段时间。

埃尔帕索移民局的那些人——美国人——十分无理。在你想要抱怨那些墨西哥人的时候，即使是最坏的墨西哥人，还是先咒诅这种美国人。这些下九流的乌合之众，傲慢而没有德性。

那一篮子食物是旅途中最好的慰藉，特别是那些水果。我们把糕全吃光了；根本不像是病人。在普尔曼的人们十分忧郁：在客厅里是一个有七个孩子的墨西哥家庭。——如果可能的话，以后来这里时千万不要经过埃尔帕索。

我仍在默默想着去欧洲。我打算到这个夏末，我们将双双前往。

承蒙你们的款待，非常感激。告诉康威，我祝他顺利度过难关。——确实，你知道墨西哥城还不算太差，只要你找到自己真正的同胞的话。（甚至是那个“坏老太婆。”你不认为这样吗？）

劳伦斯在埃尔帕索遇到的麻烦在他到奎斯塔以后给艾米·罗威尔的一封信中作了详细描述：

我总是怀疑你是否还住在伦敦，也许在伯克利看看我们这地方。我在沃克萨卡得了疟疾，然后是流行性感，后来又是伤寒：病得不轻，日感疲惫。

挣扎着去墨西哥城，又在床上躺了三个星期——然后来了这里。我们曾订了去英国的舱位，但医生说我必须呆在阳光之中，如果我要航海去英国的话，他就不能对我负责了，所以我来了这里。在埃尔帕索的移民局官员把我们当作移民来对待，差一点又一次把我弄死：以前在墨西哥的领事馆和大使馆人员——美国人——倒是十分友好，常为我们提供方便。而他们却只是一味地为难我们。此移民局是个劳工部，你可以在他们的做法中感到一种布尔什维克的味道。

不管怎样，——经过两天的战斗之后——我们于昨天回到了我们的小牧场。屋后还有积雪，老天看上去还要下雪。但一般来说，这里总是阳光明媚的。柴火烧得很暖和。那个印第安人钦尼达德在松树下劈木柴，他的妻子穿着宽大的白色靴子，正在吃力的担水。我开始感到好一些了；但仍觉得我不在乎外面是白天还是黑夜。

我看到了你寄来济慈的书的通知。可惜我没有让你把书寄到这里来，不然我现在就可以浏览一番了。不过我会写信给柯蒂斯·布朗的。我将给你寄去一本我的中篇小说《圣·莫尔》。

在墨西哥我设法完成了我的墨西哥小说《阿兹台克神》我离开的那一天好像腹部被挨了一枪，我甚至不敢去修改一下稿中的误处，那太化费精力，我真希望我把所有的忘忧果都吃了，把所有忘忧河水都喝了。谈到那种能解除人的痛苦的鸦片——一个人需要一种能够进入他灵魂深处的东西。

由于弗丽达拒绝让布雷特留在牧场上，她便在附近赫克家的宅地上找了一间小屋子。劳伦斯曾在沃克萨卡给她的一封信中，就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友谊的话题对她进行了责备，此时又给她写去了一张简短草率的便条，说她再想与他在一起相处是徒劳的：他已经失去与人亲热的一切愿意。“有些熟人就足够了。我们分道扬镳是最好的了。大家庭式的公共生活只是一种幻想，因为人的本能总是要去离间每一个人，并让他们相互争斗。”

到了5月，当天气转暖的时候，劳伦斯觉得好了一些。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完成了他的圣经剧《大卫》，此剧是为依达劳赫（麦克斯·伊斯特曼太太，后来的安德鲁·戴斯伯格太太）而作的，他最初是在洛汉夫妇处认识他的。劳伦斯为她写了米歇尔的角色，但当他把《大卫》读给她听时，伊达劳赫声称她年纪太大了，不宜演米歇尔这个角色。在5月21日的一封信中，他对伊都阿铎·伦东，康威夫妇的一个朋友说：“夏天已来到了牧场——炎热的白天。我手执锄头到处转游，引水灌溉——眼下我成了一个小牧场主和田间农夫。”出版商将《癫狂的毒蛇》一书的手稿寄给了他，他不太喜欢这个英语化的书名——“听上去像个女帽商”——而且，“他们催促我将稿子修改一下，但我觉得我还是不能去看这稿子。其中沃克萨卡的气味太重，我很讨厌这种气味，因为他在那里病得那么重。——总而言之，我一想起墨西哥就想作呕：这与那些朋友们无关，主要是因为那个国家本身。它在那时候给了我一个机会：但我怀疑我是否会再来。”他的身体大有好转。”但还未完全忘却我的疑虑。在牧场我们有一个印第安人和他的妻子为我干活——但我确实感到我再也不想见到一个印第安人或一个‘土著人’或野蛮人圈子中的任何东西。”弗丽达的侄子弗里德利奇·杰菲与他们呆在一起，“我头脑里尽是德语，想换换花样。其它的语言是那么的讨厌！”

夏天过去了，劳伦斯写得很少，对洛汉夫人退避三舍，在他设计他的排水系统的时候，他的身体也渐渐地康复了。当秋天来临时，劳伦斯和弗丽达

开始准备去英国。

此时期的最后一封信，是他在蒸汽轮“决议”号上写给霍克夫妇的（9月27日）这是劳伦斯最后一次离开美国。信中描述了许多20年代美国的情况和他自己的感受，这是他所有信件中的最出色的一封：

这里现在是星期日的下午——个个百无聊赖——一切都毫无生机，除了一丝清风刮来。大海有些微波，户外有些微寒。我们在周三早晨到达南安普敦，见到陆地我很高兴。船上人不多，大多数是德国人，或一些俄罗斯那边的人，他们说的语言我从未听到过。天气很好——我们是在上一个星期一的晚上登船的，凌晨一点启航。在午夜惊奇地发现船已驶进了赫德森湾，在防波堤的灯光中穿过。现在觉得这一切好像是好久以前的情景了。虽然天气很好，这一天我的日子却不好过，头痛得要命。头痛是在我们的船驶进暖雾时开始的，所以我估计又是老毛病症疾发了。

我不太喜欢纽约——那里潮湿闷热。我得东奔西跑去看望朋友们：那可伶的塞尔泽夫妇俩朝不保夕，处于破产的边缘，无人对他们表示一点同情。那两个新出版人，挪普夫妇正准备在他们的第五大街的办公室里大干一场。他的办公室里铺着厚厚的地毯，他们穿着绣着漂亮边饰的缎子衬衣。不过挪普夫妇看来是牢靠可信的：恐怕塞尔泽夫妇有点太“多愁善感”。阿黛尔用戏剧性的语言对弗丽达说：“我所想做的就是付清债务然后去死。”死亡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偿付的债务：而美元则是另一码事了。

尼娜〔韦特——原注〕像往常一样，忙于与其他人恢复联系——华威顿广场附近的那幢房子挺不错，但他们在隔壁造一幢15层的楼房，所以整日价噪音不绝。那个孩子，马里恩·布尔，是个18岁的漂亮女郎，确实十分可爱。她想上舞台，而那些戏子们一直对她心怀不良。我希望她不要去那种舞台生涯，那会把她毁了的。——哈里那小子还没有回纽约。——那位黑尔太太派了辆车来接我们到长岛他们的地方去：是个好地方。但当她在向我们夸耀她养的蜜蜂时，她的眼睛下面被蜜蜂蜇了一下，整个下午，她脸上的肿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在一座富丽堂皇的家宅里，我从未见到过如此奇特的女主人。情况太糟了：她对我们十分友好客气。最有趣的事是在夜间人们开车将我们带到了长岛的海边。我们用浮木点起了一堆篝火，在火上烤羊肉片吃。朝远方望去，除了沙滩和黑海中的泡沫，什么也看不见。

我躺着，思念着牧场；它好像是那么的遥远：——这讨厌的旅程，我讨厌透了！我真想结束这无休无止的漂浮。

威姆斯小姐好吗；我想她不再老是与她的母亲作对了吧，就像布雷特在40岁时那样？请来信对我谈谈你们所有人的情况：

请转柯蒂斯·布朗。亨利耶塔街6号伦敦西2区我实在感到我不知道在这船上能做些什么。

第五部 最后的几年

（一）通向米兰达别墅之路

1925年9月的最后一天，劳伦斯抵达南安普敦，又来到了伦敦蓓尔美尔街格兰德旅馆。其时他见到了几位老朋友：“只有卡斯威尔一家和伊德斯一家，不再有老友帮了，柯特也不在。”凯瑟琳·卡斯威尔欣喜地发觉劳伦斯并不羸弱，只感到他阔边帽下的那张脸看上去削瘦了点。10月9日，他致信年长的霍克夫妇：

现在我在故土已呆了8天，这里并不十分令人快慰：重雾中透射着很微弱的日光，人们都很沮丧。有125万名只靠点可怜救济的失业者。任何地方你都无法找到一位打杂的人。我的出版商在乡下拥有16英亩尚好而未割的草料，他无法收割。他叫场主割了，场主说，尽管小庄上有8位失业者，但他无法叫人干上一个星期的活。假如失业者干上一星期，他们就得脱离接济的行列。失业者发觉要重新获得接济很难，而没有活干更保险些。所以到处洋溢着恐惧的气氛。伦敦物价比纽约高，开支大。某些方面他们在寻求改革。一切还较平静，但有雾，压抑极了。

我们将动身去中部，跟我姐妹呆在一起。是否在英国住上两星期以上不敢肯定。然后我们去德国，找我岳母，再去意大利。

真遗憾啊，要离那牧场、马群和阳光而去！但当一个人要离开时，他的故土就没有吸引力了。

在一封可能写于10月13日给凯瑟琳夫人的信中，劳伦斯再度感到故土未惬人意：“天气糟透了，我们简直恨极了。”在另一封显然写于10月17日信中，他表示：“这里比较富裕，当然是参照原先家庭标准而言。我更喜欢原先的，但不欲它复现。”他还告诉凯瑟琳夫人他比以前更加厌恶“原先个人家庭的圈子”。

在伦敦，劳伦斯同弗丽达见到了巴巴拉·威克利和她的未婚夫。劳伦斯对这位巴巴拉最终并未跟他结婚的小伙子彬彬有礼。带着插手别人私事的癖好，劳伦斯对弗丽达说他们得嘲笑女儿而使她摆脱这种境况：她的灵性哪儿去了？

在诺丁汉观光期间，他们再次见到了巴巴拉。其时劳伦斯着了寒躺在床上。他从床上支撑起身子跟她交谈。他说，未婚夫老气横秋，就连她负有写作任务的父亲也较之为强；而她的未婚夫是位见难无为者。她得像狗甩蚤虫那样将他甩掉。

回到伦敦后，劳伦斯和弗丽达住在高尔街凯瑟琳·卡斯威尔兄弟戈登·麦克法兰家里。长长街道上的盒式房子仅在门牌上有区别而已。劳伦斯邀请几位来高尔街73号作客，其中包括流行书《通晓多种语言者》青年作者威廉·格哈迪（现名格哈迪亚）。威廉惊讶地看到，当她脸上映着环圈似的束光的丈夫忙碌晚饭的当儿，看上去精明能干的弗丽达却平静地坐在一旁。

接着，弗丽达热烈地跟格哈迪以后的资助者比弗布鲁克男爵交谈开了。劳伦斯说：“别这么火热，弗丽达。”而弗丽达叫喊道：“我爱火热就火热，去你的！”当格哈迪说出伯特伦·拉塞尔告诉给他的“劳伦斯没魂了”的话柄时，夜晚的高潮到来了。劳伦斯“嗤”了一声说：“你看见他穿浴衣了？可怜的伯特伦·拉塞尔！他才是游魂呢！”那就是劳伦斯对同拉塞尔早已道

逝的友谊所作的墓志铭。但他同莫里的关系还保持着。因为劳伦斯在多赛特未去奔访他，莫里感到失望，而受了朋友之请去了伦敦，尽管他不愿离开他妻子那怕是一个晚上，因为她身体欠佳，而且怀着他们的第三个孩子。莫里暗地里生着劳伦斯的气，因为劳伦斯对他已同其成亲的《阿德尔菲》撰稿人维奥莱特·利·梅斯特感到讨厌，她长得有点像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莫里觉得，对他们的小女，劳伦斯会喜欢的。

在伦敦，劳伦斯不赞成莫里主张劳伦斯和弗丽达搞幢同他们相邻近的别墅的想法，但他邀请一家子去意大利倒合莫里心意，这标志着劳伦斯已“接纳”这位莫里夫人。劳伦斯和莫里在犹太事上争论起来。在莫里看来，犹太“是位伤透了心的情人”，是唯一了解耶稣的信徒。待劳伦斯回答时，莫里发觉“他在竭力反对耶稣事上同他是何等的相似”。

而两位老朋友还是友好地分手了：劳伦斯硬要到附近铺子为搭乘就要始发的末班车的莫里买袋水果带回到多赛特去。假如劳伦斯回高尔街迟了，莫里就叫辆出租车前往铺子，在回来的路上同劳伦斯碰面。时间不早，莫里拦了辆出租车，而它走错了路线。来到铺子，果然“一位削瘦留有胡子的男士”刚走开。晚了，莫里再也没见到这位削瘦留有胡子的男士。

五天后，11月2日，劳伦斯从巴登——巴登写信给卡斯威尔夫人：“旅途真快，自斯特拉斯堡经莱茵河没有火车，所以只得搭乘汽车……我岳母看上去苍老了些，行动迟缓，但仍挺硬朗，登高爬坡来到我们旅馆。巴登——巴登寂静荒凉得令人难以相信——实在是荒芜人烟，自屠格涅夫之时起就人迹未至。

沐浴过墨西哥日光，巴登——巴登不再比英格兰灵多少，不能再住在灰蒙蒙北方的劳伦斯考虑到达尔马提亚的拉奇萨或希腊的艾尔斯度冬，而最终他选定了同一的地中海海滨。12年前当他住在费亚奇里诺时，他已熟悉那儿地方了。可其时他去了热那亚西部，到了斯波托诺。那儿马丁·赛克保证他能找到若干观光者。从那儿他给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朋友维尔·柯林斯写信。该社正为爱尔兰学校书市修订劳伦斯的历史教科书：

我正在将草就的传记寄出。当我仔细过目时，我是忧乐各半。在我稍作改删之前，假如我私下仔细过目而自作主张的话，我早把那些爱尔兰书送进地狱里去了。帮个忙，在你过目时，请替我保留有特殊标记之处，行吗？可能的话，将稿件寄回给我。这将有助于激起我的勇气和令我联想起人类的光荣。

这儿阳光充足。我们在旅馆里呆的时间不长。该在这儿找所房子度冬，尽管这一村庄并不怎么样。但假如阳光映照在地中海上，那就棒了。

我读了卷散文，相当柔软，就像用来喂张着嘴的雏鹅之类的打碎了的蛋糊。天哪！英格兰的男人们哪里去了？这地方像是嘈杂的育儿室。

莫里的《基茨》真妙，谢天谢地。可我的天，这么颓废。原文可能是：哦！舐掉莎士比亚，直至将盘子舐干净。你或许想狂喜欲死，而在25岁这过早而美妙之年夭折。

我极讨厌这感伤的蠢话，而英格兰为之腐烂发臭。为何有人最终对它不大声叫道：胡扯！

劳伦斯夫妇向一位伯萨格里尔里的军官租下了伯纳达别墅。当军官来到里居尔旅舍洽谈条件时，劳伦斯叫弗丽达见见这位小个儿军人。他看上去“这么潇洒”。因为是皇后生日，他穿着军礼服。弗丽达看到了一位戴着色彩鲜

艳的羽毛和蓝色饰带的威风凛凛的形象，这是她对安吉洛·拉伐格里的初次印象，25年后她同他结了婚。

在12月18日给威廉·霍克信中，劳伦斯这样描述这个别墅：

它靠海，在里维埃拉，离蒙特卡洛约三英里（实际上更远些）。好个谧静的意大利村庄。这里我们有朋友（马丁·赛克一家子）。住房条件不错，其正好位于一大葡萄园的城堡下。村庄的屋顶上有平台，远处是海。我们自己动手干家务：弗丽达硬不让雇个女仆。但楼下住着位园丁，他包了所有的杂务，每天早晨7时半去铺子打好水，随叫随到。我们已搞了幢三层楼房。我们大部分活动在顶楼，高得很，有厨房、卧室、起居室。起居室有个大阳台。我们在二楼就寝，底楼藏东西。它有着典型的意大利乡村情调——一种比在美国更舒适的愉快的生活。气候大致上晴朗干燥，但寒风凛冽。我们到山坡上去蹒跚蹒跚，其后便是雪山。再干点零零碎碎的事情。昨天我们采摘了些橘子做成果酱，少许焦了点，但味道不错。弗丽达的小女儿巴巴拉在阿拉西亚，离这儿25英里开外。她老远跑来跟我们呆上一两天。这儿没有马骑，没有汲水的溪泉，蓬松伞形的松树点缀着潮海多石的斜坡。

住在伯纳达别墅期间，劳伦斯开始进入第四时期，创作生涯的最后阶段。这一时期的某些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部分章节、诸如《巴伐利亚龙胆》及一篇随笔的字里行间，劳伦斯运用了他惯用的浓郁的笔调进行创作。但他的生命接近了终点（他又度过了4年零3个月，这是意想不到的），他的写作退减了——未必在容量上着意，但至少在性质上有差异。早期作品中仅仅时而显现的因素占了主导地位，一种辛辣、理智而并不总是顺当地溶合在这些早期作品宏量巨制中的因素。后期的作品，在某些讽刺短篇、新闻随笔和《三色紫罗兰》诗篇中，这种辛辣、尖酸的笔调时常直截了当地表露出来。所有这些在早期作品中经常不过是些收敛的注释。

在他写于伯纳达别墅的短篇小说初集中的一篇名叫《太阳》的小说中，劳伦斯运用了早期创作生动鲜明的笔调。其戏剧化地通过运用象征手法体现他纷繁的中心学说。就如他的许多短篇诸如《瓢虫》或长篇诸如《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一样，《太阳》又是民间传说睡美人故事主题的衍化。这儿包围着沉睡中的（潜伏着性欲的）女子的荆棘藩篱是仙人掌；给她带来生命的吻是太阳的亲吻。且正如伊丽莎白·戈德史密斯所指出的（在《古代异教象征》一书中），太阳是“普遍的变形者，……拯救被囚禁少女的伟大的情人，……释放冰姑娘的英俊的王子”。从德比郡的淫雨到瑞士的白雪，在北欧的早秋如此长时间没有见到阳光的劳伦斯将太阳作为他小说中的“男主角”，并在阳光普照的伯纳达别墅的阳台上，他把仁慈的温暖转化为女主角的躯体。她成熟地一丝不挂地躺在顶部摇曳的柏树下：“她想起希腊人说过，一具苍白、不晒太阳的躯体是僵冷和病态的。”

在9月27日给年轻的霍克夫妇的信中，劳伦斯利用西西里岛的回忆来构成小说的中心背景，而开头一段则是他在由纽约开出的船上于深夜写成的寥寥数行的主题扩充，其使《太阳》成为他创作生涯第三和第四阶段、他生命的40和45岁之间的一段航程。

这时，劳伦斯同莫里的关系实际上已终结。莫里答应带着他一家人到意大利看望劳伦斯，但医生说莫里夫人太虚弱以致于不能平安地旅行。实际上，她一直盼望的孩子出世后，她就病入膏肓了。

莫里回想起当听说莫里再次取消造访时，劳伦斯给他发了封“怒气冲冲

的信”（莫里没有保留这封信）。自此之后，劳伦斯写给他的信寥寥可数。在写于1926年1月的信中劳伦斯对他说：“不要再为耶稣或者人类或者你自己操心了，……让《阿德尔菲》见鬼去吧，……为着《阿德尔菲》，我不欲理睬任何人。《阿德尔菲》肯定会扼住双方各自的颈部而互相溺死。松开吧，松开吧！”

但莫里并没有松手。当他收到劳伦斯《关于一只豪猪之死的反思》时，便问他是否可以重刊而不支稿费。在1月17日的信中，劳伦斯表示他不愿莫里在杂志上刊登他的文章。莫里肯定意识到了他们各自的说法是何等的不投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但看在上帝的份上，让我们不要装着把它们混为一谈。”莫里答复说他同意他们不进一步交往，这样会更好些。

劳伦斯明显地对此未作答复，尽管在春季若干封信中，他跟布雷特恶意地谈起了莫里。在开普利的布雷特为劳伦斯而红颜憔悴，但不敢去北部伯纳达别墅触犯弗丽达河东之怒。劳伦斯说，莫里非常有意思，多愁善感，言外之意甚是糟糕的：“我想，跟那家伙打了一番交道后，你就想千方百计地摆脱他，随附他那种多情放纵的忧郁，可鄙极了。”

大约这一时候，劳伦斯写就了短小拙劣的讽刺莫里小说的最后一篇小说《微笑》，它显然是取材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之死（将莫里和凯瑟琳来作为马修与奥菲利亚的原型），且很明显始作于里居尔海滨。莫里在1953年7月16日信中告诉本书作者，“关于劳伦斯和莫里于1923年、1924年和1925年的关系的真相距离已发生的一切很遥远了，或者很可能在我生活中发生过。尽管我苦思冥想，但我不能把它（即真实故事）勾勒得更完美。”关于讽刺作品他说：“我看了你在1952年10月2日信上所说的，你或许受了劳伦斯关于我的讽刺小说的影响（在《D.H.劳伦斯的生平及其作品》中）。这些现在在我看来不过是一种侮辱。而且我仍然认为它们是劳伦斯秉性中最糟糕和最不诚实部分的产物。考虑到事实真相，我认为这些作品依然是一种卑劣的报复。”“事实真相”当然是指弗丽达同莫里互相间的态度和莫里的回绝，他拒绝坠入与她私通情网之事，显然不为劳伦斯所知，尽管他明显地怀疑最糟糕的事情。

在斯波托诺，劳伦斯还创作了、或至少完成了他的短篇《快乐的鬼魂》。他原先打算为辛西娅·阿斯奎斯的《鬼书》而作，而当《快乐的鬼魂》1926年10月刊登后，《鬼书》取替性地刊行了他的短篇《摇木马获胜者》劳伦斯对他的代理商说，他为追忆西里希亚夫人而创作了《快乐的幽灵》，“但是否合适没底”，或许因为开始以多萝西·布雷特为原型的卡罗塔·弗尔的性格与辛西娅夫人相似。

已婚的卡罗塔和她的丈夫拉斯奇尔男爵是早期小说《顶针》和《瓢虫》中贵族夫妇的变体。拉斯奇尔夫妇作为阿斯居埃夫妇化身的结论被劳伦斯·克拉克·鲍威尔在1937年一篇文献笔记中首次公开提出。理查德·阿尔丁顿认为假如鲍威尔结论正确的话，“小说的结局就显得轻率莽撞了。”结局中，当幽灵般的女人在拉斯奇尔夫妇乡村住宅的客室生下与劳伦斯相象的马可·莫里尔时，梅花取代了《最后的笑》中的杏花。梅花写得恰如其分，因为拉斯奇尔夫妇后有了个孩子：在东方的象征手法中，梅花表示不朽和生命的永存，并且它还代表着新年（劳伦斯完成这篇小说正当1925年年底之际）。

这一时期，他还创作了短篇《处女吉普赛姑娘》，影射出他近期观赏德比郡多石的景色的情况。回想起来他现在熟悉的已长大成人的威克利的女儿

——巴巴拉就住在附近的阿拉西俄，而和艾尔萨从伦敦赶来探望他。这大概联想到小说中那些当他们年轻时，她们的母亲就与情人私奔的妙龄姑娘。

在斯波托诺的马丁·赛克（“文静的小个儿男人，……长得英俊，但不活跃”）称赞这篇小说，尽管它直到劳伦斯辞世后才发表，又认为它缺乏最终的修改。小说中的水被赋予了性别和生命，一男子把快要淹死的姑娘按摩活了。这召唤着早期小说《马商的女儿》，且它是睡美人故事主题的另一种衍化。其中“无知”的吉普赛人是作为觉醒者的形象。它也期待着未来；这样它还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序曲。

艾尔萨和巴巴拉·威克利抵达斯波托诺期间，埃达·劳伦斯·克拉克和她在伊斯渥的朋友布思夫人也前来伯纳达别墅观光。她们到了后发觉劳伦斯患了感冒。

弗丽达相信埃达企图与劳伦斯重温旧事。一天晚上，埃达劝劳伦斯闭门不要见弗丽达。事后弗丽达说，这是劳伦斯唯一深深地伤害她的举动。一天早晨，埃达对弗丽达说：“我从心底里恨你。”劳伦斯为能从全副武装的女人的敌对阵营中解脱出来而感到高兴。当他携同埃达去蒙特卡洛远足时，弗丽达对他说了些难堪的话。

刚好就在布鲁斯特一家去印度之前，劳伦斯从蒙特卡洛赶到位于开普利的夸脱罗·凡蒂的布鲁斯特一家别墅。他帮助他们裹包收藏那些后来成为他描写布鲁斯特一家一篇刻划精细的猥亵小说《玩艺儿》中主要象征物的古玩。他围着他们歌唱，跟他们讲新近同他姐妹交谈而使他记忆犹新的故事。他学着他母亲责备他的样子：“你从前是个乖孩子，伯蒂。”

在夸脱罗·凡蒂期间，记者采访他，摄影师争相为他拍照片。他跟兴高彩烈的布雷特一起散步，告诉她他感冒未愈，感到疲惫。他是“爬着与”埃达来到蒙特卡洛，现在“一切累得要死”。他靠在沙滩上。又去费思·麦肯色别墅拜访。费思·麦肯色说她丈夫去了他租用的海峡之岛。对此，劳伦斯不久就创作了《爱岛的人》，并且探访了开普利理智的流浪汉查尔斯·埃林汉姆·布鲁克斯。但劳伦斯不再像以前那样精力充沛，他性子变得温和了，尽管他嘴里有时会尖刻几句。

当他3月中旬离开开普利而打算同他老朋友米莉森特·贝弗里奇到伊特拉坎旅行时，他感冒全好了。米莉森特·贝弗里奇5年前在塔奥米纳为他绘过肖像。他穿过大陆在阿·马尔菲与她及她的朋友梅宝·哈里森见面，忠实的布雷特紧紧尾随其后。在开普利，她已经发现红颜消衰的玛丽·加农叫人恶心而企图将其逐出劳伦斯的圈子。但在过大陆期间，劳伦斯表露出他对布雷特厌烦了。

在她的记录材料中，她讲得极清楚：在拉维罗旅馆别墅中，他们各自不光有单独的房间，而且也合住。当劳伦斯转入他的房间度过一个兴奋美妙的夜晚时，而布雷特却摸索着用火柴和蜡烛找到自己“硬冷的床”。当布雷特接到她被重新许入美国的定额证件在那不勒斯的英国领事馆的通知时，她试图拖延时间，而劳伦斯却冷酷地叫她离开。当她的船离岸驰向那不勒斯时，她见他站在岸边，挥动着她给他的蓝绿相间的丝巾。这是她看到他的最后一面。1974年，她披露1926年患阳萎的劳伦斯两次试图与她同房，她是愿意的，但他却失败了。

同一当儿，在斯波托诺的无果树间、杏花丛中及激动人心的意大利春季富丽的景色中，弗丽达同她的女儿们却过得快活。梅宝·洛汉寻到了再次

给劳伦斯发函的借口，他不是劝她出版她的回忆录吗？在劳伦斯不在伯纳达期间，她的原稿断然寄来了。弗丽达告诉她：“我希望劳伦斯重新生活，《癡狂的毒蛇》夺走了他身上这一切，这一切几乎太遥远了。”她自信地补充道：“劳伦斯不久就会回来的，我保存着这原稿。”

弗丽达对劳伦斯送给她的乔纳面对着鲸鱼而带着“谁准备吞噬谁”的疑问的照片不感兴趣。但在那些日子里，他的鲸鱼肚皮是伊特拉斯坎人的坟墓。他从罗马来到了不称意的阿西西，又到了帕卢基亚、比萨和佛罗伦萨，然后又来到了拉凡纳，那里他害上了病，只得在床上躺上一两天。

彼得·克温纳尔告诉本书作者，他在那里见到过劳伦斯。克温纳尔为他不熟悉劳伦斯而感到遗憾，但提供了在拉凡纳对劳伦斯鲜明的一瞥：“他带着两位看上去结实的中年英国妇女。我尽最大努力偷听他在旅馆餐桌上的谈话。”但所有克温纳尔对当时情形可以回想起来的是劳伦斯对当地镶嵌工艺品的指摘：劳伦斯不喜欢“两眼在头部一侧的图案，‘活像条扁平的鱼’。彼得·克温纳尔还对“（劳伦斯的）浓重的土音留下印象；古怪浓密的胡子，一副脆弱的样子和对他两位大身量母亲般的伴侣的一种风风火火男学生调皮的腔调”。

复活节前一天，劳伦斯从米兰回到了斯波托诺。弗丽达怒气未消。但当他回家临近时，她女儿说：“现在合情合理，劳伦斯夫人，你已跟他结了婚，你得缠住他。”所以正如他所告诉他岳母的，“三位女子穿着节日盛装来车站接他”，“一时我成了复活节的羔羊”。

4月20日，三位女子随同他一起去佛罗伦萨。两位女儿回伦敦去了。劳伦斯在佛罗伦萨西南乡下而位于斯堪迪西之中森波罗莫斯辛的一个小别墅落了脚。这就是米兰达别墅，其成了劳伦斯断断续续两年的家。它是劳伦斯最为著名的住址。在那里他创作了《查特莱夫人的情人》。

5月6日，他们搬入家中。一星期后。劳伦斯将其小说《两只蓝色的鸟》寄给他任伦敦的代理商们，并预言这将对他们是另一种磨难。实际上，这篇短小的讽刺一位成功的作家和他与妻子及与他女儿秘书的关系的作品并没有使康普顿·麦肯色夫妇对小说的赞赏程度超过《爱岛的人》。

18日劳伦斯在给凯瑟琳·卡斯威尔的信中谈到了米兰达情况：“我们住在这老别墅的半高处，离佛罗伦萨7英里，一年房租25英镑。”他觉得他们“可以把它作为临时寓所，随去随来；当我们走时，把它出租给别人。乡村周围美极了，除了一家人家外，没有别的客人。这家人叫盖尔—威尔金森，他们是乡村艺人，曾有一个木偶剧团：他们很友好。他的红胡子使他成为所有“留须者”中的美髯王。”

米兰达位于费耶索尔对面，是“一个典型的农庄。庄主是一位35岁的男子和他的妻子，为人很不错，只是露露面。他是个骑兵上尉，但是个文职人员，绝不像你通常所见的骑兵模样的人。仅仅在周末或某天来看望佃农。住房尽管很宽敞，却空洞洞的，又不舒适”。如1928年4月25日劳伦斯给伊妮德·希尔顿信所说的，其地难找：“……乘16路电车从教堂至弗茵哥，正如乘到终点站。”从那儿“沿着公路朝前走四分之三路，靠塔有左岔路。”两棵丝伯树“交叉矗立在通向左路的角落”。转过去，路向山谷倾斜，米兰达山坡上一幢正方形盒箱似的房子便出现在你眼前，后边是森波罗小教堂。若我们走开了，就到农舍问我们的保姆吉拉好了，她有钥匙”。（一辆公共汽车替代了佛罗伦萨至弗茵哥的电车。）

在米兰达的头个春天里，劳伦斯很少写作。是年早些时候，赛克出版了《癫狂的毒蛇》，劳伦斯新的美国出版商阿尔弗雷德·A·挪普将它在纽约发行。评论如常：《时代文学副刊》指出是书“很微薄”；P·C·肯尼迪在《新政治家》中认为劳伦斯已“走向虚无、贫乏、抽象、重复、空洞的境地”；凯瑟琳·安妮·波特在纽约《先驱论坛》赞赏它是墨西哥鲜明生动的画面，但发觉一场“大变……已侵袭着劳伦斯”；L·P·哈特雷在伦敦《星期六评论》说劳伦斯不再对人与人之间的日常关系感兴趣了；《观察者》觉得，在这篇迷人、浪漫、纷杂而又冗赘的小说中，劳伦斯不能创造出个性，他的男女主人公是出自他空乏想像的幻影。

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已显示出，即使《癫狂的毒蛇》是劳伦斯作品中的败笔，它也是壮丽的败笔。实际上，它是绝妙片断的成功，一种比那时一些小作家著名而较为畅美作品更伟大的成就。小说头六章几乎是无可比拟的绝妙的散文，但此后却插入了无聊的叙述，尽管其继续有无可匹敌的描写。再者，它有助于回想起T·S·艾略特在他评论但丁随笔中关于一位读者不必为便于欣赏作品而去从和一位诗人的信念的陈述。

不是所有的评论都持敌意态度的。埃德温·缪尔不管近来对劳伦斯所作的公开的责斥，而在《民族与雅典娜神庙》中对书中瑕瑜一视同仁地展开讨论。莫里在《阿德尔菲》的匿名评论的结尾中说：“我们难道需要说此书包涵美好和难忘的东西吗？花这么多时间去哀叹，“哎哟，现在奇迹就在这儿，我们无法用我们的心灵、太阳神经丛或尾部去攫住它”。

尽管有贬词，但不管怎样，《癫狂的毒蛇》销路正常。挪普不久将它重印。1926年至1928年劳伦斯在世期间和1930年劳伦斯辞世那年，赛克将它进行发行。挪普和海因曼将它一印再印，又收入《企鹅丛书》。再回扯到1926年春季，劳伦斯感到提不起劲来，很少写作。那时他所写的信生动地描述了他米兰达阳台上那些阳光明媚又懒洋洋的日子，其周围是粮田和覆盖着银白色橄榄树和绿色葡萄树的斜坡。

这种情绪一直延续到夏季。7月18日，抵达巴登—巴登的第五天，劳伦斯写信给凯瑟琳·卡斯威尔：“我厌恶写作与出版，情愿不再刊印什么。无论如何，现在我什么也不做，也不愿从头做起。”他还告诉她：“我对英格兰颇有恐惧感。”尽管两星期里他泡在那里作最后一次观光。

在伦敦，他同弗丽达住在契奥西的罗塞蒂花园大厦，一幢高高的旧式的褐色住宅。在那儿，弗丽达的儿子和她的丈夫第一次结为朋友。弗丽达对洛汉夫人说：“蒙蒂与劳伦斯在楼梯上碰见彼此都显得友好，很友好！”现年25岁而从小未见到过劳伦斯的蒙塔古·威克利马上注意到了他中部的土腔。

弗丽达跟洛汉夫人讲了造访理查德·阿尔西顿和“阿拉贝拉”·约克的情况：“阿拉贝拉是小说《阿伦的杖杆》的人物原形。她如此像特立尼达和路费纳的混种儿，黑色的头发，而理查德这么白皙、蓝眼睛，属日尔曼人种！”曾邀请劳伦斯光临他在伯克郡帕沃斯的马尔特豪斯别墅的阿尔丁顿在他的自传中回忆道：那次造访有些不祥之兆，正如劳伦斯所声称的那幢别墅不吉利。”

但他们都有过一阵子快乐时光。夜晚他们哼着法、德歌曲，下午去逛荡旷野。当劳伦斯告诉阿尔丁顿他打算创作一部关于伊特拉斯坎人的作品时，阿尔丁顿安排伦敦图书馆发送了六卷有关这一题材的书籍。阿尔丁顿答应在秋天酒季同多萝西·约克去米兰达。

游览了苏格兰和斯克埃岛后（“正如欧洲所开始的那样：8月当然有大批旅游者和汽车”）劳伦斯携同他的姐妹去了林肯郡海滨。8月29日他自塞顿—昂—西写信给曾在康沃尔相遇而又在佛罗伦萨加深了了解的书商格尤斯贝（皮诺）·奥利欧利：“我们在靠着故乡中部的海滨。这里美极了，宽阔平坦的海滨之上是无际的苍穹，低沉的大海隆隆作响。我喜欢这里远远要超过伦敦。”13天后即9月11日，他41岁生日，他再次写信给奥利欧利，提及了另一种重新认识：“阿尔德斯·赫克斯利来伦敦看望我。他已前去多罗迈蒂斯的柯梯纳，在那儿搞幢房子。他看上去没有以前那么神气。离开塞顿—昂—西而重新了解煤矿地区对劳伦斯来说是一次令人沮丧的经历。尽管总罢工遍及大部分地区，而矿工仍在出工：“9月我在我姐妹处，”劳伦斯后来对；罗尔夫·加德纳说，“我们驱车兜转，我看到了矿工、纠察人员和警察，它像把穿心的枪矛。”威廉·霍普金在给本书作者信中（1949）年10月16日）描述了劳伦斯最后一次访问伊斯渥的情形：“他和我细细打量着故地。我们来到了费利水坝，他伫立着审视起赫格斯来。我坐在池子边上。我转身看他时，他脸上有种可怕的痛苦的神色。我们返回时，我问他何时再来重游，他说：‘不！我恨这鬼地方。’当我们经过布利契住宅时，他连瞥都不瞥一眼。”

在伦敦返回大陆的途中，劳伦斯遇见了艾米·罗威尔的朋友路易斯·恩特梅耶尔，他对其这样评价道：“由于他没有真正的内核，不朽的犹太人是超凡的。他是不朽的……从摩西到恩特梅耶尔，那就是整个犹太人的历史。”若干年后，恩特梅耶尔在他的自传中以逗趣的笔调作了回复说劳伦斯是真正颠沛流连的犹太人。

1926年在伦敦，卡斯威尔夫人夸耀她小儿子已成为一名出色的旅行家。劳伦斯摇着头对她说：“不，凯瑟琳，我倒希望听到出色的家居者”！这是最后一次见到劳伦斯的卡威尔夫人当听说劳伦斯正患着支气管出血症时而为他担忧，他却向他保证没事：“你知道不是肺部，不过是支气管，太累了，用不着担心。只是我要尽量避免感冒。”

在卡斯威尔一家为劳伦斯举行的告别聚会上，他们一同讨论金钱。柯特连斯基声称任何不劳而获的收入把受益者同其他人脱离开来。劳伦斯说，富人们有“一种奇妙的触感而使得一个人感觉迟钝，从而走上邪路”。这是《摇木马获胜者》主题的重申。是篇小说那年早些时候被辛西娅·阿斯奎斯收入她的《鬼书》出版。小说显露了劳伦斯的现代手法，因为小说仪式方面再度表明他归属了他同时代吸收人类学知识的第一流作家的行列。无论如何，它不是劳伦斯小说真正的代表作，尽管小说中部分章节反映了他对他“放荡的”赫伯特叔叔的回忆。如弗兰克·阿蒙开始所指出的，劳伦斯还可能借用了伯德斯顿、康沃尔和新墨西哥州印第安人村庄典礼上系着柳条马跳舞的回忆。《摇木马获胜者》是劳伦斯一段创作萧条时期寥寥可数的作品之一。10月初他回到意大利后，这一萧条时期在可怕地延伸。10月18日他从那儿写信告诉艾尔丝·贾菲，“我想，我将不再创作别的长篇小说了”。但仅仅隔了11天，他已写了41页他创作生涯中力作之一——《查特莱夫人的情人》。

（二）通往查特莱夫人之路

为何一再申明不愿创作其他长篇小说的劳伦斯 1926 年秋季回到米兰达山庄数星期后便突然开始写起《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来了呢？在 10 月初葡萄收获季节信守诺言去米兰达观光的理查德·阿尔丁顿回想起来那时劳伦斯未跟他说起这部构思中的小说。但过了几年，她猜想劳伦斯创作这部小说的灵感萌发于前一年游访中部之时，即 1925 年夏季克拉克一家带他乘车穿越德比郡和诺丁汉郡之时。

这不过是推测，劳伦斯 1926 年已再度游访了那一地区。但可以肯定的是，当再次写到人类现代社会机械化时，劳伦斯又在内心树立起他永久的象征标志之一的工业化英国中部。在 1928 年给大卫·加纳特信中，他谈到了此书的缘起。劳伦斯告诉他，“早些时候，你父亲对我说，‘我喜欢对完整行为的描述’，这一直埋在我心里，直至我写这本书”。但何以产生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单一的“灵感”？劳伦斯依照寓言与象征手法进行构思，对这种文明机制感到厌恶，从而创作了这一出自他知悟见有一定形式的作品。

如他在随笔《〈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设想》中所说的：“当我塑造克利福德和康妮这两个人物时，我不知道他们该是什么样子，何以那个样子。他们恰好出现了，同他们的身份非常贴切。”

劳伦斯时而在米兰达别墅的高楼上写作，从那里眺望出去是朝向远处模糊佛罗伦萨的果园和橄榄树。时而选择阳光明媚的别墅平台。而更多时候则在森波罗小教堂后面。那儿白天天气温和的话，他便坐在一只小小的伞松制成的酒桶上构思创作他的一位庄园主太太坠入她丈夫的猎场看守人情网的故事。当这位红胡子苍白的男人在他的手稿中勾勾划划时，他的周围生机盎然。陡削的小山坡上开满了南方的鲜花（这他意欲写进散文《绚丽的特斯堪尼之春》中），夜驾在树林中歌唱，“一种极为热切、明快的雄驾叫声”。猎人们在树林中不住地射击。偶尔劳伦斯看见其中一位走过去，“穿着柔软光滑的灯芯绒裤子，肩上搭着弹药和弹药带，手上拿着枪”——装扮酷像成为查特莱夫人情人的猎场看守人。

劳伦斯曾说他“三次从头至尾”改写这部作品。自 1926 年至 1928 年 1 月期间，断断续续创作了这部小说。部分读者包括弗丽达更喜欢《初始的查特莱夫人》（其不管纽约某些爱管闲事者的竭力禁阻，于 1944 年出版）。二稿最终（在海因曼主编罗兰·根特的指点下）于 1972 年以英文版（早几年是意大利语版）出版，取名《约翰·托马斯与珍妮夫人》，一个劳伦斯考虑到的逗人、放荡、短小的民间传说的标题。

三易其稿后，劳伦斯起先还愿出版。弗丽达说他意识到了这将会给他带来更多的怨恨。但一旦他决定将是书付之刊印，他就积极地为之努力。使他感到恼火的是，他在伦敦、纽约的代理商和出版商缺乏热情。在 1928 年 3 月 15 日自米兰达发给 G·R·G·康威信中，他解释了他最终所做的。信中还蕴含着意旨：

现在我正忙于为我的新作在佛罗伦萨出个私版。你已经知道了，你会同情我的。我希望在秋季出版商能出个洁本。而我须出个全本。它至少在后半部是一部生殖力象征的小说，但棘手复杂。你知道我相信生殖力现实和生殖力知悟：与今天过敏易躁的大脑知悟截然不同。那就是我写这部书的目的所在，它不只是着眼在性上。不幸的是，性是当今最糟糕的现象之一：出自精神程

序与渴望的整个事物都是大脑的感应，而没有一点实在的生殖力的随意和自发性。但在我的小说中这却存在着。

在劳伦斯生命最后几年的信和随笔诸如《色情文学与诲淫》的许多论释中，这一解释是具有代表性的。在给康威的信中，他谈到了洁本的问题，劳伦斯事后表示他不能从书中剔除生动的章节：“我还是用剪子剪下我的鼻子为好。书在流血。”

他逝世后2年，不管怎样，他在英国和美国的出版商出了删节修订本，而未承担起还《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真面目的斗争。而斗争不久因《尤里西斯》问世而展开。它对劳伦斯清教徒般的心灵来说则是一部“肮脏”的书，一种性的机械化。但最终在1959年，园林出版社在纽约出版了《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全本，而在邮递中，却遭到了杰出的文学批评家、邮政总长阿瑟·萨默菲尔德的查禁。原先哥伦比亚大学莱昂内尔·特里林的学生弗雷德里克·范·皮特·布赖恩提出了一条开明合法的意见，宣称查禁是非法的。1960年，《企鹅丛书》在英格兰出版了全本《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这一案件提审到法院，出版商获得了胜利。

不管争议和它自身的纯粹的是非曲直，《查特莱夫的情人》一书是本世纪著名作品之一。劳伦斯最惊人的睡美人故事主题的更变涉及到了一位原型的现代妇女，她丈夫从事劳伦斯所鄙视的两种职业：产业主义和智力活动。不幸的是，作品中的克利福德·恰特莱还是个在一次打仗中受伤而成为瘫痪阳痿的跛子。劳伦斯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设想中指出，他不能说出“这种‘象征手法’是不是有意的……当然，不是在开始塑造克利福德之时。”劳伦斯后来意识到，克利福德的瘸跛“是麻痹的象征，当今社会克利福德同一身份、阶层的许多男子深沉的激情或情欲的麻痹。我感到人为地使他麻痹瘫痪或许是不公正地捉弄康妮，使她离他而去变得如此俗气。但小说木已成舟，所以只好作罢。我们称它是象征手法也好，不是也好就事件本身来说，是不可避免的。”

使克利福德变得瘫痪的战争创伤深化了象征。但就劳伦斯的虚构故事来说。它是贫乏的一种。假如劳伦斯使得克利福德性欲缺乏成为超理智化的结果，那么小说会更动人些：书中米歇尔斯（一位爱尔兰男子，可能以迈克尔·阿伦为原型）的身上早有着这种暗示，在遇见猎场看守人之前，康妮同他有过一段浪漫史。鉴于劳伦斯的倾向是反对诸如米歇尔斯之类人物的背景——克利福德所倾入的背景，而不是反对跛子，他可以在超理智化上保持对立，而不是去利用肉体上的不幸。他的猎场看守人是劳伦斯不朽的“自然”人的另一幅肖像，他继承了《白孔雀》中安娜贝尔的衣钵。但在他身上也有某些那部小说中乔治·萨克斯顿的成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是经过20年重新创作实践和磨炼之后对《白孔雀》部分的重述。

重要的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作者曾几度批评福楼拜和托尔斯泰将他们的女主人公埃玛·包法利和安娜·卡列尼娜置于死地。这些女子不过是违背了一项人为的社会法规：她们不是崇高悲剧中同自然力量相抗争而显得潦倒的悲剧形象。劳伦斯将他的女主人公置于通往生活的大道上。在这部的结尾，康妮同梅勒分手了——劳伦斯很少提供完善的结局。但读者知道他们不久将重归于好。

至于劳伦斯运用四个字母的黄色词语，他驾驭它们不同于詹姆斯·乔伊斯。劳伦斯把他看作一位呆板的作家。明显地包涵在乔伊斯文章中的蓄意给

劳伦斯认识其他方面有所作为的一位同时代人的价值带来不便。劳伦斯创作《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意图不仅仅是自然主义的(“这是一条生命之路”),而且带着医治性质,是一种摆脱羞耻的燃烧。而他对英国的道貌岸然则感到厌恶。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空气的议论还未减少,讽刺的手法是最后部分最为突出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不是从《儿子与情人》到《癫狂的毒蛇》小说中那种冗长的平铺直叙,它仅仅是昔日反响偶尔的共鸣。它是一种萎靡的议论,仅仅是一种温和的色彩。而劳伦斯那些日子大部分热烈奔放的色彩则体现在他的画品中。在他着手创作《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1926年秋季,劳伦斯在他的人生旅途中首次庄重地开始了绘画。

由于赫克斯利一家的缘故,使劳伦斯重新对绘画发生兴趣,这多少有点偶然。一天,他们坐着新车去米兰达,建议劳伦斯乘用他们一辆旧车,而他怕“学开车,跟机器打交道”, (如早先所注意到的)他“不想飞快地领略乡村的概貌”。玛丽亚·赫克斯利带着放在家里的四块旧油画布,其中一块“破裂”了。她把这些交给劳伦斯。他们引诱他在油画布上涂些他和弗丽达装饰米兰达住宅窗框、房门用的油漆或许因为正如劳伦斯一度对赫克斯利夫妇所解释的。当他称他的第一幅作品《神圣之家》为《邪恶之家》,“头上有光轮的那苏婴孩像正紧张地注视着年轻的男子给半裸的妙龄女郎深鞠一躬”,它则是以后在伦敦展出的他所有画品最为惹事生非作品的其中之一。劳伦斯并未觉得他有大不敬的地方;他的宗教信仰只不过不同于他以前那些同类的公理教友罢了。画品没有触犯米兰达庄稼人,他们喜欢它们。但当劳伦斯举办画展时,他却抱怨那些“称画品为我亲爱的朋友们的人们”,他们不但感到震惊,且对此非常生气。

在绘画上费心,前后有3年时间。1926年秋,他感到唯一的乐趣是绘画活动。他《论文杂编》中的随笔《画法》(1929年)谈到了所有绘画作品,即使是伤感作品中乐趣的特性:“没有一位艺术家,即使是最伤感的,在想象构思中缺乏奇特的乐趣而随时能创作出一幅作品。”

1926年12月,劳伦斯想去伦敦看看戏剧社《荷尔鲁伊德夫人的寡居生活》的演出,但他觉得离开意大利不十分妥当。已于1920年在阿尔特茵契阿姆看过剧目演出的卡斯威尔夫人说,埃斯米·珀西以后包括演员科林·基思—约翰斯顿和詹姆斯·惠尔在内的演出是较好的。但在舞台上清洗死尸,未能收到显著的效果。劳伦斯对赫克斯利夫妇说,人们“恨”这一剧目,觉得它“悲观忧郁”。《时代》杂志评论家喜欢头二幕,“我觉得我面前是一位富有潜力的伟大的剧作家”,然而“哎哟!在第三幕中,小说家把劳伦斯先生请了下来,而剧作家只好让位”。如早先所注意到的,当《荷尔鲁伊德夫人》和劳伦斯其他两个剧目1968年在伦敦皇家宫廷剧场演出时,反应迥然不同。而评论家们赞扬他是一位重要的剧作家,劳伦斯被刮目相看。评论家们甚至抱怨原先竟然谁也未发觉他的剧本如此妙不可言。起先提及的1974年在美国电视台的演播,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剧本是出类拔萃的。

劳伦斯于1920年后期照例保持着他的通信关系。他偶尔跟异教徒帮的葛特鲁德·库珀通通信。现在他时而同克拉克一家泡在一起,时而住在结核病疗养院里。特别是劳伦斯闭口不提结核病这字眼。凯瑟琳·卡斯威尔指出,至少在他拒绝归结自己苦难这点上,他类似于基督教科学家们。他告诉葛特鲁德·库珀不要“消沉忧愁,我们活着时该耍耍玩玩,死了,快活也随之消

失。”

在写于 1926 年至 1927 年之冬的其他信中，他为布雷特在牧场孤零零地而感到忧虑。吩咐年轻的霍克夫妇照看他，替她排忧解难，包括经济上的问题。梅宝·洛汉不能让劳伦斯白白地耽搁过去：她写信请他来她原来伪佛罗伦萨克罗尼亚别墅走走，相帮将她的书航运到美国。他回信说，在他走进这阴森森封闭的坟地之前，他须等到天气暖和些再动身。但那年冬天他果真同奥利欧利去了那儿，奥利欧利随之而起的回报是让洛汉夫人的一位朋友管他叫小偷。

也就在这一时候，劳伦斯与诺曼·道格拉斯言归于好。据阿尔丁顿说，一天，当劳伦斯和弗丽达与奥利欧利在劳伦斯工作室交谈时，道格拉斯跨了进来。一阵紧张的沉默之后，道格拉斯作了友好的表示，递给他的鼻烟盒说：“搞撮鼻烟，亲爱的。”劳伦斯接过说，“只有诺曼和我父亲——用力吸了一下——”才给我鼻烟“——用力吸了一下——”“不稀奇吗”？阿尔丁顿说，他们的友好重新维持下去。

这当儿，劳伦斯记起了另一相识——不是朋友——约翰·高斯华绥。1927 年 2 月底，劳伦斯完成了为埃杰尔·里克华德《探究》（1928 年）所写的关于传奇小说人物的评论文章。劳伦斯从自己那时所写下的观点出发，对高斯华绥进行责难。他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说过。多数处于求爱之中的现代男子就“像一群走走嗅嗅进行交配的狗”。高斯华绥对劳伦斯来说是位生活的拒绝者。在对高斯华绥的研究中他说，弗西特的风流韵事像“狗一样”。它有着这样磁特性，“如果你尚未处于困惑之中，它就跑开了。跑得精疲力竭，便羞愧地窥视着你的肩膀”。这暗示着克利福德·恰特莱与高斯华绥作品中男主角性格的一种有趣的契合。

1927 年 2 月期间，劳伦斯得了感冒。至 3 月 22 日他感冒痊愈而去了拉维罗，顺道经过罗马，去拜访布鲁斯特夫妇。弗丽达去北部探望她母亲。劳伦斯与厄尔布鲁斯特去伊特拉斯坎城市旅行。芭蕾舞作曲家伯勒斯公爵提出要跟他们一块儿去。车子、司机、特别许可证准备就绪。而劳伦斯却说：“大家挤在一起，我简直受不了，我们两个还是走着去好。”

他指出，他和布鲁斯特现“处于对男人们来说是危险的年岁：当整个心灵节奏发生变化时，最好是认识到它是属于生理现象，然而那并非消弃生理的实在”。不少人憎恨现代生活中性的欺骗，这不全然是个人的过错，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年龄的产物。个人只得抑制着挨过这一阶段。

劳伦斯对他的佛教朋友说：“我试图将我的适中与宇宙的适中保持和谐。外表上来说，我知道我的坏脾性，让它到此为止吧。”但他坚持他的信念，“在我的每一幅画中画上你指骂的一根阴茎。我所绘的画，都是对人们被阉割了的社会灵性的冲击。”而这位男子的主旨决不是诲淫的：“我是出于明确的信念才这样做的。男性生殖器官是伟大、神圣的象征：它代表着一种深奥的已被我们所否认且仍在被否认的生命。女人们带着一种呲牙咧嘴的性的歪曲而可怕地将它否定。但耐心！耐心！人们仍可以相信。有了男性生殖器和其后的那种神秘，美感便无影无踪了。”

劳伦斯带着一种作了充分准备的心境去了伊特拉斯坎墓地。起先几天，他和布鲁斯特住在位于阿马尔菲之上的格林姆斯坦德公爵的庄园。天气寒冷，劳伦斯同两个成年的布鲁斯特孩子和长着胖乎乎脸蛋的小哈沃德蜷缩在烧着大木料的炉边。劳伦斯再给他们讲伊斯渥的故事，领着一家唱歌。带着

笑容和专意。他着手创作了耶苏受难像，画的前景是潘神和仙女。但最终他删去了耶苏受难像，保留了“异教徒”的图像。

在4月初，约化了一星期时间，他和布鲁斯特温游了劳伦斯去世后才发表的《伊特拉斯坎风光》中的其地其景。这是他第四部游记，也是最后一部，同时又是最为深奥的。他书中的解释时而被考古学家所赞赏。即使是他们中最著名的马西诺·泼罗蒂诺，也将劳伦斯的推测当作奇异的想法而铭记心中。

游览了泼巴箕利阿别墅和在罗马的收藏着许多珍贵的伊特拉斯坎文物的博物馆后，劳伦斯和布鲁斯特前往西北方向的罗马纳沿海沼泽地。他们最终参观了城市废墟和隐埋的坟地。

同情劳伦斯的布鲁斯特是这次旅行理想的伙伴：那种爱怜对自由自在、富有想象力地从事伊特拉斯坎古墓研究的劳伦斯来说既是一种激励，又是一种约束。而同时，他充分怀疑布鲁斯特是位实实在在的神秘主义者，不让自己跑得太远。一位抱怀疑态度者是受不了的。时而赞成，时而表示异议的斯文的新英格兰人布鲁斯特，确实是合适的旅游伴侣。他们去了塞利太利、西利塔维契阿、塔基利阿、沃尔西、格罗塞托和弗俄特而隆，承受了条件差旅馆、“暗中盯梢”的法西斯党和疟疾缠身的马车夫的磨难。日复一日，参观令人惊异的坟冢。

在这位矿工儿子的血统中，有着祖传的征象，在一位持着一盏灯或一根蜡烛的向导的带领下，他进入这些隐秘的地方。灯光和烛光映照着在塔基利阿用红黑黄颜料绘着舞蹈者、猪人、公牛和狮子的粉饰过的墙壁。劳伦斯喜爱伊特拉坎人，他们既是“蒙昧”的，又是开化的。他们没有虚假的文学文化，有着生殖的意识，懂得“事物永久的奇迹”。但钱欲熏心和对非凡的缝纫者崇拜的罗马人将伊特拉斯坎人毁了，把他们驱进“大腹便便·安分懒散”的罗马人”行列。在这以前，伊特拉斯坎人是古罗马精神的忠实信徒，而他们却毁在以后那些在劳伦斯看来活像现代美国人的罗马人手中。

《伊特拉斯坎风光》一书不完整。如果劳伦斯再活得长久一些的话，他会增加更多的章节。从他死后才发表的随笔汇编来看，他倒是位杰出的、富有哲人气质的作家。他参照了属于1840年著作。而1907年收入《普通丛书》出版的乔治·丹尼斯《城市与伊特鲁里亚墓地》一书。但他在考察在他们的天性中他发觉了一种真正的保存生活自然幽默欲望和具有敏锐感觉化为尘土的人们的文物的同时，他在他的描述中，展开了丰富的想象。

从劳伦斯那时起，专业学者已在伊特拉斯坎学研究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包括对伊特拉斯坎语言这一长时间难解之谜理解的突破。但那些参观过墓地尤其是塔基利阿绘画作品的人们可以看出，假如强烈地要一一列举成就的话，那么劳伦斯的贡献是卓越的。且他的著作既材料翔实，又脍炙人口。

在参观古代葬地时，劳伦斯继续精神抖擞地展开了想象。复活节前的星期天，当他看到商店橱窗里一只从蛋中孵出小白公鸡玩具时，他对布鲁斯特说，这启发了一个标题，《逃跑的公鸡——一个耶苏复活的故事》。三星期后，他从米兰特别墅给布鲁斯特写信，声称他已写就了“一个耶苏复活的故事。耶苏起来后，对一切感到十分厌恶，不能再容忍昔日那帮人，所以挣脱出来”。以后“当他康复后，他开始发现现象世界是一多少令人惊诧之地，比任何拯救和天堂都来得奇妙。幸亏他的星星，他不再需要尽‘天职’了”。劳伦斯说，他管这故事叫做《逃跑的公鸡》，联想起“那弗俄特而隆的玩具”。

这天见到那玩具后，他搭上汽车去佛罗伦萨，坐了5个钟头格格作响的

车子，夜晚抵达米兰达。弗丽达从德国回来便患上了重伤风，第二天就好了，去佛罗伦萨看她的女儿巴巴拉。巴巴拉来时带着一位英国朋友，保姆似的西蒙夫人。巴巴拉准备与她的儿子结婚。劳伦斯夫妇让西蒙夫人乘船去了弗茵哥的旅馆，而把巴巴拉带到米兰达。这年在劳伦斯看来，她姿色褪减，他感到伦敦在折磨着她。他自然也染上弗丽达的伤风，尽管问题不大。

特斯堪的春天来临了，劳伦斯写下了《伊特拉斯坎风光》随笔，这些文章在他在世时发表在杂志上。他又创作《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二稿，绘制了《摩西的发现》，画中有一群高高的紫褐色的女黑人。但他有不少来自外界的精精烦恼，其中包括梅宝·洛汉发电报来叫他回新墨西哥州。

戏剧社的头儿从伦敦来信说他们准备在5月下旬上演他的剧作《大卫》，且邀请他去北部助一臂之力。但一场疟疾的折磨，使他放弃了去“素来厌恶”的伦敦游访而同“戏剧界众狂饮一番”的打算。接着对《大卫》一些无礼的指责从伦敦传来。劳伦斯写信对布鲁斯特说，评论家们是一帮子阉人，“我要巧妙而又惊人地去踢这些没有睾丸人的屁股”。

来自外界最令人头痛的是劳伦斯在新墨西哥州结识的美国母女俩的到来。去年在英格兰他又见到她们。在他伊特拉斯坎之行的日子里，他住在她们在罗马的公寓。现在6月份，他不得不极其讨厌地领着她们在佛罗伦萨兜转。她们谈到了薄加丘，说米开朗基罗《大卫》是一位“疯子”，每位男人是“小伙子”，每位妇女是“姑娘”。“美国的白内障遮住了她们的视线：‘她们简直不能看见什么东西，你最好还是叫只狗去观赏一幅画或一座雕像。’而她们还爱挑剔”，尽管她们是“彻头彻尾的文化瞎子”，并且体现着“纯粹的返祖现象。她们被否定，否定、否定，直至化为乌有，而她们自己则是蠕动着—团神经的空洞洞的容器”。

或许回想起梅宝·洛汉急冲冲召返陶斯，劳伦斯感到，“我宁愿住在鬣狗窠而不愿住在美国。在6月9日给布鲁斯特信中提及的这些看法，是他对美国所作评价中最为尖刻的一部分。游览佛罗伦萨两位女子所放厥词早已泯灭：次年在克利斯蒂·休斯和她女儿玛丽·克利斯蒂基础上，劳伦斯撰写了一篇新闻特写，《劳拉·腓利宾》（收入《论文杂编》中）。怀着带有稍稍怜爱的厌恶，劳伦斯在特写中将那姑娘视作一位在午餐前起身喝杜松子药酒的迷人的年轻的虚无主义者。她将在40岁把自己毁了，劳伦斯这一叔伯般的告诫，证明是条令人抑郁的真理：他对杜松子酒的憎恶，比起纯粹的清教徒来要实用得多。

若干年后，劳伦斯在1929年11月给宾纳信中提到了她：“告诉克利斯蒂·休斯，我会写信给她。告诉玛丽·克利斯蒂，假如她仍结婚且不介意的话，我会送她一件结婚礼物。礼物二年后再给。等着瞧，是我英国人关于年轻人婚姻的座右铭。”

1927年6月，赫克斯利夫妇将劳伦斯接到了靠近斯培西亚、在利古里亚滨海的玛米堡。他不喜欢玛米堡这地方——“作为一种地方糟透了；公寓、死海、水母以及上百万的村庄”。赫克斯利夫妇驱车送他回佛罗伦萨后，一场大出血使他躺了好几个星期，弗丽达和农妇们看护着他。7月31日当他最终病愈可以旅行时，便写信给马克·戈特勒：

我挣扎着，感到虚弱，但还好，我有佛罗伦萨最好的医生吉利奥利教授，特斯堪医学界的头面人物。病症是慢性支气管充血，导致现在一系列支气管出血。以前我这种症状不多见。吉利奥利说，如果出血不止就麻烦了。但血

果真止住了，所以用不着担心。发作时在床上躺一天就行了，稍加注意，不要像在玛米堡那样洗海浴。我觉得他说得对。他说我们准备去山区。所以星期四晚上——上帝保佑——我们前往奥地利。在佛罗伦萨我睡眠很好，我静养不出，直至到维拉契，这样我该会全好了。我会寄地址过去的，因为我现在还不敢肯定。内出血纷纷进溅，或许能排除身体各部位的毒血。医生说，假如我觉得不对劲，就不能工作，只能躺下休息，这样的话，不必去疗养院。这我将努力去做。我没有感到不对劲地方。

告诉柯特自己找个医生，不要来打扰我。

我们见到了 J·W·N·萨利文，他同赫克斯利一家一块儿来的，人不错，就是多愁善感。我想他会相当快活的，不是一点儿。他径自回英格兰去了。

在早先几天给艾尔丝·贾菲信中，劳伦斯说他的病是由懊丧所致，积淀很深。而然后在内出血或诸如此类事情上反映出来的懊丧。”在 8 月 3 日（他去奥地利的前一天）在给一位新美国记者、心理学家特里根特·伯洛斯博士的一封信中，他重申了这一想法。不久前，劳伦斯对伯洛斯说：“折磨我的纯粹是原始的天性的挫折。”他感到其程度“远甚于性的天性——社会的压抑更能起破坏作用”。

一星期后，在自奥地利给多萝西·约克信中，劳伦斯提到弗丽达的姐姐纽奇，她现在叫弗劳·克鲁格：

通常酷旱早些日子已过去了，这年整个 7 月我患支气管炎及支气管出血症躺在床上，感到是一具可怜的标本。天气还热得可怕，3 个月不见雨水。我挣扎着了上了铁路卧车，星期五到达这里。山区凉爽，感觉很不错，但却苦于支气管炎缠身。弗丽达妹妹与她的丈夫住在离这儿 6 英里开外的奥西亚车西，弗丽达刚好去那儿游泳。这天是她的生日，我将出去吃午饭。我不能游泳或洗浴，甚至不能跑得很远，真使人感到难受。但住在小镇这加斯特豪斯大旅馆中，也使人心旷神怡。所有蒂罗尔山区的人都得经过。吃的东西确实不错。我喜欢维拉契这块小小的德国旧地和美妙充盈、默默迅速地流逝着的德拉瓦河。

我想我将要住到 24 日（8 月），然后转到北部。我们该在巴伐利亚度过 9 月。

快到月底，劳伦斯再次拜访了弗丽达在厄斯金豪森的另一位姐姐（“依然还是座落在森林角落谧静、舒适的木质小房屋”）在那儿，劳伦斯在松树间散步，玩玩单人纸牌游戏，偶然翻译弗尔夏的《乡村骑士》：“当我有事情做时，我就觉得愉快——我做了好多事情。”

与往常一样，不断有人来访，其中包括一位 30 开外、既是医生又是剧作家、说一口流利英语而起先在英格兰作为战俘的男子麦克斯·莫尔。劳伦斯初次印象是，莫尔虽然“人不错，有趣”，但却是位穷途末路、不能再埋头探究未知之事的丧魂落魄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劳伦斯对莫尔另眼相看，或许因为他最终感到他初次的判断是错误的。

莫尔确实是位勇于探索者。劳伦斯去世后几年，身为犹太人的莫尔离开纳粹德国来到上海，开始了新的生涯。仅过了几年，便死于心脏病。他给托马斯·曼写了一封信说：“去年，我口袋里带了 10 美金来到这儿。我拥有器具、医疗训练术、几张被我抛在德国的家人的照片、劳伦斯的信件和同德国一刀两断的自豪感。”

它是对莫尔回忆的赞美，他是为数不多医生中得到劳伦斯青睐的其中之一

一。另一位是搞文学的，劳伦斯在同一季节所碰见的：汉斯·卡罗萨，巴伐利亚诗人，一位结核病专家。他是与《坛底》和《简言》杂志编辑弗朗兹·晓恩伯纳一起来到厄斯金豪森的。

晓恩伯纳在他的《一位欧洲知识分子的忏悔》中，对卡罗萨的观访和他自己同劳伦斯的友情生动地作了描述。晓恩伯纳是随跟其后另一位非犹太人而自愿离开他所憎恶的纳粹国家者。卡罗萨继续留在那儿。晓恩伯纳以后表示，劳伦斯的著作应该成为教科书。这是饶有趣味地与那些将劳伦斯看作是一位法西斯主义者人的看法截然不同。晓恩伯纳能辨别一种反理性观念同一种法西斯主义信仰之间的区分。作为德国一流编辑的一分子，晓恩伯纳密切注视着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整体发展、纳粹分子在内部的渗透以及德国出版界的最终支配地位。他还仔细研究起劳伦斯和他的作品，因而在这方面证明他是位专家。

当晓恩伯纳问劳伦斯是否他能带卡罗萨来检查他身体时，劳伦斯说，假如一位法人兼医生不能治他病的话，那么谁能治呢？大脸盘、眼神和蔼，被劳伦斯认为“温顺得像捣烂了的马铃薯泥”的卡罗萨来到艾尔丝·贾菲家里，“给我听诊肺部呼吸道。他未能听出肺部什么毛病来，认为它肯定痊愈了，不过是支气管炎，而医生对支气管炎是不在意的。但他说不要过多吸入热空气，它会使内出血复发。”10月7日，劳伦斯从巴登—巴登写信把这些告诉给艾尔丝·贾菲，他同弗丽达三天前已到达那儿。寡妇艾尔丝现在成了麦克思·韦伯哥哥阿尔弗雷德的情妇。

从10月12日他给奥利欧利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接受卡罗萨的劝告是多么认真：“我正在做吸气疗法，每天早晨同其他鬼灵般身影一起，披着一件白色披风，戴着头罩，在迷迷糊糊的蒸雾中坐上1个小时。这对医治我的支气管病有益。”

卡罗萨在贾菲家里给劳伦斯检查身体后，他同晓恩伯纳穿过树林、原野，来到依金小小的车站。晓恩伯纳问起他对劳伦斯健康状况的看法，卡罗萨说，劳伦斯的肺病早已把一位普通人送上天堂，但作为一位艺术家，他包蕴了超越纯肉体的力量，不可能作出正常的预言。他估计劳伦斯能活三至三年以上时间：“病确实没法治了。”正如晓恩伯纳所注意到的，这是“残酷的正确结论”。

离开厄斯金豪森一星期前，劳伦斯向奥利欧利表示：“我十分喜欢这地方，既宁静又空寂。但现在渐渐有点寒冷和潮湿，有时下倾盆大雨，而我们觉得自己活像漆黑海底中两条孤零零、懒洋洋的鱼儿。”弗丽达渴望去意大利，“但我为某些原因还是很喜欢这儿：它使我睡眠充足，我想那是一个人在这世上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了”。但到了10月14日，他自巴登—巴登写信给奥利欧利：“这儿天气始多雾寒冷，尽管不十分冷，不过是冷森森的。我们两个将马上愉快地回米兰去，重新沐浴真正的阳光。”他想回来是为了绘制一幅成竹在胸的画，或许就是他10月21日回米兰特后给布鲁斯特信中所提及的那幅画：“我可能着手创作一幅亚当和夏娃用苹果抛击上帝、将他逐出天堂的画。”对凶暴的《旧约全书》中的耶和华是又一打击。这一想法后来在水彩画《将苹果往后掷》中体现出来。

但一回到米兰达，劳伦斯就又不得安宁，突然写信给数年前的老朋友坎贝尔夫妇（戈登·坎贝尔已成为格兰纳维的公爵，现住在都柏林郊外）：

旧音萦绕！柯特说比阿特丽斯在伦敦。不知怎么地，近来我总是想爱尔

兰（戈登仍然在声音中带着几加仑眼泪说“阿尔兰”吗？）

我们刚从德国回到这儿。我怀疑我确实对意大利和意大利人感到有点儿厌烦，明年我想尝试下做放纵的爱尔兰人的滋味。你以为我会吗？你以为弗丽达和我会在爱尔兰过上一年，租一套附近波涛汹涌和有褐色沼泽之类、布置一新的小房子吗？你觉得我们会吗？这合适行得通吗？其地偶然不下雨。当然，在我的心目中，爱尔兰就像水族池底，藏在里面冷僻角落寥寥无几的几个人像对虾似的。但我有种预感，比起这特斯堪来，它对我来说更意味着什么。

劳伦斯觉得坎贝尔夫妇的答复“小心谨慎，但又鼓舞人心”。坎贝尔已声望赫然，成为一名政府官员和银行董事。劳伦斯向他提出的想法可能与利特文诺夫一家去俄罗斯观光的相似建议同样吓人。但劳伦斯在作出进一步打算去爱尔兰之前，他发觉在佛罗伦萨的一些事缠住了他：出版《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计划。11月17日，自从回到米兰达后他第一次去了镇上，而在佛罗伦萨见到了一位一度是潜在的信徒、伦敦西区贵族住宅区的迈克尔·阿伦（“他太懊丧了，不顾他所赚到的钱，而显出一副消沉的神情，是条十足足的、试图洋洋自得的丧家之犬”），劳伦斯曾将他请至米兰达。但几天后，他写信给奥利欧利，请叫他儿子卡罗·扎诺蒂告诫阿伦不要出来。与此同时，进行了《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出版协商：

让卡诺蒂信给迈克尔·阿伦你不会介意吧。我不知道他的博戈圣吉罗吉俄的住址，请叫卡诺蒂等个回音。迈克尔·阿伦他星期三出来，而今天弗丽达患了伤风躺在床上，迈克尔·阿伦害怕得感冒，所以我得警告他。威尔金森他们晚上在佛罗伦萨，明天将有信来。

我正在严肃慎重地考虑在佛罗伦萨出版我小说之事，我已写信给我小说的代理商，不过你得帮我一把。

你愿意吗？我不久来跟你商谈此事。

阿伦来看你了吗？我相信他感到孤寂和伤感。

奥利欧利受诱成了劳伦斯的出版商——不完全是位出版商，但不管怎样，却是位这一项目合适的办事员。劳伦斯去世后几年，奥利欧利在他《一位书商历险记》中对自己成为劳伦斯供差遣的僮仆和准出版商而频繁地去米兰达显得怨气冲冲：不说这是劳伦斯的“黄金时刻”，而奥利欧利每去二次，得损失半天时间。而劳伦斯同奥利欧利谈妥了一项精明的庄稼人的协议，即提取该书利润百分之九十。（阿尔丁顿在他论述道格拉斯和奥利欧利的著作《皮诺曼》中（1954年）中认为这些说法不能反映出奥利欧利对劳伦斯态度的真相，这是一种赞美的爱。它们被道格拉斯写入奥利欧利的书中。

圣诞节后不久，劳伦斯完成了《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最后修订稿。卡斯威尔夫妇邀请劳伦斯去哈尔茨山区同他们一起过圣诞节期。他们那儿的旅馆老板是欣赏劳伦斯作品的肺部专家。但劳伦斯觉得德国“太远”。在米兰达，“17位庄稼汉在林中快乐地歌唱”。弗丽达安排一位农夫的孩子达罗·班达利在佛罗伦萨一家医院接受破裂手术。待他出院后，小男孩跟他姐姐们谈起那儿抽水马桶之事无意中被弗丽达听到：“这玩意儿你要拉，你得拉，懂吗？”

1月6日，劳伦斯告诉布雷特，他只有一章多点要改写。到了10日，他写信对卡斯威尔夫人，他已完成小说的全稿：

我想得知你在何处，是否在哈兹堡。我需要一点儿帮助。去年冬天，我

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三易其稿，最后的说明从它的总体意思上来看，字面上十分不妥当，但确实合乎道德。佛罗伦萨的一位妇女说，她愿打印小说，她打印了五章，现在撒手不干了，说小说太淫秽了。臭娘们！你能物色几个支付一般报酬替我打字的合适的人吗？你行的，我知道，若你空暇的话。可你挺忙。所以你考虑几个可靠的人，男女都行，只要我信得过，不要中途撒手。他们会得到适当报酬的。望马上给我回信，但不要寄到这儿。我想我们星期六或星期一去瑞士观赏雪景。这儿如此潮湿。你可寄封短信过来，通过阿尔多斯·赫克斯利转给我，他在瑞士的列黛亚市勒列兹。我们打算入他们的伙。搞套他们考虑之中的小公寓：或许要住到2月底。我真想努力将我的身子养得好些，咳嗽仍使人烦恼。我要重新牢牢地抓住生命。以上6个月穷困潦倒。

然后我想三、四月份在佛罗伦萨出我长篇小说的私版，数量1000册，每册二畿尼，这样上帝保佑的话，可挣1000英镑，缓解下手头的拮据。我将小说取名为《温柔》。

请不要告知任何人，我不想臭名远扬。

如原先所知，带着小说“震撼人心”的字眼的疗术，劳伦斯让自己融会于《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之中。在后来两次论述中（全本诗集《三色紫罗兰》绪言与随笔《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设想），劳伦斯提到斯威夫特的诗歌《写给一位太太的化妆室》对他说来已成为一种“一向对身体和身体潜能屈膝害怕”的心灵的象征……像斯威夫特这样一种伟大心灵的错乱，至少部分地可归结于这一原因。他在给女主人西莉亚诗中有着疯狂的迭句，“但，西莉亚，西莉亚，西莉亚的屙屎了”（韵脚是啐词）。我们看看，当一颗伟大的心灵处于惊慌失措时会是什么样子，……当然是西莉亚屙屎了！谁不这样？如果不这样会多么糟糕”——劳伦斯在《设想》中写道。

而这位憎恶“色情小说”的清教徒直言不讳地表示，为了小说自身缘故，他不提倡猥亵肮脏的描写。在以后随笔《色情文学与诲淫》的论述中，劳伦斯对“人身体中的性功能与排泄功能”作了细致的区分“前者代表着创造流而后者其“流趋向消融”。并且：“在真正健康者身上，两者的区分是瞬息的，……而在退化者身上，深处的本能消失了，于是两者合为一体。”劳伦斯没有回避消融的事实，而是敢于正视它，于是在他大部分作品中，他赞美另一种“流”创造的、热烈的、壮伟的生命之歌。

这看上去似乎与《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章节相抵触，小说章节中情人由于自然冲动的缘故而赞美心上人，但劳伦斯实际上是在答复斯威夫特；进一步来看，他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再次表述了对消融的看法，“两股流”不应“合为一体”，即使它们共存着，因为其中一流必要摆脱矛盾体而成为创造流。

正如他早先给伯特伦·拉塞尔信中所说的，劳伦斯还在《设想》中，抨击带着维多利亚式热情的手淫行为，尽管近来研究发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代表作家们并没有他们日常看上去那么“纯洁”，举个例子说，他们中的重要人物之一W·E·格莱斯顿被披露出来是位习惯手淫者。

劳伦斯《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第三稿显得最为特别。这儿我们需要讲点本末经过。1944年，劳伦斯死后14年，《第一夫人查特莱》在美国出版，并且跟书审官打赢了官司。但它在饱经风霜的劳伦斯崇拜者中，没能赢得众多赞赏者，尽管他们中某些人感到小猎场看守人帕金是位逗人可爱的形象。1973年，在最后修订稿在美国、英格兰出版并且还打赢了官司的13年后，

劳伦斯在伦敦和纽约的出版商推出了小说第二稿。他们取题《约翰·托马斯与珍妮夫人》，没有人提出反对。小说中的猎场看守人仍叫帕金，不过比起一稿中的帕金，形象更显得富有人情味。这一修订稿中康斯坦斯·查特莱比第一、第三稿中的形象更热烈、温柔。这些特点，加上时常所见的绚丽的文笔，使得我们中某些跟着劳伦斯命运跑的人得出《约翰·托马斯与珍妮夫人》是查特莱小说中最杰出一部的结论。

在一著名的章节中，劳伦斯作了不同于运用在长篇小说《袋鼠》中一种航海象征的修改。《袋鼠》将男女主人公视作运驶着的两条敌对的船。在《约翰·托马斯与珍妮夫人》中当康妮考虑她同帕金结婚时，她把婚姻看作两条船。假如我们将它们紧缚在一起，并排地缚绑在一起，那么“第一场风暴就会将其砸得粉碎。那就是在现代文明恶劣气候情况下的婚姻。但将两船分开，各自凭借着自己的技巧和动力而驶向同一港口，一种无形的生命联结着它们，那婚姻将会如此……

就在劳伦斯与弗丽达随同赫克斯利一家去瑞士列黛亚布勒列兹之地而沐浴着完成《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最后修订稿的余辉时，2月3日，他给都柏林的格兰纳维夫人去了一封信。带着他可能在那儿制造骚乱的情绪，信中震撼人心的字眼或许没有像他去都柏林观访的威吓那么骇人听闻。他告诉坎贝尔夫妇：“我知道我写的小说，字面上对任何出版商来说，太令人吃惊了，纷纷斥之胡说！混账！……

来信收悉。由于我该死的确实害了一船人的支气管病，二星期前我们就来到这儿。甚至连医生都说，这是高度和雪地反应的结果。下雪对支气管病不利，会使其恶化：虽然自托斯卡尼之后，海拔降低了，我感觉轻松了一些。瞧，那是我的哀嚎：咳嗽、气喘，声音听上去可能比我原来更糟糕。我希望我们在这儿住到月底，然后返回米兰达振作一下。这儿白雪皑皑，一定量的冬季运动没有一项适合于我。现在又下雪了，雪撬声丁当作响。我坐在床上，脚上盖着一条德国羽毛垫枕。弗丽达躺在她的床上，读着安德雷·格埃德的《科里登》这是一部消沉的短小作品：白色的崩溃的世界悄然无声。我们在这农舍区租了一套公寓……

我真想去爱尔兰看看你们大家，还有利埃姆·欧弗英赫蒂。还想去都柏林，去西部。我希望天不要老是下雨。我不愿参与政治而遭到枪击或逮捕。但我想去。我想4月将回米兰达养息一番，那部小说多少出自我的手。不知怎地，我对爱尔兰根本产生不了印象，更谈不上厄瓜多尔或满洲了。但我认为，一个确实不存在和不再宣称其不存在的国家如意大利，定是颇慰藉人心的。从地区性而言，如你所说的，任何地方都不是这样。假如一个人在爱尔兰画了裸体画——不是（奥古斯塔斯）·约翰用粘稠的泥灰搞起来的那种，我们会被扔进城堡地牢里去吗？警察们穿着橙色裤子、戴着鹅毛吗？不，警察裤子的颜色是绿色和粉红色的。而钱用玻璃制成的吗？所有汽车依照法令规定而均为淡粉红色吗？所有街道角落均有一名仪式上用的竖琴师，门前到处都传诵着诗歌，铺嵌着小巧白色卵石的人行道上也遍地是诗。带着如孔雀石一样的闪闪发光金护肩和双刃佩刀而趾高气扬的绅士们，逼着每位百姓在他通过之前必须用盖耳语发六个单词音。那是我异想天开，所以不要令我失望。在某些街上不准行走，而只能跳着快步舞从一头跳到另一头。夜间挺着酥胸行走的女士们，用项圈上很小的电灯照路。修女们服饰是红色的，传教士们是柠檬色的。哦，爱尔兰！戈登披着一张豹子皮。

几天后即2月6日，劳伦斯自黛亚布勒列兹写信给奥利欧利，提到了赫克斯利夫人的妹妹罗丝·尼斯（没几年，她跟比利时诗人埃里克·德豪勒维尔结了婚）：

我以为此地确实对我有利，我真的感到强健了些。不错，我不喜欢雪，它白得恶劣，使人感到脚冷，但有时雪是美丽的。昨天，我们同阿尔德斯、玛丽亚·罗丝、朱利安·赫克斯利、阿尔德斯的哥哥和他的妻子朱丽叶乘着雪橇去关口顶部野餐。阳光灿烂，万物辉煌，很称我心，它将生命溶为一体。

我正从伦敦取回小说的打印稿，玛丽亚正在打印第二部分。所以我想两星期里将小说打印完毕寄给你。我将让赛克和阿尔弗雷德出个结本，然后我们可以着手在佛罗伦萨出私版，我决意这么干。我希望你仍能助我一臂之力。我想在二星期左右时间里把小说寄给你而交付于印刷商。

早先劳伦斯已对奥利欧利说过“玛丽亚将打印小说中‘最糟糕’的一小部分”！但她在瑞士的嫂嫂朱丽叶却“一本正经地”对此书感到“非常生气”，颇为粗鲁地建议劳伦斯取题《约翰·托马斯与珍妮夫人》。不久，劳伦斯在第三稿中这么做了。他写信告诉梅宝·洛汉：“你或许知道，约翰·托马斯是阴茎别名之一。”

其时劳伦斯为集成版收集、修改他的诗歌，而在1928年秋季出版。在离开米兰达之前，他已开始收集工作：“我一点一滴、挖空心思地收集，尽力使我昔日之作公之于世。”9月，他告诉赫克斯利，1月在瑞士对诗歌作了进一步修改。

2月，麦克斯·莫尔同罗尔夫·加德纳来列·黛亚布勒列兹拜访。劳伦斯跟保持了几年通信关系加德纳谈起改良问题。加德纳在他和他年轻伙伴旅行宿营的多赛特办了戈尔农场，听上去吸引人。莫尔说，人人都该有归宿。劳伦斯告诉加德纳这位令人愉快、朝气蓬勃、友好、皮肤白皙的盎格鲁撒克逊年轻人说：“或许我准备回到原来的英格兰去。”

与此同时，卡斯威尔夫人来到原来的英格兰，不顾感冒缠身，熬夜完成了她所承担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几个片断的打字工作。而这劳伦斯在信中为之忧心忡忡，诸如他2月28日给她信中所说的：“明天是2月最后一天，小说不在这儿，人们拍电报来为之大惊小怪，……”他写信给几天前去了巴登—巴登的弗丽达，不领情面地说他“仍在等待那个女人的最后几章”。3月2日，完整的原稿来了。那天是他完成《虹》长篇小说周年的日子，离他去世日子恰好还有两年。

3月3日，他在给奥利欧利的信中说，下星期二他将在米兰同弗丽达碰面，想在星期三晚上一同抵达佛罗伦萨：“小说最终打字完毕，我或在星期天邮寄给你，或携带在自己身边。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动手了。……”

（三）同“无知的书审官”的交锋

离开列黛亚布勒列兹，劳伦斯给罗尔夫·加德纳写信：“好了，在意大利一段时间内，可以将法西斯主义置之脑后。但不久后，同生活相抵触的虚假能力意识的形成是非常令人沮丧的。除采取不正常的分离术外，是逃不脱的。”因为想在那儿出版他的小说，又因为弗丽达急于想回来，于是他回到佛罗伦萨。

到米兰达没几天，劳伦斯创作了他后期第一幅水彩画《火舞》：“两位赤身裸体的男子我认为太拘泥，不很‘自然’。”几星期后，他写信告诉赫克斯利：“我绘了幅一男子撒尿的极妙的画，我相信玛丽亚会挑中这幅的，简称《蒲公英》。现在我在创作一幅小型油画，称作《萨宾妇女的受侮》，或叫作《屁股的研究》。”他提到了另外若干幅近作：《打呵欠》、《蜥蜴》和《干草堆下》。所有这些都在来年展览之列，但《蒲公英》未参加展出。

至于前些时候，他除了写信外，很少写作。去年1927年是他创作贫瘠的一年，仅仅出了《墨西哥的早晨》一本书。现在出版《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占据了他大部分兴趣。一位崭新的劳伦斯出现了：“为了在余生中过上好日子，劳伦斯变成了商人。

这暗示着一种冲突，因为假如一个人憎恨差不多他所从事的机械化的商业文明，他必定也憎恨它的财富的象征。但他身上有着俭朴的宗教与起兴资本主义合为一体的新教中产阶级的特性。1928年，他曾向布鲁斯特喝道：“富裕是你的职责。”同年，他写信给多萝西·布雷特说：“节俭些，把你的债务还清，它挺烦人的。”布鲁斯特披露——这看起来令人难以相信，劳伦斯甚至买过美国的股票。但或许如《圣经》一章经文所说的，爱钱而不是爱对他来说是万恶之源的钱的本身。劳伦斯商业性的一面督视着他小说出版的大部分经济细目。已写好他哥哥伯特向哈伍德请求的第一封商业信件的内斯特·劳伦斯在他自身的从商生涯中，没有干出什么比年长的伯特所备下的收据更具有职业性商业化的事情了（他亲笔所写的原件仍保存着）：

奥利欧利先生对你附寄订购《查特莱夫人的情人》

支票一事表示感谢。书准备好了，将立即用挂号寄出。

（隆加诺卡西尼6号，佛罗伦萨。）

奥利欧利将它印了一下。到了4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大量汇单寄来订购小说的初版。碰上这些事情，这一春季劳伦斯忙个不停，来米兰达的拜访者接踵而至。劳伦斯同新老朋友的关系活跃。在新朋友中，劳伦斯结识了哈里·克罗斯比夫妇。劳伦斯同哈里·克罗斯比这位思想开明的波士顿小伙子和他那位活泼、才华横溢的妻子卡莱斯从未见过面，不过他喜欢克罗斯比的诗，这些诗还是在他有姻亲关系的叔叔J·P·摩根所属的银行办公室里当职员时他妻子教他写的。劳伦斯还欣赏黑太阳出版社这家克罗斯比夫妇在巴黎创办的出版社的名字：《瓢虫》中的康恩特·狄奥尼斯不是说太阳在其闪闪发光的护套中确实是漆黑的吗？

克罗斯比俩口子准备买下劳伦斯的手稿，并且当他们听说他的小说《太阳》1926年在伦敦印刷而准备收入小说集《骑马出走的女人》中而且还是未删节的修订稿时，他们准备将它出版发行。以后他们出版了《逃跑的公鸡》，而劳伦斯去世后，他在英国和美国的出版商们将小说的题目缩成《死者》加以发行。

克罗斯比俩口子送给劳伦斯几枚金币连同一只那不勒斯皇后的鼻烟盒作为报偿。他们获得这些金币得到了爱德华·威克斯的帮助。他在他早先《太平洋月刊》工作期间，是他们美国的代理人。硬币藏在年轻的威克斯的一位名叫赛克斯朋友的鞋子里面而进入法国，而克罗斯比的女仆在一次晚上戏剧性地宣布赛克斯为“性感先生”。哈里·克罗斯比想快点将金币交给劳伦斯，所以他送他们匆匆赶到了东部车站。恰在开往意大利列车启动之前他赶到了。他把这装着金鹰钱币的盒子塞给一位看上去忠实可靠的旅游者（“不是炸弹，不过是给一位诗人的金子”），恳求他在佛罗伦萨汇寄。当列车驶动时，那位陌生人仅仅来得及介绍下他是阿盖尔的公爵。在佛罗伦萨，一位铁路部门的“无赖”最终把盒子交给奥利欧利时，便进行敲榨勒索。而劳伦斯欣赏这“宝贝”：尽管没有劳伦斯式的风格并带点20年代的样子，但那只镀金的鹰示意了他的象征物。但因为他觉得克罗斯比夫妇“没有到了成为富翁的地步”，故为之担忧。

此时，劳伦斯试图去安抚一位老朋友，她偶然听到了一些该是他对她作出的令人不愉快的议论。这些话已经过当时在伦敦的玛丽亚·赫克斯利和赫克斯利夫妇的朋友伊冯·弗朗契蒂而传入凯瑟琳·卡斯威尔耳里；劳伦斯向卡斯威尔夫人解释说，尽管赫克斯利夫人“确实非常正派”，但伦敦使她紧张不安。

在4月22日的一封信中，劳伦斯声称他“从未说过作者什么多余的话：那个该死的凯瑟琳没有给我打过任何字等等。但一切都不是恶意的，为何我竟会这样呢”？并且说：“人觉得不应有‘朋友’，他们给一个人带来这么多损害；的确他们不是故意想这样做，但不由自主。”

那年春天，劳伦斯还写信宽慰威特·宾纳，因为劳伦斯在《癫狂的毒蛇》中，把欧文·里斯作为一面镜子显示给他看，显然是冒犯了。劳伦斯对他说，他现在相信“男主人公过时了，领导者退居末位。最终，男主人公的背后是富有挑战性的典范，也是一位冷血的家伙。”他赞成宾纳的说法，“领导者与跟随者的关系令人头痛。男人与男人和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新颖关系将变得有些微妙·敏感，而不是一起一落的关系，或步入后尘、你前我后的关系。所以你瞧，我最终变成了只羔羊”。

他并未真的变成羔羊，但他已舍弃了在他第三创作阶段占据如此众多的支配地位的领导典范。他运用虚构手法，把在那封信中跟宾纳所说的应用到《逃跑的公鸡》中去，他使起死回生的男子放弃了预言。

1928年春季，来米兰达造访者当中有年轻的美国出版商贝内特·瑟夫，他同道格拉斯一起从佛罗伦萨赶来。途中，道格拉斯就世人对同性恋的“愚蠢态度”横加挑剔、对购买“古玩赝品”而不愿私下印刷道格拉斯著作的美国旅游者吹毛求疵，还对劳伦斯和弗丽达评头品足。但到了米兰达，他却热情地同劳伦斯打招呼。但当瑟夫单独跟劳伦斯呆上一会儿时，劳伦斯严厉地责问他怎么敢把道格拉斯这样的人带来，而他们还是快活地问候道格拉斯。

另一位来访者是罗尔夫·加德纳的姐姐玛格丽特。她回想起来有两位已是昨日黄花的老处女（或许是贝弗里奇和哈里森小姐）曾一起同她和劳伦斯吃茶点。那两位劳伦斯私下管她们叫圣母玛利亚的老处女显然对他的画品提出过非难。她们看上去就象薄伽丘《十日谈》（第三天故事一）插图中的修女和柔软的树枝。可是当她们看见一位赤裸的腹部上垂耷着性器官而入睡的园丁时，她们退缩避开了：“为什么你要把他画进去？”笑嘻嘻的劳伦斯接

着展出了《撒尿精》（《蒲公英》），尽管年轻的加德纳姑娘忽视了这点，而年长的妇女却没有：“是的啊，劳伦斯；你走得太远了。”

玛格丽特·加德纳进一步回想起（在一篇《见到大师》的文章中），等到两位圣母玛利亚离去后，劳伦斯出示给她与美国《论坛》杂志通信的片断，读者们的羽毛已被发表在刊物上的《逃跑的公鸡》的第一部分所弄皱：“不适合于阅读了，我可爱的小说！哦，他们肮脏、卑鄙、冷漠的小心眼儿！”

当布鲁斯特一家5月份来到佛罗伦萨时，他们吃惊地发觉劳伦斯比13个月前要“孱弱得多”。“我们突然感到他病得不轻”，布鲁斯特夫人回忆道，“并且感到我们不应把我们同他在一起的时间拖延到将来，而应攫住一天天过去的时间”。布鲁斯特夫妇没有采纳劳伦斯俩口子去米兰达的建议，而决定在6月陪伴他们去瑞士。

动身前三天，6月7日，劳伦斯写信给奥利欧利：“这儿所有的单子都签了字，编号到一千。另外10张签了字而未编号，以防万一出问题，将它们分开，10张是空白单。全部搞好了，真高兴。”

现在他可以离开了，《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也进入了尾声。布鲁斯特夫妇回忆起一次往北的愉快的列车旅行，他们全独自在一间列车分隔间里唱着穆迪和珊基复活赞歌，然后在都灵呆了一天，在法国呆了几天。他们对住在尼兹街而感到扫兴，因为房东对布鲁斯特夫妇说，法令规定不许他出租房子给那位咳嗽了一整夜的先生住。布鲁斯特夫妇和弗丽达感到恼火。劳伦斯则一定知道他们为何突然间全都离开，这我们从他们都在瑞士谢普利的格昂旅馆安顿下来后他在夏至那天写给奥利欧利的信中可以看出：

我们和布鲁斯特一家子住在这家大旅馆，照顾得很周全，9个法郎一天，包括茶点。其地在乐勒曼之上一侧约两千英尺开外。我们总算安排顺当了点。如果你回英格兰而取道于此，在洛桑下来看看我们。旅馆在韦维上头，离洛桑相当近。尼兹街那地方很粗俗，因为我咳嗽，那些蛮横的法国人竟要求我们离开，他们扬言不能接受任何咳嗽者。我感到很生气。这儿还可以，就是阴暗了些，但舒适；冷得发抖、不舒适，对人没有好处。布鲁斯一家子也在这儿。弗丽达去巴登—巴登过一周，阿尔德斯打电报来说他同玛丽亚将在下星期二、三从巴黎赶来入我们的伙。所以正如布鲁斯特夫妇所说的，我们并不冷清。他们挺好，照顾我很周到。我应该赶紧长胖些，比你或者弗丽达都胖。顺便说一句，待玛丽亚来时，务必给她一本《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假如一位查尔斯·威尔逊男士来函索的话，寄给他一本，我认识他。我急切想得知贵夫人做些什么，你为她做些什么。大家纷纷来信想了解什么时候他们将能拿到小说。不知怎么地，我一天天感到小说寄至英格兰安全：美国版寄过去已一星期了。你一旦开始发送，勇往直前，直至什么事情把你羁绊住。我非常急于想知你那里情况怎样。要是我能呆下去把东西寄送出来该有多好。

一星期后，他的首批小说来了，劳伦斯感到高兴。他写信给奥利欧利：“《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今天早晨寄到了，我们激动万分，人人觉得装帧漂亮。”劳伦斯觉得它是“一本美观而又庄严的书；样子和比例也不错，我非常喜欢这种赤褐色，并且我想我的长生鸟恰好就是封面上右边的鸟。现在让我们希望她既快又安全地找到路子，到达所有的目的地。”

关于这本书，劳伦斯不断地给奥利欧利写信。在谢普利的三星期里，劳伦斯寄给他的信件和明信片多于12张，不光商谈《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一书，

还谈到他的画；沃伦美术馆打算将这些画在伦敦展出。新近一次到佛罗伦萨观光后，伊妮德·希尔顿带了一部分画去了英格兰。现在劳伦斯跟奥利欧利商谈余下这批画包装航运的问题。

他在谢普利写了更多的信：他《论文杂编》中的《漫不经心》一篇，对那儿的生活和活泼的一位小巧的英国妇女作了生动的简述。当他下午坐在旅馆阳台上俯瞰“神奇、明净的湖面”和山脚下刈割庄稼的男人们时，她心事重重，搅得他心神不宁。而他那位“小巧玲珑而过于认真、同他呆在同一阳台的邻伴却喋喋不休地谈她”对法西斯主义或国际同盟或法国是否正确、婚姻是否遭到威胁的忙碌的关注，这破坏了他的心绪。正如他在《逃跑的公鸡》中一位预言家一样，他想放弃预言（“我的任务完了，我的教授结束了”）：现在他需要的是漫不经心。

当他迁移到较高的在阿尔卑斯山区的格什塔德格斯苔格时，他感到更加自由自在。他和弗丽达在克索曼特租下了一所牧人农舍，他邀请布鲁斯特一家子来，尽管他感到阿克莎可能会发现这样的膳宿条件“太乡气、粗俗”：她“简直不是位住农舍者”。不过他的其地“有点世界末日大审判的”气氛的说法吸引了布鲁斯特一家，他们来到了附近一家旅馆。在格斯苔格为滑稽和马丁尼酒所披靡而成为如以后一本用松散的美语所写的导游书的隐语所说的“伯尼斯·奥伯兰的最美丽的胜地”之前，这就是时常出现在报纸上的一种神秘称号的名字，主要是由于它出名的门徒所作的大吵大闹的嬉戏所造成的。

7月20日，劳伦斯写信给伊妮德·希尔顿：

很高兴接到你的来信、对你的乔迁感到欣喜。我告诉过你了吗？我相信那正是我们1917年住在二楼阿尔丁顿家里的房子。正面阿拉贝拉在房顶有个阁楼，很舒服，我很喜欢。我希望你能平平安安地住在那里。

有点遗憾的是，你这么轻率地将画交给了多萝西·沃伦的使差，我不完全信她，我从前了解她，她是奥托琳娜夫人的侄女，她没有给我回过信。现在米兰达的画大件已经带给她了。假如我从她那里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我将叫你转交封信给她，你可以把她那里的小件画品要回来。然后我们将在某些程度上控制住她。我已告诉了她，我可能这么做。

九天后，劳伦斯再度写信给伊妮德·希尔顿，说他越来越窘迫了，需要她帮忙：“一家卑劣的书籍出口商行订购了80本《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现在表明，他们有个美以美会教徒团体，他们已经读过小说，当奥利欧利从佛罗伦萨寄去了72本小说后，他们仓促地取消了订购。现在除非我们赶快行动，否则他们将会把小说寄回至佛罗伦萨，甚至可能拒绝从邮递员手里接受寄品。”劳伦斯告诫希尔顿夫人，书“处于危险状态”，请她征得她丈夫的同意，为这些书造访一下威廉·杰克逊公司。

他要求她将书带到她麦克兰堡广场公寓，从那儿将它们寄给已把付款的汇单寄到佛罗伦萨奥利欧利处的订购者，以后劳伦斯其他朋友如柯特连斯基（对严峻的考验感到忐忑不安）阿尔丁顿和布莱特·帕特莫尔（《阿伦的杆杖》中的克拉理斯·布朗宁）的儿子德雷克通过这办法来帮助他；在他们的城里住所或乡村别墅接收这些书，根据来自佛罗伦萨的旨意，而将它们航运出去。这样考虑到初版印刷的要求不过分的本子的数量，《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在英格兰作出了比较广泛而有效的传播。

弗丽达在一个星期二，或许是7月31日，从格斯苔格写信给阿尔丁顿说，

“你对《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有欣赏眼力的信恰好这一时候到了，劳伦斯躺在床上，看上去更加愤懑，每分钟更加愤懑——人们看起来对它极度厌恶！可我却感到高兴”！她谈到了一些他们生活的现状（“劳伦斯确实好些了”），还说：“你的信是第一次令人愉快的信，这样的信大约仅有四封。”对此劳伦斯补充道：“其余剩下的有一些是冷冰冰的非难的弹丸，而大部分则是冷若冰霜的沉默。哦，我真高兴丢失了我朋友们的废渣！特别是老处女之类的东西。”注意到奥托琳娜·莫瑞尔夫人现在再次站到劳伦斯这一边是桩有趣的事情：那年他们之间的友谊已较早地复苏了。劳伦斯写信给戈特勒，认为奥托琳娜夫人毕竟是；一位众多妇女中的皇后”。

或许《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工作进行得这么艰苦（从7月至9月，劳伦斯单独给奥利欧利写了20封信），他的身体在衰垮，尽管所有这所作所为使人联想起古代时的肺结核患者，那种给古希腊医生留下深刻印象的结核病人的能量。在一封从格斯苔格发出的信中，弗丽达告诉奥利欧利，她相信劳伦斯“变得强健些了，奋斗使他的灵魂升华”！一位美国结核病专家小埃德蒙·R·克拉克医生已有益地考虑到了在这一领域某些新近的进展，它们可能适用于劳伦斯。在一封给这位作家的信中，克拉克医生指出，他必然的、简短的论述与杜布斯夫妇的《白色的瘟疫》一书（1952年）有关联，应读一读：

从我们对众多的肺结核病人研究中，我们已认识到了他们中几乎所有人跟随着一种可能体现患结核病或可能患上结核病的个人特性的人类行为模式的事实。我们已着手研究的众人通常是单身的，他们原先的生活没有必要量的爱情、钟爱和安全感。作为一种这早先形成阶段的结果，个人滋长着一种对来自成就、赏识和收获满足的渴望。它于是就是对患结核病患者必须随逐的生活之路作出说明的个性发展的背景。迄今为止，我们研究过的所有病员表示出一种可能被形容成为他们生活中的目标而努力拼搏的生活行为。这通常是被透选出来作为满足这些基本需要的一类。随着个人生活流逝且最后到达不再可容忍或显现出的目标无法实现的顶端时，这种奋斗加剧。在这顶端，个人精疲力竭躺倒了，又绝望地舍弃不干了，此后不久便发现患上了结核病。这过程由一位马不停蹄、速度过快，时间过长的载负重荷者来说明下可能更好些。

随着这奋斗阶段程度的加剧，个人变得对外界种种对追求他的目标起过作用并且经历了一种社会孤立过程的行为越来越缺乏兴趣。这种孤立可能通过朋友们的抛弃、求职的失败或通过一种诸如在劣等地区离开他的家庭开始到处流浪而同社会稳定进行更彻底决裂的游民身上可看到的各方面而将它本身显现出来。

从你关于劳伦斯的评述中，我怀疑他是一位总是不停地干、在行动中寻求更多满足的非常好动的先生。并且我怀疑注重休息、行为有许多不便之处的疗养院生活是无效的。假如这种怀疑是正确的话，我会猜想劳伦斯是一类十足慢性、无痛的所谓“纤维性”肺结核病的病例。这种病症治疗或不治疗，很少或不会发生较好或更糟糕的变化，除开他可能变得气绥、沮丧那些过程。在那些过程中，他病情或许有所恶化。他听上去就像我们研究的病人中极少死于结核病一类人。但同样地极少得到康复。并且他们有一种高度的肾上腺活动性水准。

根据克拉克博士和他在弗额兰德疗养院的同伴所得出的结论，劳伦斯所可能具有的“高度的肾上腺活动性水准”是一种特别有趣的迹象。他们对结

核病人肾上腺活动性的类固醇荷尔蒙分泌进行了试验，发现低度的类固醇水准伴随着最为活跃的结核病形态；接近正常的水准伴随着更为普通但较不广泛的一类病症；高度的水准伴随着虽然棘手却限于局部的传染病。

正如克拉克博士在全国结核病交流会上所解释的，第一类病人显得冷漠、情绪低落和孤独。几乎类固醇水准正常的病人看上去在社交方面显得活跃，比较善于调节。类固醇分泌率高的病人易患忧虑、抵触和血压快速变动症。在紧张、愤懑之际，腺体分泌出额外的类固醇荷尔蒙激素。一位并未好转而不断地注射链霉素的病人变得对针头的反复刺截感到恼火，使他的肾上腺分泌达到正常程度，因而很有可能使他康复。恐惧的情绪还刺激肾上腺输出量，这已医治了其他病人。

现在所有这些怎样适用于劳伦斯呢？过量的肾上腺分泌常引起人没完没了的愤懑。弗额兰德疗养院医生们相信，这样的病人可以通过交感神经的治疗来减轻降低他们紧张和肾上腺的过量活动。因为劳伦斯显然有“一种高度肾上腺活动性水准”，假如他服从的话，有可能交感神经的治疗可适用于他——各方面可对他进行医治。

另一方面，有可能劳伦斯频繁地使性子和对于《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公开行动的激动心情是保护自己的不自觉的企图。这是一种俗人独立的细微的迹象。当然，它不是超越出现代心理学或身心疾病医学的区域。劳伦斯的那种经常使得陌生人感到震惊和他朋友们的忍耐性为之畏而远之的怒气，可能延长他的生命。

劳伦斯发脾气另一方面来说是属于社会心理性的，如理查德·阿尔丁顿在1933年给弗丽达信中所注意到的。这封信成了《启示录》的导言：

生活在劳伦斯家庭中者比起生活在中产阶级家庭中者来，消气来得自由自在得多。在中产阶级家庭中，积怨时常潜藏在温文尔雅的外表下。很有可能劳伦斯仅仅在做他已见到过他父亲做了一千遍的事——通过大叫大喊和明显地没有必要的狂暴的方式来发泄他的烦恼。而一旦事情过去之后，这些人身上粗暴的意欲全然云消烟散。每个人发泄完了他或她的火气之后，就打算重叙柔情。我们这些人从小就被教育要克制我们的感情，而他总是要将它表露出来。一旦我自己气泄力竭时，我对他偶尔发火根本不在乎，但我确实对他尖刻地嘲弄这么多的人和事，感到介意。不过我相信，他并非生性如此，它是由他几乎全都写及的一种困扰、敌意的情绪滋生出来的。很少真化力气去理解他试图说些什么而且智商不高的愚蠢的官员们，给他带来了许多羞耻和磨难。这耻辱他不能宽恕。但我的确感到欣慰的是，他没有在对付文学的“侵袭”上浪费时间，而是仅仅作出一位艺术家需要作出的答复——创作另一本精彩的作品。

在格斯苔格的那年夏天，劳伦斯很少从位于山坡上的农舍下来。布鲁斯特一家几乎每天喘着气爬上山坡，通常他们会发现劳伦斯坐在一棵梨树下，在一本小孩子用的练习簿上写他的汇编文章。弗丽达曾对奥利欧利说：“布鲁斯特一家赶上吃茶点。阿克沙总是穿着白色的衣服。她的心灵也这么洁白，就像只白色的蛋。他们管劳伦斯叫‘大卫’，并且她把他画成一位蓝眼睛的阉人！”布鲁斯特一家在草地上坐在他身边，唱着民歌。他们曾在绿色的山坡上在劳伦斯的指挥下，排演一出歌戏《三位女神》。扮演帕里斯（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王子——译者注）的厄尔·布鲁斯特缺少一只苹果，将一块圆石块递给扮演维纳斯（罗马神话中爱和美的女神——译者注）的弗丽达，

布鲁斯特夫人站在一旁扮演朱诺（罗马神话中的天后——译者注），小哈沃德扮演密涅瓦（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译者注）。

劳伦斯欣赏来看望布鲁斯特一家的两位印度信仰者：给劳伦斯按摩过的波希·森和迪恩·戈帕·穆尔基。劳伦斯对迪恩·戈帕·穆尔基说：“你并不真正信仰上帝。你不可能到这种年纪。不，不，它是一种人类已精疲力竭的念头：这字词已不再表示什么意思了。”但劳伦斯在这一时候所阅读的某些印度书籍中，发现了重要的东西。且当听说甘地的聚居地和他的纺织木时，他说：“他是对的。我们可以开辟有少量人数的这样一块天地，而我只应在我自己国土上这么做：或许是南英格兰。”

1928年劳伦斯在瑞士总共住了4个月之久（到过列黛亚布勒列兹、谢普利一瑟一韦维和格斯苔格），仅在冬天逼近之际，才离开格斯苔格。自从他作为后生小子曾在这儿兜转、厌恶它的每一步路之时起，他对那一国家的态度为之一变。但也许他心灵的转变，象征着他生命最后岁月的政治上的中立态度，绝了根的中立态度。

在瑞士，他除了对《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忧虑和出自他笔下、把许多明显健壮者搞得焦头烂额的信件外，劳伦斯还创作了几幅画，写了一些文章和小说。在格斯苔格的那年夏天，他创作了《矿井发生的事故》的画，又完成了画品《农夫》的创作。《农夫》中长着小胡子的中心形象尽管是一位黑头发、具有意大利人气质、古铜色皮肤的模特儿，米兰达山庄的皮尔罗·皮尼，但实际上却是青年时期劳伦斯的叙旧。一种相似的类型在格斯苔格其他画品中出现了，即《北海》，此画也许是海涅《北海》一诗的写意，“我来了，带着风来了 / 那往昔的年代，是上帝的天堂所在， / 那下面是他的人类儿女”——劳伦斯在描绘上帝的儿子降落到人类的女儿面前时，可能就是引用了这些诗行——在《虹》中，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同样也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都是这样。此画中的那个等待从海上来的裸体陌生人与她作爱的裸体女人例外地不是弗丽达：她像是辛西娅·阿斯奎斯，他现在可能是痛苦地与她做着空想之爱。

至于这一时期的写作，他在格斯苔格为现在给他优厚报酬的杂志草草地勾勒几篇明快、俚语性的短小文章。一天下午，他和布鲁斯特一家坐在山坡上的钓钟柳间，他读着他笔记本上小说《蓝色的噬鱼蛇》。读到小说收尾之前，他问布鲁斯特一家怎样结尾，他们要求有这样一个结局，允许这位上了年纪的小个子夫人以她自己的本事去看管好她年轻的丈夫，去战胜她迷人的对手。劳伦斯承认，起初他也是这样结尾的，但他发觉他必须把这位盛气凌人、母亲般的小妇人置于失败之地。在劳伦斯大部分小说中，具有双重关系第三者通常是获胜的，尤其是当这种关系中中介人的其中一位是一个不可一世的典型、而另一位却逃之夭夭之时。《蓝色的噬鱼蛇》以它的尖刻和严酷，成了劳伦斯最后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讽刺作品之一，不包含情感、色彩、激情、音乐。而在格斯苔格，他确实写了一部富有想象力、具有他散文上乘之作中丰富多彩特色的作品，这就是《逃跑的公鸡》的第一部分，它描绘出黎巴嫩海滨壮丽风光，叙述了一位复苏的预言家向埃及神话中女神的女术士表示爱慕之心的故事。

正好在劳伦斯完成他故事创作时，他在姐姐埃米莉和她的现年19岁的女儿玛格丽特从英格兰赶到了。8月31日，他写信给伊妮德·希尔顿：“尽管我见到她们很高兴，可它使我感到相当忧虑和压抑。我确实不是“我们的伯

特”。到了那地步，我决不是的。对我来说很清楚，她们的看法与我的看法之间总是可怕地隔着一道鸿沟。”她们带着他几幅画去了伦敦。劳伦斯感谢伊妮德·希尔顿到车站接她们，并且补充说：

想象一下那些书商如此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上攫利！我听说在美国的价钱是 50 美元。哦，上帝，谁都总是要受骗上当的。但现在我们准备抬高余下书籍的价钱。

我猜想你见到了柯特，并且听说了他惊慌失措。他就是这样。他以为因为戈特勒和若干位人就像上述那样地将会对我的画品进行恶毒的攻击，所以人人都如此，其实不然……

想了解艾丽丝·戴克斯对《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看法！

山区开始薄雾笼罩，有点潮湿，寂静而又秋意袭人——现在是离去的时候了。非常感谢将诸事处理得这么顺当。代我向劳伦斯问好。（劳伦斯，她的丈夫。）

总是说“现在是离去的时候了”，尽管这次劳伦斯离开格斯苔格不全是出自内心的强制。他深秋的信提到寒意正袭击着农舍。9 月 18 日，他和弗丽达最终乘坐着叮 作响的牛车，从高高的阿尔卑斯山下来。

1928 年秋天，劳伦斯和弗丽达离开格斯苔格后，来到了巴登—巴登。其他时间在利契丹塞拉利逗留，在欢泉品尝泉水，在寇萨尔欣赏音乐会。“布鲁斯特一家理所当然地在这儿，”劳伦斯写信对奥利欧利说。离开格斯苔格之前，布鲁斯特一家早早地动身去了什么地方，他写信告诉他们”我的一篇发生在美国书商身上的最逗人的小说，叫做《玩艺儿》。你们将以为小说说的是你们的事，其实不是的——这是最为露骨的所有这样否认中的其中之一。

对布鲁斯特一家来说，忍受着那篇的确令人痛苦的小说的折磨，能掂量出他们对劳伦斯的忠诚。在这篇短小的故事中，无家可归、到处流浪而喜爱他们的古玩的美国夫妇俩“都搞绘画，但未铤而走险。艺术没有将他们扼死……他们画着，如此而已”。当 1926 年在开普利帮助布鲁斯特一家包装他们的“玩艺儿”时，劳伦斯已熟悉了这古玩。

最为卑劣、滑稽而向他们刺来的是使他们感到失望的“印度人思想”的判决。而布鲁斯特夫妇在最后几年中未使劳伦斯感到失望。这了不起。尽管弗丽达以她的温暖和活力占据着劳伦斯生活中的主要位置，但他还需要一些冷静的男性朋友谈谈心，他找到了阿尔德斯·赫克斯利和厄尔布鲁斯特。他们不谄媚奉承——赫克斯利走自己出人头地的路，而布鲁斯特则坚持他的“印度人思想”——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意向，但他们尊敬劳伦斯，同他进行愉快的交往。“在劳伦斯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布鲁斯特说道，“我想不起他曾对我吹胡子瞪眼的，正如我们之间友谊开始几年所发生的那样。或许他觉得试图叫我回心转意是枉费心机。”

从巴登—巴登的罗文旅馆劳伦斯写信给奥利欧利：

我们想放弃米兰达这地方。我敢肯定它不利于我的健康，因为在这些地方，我感到要比呆在米兰达好。那儿肯定是一座巨大、搅乱人心的妓院，我受不了。所以弗丽达将去收拾一下所剩无几的东西——它们确实都收拾好了，并且让出了房子。但请不要告知任何人。这样谁也不会围着她小题大做。我将去法国南部。阿尔丁顿夫妇（理查德·阿尔丁顿和多萝西（“阿拉贝拉”）约克）在离开靠近土伦的耶尔大约 19 公里的泼特—克劳斯岛上拥有一座古堡。

那儿天气非常温和，没有什么人，只有 14 家渔民。所以如果中意的话，我们将在那儿度冬。假如你可能的话，务必请来。也许他们将给你一个去那儿的护照。

阿克沙·布鲁斯特回想起离开巴登——巴登之际，她同她丈夫同劳伦斯一起去了法国的里维埃拉，弗丽达离开米兰达别墅到意大利各处远足。在去南部的路上，劳伦斯与布鲁斯特夫妇在斯特拉斯堡歇了脚。他觉得那儿由法国、德国建筑成分组合成的大教堂是他见到过的哥特式造型最有气派的。后来在寒意侵人的黄昏时分，他们走进了一家电影院，直至到了该上火车的时光。他们在影片中看到了莱蒙·纳代罗和弗朗西斯·X·布什曼。布鲁斯特夫人说，这种虚假使劳伦斯作呕，它没有人性。他只得离开，否则他会恶心的，以后，在《三色紫罗兰》诗中，他抨击电影违背了人性。不过在斯特拉斯堡歇脚的日子里，至少获得了一种确有助益的价值：他再次见到了在他的小说《边界线》中扮演了一个如此重要角色的大教堂。

直至 10 月中旬，劳伦斯才到达泼特——克劳斯。中间的一段时间，他同赫克斯利夫妇、弗丽达姐姐艾尔丝和阿尔弗雷德·韦伯在法国沿海等待着弗丽达。弗丽达从意大利回来得了感冒，不久劳伦斯也患上了。她可能为了一段风流韵事在中途停顿过。因为她曾对她的挚友说起过：“自 1926 年起，劳伦斯就阳痿了！”阿尔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曾作过嘲弄人的劳伦斯强调弗丽达“意大利感冒”的模仿。阿尔丁顿在他的自传《为生活而生活》中暗示过弗丽达到达泼特——克劳斯之前发生的事情：“因为牵涉到了去的里雅斯特旅行”，所以从米兰达山庄别墅出来是“一复杂的过程”。安吉洛·拉伐格里在一篇为内尔斯的劳伦斯《综合传记》所写的回忆录中声称，自 1927 年去米兰达看望他们之后，他就与劳伦斯失去了联系，直至在《晚邮报》上读到劳伦斯去世的消息。拉伐格里接着给弗丽达去了慰问电报，并邀请她到斯波托诺来看看他和他妻子。但罗伯特·卢卡斯的弗丽达传记直截了当地指出，1928 年弗丽达来泼特——克劳斯之前，到拉伐格里落脚之地，靠近的里雅斯特的镇上去拜访过。

总之，劳伦斯在岛上度过的 1 月是不愉快的。在和阿尔丁顿的谈话中，他对赫克斯利成功之作《针锋相对》横加挑剔；他写信给赫克斯利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又对阿尔丁顿正在创作的长篇战争小说吹毛求疵。在泼特——克劳斯之际，若干份攻击《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报纸的发来，并没有改变劳伦斯的观点。

在夏天，《骑马出走的女人》的评论意见已显得冷冰冰的，或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架势，尽管阿诺德·贝内特已在《标准晚报》上宽宏大量地称劳伦斯是“今日创作最为强盛的小说家”，并且认为，集子中的十篇小说（英国版删去了美国版所收集的《爱岛的人》）“由非凡的创造力表现出特性……使得人性在字里行间清楚地显露无遗。读了小说，你会觉得你面临着一位粗野超凡的巨人”。

但没有谁为《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那样大胆地说话——埃德蒙·威尔逊表示赞赏的《新共和国》评论，直到 1929 年 7 月才露面——除了劳伦斯的美国朋友赫伯特·丁·塞利格曼之外。他已（在 1924 年）完成了有关劳伦斯的第一部著作。塞利格曼在 1928 年 9 月 1 日《纽约太阳报》上的一篇评论中，推崇《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但，正如他透露给本书作者那样：“它是从以后版次中删下来的。文学编辑亨利·黑兹利特告诉我，他从未见过文章中的

一篇阅读材料被编辑这样蓝一道红一道地勾划。《太阳报》开辟了前所未闻的长篇连读的文学评论专栏，而刷掉了我的具有感染力的随笔……它结束了我为《太阳报》撰写评论文章的工作”——正如凯瑟琳·卡斯威尔为《虹》拍手叫好，而在13年前就结束了为《格拉斯哥先驱报》撰写评论文章的生涯一样。

在泼特—克劳斯，劳伦斯读到的英国攻击《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最为恶劣的是他的老对手《约翰牛》。它的标题称这部小说是“一块邪恶的里程碑”。一幅照片所显现的是写书的“长胡子的色情狂”，随附的一篇文章称小说是“已玷污了我们国家文学创作声誉的最为淫邪的情感的发泄。法国色情文学的炮制者会被徒劳地拖扯着而找不到淫邪猥亵的臭味相投者”。

这当儿，在一封只注明“星期日”（1928年10月21日），信中，劳伦斯向奥利欧利表露了其他公开的想法，但建议小心谨慎：

我想，假如我是你的话，我将准备出一套原文是意大利语和英语，加注释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作家丛书，大约80至100页的小开本。或多或少，开本同佛蒂尼丛书相似，但不重复仿制，不完全相同。

我已动手搞拉斯卡（意大利小说家—译注）的《第三次晚餐》。它是一部非常有趣的小说，讲一位洛佐医生—大约60页，很合适。劝说你的老教授给你写一篇拉斯卡简短生平，并对小说作些注释——我以后会告诉你我认为要作注释之处——这是一篇关于洛伦佐医生和曼能特教师的故事。

以一部有趣而健康的小说来作为丛书的起端是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可以出粗俗的作品。我想我们将把拉斯卡的作品搞成三册——三次晚餐——先从《第三次晚餐》着手。这不会占我很多时间。你是怎么想的。

进行国际性的淫秽作品的大规模的查禁在展开。我附上从《标准晚报》上剪下来的一段剪报。同样是一件小事。一位英国妇女在米兰一家书店看到了一本《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要买下它，书商要求查看她的护照和后者仅有三天逗留的时间。妇女说她恰好回英格兰，书商拒绝卖给她这本书。我想，他是怕海关截下这本书，并且他可能被引证为已出卖了该书——国际同盟可能会追踪他！

未等到奥利欧利的许可，劳伦斯就动手翻译了来年3月出版的《梅兰特大夫的故事》。他的商人这边准备了其他的广告：

皮诺·奥利欧利

将出版一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小说，原文英语（和意大利语），丛书由D·H·劳伦斯、诺曼·道格拉斯、阿尔德斯·赫克斯利和其他著名作家翻译，有翻译者写的导言，还附有注释和图表。丛书的第一种将准备在12月10日出版——拉斯卡的《第三次晚餐》，由劳伦斯翻译，附有导言，数量限1000本，邮寄费用12至6先令或3美元。

劳伦斯进一步告知说：“假如你还要印意大利语版的话，得支付15先令和4美元。”在同一封明显写于10月25日的信中，他还说：“如果你高兴干的话，我建议你经营起来，给我百分之十利润。”奥利欧利觉得接受这一建议是安全的。但他准备在劳伦斯这次翻译上化本钱，劳伦斯在创作了《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之后获得成功的洋洋得意中，劝诱他印刷数量很可观的版次，尽管在英磅下跌使得出版业对奥利欧利来说非常令人痛心地从获利之前，隆加诺丛书本身有了11种书目。

在泼特—克劳斯期间，劳伦斯写给美国律师莫里斯·欧内斯特一封信值

得注意，劳伦斯已寄给他一本受到审查的书。劳伦斯对他说，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印这封信，利用这时机来抨击那些憎恨“生气勃勃、茁壮成长着的觉悟”的愚蠢的书审官。“它是我们滋长、扩展而他进行恐吓的意识。并且我们的觉悟处于它最新、最灵敏的活动之中，处于它生机盎然的成长之中”。但在那些日子里，劳伦斯再度引起了更多的审查人员的怀疑，因为正如阿尔丁顿在他的自传所回忆起的，在泼特—克劳斯期间，“来打扰我们的只是些法国官员，他们来调查可疑的异己分子劳伦斯，并且不让我去看望他”。被在曼茨的德国人当作一名英国间谍而加以拘捕的劳伦斯被英国撵出康沃尔，他们认为他是在帮德国人做事；而最终法国调查这位被认为是搞间谍活动者的做法是令人恶心的。

11月14日，离开泼特—克劳斯三天前，他写信给威廉·格哈迪，谈到了关于在《针锋相对》中以劳伦斯为模式的马克·兰姆皮阿恩形象问题：“我拒绝充当兰姆皮阿恩这一角色。阿尔德斯对我的赞美仅仅是肤浅的，并且出自完全受相反冲动的玛丽之口”——玛丽当然是玛丽亚·赫克斯利。但，不管劳伦斯偶然的脾气，他同赫克斯利的友谊是牢固的。

在泼特—克劳斯时，劳伦斯以一种较少带尖刻成分的语气给艾达写信：这儿真有趣……理查德和阿拉贝拉挺好的；布莱特·帕特莫尔也如此，一位我们在以前结识、年龄与我相仿的妇女。他们都忙于从事文学工作。他们出去游泳了。这儿离海和其他岛屿有一小时路程，离大陆10英里。这儿真不错，不知怎么地，真不想离开。”

接着而来的是大风和寒风及当地环境的恶化，这次真的使他搬迁了。11月17日，他乘着一艘汽艇回大陆，汽艇的发动机在凛冽的北风中出了故障。在汹涌的波涛中，船开始向海面漂流开去，但操作发动机者将机器发动起来了，船平安地抵达海岸。远离了袭击泼特—克劳斯各种各样风暴的劳伦斯，在土伦一家旅馆客室中，最后一次同阿尔丁顿告辞。阿尔丁顿不明白为何劳伦斯要离他而去，说：“耐心等着。”恰好一年后，劳伦斯告知奥利欧利，他“非常”不喜欢阿尔丁顿长篇小说《英雄之死》的第一部分。这部小说劳伦斯在泼特—克劳斯的维基同阿尔丁顿住在一起时已读过。“但自从离开维基后，我未写信给他——那是一个长篇故事”——明显地牵涉到了阿尔丁顿处于因布莱特·帕特莫尔而抛弃多萝西·约克过程的事实。不管怎样，劳伦斯并未与帕特莫尔夫人绝交。在阿尔丁顿继此之后给布莱特·帕特莫尔的一封信中（未公开），他想知道在泼特—克劳斯时劳伦斯是否听说了夜晚他溜进她卧室之事。劳伦斯看上去再度表现出他请教主义的残忍感，正如数年前当希尔达·杜利特尔离开阿尔丁顿而与塞西尔·格雷私通而他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而在泼特—克劳斯最后一次告别中，阿尔丁顿则是位受命要耐心等待的罪犯。

在大陆，劳伦斯来到了班多尔，住进了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喜欢的鲍·利伐基旅馆，一直住到来年3月。在那儿，他们通过伦敦书商查尔斯·拉尔的关系，结识了威尔士作家里斯·戴维斯。接着在尼斯，劳伦斯于“星期一”（1928年11月28日？）写信给他：

拉尔先生给了我你的地址。你愿意来这儿这家小而住价低廉的旅舍作几天客吗？班多尔离土伦旁边的马塞约20分钟路，离土伦也20分钟的路。你能来的话，我夫人和我都会感到高兴。在这儿将住多久我还不肯肯定，但总要十天吧。

里斯·戴维斯到班多尔首次同“花技招展”的弗丽达和“身上的特征显示着一种最终从男性的岁月和平民力量中精炼出来灵敏”的劳伦斯见了面。劳伦斯嘲笑戴维斯对年轻作家们所作的赞美之辞；他咬定他们只能是恨他。但他们不像带着他们的钱包和奸计、企图赶上他的老家伙们这么坏：“我知道我是笼子里的一只猴子。但如果谁将手指放在笼子上，我就咬，狠狠地咬。”

因为劳伦斯经常萎靡得不能行走。戴维斯就坐在海滩上同他交谈。那年秋天天气暖洋洋的，劳伦斯爱上了南方的海滨。他写信给玛丽亚·赫克斯利，描绘班多尔“日落时分，沐浴着柔和金黄色的日光，半数的白舸在白色的暮光的海面上消融，西部玫瑰红暮色中的棕榈树卷曲着树顶，粗壮深色的树柱矗立在暗色之中，朦胧的男孩的身影奔跑着叫喊着，还有黄昏中簇叶下小小的一盏盏橙黄色的灯”。

这是一种抒情的昙花一现的时光。来年冬天，当劳伦斯回到班多尔，他写下了几篇关于海滨的优美的诗章。而1928年在班多尔，他却埋头为现给他每篇20英镑稿酬的伦敦报纸撰写两千字的文章。这些通俗的文章仅花去他一个半小时，并且允许他轻易地谈论许多他曾用戏剧化的杜撰的文字来表达而感到苦痛不堪之事。尽管他的出版商们对他其它小说或伊特拉斯坎研究成果催促不休，而当政府征收他版税百分之二十、他的代理商征抽百分之十时，他觉得在书上不值得化费力气。

在班多尔的那年秋天，他的创作精力主要转向于短小的诗歌。关于这他在的一封信中告诉赫克斯利：“我已动手写一本感想录，我取题叫《三色紫罗兰》，一种结构松散、短小的诗歌形式。弗丽达兴奋地说它是真正的打油诗——指的是感想录，不是诗歌，尤其不是指抒情诗。”早晨他支坐在床上，戴着一顶窄小的非洲草帽（“保持我大脑温暖”），创作这些《三色紫罗兰》诗。暗暗发笑时，他会把诗念给来访者们听。

与此同时，在伦敦，他画展的计划在进行着，也是他给戴维斯一封信中提及的一项新计划：

奥利欧利写信告诉我，芬弗罗里柯（出版社）的人将遴选一批我画品复制品的代表作，这些画挂在多萝西·沃伦的美术馆等待展出。那将十分有趣。而我没有直接听到什么消息。假如你写信给伦敦阿弗洛迪特那边人，可以提提这件事——如果他们是芬弗罗里柯出版社人的话。因为事情将要办的话，我们在多萝西·沃伦在纽约举办画展之前，得赶紧将画拍成照片。选代表作的想法真逗人。

我妻子颇令人痛心，眼睛上了火，我想得了风寒了吧。但她从未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所以她若真的有点什么，她会很在意的。

12月23日，劳伦斯写了明显地是最后一封给罗尔夫·加德纳的信。罗尔夫·加德纳同他的朋友们一起在戈尔农场干“田园的修复”工作。劳伦斯现在是“快活的，并且更是进行自我欣赏。”他祝加德纳顺利，同时对《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进行防范，使其免遭加德纳的批评。他最后说：“这愚蠢的怀特·福克斯关于纯粹的建设性行动的花言巧语全是一派胡言，至少十分之九肯定是要破产的！要不然，你所有的建构虚弱地证明是破坏性的。”“愚蠢的怀特·福克斯的花言巧语”涉及到了被加德纳的朋友“木工技术运动”头儿约翰·哈格雷夫所采纳的名称。这既吸引着劳伦斯，又使他感到厌恶。（有趣的是，哈格雷夫稍后引起了他对一位不久对政治长篇小说感到伤感的年轻的美国人约翰·斯坦贝克表示称赞的注意。）

加德纳继续在英格兰和非洲进行活动，情感总是为劳伦斯的教诲而不是为他个人的模范所激起，当后者变得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主义者时，加德纳同哈格雷夫断了交。甚至在德国，当那个国家“仍未被希特勒主义偏执狂所束缚时，加德纳和他的同伴们“在考察中、在工作帐篷里、在节日里和德意志联邦的中心……寻找着活生生的劳伦斯式的梦幻的真实存在。”那是（1943年加德纳在他《英格兰自身》一书中所写的。1952年11月，加德纳在给本书作者的一封信中，对关于劳伦斯和他们间的关系作了新近的、完整的论述。这样全面讨论劳伦斯接近终点的生涯的论述没有不恰当之处：

今日想起他，我又想知道他身体的虚弱是否由他人生旅程中实质性的探究方法所造成的？他经常对他的价值稀里糊涂，使暴躁的坏性子去破坏他的均衡感。早先生活过去了，劳伦斯追求内在方面有多久了呢？我想这儿有些混乱不清。在把他自己从启蒙运动柏拉图哲学式的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影响中挣脱出来的愿望的某些方面，他可能在激冲的波涛中挣扎着。他比任何浪漫主义作家都转得远……但圣灵的教义趋向于在他不是痛苦的时刻他既是批判性地又是神学性地返回的平衡。那就是为何我总是喜爱《意大利的晨曦》的缘故：一本包含着所有他思想起源的意义深长的书。

总之，当我在孩提之时，其时并不反对劳伦斯提出的解脱清教徒式的性的压抑的看法，而反对理智抽象化的专制和分析科学设计出的宇宙僵死的观点。劳伦斯对邓阿农尼齐奥的《人体解剖学》一书的引证给人印象很深。如上所述，在黑暗中，他发现了力量的源泉，这是逼近我们文明的仲冬时期的黑暗，是更新的黑暗，是英国中部和北部的黑暗。

“黑暗、真实、幼弱代表着北方”，坦尼森已写道。而劳伦斯以他辉煌的创作承接它，将它作为无形世界未加探索、不可测知的资源的象征，昔日史前人们居住地和风景地的巫术的资源。它是出自他感官、用搏动的血肉表达情感的心灵的滋养品。在此，所有其他的作家用生活习惯和传统的情感来描绘“社会的人”流尽鲜血。撇开这些不说，除了他自己稀奇古怪的“思想倾向”的术语外，劳伦斯为人们发现了超越原始、化学的性的太空的躯体和力量。并且就前景展望本身来说，他的兴趣超过了人的个性，超出了社会集团。正如你会如此恰当地说：“他的前景展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对身上带着创造行动的意欲的某人例如我本人来说，随着这位勇敢的生活探索者和生活阐述者在我们世间的时代中稳步前进，它是何等样的一种体验。鉴于他的书是从他手中融化出来的，人们能年复一年地分享他由他小说家想象力富有想象而持续地设计出来的、使人激动而富有启发性又意味深厚的生活。它是一种伟大的业绩。

那是关于劳伦斯在同时期所产生影响的最为重要的论述之一，吸收了多年深思熟虑的观点（被一位1960年成为多赛特郡长的人所指出）。在1929年，年轻之辈对他们的老一辈企图扼杀之的劳伦斯帮不上多少忙。1月7日，劳伦斯把两本《三色紫罗兰》手稿副本作为公务信件挂了号寄给他在伦敦的代理商。一星期后，他还用挂号件寄发了为他绘画复制品书册所作的绪论。至24日，他开始担忧起这些文献来，因为它们还未寄到柯蒂斯·布朗处。在知名度与吉克斯一样广泛的内务大臣威廉·乔因森·希克斯的怂恿下，手稿被扣在邮局。吉克斯是一位在英格兰开始对私藏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本子横加搜觅的宗教信徒。劳伦斯的代理商和出版商们埋怨探子们已注意到他们，警察也跑到他一些朋友家里去。而秘密传播非常成功：至1928年年底，

劳伦斯告诉奥利欧利，《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总的赚头迄今为止是 1024 英镑。

当 1 月 11 日劳伦斯从班多尔给布莱特·帕特莫尔去了一封友好的信、随便提及在泼特—克劳伦斯所遭不便时，他并不知道她家那些天有一位官员来查访：

好久未有你的音信了，你消失了吗？从你那儿也未得到圣诞、新年的片言只语！也许你过节实在忙不过来。不管怎样，我希望是这样……

奥利欧利说，他已寄给你几本《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我希望它们能平安无事地寄到。我告诉他寄数不要超过一打。现在有位书商想将书接收过去——荷碌恩红狮街 68 号的查尔斯·拉尔。如果我通知他下星期来你处取，你把书交给他，我想他靠得住。

这里也没有什么新闻，只不过我的画可能将要复制成册。每次十畿尼。我听你回音！

阳光明媚，今天下午我们坐着一条汽艇在海上转！当我们从灯塔那边起身，我叫人掉转船身，我知道我们应该看看远处泼特—克劳伦斯的幽灵。

布莱特，你在哪儿？

“布莱特，你在哪儿”？——她同理查德·阿尔丁顿在意大利。寄至英格兰给她的几本书已被没收。就如 1929 年 1 月 24 日劳伦斯告诉奥利欧利那样：“她儿子（德雷克）写信对我说，一位探子模样的家伙也打电话到那儿。柯特写信惊慌失措，也许生怕他们会查访他。而真正令人头痛的是伦敦警察厅扣留了我寄给柯蒂斯·布朗的手稿——这些我们必须重新找到。”

那次没收再度将劳伦斯的大名带进国会。其时，劳动党在国内选举中获胜，提出了禁压的问理，或许是受了威廉·霍普金的指使。2 月 28 日，西莱斯特代表、代替因病缺席的埃伦·威尔金森的 F·W·帕希克劳伦斯提出了这问题。他问“在出版问题出现之前”，内务大臣是否叫谁采取行动，将劳伦斯的手稿扣止在邮局中？”是否他将提供受将书和手稿扣留、查禁指使的办事者的姓名、官职？这些人审查文学作品的资格是什么？并且是否他将说明扶助作家和出版商的法令条文及被他的部下所扣留、查禁书籍违法之所在？”

乔因森希克斯与 15 年前《虹》遭到禁压之时的约翰·西蒙一样灵巧。如同西蒙一样，吉克斯以古代淫秽出版物条例作掩护解释道，任何都市警察官或任何两位治安官可根据誓后通告而发布搜查令，查禁任何“淫秽”书籍或画品。对于这一点，年轻的劳伦斯在伊斯渥曾遇见到的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起来问道：“尊敬的先生将明确的说明将法律施之于行动是谁的职责吗？”

吉克斯答道，警察有这权利，尽管他不想否认他自己的责任。1908 年邮政条令规定，邮政部长必须“拒绝参加任何淫秽物品的转运工作。”1924 年斯德哥尔摩的邮政联想协定同样如此规定。吉克斯说，手稿是在包裹检验线中被负责检查低价寄发的信件的检查员发现的。吉克斯补充说道，劳伦斯的手稿被发现后，它被送至内政部，并根据我的旨意送至检察官处。我听说这里面毫无疑问地包含着淫秽的东西，理应予以没收。无论如何，我给两个月时间，允许作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如果他愿意这样做的话。

帕希克劳伦斯还想知道，是谁作出这些东西是淫秽物品结论的。吉克斯答复道：“首先，既然是这样的话，邮政部长作出决定，这是证据确凿淫秽案件。他然后交给我，如果我同意决定的话，我就交给检察官。它根本不是

什么文学作品的功过问题。如果尊敬的议员先生有什么疑问，我将向他出示该书，它显然充斥着色情内容。”

又如西蒙一样，吉克斯咬定不存在什么文学作品的审查。而且如同那次议会争辩《虹》一样，这次争辩最终以询问邮政部长打开包裹权利的调子而逐渐消失。

不管怎样，如同大部分审查员一样，吉克斯使得他企图要禁压的做法看上去有迷惑力。赛克 1929 年 1 月在伦敦出版了《三色紫罗兰》洁本。9 月，挪普在纽约也出版此书，而删去了 14 首使吉克斯心烦意乱的诗。劳伦斯安排一位澳大利亚的朋友 P·R·斯蒂芬森（明显地与书商查尔斯·拉尔有交情）出一个全译本，尽管没有斯蒂芬森出版社鉴定的商标。他们定于 1929 年 6 月出书，但结果等到 8 月才发行。它包括 500 本“固定”本数，外加 50 本用日本精制犊皮纸作装帧。接着，在欧洲大陆以相同的图版出了流行版。劳伦斯得感谢使得诗章的报酬取得颇为可观的惊人成就的“愚蠢的书审官”；他从《三色紫罗兰》的纠纷中，净得 500 多英镑。

离开班多尔之前，他又好几次见到了里斯·戴维斯，并且接待了其他来访者，其中包括朱利安·赫克斯利夫妇。2 月，埃达的来访使得劳伦斯为之消沉：他可以“感觉到她身后所有那些中部地区的绝望”。她已年逾 40，“多多少少同至今生活的一切有些格格不入：事业、房子、家庭，甚至庭园不再想要了”。这当然是不可争辩的“妇女身上的器官问题”，而主要是由于太“单纯”而没有肉欲所致。

埃达离开班多尔后，再也未见到她兄弟。他，一位时常告诉世界做什么的预言家找不出恰当的话来安慰他妹妹。他写信对她说，在那些凄惨的最后岁月里，他受尽磨难，但他觉得他“正在趋向一种不同的、只有经历苦楚才能获得的“其它类型的快乐：“这是一种旧式生活方式缓慢的绞动。在阳光下，我们将开始另一种忍耐。”

他渴望阳光：“班多尔地区遭受到一种异乎寻常的寒气，棕榈树和桉树也冻结了。劳伦斯想去西班牙，而想去意大利的弗丽达表示异议，最终他们去了北部而分道扬镳了，劳伦斯去了巴黎，弗丽特再次去巴登—巴登探望她母亲。启程前两天，劳伦斯写信给厄尔·布鲁斯特：“我真正希望唯一的一件事是不要总是咳嗽，胸口、咽喉不要痛，精神上也不要哀伤。为何上帝总是让我体内遭受痛楚？”

大概一星期前，他对莫里说：“我愿意老些，只要我的胸口不这样搔抓。”莫里自 1926 年以来，第一次写信请求劳伦斯出借一本《虹》给他在瑞士打算写一部研究劳伦斯著作的朋友；莫里不想冒险寄给他赠送本。劳伦斯说，他自己的初版书已给偷走了。但他告诉莫里，美国的重印本在欧洲能买到。莫里对鲍·利伐基地址有“不祥之感”——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就在那儿第一次大出血。他认为这信的口气是“友好的，但却是悲哀疲惫的”。在信中，劳伦斯告知莫里，他正在考虑去马略尔卡岛，但“我没有任何想去某地住下的强烈的预感——仅仅目前不去意大利”。

在班多尔的冬天里，正如我们所已见到的，作品还是丰富的，至少有短小的作品出来。正如从给赫克斯利信中所引证显示出来的，关于《三色紫罗兰》，劳伦斯无意有所寄托，但它们是长时间思索、触感的一种发泄。在各种新闻体文章中，他得自始至终地遵照文章的一定的长度，而《三色紫罗兰》则可以随心所欲地或长或短”它们可形结一种单一的心绪或思想。他后

期警句式的散文，在这些短小的诗句中，甚至可成为较为充实的剧本（“看在上帝的份上，让我们成为男人，/不要是听从机器的猴子……”）他早期的长篇小说，往上推的《恋爱中的女人》并不通常地包含着对人生和社会的归结；劳伦斯通过人物形象诸如作为小说有机部分的伯金来戏剧性地表示或陈述想要说的。但在《袋鼠》中，劳伦斯开始连篇累牍地作说教式的叙述。甚至《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也开始如此：“我们实质上处于一种悲惨的时代，所以我们绝对不想悲惨地承受它。”而且在这一劳伦斯最为独特、最频繁的、尽管不是他顶峰期的最后阶段中，诗节中表述的就是这些粗率的、写法特别使他高兴的格言。

为画卷所作的绪言，远远要比他在班多尔还在写的那些纷杂的文章来得重要。在那篇绪言中，他着重探讨了现代法国和英国画家的作品，而后者则被清教主义所牵制，被一种害怕带着梅毒来到欧洲的躯体的恐惧所牵制。这看上去几乎成了一部赫克斯利的传记。当然劳伦斯很久以前在《意大利的晨曦》中谈到过这种想法。

他现在发觉，对躯体的恐惧将英国画家驱使到了风景画创作上，除布莱克（1757—1827。英国前期浪漫主义诗人、水彩画家、版画家。——译注）之外。并且十分令人吃惊地说，他自己“对风景画不深感兴趣”。的确，在他自己的画中，人物形象是突出的，尽管远处有美丽的风景。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位某些精雕细琢、写实的风景画的创造人却说，“梵·高（1853—1890。荷兰著名画家。后印象派代表人物之一。——译注）骚动的人的躯体——全是一种劳伦斯式的质性——在困扰着他。

他认为，法国画家对性的处理太卫生了，尽管那比起盎格鲁撒克逊的整个“毛骨悚然”的主题要来得明智。并且劳伦斯虽然感到雷诺阿（1841—1919。法国画家。印象派成员之一。——译注）“有点平庸”，可他欣赏他：“你用什么来画，大师？——用我的阴茎，该死！雷诺阿并不企图要摆脱肉体。”

关于塞尚（1839—1906）法国画家。后期印象派代表人物。——译注），劳伦斯写了大量文章，他的杰出之处主要表现在技巧上：他认为塞尚在其人物肖像画和苹果画中，未能如愿地突出肉感。他永远不能“冲破思想观念可怕的玻璃屏障去和生命进行实在的接触”。

如果说，在那篇文章中劳伦斯是批评英国、法国画家的话，那么他在班多尔为爱德华·达尔伯格长篇小说《底层的狗》所作的另一篇序言中，则是回过头来对美国画家作骇人的一瞥，他把小说当作“排斥意识中的最后说明”而不加重视。但书还是有价值的，它显示出了心潮的流动，使欧洲生气勃勃且是她最完美人性的相互间同情的温暖、个体自发的而在成千上万热烈的细流中时常撞击着的潮流，看上去未能在美国土壤中存留……一旦心碎了，人们变得暗中互相倾轧，而他们发展社会的慈行”。

在美国，害怕肉体紧张到了极点：“人们暗中的肉体排斥是由于美国‘抽水马桶’、卫生设备、厨房、洁白的瓷器和防腐剂的至善至美。而它在诸如那些关于‘口臭’或呼吸不良的令人敬而远之的广告中显露出来。”现在美国的排斥倒向欧洲，污染着那儿的民主。“旧流绝断了，人们可有一点时间用超越主义、和惠特曼式的“同化”来扩充自己……人们不受他们肉体的影响，向前翱翔，直到精疲力竭为止。一旦精疲力竭，他们挣扎着不是重新落在他们肉体中，而是落在肉体运气的赌注上。”

劳伦斯从班多尔出发去北部时，准备出《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巴黎版，

继续与肉体的忌惧作斗争。3月10日，他写信给奥利欧利：

我们早晨动身。在巴黎的地址是：巴黎、巴德蒙特帕纳斯，弗塞勒斯旅馆。

往那儿寄封短信给我。

当然，奔波中咽喉发炎。格罗弗斯先生说，不管怎样，他将与我合作，出一种（《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版本。我想自己来印刷，让他们去干，出版和发行工作，这样事情掌握在我的手中。现在想出一种小型的厚厚的袖珍版，售价60法郎。这样大家可便于携带。你觉得如何？我将力图把事情办得快一些。

自从我收到你信之后，看起来相隔了很长时间，你好吗？

要是我不突然间感到相当不舒服有多好。弗丽达准备径自去巴登—巴登两个星期。

（另外），他们说现在有种德文非法翻印版。

（四）绘画、随想录和龙胆

劳伦斯在巴黎住了将近一个月，着手在搞每本售价为 60 法郎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通俗”版的出版工作。他走访了西尔维娅·碧奇的莎士比亚书店，发觉她不感兴趣：毕竟她出版过另一本著名的禁书《尤里西斯》，而那是“一种竞争的显示”。最终，一位与整容专家海伦娜·鲁帕恩斯坦结婚的美国人爱德华·泰特斯承担起《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通俗版的出版工作。劳伦斯撰写了《我同裘利·罗吉的争论》的绪言。书在劳伦斯离开巴黎后的 5 月出版。

在那儿，他拜访了住在絮伦的赫克斯利一家。3 月 18 日，他给奥利欧利写信说：“其地非常幽静，阳光充足——絮伦是一块宁静美妙的小地方；美妙在于它靠着河流，而没有其它事物。至于将来，“我不敢肯定我们是否将去西班牙——我是想去的，但弗丽达极不愿意去。所以或许我们只能妥协一下，回意大利去”。

在赫克斯利家中、在巴黎弗塞勒斯旅馆，劳伦斯病倒了。住在旅馆隔壁房间的里斯·戴维斯听到他在晚间令人窒息的咳嗽声，而当戴维斯穿过互通门时，他发现劳伦斯在床上痛苦地翻来覆去，“就像一个暴怒中的希腊雕像。”当戴维斯建议去请医生时，劳伦斯对他大发脾气接着安静了一些，仿佛他已驱逐了罪恶的灵魂。

弗丽达到后，他病有起色，去了欧奈隆维纳，最终见到了几乎是神话之中的克罗斯比夫妇，他们住在穆兰都苏莱尔的森林边上。卢梭在那儿居住过，卡格利奥斯特罗在那儿举行仪式。在卡莱斯·克罗斯比生动的自传《热烈的岁月》中，以她犀利的目光和笔锋回忆起“劳伦斯变化无常，严峻而充满智慧，而弗丽达则好面子，爱使性子，充满傲气”。

在那黄水仙季节，卡莱斯和劳伦斯坐着驴车出去采集勘察植物。劳伦斯“用一块披巾裹住膝盖，竖起领子，柔软的帽子拉向灼热的眼睛”。在厂房里，哈里·克罗斯比坐着写作，弗丽达放着留声机，“在她莫名其妙地录音后，劳伦斯一阵恼怒打断了录音”。（弗丽达回想起在 1930 年劳伦斯去世后不久的一封给卡莱斯·克罗斯比未公开、未注明日期的信中写道：“去年大约在这个时候，我们同你呆在厂房中，那个周末对我来说如此生动活泼，洛伦佐和哈里都这样生气勃勃。并且我见你穿着水手服，戴着哈里送给你的手镯。”）

或许劳伦斯两口子在去哪儿的问题上发生过争执。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劳伦斯肯定是获胜的。因为 4 月 6 日他奥利欧利的信中提到：“我已与泰特斯结清了帐，明天早晨我们动身去西班牙。我想摆脱巴黎，这么吵闹、肮脏、紧张，再没有一丝快乐。”在他和弗丽达到里昂、阿维尼翁、佩皮尼昂、巴塞罗那远足后，他从帕尔马都马略尔卡的普略圣波阿方索旅馆写信给奥利欧利：

马略尔卡这个岛颇像西西里岛，但没有这么美丽，而且死气沉沉。但它从尘世中摆脱出来而处于另一世界的南面的海有特色。我喜欢那海——宁静对我是有益的。或许我们将住上一两个月，然后去意大利，找一所度冬的房子。弗丽达决计不去西班牙，甚至不愿试着学学西班牙语。所以我想秋季我们将回意大利。但我喜欢这儿寂静——这么幽宁，人们全然没有什么紧张不安——任何人都不紧张。我真的希望你保留你《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最后售

卖的钱额以支付邮资，我希望现在我们双方完全公正不吃亏。

不久，劳伦斯对马略尔卡岛感到厌倦：至 4 月 24 日，他所欣赏的镇静悠闲的人们变得“死气沉沉、僵木”。他对戴维斯说，他不能忍受“有点像英国城市里的他们西班牙式的面孔、僵死和令人讨厌的假面具”。他又病了：“我的牙齿像打响板似地打战——那是我所做的唯一的西班牙活计。”他承认，“总的来说，居住在意大利最适宜，法国其次。弗丽达胜利了！”带着再度去意大利的心绪，他从马略尔卡岛给奥利欧利写信：

我们仍住在这儿，很愉快。不是暑气冲天，而是寒意逼人。但我根本不愿在这岛上生活，人们都一样的呆板，气氛颇为沉闷。我更喜欢意大利——当然，弗丽达也如此。我想我们将住到月底，然后去西班牙的阿利坎特、格拉纳达、塞维利亚和马德里作短暂的旅行。然后我想回意大利，看看房子。弗丽达提出去拉哥第加达，那儿可能不错。可我觉得我喜欢靠海。玛丽亚和阿尔德斯要我们在面海的山区之中的玛萨一卡拉拉后面找所房子。我喜欢那样。所以我们大概会去玛米堡，然后从那儿乘车去看一下是否有房子。如果你听到什么消息，请记一下，我要一所房子——不是只有半间的，就像在米兰达一样。不要太大，要有个花园，假如我找到中意的地方，我愿住上几年，装饰一下，也许安上集中取暖装置。如果你碰巧来玛米堡，务必坐车来找我，我来付钞。或者，如果你听到佛罗伦萨周围的山区有什么好的住处，通知我一声。我要找块地方。若可能的话，我们可能保留着。这么有不少合适的住房，但我不想要。

关于我们《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唯一的消息是，我收到了一张劳伦斯·格翁姆 8 本书 68 美元的支票。所以把他划掉。现在假如我们能使米勒和吉尔、还有（书商）戴维斯付清，我们就不会干得如此蹩脚。泰特斯在巴黎已将印版搞好了，我想这星期他们开始印刷。所以化不了多少时间。他寄给我一张样稿，缩小了，看上去很好。伦敦有一位男士谈起在那儿印 500 本——在伦敦由自己来印刷，正好是当着吉克斯的面。不知道是否成功。赛克正在整理《三色紫罗兰》删去大约有一打诗歌。斯蒂芬森已寄给我 9 幅画的样张，其中有些不错，而有些非常模糊，衬度非常弱。

劳伦斯在马略尔卡岛逗留。5 月 26 日，劳伦斯写信给里斯·戴维斯，“六星期中，这封信是我对文学最为重要的贡献”，尽管在马略尔卡岛他写下了一些阿尔丁顿和奥利欧利在他去世后收入《最后的诗章》的《更多的三色紫罗兰》。在其中一首诗中，他提示乘坐当地的电车对旅游者来说是冒险的。他讲起一位脸色阴沉的妇女戴着“一条时髦的黑色的披巾”，这使她一半像圣母，一半像艾斯塔特（希腊神话中的爱情女神——译注）。她黄褐色的眼睛突然间闪闪发亮地打量着他，好像在说他同她可以一起堕落：“她能保持她的罪孽 / 她可以同某些结实的西班牙人犯乱 / 犯乱我不感兴趣。”

弗丽达也在电车上经历了不可思议的冒险，正如劳伦斯 5 月 26 日给里斯·戴维斯信中一节所说的那样：“在电车上，一位男子在弗丽达的屁股上拧了一把——我不在那儿。我没有告诉她我把这事告诉给了你。所以她鄙视用马略尔卡岛话写成的每封信，而在 6 月 4 日，她执着要去意大利，去马赛。不管怎样，在那儿，她易受惊的臀部决不会被拧掐了。

但弗丽达在 6 月碰上了一件更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她的踝关节骨折。在酷暑炎炎的一天，弗丽达在海上冲浴，她朝岸上看时，吃惊地发觉一位骑在马上、穿着华丽制服的军官正盯着她看。她惊慌失措，往一些礁石攀爬，她

的一只脚陷入了一个覆盖着海藻的洞里，她的踝关节骨折了。她倒下了，痛楚不堪。军官跳下来，爽快地让出了他的马。劳伦斯赶到了，叫几个男士用一辆车将她送到旅馆。踝关节的伤在一段长时间里给弗丽达的行动带来不便。

弗丽达去伦敦观看劳伦斯的画展，而且叫一位在帕克莱恩的专家来治疗她的伤痛。劳伦斯 6 月 18 日离开马略尔卡岛去玛米堡，和赫克斯利一家住在一起。但在离开马略尔卡岛之前，他必须向一些人否定大意是他已赴身黄泉而在英格兰传开来的消息。他对作为现在和将来劳伦斯财产的代理人、当时是柯蒂斯·布朗代理处成员的劳伦斯·鲍英吉尔说，他“只是还”不想上天堂。他要埃达放心，“愚蠢的报纸，‘正’巴不得宣布某人死亡。可他们操之过‘急’了。”

其中最有意义的信是他写给莫里的一封，也是他所有写给昔日朋友信中的最后一封信。当听说劳伦斯病情危急，莫里便来马略尔卡岛探望他。但劳伦斯说：“你所说的你爱我的我不是我，不过是一尊你自己所想象的偶像而已。请相信我，你并不爱我，我是你天生讨厌的动物——就像林德一家，斯奎尔一家、埃利奥特一家和古尔德一家讨厌他一样。”劳伦斯坚持说他与莫里相互间并不了解；他们在过去的岁月已分享快乐的时光，因为他们都“有点”假装着。但最终劳伦斯和莫里属“于各不相同的天地，属于互不相干的意识路子”。劳伦斯表示他的健康“很糟糕”，尽管他不愿死。而莫里则必须接受这一事实，他们再次见面是没有好处的：“即使我们的灵魂长存不朽，我们也将不同的地狱寄寓。”

在那时节奏轻快、短小的《更多的三色紫罗兰》诗中的《多年后的通信》一首中，劳伦斯写道：

一位男士写信给我：我们错过了，你和我。

我们意味着对对方都有重要作用，

而我们错过了。

一错就是一英里距离，

先生！

因为赫克斯利一家在玛米堡的小房子挤满了，所以劳伦斯移到了吉利安尼的一家膳宿公寓。他 6 月 23 日给奥利欧利的信中描述那儿“宜人而凉快。我们在门外一棵大梧桐树下用餐。玛米堡根本不热。阿尔德斯和玛丽亚真是不错，非常健康——我也好多了，尽管仍咳嗽……我听说画展是成功的，但批评家令人生畏——某些画品出卖了，我尚不清楚卖了多少幅”。劳伦斯叹息“可怜的雷基（特纳）为他的朋友们举行了葬礼！（查尔斯·埃林厄姆）·布鲁克斯去世的消息你听说了吗？——你认识他吗？道格拉斯认识他。”

几天后，劳伦斯告诉给奥利欧利关于一位来自美国的劳伦斯崇拜者的情况：“我已写信给玛丽亚·克利斯蒂娜·钱伯斯——或许她将来此地。”钱伯斯夫人，一位住在长岛的墨西哥妇女，《文学摘要》编辑的太太。她在跟奥利欧利大约一年的通信中，曲曲弯弯地绕着她的路子。她已跟劳伦斯谈起美国海关扣留《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一事。1928 年 8 月 30 日，劳伦斯在给奥利欧利的信中说：“钱伯斯夫人我从未见过。留一张大照片，看上去倒挺迷人的——可怜。”

她的名字醒悟而在回响：玛丽亚·克利斯蒂娜立即使人联想起劳伦斯近期在《劳拉·腓利宾》中所勾勒的美国姑娘玛丽·克利斯蒂·休斯。当然钱

伯斯的姓氏拨动了昔日的回忆。而她来玛米堡拜访简直是不愉快的。正像弗丽达在 1953 年 5 月 26 日一封信上所说的：“玛丽亚·克利斯蒂娜·钱伯斯逗留的时间不长，我记不太起。”此时，弗丽达写信给梅宝·洛汉说。劳伦斯害怕见到钱伯斯夫人：“他这么虚弱，任何动感情的事他是承受不起的。”在玛米堡，当劳伦斯观看别人在海上冲浴时，心绪黯然。以前两个夏天可怕的内出血后，他不敢去冲浴，出血显然是由于他在那儿游泳的缘故。他冷眼旁观着玛米堡，写下了若干首《更多的三色紫罗兰》的讽刺诗，讥讽“大声叫嚷的游泳者”和“海浴者”（“呵，诱人蓝褐色的肉体，它们还是作为杜仲胶的好”）结尾写道：“他们声称躯体是健康的，而看上去却一钱不值。／只有双眼到处在缠绕、搜寻，好像在问：那么生命在何方？”这种严峻的口气在给奥利欧利的信中也有所流露。信中还谈到了钱伯斯夫人的来访和劳伦斯今后的打算：

玛丽亚·克利斯蒂娜把我拖得相当疲乏。明天她将去比萨，在那儿宿夜。星期五即去佛罗伦萨。她将于下午 1 点 15 分到达，但我想你不必去接她，如你愿意，请在星期五下午 1 点 15 分之前替她在摩登诺租一间房间。她可以租马车去。

我希望我能在星期六乘坐同次列车抵达。我能真的同你们一起住在你们的寓所里吗？我愿意这样，不要到车站来接，这容易使你急急匆匆的。

遗憾的是，用餐时的气氛是沉闷时。这儿玛丽亚和伊冯·弗朗契蒂对典礼官非常无礼——但是突然之间玛丽亚改变了态度，屈尊俯就地变得愉快起来。他们仍想知道你同阿尔德斯什么时候去蒙特卡蒂尼。海滩上的一些人都可怕地意识到了他们自己和他们野兽般的肉体。好，我为将能摆脱女人、女人、女人的氛围而感到高兴，再次前来看你。

7 月 6 日星期六，玛丽亚·赫克斯利驱车送劳伦斯至比萨，在那儿他登上了去佛罗伦萨的火车。他对举办画展前夕伦敦所发生的事一无所知。自从画展举办以来，确切地说，三周前画展已开办，观看的人次达 12000 至 13000。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向内务大臣提出控告。这次不再是吉克斯（他已成为布伦特福的公爵），而是约翰·R·克莱因斯，他在那年春天在新的工党政府中接替了这一职位。克莱因斯对他的自由言论得意洋洋，但当诸如此类的事件发生时，职权掩盖了一切。7 月 5 日，侦探监察员戈登·黑斯特和侦探警官托马斯带领六位警察来搜查美术馆，他们搜去了 13 幅画，对此丽贝卡·威斯特认为，这种“可恶的事情”是“一种令人愤恨的缺乏匀称感的行动。六位警察应拿 12 幅画，多拿一幅则是一种过错”。

警察还抄走了四本画品的复制品和一本乔治·格罗兹的《瞧！这个人》（这样，希特勒作为一名艺术批评家而提前出现了）。但经多萝西·沃伦（她已成了菲利普·特罗特的太太）劝说，他们没有没收路易斯·阿拉贡的译作《捕猎幻兽》：她解释说它是儿童读物，尽管用猥亵的法文排印。当警察听说布莱克 101 年前已离开人间，他们也就允许保存他的某些复制品。但劳伦斯的 13 幅画和有伤大雅的书藉却被送至马尔博罗街违警罪法庭地下室。于是它们将遭到焚毁的谣言在伦敦纷起。与此同时，沃伦美术馆以剩下的画和几幅埃达·克拉克从米兰达带回的“无伤风化”的画品举办了画展。

在意大利，劳伦斯遭受了 1927 年在玛米堡相同的经历。当他抵达佛罗伦萨时，他就病倒了。短短几天中奥利欧利以为他可能不行了，所以恐慌地打电报给弗丽达。劳伦斯住在奥利欧利的寓所闭门不出，而被隆加诺格格作响

的车子噪声所打扰。10月10日，他在致玛丽亚·赫克斯利的信中说，他得知了画品遭查禁一事，“其它没什么，就一个电报”告知他画被禁封，“并且受到被烧毁的威胁——死刑判决。”他把自己的病归结为“星期五在海滩上坐得太晚了”的结果。

劳伦斯考虑回巴伐利亚，他的病刚痊愈，麦克斯·莫尔就邀请他去那儿。但在13日他写信告诉莫尔，弗丽达“突然”抵达，想“先去巴登——巴登她母亲那儿，然后或许在9月份回巴伐利亚。”当他听说弗丽达正在路途中，他的病有了起色。她刚到，不管依旧疼痛和颤战不稳的脚踝而显得充满活力，他的病全康复了。弗丽达尽管担忧地下室的潮湿会毁坏这些禁封的画品或画会被警察焚毁，但她享受到了伦敦的乐趣。在那儿她感到“像希巴阿剌伯南部——古王国——译注）的皇后。艾格·卡恩请她吃了一顿饭，并且示意他可能在巴黎举办画展。她第一次感到她的三个孩子“全”同她在一起。“我的儿子蒙蒂跃跃欲试，要与警察较量一番——兑：勇敢一些，再勇敢一些！”

7月14日，劳伦斯写信给多萝西·沃伦，告诉她宁愿让他的画被烧毁，而不要与警察妥协：“对我来说，我的画是神圣的，为了英格兰的自由，我不愿将其烧毁。我是位英国人，我为英格兰的自由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而我已活了大半辈子了，我首要的信念是我的男子汉气概，我笃实的言论将是不可亵读的，是超越国籍、不受其它什么约束的。为了改变一项英国法令而承认我的画应予以烧毁，将是承认对我最不信任的境况所作出的牺牲。”又说：“假如我能阻止它的话，不再有折磨，不再有苦难，不再有无休止的死刑判决。每种折磨引出一条致命的命运锁链，每种苦难是一条缠绕人类家庭的拉奥孔的蛇。去它的。”7月16日，劳伦斯病愈去了德国。这恐怕是道格拉斯在《回顾》中曲解地进行回想的出发点。劳伦斯邀请奥利欧利和道格拉斯去吃一顿辞行的午餐，点了名贵的菜和酒。接着当他们未用完餐时，劳伦斯忽然惊叫起来：他和弗丽达会误了火车的。道格拉斯对这一圈套已有准备——他近来诱使劳伦斯替他和奥利欧利付些饮料账（“赢得他尊重的最好办法是让他遭受诸如此类小小的损失”）——但在午餐的一片混乱中，道格拉斯捡起了账单。道格拉斯回忆道：在车站上劳伦斯没有再提起此事。“当列车启动时，我察觉出——可能是我的想象，一丝怪笑浮现在他苍白的脸上”。

7月22日，劳伦斯自巴登——巴登写信告诉奥利欧利，也许《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初稿可由赛克和挪普负责出版：“我相信此书几乎没有任何胡说八道的地方。没有提到阴茎，实际上事情变得几乎是无根无源的。”奥利欧利有手稿：“我希望你瞄瞄所谓的淫秽的部分，看看到底淫秽到何种地步。我敢肯定几乎连轻描淡写的地方都没有。我肯定我能删除个别美中不足之处，但我们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我不能删，甚至绝对不能动手删。”一星期后，他从山区高处库霍斯普拉格（贝布）写信给奥利欧利，那儿是弗丽达和她母亲硬拖他去的：

我已改完了（拉斯卡）的校样，正准备立即将它们寄回去。你可过过目。

是的，我收到了多萝西（多萝西·沃伦·特罗特）冗长而无聊的信，而从阿尔德斯处只收到一张明信片，从你那儿什么也未收到。维克多·丘纳德在电话中的胡扯烦人。画的案子要拖到8月8日，所以在此之前没事可做。真想不到赛克不能提供所有订购骗人的250本（《三色紫罗兰》，删节本）的汇单——超额订购。他正在销售第三批1000本的十分之六版本的普通本——对诗歌这种本子很合适。

不必为寄送《罗盘》操心。顺便说一句，这是最后几本，现在停版了。

我将寄给你乔纳森·凯普编的我的《诗集》，替我同我其他书一起保存着。海因曼正在搞一个花费昂贵的《爱岛的人》的版本，现付给我 300 磅。兰多姆出版社推销每本售价为 4 美金的巴黎版《查特莱夫人的情人》，骗人的东西，可怜！拉尔将在这星期将《三色紫罗兰》（未删节）整理就绪，但我要求他等到 8 月 8 日画品的问题解决了——它们仍被禁封着，再出书。多萝西继续在搞画展，真傻。

这儿淫雨连绵，寒气逼人，我只得裹着肥大的羽毛垫躺在床上取暖。我得了感冒，简直恨透了。一两天内我们或许将去巴伐利亚，或许去科莫。我愿意呆在佛罗伦萨。这儿这么冷，天气又糟透了。

泰斯特不要我出《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洁本——大家都这么想。

康普顿·麦肯色认为自己是小说中的中心人物，替劳伦斯付出 300 英镑来阻止海因曼要出《爱岛的人》的打算——这一损失简直不能改变他的脾性，《诗集》不管怎样看上去给他一些满足，因为尽管去年秋天英国的评论调子显得极为冷淡。而在那年夏天，美国的评论家们则对此书推崇备至，把劳伦斯看作一位举足轻重的诗人。

在伦敦，亨伯特·沃尔夫在《观察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天才，但……》），它是具有典型性的、对劳伦斯和他的英国同伴作家评头论足的、持对立观点文章中的其中一篇。沃尔夫说，他是火山。尽管他能创作出“就肉体的力量和放荡不羁的精灵来说英国别的诗作“不能与之匹敌的诗章，而表述出来不过是“溶岩，不是明亮的灯光，因而待到它平息后，乡村遭到摧毁。空空如也”。莫里在《阿德尔菲》中也持敌对态度，对许多诗作吹毛求疵，尤其是对后期的作品，尽管他还认为总是成就“印象深刻”。

其时在美国的评论中，约翰·古尔德·弗莱彻在纽约《先驱论坛》上，珀西·赫钦森在《纽约时报》上，路易斯·恩特梅耶尔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哈利叶特·门罗在《诗歌》上，对《诗集》反应较为良好，尽管偶尔也听到美国评论中的相反意见。弗莱彻热烈赞扬道：“当今所有的爱情诗人，无一能超过 D·H·劳伦斯。”美国的评论者中，他的老朋友哈利叶特·门罗的意见最为冷淡：“称得上奇妙无比”，但技巧很粗糙。如果艾米·罗威尔活着的话，她将比这推崇得更为热烈。但哈利叶特·门罗感到，在修订他早期诗作中，许多作品曾首次在《诗歌》上发表过，劳伦斯将它们毁掉了——这一点已由菲列斯·巴特利特在《诗歌的进程》（1951 年）中和理查德·埃尔曼在他评述劳伦斯诗歌的论文《D·H·劳伦斯的成就》（1953 年）中进行过劝导性的争辩。

就在（1929 年夏季美国的评论文章纷纷发表之际，冷漠的劳伦斯在他的山坡往处开始创作与《三色紫罗兰》风格相同、以一种多刺的植物命名的一组新的诗篇，这点他在一封发自巴登的库霍斯普拉格贝布给奥利欧利措词激烈的诗中谈到过：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原稿昨天收到了，谢谢你的寄送。当然，我仍不想出一个通俗法本，并且怀疑是否我将自己去干。如果肮脏的众人没有胆量出现存版，让他们息手。为何我要自己修削停当而便宜）这些下流胚！不管怎样，我讨厌这些贪食的家伙。我不会把原稿寄至英格兰——将寄回给你。现在我把美国版的《诗集》寄给你，请替我保存着。

我们住在这倒霉的山上，整天下雨，又严寒逼人，可恶极了。但只能呆

下去，因为我岳母一想到下山就发狂。她说这儿对她非常适宜，给她这么多力量——这里给我力量，力量！——她 78 岁，发疯似地担心可能会一命呜呼。她会看到我或其他什么人上天堂超过 10 次，而得到一点更多的力量残喘几年。天气这么可恶、可怕，我差不多要晕过去了。我从未感到这么消沉、压抑和虚弱。这 10 天时间，真可怕！一半是因为那可怕的老太婆、冰似的寒风、令人生厌的黑树林，一半是因为所有令人沮丧、脑满肠肥的客人。的确，在如此环境下渴望生活下去，人们会感到惊讶，我知道我没有这样。

明天我们将下山去，情况会好些。我们将在巴登—巴登利希滕斯尔的罗文旅馆住上一星期左右。那儿天气较好——我可以坐在客店里，男人们从山庄赶到此地喝啤酒，吸旱烟，我可以摆脱一点吞噬着她们周围生命的老婆子们可怕的气氛。事实上，老年和年长的妇人们可怕、可怕，贪婪地蚕食着所有的生命，而使得她们活下去。她们对别的什么人上西天并不在乎。我知道，假如我 43 岁去见上帝，而她年至 78 岁还活着，我岳母会私下暗自庆幸，她会感到一种邪恶的快慰。这种事的确置人于死地……

等我找到更舒适、惬意之处，你再将《洛伦佐医生》寄给我（原文如此。案：原文动词〔sent：寄〕误作过去式——译注）。现在我除了写几首这时取作《荨麻》的类似刺人的三色紫罗兰诗外，无事可做。我将把这些诗取名荨麻。

劳伦斯日常比起同实际上他所热爱的岳母住在一起要生活得好些。而弗丽达在她直言不讳的传记中承认：“只是在最后日子里，我母亲她自己这么虚弱和衰老，与极度孱弱的劳伦斯住在一起，他们彼此感到厌烦。”老巴伦英·比劳伦斯活得长命，但她为他和所有他对弗丽达的用意而感到悲哀，弗丽达进一步写道：“我以为劳伦斯离开人世后，她生存的意欲便离她而去了。”经受了住在山顶的折磨后，劳伦斯不到 7 个月便与世长辞了。其时，他看起来没有再给他的岳母写过什么。回到巴登—巴登几天后，他向艾尔丝抱怨了这位“自作聪明的老人！”

8 月 3 日，他下山来，这时离他画品的“审判”日期还有五天，也是法官弗雷德里克·米德年届 82 岁的 5 天之前。曾卖力地对《虹》起过破坏作用的、没有证书的专家赫伯特·G·马斯克特冒充艺术评论家，诬蔑这些画品“粗俗、拙劣、骇人、丑恶和污秽”。带着这在案记录，法官觉得阻止季托专家的辩护的做法是正确的。三位著名的艺术家是：奥古斯塔斯·约翰、格林·弗波特和威廉·罗森斯坦。

而辩护律师圣·约翰·赫钦森只是哀叹：“我们只得等到 1929 年一个所谓激进的政府上台，新的审查机构在这一国家建立起来。”当赫钦森谈到达利奇美术馆中的“维纳斯”时，法官米德插嘴说：“将这些画同达利奇“维纳斯”进行比较是一件严重的事情。”他准许赫钦森作最为令人信服的辩护，但全然无用，因为“天地间最杰出的画可能是污秽的”。不知怎么地，他没有化精力去断言劳伦斯的猥亵是合法的，因为赫钦森提出把画品收回，保证不再展出；美术馆馆主将把它们运交给劳伦斯。所以最终警察未将画烧毁。

但报纸继续声称劳伦斯是只淫邪的怪兽，而他照例振振有词地抱怨他没有得到报偿。他将怒气发泄在《荨麻》诗集中和某些以后出现在为《最后的诗章》所节选的《更多的三色紫罗兰》中的诗篇上。其中一首是抨击艺术批评家 T·W·厄普的。厄普在《新政治家》中怀着恩赐的态度来评论画品，招致劳伦斯尖厉的反驳：“我听到一只小鸡叽叽喳喳在叫：/ 我叫托马斯，托

马斯·厄普！”——他既不会画又不会写，只会对别人指手划脚。

遭这些诗歌抨击的其他对象有“昏眊、娘娘腔的米德先生”、《伦敦信使》和它的编辑 J·C·斯奎尔，甚至是（13000 人中）来美术馆的观众，他们咯咯的笑声和盯着没有遮羞布部位看的举止刺激着劳伦斯的写作：“但为什么，我问你？呵，告诉我为什么？/ 他们也不是完全和你我一样吗？”

在这类诗篇中，劳伦斯怒不可遏，而这在他大部分作品中很少这样。在这以前，他在《袋鼠》战争章节中为所有神经过敏的男人们说话时，偶尔流露出一种象征性的怒气。但只有在《荨麻》诗集中和《三色紫罗兰》个别几首诗中，他怒气冲冲。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中，他被痛苦地激怒了。

有时，他看上去火气比原来更大，如从佛罗伦萨给查尔斯·拉尔信中所表露出来的。拉尔已寄给他梅纳尔的朋友西尔维亚·林德所写的。关于《三色紫罗兰》的评论文章，她的丈夫数年前曾为贬毁《虹》卖过力。现在劳伦斯写信给拉尔：“你该叫人写信给《每日新闻》，询问一下西尔维亚·林德是否故意引用错误——

不要极其一本正经地去做（不要）去做

因为你痛恨人们

“‘不要’在她的引用中被删去。变得面目全非了。那就是他们所惯用的伤害我的伎俩。”在这一时期的诗歌和信件中，劳伦斯一再流露出忧愤的情绪，这当然是事出有因的，而且这种情绪因病而加重。但他依然意气风发，就如《最后的诗章》许多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1926 年，他撰写了一篇评述 H·M·汤姆林森《幸运的天才》的文章（当时并未发表）：“一旦人造世界幻想的破灭，你仍可看到所有其他魔力、妙处和雅美的实在。”这就是不朽和当然也是后期劳伦斯、《最后的诗章》作者的答案。

他的老朋友理查德·阿尔丁顿以后流露出（在他为《启示录》所作的绪言中）他同情地理解许多劳伦斯已所表述的：

在劳伦斯之前，杰出的才智被伯格森怀疑过，无知的心理被弗洛伊德系统地阐述过，整个欧洲文明的价值体系遭到托尔斯泰、尼采、甚至是陀斯妥耶夫斯基以他们不同方式所作出的否定。劳伦斯同他们截然不同，部分原因是由于他是英国人，而主要原因是由于他本质上是位诗人——一位因种种原因而发现他更为有效的工具是散文的诗人。但，作为他的所处阶层和时代的英国人，他简直不能避免既是位传道士，又是一位诗人。传道士易如反掌地博得全场的喝彩。从知识分子观点出发（这是他们对他冷若冰霜、充满故意的缘故），劳伦斯根本的异端只是他将情感的品性、知觉的强度和激情放置于理智前……劳伦斯不得已给予或想要给予的是一种崭新的或是不同的情感、生活和爱情的方式，而不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你不能把他置于格套之中。当然，他也得思考——他是怎样成为一名作家的呢？而他作为一名作家的问题是将这些他坚信不受有意识的才智支配的情感和知觉形诸文字，这对于正着手对付自己的经历的劳伦斯来说太困难了，而对可能完全曲解他创作的作品的任何什么人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他把印第安人的歌唱说成是无知的意指什么？他往常跟我们谈起的“肉体的生命”和“脆弱”究竟指什么？我可感觉到、你也可感觉到他的涵意，但它们是不受简洁、明确的语句约束的。这些只有通过想象、象征和劳伦斯擅长的引人入胜的描写才能表达出来。

1929年8月7日，劳伦斯写信给希尔达·杜利特尔，她为她和她疏远了丈夫阿尔丁顿编辑的《意象派·诗集》向他索取某些近作。她明显地示意要见见劳伦斯，但这位她曾将其写成梵·高一样的男人拒绝了见面的想法，但他确实封寄了一些诗章：

你的信今天上午收到了。这儿仅有几首从赛克搞的《三色紫罗兰》中删下来的用红笔勾划的样诗。这几首诗我已从书内封中抄出，改动一两句词，使其上口些。现在合你意思去做——取你喜欢之作。你不会真正爱上这些诗的，但你不能从一块石头中提取血液。

我们在这儿住上10天左右。我想我势必去南部。我咳嗽真烦人。巴登这儿很潮湿，水气蒙蒙的——天公不作美。

我不知道秋天我们将去何处，或许去意大利什么地方。自从我们见面已逾10年，我们该说些什么？上帝知道！什么也谈不上，的确，说什么也没用。那是我最后的确信。多说反而坏事，假设破损已发生的话。

道格拉斯在澳大利亚，不很好，感到不愉快。阿拉贝拉我听说在巴黎，她情形根本不好，可怜的阿拉贝拉。

“可怜的阿拉贝拉，”在劳伦斯的信和小说中，他总是将她写成悲哀的，与快乐的布莱特·帕特莫尔相对。至于希尔达·杜利特尔，“说什么也没用”——不顾劳伦斯的断然拒绝，在她和阿尔丁顿编辑的《意象派诗集》中，她收了他6首诗。劳伦斯有时讨厌过去所作所为的人。她这么忍心隔断可能性、在进程中用民间格言假设“破损已发生”的做法是不多见的。实际上，劳伦斯不相信希尔达·杜利特尔的忠实：虽然他通常不忌恨，但他不能忘记几年前在同他们的几位美国朋友的争论中，希尔达·杜利特尔是站在对立一方的。而且，如前所知，劳伦斯对希尔达·杜利特尔抛弃阿尔丁顿而投入塞西尔·格雷怀抱的做法表示反感。

在巴登——巴登的那年夏天，劳伦斯接受了气喘病治疗，而弗丽达日日按摩她的踝关节。8月12日，劳伦斯写信告诉奥利欧利：“昨天晚上，弗丽达庆祝她50岁生日——一个9人晚会，还有鲍尔、特劳特、达克——好极了。”8月14日的信上说：“我们早晨动身去巴伐利亚。我不知道为何我在这里会如此痛苦、凄惨。我想是有许多身材粗壮、上了年纪的德国妇女坐在我胸口上。”

他已收到了玛丽亚·克利斯蒂娜·钱伯斯的信，她“住在纽约怪吓人的——像个罪犯似的被遗送到埃利斯岛，如此而已。但她现在正乱哄哄地奔来奔去。”同一天，他写信给查尔斯·拉尔：“我们何不办个小型的双周刊杂志，大约10页左右，就和这张信纸差不多大——取名《爆竹》，登载讽刺小品文。就这样干。叫戴维斯和几位劲头粗的人帮帮忙。让我们把爆竹放在他们椅子底下，把几枚弯曲的针放在他们屁股底下，不费吹灰之力，不要任何借口——我们可用些笔名——找点小乐趣！”

在巴伐利亚，劳伦斯在靠近麦克斯·莫尔在渥尔大斯格鲁伯农舍的位于罗塔赫——埃姆——蒂根西的旅馆边的一所小舍落了脚。8月30日，劳伦斯致信奥利欧利：“这儿我们又住在山上。环境很迷人，很幽静，有牛和翻晒的干草，还有结在高高苹果树上而突然间坠落的苹果。我们在小客栈用餐，有一股牛味。真宜人。”但他依然想着回意大利去。他又提到了弗雷德里克·卡特：“我正写信给过去我认识的一个人，他的作品《〈启示录〉之龙》据我看来非常有趣。我想有朝一日你能出版。”卡特写信给劳伦斯解释道，劳伦

斯所听说和读过原稿的“龙”一书不是研究《启示录》的。而《炼丹士之龙》（1926年）则是附有某些注释、独有创见、对各书有助益的集大成者。

8月30日，劳伦斯答复卡特：“二稿不尽人意，从阶梯上走下几步，回到更易于理解的水准。”但他相信“我们能把龙书搞成——代二畿尼出500本甚至1000本”。他们会让“斯蒂芬森和兰多姆出版社去印刷——如果不行，我们将和奥利欧利一起在佛罗伦萨搞”。并且有合作的意思：“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将力所能及地做补充注释工作——或者甚至接替你，将其续写完。”他希望卡特的构思不要“太异想天开了。我相信，当你写作而不是构思时，你感情会更真挚。”

那次通信关系的恢复是重要的，因为它使劳伦斯在这年的冬天在南部的法国海滨创作他平生最后一部著作《启示录》。与此同时，他在罗塔赫撰写了最为重要的辩论文中的其中一篇《色情文学与海淫》，从而转向抒情诗的创作。他也试图接受健康治疗，关于这他在9月13日致奥利欧利的信中谈到了：

我正在接受治疗——首先是一天两次服砒霜和磷药。这使我觉得，我真正是中毒了，所以我戒绝了。现在我只是进行食疗，不吃盐，多吃新鲜水果和蔬菜，用麦片粥代替面包。我得说我感觉不太好。事实上，上两星期里，我健康状况相当糟。或许我不适应高山环境。此地本身很不错，人人都惹人喜爱，而我却感到颇不中用。我知道往山下迁移些，成感觉会好点儿。但在酷暑持续不退的日子里，这样做会显得傻笨。我听说到处热浪冲天，这儿潮湿，气压很低，但不热。今天多云。所以我翘首企望不久天会下雨。毫无疑问，接下去天气转冷，所以我们将要下山去。我们可搭乘汽车去杰恩巴赫，其地靠近因斯布鲁克，所以我们将即刻在维罗纳下来……

我猜想弗丽达告诉过你她的脚好些了。出于习惯，她略微有点瘸，其他没什么。正骨者来自邻近的乡村，正好是位富裕的农夫。他用大拇指触摸，说：不错，骨头脱位了！猛一扳，不到一分钟就完了，骨头正了位，不可能滑脱。臼位骨头饱插，2月年她会始终走路有点瘸。我付12畿尼给在帕克·莱恩的那位专家，在巴登—巴登还有单据。医生就这么回事！一个大骗子。

好，亲爱的皮诺，我将兴高彩烈地来南部看你。希望我会振奋些，这儿对我没有多少好处。

又及，请代我向道格拉斯问好，还有雷基。

砒霜草药的药方是由一位医生莫尔开的，而药是由慕尼黑生产出来的。一天在罗塔赫，劳伦斯病情发作，以致弗丽达害怕他会死去。按照她的嘱咐，突然间莫尔来了，将他从床上拉起来。在渥尔夫斯格鲁伯的那天晚上，当劳伦斯正同莫尔夫妇的孩子玩耍时，弗丽达平静地问孩子的家长：他们是否不怕劳伦斯将病传染给小女孩。莫尔否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任何人“怎能相信一切损害会来自劳伦斯？而不足来自他自身，来自他工作，来自他疾病，来自他窘迫，来自我们时代尖刻的批评。事后面永驻着他生命茂盛和保留着的魔力。”

劳伦斯试试莫尔一位朋友的治疗，他以前是牧师，现在在慕尼黑开诊所，相信特殊食疗。安东尼·韦斯特在他极有洞察力的论述劳伦斯的著作中说劳伦斯着了“一位巴伐利亚食疗庸医的毒手，庸医和他的助手”还是将他打一顿再用食疗好”。这话大概是有道理的。”当他去南部班多尔度冬时，他已日薄西山了”。

离开罗塔赫以前，劳伦斯写下了他第一首死亡诗、也是他所有最杰出诗作中的其中一首的《黑暗中的光辉》，它以后取名为《巴伐利亚龙胆》：“不是人人家中有龙胆 / 在沉闷、悲哀的米歇尔麦斯温和的 9 月——使“日间昏黑、像冒着普路托（希腊神话中的冥王——译注）昏暗青烟的火把”的龙胆，也是“出自地狱冥王的府宅的黑灯”。这位沉湎于矿山的回忆中的诗人援引了草木复兴的神话：

给我一技龙胆，给我一束火把

让我用这青色、叉状的花炬自引

走下越来越黑的阶梯，那儿是青上加黑的青色。

那儿连普西芬尼（希腊神话中的冥后——译注）也去了，正好现在，从结霜的 9 月来到黑暗中醒悟着昏暗的看不见的王国

普西芬尼自己除了声音和一团看不见的黑影外被地府幽暗的胳膊所抱住，充满着浓重阴暗的激情，

在阴暗的火把的光辉中，黑暗投向丢失的新娘与她的新郎。

（五）旅程的终止

劳伦斯原准备去威尼斯会会特劳特，但未能如愿。他从罗塔赫写给奥利欧利的信中提到了这点：“昨晚特劳特打来电报，他们在维尔茨堡，离这儿5个小时的路。现他们正在去匈牙利（实际上是奥地利）买那本下流的描写荡妇的小说的路上。他们还说准备寄张支票过来。这当然意味着他们不愿见我，因为他们不想回答我的问题，所以溜之大吉。”

医生那时已警告他不要去佛罗伦萨，但他觉得他与弗丽达得返回那儿去取她上次旅行所弃置的大皮箱。9月23日，劳伦斯再度来到班多尔，住在鲍利伐基，一星期里他们租了博索莱别墅6个房间。10月5日劳伦斯在给伊妮德·希尔顿的信中谈起了这些：“我们住在这幢平房别墅，不错，正靠海。由一位漂亮的娘们做饭……这儿通常阳光充足，而今晨却下起倾盆大雨……现在海又呈蓝色），平台洒满阳光，我要起床了——已写就了一篇报刊文章，快近中午了。”

其时劳伦斯给伊妮德·希尔顿、布鲁斯特夫妇和艾尔丝·贾菲信中说他在德国憋得透不过气来：“这北部充满着死亡。”10月4日他在给艾尔丝的信中说：“现在它害死了斯特雷斯曼，谁能幸免？——除了兴登堡人和在斯蒂尔夫的老妇们外，谁也不能。”南部情况好些：“我们喜爱地中海，早晨它看上去仍像奥德修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译注）那样年轻”。在海上的那段时间里，他进行《最后的诗章》的创作：

地平线上的小海鸟跃出海面

突然显示出一团白、一道闪光、一卷东西、一阵某物出现的欢呼，浮现在海边缘的帆船。

（《希腊人来了！》）

现在海是阿耳戈（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译注）英雄们的海，在黎明

当奥德修斯驶过泡沫似的岛屿，他发号施令

等待，等待仍未将咖啡送来。也没有痛苦的铁窗

海上黎明未破，奥德修斯的航船

仍未通过海岛。我仍得眺望。

（《阿耳戈英雄们》）

在一封给玛丽亚·赫克斯利的信中，劳伦斯对海滨作了描绘，并且说：“这儿对我来说有些像西西里岛、希腊和前罗马。”其时他诗歌中的神话是取自希腊的。最引人注目诗篇中的其中一首《世界中间》则是部分地回复采用象征的手法，没有说数，而表达了劳伦斯许多哲理：

这海永不死亡，永不衰老

蓝色也永不消失，永不在黎明

停止掀浪

让纤细、黑色的狄俄尼索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译注）船开进来

葡萄藤爬上桅杆，海豚跳跃。

假如半岛和东方船运公司的巨轮

像时钟般驶过，驶向米诺斯的远处

我也无动于衷！

他们只能通过，距离永不改变。

现在赐予人们闪光躯体的月儿在升起，可以俯瞰太阳黎明时分我看到来

自诺索斯（克里特岛米诺斯的首府——译注）的从船上下来的细长、赤身裸体的男人们带着务必再次返回的古朴的微笑，

燃起的星火上了岸

他们蜡曲着身子、谈说着消逝语言的音乐。

米诺斯文化的诸神们和泰里恩斯（古希腊的一个城市——译注）的诸神们

不断地听到轻柔的笑声和闲谈；

年轻的狄俄尼索斯和一位陌生人

倾身在门口聆听。

麦克斯·莫尔来看望劳伦斯，住在戈兰兹旅馆，从9月下旬住到10月第三个星期。劳伦斯9月29日写信告诉玛丽亚·赫克斯利，莫尔“活像只被迷惑而来回奔走的海豹”。布鲁斯特一家在莫尔动身之前到达，开始在班多尔找起房子来，他们的女儿现在英格兰学校念书。他们可把鲍利伐基的杜莱特太太搞糊涂了，她问劳伦斯：“为什么，先生，他们为何这样进餐？为什么？他们几乎什么也不吃，不是吗？劳伦斯严肃地告诉她，“你不知道，他们是些佛教徒，是虔诚的印度佛教徒”。

布鲁斯特最终租下了布伦大别墅，离劳伦斯住处大约5英里路。他们在火车上遇见了起身来访的卡特——劳伦斯病未好而不能来车站将卡特接至博索莱。一别6年，卡特看到“肩膀线条分明的身影怎么现在竟被夸张至极端的脆弱”。头发、胡子明亮的光泽褪尽，红润的气色暗淡了，声音也变得疲乏，而双目却炯炯有神。

那年秋天，劳伦斯为《色情文学与诲淫》一书在英格兰的成功而感到高兴。书连同布伦特福公爵的（吉克斯的）审查自辩书一起收入小册子丛书里，由T·S·埃利奥特的费博和费博有限公司出版。劳伦斯的书很畅销，至9月9日，他可向奥利欧利说，书的销售速度达到一星期12000册。

在《色情文学与诲淫》一书中，劳伦斯嘲讽了吉克斯的论调，而文章的大部分篇幅则是关于劳伦斯认为比起为请教徒劳伦斯所厌恶的色情小说和“半途文学所引起的”肮脏、微小、隐秘的摩擦“来更为可取的”惊人“词眼的探讨”。最后，他希望“即使是一般民众也要正视事物，看到它报刊、电影、今日通俗文学的卑怯的手淫色情描写与见于薄伽丘作品中或一些希腊瓶画或某些庞贝（意大利古城，因附近火山爆发而湮没——译注）艺术性冲动的富有创造性描绘之间的区别，这对我们意识的健全是必要的。

激励着劳伦斯将他为巴黎版《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所写的《裘利·罗吉》绪言进行比原先的篇幅大5倍的扩写或许是通俗成功之处。在美国它已作为一本题为《我同裘利·罗吉的争论》的小册子问世。（1930年6月，由曼德拉克出版社出版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 的设想》的扩写本是他所有关于性、文学和潜意识论述中最为精彩的，再度拨动了众多劳伦斯崇拜者的心弦：“只有当心灵和肉体谐调一致时，生命才经受得住，它们间有一种自然的平衡，一方对另一方予以一种自然的尊重。”

《色情文学与诲淫》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 的设想》对一种崇高重要的主题进行宏观的论述。劳伦斯试图在计划创办的《爆竹》杂志中表述出更为折衷的态度。对此他不断给拉尔写信：“K·（柯特连斯基）认为办《爆竹》的想法不好——或许是这样。或许会仅仅收集一小伙不三不四人的作品（1929年9月16日发自罗塔赫的信）。”并且说：“不，我不愿将我自己

完全投身于《爆竹》杂志之中。我不愿抛头露面(10月7日发自班多尔的信)。”又表示：“我觉得《爆竹》不会炸响，我背后肯定有文章(10月11日发自班多尔的信)。”

跟劳伦斯在《三色紫罗兰》中运用花与思想双重意义一样(就像理查德·埃尔曼所注意到的，其带着一种创伤的暗示)，他将《爆竹》杂志看作不仅具有爆竹意义，还有讽刺小品文的寓意。正如劳伦斯告诉给拉尔的：“我向阿尔德斯·赫克斯利提起这问题，可他却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但在11月出的《名利场》中，赫克斯利为劳伦斯的画和其它作品作了大胆泼辣的辩护(丽贝卡·韦斯特在两个月前出版的另一本美国杂志《读书人》中同样为劳伦斯说话)。赫克斯利把劳伦斯看作是“动物与思想家再度结合的参战者”。赫克斯利说，因为“我们的反映已处于荒谬的状态”，所以我们应该“适应于震惊，直到这种状态解体。”

支持劳伦斯的舆论极少。然而在12月18日给奥利欧利的信中，劳伦斯埋怨赫克斯利：“我将永不求他任何事情，为我和为别人，不再求他。他一点儿都不注意。他得罪了我。你是否老是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我表示怀疑。”但这不过是一时使性子。五天内，劳伦斯写信感谢赫克斯利给了他一卷身上有着“某种微妙的魔力”的阿里斯蒂德·梅洛尔作品的复制品。赫克斯利和劳伦斯终身保持着挚友关系，尽管他们有时在信中互相埋怨。1929年2月5日，劳伦斯在给奥托琳娜太太的信中说：“……写那些小说的阿尔德斯不过是可能更体面而不写小说奥尔德斯中的小不点儿——不，我不喜欢他的作品，尽管我欣赏作品中的一种孤注一掷的厌拒和遗弃的勇气。而再者，我觉得只有半个男人、早熟的青少年之类才写这种作品。在实际中的阿尔德斯的身上，无疑男人的味道更浓。”从后期的评论来看，劳伦斯评价赫克斯利的小说多么确切！

1929年7月赫克斯利在给他父亲的一封信中，认为劳伦斯是位他喜爱、崇拜的非凡的人，“但难以相处下去，易怒、古怪、暴躁”。但年岁在改变着劳伦斯。“现在他的病治好了他的坏性子，而动人地变得谦和了”。1929年7月13日，赫克斯利在给他兄弟朱利安信中对劳伦斯不肯接受治疗的固拗感到生气。弗丽达鼓励这种态度，因此她刺激着赫克斯利和他的妻子玛丽亚。他们知道劳伦斯实际病况如何，但除非将劳伦斯手铐起来“强迫送至疗养院，否则无济于事”。

至于这本拉尔1930年印的私下删节版的4页《爆竹》杂志的响爆仅仅是轻微的，其中包括劳伦斯根据莫里研究耶稣的著作而为莫里(生于1889年)所作的恶意中伤的“传记”：“约翰·米德尔顿生于公元1891年吗？凑巧也是有史以来最不诚实世纪中的最不诚实的一年，但对一位无辜的婴儿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者，有人会伤心地问道，对一位死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在12月18日给奥利欧利的信中，劳伦斯问他是否在一星期前听说哈里·克罗斯比在纽约一家旅馆中自杀的消息。在自杀前，他枪杀了一位年轻的女同事：“真可怕——上次喝鸡尾酒兴奋的样子。他妻子带着装着骨灰(他单个人)的银罐子回巴黎去了。他太奢华而堕落了；除了自杀别无他路可走。这使我感到非常压抑。”

来月劳伦斯写给卡莱斯·克罗斯比的信充满忧虑(“你千万不要力图康复太快，最好是晕眩和失明一阵子”)。他认为哈里·克罗斯比“确实有诗人秉赋——要是他不这么拼命摧毁自己有多好！这种堕落的灵魂和它混杂的

声音，使我的心灵萎靡至死”。他说他本人的胸疾使他病倒了，但他的神经“这么健全”；反之，哈里·克罗斯比有强健的身体，而神经却是病态的：“如此而已，生与死交织在我们身上。”

10月，他写信对梅宝·洛汉说，当人们变得彼此感到烦恼时，这不是他们真正自身的机能在起作用，而是由外界一种神秘负担所致：“我以为人们之间这些强烈的反感是一种紧张恐惧的不平衡的征兆。”1月，他告诉洛汉夫人：“就我自身来说，尽管我易怒，易使坏性子，脾气仍不好，但我觉得我内心更能宽恕人，更具有同情心。无论如何，人们微不足道的怪癖不会再使我感到惊恐：甚至是他们的坏心眼。”在劳伦斯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曾用椰子油来给他按摩的厄尔·布鲁斯特说：“在此期间，他得到了很大的安宁。”那些月里，在明媚的地中海海滨他写下的一首诗《死亡之船》于源出埃及和伊特拉斯坎坟墓的象征中映射出那种宁静：

当苹果简直是轰隆隆纷纷落在坚硬的土地上时，
附近是严酷的冰霜。
死亡就像灰的臭味浮悬在空气中；
啊，筑起你死亡之船。啊筑吧！
因为你需要它。
因为遭湮没的航行在等待着你。

还有另一本写就的书：《启示录》，劳伦斯最后的歌颂太阳的赞美诗。全书充满着活力，尽管对那些在最后岁月里见到过劳伦斯的人来说他竟还能写作看上去是一个奇迹。但不管病痛和无疑在吞噬着他的疾病的征兆，他还是说和写给他生命的最后日子，仿佛他要继续活下去似的。

他对《圣经》中的《启示录》感兴趣可远远追溯到他孩提之时在矿工礼拜堂的日子。他从阅读詹姆斯·普赖斯和布拉伐特斯基夫人的著作中所获得的神学思想给他重新考察基督教提供了材料。1922年在新墨西哥州与卡特开始的通信关系增强了他对启示的象征的兴趣。自1929年夏天劳伦斯恢复了与卡特的通信关系后，他写下了大量信件，全与早先写给卡特的信并在一起出版。这些信件将为《启示录》的重印作了一篇极好的绪言。专家们从这些1929年写给卡特的某些信件中将显现出劳伦斯对这主题的兴趣是多么浓厚：

（10月1日）我们要合起来写本书。我很想再在世间投入巨大而古老的异教幻想，以前人性的思想和观念使得一切变得像现在那样渺小，紧塞……

（10月10日）让该死麻木糊涂的学究们去故弄玄虚吧——我们要的是深奥世界的魔力。我着实憎恶约翰（耶稣12门徒之一——译注）带着犹太人似的鼻音训斥别人的架势，道义上这么丑恶——而喜欢地狱判官（古埃及主神之一——译注）的复生，或是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爱神阿芙罗狄蒂所恋的美少年——译注）或是狄俄尼索斯——不是像弥赛亚（犹太人期望中的复国救主——译注）那样将“天国”赐予“善者”——诅咒的救生主好坏都一样——如下着的雨，有公允和不公允之处——像太阳一般……（10月29日），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血淋淋的《启示录》和它们是否有什么秩序并不太感兴趣。但它们对别的旅程来说是一种有益的开端。我爱前基督教的天国——变成这样一座意识监狱的行星——和黄道带的常年。但在任何魂灵“陨落”之前，我更爱前俄耳甫斯的天国……（11月7日）我倒很希望你做些纯粹的天文学和占星术的解释工作——行星、行星之宫、轨道、特性等等——还有黄道带和黄道十二宫：天宫、升高、陨落及黄道和黄道与地平线的轨道交角的

含义。一般人还不知道那些简单的事情，甚至是那些将要读这本书的人……

将近年底，劳伦斯告知卡特绪言写作的进展情况，并且向卡特提供了班多尔的近况：

我已草就了绪言，准备过目一下，形式上稍作加工。我希望能让布鲁斯特女儿来打印——这星期她来——天知道人们对它会产生什么想法。你写完了你的章节后，寄我一本。——我将把《伊诺克》寄还给你。

近来天气极好，阳光充足，气候温和。今天早晨又显得宁静、可爱。布鲁斯特一家仍住在旅馆，没有钱回家，甚至连付旅馆费的钱都没有。上帝保佑，一些东西终于运到了，或几乎运到了，快了。今天有架豪华的钢琴从土伦发送过来，他们将去接。它将是别墅中第一件家具！——孤零零的。——我们正好是一个帮，来自卡普里的的德·齐亚拉夫妇住在旅馆里，还有来自新墨西哥州的伊斯门（艾达·劳）夫人。他们一同赶去喝茶孔，这样博索莱空空荡荡，连猫也厌恶地溜走了。

圣诞节前的一星期里，别墅为一只鱼缸而发生了一场大风波。这只黄“橘子酱”色的依顺劳伦斯的猫（“我以前从不知道有只法国猫——沉着冷静，刚愎自用，和蔼友善，但从不浪费感情）从缸中取出了两条金鱼，鲍利伐基的杜莱特太太将此猫送给先生取乐。”这只名叫米基·博索莱的猫杀死了一条鱼，另一鱼负了伤。12月29日劳伦斯写信麦克斯·莫尔的信又一次显示出他是怎样大笔一挥而仍能赋予动物生命的：“我表示好意地用巴掌拍拍米基·博索莱，他像一条中国龙似地缠住我，所以我多拍他几下，现在他想要撒娇，而我拒绝了。他真不要脸！”

现年17岁的哈沃德·布鲁斯特带着劳伦斯姐姐给的几大篮吃的同一天从英格兰赶到了。她打印好了劳伦斯为卡特“龙”书所作的绪言。但它看上去太冗长，劳伦斯将它搁在一边。后来他撰写了一篇较为简短的，不管怎样，它没有在卡特《启示录之龙》一书中出现。但这篇“绪言”劳伦斯辞世后几月竟登载在《伦敦信使》上（发表于1930年7月）。这是一篇研究《启示录》的优秀论文，有一些论述信经的重要见解。信经的力量劳伦斯觉得“唤起了难以理解的深邃的感情本性和能动本质。多年来所积累的经验仍在一种信条中搏动。并且我们在应答中搏动”。

劳伦斯显然不再顾及“置于脑后”的绪言，奥利欧利首次将这篇绪言连同《启示录》一起出版（1931年）。在绪言中劳伦斯发觉基督教是一种为“精神贵族”服务的宗教，带着一种强制命令与温和的劝导之间的双重冲突。对他来说，《启示录》是弱者反对强者的强烈的呐喊，因而它在百姓中仍深得人心；他记得教堂里的矿工和他们的妻子将淫荡的巴比伦（古代巴比伦王国首都，这里借指伦敦——译注）看作是他们想要根据《启示录》所提供的夸张的摧毁的想象而对它进行破坏的邪恶的现代城市——然后“获救”的破坏者们可从辉煌的天国幸灾乐祸地盯着废墟看。这种态度使劳伦斯感到厌恶，因为它有助于将爱的福音转变成恨的福音。他的结论是人们不能在分离中生存，因为他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一分子。

在撰写《启示录》这点上，他翻出的全书中最重要章节的其中之一显示出他所写的一切是怎样来自于一种所有生命聚合的深层的感觉。这一章节开始写道：“一个人最热烈追求的是他生活的一致，而不是他自身与世隔绝的‘灵魂’拯救。”结尾写道：“我们所要摧毁的是我们的虚伪、无机的联合，尤其是与钱相关联的，重新建立宇宙、太阳和地球，人类和国家家庭的生

活的有机联系。以太阳为开端，余下的慢慢地、慢慢地将会发生。”

1930年2月4日，恰在他离开班多尔之前，他最后一次写信给卡特。在一张正面有咆哮着的虎头图案的明信片上，劳伦斯说他正准备归还卡特的原稿。他躺在床上，“这星期可能去疗养院。倒霉。论《启示录》的长文没有写完——撒手不写了。假如你走运出示篇幅较短的原稿，或许你会更好些”。阿克沙·布鲁斯特说劳伦斯的老朋友齐亚拉夫妇请劳伦斯吃纽约式的午餐他开心得很（像《阿伦的杆杖》中的南·迪·托尔一样，安娜·齐亚拉是美国人）。在班多尔的他们的那次午餐上，劳伦斯“迟迟不肯离去，而踱步到山庄，坐在凛冽的寒风中。打那时起，他消瘦起来。”

1月底，劳伦斯写信给奥利欧利：“当《针锋相对》搬上舞台时，赫克斯利夫妇在英格兰——明晚第一场——奥尔德斯看上去很得意，在男女演员中露了头角，妙极了。”

劳伦斯害怕他姐妹们计划性的来访而勾起对中部和所有乡间桎梏的回忆。甚至连忠实的艾达不带埃米莉的单独来访，数次也太多了——凯瑟琳·卡斯威尔注意到劳伦斯“那时其实不愿见到艾达”。埃达只得推延时间，在2月3日的一封信中劳伦斯声称准备去文斯的一所疗养院：“在我呆在文斯期间，你不要来这儿，他们将只让我一星期二次会客。所以稍等一些时间，等到我四处兜转一下而去文斯之时你再来。他们说那儿天气不错。”

疗养院是由安德鲁·莫兰医生介绍的。在莫兰携同他妻子去科特达祖尔假期旅行之前，他接到了戈特勒和其他安排会晤的劳伦斯在英格兰的朋友们的告知，劳伦斯对治疗的想法很反感，他甚至可能粗暴地拒绝商讨此事。不管怎样，处方必须是准确而又简单的。他的朋友们解释说，劳伦斯经常忽视随附的用法说明，仅仅接受对他有吸引力的部分而置其余的于脑后。

但莫兰发现当他们在博索莱一起用茶点时，劳伦斯既愉快又友好。“他不失时机地向我们表示欢迎”，莫兰医生回想道。当他的妻子准备茶点时，他亲自烤着面包，干起来正儿八经的，又非常好玩。劳伦斯和医生坐着谈，尽管劳伦斯“总的说来是可爱的，又温文尔雅，情趣横生”，但医生不久感到他的主人累了。莫兰告辞了，医生安排第二天早晨来作专门探望。莫兰医生在给本书作者的信中，记录了其结果：

我发现尽管劳伦斯显然患肺结核已有好长一段时间了——大概10年至15年左右——他不光从未严格地接受治疗建议，还可能有甚于此者。当想起几件微不足道的琐事时，他便对大部分给予的劝告置之不理。我发现他极度衰弱，明显地病得不轻，需要卧床休息好几个月，假如他有机会阻止病势的话。所有他看上去对结核病治疗所知的是他从在疗养院中度过几个月后使他彻底康复的他的朋友马克·戈特勤那里所学到的东西。他能记起的唯一的一课是每天早晨他应该散步三或四英里并要喝许多牛奶。劳伦斯试图怀着忧郁的决心进行散步活动，但近来他力不胜任，而代之以车行。他承认稍一会儿就感到疲乏，特别是当从大西洋慕名而来的陌生人来访之时。

虽然他病情的严重程度是清楚的，但我觉得并非一点希望也没有，因为他从未有过一次适当治疗的机会，当做所有错事之际而使他活得如此长久的他的抵抗力一定是令人惊异的。我的困难是怎样替他安排治疗监护和他需要的环境。他自己想回新墨西哥州，但完全排除迁移困难外，他如此孱弱以致于我觉得他可能在途中要出意外。他强烈反对在瑞士和英格兰接受治疗，看上去唯一的可能性在于找距离不太远的适宜之处。地中海海滨本身对这类病

症有一种坏声誉，而使之面临加剧他支气管炎的班多尔的环境。所以我建议他该去文斯的一所小疗养院，那儿是高出海平面 100 英尺、离内地数英里远的地势优雅的胜地。呆在刻板的疗养院劳伦斯会受不了的，但这所疗养院除了有效的医用和护理设施外，则更像一所幽僻的旅馆。

莫兰医生登上了文斯，并从那里写信谈了埃德·阿斯特拉疗养院的情况。劳伦斯在 1930 年 1 月 30 日的回信中仍想企图逃避治疗，仍说起他支气管炎的折磨：

来自文斯的信收到了，谢谢。我不太想去埃德·阿斯特拉疗养院，我仍躺在床上，不做任何事，不见任何人，因为也无人可见，除了我妻子的女儿之外，她同我们呆在一起。到昨天，支气管炎已好了不少——但今天又有一点复发了，可能是刮北风的缘故。如果病情好转的话，我不去文斯了；如果不见好转，我就去。

我们俩对你的忠告非常感谢，我看到的建议是合理的。我会给你一本签名的初版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可以从佛罗伦萨搞到一本。但我将它寄到何处呢？寄给莫兰太太？她在门通的住址是什么？

下星期再汇报病情进展情况。

但没有什么进展可以汇报的。布鲁斯特——他回想起在接近生命的终点时，劳伦斯不再反对上帝一词，并且说，“我想要找到上帝：我希望弄清我同他的关系”——回忆起在他们最后的其中一次谈话中，劳伦斯告诉他，“我的书引起的敌意冲我而来，使我落到这种地步”——轻轻拍着他的胸脯。“看起来我身体内有邪恶的灵魂；假如我在一处地方病有所好转，它就跑到另外地方去了”。

1930 年 2 月 6 日劳伦斯离开班多尔去了疗养院。

弗丽达写道，“劳伦斯总是把疗养院想像得令人惊惧，我们俩憎恶它。他是这么热爱自由！”她从未让他感到像一位病员。”只要我在和有他的灵魂，他永不会感到像一件可怜的废物！现在我们只得屈从。”

当他们准备离开之际，劳伦斯“带着一副急切的脸色”告诉弗丽达递给他所有他的稿子。她将它们放在他的床上，他把其中大部分撕碎了，然后“将一切收拾停当，帮助他捆扎皮箱，我没有哭过”。动身前那天早晨，劳伦斯端坐在床上修改着《荨麻》的校样，猫米基在紧闭的门外黯然地搔痒。当阿克沙·布鲁斯特进来时，劳伦斯仰望了一下。他说他不久将回来来观赏他们的松树林，她对此表示相信。

劳伦斯夫妇同厄尔·布鲁斯特乘坐一辆车离开博索莱。阿克沙留在班多尔。她抓走了米基。她看到 2 月 6 日早晨的聚会结束后，他们的车上装上了杏花。

去文斯有 5 小时艰难的路程。他们只得从土伦坐火车到昂蒂布。弗丽达回想起来，在土伦车站，劳伦斯“只得上下楼消耗他承受不起消耗的体力”。火车那么拥挤，她只好安排去昂蒂布的一间包厢。在火车的颠簸中她与布鲁斯特同这位苍白、虚弱的男人静静地呆在包厢中。布鲁斯特回想起，不管情绪低落和疲惫，劳伦斯在日光时隐时现的那天试图轻快地打开话匣子。在昂蒂布，他们遇见了巴巴拉·威克利的一位朋友布莱尔·休斯·斯坦顿，他用车带着劳伦斯和他一帮人走完余下的路程。

驱车登攀文斯的路上，“他谈着，兴致很高，”布鲁斯特回忆道。最终他们从凹凸不平的山区高地来到平坦的石块泥灰砌合成的葡萄园中的小镇，

它的一座四方形的塔高出红瓦片屋顶矗立着。

8 世纪前图卢兹的一位诗人皮埃尔·维德拉赞颂劳伦斯那天踏上那片土地：

Qu'omnos aptondous repaire
Com de Rozert roqu' a Vensa...

（没有哪一旅程比得上从罗纳到文斯的路程更美妙——原注）

劳伦斯来到埃德·阿斯特拉疗养院——来到斯塔斯。而它更像一家旅馆。劳伦斯写信给玛丽亚·赫克斯利，“那儿是一家旅舍，护士给你量体温，两位医生一星期来看你一次”。他说，X 光显示出，“自从在墨西哥开始的 5 年中，肺部萎缩得非常小”。他仍将一切归结于“可怕”的支气管炎；它“令人恐惧”：炎症已感染了这个可怜的人的腹部和肝脏。”

莫兰医生现在回到了伦敦，收到了 X 光报告。起先变化“看上去略有好处；无论如何，劳伦斯写信告诉我他感到空气比较新鲜，他的妻子弗丽达为他得到适当治疗而感到宽慰”。

劳伦斯房间涂上了布鲁斯特称作“深沉的、压倒一切的蓝色”，当布鲁斯特将一束束橙色的花卉带到他房间时，劳伦斯表示感谢，其中和了那些令人敬畏的蓝色墙壁的光彩，使其变得稍微柔和些。”劳伦斯爱上了自然风景，不管怎样，从他的小平台：他可看到远处的卡涅、微光闪烁的海岸线和地中海。

弗丽达住在文斯的尼亚旅馆，天天来埃德·阿斯特拉疗养院。2 月中旬，她返回班多尔的博索莱别墅，把一切收拾停当，并交出别墅的钥匙，巴巴拉呆在那儿。她和巴巴拉迁移到了德·齐亚拉在卡涅刚刚退出的房子，从文斯乘车不到半小时可赶到。

劳伦斯开始感到“比较快活”，希望不久可散散步，但他发觉疗养院本身单调乏味，“只有法国人在恢复健康，而我却沾不上边”。他每天走下二层陡的楼梯去吃午饭，而要不然他只得躺在床上，希望不久他能“再次散散步”。法国医生们与莫兰持相反意见，认为劳伦斯应该稍许活动活动，不要整天休息。劳伦斯赞同他新的医生的看法：“有一定量的活动比较好。”他给奥利欧利寄去了一张明信片，告诉他：“听说你还好很高兴——小心些，不要实在搞得精疲力尽，像我一样。——医生们认为他们不久还能使我有好转——但愿如此，对此我感到那么疲乏。”

但他仍能享受南部地区冬末的风采和植物的花香。他对玛丽亚·赫克斯利说：“含羞草属植物与在澳大利亚的一样，都呈云状含苞怒放，杏花非常可爱。”遇到好天，他可以坐在园子中。他写信对玛丽亚·赫克斯利说：“如果你光临的话，或许我们可能有几天快活的日子——如在黛亚布勒列兹一样，仅仅只是快活。”

赫克斯利夫妇为《通向天堂之路》的问世而呆在伦敦，坎贝尔·狄史逊将它改编成剧本，取名《针锋相对》。劳伦斯希望剧目能赚一笔钱，但它并没有赚到。丽贝卡·韦斯特在她为劳伦斯所作的《挽歌》中对小说中如此生动形象在舞台上却没有生气作了解释，但她觉得马克·拉姆皮形象还是生动的，她认为，“甚至高出我们的阿尔德斯·赫克斯利都觉得他得尊重劳伦斯”。当帷幕一降下，她向她的同伴作了提示，她同伴说，“你知道，劳伦斯病势危急，”丽贝卡立即回答说，“呵，我不相信，这完全不可能”——因为世界没有劳伦斯就会像赫克斯利剧目中没有拉姆皮：“然后最好的将会是虚弱

无力的。”

躺在病床期间，劳伦斯读了许多书。对劳伦斯什么都没带而感到吃惊的布鲁斯特在疗养院图书馆寻找起可读的书籍，而找到几本司各特的法文翻译版作品。劳伦斯写信感谢劳伦斯·鲍英吉尔惠寄的“《毒蛇》和中国书”，对此他未作评论。《毒蛇》当然是杜波斯·海沃德的《毒蛇的女儿们》（1929年）劳伦斯关于“海上姑娘的形象是苍白捏造的”的论说暗示着他一眼就看穿了一种文学时间上的骗局，琼·罗威尔在《摇篮深处》中的有目的的海上冒险活动。他对一本书的评述——“我对自我感觉良好、年轻的美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像机前故作姿态的做法感到厌恶”——会同托马斯·沃尔夫的《瞧着回家路，安吉尔》1929 有关吗？

劳伦斯对玛丽亚·赫克斯利从伦敦寄来其他书籍也表示感谢：《柯利恩》，对此书他没有作什么评论，而关于“布朗宁书”，可能是奥斯伯特·伯德特的《布朗宁一家》（1929年），他发觉“有些丢脸——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它的最高水准上稍作一点蠕动”。

其时布鲁斯特离开文斯而回到了班多尔；他勉强离去，期望再次去印度之前返回再作逗留。而在那最后几星期中，劳伦斯不断地接待来访者。艾达·劳、伊斯门从彭多尔赶来与弗丽达和巴巴拉呆在一起。2月27日，艾格·卡恩和他的妻子也来了：“我喜欢他。”劳伦斯写信告诉布鲁斯特，“——有一点儿真正的宗教信仰。”艾格·卡恩又谈到了在巴黎一家私人美术馆展出劳伦斯画品之事。劳伦斯打电报给多萝西·沃伦，叫她保存好警察已归还给她的画品，而不要航运到文斯，而画品卷紧放在玛莎·戈登·克劳奇的农民陶器作坊中——这些画品后来被船运到陶斯。弗丽达去世后，安吉洛·拉伐格里将大部分画卖给了当地拉福恩达旅馆老板萨基·卡拉维斯，他在那儿将它们展出。

住在靠近文斯的格拉斯的H·G·威尔斯于2月24日来探望劳伦斯，并告诉劳伦斯他高高兴兴地摆好姿势让雕塑家乔·戴维森塑像，又说劳伦斯应该让戴维森“塑”他的头像。威尔斯在他的别墅款待戴维森，建议戴维森马上去文斯为劳伦斯塑像：“我进行款待不是为你，而是为他。你一定会将他塑得令人满意。我敢肯定他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种虚弱的样子。你能使他振奋起来。”

热诚、长着胡须的戴维森——小奥古斯塔斯·约翰——第二天早晨携同他的妻子来到了文斯，而取消了原先去巴黎的计划。弗丽达迎接他们，送乔·戴维森上楼，那儿他发觉劳伦斯在阳光充足的阳台上用午餐。劳伦斯同戴维森聊了起来，最终他抓过粘土塑了起来。他问劳伦斯是否塑过模型，劳伦斯说他曾试着用代用粘土，但他怕触到这种材料，怕嗅到它的气味。戴维森拿起他用的一些粘土，劳伦斯坐着将粘土抓在手中，他喜欢它的凉快和干净。戴维森答应寄给他一些，因为劳伦斯说他喜欢塑小动物。

1小时后，劳伦斯在送戴维森下楼用一些午餐的当儿打了一个盹。接着劳伦斯穿着他的蓝色的睡衣端坐在床上，雕塑家完成了工作。几天后在巴黎，戴维森对哈里·佩恩·惠特尼夫人谈起了劳伦斯病情的严重性，这位富裕的美国妇女说：“你不能打电话给劳伦斯夫人或什么人、叫他们不惜代价吗？——她将介入此事。戴维森打电话给在格拉斯的威尔斯，但在那时就是连好心的赞赏者的钱也帮助不了劳伦斯。因为对一位经常对人类的愚笨进行挑剔。而不是对生活本身进行挑剔的人来说生命到达了终点；一位没有自我怜

悯之心、写生活和它的崇高及悲哀、并且用无可匹敌的活力来进行写作的男人。

病情看上去稍有好转后，病魔再度向他袭来。他厌恶起疗养院来了，至2月20日感到他已“在这里相当糟糕——觉得我有点‘感冒’——太难受了。这地方什么也没有——我还是呆在博索莱好”。第二天他说：“我这里情况很糟很凄惨，如此糟糕的夜晚、咳嗽、心脏、明显地愈加严重的难受。似乎得了流行性感冒，但他们说没有。这地方不好——不会久留——我还是住在旅舍里好——惨啊。”显然于同一天，“星期五”（2月21日），他最后一次写信给奥利欧利：

听说你好转，感到高兴。我不行——相当糟。这地方不适合于我——不会久留，或许再一星期。感到沮丧。也许我们会租一所房子呆上一小段时间。

你能寄我一本初版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吗——我要将它送给我的英国医生——他不收费。

天气糟糕——我又整天躺在床上——感到悲哀。

至2月27日他能写信给埃达·克拉克和厄尔·布鲁斯特，说他“还是老样子”，不管怎样“没有恶化”。又说3月1日将迁入文斯的一所住舍中，并且有一位从尼斯出来的英国护士：“我将会受到更好的照护。”突然准备同穆克基一起去印度的布鲁斯特在离开班多尔启程之际收到了他的信。他希望两个月内回来，然后希望去看望劳伦斯。

作为一名作家劳伦斯于动身前不久在疗养院作了最后的努力进行写作。他支撑在床上，勾勒着已寄过来的埃利克·吉尔的《艺术刍言和其它随笔》的书评。弗丽达说过：“劳伦斯去世前几天写作这篇未完的书评。这本书使他发生了兴趣，在许多方面他赞同它的观点。接着他对写作感到疲乏，我劝他别干了。那是他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

所以它能告诉我们许多劳伦斯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所思想的和所感觉到的东西。

正如劳伦斯·克拉克·鲍威尔所指出的：“尽管（劳伦斯）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病入膏肓，但任何人都不能通过阅读而理解它。思路稳定，行文还是那么委婉、整齐、流畅”。的确，它有一种人们认为濒临死亡的人力所不及的幽默和生动感——不是一位显然是健康者而即刻死于猝不及防的心脏病意义上的濒临死亡者，而是一位受到病魔长期折磨而消瘦下去者意义上的濒临死亡者。这儿我们发觉为了将“坏事”从原先的方面摆脱开来，他说吉尔不是一位天生的思想家或天生的作家，而是“一位不成熟和粗鲁的业余活动者：粗鲁是唯一之词：令人发狂，就像一位使人讨厌而没有教养的工人在小酒店中大吵大嚷——‘大发雷霆’一词也许更加贴切——并且猛击着他的拳头”。

吉尔甚至也不是一位艺术家，劳伦斯说，而恰恰是一位工匠。但劳伦斯感到吉尔许多所说的是有价值的：他的断言，举个例子说，当他在业余时间干他所喜欢的工作而在工作时间做要求他做的工作，人处于奴役之中；当他在工作时间做他喜欢做的工作而在业余时间做要求他做的工作时，人处于自由之中。这些观察比起他“在所有卡尔·马克思或怀特黑德或一打其他统加起来哲学家身上”发现的包含着更多的智慧。吉尔将他的真理抛向“现代产业主义的牙齿”，即使表达这样的真理是徒劳的——这就是“机灵的讨厌鬼们”从未将它们表达出来的原因所在。但它才是无用而货真价实的真

理。”

劳伦斯讨厌吉尔的天主教，尤其是因为他是位皈依宗教者：因此愿意“承受着所有的老上帝，看都不看一眼而忍受着苦难，称那叫正统的宗教。大的苦难是上帝，小的苦难诸如博爱、贞洁、顺从和谦卑。将它们整个地吞咽下去，这样你就是一位道地的天主教徒；将它们舔一舔，看看什么味道，这样你就是位使人感到不舒服的新教徒。”

这篇文章的结尾一段对阐释劳伦斯恰好在他辞世前那些天中的内心世界显得如此重要，所以必须将它完整地援引出来：

吉尔先生有两种主题：“干得不错”和“漂亮”——或相当“漂亮”。他几乎总是诚实、坦率和深刻的，名副其实的预言家，当他讲到干得不错之时。他几乎总是厌恶漂亮。为什么，啊，为什么，人们会继续给诸如艺术、漂亮、上帝和代表着我们当中深奥的感情状态的词下定义而因此对定义无能为力了吗？为何对此费尽心机？“漂亮是绝对的，可爱是相对的”，吉尔先生说。是，是的，但实际上怎么样呢？漂亮归漂亮，可爱归可爱，并且假如吉尔先生认为漂亮实在应该有一种精妙的道德特征的话，而可爱则仅仅是偶然的，或就美丽来说是对等的——是啊，为什么不？但别的人并不在意。

就劳伦斯所关注的，不管怎样，“别的人”并不在意。赫克斯利一家刚从伦敦出来就来到了戛纳；剧目演出进行到了最后一星期。他们于2月25日抵达，立即去看望劳伦斯。曾说过在那最后两年中尽管没有燃料加进去而劳伦斯却像不可思议地燃烧下去的一片火焰的赫克斯利立刻看到现在“奇迹结束了，火焰也逐渐熄灭了。”他和他妻子呆在戛纳陪伴着劳伦斯度过最后的日子。

莫兰医生在2月25日给戈特勒的信中谈到了一位疗养院医生对劳伦斯进行观察的情况：“双肺呈中度严重状态，但它是引起最大焦虑的一般状况；他胃口差，并且对治疗不作反应。”

已注意到病中的劳伦斯“从未丧失过他的尊严”的弗丽达不想晚上让他独自一个人呆着。当她出去时，他会说：“现在在天亮之前我只得打几次滑铁卢战役了。”他曾对巴巴拉说：“你妈妈不再关心我了；对我的死亡她感到讨厌。”

一天晚上弗丽达知道他带着感激和明亮的眼神要她陪着，他把身子转向巴巴拉说：“我需要你妈妈不是经常的事，不过今晚我的确要她呆着。”弗丽达试着躺在一把长藤椅上，不时地为了一颗慰藉人心的星星而去仰望漆黑的天空，但天空没有月亮，没有星星。

弗丽达在那儿呆了几个晚上，听到黑夜楼中上上下下的咳嗽声，“老的和少的咳嗽声”；它就像托马斯·曼《魔山》中干咳的合唱，这本书弗丽达大概没有读过。当隔壁房间的小姑娘哭喊：“妈妈，妈妈，我受不了啦！”，弗丽达为劳伦斯稍有点耳聋而感到庆幸。

有时他显得烦躁，一次他对她说：“你睡在这儿对我没好处”。她走出去抹眼泪，但待她进来时，他温柔他说：“别介意，你知道我除了你什么也不需要，但有时有些事情在我身上表现得比较强烈。”几星期后，弗丽达能写信给宾纳。（3月13日）：“平稳地走到底，他充满生气，我们都在充分利用我们的日子，然后他如此壮烈地面对着死亡，如此像一位男子汉，我能帮他到底，谢天谢地。”

恰在生命临终之际，他只得从疗养院中搬出来，仿佛他不愿意死在那儿。

总是为劳伦斯不能休息而感到抱歉的莫兰医生说：“给了劳伦斯如此敏锐感觉、如此激昂情感的那些特别的素质使得他完全不可能长时间地屈从于有限的疗养院的生活方式。”

劳伦斯称他在埃德·阿斯特拉疗养院的病是“流行性感冒”。莫兰医生已注意到了胸膜炎的复杂性。谈到劳伦斯首次来到埃德·阿斯特拉疗养院而健康状况有好转后，莫兰医生说：“不幸的是，几周内一场胸膜炎的侵袭使他突然病情复发，而他消瘦的身体无法抵抗得住。特别是他在临终的几天里不愿住在疗养院，硬要迁到山庄别墅中。”3月4日莫兰医生写信给柯特连斯基：“劳伦斯离开了人世，多可怕……我现在希望当初不要催他去文斯，因为我惊恐不安的是我的努力只使得他最后的几星期中过得更不舒服。”

已故诗人罗伯特·尼科尔斯在一封恰好写于劳伦斯去世后的信中说赫克斯利告诉他劳伦斯最后的一次责备，“弗丽达，你害死了我”——由一位虚弱的濒临死亡者向他充满活力、健康的伴侣提出的一次不公正的责备。

没有人能替代弗丽达进行这次迁移，3月1日（圣大卫节）迁到了罗伯蒙德别墅（后来叫奥兰拉别墅），事情就发生在那儿：

我们准备将他领出护房，租下一所他住的别墅……只有这次他让我帮他穿上鞋子，别的事他总是自己动手。他走进颤动的出租车来到住舍，躺倒在他临终的床上，精疲力竭。我睡在他能望见我的睡椅上。他仍在进食。第二天是星期天。“别离开我”，他说，“别走”。所以我就坐在他床边看书，他在读哥伦布的传记。中饭后他开始非常难受，一顿茶功夫后他说：“我肯定有热度。我迷迷糊糊的。给我体温表。”只有在这次，我看到他痛苦的脸部表情，我哭了起来，他说：“别哭。”一种急促、强迫发出的声音。所以我不再哭了。他叫呼在那儿的阿尔德斯和玛丽亚·赫克斯利，他第一次痛苦地放声大哭起来。“我现在该要些吗啡，”他对我和我女儿说，而阿尔德斯出去找医生要一些……接着他说：“扶住我，扶住我，我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的手在哪儿……我在什么地方？”

然后医生进来给他吗啡注射，一会儿他说：“现在我好些了，要是我能出汗我会好些的……”接着又说：“现在我好些了。”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玛丽亚·赫克斯利与我呆在一起。我始终握着他的脚踝，发觉它充满着生命活力，所有的日子我将他的脚踝握在我的手中。

1930年3月2日晚10时，劳伦斯与世长辞了。“他呼吸比较安稳，而突然间呼吸中断了。他的命数在他鼓起的胸脯撕裂着的时刻到来了，他的面颊颌部凹陷下去，死神已攫住了他”。

让我用这青色、叉状的花炬自引

走下越来越黑的阶梯，那儿是青上加黑的青色。

后记：传奇的余烬

1930年3月4日，当劳伦斯素色的栎木棺材葬下墓穴时，一小伙朋友靠着文斯小墓地的墙站立着：弗丽达和她的女儿巴巴拉在场，还有赫克斯利夫妇、德·齐亚拉夫妇、艾达·劳、阿克沙·布鲁斯特、罗伯特·尼科尔斯。没有举行仪式。弗丽达回忆道：“我们安葬他非常草率，像安葬一只鸟……我们将花放在他的墓穴上，我所说的就是‘再见了，洛伦佐。’他的朋友和我把大把大把的含羞草属植物放在他棺木上。”

弗丽达住在罗伯蒙德别墅，照看她葬礼后不久就病倒了的女儿。弗丽达在这时一封未注明日期的写给卡莱斯·克罗斯比的信中说：“我多么思念洛伦佐，不管他的病和所有一切，（思念）他的慷慨和他给予我的生命。”因为劳伦斯没有立下遗嘱而离世了，根据英国的法律，弗丽达仅能接受他留下的4000英镑（两万美金）的利息；她怀疑甚至不能要求索取留下来的手稿和画品。正如她在另一封发自文斯而没有注明日期信中对贝西·弗里曼所说的：“我至少已遭受到这该死的折磨。”

劳伦斯去世后不久，莫里来拜访劳伦斯在文斯的墓。莫里和弗丽达最终成为情人。这一点他在23年后的日记中反映出来：“她第一次投入我的生命之中，我体验到了爱情满足的真实含义是什么。”

直到1932年9月3日，关于劳伦斯财产的论争才在伦敦遗嘱检验法庭展开。弗丽达要求法庭取消早先将则产转让给乔治·劳伦斯的管理遗产委任状。她另一位主要对手是埃米莉·劳伦斯·金；劳伦斯的妹妹埃达站在乔治和埃米莉这边，尽管开始她持中立态度；但来自弗丽达律师和代理人的压力激怒了埃达，弗丽达对劳伦斯家属所加的诬陷之词更加惹怒了她。由于莫里作证，弗丽达打赢了官司。去年莫里出版了劳伦斯的第一部传记（《妇女之子》）。弗丽达烧了一本书，把灰烬装在一只纸板箱中寄给他，但他没有怨恨地忍受了。他作证说1914年战争爆发后的几个月后，他立下了有利于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遗嘱，而劳伦斯又同样立了一道有利于弗丽达的遗嘱，弗丽达辩解，她和劳伦斯在旅途中丢失了证明。

弗丽达写信给一位朋友：“案子还未被提出来时我不敢肯定能打赢：一位严厉的老法官梅里瓦尔伯爵，但我要将所有力量化在证人席上，恰到好处地得寸进尺，我感到我可以劝鳄鱼动心而认为劳伦斯要我继承他的遗产——他们说我有说服力——但成功是属于洛伦佐的——但劳伦斯渗透着这英国的作法现在恰是令人吃惊的，为他的缘故，我充满了最大的满足——我没有白活——所以有一支为你而唱的凯旋之歌。”

在同一封信中弗丽达注意到“埃达自然是大发雷霆。”埃达·劳伦斯·克拉克在给同一位朋友的信中证实说：的确，来自双方这些妇女的一系列交往对一位持中立态度的朋友来说是一种迷人的劳伦斯经历的副产品，假如信中有不平之气的話，那么它部分是两位女子对劳伦斯不同类型的钟爱之情的强化。埃达仍怀恨在心，当莫里出人意料地于1933年耶苏受难日代表弗丽达来进行调解而拜访她时，埃达的丈夫用“耸人听闻的话”解释了他对弗丽达的态度，当埃达明确表示她不想同她前嫂子进行任何交往之时。

弗丽达孩提般的秉性使她更有可能不念旧嫌：生活仍是充实和丰富的，因为她尽管身为劳伦斯寡妇而有烦恼、痛苦，但她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和荣誉（在牛津大学演讲，与肖伯纳夫妇共餐）；她又一次深深地陷入情网之中，

因为她觉得劳伦斯希望她这样做。埃达经常为她的大儿子杰克的健康而担忧，他削瘦脆弱，一头红发，对她来说，他出人意料地像他年轻时的舅舅。埃达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在此期间，杰克死于德国战俘集中营。但在她的晚年，埃达拒绝相信他已离开人世：每天午后，她常在她和里普利家里坚持说她能听到他骑着自行车进巷而开门的声音。

跟劳伦斯有密切关系的其他许多人也相继去世。其中一位是欧内斯特·威克利，劳伦斯去世后，他要求弗丽达再做他的妻子。他死于1954年5月，卒年90岁。威廉·霍普金也活到1950年，终年90岁。劳伦斯终身忠实的支持者，这位生气勃勃的小老头命中注定地在靠近伊斯渥的一个小镇上扎下了根，他跑到那儿作关于他生死之交的朋友的演讲。威廉·霍普金的寡妇（他的续房，奥莉夫）仍住在伊斯渥；他的女儿伊妮德·希尔顿太太和她的女儿在加利福尼亚州定居。

威廉·霍普金甚至比吉西·钱伯斯还得活得长久，他把他的墓志铭写成一首诗——《米丽娅姆》——待她1944年4月3日去世后为伊斯渥报纸所作。吉西归还了劳伦斯20年前的最后一封信后，1933写信给海伦·考克，“我们再也没有书信来往，我从未听到他的音讯”。她不知道他最糟糕的病情，在以后证实是他死之日她觉得她听到过他突然说：“你还记得只有痛苦而没有任何欢乐吗？”而第二天仍不知道他已与世长辞了。她觉得她看到过他一小会儿，“恰好在我认识他的早先的日子里，他脑壳后戴着一顶小帽子”。大约离劳伦斯去世前18个月，吉西告诉海伦·考克，她“强烈地感到他不时地在吸引着他，迫切地想知道看上去急需的某些通信关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一种在同一封信中出自于可以将劳伦斯说成是“受束缚的人”。他的“说理和探究只能给他的极度痛苦作证”者的好奇的推测。但这是表现吉西以后对劳伦斯态度特征的外在的具体化的自我谴责的另一例子。

在7年未见到过吉西之后，海伦·考克于1940年在诺丁汉郡的一家茶室中见到了她，这次会面在她关于吉西的传记《D·H·劳伦斯的“公主”》1951年中作了强有力的描写。吉西，“一具拱腰、笨重的身躯，”疲乏地将她自己硬扯到精神崩溃的后果中去，她满腹忿恨地谈到了战争、他的病情、她的叙写劳伦斯的“著作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对待”。当地发觉海伦对她表示同情时，她把怨恨发泄到她老朋友身上，掉转脸扬长而去。“我们分手了”，海伦·考克写道，“知道的都说人”考克太太比劳伦斯多活好几年。1970年，她在陶斯参加了劳伦斯讨论会，在那儿她遇见了主要的幸存者，在鸡尾酒会上有多萝西·布雷特。布雷特拒绝参加讨论会，她的赞助者将不支付她要求过高的费用。在年近90之际而横渡大洋的瘦小的海伦·考克精神饱满，容光焕发，是讨论会上的头面人物。

凯瑟琳·卡斯威尔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就去世了；她的丈夫唐纳德死于伦敦停电熄灯期间的一次事故中，劳伦斯其他几位朋友也遭横死，其中三位自杀了。由于压抑和健康状况恶化，马克·戈特勒于战争爆发前的一个夏天在伦敦自杀身亡。劳伦斯喜欢的布鲁斯特夫妇的朋友迪恩·戈帕，穆克基在一次精神崩溃后，于1936年在纽约悬梁自尽。反复无常的菲利浦·黑索尔坦因之死更加惊人、更可以预报：1930年12月，他长久没有看到的劳伦斯去世的同一年，黑索尔坦因（根据他的朋友和传记作者塞西尔·格雷）在他的伦敦公寓拧开煤气管而摆脱了桃色事件的纠缠。

但也有一些老的劳伦斯崇拜者发迹了，直到他们一命呜呼为止。劳伦斯

的同学乔治·尼维尔 50 年代是在伯明翰的政府官员，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要年轻好几岁。米歇尔·阿伦在 20 年代因他的昙花一现、微不足道的长篇小说而交了好运后，像一位证券经纪人似地退休住在派克大街的公寓。同阿伦一样，阿尔德斯·赫克斯利被癌症夺去了生命，而经过一段既有益又杰出的创作生涯后，诸如《幕后策划者》和《卢顿的众魔》的“生产”的史书和他的旅行见闻讲解比起他小说中无力的尝试来要丰富得多。作为劳伦斯在世期间勇敢地为他说话的为数不多者的其中一员，赫克斯利在有生之年继续这么干。1932 年，在伊妮德·希尔顿的帮助下，他编辑了已成为劳伦斯作品中的里程碑的大部头的信件汇编，正如赫克斯利为书信所作的、已成为评价和鉴赏劳伦斯的里程碑的绪言一样。死于 1962 年的理查德·阿尔丁顿准备将多种著作公诸世间，其中有一些是关于劳伦斯的。1954 年，阿尔丁顿冒险出版《皮诺曼》一本关于已故的皮诺·奥利欧利和已故的诺曼·道格拉斯的非正规传记，一本被道格拉斯派系看作是诬蔑的书。阿尔丁顿在 1956 出版了传记《阿拉伯半岛的劳伦斯》后，不公正地遭到了讽刺和挖苦，其是这样不尊重地对待一位“民族英雄”的。D·H·劳伦斯出身高贵的朋友厄尔·布鲁斯特在他妻子去世后住在印度。他们 1934 年出的《回忆录与通信》是研究劳伦斯著作中最优秀的一种，主要是因为作者所持的同情态度和他们消除了利己主义。

辛西娅·阿斯奎斯论述劳伦斯是坦率的，而在她的《回忆与快乐》（1952 年）中却显得优雅。1969 年，她死后才出版的日记第一卷表露出对他宽恕和爱怜的赏识；她记下了对她朋友们和家庭所感受到的乐趣，因为她觉得她与劳伦斯有过一段风流韵事。

劳伦斯昔日朋友之一、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终年 90 岁的伯特伦·拉塞尔在一篇登载在英国和美国杂志上、传送到英国广播公司、在他的自传中又提及的回忆文章中为他作出粗暴的断言对一位直言不讳者进行延期的报复而感到庆幸，声称劳伦斯是位法西斯分子——一种几乎不能给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带来荣誉的过分的简单化。

另一位被劳伦斯称作“一只迟迟未去的蚊子”的劳伦斯怀恨者威特·宾纳保留了《与天才一起旅行》中刻薄之言，它是一本当新一代读者发觉劳伦斯是作家时而一度唤起对早先回忆的狂热的气氛的书。

但假如劳伦斯仍有毁损者的话，“那是他们的毒害”：劳伦斯已长久地超越了现世的鼓动。他的遗体在文斯墓地的一座偶尔被旅游者参观、两次接受露伊·伯洛斯拜访的墓穴中安息了 5 年。据说，劳伦斯个体象征的长生鸟是被一位忠实于劳伦斯的农民用彩色卵石装饰在他的墓碑上：这一故事使设计者多米尼克·马特耶西啼笑皆非，他认为自己不是农民，而是位资本家。墓碑现在悬挂在伊斯渥管理遗体部门会议室的墙上。

当根据弗丽达意思，安吉洛·拉伐格里赶到文斯准备将劳伦斯遗体掘出并且（3 月 13 日在马赛）进行火化之时，墓碑于 1935 年最终重新从文斯墓地迁出。经过了一番棘手的技术困难后，拉伐格里在 4 月 4 日将骨灰瓮送上了停泊在维尔弗朗什的“萨弗尔寓言”号船。在纽约港口，他进一步遇到了麻烦，在那儿，由于多萝西·布雷特朋友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兹的固执，而将骨灰瓮以一种残忍的荒唐的喜剧形式带上了岸。安吉洛·拉伐格里接着将骨灰带到了西部，当弗丽达在新墨西哥州的拉米车站遇见他时，骨灰瓮在一片混乱中被遗忘了，遗放在站台上。弗丽达直到走出拉米 20 英里路才发觉

丢失了东西，只得返回。正如弗丽达以后所说的，劳伦斯肯定会欣赏这一幽默情景的，因为他会对靠近陶斯的路标感到有趣，其帮助旅游者寻找路标上令人捧腹地称作“D·H·劳伦斯圣地”之所在。

他的骨灰最终被带到了山区大牧场，那儿弗丽达和安吉洛为骨灰而造了一所教堂。无论如何，洛汉夫人决意认为骨灰不是属于弗丽达的，而是属于世界的，这一点为自封为女代言人的洛汉夫人所指出。她于是同弗丽达的关系紧张起来，弗丽达对洛汉夫人1932年的回忆作了有益的提示：“我恳求梅宝重新写那本书，它对劳伦斯是不公允的，它微不足道！”另外，洛汉夫人迫使陶斯社会集团排斥安吉洛·拉伐格里：她总是邀请弗丽达而不是安吉洛参加一些不怀好意的聚会。以不总是起作用的忠实出名的弗丽达介入这些事件之中。但别的聚会者邀请安吉洛，他最终甚至被允许进入洛汉夫人庄园的神圣的围地。其时骨灰带到了，洛汉夫人决定去偷，但有人告知了弗丽达。一种看法是告密者是布雷特，她的《劳伦斯与布雷特》（1933年）看起来是调子比较温和回忆录中的一种。不管谁告的密，弗丽达马上将骨灰埋置在水泥祭坛中。过些时候，当布雷特被冷漠地请去让她居住的一间洛汉夫人的住房时，她摆出了一副债主巴特尔比的态度（“我不愿意”），直到洛汉夫人叫来警察将她撵了出去。布雷特从弗丽达埃尔普雷德住处迁到了山上的一座庄园，在那儿她可以利用一架小望远镜看到弗丽达和安吉洛是否有兴致勃勃前来探访的客人。

洛汉夫人死于1962年，比宾纳早6年；在她的最后的日子里，她精神恍惚。她有一些叙写劳伦斯“秘而不宣”的文章，其直到她死后20年才发表。尽管现在肯定有丰富而有价值的材料帮助我们认识本质上的劳伦斯，但可能她觉得她将作出决定性的说明。或许洛汉夫人论述他的文稿与那些长期埋积在亚伯拉罕·林肯和奥斯卡·怀尔德的完全不相干的案件中的文稿一样激动人心：与同这些人有关联而发表于1950年的文稿一样，出自洛汉夫人手下的对“神秘”的劳伦斯的展示，倒头来连一件破烂都不如。

劳伦斯骨灰传奇的其它插曲登载在1950年7月21日的《约翰·奥伦敦周刊》上，记者S·K，拉特克利夫在周刊上说，他的一位在陶斯的朋友告诉他，当弗丽达试图在教堂举行有一些印第安人参加的葬礼时，显然是充当他妻子傀儡的托尼·洛汉“在当地印第安人中散布墓穴中埋的是位伟大的人物而不能打扰他之言。如果他们介入此事，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将永远遭到诅咒。我朋友说，弗丽达只好叫人将圆锥形墓堆围守起来，叫远处其他的印第安人。”

随着住在靠近陶斯的埃尔普雷德的弗丽达于1956年8月11日她77岁生日那天离开人世，劳伦斯的故事也确实进入了尾声。她被安葬在他位于洛博山上坟墓（有时将它作为一块圣地来对待）的前面。

至于奥兰拉别墅，劳伦斯在文斯的临终之舍，日本学者塔卡诺利·伊里（译音——译注）在1972年试图找到它的位置，而“发觉除了一只充盈着脏水的大水塘外什么也没有。住在邻近的一位女士告诉我，奥兰拉别墅毁于1968年。我在该是别墅所在之地伫立了一会儿，望着细雨点在黄色的水塘面上跳跃。于是我发现了两棵树。我立即回忆起它们同你（和沃伦·罗伯特夫妇的）的《D·H·劳伦斯和他的世界》一书中照片上的树一模一样（第126页）。我满怀深情地拍下了这两棵树。”

至于D·H·劳伦斯，但愿因为他比大多数人活得更热切、表现他的经历

更直接，而传记对于他作品的理解比作者的大多数更来得重要，即使它们大多数明显是自传体的，某些劳伦斯的传记倾向于对他的刻划既过分地进行吹捧，又过分地怀有敌意；而另外某些传记作品则将其写成一位失去平衡的《天才，但——》这类作品遭到了阿尔丁顿的谴责。

在这一点上，劳伦斯不需要道歉，假如他曾需要的话。而他仍需要受到保护，因为他在很大程度上毫无根据地遭到了只有部分具有真实性的叙述、单纯的谎言和由联想引起的罪行的责斥（“一位心智健全者怎能容忍写那些回忆录的人们”？）。他自身最好的防范是他的作品，它具有一种比所有摧毁它的病态的企图生存得长久的健康。到了 70 年代，劳伦斯到处被认为是现代文学中举足轻重人物中的其中一位。他尤其对赞同他厌恶生活机械化看法的年轻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至于他的传记，假如它是根本必需的话，那么它的全部都是必需的。当他作法卑劣或使坏性子时，现在不要化力气去企图“原谅”劳伦斯，因为他经常如此；另一方面，不要因为这而企图使他成为目空一切的怪物。作为一位男人，如他们所说他经常是快乐和喜悦的，但有时他摔陶器——一种使坏性子的举止对一位回忆者和他的读者来说比起长时间的和蔼和光彩来更突出了戏剧性。我们中的某些人的确始终如一地喜欢一种更为安宁的生活方式；但关系最为密切的弗丽达觉得劳伦斯比起他的感情爆发要来得伟大；她忍受着，经常来顶嘴来活跃气氛。当 1932 年弗丽达在法庭为她丈夫的遗嘱进行争辩时，她的代理人（根据某些报道）因为他俩所度过的贫困的岁月而站起来伤感地将劳伦斯一生看作是和谐的典范——对于这点，弗丽达据说跳起来失声痛哭：“但是说我们拚命争吵是失实的！”到庭者据说当老法官梅里瓦尔伯爵露齿嘻笑时便哄堂大笑。

但即使劳伦斯和弗丽达确实吵过嘴，但他们将其置于一边而维持一种基本和谐的关系。劳伦斯在晚年写了一篇用恰到好处题目来概括这种关系的文章：《我们相依为命》。弗丽达关于他们一起生活的证言在她的劳伦斯的回忆录中、主要在《不是我，而是风》中找到。在《恋爱中的女人》中的劳伦斯具有相当经验的代言人——鲁珀特·伯金——同劳伦斯一样，具有一种强烈的支配欲，但他同伯金都更加强烈地要求有一种平衡的关系。在他沿着这些思路而进行的别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在《约翰·托马斯与珍妮夫人》中较早引述的航海隐喻，其中婚姻被看作是两条各自驾驶着的而在同一目的地会合的船。在这样的想法面前，劳伦斯与弗丽达的斗嘴可被看作不仅仅具有治疗性质，而有时还具有一点喜剧意义。索恩顿·怀尔德指出，许多那些叙写劳伦斯者这样写没有幽默感，没有把他认作是一位 *enfant terrible*（爱磨人的小孩）。关于劳伦斯财产结案的闻说，当弗丽达恐怕打断了她的律师对劳伦斯夫妇的婚姻的和谐所作的逼真而狂热的论说时，她不仅在法庭所进行的程序中加进了某些坦率的成份，而且还加进了一些健康而有益的幽默。

以后当梅里瓦尔伯爵称劳伦斯是“这位伟大人物”时，她欣喜若狂。劳伦斯的声誉自从他辞世后而变得好起来：实际上他的朋友们通过他们对登载在各种杂志上贬毁性的讣闻进行强有力的公开的抗议而取得了 1930 年斗争的胜利。在《民族与雅典娜神庙》中，E·M·福斯特提出了当时遭到挑战的论点，尽管它的判断现在普遍被接受：他称劳伦斯是：“他这一代人中最伟大而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

但 1932 年那年关于遗嘱的争论标志着劳伦斯的声誉开始下跌，因为其时由于梅宝·洛汉的《洛伦佐在陶斯》，回忆录的战斗继讣告的斗争之后又爆发了。后者讣闻为数不少是有失体面的，它们中的任何一篇都比不上吉尼特在《纽约人》中所写的，其在一位男子刚去世后说他喜欢脱得赤条条地爬桑树，又说他有一种大意是他的精神分析学理论被 C·G·荣格偷走了的妄想狂的信念。吉尼特（珍妮特·弗兰纳）在 1972 年将这些荒唐可笑的指责重印在使人回想起那粗俗讣告的一本书中。但劳伦斯摆脱了她所能及到的圈子，不过他没有爬到桑树上去，没有为荣格而感到忧虑。他创作的杰出之处将他从所有恶意中伤的谣传中摆脱出来。那些撰写怀有恶意的劳伦斯讣告的作者不可能写出像丽贝卡·韦斯特所撰写出来的关于劳伦斯的回忆文章那样的好作品。他们可从她那儿取些经。可以插一句的是，当像丽贝卡·韦斯特这样有价值的作家命笔赞美劳伦斯而卑劣的记者们却荒唐地将他描写成赤精精爬到桑树上去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一位以后创作出惊人的诗体长篇小说的作者阿纳斯·宁非凡地创作出一部关于劳伦斯的杰作。

1931 年，被阿尔德斯·赫克斯称“一部稀奇古怪的毁坏性的圣徒传记作品”的莫里的《妇女之子》开始对劳伦斯进行长时间的贬毁起了作用。但至少莫里给了劳伦斯郑重其事地对待他的荣誉；承认这个，一个人不管有什么不同看法而可容忍莫里的想法。这部莫里论述劳伦斯的第一本著作（重印于 1954 年，加了新的序言）多半是一种文学批评的形式。随应而出的回忆录几乎难及其尾。劳伦斯的传记作者们可能在描绘他的缺陷，但如洛汉夫妇和宾纳夫妇那样无中生有的做法只是颠倒是非而将劳伦斯贬低成为一位侏儒。莫里没有那样做：不管他可能把作为男人和作家的劳伦斯写得多么荒谬，但莫里至少将他看作是庄重的形象。

在所有至 70 年代为止的关于劳伦斯的回忆文章和著作中，最为清晰明白的莫过于弗丽达的《不是我，而是风》（1934 年），叙述坦率真挚。（以后，弗丽达试图稍作改头换面，企图将劳伦斯神圣化。）凯瑟琳·卡斯威尔的《野蛮人的朝圣》内容扎实，主要论点可靠。如原先所注意到的，布鲁斯特夫妇的《D·H·劳伦斯：回忆录与通信》以它公正无私而著称。但在回忆录作者中间，这种态度是罕见的。

长生鸟还是从一度成为传奇之余烬的他自身的骨灰中诞生出来。然而过一段时间，它们变成了被人遗忘的灰烬。读者因为 1929 年起的日益严重的经济萧条而开始将劳伦斯遗忘了，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几乎是完全把他置于一边，尽管劳伦斯的价值当时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但追忆的随营者们却使他看上去像位患癔病的白痴。现在，随着时间的推延，劳伦斯还其本来真实的面目。他的作品现在遍于世界各地，对他展开评述的反响是鼓舞人心的总为为数不多的评论家在为他说话：赫克斯利、霍勒斯·格雷戈里（《启录录》的朝圣者》（1934 年）的作者）、F·R 利维斯。辛辣地攻击仅仅是稍对他有些看法的任何人的利维斯是有生之年劳伦斯坚定不移的拥护者。值得庆幸的是，他从仔细考察入手而将劳伦斯的长篇小说作为激动人心的诗篇来加以研究的具有洞察力的论文以《D·H·劳伦斯：小说家》为名于 1955 年出版。威廉·蒂弗顿教父的《D·H·劳伦斯和人类生存》是这一主题的老练的抛砖引玉之评论著作。《弗蒂顿教父》在以后书的版本中变成了作者的真实姓名马丁·贾勒特克尔教父。马克·斯皮卡尔的《D·H 劳伦斯爱的伦理准则》通过主要的长篇小说来追踪它的主题。又在 1955 年，莱昂内·维万特的《潜在

性原理》对劳伦斯的生机说提供了一种透彻的哲学研究。威廉·约克·延德尔重印的论文以及导言表明了对他早先曾加以取笑的劳伦斯态度的转变（尽管他否定性的批评是有价值的）。当出现在《劳伦斯杂记》（1959年）中稍稍老迈的作家们的那些论文之旁的较为年轻的批评家的论文显示出正在茁壮成长的一代作家不仅对劳伦斯深为了解“而且能感人地明示劳伦斯在未来的重要性之时，马克·肖勒的杰作是为他为劳伦斯精选的集子所作的长篇序言中他对劳伦斯所进行的卓越自传体的和评论性的研究的预言。许多依然是年轻之帮的别的作家有价值地向《D·H·劳伦斯评论》投稿，一种由詹姆斯·C·考温精心编辑、阿肯色大学出版的非常重要的文学杂志。除登载大量有价值的论文外，《D·H·劳伦斯评论》还登载许多诸如大卫·E·杰拉德《D·H·劳伦斯在他诗歌、戏剧和小说中所运用的伊斯渥方言词汇汇编》（1968年秋）和罗斯·玛丽·伯韦《D·H·劳伦斯自早先孩童之时起的阅读书目》（1970年秋）的有意义的文献目录注释和如此有用的特写。由托马斯·L·厄斯金精心编辑的《文学和电影季刊》的第一期（1973年1月）包括八篇研究根据劳伦斯小说改编的电影的论文。一个D·H·劳伦斯的研究团体已在日本形成，另一个在他的本土伊斯渥，再一个在美国。正如带有诸如沃伦·罗伯特《文献目录》这样值得注意附录的各种单目和传记所显示的，劳伦斯研究已不断地在迅速发展。《书信集》已受到了残缺不全的指责（有不少多余的材料不能收进去，因为信件只能压缩收入一般容量的二卷集子中），现在一帮子劳伦斯研究专家正在为剑桥大学出版社编辑为人们所熟悉的、由劳伦斯列出的5000封信件。少数明智优秀的劳伦斯小说、诗歌和其它作品的版本也问世，但某些小说版本中原文有讹误，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英国和美国出售的《儿子与情人》包含着故事进行到尾声的高潮时刻而保罗·莫尔“低声吐出”妈妈这个词的惊人的讹误。而由交给印刷商的原稿（它现保存在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图书馆中）和最早印刷的版本可证实劳伦斯把这一词是写成“呜咽地说”。剑桥大学出版社在詹姆斯·T·博尔顿和沃伦·罗伯特夫妇主持编辑工作下也推出了原文正确的版本。

至于评论，诸如科林·克拉克的《消融之河：D·H·劳伦斯与英国浪漫主义》（1969年）的著作是阐述劳伦斯的里程碑作品（但请看发表在1971年春的马克·斯皮卡尔反驳克拉克之作《长篇小说：论坛或杜撰的小说》，还有乔治·H·福特的《双重衡量：D·H·劳伦斯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研究》（1956年）、基思·萨加的《D·H·劳伦斯的艺术》（1966年）、詹姆斯·C·考温的《D·H·劳伦斯的美国之行》（1970年）和司各脱·桑德的《D·H·劳伦斯：重要长篇小说之林》。还有其他优秀著作，作者如基思·阿尔德里特、阿明·阿诺尔德、比得·巴尔伯特、安东尼·比尔、菲利浦·卡罗、大卫·卡维迪什、艾利纳·柯勒萨迪尼克、H·M·戴尔斯基、艾弥尔·德拉芬纳、R·P·德雷帕、桑德拉·M·吉尔伯特、大卫·J·戈登、弗兰克·克莫德、汤姆·马歇尔、斯蒂芬·J·米科、朱丽安·莫伊纳汉、查曼·内厄尔、乔治·A·潘尼查斯·阿鲁纳·赛修、托尼·斯莱德、约翰·E·斯托尔、小E·W·特德洛克和金斯利·威德默。许多对较全面地了解劳伦斯起推进作用的文章不断地发表在专业性杂志上或收入评论集中；后者的其中一篇，即路易斯·L·马茨对《儿子和情人》进行精细分析的《意象的世界》值得一提，还有马克·金凯德威克斯关于《虹》和《恋爱中的女人》的一篇可以仅仅被称作毫无价值的论文。

将来必须确定的主要论点的其中一点是是否劳伦斯的“预言家”的一面将与“纯粹的创造力”共存。如果我们看到它是最为重要的方面与较为普遍公认的“有创造力”的劳伦斯相结合的三位合体的话，或许我们其时对作为预言家一面的劳伦斯将抱有更多的好感。三种预言分体的第一种可能被认为是布拉伐特斯基夫人、弗罗宾尼斯、詹姆斯·普赖斯和其他类似劝说者的混合体，而随附着一种相信诸如沉没的阿特兰提斯洲和它无法挽救的文化教士的信念。或许具有丰富想象力的现代诗人需要玄想的边缘世界和这种类型的胡说来激起他们的诗歌创作天赋。假如这样的话，这需要被理解和被安置好，因为我们中的大多数愿意处于与耶茨和《梦幻》略为相似的情形而做。就劳伦斯而言，他的玄想的这特别的方面是最为困难的，并且有时是他天性中最使人恼怒的部分；但它不是持久的侵入，尽管有时它变得使人讨厌。

劳伦斯预言方面的第二部分是最为简单的，也是最容易理解的；常识部分。这就是作为求实的预言家的劳伦斯，他推崇更充足的阳光，诅咒机器和污染，全面地抨击实利主义者的价值。有时是狂喜，而更多的时候是机智、会谈性和讽刺性的，这就是在诸如《三色紫罗兰》和《论文杂编》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中“人类的”、粗俗的、新闻的预言性频繁的缩减，尽管其随时会在他作品的任何之处出现。

劳伦斯预言的第三方面是三者中最可信和结合得最好的。它不是以一种深奥、神奇莫测的方式和报刊文章的易于理解的理性主义来了解我们世界的价值，而代之以与富有想象力的价值的大规模的结合——一种长久为人所熟悉和深深地体验到的主题的戏剧化、充分的具体化、虚构的和谐的结合。就劳伦斯而言，这就是他对威胁自然的机械力量所持的反对态度：“血的认识”带来了生命所需要的、哲学家们以他们各种方式进行追求的平衡。这就是赞美完整的人而不是被产业主义或钱欲或机械的爱情扯得粉碎的人的劳伦斯——他就是在表现中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真实的作为预言家的劳伦斯，他写出了他最优秀的作品。

在《关于一只豪猪之死的反思》中（现在《菲尼克斯之二》中）的劳伦斯随笔中的其中一篇《长篇小说》是与他曾提供的一切一样严密准确的一种关于他特殊天赋的描述。他相信长篇小说在面对人生方面应该是“高尚的”，它的各个方面应该是生气勃勃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它应该是“敏锐”的。这种“敏锐”是与死亡相对立的“对万物中上帝之火”的一种情感；敏锐“看上去存在于易变的、转化的、奇异的或美丽的联体”的一种奇特的类型之中。他房间中的一张桌子是僵死的：“它甚至不是苟延残喘地生存着。还有只荒唐可笑的小小的铁炉，因为某些未知的原因，其是敏锐的。……还有一只打盹的猫，非常敏捷。哎哟还有一盏僵死的玻璃灯。”劳伦斯认为，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必须与小说中所有其它的事物有一种敏锐的关联：雪、臭虫、阳光、男性生殖器、火车、大礼帽、猫、哀伤、食物、人物、白喉、倒挂金钟属植物、星星、念头、上帝、牙膏、闪电和手纸。他必须与所有这些事物处在一种敏锐的关系之中”。并且，尽管“你可以愚弄有趣的、几乎是所有的媒介物”，“但你不能愚弄长篇小说”。甚至是虔信派教徒的诗歌也作为诗歌而幸存下来，但一部长篇小说中的哈姆莱特将“具有一半的喜剧性，或有点猜疑……不知怎么地，你在诗歌和戏剧中打扫得稍干净点，你让通人情的话语讲得稍自在些。现在一部长篇小说中，其总有一只雄猫，一只扑向洁白的语词之鸽的黑色的雄猫，如果鸽子没有防范它的话；还有绊足的香蕉皮；

你知道还有住舍中的盥洗室。所有这些事物有益于保持平衡。 ”

在另一篇随笔《为何小说至关重要》中，劳伦斯将长篇小说称作是“一部辉煌的生活之书”。它仅仅是阐述完整的活生生的人。”作为一位小说家，我把自己看作胜过天使、科学家、哲学家和诗人”；虽然他们可能是研究“活生生人不同点滴的大师”，但他们永远也不能达到研究完整的人的地步。劳伦斯总是远远地摆脱了将长篇小说供消遣的看法：“拿它的最高极来说，长篇小说和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长篇小说可以帮助你。它可以帮助你 not 成为生活中僵死的人。”因为“只有在长篇小说中，所有的事物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或至少它们可能得到充分的表现，当我们认识到生命自身而不是死气沉沉的安全体是一种生存的理由之时。由于出于所有这些事物的充分表现，所出现的唯一事物也就是任何的事物，整体的男人，整体的女人，活生生的男人和血肉饱满的女人”。

我们时代的其他作家有谁拥有如此繁富和多样的作品而留给我们这么少不值一读的几行文字或这么多如此充满生命、如此真实可信地充满诗意。如此“敏锐”的作品呢？

没有其他作家给我们如此强有力的信念：

那美丽超于坟墓之上，

那完美、辉煌的经历永远不会垂临

于乌有，宁可时间使月亮变得黯淡

也不愿在这种奇特生命中的我们的完美

失去光彩或趋于死亡。

